







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知识生产与革新

陈 恒 陈慧本 主编



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 :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知识生产
与革新 / 陈恒, 陈慧本主编.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25. — ISBN 978 - 7 - 100 - 25029 - 0

I . K10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CC678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知识生产与革新

陈恒 陈慧本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25029 - 0

202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2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½ 插页 2

定价: 148.00元

主编介绍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著译《世界史与当代中国》《西方城市史学》《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读书》等刊物上发文多篇。主编《世界历史评论》《新史学》等杂志。主编“光启文库”“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等丛书。

陈慧本

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研究领域为19—20世纪德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学术研究》《新史学》等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德国新历史主义史学研究”（22CSS02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德国历史学话语及知识生产研究”。

序言：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

自古以来，权力与知识的共生、纠结乃至互动，一直是学界一个古老而又常新之主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王”的概念，主张只有那些掌握了真正知识的哲学家才有资格统治国家，真正的知识不仅仅是事实的认知，而是对于善和正义的深刻理解；而在雅典城邦政治中，雄辩术等知识也在公共事务讨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表明，在古希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一方面被视为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关键，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实际政治行动和影响力的来源。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概念以强调两者的相互作用，认为权力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实施控制，而知识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利奥塔进一步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的知识霸权，“知识和权力是提供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指导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问题”¹。总的来看，古今的哲人智者们对此皆极为关注而又都未能有定论，但古今中外的各个民族都对人类基本知识的构成、演变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贡献。

历史学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解释，它更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一种理解现实、塑造未来的工具。历史学推进着人类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当然，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思路来研究过去，而这些思路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换言之，作为一种知识，历史学的展开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和空间。

1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4页。

近世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西方世界逐渐兴起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这不仅是经济版图的大分流，同时也是文化知识版图的大分流。西方现代知识话语是西方世界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观念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现代化实践及其世界构想观念的结构。这种知识话语天然地以西方为中心，却在经济霸权与文化霸权互为表里的作用下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

于是乎，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在经济政治上向西方看齐，还意味着有意无意地接受西方的文化观念。现代西方的“历史”是一个“集合单数”概念，被归结为某个单一不变的主体的连续发展过程，如赫尔德重视人类文明的整体特征，认可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却又强调欧洲是人类文明的特殊优待区。现代化观念通常将历史视为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遮蔽了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如萨义德指出，“东方学”是西方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象，其实质乃是一种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机制。其实，赫尔德的理论还为我们解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我们可以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同时否定其中之一具有价值上的优越性，进而平等地看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特质。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知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享着鲜明共识：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张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反对霸权、追求正义。这就要求我们跳出既有的范式，以发展、辩证的眼光看问题，绝不能沉浸在既有范式中自我陶醉。

归根结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都是知识生产的建设；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是知识策源地的竞争。没有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就不会产生强大的学术磁场，也没有真正的文化引领力。“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旨在系统梳理全球世界史的发展，以期助推我国学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扩大我国学者在世界史领域的话语权和解释力。本发展报告以知识史、思想史路径为基本原则，依据世界史知识生产现状，按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学科、观念、方法等背后的深刻原因，盘点每个领域的具体数据、发展路径。发展报告分国外、国内两部分进行梳理，力图通过案例的深入挖掘、研究，形成中外对比，以期在比较中看发展、找差距、补

不足，揭示中外知识体系的异同与联系。

建设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让我们通过文字磨砺“批判的武器”，以思想作为实践的路径，传递我们在大变局时代下的点点薪火。

本报告的编写获得教育部首批文科实验室“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的资助。

世界史学术发展报告编写组

2023年12月25日

目 录

· 序言：知识世界与人类文明	i
德国殖民史学的范式转变——杨怡萱 张骏	1
现代历史知识的形成与演进：一个德国的案例——尉佩云	24
走向通史之路：知识史研究的德国面貌——范丁梁	45
近现代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与欧洲观念——信美利	65
20 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分期、理论进展与史学实践——黄 璐	93
英美史学界的古罗斯研究：知识传统与学术转型——周厚琴	110
苏联社会史家中的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学派 ——霍佳科夫著 颜敏翔译 孙熠智校	133
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姚汉昌	159
加勒比区域史的研究历程、特点和未来展望——陶万勇	186
越界与回响：动物史研究的起源、发展与现状——刘晓晨 包 颖	229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的工作与经济地位——黄嘉欣	251
从拒绝到接受：伍麦叶王朝史研究与西方对穆斯林传统文献的认识——赵 琳	273
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梁道远 卡哈尔·阿里木	294

近五年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发展报告（2019—2023）——董子云	361
20 世纪菲律宾民族史学书写：基于菲律宾史学组织的考察——尹蒙蒙	391
• Contents and Abstracts	421
• 作者简介	429

德国殖民史学的范式转变

| 杨怡萱 张骏 |

摘 要：由于德国殖民历史时间的短暂性和空间的有限性，德国殖民史研究长期以来都处于德国史学的边缘地位。而德国殖民史学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德国史学的历史缩影。20世纪70年代以前，民族神话叙事一直是主导联邦德国史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但自德国1884年开启殖民，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史学发生转型，这期间的德国殖民史学发展不仅体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而且同时完成了“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史学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殖民理论的传入为德国殖民主义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导和理论可能性，自此德国殖民史学开启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后殖民转向。同时，德国殖民史学的日渐成熟与显学化也拓宽了殖民主义之概念，这为帝国史乃至德国现代史中的纳粹主义研究重新开拓出一条历史出路。

关键词：德国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德国史学

引 言

德国殖民史目前在国内的德国史研究中属于一个极为边缘的话题。一是因为国内学者对德国的研究相比英美史的研究而言更受语言的限制，而语言在研究中的刚需性又与原始史料被充分解读及运用的程度息息相关。因此，德国史研究的全面性和成熟度还欠缺一定火候，学者们自然更偏向于优先处理德国历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与热点学术话题。二是因为德国殖民的历史本身短暂。德意志帝国在整个殖民列

强队列中属于后起之秀，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起初反对德国开展海外扩张，直至1884年才改变自身立场，继而支持德国加入争夺非洲的欧洲竞争队列之中。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宣称先前授予烟草商阿道夫·吕德里茨（Adolf Lüderitz）的西南非洲部分地区现在受到德国的保护。¹故此，德国正式拥有了自身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而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Berliner Konferenz）上，欧洲殖民列强相互之间正式确认了对非洲领地的殖民分割。而“一战”结束后，德国拥有的全部殖民成就却一夜之间灰飞烟灭。²并且，整个德意志殖民帝国在全盛时期也仅包括非洲四个区域（以纳米比亚为主的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以坦桑尼亚为主的德属东非）、南太平洋岛屿上的部分领土（新几内亚东北部、萨摩亚的一部分、俾斯麦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以及中国山东的胶州半岛。由此可见，其殖民地相比于英国领土而言破碎且零散，故既不宜大量移民，经济开发价值也略显逊色。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1893年时德国进口总额中来自殖民地的部分仅占比0.1%，到了1912年时该比重也只提升到了0.4%；而1893年德国出口总额中输往德属殖民地部分的比例为0.2%，1912年时该数额也仅增加到了0.5%。³因此，在整个殖民史研究范畴中，国内学者对德国的关注度明显是大幅度低于英法美等老牌殖民帝国的。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在德国史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一份关于德国殖民史

1 Sara Lennox, “Postcolonial writing in Germany”, in Ato Quay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20.

2 有关“德国对外殖民扩张”这段历史的时间与空间界定问题，学者们存在不同的修正意见。基于“1884—1918年为德国殖民时段”这一学术共识，以汉斯·芬斯克（Hans Fenske）和苏珊·赞托普（Susanne Zantop）为代表的学者继而提出，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前乃至近代早期也存在大量私人商业性质的海外扩张行动，这一段历史已然可以证明德意志帝国在实际扩张之前就已形成了殖民主义幻想。具体可参见Hans Fenske, “Ungeduldige Zuschauer: Die Deutschen und die europäische Expansion 1815–1880”, in Wolfgang Reinhard, ed., *Imperialistische Kontinuität und nationale Ungeduld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pp. 87–123。以及Susanne Zantop, *Kolonialphantasien im vorkolonialen Deutschland, 1770–1870*, Berlin: E. Schmidt, 1999；而以Dirk Van Laak、Gisela Graichen以及Horst Gründer为代表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第二帝国时期的殖民行为与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在东欧的扩张实则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德国殖民主义也应当将后者纳入其内。关于这一观点的探讨可参见Dirk Van Laak, *Über alles in der Welt: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unich: C. H. Beck, 2005。以及Gisela Graichen, Horst Gründer, *Deutsche Kolonien. Traum und Trauma*, Berlin: Ullstein, 2007。

3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 p. 149.

较为详述的研究综述。仅有的几份与德国殖民史相关的文献也是着力于梳理德意志帝国时期殖民的历史脉络与基本概况，研究视角大多停留在外交政策或军事冲突上，而对殖民者抑或是被殖民者社会文化层面的探讨则着墨不多。国内学者中对德国殖民史最早的关注应当始于陈晓春的《俾斯麦和德国的早期殖民地扩张》¹，这篇文章从德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对俾斯麦推行殖民扩张的行为动机做出了相应解释。此后邢来顺的《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继而认为德国殖民地的形成是德国政府、商人、传教士以及探险家们通力合作的结果。并且，在对待俾斯麦殖民态度转变这一问题时，邢来顺与陈从阳二人均指出，该行为同时受到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从国内环境来看，除了民族主义的煽动与缓解1873年经济萧条的压力以外，俾斯麦更是为了在1884年大选中获得政治主动权；同时，这一阶段英俄、英法矛盾的加剧，也为英国在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这一问题上被迫让步提供了前提。²除此之外，出于史学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本国史的原因，国内学者更多放眼于德占青岛期间的历史境况与中德交流或从德占青岛的视角来分析德国殖民问题。³此外，孙立新的《近代来华德国人已刊纪实报道选介》集中介绍整理了大量来华德国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游记、记事报道、回忆录和研究性专著等各种各样的纪实报道，并鞭辟入里地指明此类文献所蕴含的极高史料价值。尤以作者在文中所言为代表，近代来华德国人报道的中国近代状况虽然需要辩证分析其客观性和真实性，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中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的……他们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代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观的复制”⁴。近几年来，一些从国际关系、后殖民主义、文本分析等跨学科方法入手，从更加立体全面的视角对德国殖民问题进行创新性分析的研究

1 陈晓春：《俾斯麦和德国的早期殖民地扩张》，《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第91—97页。

2 邢来顺：《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98—103页。陈从阳：《俾斯麦非洲殖民原因探析》，《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第128—131页。

3 景德祥：《从青岛看德国殖民统治与中德文化交流》，《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孙立新、孙虹：《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德合作”》，《北大德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88—104页；张焱：《德占青岛时期的种族主义印记——以“华洋分居”和“华洋分治”政策为中心考察》，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孙立新、王保宁：《德国殖民统治下的青岛中国人社会（1897—1914）》，《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高莹莹：《青岛德文报纸的创办与德国殖民政策》，《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4 孙立新：《近代来华德国人已刊纪实报道选介》，《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第170页。

成果接连出现。¹较为前沿新颖的则当属范丁梁的《德意志帝国的区域研究——以殖民地区为对象》²，该文从知识史视角切入，为后继学者了解“德国殖民当局对殖民地知识认知体系的建构”这一问题提供了先例。

德国殖民史研究较边缘化的问题也曾是欧美史学界探讨过的一大难题。波兰学者马乌戈扎塔·帕基尔（Małgorzata Pakier）和博·斯特罗斯（Bo Stråth）曾将“殖民主义”界定为“欧洲四大黑暗过去”之一。³就德国在以上四大历史事件中的特殊性而言，它为期短暂的殖民历史相较于其他三者确实只处于次要地位。此外，德国殖民地在“一战”后直接被其他欧洲国家接管，因此德国人也没有经历过非殖民化带来的社会痛苦与反思。更重要的是，战后德国史学界在德意志特殊道路问题（Sonderweg paradigm）上的纠缠，也成为德国学术界内殖民史兴起、发展乃至范式突破的重大阻碍。相比之下，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带来的屈辱性记忆大体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与“二战”和大屠杀有关的惨痛记忆。⁴

那么这是否就证明德国殖民史问题已然全无深入研究的必要了呢？实则不然。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对德国殖民历史的关注度及兴趣都有了显著的回升，相关研究成果、学者和机构层出不穷。至少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教授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看来，这一转向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1. 德国殖民主义具有不同于其他欧洲殖民帝国的独特方式，这在比较史及全球史历史学家看来，是一个极具指导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案例；2. 德国殖民主义的影响具有超越时空的深远性，在时间上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在空间传播上从殖民地渗透至本土；3. 全球一体化进程下殖民问题仍然是当今政治冲突的核心。”⁵

1 张睿佳：《世界体系视角下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高凡：《殖民想象与帝国话语：1896年柏林殖民展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2 范丁梁：《德意志帝国的区域研究——以殖民地区为对象》，《光明日报》2024年1月29日第14版。

3 Małgorzata Pakier and Bo Stråth, *A European Memory?: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Politics of Remembr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0, p. 14.

4 Monika Albrecht, “Negotiating memories of German colonialism: Reflections on current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memory politics”,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47, no. 2 (2017), p. 3.

5 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trans. by Sorch O’ Hag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5.

研究领域发展缓慢，有时很大程度上与它所具有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相挂钩，但对于已知其价值却仍未获得相应重视的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袖手旁观。因此，对德国殖民史这一研究空白的及时填补，既是德意志帝国史，也是跨国史研究当中的重要一环。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对此展开专门的深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愿从德国殖民史研究的史学范式更替视角出发，对国外德国殖民史的研究成果、现状做整合与分析，若有欠缺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主导联邦德国史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就是民族神话叙事（*nationale Meistererzählung*）。¹这样的史学叙述话语固然也会同样映射至同时期与德国殖民问题相关的研究著述之中，但自德国1884年开启殖民历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史学发生转型，这期间的德国殖民史学发展，依然呈现出纷繁复杂、互不相同的阶段特征。

“一战”之前，有关德国殖民史的诸多研究成果大多都不是出自专业史家，而是主要由军事长官或行政官员的研究报告构成。譬如，德国地理学家柯特·冯·弗朗索瓦（Curt von François）的《德属西南非洲——1893年4月与维特布伊交战前的殖民历史》（*Deutsch-Südwestafrika. Geschichte der Kolonisation bis zum Ausbruch des Krieges mit Witbooi, April 1893*），便是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殖民地调查报告。²弗朗索瓦此前曾是一名探险家，1889年被德意志帝国殖民政府任命为德属西南非洲帝国安全部队（*Imperial Schutztruppe*）的军事指挥官，随后被提升为陆军司令。除此之外，其继任者特奥多尔·洛伊特魏因（Theodor Leutwein）1906年出版的自传《在德属西南非洲的十一年总督生涯》（*Elf Jahre Gouverneu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也同样值得关注。长期身居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原住民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得洛伊特魏因逐渐意

1 徐健：《21世纪德国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讨论》，《世界历史》2015年第6期，第115页。

2 Curt von François, *Deutsch-Südwestafrika. Geschichte der Kolonisation bis zum Ausbruch des Krieges mit Witbooi, April 1893*, Berlin: Reimer, 1899.

识到，殖民军队对殖民地的残酷镇压长远来看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其在报告中意在呼吁，殖民政府应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寻求本地机构和当地酋长的协助。¹

显而易见，这一时期记述殖民地政治经济状况的作品，无一例外均以德国人抑或德国殖民机构为叙事主体，并且旨在尽可能地展示当时殖民者，或至少是作者本人的正面形象。《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丧失其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在该和约内容公开之时，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和德国民众一样，对祖国失去殖民地感到惋惜与沮丧。但这一时期，对德国殖民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成果依然主要集中于政治界和新闻界，历史学家的贡献微乎其微。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则当属前德属新几内亚总督海因里希·施奈（Heinrich Schnee）编写的《德国殖民地词典》（*Deutsches Kolonial-Lexikon*）²；六年之后施奈又撰写了一部替德国殖民主义辩护的著作《德国殖民的过去与未来：德国殖民地的真相》（*German Colonization Past and Future: The Truth about the German Colonies*）³。施奈的写作意图无外乎对《凡尔赛和约》当中关于“德国殖民罪行”的“不合理”论断，以及对“德国人以‘暴力’和‘不文明’方式统治其殖民地”的相关“不实”指控进行反驳，以此试图让协约国归还德国先前所拥有的殖民地。换句话说，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远不如德国的殖民统治那么“仁慈”，因此作为世界上主要文明国家之一的德国，有权继续参与殖民化的相关项目。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维护德国殖民统治成就、恢复德国国际声誉、呼吁协约国将殖民地归还德国等方面，费了不少力气。

这种辩护心态在20世纪50年代时依然得到延续，至少从奥斯卡·欣特拉格（Oskar Hintrager）编撰的《德国时期的西南非洲》（*Südwestafrika in der deutschen Zeit*）中仍可以看出。⁴欣特拉格是“二战”后退休于西德的原德属殖民地高级官员，他在这篇报告中描述了许多与殖民管理相关的事件。另外，长期以来德国史学界有

1 Theodor Leutwein, *Elf Jahre Gouverneur in Deutsch-Südwestafrika*, Berlin: Mittler, 1906.

2 Heinrich Schnee, *Deutsches Kolonial-Lexikon*, Leipzig: Quelle & Meyer, 1920.

3 Heinrich Schnee, *German Colonization Past and Future: The Truth about the German Colonies*, with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Harbutt Dawson, London: G. Allen & Unwin Limited, 1926.

4 Oskar Hintrager, *Südwestafrika in der deutschen Zeit*, München: Kommissionsverlag R. Oldenbourg, 1955.

关“普鲁士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等领域的研究，几乎都绕不开对德意志特殊道路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以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为中心的费舍尔学派（Fischer Schule），主要关注“一战”期间由德国政治家、军事将领和垄断资产阶级共同设计的战争目标。¹他们的选题偏好充分向读者表明，此时的史学家们依旧对战事决策过程和关键决策人物充满兴趣。

20世纪60和70年代，代表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主流趋势的当属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和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为首的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er Schule）。尽管其大力批判“传统史学忽略了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意义，只注重对历史事件的考察，只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²，但是比勒菲尔德学派在那一时期的书写对象，还是以“社会经济力量”和“战略精英”为主。他们对“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和更为普遍的“新文化史”仍抱有批判性的态度。³正如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在1978年所写：“大众的行动和信仰被解释为社会高层的精英对他们施加的影响，这是对比勒菲尔德学派和特殊道路范式的一个诙谐的概括。德意志帝国仿佛被呈现为一个木偶剧院，容克阶层和工业家牵着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则在历史舞台上笨拙地跳舞，缓缓走向第三帝国的最终帷幕。”⁴韦勒的《俾斯麦和帝国主义》一书（*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便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一种典型体现。在这部作品中，韦勒认为殖民主义（Kolonialismus）应该被解读为社会帝国主义（Sozialimperialismus）；同时，俾斯麦允许开启殖民计划这一行为背后的实际目标，不仅是为了确保政府获得足以支撑德国经济扩张的资源，更是为了通过完成这看似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使得俾斯麦富有魅力的统治体系

1 1961年汉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弗里茨·费舍尔出版专著《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Düsseldorf: Droste, 1961）；1969年出版专著《一场幻想的战争》（Fritz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 Düsseldorf: Droste, 1969）。

2 王亚平：《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第44页。

3 具体可参见 Alf Lüdtke,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trans. by William Templ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以及 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sches Denk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1945–2000*,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1, p. 61。

4 Richard J. Evan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otowa, NJ: Croom Helm, 1978, p. 23.

显得更加成功和稳固。¹根据韦勒的这一解释，德意志帝国时期海外扩张的主要目的，在于迫使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政治反对派支持新的国家发展计划，从而借此分散这一群体对国内社会矛盾的注意力。韦勒的确是从殖民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威廉二世时代的社会冲突，但自始至终他的研究重点和目光都不在多哥或喀麦隆这些深受德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害的被殖民地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将德国的世界扩张主义愿景视作20世纪德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之一。例如，最典型的一种说法主张，德意志在第二帝国时期便已在孕育着一种纳粹帝国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政治文化。²因此，军国主义（Militarismus）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等话语，总是不自觉地将殖民历史带入一种由德意志特殊道路和德意志帝国主义共同构成的宏大叙事之中。德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才是这些历史家探讨深究的核心问题，被殖民者此时似乎依旧处于主流叙事舞台的幕后，不被发现。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种全新的、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史学转向初露苗头。这一新态势对以“自上而下”为主的联邦德国历史书写范式，带来了极具冲击性的挑战。至此，德国人终于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身的殖民时代，而这一转变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时代风向的扭转与史学理论的创新为殖民史研究的转向搭建了一套发展框架。60年代末，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欧洲政局急速左转，全球非殖民化进程纷纷启动，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受到公众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之下，德国此前那段不光彩且被纳粹恐怖所笼罩的殖民历史记忆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其次，在史学领域，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这一率先于英国劳工史研究领域兴起的史学理论转向，则为同时期德国史学中仍旧盛行的普鲁士中心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批判发展的力量。由此，一种以历史批判为特征的“民族叙事”继而诞生，德国史学的叙事模式从先前的民族神话叙事转向了所谓的民族历史批判性叙事（nationale Kritischerzählung）。在此理论指导之下，学者们得以重新评价德国殖民历史。

1 Hans-Ulrich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 Köln: Kiepenheuer und Witsch, 1972.

2 具体可参见 Mommsen Wolfgang,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Frankfurt: Fischer Bücherei, 1969, p. 168.

1971年赫尔穆特·布雷（Helmut Bley）所著的《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1894—1914》（*South-West-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就是一部从“自下而上”视角对德国殖民历史进行再次审视的初尝试。布雷在书中聚焦于德国与其西南非洲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指责德国人抢夺非洲人的土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制造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最重要的是，针对1904—1907年德国对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Nama）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¹，布雷大力抨击德国殖民军事手段的残酷；同时布雷也将“极权主义的产生”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二者相联系起来。²有关布雷这一观点引发的后世争论，本篇后文将做详细阐述。同时，这一时期德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们对殖民史的讨论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德国，其很多作品都是首先围绕“欧洲扩张主义”这一更大的主题顺势展开的。这一研究趋势以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霍斯特·格伦德（Horst Gründer）、瑞士历史学家鲁道夫·冯·阿尔贝蒂尼（Rudolf von Albertini）、德国全球史家于尔根·奥斯特海默（Jürgen Osterhammel）和沃尔夫冈·姆森（Wolfgang Mommsen）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帮助德国殖民史研究建立了一套较为稳固的学术传统。³其中，格伦德的研究兴趣常年集中于德国殖民史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其先后出版了多本与德国殖民史相关的研究著作。一方面，格伦德的研究旨趣侧重于探讨基督教传教士在德意志帝国建设之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格伦德又尤为关注非洲和中国，其曾尝试比较德国与其两大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⁴

在此我们本不应忽视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对德国殖民的相关研究，但是相比于联邦德国的史学发展趋势而言，民主德国的史学研究总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贯穿始终。

1 赫雷罗和纳马种族灭绝是德意志帝国针对德属西南非洲（现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发动的一场种族灭绝和集体惩罚运动。这是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灭绝，其发生在1904—1907年间。本次种族灭绝屠杀了50000—65000名赫雷罗人和约10000名纳马人。

2 Helmut Bley, *South-West-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 London: Heinemann, 1971.

3 例如，那段时期重要的著作有 Wolfgang Reinhard,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Expansion*, 4 vols.,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83–1990; Rudolf von Albertini, *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 1880–1940*, Zürich: Atlantis, 1976; Jürgen Osterhammel and Wolfgang Mommsen,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4 Horst Gründer, *Christliche Mission und deutscher Imperialismus: Eine politische Geschichte ihrer Beziehungen während der deutschen Kolonialzeit (1884–1914)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Afrikas und Chinas*, Schöningh, Paderborn: Brill Schöningh, 1982; Horst Grün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 Paderborn: Brill Schöningh, 1985.

因此，在有关反思德国殖民主义这一问题上，民主德国则声称完全与过去的殖民历史决裂，并与深受西方“新殖民主义”压榨的人民团结一致。¹故而，民主德国的德国殖民史研究几乎不存在较为明晰的范式革命，故在正文中不对此做深度分析与探究，但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仍旧可以作为后世学者发扬德国殖民史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基石。²

20世纪80年代以后，涉足文学批评、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后殖民主义研究浪潮传入德国，这为德国殖民主义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导和理论可能性。以解构“欧洲中心论”和民族主义史学传统为目标的后殖民理论，至少间接地促成了殖民主义史学新篇章的出现，德国殖民史研究也自此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二、全球史浪潮下的后殖民转向

德国殖民史的后殖民转向，绝非仅仅在吸收海外后殖民理论之后便直接完成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趋势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与同时期德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德国殖民史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全球史研究进程中的一部分，也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换句话说，德国殖民史学孕育自全球史，同时又不断滋养着后者。

（一）德国全球史研究的兴起

自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叙事就在德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中得以牢固确立。虽然比勒菲尔德学派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时大力提倡在治史中融入社会科学方法，并不断尝试超越历史主义史学，以及努力将德国史学传统中的“民族国家叙事”眼光扩

1 Britta Schilling, “German Postcolonialism in Four Dimens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8, no. 4 (December 2015), p. 429.

2 一些代表性研究譬如 Ernst Hillebrand, *Das Afrika-Engagement der DDR*, Frankfurt a. M.: Lang, 1987; Ulrich van der Heyden, *Engagiert für Afrika: Die DDR und Afrika*, 2 vols., Münster: LIT Verlag, 1994; Ulrich van der Heyden, *Die Afrikawissenschaften in der DDR. Eine akademische Disziplin zwischen Exotik und Exempel. Eine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Münster: LIT Verlag, 1999。

展为研究现代化社会进程的结构性史学，但归根结底来看，其终究是一种无法脱离“民族性”的社会史学。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德国这样一个最早实现历史学专业化的国家，其全球史研究进度，无论是在起步还是在成熟度方面，都大为落后于英美学界。目前，德国仍然属于那些正在努力跟上最新史学前沿的国家之一。对此现状，奥斯特海默给出如下解释：“在全球历史研究领域工作（或对其感兴趣）的绝大多数学者不容易获得以德语出版的作品。除了这一平常且极为务实的考量之外，将德国对全球历史研究的贡献视为一种独特、独立且界限清晰的论述，并非显而易见的事。德国历史学家一些最好的作品现在是以英文出版的，要寻找其‘德国性’的痕迹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最终是徒劳的。”¹而国内学者也曾对此问题提出过独特的见解，陈浩认为“长期占据德国史学争论中心位置的‘特殊道路’问题，以及德国民族国家叙事的主流历史书写地位”²是这一问题的答案。

不过，学科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慢，并不等同于学者所产出的学术成就价值匮乏。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史作为一个前沿领域在德国史学界受到热议后，国际舞台上德国全球史家的身影和史学作品愈发丰富。目前德国全球史研究的主力军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史学家³，他们甚至还创办了相关的全球史刊物。例如，既是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又是莱比锡大学全球与欧洲研究所（Global

1 Jürgen Osterhammel, “Global History in a National Context: the Case of Germany”,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vol. 20, no. 2 (2009), p. 41.

2 陈浩：《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5页。

3 这一群体的代表性学者及其作品主要有于尔根·奥斯特海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013年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出版了德语学术界第一本全球史理论性著作（Sebastian Conrad, *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 H. Beck, 2013）；2016年其将该书改写为英文版（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但其实可以等同于康拉德重写了一部书。2018年两本书均已推出中译本，具体可参见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又名夏多明，其2011年出版的全球史著作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德国全球史发展的现状，该书2022年已推出中译本，具体可参见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董欣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马蒂亚斯·米德尔最近在《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史与空间转向：从区域研究的影响到全球化关键时刻的研究》的文章。该文凝练了米德尔近年来对传统的区域研究与全球史之间异同的思考。可参见Matthias Middell and Katja Naumann, “Global History and the Spatial Turn: From the Impact of Area Studies to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Issue 1 (2010), pp. 149–170.

and European Studies Institute) 所长的马蒂亚斯·米德尔 (Matthias Middell), 就是德国权威史学刊物《比较：全球史与比较社会研究杂志》(*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的主编。

近年来德国全球史迅猛的发展浪潮自然将“德国殖民史”这朵亟待绽放的浪花推送到历史学家的眼前，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德国殖民主义史》¹ (*Deutsche Kolonialgeschichte*)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康拉德立足于德意志殖民帝国，但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之外更广泛的殖民关系问题。这意味着，在时间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早已跳出德国官方正式展开殖民扩张的三十四年 (1884—1918)。向前，可追溯至德意志帝国统一前的“帝国幻想时期”；向后，则推进至“一战”之后德国人以及被殖民者对殖民经历的历史记忆建构时期。在空间方面，该书首先关注的是早先归属于德国的官方殖民财产，随后又进一步考察了德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互动性联系，并将19世纪末的德国殖民主义置于一个“泛欧洲”的概念内进行解读。毕竟，同时期帝国对外殖民关系的构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德国国内社会矛盾。

除此之外，德国全球史家对殖民问题的关注还体现在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全球史理论著作《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之中。同时，这一群新生代全球史历史学家还逐步接触到了文化转向、有关东方主义的辩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跨学科理论。²

因此，早先那种沉迷于西方或非西方、进步或落后、文明或野蛮等二元思维固化模式中的史观逐渐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德国学者开始批判性地反思德国现代史的路径与模式。尤其是在对待殖民扩张这段历史时，德国全球史家主张将全球性的意

1 德文初版参见 Sebastian Conrad, *Deutsche Kolonialgeschichte*, München: C. H. Beck, 2008; 英译版参见 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trans. by Sorchia O' Hag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一些学者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和东方主义辩论等相关思想流派引入了德国学术界。最主要的为康拉德与兰德里亚合编的论文集，该书编者提倡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应用到德国历史研究之中，具体参见 Sebastian Conrad and Shalini Randeria, eds., *Jenseits des Eurozentrismus: Postkoloniale Perspektiven in den Geschicht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Campus, 2002。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参见 Jürgen Osterhammel, “Edward Said und die ‘Orientalismus’-Debatte. Ein Rückblick”, *Asien Afrika Lateinamerika*, vol. 25 (1997), pp. 597–607。

识和地区性研究相结合，旨在关注民族国家范式主导下一向被史家忽视的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交流进程。同时，将此前研究过的问题重新置于全球性背景下，并从跨国视角和被殖民者角度出发重新书写的尝试也愈发丰富。由此可见，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已成为历史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们为数不多的集合点之一。¹

（二）德国殖民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后殖民理论之所以能成功融入德国殖民史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史学在德国的发展；而德国全球史相较于英美全球史研究，最独特的价值便在于“得到德国殖民史的助力”²。通过归纳整理后殖民转向后历史学家们有关“德国殖民史”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三条主要研究线索：

首先是对建立在不平等权力关系基础上的殖民主义话语的探究。立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和对“思想非殖民化”的呼吁，诸多研究借助于文本批评理论，对建构殖民计划的修辞和话语模式进行重构。这些研究所调查的对象通常包括民族志、大众文化、参与政治决策之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学中的殖民范式等。殖民话语通常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例如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僵化的二分关系。纵观相关学术研究，最早对“德意志帝国主义想象”背后的权力话语体系做出反思的成果，也多集中于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当属1982年桑德·吉尔曼（Sander Gilman）所著的关于“黑人形象意义”的论文集，以及次年西比利亚·本宁霍夫-吕尔（Sybille Benninghoff-Lühl）所出版的关于德国殖民主义的小说。³这些对“帝国幻想”的分析旨在表明，殖民扩张不仅仅是基于军事、政治和经济战略，而且还必须被视为殖民主义文化的产物。约翰·P. 肖特（John P. Short）从边缘性文化入手，以此寻找殖民主义对德国社会产生影响的证据。其在著作中重现了一些如折射帝国繁盛殖民图景的1896年柏林贸易展览会（Berliner

1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第124页。

2 陈浩：《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与现状》，第133页。

3 Sander Gilman, *On Blackness without Blacks: Essays on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Germany*, Boston: G. K. Hall, 1982; Sybille Benninghoff-Lühl, *Deutsche Kolonialromane, 1884–1914, in ihrem Entstehungs-und Wirkungszusammenhang*, Bremen: Übersee-Museum, 1983.

Gewerbeausstellung)，或殖民者意欲彰显帝国权力、塑造帝国形象的1907年霍屯督人选举¹（Hottentottenwahl）等事件。²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为德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搭建了一座交流的桥梁，不同的学科范式和研究理论得于此相遇。毕竟在戴恩·肯尼迪（Dane Kennedy）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采取的策略是对殖民者的语言进行批判性审视，解构有代表性的文本，揭露他们表面叙述背后的话语设计。”³

其次是强调殖民知识，即关于殖民地领土和人口知识的重要性。一方面，人类学、科学或医学等学科，均在德意志帝国获得和征服殖民地领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知识不仅仅是欧洲优越性的先决条件，也是殖民权力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21世纪，诸多医疗史领域的学者都为德国殖民主义研究做出了创新性贡献。极具代表性的有沃尔夫冈·埃卡特（Wolfgang Eckart）对于殖民地热带医学的研究；保罗·温德林（Paul Weindling）是分析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先驱者之一。⁴除此之外，扬斯·鲁本塔尔（Jens Ruppenthal）尤为关注德国最大的热带医学机构——位于汉堡的伯恩哈特·诺赫特热带医学研究所（Bernhard-Nocht-Institut für Tropenmedizin，简称BNITM）及该研究所的相关成就。⁵同时，克里斯托夫·格拉德曼（Christoph Gradmann）介绍了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德国19世纪微生物学专家——在非洲殖民地时期的细菌学成果；马里·韦伯（Mari Webel）也将德属东非昏睡病（又名非洲锥虫病 [African trypanosomiasis]，是一种由布氏锥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及其他疾病的医疗问题与帝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⁶2008

1 1907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作为“霍屯督人选举”而被载入史册。这一事件是在1904—1908年霍屯督人和赫雷罗人起义以及德国军官舒茨特鲁普（Schutztruppe）对其反对者实施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发生的。

2 John P. Short, *The Magic Lantern Empire: Colonialism and Society in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4, Issue 3 (1996), pp. 345–363.

4 Wolfgang U. Eckart, *Medizin und Kolonialimperialismus. Deutschland, 1884–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1997; 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Jens Ruppenthal, *Kolonialismus als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Stuttgart: Steiner, 2010;

6 Christoph Gradmann, *Laboratory Disease: Robert Koch's Medical Bacteri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i Webel, *Borderlands of Research: Medicine, Empire and Sleeping Sickness in East Africa, 1902–191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Hoi-Eun Kim, *Doctors of Empire: Medical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Imperial Germany and Meiji Japan*,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14.

年，埃尔克·赖夏特（Elke Reichardt）将社会史与医疗史的研究范式相穿插，在“健康”“种族”“帝国”这几个话题之间搭建了一种可能性。¹

最后，借助并融入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相关研究。目前对新帝国史的研究已表明，在后殖民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帝国史研究中让“庶民”（包括原住民、妇女以及所有被历史档案所掩盖或隐匿的人）“说话”，使一种克服以往帝国史缺陷的新帝国史成为可能。²而新帝国史又在发展过程中渐次融合了新社会史、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多种思潮，继而将性别、种族、文化、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互动网络等话题作为理解和解释帝国的重要维度。在殖民地小说研究热潮之后，一种关注妇女及性别的新帝国史应运而生。受安妮·斯托尔（Anne Stoler）及其他专注于种族和性别研究的学者之启发，玛丽安·贝克豪斯-格斯特（Marianne Beckhaus-Gerst）极为关注德国殖民地的妇女状况。³洛拉·维尔登塔尔（Lora Wildenthal）于2001年出版的关于妇女和帝国的书则成为另一个里程碑。⁴2007年，伊里斯·维格（Iris Wigger）研究了性别、阶级和民族主义复杂网络中的种族主义歧视，以及20世纪20年代法国军队在占领莱茵兰期间，因部署黑人士兵而与德国本土居民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⁵伯特·昆德鲁斯（Birthe Kundrus）对德国殖民主义的研究聚焦于德属西南非洲的身份认同问题，其主要围绕四个领域展开：移民的概念界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对自然的认知、二者对“在非洲建构德国文化”这一行为的看法以及德国人和非洲人之间关于“异族通婚”的讨论。⁶拉里

1 Elke Reichardt, *Health, "Race" and Empire: Popular-Scientific Spectacl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Morrisville, NC: Lulu.com, 2008.

2 刘文明：《“新帝国史”：西方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9期，第121页。

3 Ann L.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Marianne Beckhaus-Gerst, *Die (Koloniale) Begegnung: Afrikanerinnen in Deutschland, 1880-1945-Deutsche in Afrika, 1880-1918*, Münster: LIT, 2003. 除此之外，还有Sara Friedrichsmeier, Sara Lennox and Susanne Zantop, eds., *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ts Leg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4 Lora Wildenthal, *German Women for Empire, 1884-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5 Iris Wigger, *Die "Schwarze Schmach am Rhein". Rassistische Diskriminierung zwischen Geschlecht, Klasse, Nation und Rasse*,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07.

6 Birthe Kundrus, *Moderne Imperialisten: das Kaiserreich im Spiegel seiner Koloni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 2003.

萨·福斯特（Larissa Förster）、达格·亨里克森（Dag Henrichsen）和迈克尔·博利希（Michael Bollig）在其共同编著的作品中，对德国在殖民地实施的暴力行为及被殖民者的相应反抗进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追溯了西南非洲受难者的后代对于此次灾难的历史记忆。¹布丽塔·席林（Britta Schilling）的著作完善了对于德国人如何反思其殖民历史及建构殖民历史记忆的研究。²德国作为参与了现代“新帝国主义”且最先进入“后殖民状态”的欧洲国家，其在殖民主义指导下的集体记忆演变——从殖民地的丧失、国家社会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民族分裂、冷战时代一直延伸到今天——对于当前德国殖民史的研究而言不可或缺。同时，席林进一步研究探讨了该种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与前殖民时代的物质文化密切相关。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德国殖民历史研究的侧重材料也发生了图像及视觉转向。此前，图像在德国历史（尤其是德国殖民主义历史）研究中大多被学者视为更为重要的文本性材料的参考或补充。³但近几年来，人们逐渐接受了将照片、明信片、广告、海报和电影等视觉材料作为探究德国殖民主义历史的媒介这一变革，沃尔克·马克斯·朗本（Volker Max Langbehn）主编的论文集便是一个极好的范例。这本选集以视觉材料为主要历史研究对象，借此重新评估了此前德国的殖民经历及德国殖民史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大背景中所处的地位。⁴

后殖民主义史学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的解构与对抗，同时也为第三世界学者提供了分享及重构学术话语权的机会。故而，我们也应特别重视非裔德国人对德国殖民史所做出的学术贡献。而“非裔德国人”（Afrodeutsche）这一概念，最先于《展示你的色彩：非裔德国女性追寻她们的历史》（*Farbe bekennen: Afro-deutsche Frauen auf den Spuren ihrer Geschichte*）一书中出现。该书的其中两位作者梅·奥皮兹（May Opitz，此后改名为May Ayim，即梅·艾依姆）和卡塔琳

1 Larissa Förster, Dag Henrichsen and Michael Bollig, *Namibia-Deutschland. Eine geteilte Geschichte: Widerstand, Gewalt, Erinnerung*, Wolftrathshausen: Edition Minerva, 2004.

2 Britta Schilling, *Postcolonial Germany: Memories of Empire in a Decolonized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Jens Jäger, *Photographie: Bilder der Neuzeit: Einführung in die historische Bildforschung*, Tübingen: Edition Diskord, 2000, p.36.

4 Volker M. Langbehn, *German Colonialism, Visual Culture, And Modern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2012.

娜·奥贡托耶（Katharina Oguntoye）都是在德国长大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裔德国女性。20世纪80年代，奥皮兹和非裔美籍女性作家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共同创立了为德国黑人利益发声的非营利性组织德国黑人倡议联盟（Initiative Schwarz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又名ISD）。除此之外，她们还集中参与了其他社区性的建设项目，包括于1986年创立了第一个非裔德国妇女活动团体以及为黑人妇女服务的文化政治论坛Adefra，其名称源自非裔德国女性（Afrodeutsche Frauen）的缩写；以及1991年参与并组织了第五届跨文化黑人女性研究夏季学院（Fifth Cross-Cultural Black Women's Studies Summer Institute），这是首个于德国举行并专门讨论“欧洲共同体中的黑人”（Schwarze Menschen und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这一主题的国际会议；自1996年以来，2月便一直被视为“汉堡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 Hamburg），每年2月，汉堡市都会组织各种重点关注汉堡、德国和世界各地黑人历史的社会活动。以上组织和社会努力，均意在为德国的黑人群体提供一个正确重塑自我认知、正视自身身份与历史以及摆脱外部质疑和歧视的机会。正如她们在书中所集体倡议的那般：

我们与奥德雷·洛德一起在非裔美国人（Afroamerikaner）的基础上创造了“非裔德国人”一词，以此作为我们文化起源的表达。“非裔德国人”的定义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五个人的母亲均是德国人，父亲则是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许多其他的非裔德国人，他们的父母要么均为来自非洲的非裔德国人，又或者父母其中一方是非裔德国人。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基本共性并非基于生物学标准，而是“生活在德国白人社会之中”这样一种社会标准。¹

除此之外，随着国际殖民史学研究焦点的转变，部分由非裔德国人所撰写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这为德国历史学家们恢复德国黑人历史声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

1 May Opitz, Katharina Oguntoye and Dagmar Schultz, eds., *Farbe bekennen: Afro-deutsche Frauen auf den Spuren ihrer Geschichte*, Berlin: Orlanda Verlag, 1986, p. 10. 此书的英译本参见 May Opitz, Katharina Oguntoye and Dagmar Schultz, eds., *Showing Our Colours: Afro-German Women Speak Out*,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考。譬如，成长于纳粹帝国的黑人汉斯·马萨奎伊（Hans Massaquoi），以及20世纪80年代曾在东德接受纳米比亚政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sation，缩写为SWAPO）领导层培训的纳米比亚人露西娅·恩贡贝（Lucia Engombe），均在其日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为公众揭示了那些曾被隐藏、难以被看到抑或是极易忽视的个体视角下的微观历史。¹正如莫莱菲·科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所言：“在德国社会中，非裔德国人长期深受种族概念的伤害，但其却无法摆脱对德国文化的完全融入……这种心理和文化上的不和谐，使得寻求了解自己非洲血统的非裔德国人陷入了一种‘错位’的状态。”²目前来看，非裔德国人的身份认同观念，虽逃不脱殖民历史已经造成的现实后果，但现今已逐步跳出殖民主义的历史束缚。

一个国家后殖民状态的组成部分——如殖民历史的持续时间、地理范围和结束方式——对塑造一个国家的殖民记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殖民历史短暂，因此其史学发展历程迟缓也情有可原。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不需要为这段“不起眼”的殖民历史担负历史责任，展开历史反思。由此可见，后殖民转向之后丰富前沿的殖民史研究成果，在重构德国殖民主义、完善大众对殖民历史的记忆以及解放帝国史固化的二分思想等方面，做出了充足的史学贡献。

三、余论：一条从西南非洲通往奥斯维辛的种族主义之路

德国殖民主义的历史绝不仅仅是德属殖民地的历史。德国与非洲之间展开经济贸易的目的，不只是从狭小的德属殖民地里榨取有限的“养料”，更重要的是与南非、摩洛哥和埃及等广袤之地建立联系；同样，当一名德国地理学家于非洲大陆旅行时，其行程也并不局限于德意志帝国所属的领土；或许最终构成德国艺术家灵感来源的原始非洲艺术，也并非只来源于多哥或喀麦隆这几片德属殖民地；更不应忽

1 Hans Massaquoi, *Destined to Witness: Growing Up Black in Nazi Germany*, Thorold: William Morrow Paperbacks, 2001; Lucia Engombe, *Kind Nr. 95: Meine Jugend zwischen Namibia und der DDR*, Berlin: Ullstein Taschenbuch, 2004.

2 转引自 Britta Schilling, “German Postcolonialism in Four Dimens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432.

略的是，殖民历史带来的深远冲击力往往会反噬暴力的实施者——宗主国。另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殖民关系并没有随着后者政治上的正式独立而戛然而止，新殖民主义及旧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留下的历史隐患依旧日日夜夜困扰着非洲人民。因此，德国殖民史学的发展为帝国史，乃至德国近现代史研究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便是激发了历史学家们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重新反思殖民主义的历史定义。这股研究热情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在德国殖民历史中为纳粹主义研究重新寻求一种历史出路。

既是德国人类学家、医学家，又是纳粹党成员的尤金·费舍尔（Eugen Fischer）曾在1908对纳米比亚地区的混血婴儿——由非洲裔母亲和德国裔或荷兰裔父亲所生——展开过人类学研究。而在纳粹统治时期，费舍尔所捍卫的大量种族学理论均基于早年他在非洲殖民地的相关实验。同时期不少类似的例证似乎都在指向“德国殖民历史与纳粹大屠杀存在联系”这一历史共性。因此，随着纳粹政权的倒台和历史反思的延续，部分历史学家对德国殖民历史与纳粹大屠杀之间的关联性逐渐产生好奇。这一猜想最早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于其1951年首次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提出。欧洲殖民主义帝国时期采取的种族化及领土扩张手段，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萌发奠定了基础，故而欧洲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则是阿伦特所说的“帝国回旋镖”（Imperial boomerang）的结果。¹同样，黑人文学运动的创始人和反殖民主义者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其首版于1955年的著作《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中延续了阿伦特的观点。他认为希特勒采取的各种“适用于欧洲殖民主义的一系列程序和手段，早先就一直专门存在于德国的殖民地统治之中”²，从而将大屠杀的行动根基牢牢地置于帝国殖民历史之中。此后更多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视角，试图从多个层面挖掘并证实德国殖民历史与大屠杀之间的争议性关系。1996年，布雷为其《德国统治下的纳米比亚》（*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一书撰写了新的导言，从而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³在该书中，他将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

1 具体参见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pp. 115, 223。

2 Aimé Césaire,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 36.

3 Helmut Bley, *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Hamburg: LIT, 1996, pp. xvii–xx.

对德国犹太人的虐待，追溯到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政府对非洲人的虐待。乌韦·凯特尔森（Uwe Ketelsen）在其文章中明确表明了“德国殖民主义的野心已扩展到了欧洲东部”¹的观点。伊莎贝尔·赫尔（Isabel Hull）在其研究中延续了这一观点，其主要讨论了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历史是如何塑造着“一战”时德国的军事文化的。在他看来，德国人在殖民地种族灭绝的“前科”，导致德国军队在西线面对战场上的敌人时，形成一种“对方应当被消灭”的激进心态。²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坚称，德国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和种族灭绝行为影响了当时德国人的思维方式。譬如，展示集中营场景和赫雷罗人及纳马人被处决的明信片曾在当时被德国士兵反复寄给他们在德国的亲人；古斯塔夫·弗伦森（Gustav Frenssen）于1906年出版的小说《彼得·摩尔的西南之旅》³（*Peter Moors Fahrt nach Südwest*），以光荣自豪的口吻讲述了德国士兵参与种族灭绝的故事，该书自1908年起还成了学校内的标准读物。⁴于尔根·齐默尔（Jürgen Zimmerer）认为，德国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大屠杀，实际上铺设了一条从西南非洲通往奥斯维辛的种族主义之路。⁵虽然“德国殖民历史和纳粹大屠杀之间存在连续性”这一观点也曾遭到过历史学家的质疑⁶，但其更多是对连续性的程度有疑义，从未对连续性本身提出异议。这种将纳粹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追溯至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史学研究趋势，重新唤醒了德国人对于德意志帝国殖民痕迹及《凡尔赛和约》的历史记忆，一场场更加深刻的自我批评从而得以接连不断地展开。这一影响也绝非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其更是辐射到了德国的记忆政治、公共

1 Uwe Ketelsen, “Der koloniale Diskurs und die Öffnung des europäischen Ostens im deutschen Roman”, in Mihan Dabag, Horst Gründer and Uwe Ketelsen, ed., *Kolonialismus, Kolonialdiskurs und Genozid*, Munich: Fink, 2004, pp. 67–94.

2 Isabel Hull, *Absolute Destruction: Military Culture and Practices of War in Imperial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Gustav Frenssen, *Peter Moors Fahrt nach Südwest*, Berlin: G. Grote'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06.

4 Reinhart Kößler, “Kolonialherrschaft—auch eine deutsche Vergangenheit”, in Helma Lutz and Kathrin Gawarecki, eds., *Kolonialismus und Erinnerungskultur*, Münster: Waxmann, 2005, pp. 23–40.

5 Jürgen Zimmerer, *Von Windhuk nach Auschwitz? Beiträge zum Verhältnis von Kolonialismus und Holocaust*, Münster: LIT, 2011. 更多该观点的阐述可参见论文集 Michael Perraudin and Jürgen Zimmerer, eds., *German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6 譬如 Birthe Kundrus, “Von den Herero zum Holocaust? Einige Bemerkungen zur aktuellen Debatte”, *Mittelweg*, vol. 36, no. 14, (2005), pp. 82–91。

空间、后殖民状态和社会景观等方方面面。

1904—1907年期间德国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屠杀，使得最终只有20%的赫雷罗人和不到原先一半的纳马人在被迫撤退至沙漠并被驱逐到集中营的路途中存活了下来。¹ 尽管无数的历史研究都提供了充足的犯罪证据，但德国当局直到2015年才正式将其一百多年前所犯下的这桩肮脏行径定义为“种族灭绝”，并陆续将当时用作“种族学实验”的受害者遗骸归还给纳米比亚。随着2004年赫雷罗和纳马种族屠杀100周年和柏林会议120周年的到来，德国对其公共空间内的后殖民历史遗迹也展开了更深一步的发掘。从2005年左右开始，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弗莱堡、汉堡、莱比锡等多个城市都成立了后殖民协会，例如柏林后殖民协会（Berlin postkolonial）以及汉堡后殖民协会（Hamburg postkolonial）。他们的成员主要来自非洲地区和德国，协会旨在于目标城市和地区中寻找殖民遗迹，并参与和组织公共空间和集体思想领域的非殖民化活动。比较常见的活动形式有在其所属城市中组织“反殖民”的游览；为居民或游客展示殖民时期的不同遗迹；在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在博物馆举办展览；或倡导改变一些为纪念德国殖民时期关键历史人物而制定的街道名称和种族主义话语。几个经典的范例即可予以说明：2007年慕尼黑一条原名为Von-Trotha-Straße（冯·特罗塔街）的街道就被重新命名为Hererostraße（赫雷罗街），原街道名称中的阿德里安·迪特里希·洛塔尔·冯·特罗塔（Adrian Dietrich Lothar von Trotha）将军曾主导了对赫雷罗和纳马人的种族屠杀。同样，柏林一条原名为Gröbenufer（格罗本河岸）的街道，此前意在纪念勃兰登堡军官奥托·弗里德里希·冯·德·格罗本（Otto Friedrich von der Gröben）。格罗本曾于1683年受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20—1688）指派远征西非，并在现今加纳（Ghana）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首个殖民地大弗里德里希斯堡（Groß Friedrichsburg）。这条街道的名称也在2010年被柏林当局以前文所提及的——非裔德籍反种族主义活动家和诗人——梅·艾依姆之名替代，正式更名为May-Ayim-Ufer（梅·艾依姆河岸）。此外，最近一次即2021年，柏林当局特意选定了与街道名称历

1 Elise Pape, “Postcolonial debates in Germany-An Overview”, *Af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no. 2, (2017), p. 3.

史相关的非洲裔德国哲学家安东·威廉·阿莫（Anton Wilhelm Amo）的名字，将 Mohrenstraße（摩尔人街）更改为 Anton-Wilhelm-Amo-Straße（安东·威廉·阿莫街）。此次修改旨在消除 Mohr（摩尔人）——其在德语中带有贬低黑色人种之义——这一种族主义话语对德国殖民记忆及公共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当然，对殖民主义与纳粹种族灭绝之间所具关联感兴趣的学者及相关研究还有很多，不少学者对于争论的始末以及经典观点都给予了评述，鉴于篇幅限制，于此不一一赘述。¹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终于可以为那些沉浸于德意志特殊道路，以及第三帝国与大屠杀研究的民族史学家，提供一个与跨国史学者对话的舞台。同时，借助“殖民主义对纳粹主义研究产生的史学影响”这一经典案例，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德国殖民史的研究价值仅仅体现在跟上英美世界的学术潮流，弥补和完善德国史学的全面性吗？

我想任何一位读者在了解了目前德国殖民史的学术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后，都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因此，无论是德国本土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都不能因其在帝国主义浪潮中略显“逊色”，便将其忽视或将其归入集体记忆的边缘。尤其是那些曾经作为被殖民者的第三世界学者，对此问题更不可能给予漠视态度。因此，对德国殖民史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德国史学术界而言，是极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与此同时，若要致力于将德国殖民历史更完善地嵌入帝国史，乃至德国近现代史研究之中，那么这一任务的完成也必然离不开对专业学者队伍的培训和扶持。

总而言之，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很大程度上都在被其复杂绵长的殖民历史关系所塑造。如果不考虑如今日益增长的跨国联系，就不可能理解19世纪末的殖民主义。而若要理解1900年前后的全球一体化，就必然不能脱离塑造了全球政治、全球经济、移民和文化交流的帝国网路和殖民结构。就这一全球化进程对德国的影响而言，殖

1 对于这一争论的探讨与综述具体可参见 Dirk Stone and Dan Moses, *Colonialism and Genocid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68–80; Birthe Kundrus, “Kontinuitäten, Parallelen, Rezeptionen. Überlegungen zur ‘Kolonial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WerkstattGeschichte*, Issue 43 (2006), pp. 45–62; Matthew P. Fitzpatrick, “The Pre-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The Sonderweg and Historikerstreit Debates and the Abject Colonial Past”,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41, Issue 3 (September 2008), pp. 477–503.

民主义的世界秩序对德国也是至关重要的，其价值甚至超越了它自己殖民帝国的实际边界。至少在萨克森迈尔看来，现如今，殖民主义的历史已成为挑战德国史学中突出的以欧洲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预设的主要领域之一。¹

（杨怡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1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第124页。

现代历史知识的形成与演进：一个德国的案例

| 尉佩云 |

摘要：从基础意义上讲，在对人类过往生活的质料与符码等经验性内容进行组织和表述的过程中，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并不是天然的思想范畴。在最初的形态中，“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历史性和历史维度的特定形式。史学形态和历史性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产物，而史学职业化则是这一结果的现代化，并且以学术形式固定下来。在德语世界，知识社会化和当时19世纪德国理念论的认识论结盟，形成了“历史知识理论”。此后，“二战”打破了德国历史知识理论思想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作为战后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约恩·吕森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进行了扬弃，塑造了历史知识理论的新形态。从历史意义、历史主义与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教育四个主题出发，经过从本体论到知识论、经验性到范畴性的思想演变和重述，古典的历史知识理论得以现代化并契合了当代社会形态，进而恢复了历史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但是，吕森在对德罗伊森的思想批判中，在对历史理性、生活世界等概念的研究中，并未完全否定并放弃理念论的解释方式，理念和精神要素在吕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中以现代形态得以保留。

关键词：史学形态 历史知识理论 德罗伊森 约恩·吕森 历史主义

历史知识是人类对自身过往进行描述、反思、表述和呈现的知识结果。然而，以一个历史化的方式呈现过去，却并不是人类天然的思想状态。此处的历史化指的是，将时间与事件以序列化的方式进行排布展开，并在这种展开中思考历史的意义。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之前，人类对于自身过往的处理，大多是以神秘主义（Occultism）的方式进行，过去并没有成为明晰可辨的人类实践活动和相关行为后果。¹即便在今天，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在某些文化类型中，历史化地处理过去也并不是天然的方式。

在人类的自我意识中，历史化地处理并思考过去是一种特定的意识类型，作为其产出的历史知识也是特定的人类智识成果。这种知识生产和智识成果在人类自身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获得了历史合理性，从而成为主流的处理过去的时间思考形式，并具有了跨文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由此，历史化地处理过去成为历史学的基本意涵，并且也成为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思考范畴，这意味着对自身工作方法和思考方式的反思。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德语世界中，以历史化的方式处理过去成为一种现代的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当时，上述人类智识工作逐渐演化为一门学科——现代历史学。在此后的人类社会中，对人类过往的思考、吸收、表述与传达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化行为，由此现代历史学正式诞生（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功能）。也是在这种思考和传达中，人类过往被进一步主题化、经验化、现代化。在德语世界，上述的知识社会化和当时19世纪德国理念论的认识论结盟，形成了“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

通俗地讲，“历史知识理论”即现代历史学的知识生产理论，它在晚期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以普遍主义为核心，并通过对这种普遍主义的时间化，将其转化为历史主义的解释原则，呈现为一套对人类过往的乐观主义的思想共识。这意味着，人类在对过往的认识上达成了知识逻辑的普遍有效性，这种普遍性建立在历史方法论、历史认识论和史料集成的基础之上，比如1819年的《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以及始于1815年的《希腊语铭文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通过这样的方式，历史理解的概念发生了转移，从历史化地处理过去演变为关于过去的知识生产。通过系统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史料批判，过去本身不再直接地呈现于现在，而是呈现为遗迹、铭文碑刻和史料集成。这就是说，过去以历史知识的形式呈现于现在世界之中，历史知识具有本体论的意涵，我们在现

1 Christian Meier, “Die Entstehung der Historie”, in Reinhart, Koselleck und Stempel Wolf-Dieter, Hrsg., *Poetik und Hermeneutik, Bd. 5, Geschichte, Ereignis und Erzählung*, München: Fink. 1973, S. 251–306.

在理解并把握过去、历史化地处理过去，是通过过去在当下的变体形态——历史知识——来达成的。

这种历史知识的形成与演变在德国史学传统中具有清晰的脉络，从德罗伊森到威廉·洪堡，再到约翰·费希特的理念论历史知识理论中都有思想表达。然而，德国古典历史知识理论的这种普世性与世界性蓝图并未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作为确凿的德国历史经验，纳粹历史与大屠杀打破了以理念论的历史知识理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破坏了这种历史知识生产所具有的世界性。“二战”结束以后，德意志思想的世界性备受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其他国家，也同时存在于德国本土的思想语境中。由此，“1945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重塑了德国的史学范式，重建了历史研究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性范畴。其中，约恩·吕森以德罗伊森的理念论历史知识理论为参考，在战后的语境中，他重新思考并接续了德国历史知识理论的当代传统。

上述从古典历史知识理论到现代历史知识理论的“德国案例”值得我们重视。一方面，这种演变是一种知识概念的迁移，其中体现的政治意涵和价值表达的转换促使我们思考知识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共生与悖离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演变也是历史知识的现代性演变。在我们将历史知识作为思考对象进行主题化的过程中，历史知识的现代性（作为现代文化构成的一部分）意味着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价值表达——更为重要的启示是，我们该如何将历史知识进行现代化重塑，使之符合平等、民主、人文等多元的现代价值观念；并且，在将这种现代价值观念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之成为现代历史经验的构成部分进而现实化。

一、知识史背景

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德罗伊森具有一些固定的学术标签：作为普鲁士学派的奠基人以及普鲁士政权的赞美者；作为兰克式客观主义的批评者；作为历史写作原则的政治相对主义的辩护者；以及作为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长久以来，德罗伊森在学术上的声名首先得益于他的希腊文化研究，《希腊化时代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亚历山大大帝史》（*Geschichte Alexanders des Großen*）

等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¹而他在历史知识理论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成就，则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德国的年轻学者约恩·吕森、卡尔-海因兹·施皮勒等人的著作中重返当代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学术语境。²基于约恩·吕森后来在史学理论领域的成就，在1977年整理出版的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首卷本中，扉页上写着“献给约恩·吕森”（Jörn Rüsen Gewidmet）。³吕森在谈到自己和德罗伊森的学术关系时说道：“就史学理论的传统而言，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与我的思考最为接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将自己视为他的弟子。这并不是说我是在机械地重复他对历史研究中基本问题的探索方式……我试图将20世纪特定的历史经验引入到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论证框架中。”⁴

约恩·吕森于1958年步入科隆大学后，他当时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路德教新教神学家雅各布·伯麦（Jakob Böhme, 1575—1624）的思想研究。按照吕森本人的说法，伯麦无论就其学术地位还是思想的原创性而言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唯一的问题在于，和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现实社会状况相比，伯麦的思想实在离题太远。在导师特奥多尔·施德尔（Theodor Schieder）的帮助下，吕森最终选择了在“历史和哲学交界处”的德罗伊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吕森选择德罗伊森作为博士选题并成为他迄今为止的志业，现在看来这绝非偶然：第一，20世纪50、60年代英、法、美的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已经波及德国，而在德国这个相对封闭的思想系统中，历史研究长久以来作为“精神科学”而存在，所以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被视为“危机”。吕森等人面临重新讨论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规范的问题。而在德国的史学思想中追溯这个问题，德罗伊森

1 R. Bichler, “Hellenismus”,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s Epochenbegriff*,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3.

2 Jörn Rüsen, *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 Paderborn: Schöningh, 1969; Karl-Heniz Spieler, *Untersuchungen zur Johann Gustav Droysens “Historik”*,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0.

3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Hrsg. Peter Leyh, Bd. 1.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7.

4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41.

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第二，“二战”结束后关于纳粹罪责问题的大讨论已经蔓延开来，在德国这样一个现实政治和历史认知紧密结合的传统中，吕森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自然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思想资源。不论作为正面还是反面案例，德罗伊森关于普鲁士政权的历史研究与写作在这方面都堪称典型。第三，基于前一点，纳粹大屠杀认知和历史研究的道德伦理问题牵涉在一起，这与德罗伊森宣称的“历史研究就是伦理研究，历史世界就是伦理世界”不谋而合。¹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吕森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于尔根·科卡、沃尔夫冈·蒙森、赫尔曼·吕波（Hermann Lübbe）、汉斯·鲍姆伽特勒（Hans Michael Baumgartner）等人“史学理论研究项目”（Theorie der Geschichte）的成立，“二战”结束后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历史知识理论研究真正开始了。作为古典历史知识理论家的德罗伊森，伴随着吕森等人的批判性吸收与发展，面对战后新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语境，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学术生命力。所以，从吕森对德罗伊森史学思想的扬弃这个案例中，我们能够窥见德国古典历史知识理论的现代演化与时代命题的结合。以下我们从历史知识理论主题的内在演变逻辑来进行详细阐述。

二、历史意义：古典与现代

历史意义是一个现代历史思考的概念，它指的是，在解释人类世界的时间延展及变迁时，将其置于一个主观性诠释模式之中，任何人类历史的时间发展及变迁都受目的意志的影响，进而将整个人类的历史活动和变迁以一个主体形象展示出来。² 比如说，在中世纪的历史时期，上帝承载了一切人类历史的展开和变迁，一切人类活动都是在“上帝之手”中；近代以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承载了当时一切的历史变动，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化身；19世纪的“进步”和20世纪

1 主要参见德罗伊森“系统论”的部分，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及以后。

2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In Klaus E Müller, Jörn Rüsen, Hrsg., *Historische Sinnbildung—Problemstellungen, Zeitkonzepte, Wahrnehmungshorizonte, Darstellungsstrategien*, Reinbek: Rowohlt's Enzyklopädie, 1997, S.17. 对Sinnbildung的其他论述，同样可以参见此书。

早期开始的“文明”分别成为当时一切历史解释的中心。只不过，当所有“掩盖它（历史意义）本来面目”的概念遭受质疑和失效后，伴随着现代历史的发展，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用“历史意义”这个概念来对上述所有历史时期的思想范畴进行探讨，它们都属于历史意义的“前概念”阶段。而正是这些“前概念”阶段的思想范畴，赋予了当时人类历史以总体的意义，现在正是因为这些“前概念”思想范畴的失效，历史意义才成为一个术语出现在当代的历史思考中。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传统的人类历史意义赋予形式出了问题，历史意义概念才得以出现。这在下文从德罗伊森到约翰·吕森的思想变迁中也是如此。

德罗伊森是德国理念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时期（1826—1829）就是黑格尔的学生。甚至，在吕森看来，德罗伊森在古典学研究上几个关键概念的创设，譬如“希腊化时代”（Hellenismus），本身就是他在经验性领域中对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阐发和证明。¹在德罗伊森对历史意义的原初理解和解释中，理念论和基督新教神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德罗伊森说，人类及其世界在时间变化过程中，有一个包含一切历史现象的发展趋势，在一切人类经验中，存在着一个人类发展的“内在统一性”（innere Einheit）。对于历史意义这个概念而言，德罗伊森的“内在统一性”是一种前现代先验论的表达。而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我们以“历史意义”这个概念来指涉“内在统一性”“绝对整体性”等在前现代时期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思想范畴。也就是说，“内在统一性”等说法属于“历史意义”的“前概念”阶段。如果分析德罗伊森“内在统一性”的时代精神内核，我们会发现，它一方面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再现；另一方面，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基督新教在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及宗教的总和也只是一个绝对的整体性（Die absolute Totalität）所形之于外的形象。我们深信有这个绝对整体性的存在，我们感觉得到它。我们确知我们自己存在，这个事实，使我们感觉到绝对整体性的存在。……最高的、而且笼罩一切历史发展中诸目的之上的历史的终极目

1 Jörn Rüsen, *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

的，是我们的经验研究中无法窥知的。由我们对自己存在的体认，由我们对伦理责任及伦理意愿的追求，由我们对自己完美的追求；我们会觉得进步充实。这种充实进步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过程”。¹

在德罗伊森的表述中，“绝对整体性”的绝对存在，是我们“深信”并通过确知自我存在而感知到的。按照何兆武的说法：“神学的推论方式是：正面的事例就从正面证实了某个论点，反面的事例则从反面证实了同一个论点。”²那么，此处的“绝对整体性”“目的之上的终极目的”无疑指向一个神性基督中心，即上帝最终统摄一切。基督的存在是在一切之先的、无所不包的，无论是“内在统一性”还是“绝对整体性”乃至“终极目的”，它们和基督中心在逻辑上是一体两面的。³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史学思想的演进中，我们用现代学术概念“历史意义”来指涉前现代的基督中心、内在统一性、绝对整体性，而正是这些范畴赋予了历史以“前意义”（vor-Sinn）阶段的历史意义。

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把一套理念论历史哲学转化为一个包含广泛的历史解释系统。在德罗伊森对历史的本体性解释中，其关键点在于，在人类社会及人类行为之中包含的理念、思想、精神乃至意向性驱策力，本身就具有历史的性质。在“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德罗伊森在理念论和基督教的背景下，做出的解释是历史乃是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其中，理念和思想的力量是贯穿性的。那么，这就是说，在历史世界中，理念和思想本身是先在的、直接的、不证自明的。在此，理念和思想所具有的基督中心最后外化成为一个经验性的历史解释体系。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一整套解释体系最后的核心都在这一论点上。

1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12、87页。

2 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与历史构图》，《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

3 德罗伊森还用其他的术语，比如“唯一的历史”（Über den Geschichten ist die Geschichte）、“目的之上的目的”（Zweck der Zwecke）来表达这个基督内核。德罗伊森对兰克虽然多有批判，但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学术眼光回顾兰克在使用“内在的关联”（inneren Zusammenhang）这些概念时所表露的思想内涵，可以说，作为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和兰克所表露出来的时代趋同性大于其差异性。这也是为何伊格尔斯在《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中指出，在德国的思想图谱中，兰克作为理念论传统的高峰，是一位历史思想家。

也正是由此，亨克德永（Henk de Jong）才会说德罗伊森是“19世纪历史学术研究中黑格尔最为成功的信徒和追随者”¹。

在约恩·吕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中，历史的意义形成（Sinnbildung）是其整个理论架构的核心。吕森在论及历史意义时，给予的定义是：“意义指的是人类世界的时间延展在主观性模式中得到的诠释，任何转变看起来都是有意图的，仿佛它们受到了目的意志的影响。意义概念与意图和目的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目的性则将人类的行动作为一个能进行思维和反思的主体活动凸显出来。”² 吕森以上对历史意义的定义，将德罗伊森整个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内在统一性”“绝对整体性”乃至“目的之上的终极目的”等前现代基于理念论和神学动机的史学思想，转化为一套现代史学理论的学术话语。伴随着现代历史经验的进展、现代性历史思考的发展，德罗伊森“上帝之手”式的历史解释系统在本体论层面丧失了其可信度。而正是历史认知中理念论中心、基督中心等带有经验性外壳的历史解释的失效，历史意义才成为一个完整、理智的现代学术概念出现在吕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之中。

上述转化过程的发生，首先便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的过程，世界和对世界认知体系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性逐渐消失了——“内在统一性”“绝对整体性”乃至“目的之上的终极目的”等思想在本体论层面逐渐失去了思想解释的有效性。吕森在论述这个转化时说这是“历史被历史所否定”：德罗伊森等人设立的前现代的人类世界和历史世界的中心概念，伴随着现代历史经验的进展、现代性历史思考的发展，原先那些看起来“有目的的转变”，伴随着历史的非连续性、断裂和突变，特别是纳粹历史的影响，“上帝之手”式的历史解释系统在本体论层面丧失了其可信度。譬如说，吕森等战后代德国历史学家，在解释德国历史的整体性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纳粹屠犹的片段讲述成受目的意志的影响并且是人类主体的有意识行为。但是，在德国思想体系中，理念论中心作为传统历史思考的规定性范畴而存

1 Henk de Jong, “Historical Orientation: Jörn Rüsen’s Answer to Nietzsche and His Foll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 No. 2 (May 1997).

2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S. 17.

在，为历史思考提供思想资源和合理性。吕森等一代学者无法脱离它的视野而创造一个新的历史解释系统，这是因为理念论本身乃是这一代学者成长的思想背景。由此，当这种理念论陷入想要疏离的传统思想资源和无法脱开的个人思想背景的悖反之中，吕森及战后史家只能通过对理念论中心解释方式的批判反思，来重新思考理念论作为民族传统思想资源的局限性与合理性。这种反思最后演变成了两种知识表达类型：一类是对德国历史的整体性解释反思，历史意义概念就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对此背景下个体的精神结构和认同进行反思，这就是后来讨论德国战后代际伦理和代际认同的基础。综上所述，正是历史认知中理念论中心、基督中心等“前现代”“前意义”阶段历史解释的失效，历史意义才成为一个完整、理智的现代学术概念出现在吕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之中，用来替代德罗伊森所使用的具有前现代先验论特质的历史解释的一元论中心（“理念”“基督”“终极目的”）。

历史目的论和原始本体论原本在德国理念论传统中一直扮演着对历史思考的界限、合理性、有效性、实现方式等进行规范化思考的重要角色，而现在由于这些概念的失效和缺场，则会导致该体系下历史思考的合理性、有效性范畴的失效。因而，在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中，历史思考的理论张力的核心准则，需要转化成为一套现代历史思考的解释系统。吕森以“历史意义形成”为核心，展现了德国古典历史知识理论到现代历史知识理论系统性转化的一种路径。吕森对此做过精当的阐述，他说：“‘意义’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取代了在长久以来历史思考中掩盖其本来面目的概念。至少在德国的概念史和思想史中，‘历史意义’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表现出理念论对历史本体性特征的原本信任的丧失。从此以后，历史意义就一直伴随着对历史思考的功效、危机、界限、合理性和实现方式的反思以及对历史思考在人类实践生活过程中文化导向功能的反思。”¹

洪堡在其名篇《论史家的责任》中说：“主体与客体，在原始上，在一切之先，是相互重叠的。”² 所以一旦先在的、原始的历史理念论中心失效，附生在上面的一套

1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S. 20.

2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 in Andreas Flitner und Klaus Giel, Hrsg.,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0, S. 585–606.

解释系统的核心论点自然随之失效——即使在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之初，此类史学理论范式曾居于中心地位。回到吕森对德罗伊森思想的扬弃这个视角来看，吕森以“历史意义形成”这个概念接续了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中的那个理念论中心，并对与此相关的概念，例如“终极目的”“绝对整体性”等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当然，吕森的“历史意义”绝不会再扮演历史解释的经验性核心；反之，他以“后设”（*meta-*）的方式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重新讨论德罗伊森所留下的那个精神内核的时效性、现代性意义。显而易见的是，德罗伊森知识理论中的本体论内核被吕森以知识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并进行了现代化分析。

不过，在当代史学理论整体性语境中，历史意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历史意义是一还是多？海登·怀特说：“如果我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一种而是不同的多种意义，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¹而在吕森这里，历史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唯一存在。那么，我们由此就有理由怀疑，吕森的历史意义是否会在现代知识论的外壳下隐藏着一个理念论的核心呢？皮特·莫兹（Peter Munz）对此颇为尖刻地说吕森将德国传统的历史知识理论上升到黑格尔式的精神愉悦感的境地，将它作为意义的源泉——“仿佛圣杯中的精神泡沫在源源不断地为他流出”²。这就引向另一个问题，即：吕森是否属于，或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家？在此我们暂存之不论。

三、历史知识性质与历史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历史主义”（*Historismus*）最早出现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797年随意记录的一些有关语言学的零碎笔记中，它诞生之后，逐渐和德国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结盟。作为历史知识理论的一种观念，早期的学者们事实上很少使用历史主义一词，而是将这些历史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行了逐渐精细的表述，在此过程中，历史主义作为确定性思想范畴得以形成。³在德罗伊森时代，“历史主义”作为概念的内涵还处在不

1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 No. 2 (1966).

2 Peter Munz, “Review of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Vernunft*”,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4, No. 1 (Feb. 1985).

3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断演变和丰富化过程中，因而，在以下的行文中，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知识的观念其实是他历史主义思想的一种表述，只是并未明确使用“历史主义”概念来界定。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德罗伊森对历史知识的论述，同样理解为“前概念”阶段历史主义思想的展现。

德罗伊森对历史知识性质的论述，核心理解同样是由理念论的逻辑所生发出来的，借由对历史知识的阐述，德罗伊森表达了他的古典历史主义思想。也正是由这个思想前提，德罗伊森阐述了一套和现代史学理论认知有所区别的历史主义和历史知识的存在与呈现方式的理论。就历史主义而言，在约恩·吕森的所有著述中，除了早期和他的学生豪斯特·布兰克（Horst Walter Blanke）以及弗里德里希·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有关于“历史主义”主题的合作外，仅有一本《历史主义思想谱系：德国文化科学研究》面世。¹从他所有著作的体量比例来看，关于“历史主义”主题的专门研究在他的学术成果中是占比微小的。对这样一位在德国历史主义浓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对此问题的解答，需要具体考察历史主义与历史知识性质在德罗伊森和吕森之间的思想转变。

德罗伊森的历史主义思想就体现在他对历史知识性质的论述中。德罗伊森认为，人类历史中存在的历史事实，它在现实生活界（Lebenswelt）中的性质高于客观研究的性质。基于理念论的前提，德罗伊森指出“历史”超出于认知层面之外，在史家未曾完全掌握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历史学家生活的环境与条件之中，存在于思考主体的精神状态之中。²由此，就可以引出德国历史知识理论传统中的两个命题：（1）历史意义的存在和发生是“不可预想的”（Unvordenklichkeit des Sinngeschehens）。³在史家的精神主体做出判断之前，“历史”已经以鲜活的（Lebendige）、富有影响力

1 Jörn Rüsen und Horst Walter Blanke, Hrsg., *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 Zum Strukturwandel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Paderborn: Schöningh, 1984; Jörn Rüsen und Friedrich Jaeger,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 H. Beck, 1992; Jörn Rüsen, *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 Studien zur deutschen Wissenschaftskultu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3.

2 “Die der Vergangenheit werden (im historischen Denken) Geschichte für die Gegenwart”，简言之就是“Aus Geschäften wird Geschichte”，参见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S. 69。

3 Joachim Ritter, Karlfried Gründer, Gottfried Gabriel, Hrs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11: U–V,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1, S. 339–341.

的形式存在于当下，延伸至未来。¹（2）历史不是僵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以跃动的精神延伸至未来。在此，历史知识表现为“过去先行发生”，但它其实是现实生活界中的特质；这个历史知识的先行发生，必须被放回到过去之中，说明它过去的状况是何种面貌，乃至塑造了今日此时此景的生活。这个“跃动的精神”其实就是理念论中心，在这个理念的驱动之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史家的求知活动与人类活动是合一的，被同等的理念力量所驱策；第二，历史在其本质上是“活的历史”，因为其中有理念力量存在。而这个论题在吕森的同名著作《活的历史》中获得了完整的现代解释。²

所以，历史知识不是我们今天史学理论中所认为的纯粹的知识产品和认知成果。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知识是人类展开自我认识的媒介。历史知识是自知的知识，是知识的主人，历史知识洞悉自己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在与时俱进中形成的产物。³历史知识因此具备了实际的道德功能：过去社会变迁的脉络和现在史家及同时代人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是相连的，我们对这个脉络的重建，有助于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自由的潜能。因为作为史家的我们和历史本身被同一理念力量所驱策，我们能够洞悉历史的发展方向。在此，吕森对德罗伊森的论题进行了吸收，他重新表述说“人们生活的现世界，在历史知识的烛照之下，显示出它是极广泛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历史的眼光观察过去，就是向现社会中的人们，说明时间中的方向为何，这个方向可以及必须在未来如何继续下去”⁴。此时，历史知识对个体的人而言，便具有了教育功能：历史学家由此向读者说明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它就积淀在现世生活之中。人们经由历史知识，能够扩大自我认识的历史视野，提升行为能力，开启获得更多行动的机会，进而“合历史而动”。这便是德罗伊森所谓的“通人教育”（Bildung）。德罗伊森在此阐明了德国历史主义的核心：历史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

1 吕森曾在此论点上发挥说，现代主义（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一大误解就是，经由系统的方法论，我们能够掌握与知识主体相对的抽象事物，并命名为“客观历史”。这实乃一种浅显的认知误区，因为史家主体本身乃是历史性的产物。

2 Jörn Rüsen, *Lebendige Geschichte. 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I: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9.

3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47、86页及相关论述。

4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导论第22页。

和未来的，包含辩证动力的发展过程。

因而，历史是“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创造未来”这一原先朴素的论题具有了本体论内涵。在德罗伊森这里，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历史知识、通人教育、辩证动力是一套系统的解释学。在现代史学理论的理解中，历史主义作为历史研究中产出的一个理论范畴，历史知识作为学科研究的知识成果而存在。而在德罗伊森的体系中，历史主义不仅仅是历史思考的理论对象和方法，更是历史思考的基础，甚至是“历史”本身（“种子的真实性及价值，是在强烈不断的生长过程中才获得的”¹）。这种历史主义就成为史学职业化和现代史学的解释学基础。

以上便是我们对德罗伊森历史主义思想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回到本节开始的问题，“历史主义”作为研究专题在吕森的整个学术成果中占比甚微，但纵观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吕森其实继承了历史主义的思考方式，历史主义不仅是他的外在思想表征，更是他的逻辑内核；甚至可以说，他的历史知识理论体系就是对德罗伊森意义上历史主义的新发展。以下我们来看吕森如何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古典历史主义进行的新拓展。

吕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体系以历史意识为起点，历史叙事作为历史意识的实现方式，历史意义作为理论核心，历史文化作为当代社会中对“历史”如何有效呈现进行探讨的领域，学科范型作为现代历史学的学科结构，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循环。其中，历史研究来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导向人类的现实生活。与海登·怀特的叙事理论不同，吕森的历史叙事理论完整地展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逻辑。²吕森首先确立了四种历史意识的类型：传统性历史意识、典范性历史意识、批判性历史意识、进化性历史意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时间经验、历史感、外部和内部的导向以及道德价值论证的方式。与这四种历史意识相对应，形成四种历史叙事模式：传统叙事、典范叙事、批判叙事、进化叙事。这四种历史叙事类型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内涵、历史连续性内涵、历史认同内涵与历史意义内涵。在进一步的解释中，吕森给历史意识和历史叙事以不同的历史分期：（1）传统历史叙事和历史意识，是新

1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30页。

2 尉佩云：《历史叙事的理性逻辑——约恩·吕森与当代西方历史叙事理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

石器文化以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主导类型，在此阶段时间概念是永恒的、永生的。（2）典范历史叙事和历史意识介于新石器文化和前工业社会之间，在文化范畴上可以追溯到自希罗多德到伏尔泰之间。这个阶段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意识获得了超时间的有效性，并且极大地扩展了时间经验的范围。（3）进化历史叙事开始于18世纪的后半叶，是现代社会历史意识的主导类型。最后，古典文明的兴起被吕森视为传统历史叙事向典范历史叙事的过渡，而启蒙运动则被视为典范历史叙事向进化历史叙事的转变。这四种历史意识和历史叙事类型，具有鲜明的历时性特点和“不可通约”的特质。

在吸收韦伯“理想类型”思想的基础上，吕森的四种历史叙事类型在历史经验上取得了各自对应的时间涵盖。在评价德罗伊森时，吕森说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是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丰硕成果与典范表达；是普鲁士改革时代的政治和精神外化；是基督教宗教改革时开明神学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市民教育的需求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¹吕森在学术自省方面也一再强调，自己的整套叙事理论乃是一个现代史学理论范式下的结果，按照他自己的学术划分，属于进化性历史意识和历史叙事模式的结果——也即是说，传统、典范、批判、进化的这套叙事理论，本身诞生于进化性历史思维作为基础性维度之上。²并且，吕森自己对德罗伊森所谓的“批判”和“修正”也只是在今日历史学基础之上的结论。³将上面的论述加以总结来看，第一，吕森认为自己的叙事理论可分为传统、典范、批判、进化这四种叙事类型，这种划分方式本身是18世纪之后进化性历史意识和历史叙事方式的产物；第二，这种划分方式既然能被现代性历史经验所证实并支持，那么就能被以后的历史经验所证伪并推翻；第三，基于上述论断，那么他的整套叙事理论就是当代时代精神的彰显，是和今天的时代状况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学术形式相契合的历史知识的表现方式。这便属于古典历史主义的一种。由此便说明，在吕森的认知中，德罗伊森的观点并未过时，因为我们对德罗伊森的批判是基于今日的环境、状况以及现代历史学的形

1 Jörn Rüsen, *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 S. 9–43.

2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Über die Arbeit des Geschichtsbewußtseins, sich in der Zeit zurechtzufinden*, Köln: Böhlau, 1994, S. 21–34.

3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22—26页。

式而发，历史知识在逻辑上仍然是自知的知识，是与时俱进、自我演化、自我深入和扩展的知识。

吕森的叙事理论一方面可以看作历史编纂的思想发展史，使我们对历史意识和历史叙事的结构性认知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吕森的叙事理论中依然能够看见德罗伊森的历史主义内核，在外在世界的万端营求中，它的变动不居有其一致性的表达。历史经验本身的展开和现身有助于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范畴中深入理解历史的广阔，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本身也是历史：这是因为，历史在无休止地钻研自己并扩展自己的视野，历史的进步发展和历史情境联系在一起，史实的呈现方式（*Darstellung*）、方法论与历史本身是对应的。更具体地讲，古典历史知识理论、现代史学理论、历史知识乃至现代历史学本身就是历史主义的一部分¹，由于现实社会与历史思考之间的绝对关联，现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和现社会生活中的环境和条件不可分离。也正是由此，约恩·吕森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论证上，始终认为历史学来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导向人类的现实生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吕森并未否定作为德国重要传统思想资源的历史主义，而是将其转化成一整套契合现代历史知识理论话语的表现形式。

四、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从“Historik”到“Disziplinäre Matrix”

在所有的人文研究中，没有一门学科像历史学一样从其形成之时就开始对自己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进行不断的追问。各个历史时期对“历史学是什么”的询问，其本质是对历史研究的时代价值的考察。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逻辑合法性、时代效用性的追问，这三个方面是合一的。由于历史主义的逻辑后来成为历史学的立身之本，所以，对各个时代的学科性、合法性、有效性的讨论最后系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之中。也即是说，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其本质是各个时代对历史研究的

1 由于不同的政治倾向，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对约恩·吕森及其学生豪斯特·布兰克、弗里德里希·耶格尔对历史主义的此类解释多有批评，因为在伊格尔斯看来，此类历史主义的极端化是德国历史上数次灾难的思想根源。可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

合法性、有效性、价值本源的学术化与精确化表达。

在19世纪这个“历史学的世纪”中，德罗伊森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与阐释是与历史学的职业化一道而来的。德罗伊森指出，他所提出的“历史知识理论”不是历史哲学，也不是历史神学，而是要成为历史思考和探究的工具。¹因此，在德罗伊森对19世纪之前各类历史知识理论的整合与融贯下，他的历史知识理论成为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理论思考，包括方法论（Methodik）、系统论（Systematik）、体裁论（Topik）三大部分。

就方法论而言，首先是问题启发（Heuristik），其次是史料批判（Kritik），最后是历史解释。德罗伊森的方法论强调的是历史地理解，首先设置历史问题，然后通过具体的材料证据，能够将现时代中的过去经验还原为它们的过去面貌。换句话说，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工作，将他们所处时代中的遗存，疏离为历史材料证据中的过去，进而能够看到现今的历史是如何在过去形成的，而未来又会走向何处。²所谓的系统论，就是一种建立在理念论之上的历史解释系统。德罗伊森强调，历史解释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人类世界在时间中的过程（Vergang），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进而呈现人类行为在理念和精神上的动力。至于体裁论，便是历史学家最后的论述（Apodeixis）或写作工作。不过，历史写作并非附属于史料的文字呈现，而是历史知识中的创造性思想活动。在体裁论中，德罗伊森对修辞的引入，引出了历史知识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历史教育。在德罗伊森的视野中，主要指的是市民阶层的教育、教化以及通人教育。

从德罗伊森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和理解中可以看出，德罗伊森的历史学是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性学科，而非确立规律的经验性学科。³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约恩·吕森一方面吸收了德罗伊森的这个核心观点，另一方面又对之进行了符合现代历史学语境的拓展。

具体来看，吕森对德罗伊森做出总体性评价时说：“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刺激

1 Johann Gustav Droysen, *Grundriss der Historik*, Leipzig: Verlag von Veit & Comp, 1882, §. 16, S. 12.

2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19—57页。

3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民族主义与史学（1789—1996）：历史视野中的德国例子》，刘耀春译，《世界历史评论》2018年第10期。

了历史研究中理论形式知识的使用，这个事实，改变了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中系统论的地位：因为抽绎史实中知识的那些方法规则，最后一定要与理论性观点相结合；因此，从历史理论上说明历史研究中规则系统的最终基础，这项工作——系统论——必须要重新加以整理。”¹吕森在此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现代社会对历史知识性质理解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采用与之相符的历史解释。这也证明了上节的论点，即历史主义是吕森历史知识理论的内核：历史知识、表现形式与历史本身是相对应的。其二，德罗伊森的系统论是理念论的历史解释系统，基于历史主义的逻辑要求，我们必须提供现代社会当中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研究中规则系统的最终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现代社会的经验中重新申论历史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问题。吕森的对此的回答便是“学科范型”（Disziplinäre Matrix）论。

学科范型是吕森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进行表达的理论。在具体的阐述中，他给出了一套非常复杂、多元、逻辑化的理论阐释，即：（1）五个构成元素：兴趣、概念、方法、形式和功能；（2）五个思考维度：语义学维度、认识论维度、美学维度、修辞学维度以及政治维度；（3）三个理论层次：理论反思层次、实践反思层次以及实际生活层次。其中居于核心的依然是历史意义形成（Sinnbildung）的原则。²通过以上这五个元素、五个维度、三个层次、一个核心的理论模型，吕森对当代语境中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做了回答。

“学科范型”论的提出是在1976年³，此时正是德国现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开辟时期。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诉求，战后新一代的史学家、史学理论家们想要“创立新世界”，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也迫使德国史学理论家必须重新思考并回答“历史学是什么”“今日有何用”的问题。所以，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中，必须对历史学的规则系统、学科性质进行重新阐述。吕森的“学科范型”论，一方面吸收了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核心观点，依然将历史

1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导论第25页。

2 详细参见尉佩云：《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途径——以约恩·吕森的学科范型论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3 Jörn Rüsen, *Für eine erneuerte Historik: Studien zur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76, S. 46–48.

意义放在整个学科思考的中心；另一方面，德罗伊森的“启发”“批判”“历史解释”等概念被吕森用“兴趣、概念、方法、形式和功能”等现代史学理论术语进行了重新梳理表达。譬如说，德罗伊森原先的体裁论在吕森的学科范型中属于“表现形式”领域。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对历史书写与历史表现理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吕森使用“表现形式”这一术语，便是对当时国际史学理论话语的回应。此外，吕森的学科范型也吸收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比如库恩的“范式”理论、韦伯的“理想型”理论等。正是借助这些理论，吕森才能够将从德罗伊森那里继承的对历史学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理解，用现代历史知识理论的话语系统地表达出来。

在学科的定义上，历史学从德罗伊森的“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转化成了吕森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与此相应的学术背景是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史学界逐渐完成了由“社会”向“文化”的研究范式转移。至此，历史学不再是“精神”“理念”外化形塑的产物，而是向现世界提供文化产品的学科。由此，我们才能恢复历史学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功能，弥合当代史学在“理性方法论”和“诗性表现论”之间的裂隙。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上，吕森完成了由古典到当代的转变，历史研究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论研究”。

五、历史教育：由“市民教育”到“公民教育”

在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中，还包含着历史教育这个重要领域。海登·怀特在早年的一篇评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论文中，曾将之描述为“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写作”¹。怀特所使用的“资产阶级科学”一词，可以说准确地揭示了德罗伊森在历史教育上的鲜明特点。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建基于19世纪受教育的资产阶级，以当时欧洲各国为考察对象，以人类社会化理论为核心，得出结论：人端赖于

1 Hayden White, “Review of Historik by Johann Gustav Droyse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9, No. 1 (Feb. 1980), pp. 73–93.

该文后来收入他的《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 1987）一书第四章，并更名为“Droysen’s Historik: Historical Writing as a Bourgeois Science”。

自由开放的主体自我，从这个自我了解到自己的历史渊源，进而得出“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Ich der Menschheit）。¹

吕森对此说：“德罗伊森和黑格尔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是市民社会解放的背景和历史问题。”² 借由这一点，德罗伊森将市民社会的解放和国家强制力的加强解释成一个合一的历史过程。这一般视为德罗伊森对普鲁士政权的政治辩护。后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将德罗伊森作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先声而进行追溯³，遭到吕森的诸多批评。伽达默尔意在指出，其一，海德格尔“被抛入的此在”和德罗伊森的历史解释体系有诸多相合；其二，历史主义传统中，学术思想和强权政治的水乳交融自德罗伊森开始就有其先例。德罗伊森“市民解放”和“通人教育”等历史教育和教化思想，在此扮演了一个暧昧不清的角色。

德罗伊森的历史教育思想发展后来朝向了两个方向：一方面，这种通人教育有助于个体在历史中觉识自己的完整性，理解历史的贯通感（Totalität），在合历史性中达致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因而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历史课程是政治教育及一般性的通人教育的基础。政治领袖是最实际的历史家”，因而，“也只有我们的学科（历史学），才能掌握与塑造国家思想的脉络”。⁴ 历史教育在这里显然成为塑造政治认同，建立集体共通感的政治原则，并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市民解放”。

吕森对德罗伊森历史教育思想的扬弃，基本是吸收并强化了其中的人文主义要素，抛弃并弱化了其中的政治原则。吕森尤其反对德罗伊森将市民社会的解放与国家权力的强化解释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认为这是德罗伊森对普鲁士政权的政治辩护。与德罗伊森不同，吕森在“二战”后以左派自由主义者的形象登上学术舞台，他对第三帝国国家权力的批判、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与清偿一直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吕森看来，历史教育就应该为建构现代自由的公民意识、公民认同和国民教

1 Irene Kohlstrunk, *Logik und Historie in Droysens Geschichtstheorie. Eine Analyse von Genese und Konstitutionsprinzipien seiner "Historik"*, Wiesbaden: Frankfurter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1980.

2 Jörn Rüsen, *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 S. 16.

3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44–59.

4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107、109页。

育服务，最终塑造新的德国认同（即两德统一后的新德国）。由此，吕森在20世纪90年代主持了德国北威州的历史教育改革项目，将重塑新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肯定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强调人类的一致性、反思宏大叙事列为历史教育的主题。¹

吕森进一步指出，通过新德国现代自由公民教育的改革，德罗伊森“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自由本身是历史认同的结果，它只能从过去经验中取得”等思想，在现代历史教育中能够获得新的合理立足点。²这个立足点就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构新的人文主义和公民认同，为了将历史教学论的话语形式扩展到跨文化的维度，需要进行历史理论反思的人类学转向，在人类学的普世性上重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个体认同。在此，时间经验的意义形成对于历史思考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必须以人类学的普世性原则进行处理和解释。³总而言之，吕森的历史教育思想祛除了德罗伊森“通人教育”中受时代局限的一面，同时吸收改造了“通人教育”中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六、德国历史知识理论的现代演化

以约恩·吕森对德罗伊森史学思想的扬弃为例，德国历史知识理论从古典状态向现代历史知识理论演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总体性的特征。首先，历史知识理论话语状态从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人类过往以历史知识论的方式进行呈现，既是现代史学形成的结果，也是它最为突出的特征。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中理念论历史哲学的解释体系，由吕森以现代知识论的形式将其消化并转化为现代史学理论话语。其中的理念论中心，吕森以“意义构建”的方式完成了概念迁移。其次，历史主义由世界观向逻辑范畴转化。历史主义由古典概念中的历史本身、自知的知识，转化为现代历史知识理论中的逻辑范畴，它所含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逐渐退隐。再次，在学科认知上，历史学由“精神科学”变成“文化科学”。德罗伊森“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等世界史精神的概念，由吕森以历史人类学、跨文化史学理论等方式进行了

1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 Orientierung. Über die Arbeit des Geschichtsbewußtseins, sich in der Zeit zurechtzufinden* 以及 Jörn Rüsen, *Historisches Lernen. Grundlagen und Paradigmen*, Köln: Böhlau, 1994。

2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导论第26页。

3 Jörn Rüsen, *Evidence and Meaning: A Theory of Historical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2017, pp. 80–89.

重新论证，使其具有了现代意义。

同时，约恩·吕森又继承了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中的核心论点：第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性首先来自人类的生活世界。历史不是外在于史家的抽象事物，在史家发觉之前，历史已经沉浸在现时代的人类世界中。第二，历史研究来源于人类生活，最后导向人类的现实生活。区别在于，德罗伊森以理念论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论证循环，吕森以学科结构认知（“学科范型”论）为基础完成了这个论证。第三，历史学是一门以意义寻求为目的解释性学科。吕森以“历史意义”为整个理论架构核心就可以看出。第四，历史研究的首要性质在于其伦理性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吕森对历史创伤、历史认同问题的研究上。

在吕森对德罗伊森思想的扬弃中，有些主题的“现代演化”并不是非常彻底，比如，在历史意义、历史主义、历史伦理这些主题中，吕森对理念论内核的剥离是非常含混的。仔细彻查会发现他对历史意义的申论、对“生活世界”的强调、对历史理性的辩护、对历史伦理的信仰，总有一个似有似无的“精神驱策”。当然，这个“精神驱策”是以现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形象出现的。在当代史学理论界中，这个暧昧的“精神驱策”可以称之为吕森历史知识理论中那个漫长悠远的“德国性”。

走向通史之路：知识史研究的德国面貌

| 范丁梁 |

内容摘要：在德国史学发展中，关于知识的研究经历了一段爬坡过程。通过整合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资源，作为专有名词的“知识史”在21世纪的德国史学中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地位。它不但深化了德国历史学家对知识现象本身的历史性审视，而且作为研究探针和反思推力促进了对1800年以来德国史的全盘考察。与智识上的繁荣和方法论上的开放相对，知识史研究在组织和机构上日益呈现出分散和动荡的特征。众多的知识史问题正在不同的旗帜下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探讨，并且也遭到了不同的反对意见。

关键词：德国史学 知识史 科学史 知识社会学

近年来，知识已是众多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当人们信赖知识在经济生产和社会创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时，当人们想要深入了解社会各领域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应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时，当人们日益倾向于把知识定义为社会与文化的组合产物时，越来越多的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科学史和历史学等——都试图阐明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但就像人们对“知识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一样，任何研究领域也无法超然而独力地处理知识生产、流通与运用中的所有复杂条件与后果。就此而言，历史学家要书写的知识史也受制于其特定的视角、方法与认知预设。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什么是知识史》中对知识史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进路做了精要的阐释，不过他并未强调知识史研究的国别特征。¹德国史家马利

¹ 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安·福塞尔（Marian Füssel）在其关于知识史研究的入门介绍中，也是秉持着国际和欧洲视角。¹当然，在全球史学职业共同体的智识同质性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要谈论某个研究领域的民族国家性是一件需要谨慎以待的事。对知识史而言更是如此。倘若历史学家深信知识是人类复杂的文化成就，也切实体验到知识迁移超越了人类共存的政治形式所赋予的界限，那么就很难宣称某个国家的知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临界性”。但如果跨过历史化、语境化和地方化的“史学门槛”，人们依然可以在学科发展的细节和调性上描绘出一些国家特性。本文试图从历史沿革、学科个性和现实境遇等角度出发，分析知识史研究在德国的面貌；并从对其学科运作和知识生产的审视中，思考其未来的走向。

一、多传统的汇聚

虽然从主题上看，过去的一切原则上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但在具体实践中，有许多事物的历史并不是主要由历史学家来书写的。在“知识史”这个专有名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一研究对象实际上已经存在于科学史、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等各种研究传统中。所以，在知识史的“前史”中，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和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等都是先驱者。不过在德国，这些学科与知识史之间的纠葛和区分各不相同。

在知识史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序列中，科学史首当其冲。在德语学界，科学知识可谓研究最广、讨论最多、学科化程度最高的知识类型。这首先跟概念的使用有关。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将科学史缩小为自然科学史不同，德国的科学史更是全面的学术史。因为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本身并没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德国人称之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之间制造分裂与等级。1858年9月30日，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向

1 Marian Füssel, *Wissen. Konzepte – Praktiken – Prozesse*, Frankfurt a.M. 2021.

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预备咨询会议”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将“科学史丛书”与“德国历史年鉴”（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和“德意志人物志”（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共同作为历史委员会的首要编纂任务。兰克认为，德国的“科学成果史缺乏连贯的指导”，“如果能编写一部德国科学史，那将是一部真正的国家著作”。¹ 兰克的建议表明，19世纪历史学家对科学史的兴趣可能比今天人们所设想的要大。但他将科学史局限于科学成果史，并且更进一步建议将重点放在晚近时期，这也说明了传统科学史的学科领域是多么狭窄。似乎只有在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文明进步的指导思想下，各个学科的历史才成为一部关于发现、错误、阻碍、斗争和动荡的事件史，并最终划出一条科学崛起的宏大主线。这一德国综合科学史计划得到了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Joseph）的大力支持。从1864年开始至1913年为止，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共出版了24卷的《现代德国科学史》（*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Neuere Zeit*），其涵盖的学科从数学、物理、化学到语言学、哲学和神学，不一而足，其中第20卷是史学史。这套书固然也是为了补充政治史的成果，但也清楚地证明了，德国史学在专业化之初就对科学和学术有过系统的考量。

当然，德国的科学史最终在历史学之外制度化了。“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中的历史”，是各个学科自己的学科史，它基本上由学科内部进行研究和书写。无论在内容方法上，还是在组织机构上，它与历史学的联系都微乎其微。1901年，德国医学和自然科学史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Naturwissenschaften）成立，后改名为德国医学、科学和技术史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简称DGGMNT）。1964年，围绕如何处理学会成员之纳粹经历的问题，学科内部产生了严重分裂。1965年，一部分人从原学会脱离出来，成立了新的科学史学会（Gesellschaf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简称GWG），随后开始出版其学术期刊《科学史报告》（*Bericht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新的学会名称把“自然”一词移走，表明了科

1 Leopold von Ranke, *Abhandlungen und Versuche. Neue Sammlung*, Leipzig 1888, S. 490.

学史进一步的开放。科学史家、文化社会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1976年出版了《自然史的终结：18至19世纪科学中文化自明性的变迁》。他在其中实践了“历史科学研究”（Historische Wissenschaftsforschung），从而回答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之问：一种思维方式及其所有先决条件在各个知识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核心动力究竟何在？¹这部探讨“自然史的终结”之作，意味着历史思维向科学史的进军。1994年，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在柏林成立。该研究所拥有令人羡慕的大量研究资源，其研究重心在科学的认识论和知识论上。2017年，DGMNT和GWG合并为新的科学、医学和技术史学会（Gesellschaft fü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Medizin und Technik，简称GWMT），旨在将这一学科领域的力量整合在一起，更有力地走向未来。

这个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包罗万象的知识史”联系在一起。对于科学史与知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曾担任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之列支敦士登人汉斯-约格·莱因贝格尔（Hans-Jörg Rheinberger）提出的口号是“交错而非合并”²。在德语中，Wissenschaft（科学）与 Wissen（知识）这两个单词的词源关系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将Wissenschaftsgeschichte（科学史）与 Wissensgeschichte（知识史）放在一起讨论。“知识史而非科学史”“从科学史到知识史”这样的论文题目³，在德语中的韵律感要远胜于英语和法语。⁴当知识史的运作

1 Wolf Lepenies, *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Wandel kultureller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in den Wissenschaften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76.

2 Hans-Jörg Rheinberger, “Wissens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Ein Statement”,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23/24 (2003), S. 12f., hier S. 13.

3 Ulrich Johannes Schneider, “Wissensgeschichte, nicht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in: Axel Honneth/Martin Saar (Hrsg.), *Michel Foucault. Zwischenbilanz einer Rezeption*, Frankfurter Foucault-Konferenz 2001, Frankfurt a. M. 2003, S. 220–229; Jakob Vogel, “Von der Wissenschafts- zur Wissensgeschichte. Für eine Historisierung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0 (2004), H. 4, S. 639–660.

4 在美国，虽然向知识史的转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等地的大学尤其与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联系紧密，但这一术语在美国科学史圈的流行度远比不上德国。2015年起担任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西蒙娜·莱西格（Simone Lässig）对通过社会和文化史的方式来研究知识史颇有兴趣，所以她将知识史作为该研究所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在莱西格的推动下，美国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关于科学史和知识史的对话才日益深入。参见 Simone Lässig,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in: *Bulletin of the GHI Washington*, 59 (2016), pp. 29–58。

模式不断跨越更多边界，不断囊括更多主题时，科学史似乎就变成一个狭窄而封闭的领域。科学史内部对传统方法的失望和渴望自我革新的动力，加强了它向历史学的靠拢。德语的“科学”概念虽然在横向的覆盖上较为灵活，可以涵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但在纵向向前现代时期延展时却也遇到问题。作为一个带有目的论性质的概念，“科学史”很多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描述许多历史学家对古代、中世纪、现代早期、非西方、业余人士和手工业者的知识创造实践进行的大量探究。因此，像罗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这样的科学史家——这位美国学者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在历史化的道路上大步向前。这一趋势导向了对非西方知识传统的重视，对“科学”和“客观”等概念之历史变化的认可，对科学思想和行动的语境化理解，由此加强了科学史与知识史之间的联结，当然也模糊了两者之间的边界。¹

与科学史的这种开放与交融相比，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在纲领层面，两者似乎是同根同源的，因为思想史的理论权威——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福柯、卢曼、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²——都可以在知识史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实践上，两者的距离仍然较为遥远。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里，德语世界的思想史对自身的方法论立场进行了持久的反思与革新，但无论它如何宣称要“将思想嵌入传统知识秩序，并将其与政治行动、特定语言和修辞策略联系起来”³，它从根本上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任意性的，它依然假设真理是存在的——不管真理是否能被把握和认可，它依然坚持好的、正确的、光明的、伟大的思想遗产必须在思想史中得到捍卫。正如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20世纪70年代在讨论历史主义时曾主张思想史“去社会学化”和“去历史学化”一样，他认为：

1 参见Lorraine Daston/Peter Galison, *Objektivität*, Frankfurt a. M. 2007; Staffan Müller-Wille/Carsten Reinhardt/Marianne Sommer, “Einleitung.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Wissensgeschichte”, in: Marianne Sommer/Staffan Müller-Wille/Carsten Reinhardt (Hrsg.), *Handbuch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 2017, S. 2–19; Kaspar von Greyerz/Silvia Flubacher/Philipp Senn, “Einführung. Schauplätze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in: dies. (Hrsg.),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 des Wissens im Dialog-Connecting Science and Knowledge*, Göttingen 2013, S. 9–32。

2 Martin Mulsow/Andreas Mahler (Hrsg.), *Texte zur Theorie der Ideengeschichte*, Stuttgart 2014。

3 Samuel Salzborn (Hrsg.), *Handbuch Politische Ideengeschichte. Zugänge-Methoden-Strömungen*, Stuttgart 2018, S. VII。

关于历史主义思想如何以及为何出现的问题，关于这种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意识形态条件和原因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历史问题。追问历史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追问其制度化对传统和角色形成的影响，也是合理的。但这些都是关于历史主义的历史性问题……我认为必须摆脱这些问题。学术史不能面向知识社会学或思想史。……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起源和发现的背景，也不是效果和功能的背景，而是正当性和有效性；不是历史学的社会学，而是历史主义自身的逻辑……对历史学家这一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这一社会产物的政治效果的批判，不属于关于历史主义的学术逻辑辩论。历史主义的效果或“功能”与其逻辑内容并不相同。历史学家的政治意图和效果尽管可能很有趣，但与他们的方法和结果的有效性无关。¹

德国思想史这种传统的哲性立场，使得它为知识史的成长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养分。从最简单的定义来看，知识的历史问题旨在分析知识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它承认两个基本前提：其一，知识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流通。知识的运作就是某一知识领域对其他知识领域做出反应，在不同社会空间中被使用，并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其二，知识是一种历史现象，知识史并不试图讨论知识体系的真假、好坏和利弊问题，而是要讨论它们何时、如何、为何出现并消失的问题。菲利普·萨拉辛（Philipp Sarasin）在2011年发表的德语世界知识史纲领性论文《什么是知识史》（Was ist Wissensgeschichte）中，告诫知识史家不要评判他们所写知识的正确性，并提醒他们“作为意义之源的作者早已死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进步和真理采取一种适度的怀疑态度，并将其与“作为一切之基础的权力问题联系起来”。²这显然与德国思想史的立场相去甚远。

1 Thomas Nipperdey, “Historismus und Historismuskritik heute”, in: ders.,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6, S. 59–73, hier S. 66.

2 Philipp Sarasin, “Was ist Wissensgeschichte?”, *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36 (2011), Nr. 1, S. 159–172.

德国的知识史研究最大的源泉来自知识社会学。随着探讨人类知识之社会条件的知识社会学在20世纪初的德国出现，知识作为一种理解的媒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知识社会学最初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将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目前知识史的许多问题视野都已被它预见到。¹不过，早期德国历史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的零星联系，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直到“知识社会”理论大行其道，才给了历史研究极大的刺激。对德国史学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知识社会”就没有“知识史”。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分析假设，即在他所称的“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已成为社会行动的核心基础。这之后，“知识社会”作为一个时代诊断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流行开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德语国家的历史研究也开始了关于知识社会的讨论。2001年，有两本重要著作出版：其一是被译成德文的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²；其二是比勒菲尔德社会学家彼得·魏因加特（Peter Weingart）的《真相时刻？》，他在书中指出了知识社会中科学、政治、商业和媒体等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并用政治化、商业化和媒体化等概念对其进行了分析。³这之后，德国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特定时代的知识秩序特点，尤其是科学、社会、政治与经济各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⁴

2005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ät Zürich）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共建了一个知识史中心（Zentrum Geschichte des Wissens）。直到2022年该中心关闭为止，它一直是德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史机构。这里的一些领军人物大多是历史学家，也有一些人来自文学史、历史人类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哲学和其他领域。该中心提供跨学科的硕博博士学位，并给自己的官方期刊起了一个

1 参见 Rainer Schützeichel (Hrsg.), *Handbuch Wissenssoziologie und Wissensforschung*, Konstanz 2007。

2 Peter Burke, *Papier und Marktgeschrei, Die Geburt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Berlin 2001.

3 Peter Weingart, *Die Stunde der Wahrheit? Zum Verhältnis der Wissenschaft zu Politik, Wirtschaft und Medien in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Weilerswist 2001.

4 参见 Stefan Fisch/Wilfried Rudloff (Hrsg.), *Experten und Politik: 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beratung in 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 Berlin 2004; Richard van Dülmen/Sina Rauschenbach (Hrsg.), *Macht des Wissens.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issensgesellschaft*, Köln 2004; Peter Weingart/Martin Carrier/Wolfgang Krohn (Hrsg.), *Nachrichten aus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Analysen zur Veränderung der Wissenschaft*, Weilerswist 2007。

响亮的名字——《下班后：苏黎世知识史学年鉴》（*Nach Feierabend: Zürcher Jahrbuch für Wissensgeschichte*），意指知识史是研究者们写完“大写”的科学史后在周末和节假日干的事。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知识史研究在德语世界已在智识上获得认可，尽管作为一个大学外的科研机构，它的体制地位并不那么稳固。

二、视角和方法的进阶

知识史并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学科领域，而是对潜在研究对象的一种特定视角，它的核心立场在于将知识现象首先变成一个双重性的历史问题：知识有历史，知识创造历史。国际上已蓬勃发展一段时间的知识史，正是基于并且反映了知识的这种双重历史性。知识史研究在德国的成果也立足于此。围绕这个双重历史性，产生了知识史的核心问题：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如何产生的？知识的魅力何在？知识如何迁移？知识如何被利用、误用甚至被滥用？知识在历史上的变化以何种形式、媒体和空间表现出来？我们的智慧来自何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在这些领域，德国学者都做出了值得赞许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既然人们无法就知识的定义达成一致，那么知识史的研究对象就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目前的知识史不仅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还包括那些传统上被排除在狭义科学范围之外的知识形式的历史，例如技术知识、实用知识、程序性知识、管理知识、日常知识、社会知识和审美知识，尤其是视觉知识。它既包括精心设计的知识形式，也包括更实用的知识形式（无论是制度形成的行政和法律知识，还是基于经验形成的实用和隐性知识）。

从时段上来看，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研究者尤其将重点放在国家知识上，关注了自19世纪晚期以来行政程序以及军事和政治形式的知识性。他们聚焦基于官方统计数据而产生的“数字信任”的社会表征¹，并将警察、军队、行政管理和日常生活组织的变化与对相关医学、心理学和生

1 Peter Collin/Thomas Horstmann (Hrsg.), *Das Wissen des Staates: Geschichte, Theorie und Praxis*, Baden-Baden 2004; Daniel Schmidt, *Statistik und Staatlichkeit*, Wiesbaden 2005.

物学知识的分析联系起来。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纳粹政权中的作用也在科学化进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分析。

第二个重要的研究时段是1500至1800年的早期现代，包括向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延伸以及著名的“鞍型期”。虽然生活方式、社会协商过程和国家监管行动的科学化被描述为一个突出的现代现象，但早期现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强调，早期社会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无论是宫廷还是村庄，都是权力与知识动态运作的复杂领域。²作为从思想史进入知识史的史学家，在埃尔福特大学执掌“现代欧洲知识文化”教席和哥达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Gotha）的马丁·穆尔索（Martin Mulsow）就是典型代表。作为德语世界早期现代知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包括早期现代的政治异见、宗教异端和学术怪癖。通过梳理地下政治、社会边缘和学术边缘的脉络，他的作品暗示了现代性的另一种谱系。在代表作《岌岌可危的知识》（*Prekäres Wissen*）³中，穆尔索讨论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知识分子对魔法、钱币学、圣经释义和东方研究这些边缘领域的恐惧、钦佩、退缩和捍卫的姿态与行动。他认为：知识是有充分根据的信念和浸透在经验背景中的有组织的信息，真假并不是判定知识的标准，因为虚假知识也具有行动指导性和有效性。知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保持稳定，这并不取决于知识的客观内容，而是由知识的地位所决定的，即知识与其他知识内容的关系、物质意义上的“知识载体”以及代表知识的人的社会地位。因此，知识也可能是不稳定的、转瞬即逝的、边缘的和濒危的。

1 Philipp Sarasin u.a. (Hrsg.), *Bakteriologie und Moderne. Studien zur Biopolitik des Unsichtbaren, 1870–1920*, Frankfurt a. M. 2007; ders./Jakob Tanner (Hrsg.), *Physiologie und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Studien zur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s Körper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 M. 1998; Martin Lengwiler, *Risikopolitik im Sozialstaat: die schweizerische Unfallversicherung 1870–1970*, Köln 2006; ders., *Zwischen Politik und Kaserne: die Geschichte der Militärpsychiatrie in Deutschland und der Schweiz 1870–1914*, Zürich 2000; Daniel Speich Chassé, *Die Erfindung des Bruttosozialprodukts. Globale Ungleichheit in der Wissensgeschichte der Ökonomie*, Göttingen 2013.

2 Johannes Fried, *Die Aktualität des Mittelalters. Gegen die Überheblichkeit unserer Wissenschaftsgesellschaft*, Stuttgart 2002; Richard van Dülmen/Sina Rauschenbach (Hrsg.), *Macht des Wissens.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issensgesellschaft*; Marian Füssel, “Auf dem Weg zur Wissensgesellschaft. Neue Forschungen zur Kultur des Wissen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34 (2007), Nr. 2, S. 273–289; Marian Füssel/Antje Kühle/Michael Stolz (Hrsg.), *Höfe und Experten. Relationen von Macht und Wissen in Mittelalter und Früher Neuzeit*, Göttingen 2018.

3 Martin Mulsow, *Prekäres Wissen. Eine andere Ideen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 Berlin 2012.

相比之下，有关1945年后两德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科学化的历史研究要零散得多。不过，一些重要著作专门论述了联邦德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工作方法和应用领域，并论述了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自我形象以及对政治、教会和经济的组织和认识的影响。¹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科技知识对民主德国精英阶层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这两个德国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都是人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可预测性和可规划性的信念达到顶峰的时期。然而，迄今为止，对这种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延续程度的分析要少得多。而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出现的科学乐观主义破灭所产生的影响，还较少被纳入历史研究。

这些研究的问题和取向基本上与国际趋势相一致，其中充满了热情、探索、创新、刺激和火花，当然有时也是拼凑的、粗糙的，或者浅尝辄止。但德国的知识史研究所具有的最大特色，并不在于它是目前该领域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而是因为它试图将“知识”提升到与政治史中的“国家”或者社会史中的“社会”概念同等的地位，以此将知识史打造为打开通史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浪潮中应运而生，最终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史学专业期刊之一的《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在2008年第4期出版了名为“作为整体社会史的知识史”（*Wissens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的专刊。²它实际上是2006至2009年联邦教育部资助的跨学科联合项目“想象中的欧洲人——欧洲智人的科学建构”（*Imagined Europeans. Die wissen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s Homo Europaeus*）的阶段性成果。莱比锡大学、洪堡大学和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项目的出发点是，在“欧洲人”身份建构的漫长岁月中，与其相关的概念、想象和貌似合理的说法都是在历史对话中出现的，可以从社会观念

1 Paul Nolte, *Die Ordn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Selbstentwurf und Selbstbeschreibung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00; Christoph Weischer, *Das Unternehmen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Strukturen, Praktiken und Leitbilder der Sozial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2004; Alexander Nützenadel, *Stunde der Ökonom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Experten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49–1974*, Göttingen 2005; Benjamin Ziemann, *Katholische Kirch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1945–1975*, Göttingen 2007; Anja Kruke, *Demoskop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einungsforschung, Parteien und Medien 1949–1990*, Düsseldorf 2007; Jens Adamski, *Ärzte des sozialen Lebens. Die Sozialforschungsstelle Dortmund 1946–1969*, Essen 2009.

2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4 (2008), H. 4, Wissensgeschichte al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与相应科学研究之相互关系的变动中得到解读；正是因为18世纪晚期起科学的分类尝试与政治国家的秩序观念并驾齐驱，才导致了文化的本质主义形象。发表在这个专刊上的三篇论文，分别考察了20世纪生物多样性研究、汽车工业用户建模预测和预防性干预措施的发展如何导致了“欧洲性的发明”。这些项目成果本身并未造成多大的轰动效应，意味深长的是《历史与社会》的这个专刊口号。编辑部似乎想在顺应知识史新潮流的同时，又不让它动摇社会史研究的根基，其潜台词是：整体社会史的范式可以吸收一切。这个举措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的一种职业个性：他们偏爱在一个思维空间中，在一个“整体关联”中去谈论他们研究的对象。

尽管“整体关联”这样的说法听上去有种宏大叙事的意味，但现代德国史学的确总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展开对整体历史的想象和叙述的。19世纪时，这个整体关联是民族：它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既是梦想中的，也是现实中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很多德国史家就是在民族国家或者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组织其历史书写的，民族是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和发展方向。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为代表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发展起来一种“整体社会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的模式，他们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在这些子系统中，社会领域因其扮演的背景角色而从所有的子系统中脱颖而出，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社会史之后遭到了文化史的冲击，其在学科中的话语势力已今非昔比，但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化”或者说“意义”并没有在德国史学中成为新的解释框架。比起主体的经验和行动，德国史家更偏爱将（政治）权力或者（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菲利普·萨拉辛提出要将“知识”作为背景，将知识领域中的参与者网络，连同秩序体系、实践和知识媒介作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以一种实质性的、全新的方式来谈论三十年前被社会史学家称为社会，六十年前被传统史学家称为国家和政治的关联语境”¹。

萨拉辛的这个知识史行动纲领，是对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德国史学在内化“知识社会”概念时所采取之路线的升级。德国的知识社会史学大致上有两种形式：其

1 Philipp Sarasin, “Was ist Wissensgeschichte?” S. 159–172, hier S.

一是语境化的形式，就是将1950年后所出现的知识社会置于一个相对更长的发展时段中，从知识类型与知识生产秩序的变化出发，探讨人类世界向知识社会的转型。其二是去语境化的形式。只要所有社会都以特定的知识体系为基础，那么所有社会也都可以被理解为知识社会。现代知识社会的某些特征可以被提取出来，然后去语境化地投射到对过去社会之知识生产与流动的分析中。在前一个进路上，卢茨·拉斐尔（Lutz Raphael）、玛吉特·索洛西-扬泽（Margit Szöllösi-Janze）和雅各布·沃格尔（Jakob Vogel）等人提出了符合要求的历史化方案。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知识社会的概念置于“高度现代主义”或者说“现代盛期”（Hochmoderne）的视角下，并由此打开了通向整体历史的大门。

虽然沃尔夫·勒佩尼斯早就将工业化、民主化、科学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虽然彼得·魏因加特也使用过“社会的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ellschaft*）概念¹，但令“社会的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s Sozialen*）作为核心主题在德语世界的历史研究中扎下根来的是现任德国历史家协会主席的卢茨·拉斐尔。1996年，拉斐尔在《历史与社会》上发表了《社会的科学化：对20世纪社会史的方法论和概念论的挑战》一文。²他所谓的“社会的科学化”是指包括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内的人类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专家论点和研究成果长期存在于政党和议会、行政部门和公司，以及阶级和社会群体的日常意义世界。拉斐尔以德国为例，将19世纪至今“社会的科学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从而揭示专家在政治和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创造出来的这个新概念——正如他自己所言——是“对20世纪社会史的方法论和概念论的挑战”：首先，这一理论为研究工业时代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模式。在该模式下，政治上的飓风与灾难对德国现当代历史的结构性影响消退了，政治军事史上的急剧断裂不再遮蔽一切，其他领域的连续性浮现出来。其次，这一理论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之间架起了桥梁。狭隘的科

1 Peter Weingart,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Gesellschaft—Polit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12 (1983), H. 3, S. 225–241.

2 Lutz Raphael, “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s Sozialen als methodische und konzeptionelle Herausforderung für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2 (1996), H. 2, S. 165–193.

学史和学科史书写被突破，在“鞍型期”大显身手的概念史可以将其解释力延续到20世纪。再次，这一理论为当代历史书写的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支持。当代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社会科学生产的大量数据资料。只有当历史学家在“社会的科学化”语境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批判性审视而不是对其盲目信任时，只有当历史学家把它们当作“事实建构”而不是“事实本身”时，当代史研究才不会变成陈词滥调。

基于上述应用潜力，“社会的科学化”理论在德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拉斐尔将社会生活世界的科学化视为一个与社会和政治的国家化密切相关的过程，两者又共同构成了西方工业社会的一个总现象。他推进了知识史研究中一个适合于开辟新的实证研究领域的分析范畴：科学专家。¹理论的密集性和主题的开放性使“社会的科学化”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构想。在诸如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罪犯病理化、经济统计的国际标准化、1900年前后美国和社会改革、民主德国的家庭政策、瑞士的社会保险、政治规划概念、经济政策建议、“实证社会研究”的发展以及联邦共和国天主教会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等研究中，当学者们要探讨科学知识向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迁移时，他们就开始运用这一概念。²

伴随着知识史研究的发展，拉斐尔提出的方法在方法论反思中也得到了深入探讨。玛吉特·索洛西-扬泽建议在科学化进程中引入“知识社会”概念，并以此重新

1 Stefan Fisch/Wilfried Rudloff (Hrsg.), *Experten und Politik. 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beratung in 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 Ariane Leendertz, “Experten-Dynamik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in: Christiane Reinecke/Thomas Mergel (Hrsg.), *Das Soziale ordnen.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gesellschaftliche Ungleichheit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 M. 2012, S. 337–369.

2 Christian Müller, *Verbrechensbekämpfung im Anstaltsstaat: Psychiatrie, Krimin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 in Deutschland 1871–1933*, Göttingen 2004; Daniel Speich Chassé, *Die Erfindung des Bruttosozialprodukts. Globale Ungleichheit in der Wissensgeschichte der Ökonomie*; Marcus Gräser, *Wohlfahrtsgesellschaft und Wohlfahrtsstaat. Bürgerliche Sozialreform und Welfare State Building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1880–1940*, Göttingen 2008; Christian Fleck, *Transatlantische Bereicherungen: zur Erfind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a. M. 2007; Ute Schneider, *Hausväteridylle oder sozialistische Utopie? Die Familie im Recht der DDR*, Köln 2004; Martin Lengwiler, *Risikopolitik im Sozialstaat. Die schweizerische Unfallversicherung 1870–1970*, Köln 2006; Koni Weber, *Umstrittene Repräsentation der Schweiz. Soziologie, Politik und Kunst bei der Landesausstellung 1964*, Tübingen 2014; Gabriele Metzler, *Konzeptionen politischen Handelns von Adenauer bis Brandt. Politische Planung in der plur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aderborn 2005; Alexander Nützenadel, *Stunde der Ökonom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Expertenkultur in der Bundesrepublik 1949–1974*; Christoph Weischer, *Das Unternehmen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Strukturen, Praktiken und Leitbilder der Sozial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njamin Ziemann, *Katholische Kirch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1945–1975*.

定义当代历史。她着重强调，虽然研究者已经将科学和技术语境化，将其作为社会实践与文化意义来研究，并且发现了知识和科学对整个文化语境的意义，但科学史和知识史与“通史”之间的合作仍未得到充分发展，研究者并未真正发掘出科学技术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性。这种状况对德国史研究尤为不利。因为她认为，正是科学化进程导致了纳粹主义，并将第三帝国与其前史和后史联系在一起；第三帝国的基础是非理性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动力的结合，科学家们相互之间以及与纳粹国家的各个权力集团之间交织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网。¹而且，鉴于“社会的科学化”理论虽然能够有力地解释科学文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传播，但并没有反过来将科学化进程对科学机构的影响等量齐观。索洛西-扬泽指出，“社会的科学化总是同时带来科学的政治化、经济化和媒介化”，她点明了“政治的科学化”与“科学的政治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对科学化和政治化的概念比照，她强调，现代历史中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应仅仅被视为前者向后者的扩展，而应被视为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里，科学与政治被视为两个不断交换资源、相互依存的领域。²

与索洛西-扬泽一样，雅各布·沃格尔的动机也是将科学史和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历史研究的主流。不过，他比索洛西-扬泽更强调知识史对当今知识社会的批判潜力。他提出的知识史更重视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知识史与科学知识之间的紧密纽带，阻碍了它向通史问题的开放。一种更有贡献的知识史，应该可以通过对现代知识秩序的审视来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应该可以同时从“科学化”和“去科学化”两种视角出发去描述社会知识史秩序的变革，更应该可以把握特定的知识典范对于构建“西方文明”的自我形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³

显然，更加深入地进入通史问题，是知识史研究在德国最引人注目的诉求和实

1 Margit Szöllösi-Janze, “Wissens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Überlegungen zur Neubestimmung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e über Verwissenschaftlichungsprozess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0 (2004), H. 2, S. 277–313; ders., “Wissensgesellschaft—ein neues Konzept zur Erschließung der deutsch-deutschen Zeitgeschichte?”, in: Hans Günter Hockerts (Hrsg.), *Koordinaten deutscher Geschichte in der Epoche des Ost-West-Konflikts*, Berlin 2009, S. 277–306.

2 Margit Szöllösi-Janze, “Polit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en—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Politik. 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beratung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Stefan Fisch/Wilfried Rudloff (Hrsg.), *Experten und Politik. 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beratung in 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 S. 79–100.

3 Jakob Vogel, “Von der Wissenschafts- zur Wissensgeschichte. Für eine Historisierung der ‘Wissensgesellschaft’”, S. 639–660.

践。对于19至20世纪的德国历史而言，分析知识秩序的转型和向知识社会的迈进，可以把从威廉德国、魏玛德国、纳粹德国到1945年后德国的“三部当代史”（汉斯-君特·霍克茨 [Hans-Günter Hockerts] 语）纳入一个长期的语境框架中，既不会抹平分歧，亦不会过分强调割裂。而且，知识史的这种进路与线性的、规范化的、进步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它不会再刻画任何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一方面，知识史的观点假定，通往知识型社会的道路多种多样，包括那些通向死胡同的道路。另一方面，与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理念相反，它强调了这种发展的矛盾性、巨大的冲突性和高昂的社会成本。“社会的科学化”可以从根本上扩大社会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压迫、破坏和毁灭。就此而言，对于近现代德国史的书写来说，知识史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更是意味着新的解释框架和整合力量。

三、行动中的繁荣与动荡

2023年在莱比锡召开的第54届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以“脆弱的事实”（Fragile Fakten）为主题。¹这个口号预先表明了它要讨论与知识史有关的广泛问题。这场大会的布局与选题，体现出当前德国史学界在知识研究上的典型特点。众多领域的知识得到了讨论，包括但不限于风险知识、另类知识、感性事实、受委托而提供的历史知识、史前知识和赝品中的知识等等。科学史、环境史、社会政策史和身体史等是对话最多的领域。事实的脆弱、真相的产生、感性的力量是不断被提及的话题。修辞、策略、感知和期望等词语反复出现，成为描述知识生产的常用语。这一切都表明，知识史已经成为德国史学中一条稳定而又开阔的进路。

这种繁荣局面的形成，要归功于知识史在德国迅速的制度化发展。迄今为止，德国大学在知识史的教席命名方面一直比较犹豫，只有少数几个大学在此脱颖而出，包括：“欧洲现代知识文化”（Wissenskulturen der europäischen Neuzeit，埃尔福特）、“知识的物质性”（Materialität des Wissens，哥廷根）和“知识史”（Wissensgeschichte，

1 <https://www.historikertag.de/Leipzig2023/>，访问日期：2024年8月11日。

康斯坦茨）等。但在大型项目的合作研究上，知识史可谓大步向前。早在1979年，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就资助了一个名为“19世纪的知识与社会”（Wissen und Gesell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SFB 119, 项目执行时间1979—1986年）的项目。但当时，知识研究尚未流行开来，这个项目也没有受到什么持续的关注。直到进入21世纪，跨学科的知识史项目日益增多。目前所见的知识史研究成果，很多都是在项目滋养下产生的。如果在德国科学基金会的项目数据库中以“知识”（Wissen）为关键词、以“历史学”为限定学科加以检索的话，可以得到一个德国史学界知识史研究的模糊面貌（见表1）。

表1 21世纪德国科学基金会知识史研究相关项目列表¹

	项目号	项目名称	时间
1	SPP 1143	科学、政治与社会：19世纪末和20世纪国际背景下的德国	2003—2010
2	SPP 1173	欧洲中世纪文化的融合与解体	2005—2011
3	SPP 1981	Transottomanica：东欧—奥斯曼—波斯的流动动态	2017—
4	SPP 2130	现代早期的翻译文化	2018—
5	SPP 2357	犹太文化遗产	2022—
6	SFB 573	现代早期的多元化与权威（15至17世纪）	2001—2011
7	SFB 640	不断变化之社会秩序的表征：跨文化和跨时空的比较	2004—2013
8	SFB 644	古代的变革	2005—2016
9	SFB 700	有限国家政权地区的治理：新的治理形式？	2006—2017
10	SFB 923	受威胁的秩序	2011—2023
11	SFB 933	物质文本文化：非文字社会中文字的物质性和存在性	2011—2023
12	SFB 948	英雄—英雄化—英雄主义：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与契机	2012—2024

¹ 该表格数据针对的资助类型如下：第一，优先项目（Schwerpunktprogramm, 项目代号SPP），旨在通过跨地区合作来推进对某一科学领域产生形成性影响的课题，最长资助年限6年。第二，特别研究领域项目（Sonderforschungsbereiche, 项目代号SFB），旨在开展复杂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最长资助年限12年，通常子项目数量众多。其中包括一类文化科学研究中心项目（Kulturwissenschaftliches Forschungskolleg, 项目代号SFB/FK）。第三，小组类项目，旨在组织优秀学者展开中期合作，包括研究小组项目（Forschungsgruppe, 项目代号FOR）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项目（Kolleg-Forschungsgruppe, 项目代号KFG）。数据库网址<https://gepris.dfg.de/gepris/OCTOPUS?task=showSearchExtended>，访问日期：2024年8月11日。

续表

	项目号	项目名称	时间
13	SFB 950	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手稿文化	2011—2020
14	SFB 980	运动中的知识论：从古代世界到现代早期的知识转移	2012—2024
15	SFB 1095	弱者话语与资源机制	2015—2019
16	SFB 1604	移民的生产	2024—
16	SFB 1665	性别多样性：社会文化、医学和生物学背景下性别多样性的决定因素、含义和影响	2024—
17	SFB/FK 435	知识文化与社会变革	1999—2008
18	FOR 529	启蒙运动在现代神秘主义中的介入	2004—2010
19	FOR 621	现代宗教的变革：20世纪下半叶的宗教与社会	2005—2015
20	FOR 955	文化全球化的参与者（1890—1940）	2008—2016
21	FOR 1120	1870—1930年的疯狂文化：城市现代性的门槛现象	2008—2016
22	FOR 1501	东非和南非大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复原、崩溃与重组	2010—2017
23	FOR 1986	政治秩序概念中的自然：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	2013—2022
24	FOR 2448	科学、医学、技术和社会中的证据实践	2017—
25	FOR 3031	正常与疯狂：差异侵蚀的当代史	2021—
26	FOR 3033	艺术中的技术层面（外观、秩序、叙事模式）	2020—
27	KFG 54	应用人文学科：谱系与政治	2024—

这些研究项目基本上是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合作项目。无论是从研究时段，还是从研究主题上看，都很难概括出有什么重点。有的项目致力于描述前现代知识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向动态性（比如SFB 980），有的项目聚焦现代社会科学、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比如SPP 1143）。无论是科学、医学和技术知识的项目，还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知识的项目，都可以从知识的生产、流动、应用和变迁中得到研究。萨拉辛曾言：“我们无法在历史之外的尺度上最终‘衡量’或‘评价’知识的真理主张。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只能历史地描述知识和真理主张的形式，即探索其谱系，分析其内部结构和功能，并最终重建其权力效应。”¹知识史的这种功

1 Philipp Sarasin, “Wie breit darf es denn sein? »Wissen« und kein Ende”, *Nach Feierabend: Zürcher Jahrbuch für Wissensgeschichte* 15 (2020), S.17–23, hier S.19.

能帮助其在众多合作项目中站稳了脚跟。

近十年来，出版商也开始争相推出知识史丛书（见表2）。他们有些是大型项目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从知识史的某个研究视角切入，将相关研究聚拢起来，以在学术界和图书市场上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

表2 德国出版社知识研究相关丛书代表

	丛书名称	出版社	时间
1	历史知识研究（Historische Wissensforschung）	Mohr Siebeck	2014—
2	知识论（Episteme, SFB 980项目成果）	Harrassowitz	2015—
3	科学文化（Wissenschaftskulturen）	Franz Steiner	2018—
4	知识文化与社会变革（Wissenskultu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De Gruyter	2019—
5	历史中的社会知识（Knowledge Societies in History）	Routledge	2019—

不过，跟所有新兴的史学潮流一样，赞誉总是伴生批评，繁荣也总是隐藏危机。最尖锐的指责或许要数对知识史的无所不包和漫无边际的警惕。研究者警告，知识史正在像“橡皮泥”一样任人揉搓。¹有时候，历史主体不认为是知识之物（比如助产士的技巧），研究者却愿意悉心对待；有时候，历史主体视为崇高知识形式的东西（比如占星术的预言），研究者却认为是迷信的无稽之谈。如果知识的认定与排序不但受到时代知识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认知主体主观性的制约，那么问题是不是就变成了达斯顿所言，“还有什么知识史不涉及的吗？”²有学者认为，知识的概念不应走文化概念的老路，像宣称“一切都是文化”那样宣称“一切都是知识”，那会令它处于危险境地。这种定义的模糊性和广泛性还导致了探究领域明显的不连贯。用知识来取代科学、学术或者思想这些限制性和排斥性过强的概念，当然开阔了学科视野；但是知识来源的多样性是如此无可比拟，以至于知识史的学者无法形成一个紧密的，既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互相审核的职业共同体。

1 Lorraine Dast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KNOW* 1 (2017), pp. 131–154, here p. 143.

2 Lorraine Daston, “Comment”, in: Marke Tamm und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London 2019, pp. 173–178, here p. 174.

另一股批评力量来自科学史。有部分科学史家认为，将科学知识理解为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并将其与其他思想、取向和行动的文化模式相提并论，并不一定符合科学界的自我形象。他们希望科学史在加强与历史本身关系的同时，不要与知识史纠葛太深。科学史向知识史的靠拢，尤其会令它丧失自己在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上的特色。事实上，尽管科学史的问题仍然在，将来也肯定会在不同的旗帜下，以不同的混合方式得到探讨，但从体制上来看，传统科学史在德国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汉堡和图宾根等地以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为方向的科学史教席，在原本的教席执掌者退休后，就被取消了。当然有一些新设立的教席或者研究岗弥补了这一损失，但这些新设立的职位尤其是研究岗并不是永久性的，它们往往依附于德国科学基金会的大型研究项目或者德国大学的“卓越计划”而存在，在专项资金停止拨付后很快就会消失。柏林马普科学史所的存在，一方面当然是学科稳定性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它的高薪博士后职位令其他大学的岗位缺乏吸引力¹，它与知识史的紧密联系也被认为模糊了学科原本的轮廓。

有些历史学家对知识史的批评甚至更为激进，也充满矛盾。有些学者认为知识史解构太过。知识史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自己的主叙事，而是致力于解构现有的叙事模式。它对所有进步叙事的批判，导致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不可能区分影响较大和影响较小的知识体系，不可能区分较重要和较不重要的知识行为者，也不可能询问人们知道或者“究竟”值得知道什么？他们更进一步认为，知识史放弃整个现代叙事——包括人类社会尤其是自17世纪以来在理解和操纵自然、文本和我们的身体方面所取得的真正进步——“既没有必要，也不合情理，在事实上也站不住脚”²。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知识史批判不够。他们认为知识史是“新自由主义的人文科学小艇”，它的广泛性让它缺乏“批判的矫正力”。³关于许多大型知识研究项

1 据说哥廷根大学的科学史教席多年无人问津，很大原因是候选人认为在此无法获得可以与柏林相媲美的研究资源。

2 Suzanne Marchand, “How Much Knowledge is Worth Knowing? A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s Thoughts on the Geschichte des Wissens”,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42 (2019), 2/3, S. 126–149.

3 Caspar Hirschi, “Wissensgeschichte: das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Beiboot des Neoliberalismus”, *Nach Feierabend: Zürcher Jahrbuch für Wissensgeschichte* 15 (2020), S. 25–34.

目的涌现，历史学家们也并非都秉持着积极态度。有学者认为，对历史学而言，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教席集中到一个研究架构中，由此所产生的内部损耗似乎要大于外部产出。“这些油轮中的许多正在前方推起大浪，但因此仍然很少发现真正的新知识空间的海湾和通道。”¹

无论如何，知识史在德国的发展、繁荣和争议，再一次证明了，知识不太可能在内容或形式上被清晰地限定。事实上，知识史最初的吸引力之一，尤其是对于厌倦了毫无结果的“内外之争”的科学史学者来说，就是在知识与其背景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动态性非常适合历史主义和全球方法。在很多时候，历史学家是最实用主义的人。他们并不特别在意一本书是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科学史还是知识史，只要作者的方法和逻辑符合其论证目标即可。德国的知识史研究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比如关于跨国界知识流通和超越“西方”视野的讨论仍然较为边缘。但在让历史学家们相信知识史有助于他们以新的、更有趣的、更敏锐的方式看待过去这一点上，德国的研究卓有成效。

（范丁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 Wolfgang Kaschuba, “Vorbemerkun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34 (2008), H. 4, S. 419–424, hier S. 424.

近现代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与欧洲观念^{*}

| 信美利 |

摘 要：在19世纪复兴运动之前，“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大利民族意识以及“意大利人”均系人为建构的结果。作为古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世界的中心，意大利在相当长久的历史时期里作为西方整体之中的部分而存在，形成了其对于欧洲的独特观念，这种观念里包含对罗马帝国辉煌过去的怀念，对自身“先进”文明和灿烂文化的自信，也有对四分五裂、外来侵扰的厌倦。但这种观念却并没有加速意大利民族意识的形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国家进程。从但丁、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到马志尼、加富尔、德·加斯佩里，意大利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试图在“帝国”或者“欧洲”整体的框架之下，建构意大利民族和“意大利人”，借助欧洲的力量实现本民族的复苏。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和欧洲观念在历史上既相互依存、难以分割，又彼此博弈、抵消，从而在现实中呈现出和谐又矛盾的特点。

关键词：意大利 欧洲 民族意识 帝国

“意大利”作为一种民族意识，是由一些文化人士建构起来的，建构的过程中一直交织着他们关于“欧洲”的观念。正如意大利杰出的历史学家夏波德（Federico Chabod）所说，“贯穿整个现代史的重大命题，是涉及同整体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公认的欧洲文明同一性和局部关系问题，也就是同任何个人所属的祖国的关系问题。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意大利统一之后的民族国家与治理体系建构研究（1870—1914）”（项目批准号：20CSS030）阶段性成果。

这里还产生了关于和平的两种对立倾向：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成立的‘联盟’、‘协会’、欧罗巴共和国；另一方面是民族教条主义，只强调本国的作用，渴望自己祖国的强大”¹。同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罗伊·威利斯出版的专著《意大利选择欧洲》中也提到，“长久以来，意大利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曾经在统一欧洲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努力，即建立罗马帝国和天主教；对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但丁到马志尼——所阐明的统一欧洲的宏伟方案，他们是一向感到自豪的。即连那些要将意大利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人，从马基雅维利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代表人物，也只是把意大利视为更广阔的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已”²。而对于现代意大利人，“欧洲作为一种思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³。这也基本成为一种共识。从思想上或者说观念上，“意大利”如何与“欧洲”实现逻辑自洽这一问题，有必要深入分析，由此才能理解为何意大利民族国家发展滞后，为何“二战”以来意大利对欧洲统一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在实践中，意大利却无法主导欧洲联合，并在坚定支持欧盟和质疑欧盟之间摇摆不定。

一、帝国记忆与作为地理概念的“意大利”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心位置，不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从古代开始便处在与东西各方势力的广泛联系之中。有现代意大利考古学者认为，意大利在“失落的文明”时代的代表之一，埃特鲁里亚就是希腊文化的一个行省。⁴观点虽还存在争议，但埃特鲁里亚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迦太基人彼此间既是威胁、敌

1 Federico Chabod, *Storia dell'idea d'Europa*, Bari: Laterza, 1964, p. 126. 转引自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陈宝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6—27页。

2 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页。

3 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第1页；关于“欧洲”思想的溯源可参见 Arturo Colombo, “Europa: La lunga marcia di un'idea”, *Il Politico*, Vol. 51, No. 2 (1986), pp. 169–180; Carlo Curcio, *Europa. Storia di un'idea*, Firenze: Vallecchi, 1958, p. 5.

4 参见 Bruno d'Agostino, Luca Cerchiai, *Il Mare, La Morte, L'Amore. Gli Etruschi, i Greci e l'immagine*, Roma: Fondazione Paestum, Donzelli Editore, 1999.

人和异族，却也彼此影响，难分难解，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起源上说，古意大利人又与东方存在难以分割的联系，人类学研究通过提取现代托斯卡纳人，即埃特鲁里亚文明核心区域的居民DNA样本，与其他西欧人群以及近东群体的样本进行对比，结果证明其与前者相异而与后者存在相似性。¹ 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说，特洛伊人埃涅阿斯先到达西西里，而后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意大利，他的后裔成为罗马国家的一系列缔造者。² 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现代科学鉴定，其背后的逻辑都在证明，意大利从人种到文明，自源头而论，无不处在相对复杂、多元文明的碰撞交融之中。这种特点深刻影响着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进程。

意大利人关于欧洲统一的梦想，主要源自对“帝国”的记忆。这种记忆并没有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的缺陷部分被逐渐忽略，人们自觉地选择最优越的、最荣耀的部分，构成对理想状态的向往，或者以此建构起人类群体的理想组织模式。然而，将这种“帝国”的记忆简单地理解为“大一统”却并不合适。

就罗马帝国而言，最初，它首先作为意大利半岛的主人，其实是一个由联盟的族群和并入的族群所组成的大联盟。³ 而意大利与各行省地位平等，“整个帝国组成了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领导之下的具有行政自主特征的城市网络”⁴。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经济繁荣达到极点，各城市处于黄金时代，帝国在各行省进行行政建设，维持和平与秩序，意大利人在各行省流动谋生。商业和国际贸易在意大利经济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意大利原本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开始改变，受高额利润引导，生产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出口市场和奢侈品，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也对外省大量出口。“帝国境内喝的葡萄酒，有三分之二来自意大利。”在治理方面，“罗马帝国的活力就依靠着它的自治市制度”。⁵ 罗马的自治市制度由罗马征服之前的意大利自治市

1 露西·希普利：《鸵鸟蛋、黑陶与铜肝：神秘的伊特鲁里亚人》，戚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5页。

2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6—18页。

3 赫德、韦利编：《意大利简史》，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4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沈珩、祝本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41页。

5 赫德、韦利编：《意大利简史》，第117、119页。

制度发展而来，其习俗是通过条约和特许状承认被他们征服的地方自治团体（公民团、自治市），同样，这种地方自治制度也适用于罗马人的殖民团。¹自治市保留自己的传统官吏、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甚至保留地方法律和对相当大的领土范围的治理权，西方的海外行省也遵循此制度。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山河破碎”，丧失不列颠、非洲、西班牙、高卢，巴尔干半岛让与东罗马帝国，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像罗马共和国后期一样又重新变成同一名词。同化并不意味着罗马人被意大利人吸收，而是意大利人仍然是罗马人，即帝国或者“共和国”的属民。“帝国的理想不仅仍旧存在，而且还存在着法律概念：不仅对于罗马人，而且对于蛮族人来说，意大利仍是帝国的一部分。”²1000年左右，伦巴第人与罗马人相互同化，称为“意大利人”。意大利语中的“城市国家”（Comune）原意为“共同利益”。约在11世纪末，城市国家与主教、贵族等封建权势发生直接冲突，城市国家要求确立自己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权威，但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独立自主，而是承认皇帝在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或者皇帝授权的意大利国王的统治权。按萨尔瓦托雷利的判断，“城市国家是一个在各方承认的权力和规定的严格约束下将不同社会成分组合在一起的统一体；而先前各社会成分按各自的章程办事，制定各自的法律，实施各自的司法权”³。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⁴但丁的思想是对这种“帝国理想”笼罩下的复杂统一性的集中表达。1310年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南下意大利加冕，声称要伸张正义，消除各城市、各党派的争端，使一切流亡者返回故乡，重新建立帝国和教会之间的良好关系，实现持久和平。但丁得知消息后，对亨利七世寄予很大希望，撰写致意大利诸侯和人民书，号召对皇帝表示爱戴和欢迎，可能还亲自前往意大利北部谒见皇帝，向他致敬。然而，佛罗伦萨联合归尔甫派诸侯和城市，武装反抗皇帝。为此，1311年3月31日，但丁在卡森提

1 罗马人对拉丁人以及其他意大利被征服的民族，以服兵役为条件，授予全部或部分公民权。被征服的一些战略要地，由仍保留罗马正式公民身份的罗马农民（拉丁语Coloni，原意自耕农民）组成的屯垦团和享有“拉丁权利”的殖民团驻守。许多著名的意大利城市都起源于“殖民团”。

2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第48页。

3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第127页。

4 《致意大利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0页。

诺地区写下《致穷凶极恶的佛罗伦萨人的信》，愤怒声讨，又于4月16日上书皇帝，敦促其从速进军讨伐。但亨利七世并未向佛罗伦萨进军，于1312年前往罗马加冕。那不勒斯国王预先占据梵蒂冈，阻止皇帝在圣彼得教堂加冕，迫使加冕礼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举行。教皇克莱门五世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压力下，唆使各地归尔甫派起来反对皇帝，警告亨利七世不得进攻那不勒斯王国。于是，亨利七世离开罗马后挥兵北上包围佛罗伦萨。但丁出于对故乡的感情没有直接参与，却始终在精神上热情支持亨利的事业，并于1310—1312年用拉丁文撰写《论世界帝国》（又译《帝制论》），从理论上捍卫皇帝的权力。亨利七世围困佛罗伦萨失败后，准备南征那不勒斯，却于1313年8月病死途中。但丁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化为泡影，但他仍然坚信一定会有拨乱反正的人出现。¹

《论世界帝国》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阐述了但丁的政治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色彩。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论证帝国的必要性，指出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而只有在皇帝的统治下，正义、和平与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这种目的才能实现。第二卷论证建立帝国的天定权利属于罗马人。第三卷指出，万物之中，只有人既具有可毁灭的部分，即肉体；又具有不灭的部分，即灵魂。因此，人生有两种目的：一是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二是来世享受天国永恒的幸福。上天规定由两个权威来分别引导人类达到这两种不同的目的：皇帝根据哲学的道理，引导人走上现世幸福的道路；而教皇根据启示的真理，引导人走上来世天国永恒幸福之路。两个权威都直接受命于天，彼此独立存在。

但丁理想帝国的直接出发点是对意大利的政治关怀。但丁哀叹“意大利是奴隶”，是“苦难的旅舍”，是“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船”，“不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一个妓院！”“意大利各个城市都充满了暴君”，意大利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的圈子里，人们都自相残杀”，“看一看沿海，再看一看内地，哪有一处享受和平”。他严厉谴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和阿尔伯特一世父子只顾在德国扩充势力，却不来意大利行使皇帝的权力，“听任帝国的花园（指意大利）荒芜”²。

1 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2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2—13页。

但丁将神圣罗马帝国当作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极大地寄希望于神圣罗马帝国承担起统一全世界的历史使命，尽管在现实政治中，这一希望的实现显得极为渺茫。由于罗马帝国是埃涅阿斯带领特洛伊人在意大利所建，但丁又将特洛伊看作罗马的前身。特洛伊—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但丁心目中世界帝国的谱系，即尘世政治中神圣之城的历史。在罗马帝国前世今生的这一谱系中，但丁对埃涅阿斯、恺撒、查理大帝、腓特烈二世、亨利七世等帝王有着尤其崇高的敬意。他之所以选中维吉尔，作为带领旅人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导师，除去对维吉尔诗歌成就的推崇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写的是埃涅阿斯的故事和罗马帝国的兴起。¹

但丁更是在他的《神曲》中，以罗马来比喻上帝之城。在炼狱山顶的伊甸园中，贝雅特丽齐对旅人但丁说：“你将在这里短时做森林中的人，然后你将同我一起永久做基督是罗马人的那个罗马的公民。”²但丁还特意模仿罗马帝国的架构，将天堂描写成一座城。上帝主宰整个宇宙的运行方式，也是上帝对他的帝国的统御方式。他的笔下，天国呈巨大玫瑰形状，玫瑰的结构非常类似古罗马的圆形剧场，而所有进入天堂的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在上帝直接统治的地方，自然法则毫无作用。贝雅特丽齐把当时正保持沉默而愿说话的我拉到那朵永恒的玫瑰的黄色中心，这朵玫瑰逐渐扩大而且向那造成永久的春天的太阳散发着赞美的芳香。”³罗马帝国是模仿上帝，来完成统一世界、建立永久和平的任务的。

但丁期望罗马统一全世界，因而世上众多正义的君主，最终都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鹰旗是罗马帝国的旗帜，“鹰”的形象也代表着罗马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从埃涅阿斯到君士坦丁，再到查士丁尼，一脉相承：“自从君士坦丁把当初跟随那位娶拉维尼亚的古人（指埃涅阿斯），顺诸天运行的路线飞来的鹰，逆它来时的路线带回去后，二百余年来，这只上帝的鸟一直停留在欧罗巴的边境，邻近它当初的出发点所在的群山；它在那里代代相传，统治着在其神翼荫底下的世界，经过这样改

1 吴飞：《但丁政治哲学中的四座城》，《清华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231—232页。

2 但丁：《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三十二章，第594页。

3 但丁：《神曲：天国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三十章，第806页。

朝换代，落到我（指查士丁尼）的手中。”¹

在地狱各层列举各种受罚者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但丁并不只是考虑其人是否犯罪，而是首先要看他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在但丁决定将某人放进地狱还是天堂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基督教信仰这个基本标准外，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应当是一个重要标准。在这两大标准组成的基本框架之中，再呈现出人性的种种样态。²

现代学者认为，但丁的这种思想中带有浓厚的种族决定论意味。³家族血统的纯正与代际之间的变迁，是《神曲》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这一点，构成了但丁思想中潜在的，但又挥之不去的一个张力。一方面，但丁根深蒂固地认为，特洛伊-罗马人是高贵的民族，所以只有他们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上帝选定他们来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佛罗伦萨堕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其中的罗马贵族血统遭到了混杂；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血统是不可靠的，为家族出身而骄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虚荣。从另一种角度看，但丁的“世界观”里有宇宙宏观，也有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族这种具体微观。他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故乡，正如大海之于鱼一样”（*Nos autem, cui mundus est patria velut piscibus equor*）⁴。同时，他的“世界”看似囊括广袤的区域，但实际上他的关注点更多仍放在意大利，不过意大利在他看来并非独立存在，而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

与但丁一样，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是在佛罗伦萨、意大利、帝国和教会几个概念里徘徊纠结，试图找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答案。不一样的是，到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时期，“意大利”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至少在思想观念上，他们期望“意大利”能够结束分裂，虽然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那种统一。

首先，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历来的思想史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强调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之间的区别，比如圭恰迪尼一再拒斥以罗马为范例，绝不同意马基雅维利所坚称的罗马提供了一个万世不易的典范，或是人民群众能被委以决定政

1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六章，第660页。

2 吴飞：《但丁政治哲学中的四座城》，第236—238页。

3 吴飞：《但丁政治哲学中的四座城》，第249—252页。

4 罗伯托·安东内利：《但丁、彼特拉克与欧洲知识分子的起源》，成沫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治的重任。他自己的见解，就是赞同一个由有能力、称职，而且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少数人来统治的政府，赞同那种15世纪已然流行于佛罗伦萨的由精英主导的共和主义，反对他同时代那种扩大参议会，从而赋予无知无能者以政治权力的做法。¹另外，对马基雅维利之情有独钟于仁慈君主，圭恰迪尼也不敢苟同，他宁愿见到善存在于包纳了正义与良制的政治系统当中。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同时代的两位思想家，他们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命题，在一些方面他们会得出相似的结论，如两人都同意：教会不但腐败，而且要为意大利的毁灭与分裂负很大责任。²

其次，他们都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将“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而不仅仅关注一城一事。圭恰迪尼详尽地撰写了1494至1532年间的意大利历史。与以往以单个城市或国家为对象的史书不同³，这部书把意大利视为一个整体来给其修史。⁴他还说：“在我死前，我想看见三件事情：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共和国；意大利从此免于受到一切野蛮人的袭击；世界在这帮无赖教士的暴政之下，得以解救。”⁵就他所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或者“祖国”毫无疑问是指佛罗伦萨，但“意大利”也是他们赖以存在的整体，这个整体受到教会“暴政”压迫，而这种压迫不只针对佛罗伦萨，而是针对整个“意大利”。

与好友圭恰迪尼一样，马基雅维利也期望“意大利”得到拯救。他将“意大利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他积极呼吁，为了运用“意大利的能力”（la virtù italica）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由杰出的君主或首领团结起来。他借用彼特拉克的诗句，“因为古人的勇气，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⁶。

1 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1521—1522）中，他重谈什么样的政府最适合佛罗伦萨，结果是基本上倾向于建立一个像威尼斯政府那样的体制。

2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王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

3 圭恰迪尼也于1509年写了一本《佛罗伦萨史》，涵盖了1378—1509年间史事。

4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第13页。

5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格言集》，第52页。

6 彼特拉克和但丁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所有儿女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十章。诗句来自彼特拉克的诗篇《我的意大利》（*Italia mia*, 93—96），参见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104—106页。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继承了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确切说是对古罗马文明的怀念，而“意大利”在他看来显然也是古罗马的直接继承人，古罗马是“意大利”作为整体的依据，同时与当时统治意大利的教会形成对比参照：一个可以使意大利恢复古代精神和荣耀，而另一个则完全是意大利堕落衰败的根源。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毫不避讳地指出，

罗马教廷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使这个地区四分五裂。……¹

虽然罗马教会位于那里，并把持着世俗的权力，但它既不是那么强大，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以至于能够独揽意大利的一切权力并使自己成为统治者；而另一方面，它也不是那么弱小，以至于在它担心失去自己对世俗事物的统治权时不能召集一个强有力的人来保护它，对付那个在意大利已经变得过分强大的人。……

是教会导致意大利不能团结在一个首领之下，而由多个君王和领主来统治，这些人又产生如此大的不和与羸弱，以致意大利已经沦为不仅是外邦列强的猎物，而且也是它的任何一个侵袭者的猎物。²

然而，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忽略了一点，即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千余年里，正是教会构成了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统一性”。城市国家之间战争虽频繁不断，但算不上激烈和残酷。战争有时候持续数年，但多为小规模入侵，伤亡少俘虏多，俘虏可能很快被赎回。实际上，城市内部的斗争要激烈得多。城市各派都据守石建堡垒和塔楼内，这样的城市结构避免了大量杀戮。结果往往是，一派被逐出或者逃出城，却受到邻近古堡或城市的接待，在得到宽恕后又返回城内。从不和到和解，和解后又酝酿新的不和，然后又和解。自然，“要求和解与和平总是在人们思想中占首先地位。就是在对手之间也谈不上深刻的思想分裂”，各城各派的争斗只是为一些具体、狭隘的物质利益，却不是思想或信仰的矛盾，后者才是“精神

1 《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86页。

2 《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86页。

顽症”。所以，总结起来，意大利城市国家各有内部政治生活，彼此之间相互争斗，但是存在血缘、语言、文化、家庭生活、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统一性。¹

二、意大利民族意识与民主的“欧洲”

有意大利社会学家认为，2022年上台的梅洛尼政府呼唤“上帝、祖国和家庭”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这种提法在人们看来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传统主义的时代。这与最近几十年来意大利及其之外的地方流行的一些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即与在促进政治辩论以及唤醒公众意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那些价值观截然不同。然而，“上帝、祖国和家庭”的源头并非保守主义，而是与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思想有关。这三个词在20世纪20年代曾被法西斯重新启用，目的是体现对民族复兴运动的延续，但实践上却掏空了其内核，以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极端民族主义取而代之。²

19世纪最初十年，整个意大利大陆地区处在拿破仑·波拿巴占领之下：北部和中部在拿破仑亲自治理下；皮埃蒙特固守在英国舰队保护下的撒丁岛；那不勒斯王国偏安西西里岛，攀附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以及妹夫约阿里姆·缪拉的治理。“尽管是处于拿破仑的桎梏之下，但意大利相对来说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靠共同的法制和统一的行政管理来维系的），这有助于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长。”³

那不勒斯王国在该时期最重要的改革，是所谓废除封建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司法，各种形式的劳役和人身义务被取消（1806年8月2日法令）。同年颁布了关于分割村社与封建土地占有者即贵族大地产（封建的、教会的以及村社的土地）法令。然而这“只是在法律范畴内消灭了封建制度，贵族土地占有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却被保留下来了”⁴。大多数情况下，地税过于沉重，农民无力耕种所得土地，

1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第160页。

2 孙彦红主编：《意大利发展报告（2022～20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98—99页。

3 科瓦里斯卡娅：《意大利烧炭党》，辛益译，《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08—109页。

4 科瓦里斯卡娅：《意大利烧炭党》，第108—109页。

也缺乏进行独立经营的生产资料。出售的土地中仅有7%—8%转到农民手中。但农业资产阶级的确因1806年的土地改革而受益，60%以上出售的土地都集中到他们手中。

该时期的其他一些改革（司法、财政和行政），也促进了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者的代表人物被吸收进入国家机关，充任行政、司法和军事官员。但依附于拿破仑的那不勒斯王国，包括其他意大利国家都深切感受到了负担：必须供养法国军队，与法国的无惠贸易，大陆封锁，拿破仑进行的无休止战争所需军费。且资产阶级开展独立的政治活动与积极参与决定国家大计的愿望也破灭了。

1807年，为反抗法国统治，意大利南部山区出现第一批烧炭党“温塔”（意为支部）。名称源于这里的居民多为烧炭工人，他们将焙烧好的炭卖给小店铺“温塔”。其组织者为1806年从流亡中返回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党人。他们崇尚自由平等学说。那不勒斯和卡拉布里亚的“温塔”学徒们都接受了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地球上最初的人们是真正幸福的人，他们彼此帮助，实施善行，过着朴素的生活，而不需奢华，彼此之间亦不嫉妒，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大地表明一切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出现在大地上，也都要回到大地之中。……大地是存在着自由与平等的地方以及第一批烧炭党人生活的地方。”¹

而宗教精神贯穿着烧炭党人的礼仪。在他们看来，耶稣基督是第一位烧炭党人，也是烧炭党的庇护者。烧炭党人的活动极为隐秘，参加者须宣誓保守秘密。各支部之间一切联系都通过预先规定的标志、暗语和密码，在精心伪装下进行。其旗帜的三种颜色蓝色、红色和黑色，分别象征希望、美德和信仰。誓词中提到了必须通过斗争消灭暴君和专制者。

十字架应当用以钉死暴君……荆冠应当用以刺伤暴君的头颅；长矛应当用以挑破暴君的胸膛，让他血管中流动着的肮脏的血液流出来……斧头应当用以砍掉暴君的脑袋……火应当用来烧掉暴君的身躯；而铁铲应当用来把他们的尸灰顺风扬尽。²

1 赵克毅、辛益：《意大利统一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2 赵克毅、辛益：《意大利统一史》，第88页。

烧炭党的政治纲领是改革现存的专制国家，争取立宪；最重要的是争取民族独立。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密谋或者类似军事政变的迅速的革命形式。1813—1814年，卡拉布里亚等地发生烧炭党人的大规模起义，但很快遭到镇压。随着拿破仑统治的崩溃，烧炭党的影响拓展至意大利中部和北部。1814年4月，米兰爆发反抗法国占领者的起义，赶走了法国人，但奥地利人趁机占领米兰，将波河以北的土地并入奥地利。

烧炭党中对意大利历史影响最深远者是马志尼。他出生于热那亚，生活在一个带有詹森教派思想烙印的家庭环境中。¹他曾就读于法律系，1827年毕业。之后开始为《热那亚指南》《里窝那指南》等刊物撰写文章。1830年11月，被皮埃蒙特警察当局逮捕，关入萨窝那城堡，后被判处流放。他于1831年5月致信萨沃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1798—1849），劝说他保护“人民的权利”，并担当“民族”领袖。他认为，所有人民都应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权利，给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呼声将促使“民族”奋起。另一场法国革命已经开始，1831年革命必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演1789年革命的所有阶段。在意大利各个街区，革命也将是人民的和民族的。²

在流亡马赛时，马志尼创建“青年意大利”（La Giovane Italia），并创办《青年意大利报》，于1832年3月开始出版发行。他接受了同样流亡法国的意大利人卡尔洛·比安科关于通过游击队的方式进行民族起义的思想。在《给青年意大利党党员的总指令》中，马志尼写道：“游击小组起义战争是所有争取从外国征服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民族的战争。它能弥补起义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正规部队不足的情况；能够动员大量的人员参加斗争，而又使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尽可能的少；这种战争方式可以使整个人民在军事上得到训练；可以迫使敌人面对一种不寻常的战争；可以避免某一次失败带来的后果，避免战争中背叛事件的发生。”³

马志尼的计划中，尽管仍有秘密社团的共有特点，比如起义第一阶段是密谋策

1 P. A. Colletti, *Giuseppe Mazzini. L'uomo-L'opera*, Genova: A. Fassicomo, 1905, pp. 5–11.

2 Giuseppe Mazzini, *Prose politiche precedute da una prefazione*, Firenze: Poligrafia Italiana, 1848, pp. 13–36.

3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黄华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7页。

划的阶段，为起义行动制定方针；他却明确说，这种起义最终都要落实革命的阶段，即首先要宣布成立一个建立在整个民族地域之上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并召开立宪大会。而无论是起义，还是革命，人民都是主角。人民是“革命的第一要素”，“革命应该由人民进行并且为着人民的利益”，“不能由某一个单一的社会阶级所垄断”。“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整个政治大厦都应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人民是包容一切的伟大统一体，它拥有一切权利与力量，包容着一切意志。”¹此外，马志尼还将“上帝与人民”“自由与民主”这些具有感召力的口号加入“青年意大利”的指导思想中。

与烧炭党相比，马志尼确立的政治纲领更为鲜明：“作为民族变革发起者的任何个人与社团，都必须清楚他所引起的变革要向何处去。”²他认同意大利经济学家、哲学家麦尔基奥雷·焦亚（Melchiorre Gioia）在论文《何种政府适合于意大利》中的观点，即建立新制度最适合的政府形式是共和制。意大利的民族共和思想体系需要政治结构来支撑，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和党，虽然该政党暂时不得不由一个设立在境外的委员会来领导，但它必须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建立起自己的组织。³马志尼阐述“青年意大利”的组织纲领时说：

“青年意大利”是相信进步和义务的法则的意大利人的兄弟会，他们相信意大利会被称作一个国家，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这个国家……相信力量的秘诀在于团结，在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团结一致将其思想和行动奉献于将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国家，一个独立的、主权的国家的这一伟大信念之中。……

“青年意大利”是共和国的，统一的。之所以是共和国的，因为全民族的所有的人按照上帝和人类的法则都是自由的、平等的，都是兄弟。只有共和国体制才能保证这一未来；之所以是统一的，是因为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被联合

1 Riccardo Wichterich, *Giuseppe Mazzini. Il profeta della nuova Italia*, Monza: Garzanti, 1944, pp. 49, 114.

2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第298页。

3 P. A. Colletti, *Giuseppe Mazzini. L'uomo-L'opera*, pp. 46-49.

一致的嫉妒成性的列强所包围的意大利，首先需要的是力量。……

国家是在一个公约中亲如兄弟的，在共同法律之下生活的意大利人的总体。¹

20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史家马斯泰洛内认为，马志尼具有一种民主的“民族”观，与民族主义相区别，“马志尼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他是民主主义者”。马志尼在1832年写道：“民族是操着同样语言，具有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力量和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的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的公民整体。”²这种民族性使人变成人民，“民族”一词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一词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限度，这一限度便是其他民族的自由。他的一生一直在捍卫民族事业，努力支持欧洲不同民族性的确立。他反对那种主张霸权和种族优越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充满忌妒心理的、仇视他人的”。他同样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某个国家自身能量的扩张，这种国家除了自己力量的权限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限度。各国人民不应该违反道德法则，而应当为全人类的进步使命而联合起来。基于此，他反对1815年在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制度，并在尊重民族特性的前提下为改变欧洲版图而斗争。他以预言家的眼光注意到，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必将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欧洲合众国将在欧洲人民的合作中宣告诞生。

马志尼捍卫结社主义运动，认为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努力履行义务。他谈到各种各样的结社组织，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的和慈善救济性的，文化的和生产的，地方的和全国的，意大利的和欧洲的。1843年9月31日《人民使徒报》上，马志尼写道：“我们是统一论者，但同时也承认，意大利半岛的所有地区在关系到地方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有权进行自由选举。”³他要捍卫“一个民族中的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

在我们看来，工人一词没有任何通常与该词相关联的那种阶级的含义，它

1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第430页。

2 马斯泰洛内：《马志尼的政治思想》，黄华光译，《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第58—63页。

3 马斯泰洛内：《马志尼的政治思想》，第58—63页。

在社会等级次序中既不代表低贱，也不代表高贵，它所表示的是一种特别的就业范围，一种专有的劳动，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实践，一种社会中的特定功能，而不是别的什么。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将以我们劳动所得的工资为生，不论我们在哪里从事工作。然而，这是未来的前景，现实状况则不同。如同在各地一样，在意大利也存在着两个等级，其中一个等级独自占有着一切劳动要素，包括土地信贷或资本，而另一个等级则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第一等级的人们是为了保障和完善自己生活的安逸舒适及表面的冠冕堂皇而战，而第二等级的人们则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搏斗。¹

可见，马志尼受到法国革命思想和实践的启发，同时也根据意大利的现实情况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他所说的社会革命，旨在将人民团结为一个统一整体，民族由全体公民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一律平等，或者说人民整体的追求就是这种平等。在马志尼看来，一个民族如此，所有民族亦如此，所以，欧洲各民族和人民同此理。

19世纪30年代初，马志尼曾试图组织流亡者发起一次远征，由此促成萨沃亚地区的起义，随后开展各自为战的游击战争。他希望意大利的起义能燃起星星之火，激发外国尤其是波兰等国的起义，进而催生全欧洲的起义。这种远征虽然失败，但意大利的民主派与波兰民主派的合作，促进了全欧洲性的组织“青年欧洲”的诞生。1831年在《给青年意大利党党员的总指令》中，马志尼提出，统一的、共和制的自由政体方案不仅要在意大利，还要在全欧洲实行，而且“欧洲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导欧洲各个社会组成若干个范围广大的统一体”。²

1834年4月15日，马志尼在远征萨沃亚失败之后在瑞士创建了一个新的协会“青年欧洲”。其公约是由代表“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这三个协会的17名年轻革命家签署的。12个月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青年瑞士”和“青年奥地

1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第300—301页。

2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利”。这些年轻人的志向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组建一个民族联合的欧洲。他们认为，民族问题可以通过废止1815年《维也纳条约》和改变欧洲地图来解决。

“青年欧洲”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事实，因为它是“旨在于创建一个全欧洲有效民主组织的第一个系统尝试”。烧炭党曾扩展到许多国家，但是它的各个分支机构是相互隔绝的，邦纳罗蒂试图创建一个国际烧炭党，但是失败了。而这一次，波兰、德国、瑞士、法国的流亡者们参加了对萨沃亚的远征：这种合作转变成了对“青年意大利”政治原则的一种认同。在他看来，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将为全欧洲建成一个联邦式联盟奠定基础。¹而“青年欧洲”是欧洲第一个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管理的独立民族联盟设想之上的组织。²

马志尼与“青年波兰”协会罗达·波尔博卡的合作，从1834年一直延续到1837年莱勒维尔及其朋友创建“波兰移民联盟”为止。在“波兰民主社”的纲领宣言中，马志尼的思想，如民族的使命、人民联盟等，又得到恢复，平等、友爱等马志尼的提法又被重新启用。“青年德意志”也接受了马志尼的思想，而且该协会按照“青年意大利”的模式被视为旨在于准备起义行动的密谋工具。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瓦托雷利认为，“青年欧洲”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行动，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象征，有多少个国家的革命者参加，就建立多少个支部。³

1840年，欧洲开始一场关于民主的大辩论，马志尼发表了6篇题为《关于欧洲民主的思考》的文章，阐述具有民主含义的共和方案：

当代的民主趋向，期望参与政治生活和铲除少数人特权的广大民众的日益蓬勃壮大的运动，现今都已不再是笔者的空想，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不容否定的事实。这是一个全欧洲的事实，是各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

我们反对一切不平等。民主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由所有人自愿赞同、由所有人操作运转的政府。我们不希望由别人来指挥，但我们希望把职务委托

1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

2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第83页。

3 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第432页。

给我们中间最博学多识、最有能力的人。显然，劳动产品分配中的绝对平等制度是不公正的，在实际中也是行不通的。这种绝对平等制会使人们的才智、能力、积极性和牺牲精神完全失去其价值，会使劳动的意义和质量失去价值。¹

“民主原则与代议制政体的结合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事实”，他提出建立由进步主义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代议制共和国，反对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础”的美国式政治共和制，同时也反对诉诸恐怖行动、具有“独裁倾向”的法国雅各宾式的共和制。他认为，民主是由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们自由组成的，为了反对特权、争取公民进步而努力的政府。代议共和民主制支持“劳动与知识和资本的结合”，反对某一个民族的特权，因为政治的目的是以人类的名义建设一个人类的共同体。

1852年，马志尼再就民族性与欧洲关系进行阐述。在他看来，欧洲的危机就在于欧洲失去了统一的信仰、使命及目标。而这种统一性在当时的世界却是必不可少的。针对危机，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冷静而仔细地审视和分析构成新的统一的可能要素。“那些坚持通过暴力或耶稣会式的妥协方式，从外部固守着旧的统一，只会使危机一直持续下去，滋生更多的暴力。”²欧洲面临的两大问题，即社会的和民族的问题，第一个是影响社会关系、财富的来源及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劳动和资本、生产和消费、工人和雇主之间的问题，在彼此间建立更好的关系。第二个关于民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重组欧洲的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它是每个民族的内部问题，可以由单个的民族部分地解决。而第二个问题要解决，则需要将欧洲组织起来，不是以两百年前那种战争条约的组织形式，民族也不是王权贵族和皇室家族理解的那种非友即敌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因实力优势，或地理优势，足以伤害我们的民族，都是我们的天敌；无论是实力还是地理位置都不能伤害我们的民族，就是我们天然的盟友”³，这种观念充满暴力和危险。

1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第301页。

2 “Giuseppe Mazzini: On Nationality, 1852”, pp. 1-2. 参见 <https://webs.wofford.edu/racinepn/Mazzini.pdf>, 访问日期：2023年9月20日。

3 “Giuseppe Mazzini: On Nationality, 1852”, pp. 1-2. 参见 <https://webs.wofford.edu/racinepn/Mazzini.pdf>, 访问日期：2023年9月20日。

马志尼认为，通过共同努力和行动建立起来的是民族间的同情和民族联盟。在欧洲，不同民族因地理位置、传统和语言不同而具有个性化特征，但这种特征类似于工厂中不同的劳动分工，他们只是因为要在欧洲文明事业中发挥其特殊作用才有区分。“欧洲版图必须重建，这是当前运动的关键”¹，正如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获得行动工具，在建筑开工之前，土地必须是自己的一样，只有欧洲实现重组，各民族可以自由地审视和表达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可以通过一个能够取代当下凌驾于所有之上的专制联盟的联盟来确保其成就，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主张各民族之间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结成联盟的理论家，马志尼也为各民族的独立奋斗了一生。但他不同于20世纪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他的“民族”是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不能压迫另一个民族，因为民族的宗旨是为了整个人类。他反对种族霸权和种族优越性这种民族主义论调；他赞成民族独立，但反对对其他民族抱有嫉妒和仇恨心理。他的民族独立建立在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础上。他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某个国家自身能量的扩张，这种扩张在该国力量达到极限之前不会停止，会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可悲竞争之中”。他憎恶那些“覬覦篡夺垄断地位、只是利用他人的软弱和贫困来夸饰自己的力量和自身的伟大的民族”。²

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并没有按照马志尼的设想，在民族民主共和框架内实现。马志尼事业的直接成果甚微，但作为思想却对意大利有重要的影响，唤起民族意识，在欧洲舆论界宣传意大利问题。此外，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连加富尔最初都不相信装备简陋的千人远征团能成功登陆西西里，促成统一，马志尼却坚定支持和相信加里波第。而加里波第曾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虽然他在实际行动里表现出了对王室的忠诚，不过皮埃蒙特方面一直提防着他。当加里波第在1860年成功拿下西西里之时，加富尔唯恐意大利会走向民主共和革命，所以才急于进攻教皇国并派兵南下，提前宣布罗马将成为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首都。意大利的统一就在马志尼革命计划的“无意识”推动下完成了。“马志尼的成功在于确定了目标，并

1 “Giuseppe Mazzini: On Nationality, 1852”, pp. 1-2. 参见 <https://webs.wofford.edu/racinepn/Mazzini.pdf>, 访问日期：2023年9月20日。

2 转引自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第302—303页。

激发了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政治家的热情。和加里波第一样，加富尔也是马志尼的学生，只是他并不承认，也不感恩罢了。”¹加富尔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其实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他憎恶共和主义和革命，一直十分担忧马志尼的共和思想会破坏他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失去法国对皮埃蒙特的支持。但他实际上却无法忽视马志尼等人提出的民主思想，“未来所有政府都将默许或明确地依赖公众的支持”。加富尔已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将皮埃蒙特的立宪君主制塑造成“唯一一种能调和自由和秩序之间关系的政府形式”。²

20世纪初，马志尼的民主政治思想，包括其对民族概念的界定都被法西斯盗用并篡改。法西斯主义将自身伪装成“复兴运动的继承者”，目的是将其文化霸权凌驾于意大利民族之上。法西斯主义首席哲学家乔瓦尼·詹蒂利（Giovanni Gentile）将马志尼塑造为鼓吹民族扩张理想的思想家，指马志尼为提出“民族使命”概念的意大利之父。³

三、意大利人的塑造与“欧洲梦”

就意大利“民族国家”概念而言，复兴运动或许主要源自法国革命的启蒙。拿破仑在意大利短暂停留期间曾举办了一场征文竞赛，题目是“什么样的自由政体最符合意大利的福祉”。意大利已经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求参与竞赛的人通过“回想意大利往昔的光荣岁月”来培养民族感情。大多数作者赞成法国革命的主流政治思想，建议创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少数人，如雅各宾派领导人让策（Giovanni Ranza），考虑到意大利不同地域的风俗和方言各不相同，认为必须采取联邦制。最终胜出者焦亚设想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共和国，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以此瓦解地方习惯，创造民族文化。⁴法国革命促进了意大利民族主义传播，当拿破仑试图将法语规定为法兰西帝国（包括意大利）的官方语言时，意大利的诗人和作家感

1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p. 15.

2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p. 22.

3 Giovanni Gentile, “Mazzini”, in Giovanni Gentile, *I Profeti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Firenze: Sansoni, 1923/1944), p. 26.

4 克里斯托弗·达根：《剑桥意大利史》，邵嘉骏、沈慧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到十分愤怒，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民族诗人福斯科洛（Ugo Foscolo）。他在其1807年的作品《墓地哀思》（*Dei Sepolcri*）¹中抗议法国人规定的“教堂中不再允许举行葬礼”。他认为，墓地，尤其是名人的墓地，如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中的墓地是一种保留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激发对往昔光荣岁月的崇敬，若非如此，则一个民族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化民族主义”这一传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首次出现，18世纪时被再次发扬光大。19世纪30年代开始受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气候影响，意大利本土出现了温和的民族主义思想，“文化民族主义”重新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当时许多意大利作家热衷于创作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小说，最著名的如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约婚夫妇》和达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的《艾多略·费拉莫斯卡》（*Ettore Fieramosca*, 1833）。他们的小说也记述“国家”历史，鼓励建立“爱国历史学会”，增强知识阶层的历史意识。

不仅小说，此时的诗歌、戏剧、歌剧中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爱国主题，虽然这些并不一定说明支持政治统一和独立思想的人增加了，但当他们聆听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或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歌剧时，即使一些保守派也受到鼓舞，高呼“自由”和“我的祖国”。²诚然，此时在文化民族主义渲染之下，最受鼓舞的是浪漫派文学最为繁荣的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相应地，关于统一，也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北部的知识阶层相信，意大利应该模仿同时代的法国或英国的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回溯自身历史来寻找发展方向，如中世纪城邦国家时期、教宗英诺森三世时期或古罗马时期。但无论哪种观点，由此开始直至统一结束，意大利民族主义基本上主要是知识阶层用于反抗现实政治的重要旗帜，他们仍然以北方人为主。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较为保守的国家方案，1844年，历史学家巴尔博（Cesare Balbo）发表著作《意大利的希望》（*Delle speranze d’Italia*）³，提出复兴意大利的主要角色是萨沃亚王朝，首要之事是争取独立。因为意大利各民族截然不同，

1 http://www.letteraturaitaliana.net/pdf/Volume_8/t344.pdf, 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日。

2 克里斯托弗·达根：《剑桥意大利史》，第111页。

3 Cesare Balbo, *Delle speranze d’Italia*, Parigi: Firmin Didot, 1844. https://moodle2.units.it/pluginfile.php/312293/mod_resource/content/1/Balbo%20Delle%20speranze%20dItalia.pdf,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0日。

需要通过联邦形式来组成政府。在奥地利向东扩张进入巴尔干的时候，意大利就能享有更多自由。焦贝蒂（Vincenzo Gioberti）于1843年出版《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Del primato morale e civile degli Italiani*）¹一书，主张罗马与皮埃蒙特联合，组成以教宗为首的邦联。他指出，即便政治上的统一不能实现，也仍然存在着一个意大利民族，它在血统、宗教和语言方面都是统一的；教宗是它理所当然的领袖。

意大利统一的实现方式在教科书中常被称为“自上而下”模式，通常是指其统一领导者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通过外交谈判、王国兼并、武力占领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尤其是首相加富尔功勋卓著。²但加富尔对共和派革命的厌恶显然比他对国家统一的热爱要多，所以在加里波第远征南部那不勒斯之时，他甚至还策划阴谋以阻止加里波第的步伐。³最终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统治阶层，以国王和首相为代表，对“意大利统一国家”并无多少忠诚情感，对他们而言，统一意味着皮埃蒙特专制势力的扩张。这种想法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往往通过强权和暴力机制推行统一，而意大利南方的分离和反叛情绪也由此加剧。南方与北方的裂痕，在国家实现统一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困扰意大利人，甚至延续至“二战”之后，意大利人试图通过“欧洲方案”来解决“南方问题”。

实际上，欧洲范围内，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想主要是应对欧洲内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以空前的血腥和残酷著称，其主战场在欧洲。战争期间，不少有识之士就开始积极思考，试图寻找保证欧洲长久和平的方案，欧洲联合就是其中之一：欧洲国家通过出让主权、合并利益、建立超国家的联邦机构，从而彻底、永久地消灭彼此间的战争。此外，“一战”带来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转变以及欧洲人的危机意识，真正促进了“欧洲”思想蓬勃发展。⁴意大利人中，如菲亚特创始人、工业家阿涅利（Giovanni

1 Vincenzo Gioberti, *Del primato morale e civile degli Italiani*, Milano: Fratelli Bocca Editori, 1938, <https://ub.unibas.ch/tox/IDSLUZ/000145181/PDF>,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0日。

2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pp. 18-19.

3 Denis Mack Smith, *Modern Italy. A Political History*, pp. 23-24.

4 李维：《欧洲合众国：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Agnelli) 和经济学家卡比亚蒂 (Attilio Cabiati), 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名为《欧洲联邦或者国际联盟》。他们分析了威尔逊成立仲裁法院的思想, 就国联能否阻止新的战争爆发, 能否成为一个理想的机构展开辩论, 认为国联不过是“力量均衡”概念的扩大化, 而各国工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 使得原有平衡无法维持。¹要消灭欧洲的战争, 必须成立拥有统一的立法权及行政权、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²另一位出色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埃诺迪 (Luigi Einaudi)³也在同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 探讨欧洲“联邦”。⁴在他看来, 是国际无政府主义引发了世界大战, 而建立欧洲“联邦”是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

自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之时起, 反法西斯的斗争就已出现, 被称为“抵抗运动”(Resistenza)。在与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做斗争的同时, 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较早地开始思考战后欧洲的未来, 明确提出了战后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政治主张, 努力在欧洲抵抗运动中广泛传播这一思想, 并积极推动欧洲各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⁵这些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几位包括: 意大利外交家卡洛·斯福尔扎 (Carlo Sforza); 著名政治家、“二战”后曾连续八次担任意大利总理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 (Alcide De Gasperi); 以及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和最具代表性的欧洲联邦主义者, 被誉为“欧洲联盟奠基者之一”的阿尔蒂耶罗·斯皮内利 (Altiero Spinali)。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都经历过法西斯独裁的迫害, 长期在海外流亡, 辗转欧洲多地, 擅长外交活动, 他们对于欧洲文化整体性的认识在此过程中逐渐加深。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在将意大利的命运与欧洲统一紧密联系起来。如

1 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 贤哲之梦: 欧洲统一思想史》, 第58页。

2 Giovanni Agnelli and Attilio Cabiati, “European Federation or League of Nations, 1918”, in Peter M. R. Stirk and David Weigall, ed.,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Pinter, 1999, pp. 14–15, 转引自李维:《欧洲合众国: 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 第4页。

3 路易吉·埃诺迪 (1874—1961), 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主张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 在政治倾向上主要受美国联邦制的影响。战争期间流亡国外, 战后回国, 曾先后担任意大利银行总裁, 政府副总理和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等职, 任期内积极推动欧洲联合。

4 Luigi Einaudi, *La guerra e l'unità europea*, Bologna: Mulino, 1986, pp. 19–36, 转引自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 贤哲之梦: 欧洲统一思想史》, 第57页。

5 严双伍、徐遐舒:《意大利抵抗运动与战后欧洲联合》,《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斯福尔扎所说,“多少忧虑、恐惧和希望,震撼着意大利的未来,我们看不到还有什么出路,只有欧洲各国的国际大团结才能拯救我们”¹。

战争期间在意大利拉齐奥大区文托泰内小岛上,囚禁着大量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和斯皮内利。他们在和一些狱友交流讨论的基础上,于1941年2月写就了著名的联邦主义文献《争取自由、统一的欧洲宣言》,也称《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²其中明确提出,民族独立的思想意识“曾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它克服了地方主义的混乱,实行了广泛的团结,共同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它消除了人员交流和物资流通领域的种种障碍;它让人民在本土范围内享受教育,享有文明而有秩序的生活”。尽管如此,“资本帝国主义及其扩张政策”也是从这种思想意识上滋生而来,“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每个国家人民更需要维护符合现代文明生活水准的生存空间,并使之变得全球化。但是政治地理伪科学出现后,想为它的生存空间寻找理论依据,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实行强权政治的借口”。³

由此可见,在意大利尚未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经历较为完整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已然染上了极权色彩。战后,意大利人为了将新诞生的意大利共和国(Repubblica)区别于旧的“意大利”,也在思想观念上对“民族国家”进行切割,强调意大利人在抵抗运动中的艰苦卓绝,强调新的“意大利”是脱胎于与法西斯极权国家进行坚决对抗的仁人志士。德·加斯佩里所主持的战后重建⁴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践行这种切割意图。

与过去进行切割首先表现在抛弃君主制。1946年6月2日,意大利举行自由选举,主要就君主制和共和制进行全民公决,以及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此次选举全国有89.2%的选民参与全民公决,二十年前被强制取缔的政党得以恢复其政治活动,全

1 Carlo Sforza, *Panorama europeo*, Roma: Einaudi, 1945, p. 11. 转引自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第85页。

2 Altiero Spinelli and Ernesto Rossi, *Il Manifesto di Ventotene*, Milano: Mondadori, 2006, pp. 11–38; John Pinder, ed., *Altiero Spinelli and the British Federalists. Writings by Beveridge, Robbins and Spinelli 1937–43*, London: Federal Trust, 1998, pp. 73–85.

3 玛丽娅·格拉齐娅·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第94–95页。

4 参见尹汉超:《德加斯佩里和战后意大利重建》,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国有56个政党参与此次选举，11个政党汇集了96.5%的选票，且意大利妇女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由此，1946年6月也被学者认定为现代意大利政党历史的起点。¹6月10日选举结果表明，赞成共和制的票数占54.3%，支持君主制的选票为45.7%，共和制以微弱优势取胜。而1946年的大选也体现着意大利南方与北方明显的政见分裂：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支持共和的选票达到64%，而罗马及南方则有67%的选民支持君主制。

1946年6月12日，内阁决定由德·加斯佩里兼任意大利临时国家元首，他宣布意大利结束君主制。18日，意大利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并将6月2日全民公决日作为共和国国庆日。而同时进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天主教民主党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获得35.2%的选票，拥有制宪会议556个席位中的207个；其次为社会党，选票数占20.7%，115个席位；共产党占18.9%，104个席位。1946年6月28日，德尼古拉（Enrico De Nicola）以多数票当选共和国临时总统，委任德·加斯佩里组阁。7月12日，德·加斯佩里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此后意大利开启了天主教民主党长期执政的时代。

与过去极权时代进行切割，还表现在将天主教信仰与欧洲联合思想融入国家的发展理念。而欧洲统一在德·加斯佩里看来对意大利至关重要，尤其可以使意大利更靠近欧洲的中心，而不至于被推向地中海，被欧洲孤立。²同时，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也促使德·加斯佩里对欧洲主义更加亲近。在梵蒂冈图书馆当管理员时，他就强调：“天主教的道路包含对国家主权的限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信任。”³德·加斯佩里与推动欧洲统一的法、德领导人舒曼和阿登纳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居住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地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曾遭受法西斯、纳粹的囚禁。站在他们的角度，欧洲所遭受的苦难，尤其是他们的故乡饱受战争摧残，皆是由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要驱除这种邪祟，只有创建一个联合的欧洲国家。⁴1943年，德·加斯佩里在《重建天主教民主党之想法》（*Idee ricostruttive della Democrazia Cristiana*）一文中提出

1 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葛曾骧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2 Giulio Andreotti, *Intervista su De Gasperi*, Roma-Bari: Laterza, 1977, p. 160.

3 Eckart Conze, Gustavo Corni, Paolo Pombeni, *Alcide De Gasperi: un percorso europeo*, Bologna: Il Mulino, 2005, p. 182.

4 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第48页。

要“在自由的人民中建立更广泛的团结,”“建立具有大陆和洲际联系的同盟组织”,旨在实现基于平等地位的原料获取,移民自由和贸易自由。¹

有意大利学者认为,“意大利欧洲主义真正的核心,很明显是要求‘分摊’意大利的困难。换言之,意大利迫切需要获得原材料,以及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援助,最重要的是为它廉价的商品出口和过剩的人口找到出路”²。

在德·加斯佩里和斯福尔扎看来,美国介入西欧,提供了统一的机会:“我们不能不进行统一。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这个曾以精神力量引导世界的光荣的欧洲可能会再次沦为六千年前的一个贫穷、弱小和微不足道的亚洲的半岛。”³意大利公司从复兴的欧洲市场中获得利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至少已经形成一种经济相互依赖的结构,在意大利国内增强了实力雄厚的企业的统治地位。虽然在欧洲一体化方面,马歇尔计划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马歇尔计划对意大利在欧洲的前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恢复了意大利最大的私企和部分公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使其在经济上具备条件,能首先进入欧洲煤钢联营,继而加入共同市场。德·加斯佩里以其巨大的道德声望支持欧洲联邦,“表现得比任何其他欧洲领袖更加坚定”,他对其他外长说:“意大利准备将广泛的权力转移给欧洲共同体,只要它的组织是民主的,并且是能保证其生存和发展的。”⁴

德·加斯佩里甚至将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视为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他和斯福尔扎相信,如果留在北约之外,会破坏意大利同其他西欧国家的联系,从而危及欧洲联盟的前景。意大利的孤立“不仅会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安全)保障,而且会把我们排除于生产和贸易的洪流之外”,阻碍意大利人移居西欧国家。从长远来说,北约提供的安全是一重必要的壁垒,欧洲的几个大国可以在它的保护之下进行统一。“一方面欧洲联盟会加强公约的巩固性,而公约又对欧洲联盟提供必要的保护,使联盟可以在保护下维持和发展。另一方面联盟会保证……欧洲国家的独立,它们

1 Francesco Malgeri, *Storia della Democrazia Cristiana 1943-1948. Le origine. La DC dalla Resistenza alla Repubblica*, Roma: Cinque Lune, 1987, p. 395.

2 Patrick McCarthy, ed., *Italy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2

3 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第24—28页。

4 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第50页。

联合后会构成一个能与美国抗衡和实行自治的实体。”¹德·加斯佩里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将精力主要用于推进欧洲防务集团的建立上，该努力虽然失败，但他的活动一度将意大利在欧洲一体化运动方面的影响力推向顶峰，他本人也因为欧洲统一做出杰出贡献而赢得“国际查理大帝奖”（Internationaler Karlspreis der Stadt Aachen），早于两位欧洲统一的设计者。在德·加斯佩里去世后，阿登纳曾回忆道：“阿尔西德·德·加斯贝利、罗贝尔·舒曼和我之间的合作，是由欧洲必须统一起来的这种信念所指导的。这一合作在1954年8月由于德·加斯贝利的突然去世而告终。他死得太早了。”²

四、余 论

帝国的记忆与天主教构成欧洲的文化“边界”，也使意大利人对于“统一”欧洲的向往变得根深蒂固且理所当然。只是这种“统一”的理想中交织着多重张力，比如：精神的、信仰的“帝国”与世俗的、现实利益的“帝国”之间的张力；统筹全境的帝国运转机制与传统深厚的地方自治制度之间的张力；通过战争征服以扩大帝国版图与消除争端、维护持久和平之间的张力等等。而意大利人心中的“帝国”最根本的核心仍然是关于“罗马”的历史记忆。虽然但丁花费了大量笔墨描绘他的“世界帝国”，但其实他的“世界”中心仍是“罗马”。历史变迁中，地中海逐渐失去其作为西方世界中心的地位，但“罗马”这个西方中心的标志并没有从意大利知识分子的记忆里消失，反而随着现实的中心地位的失去变得更加深刻。

与“罗马”形成对照的“意大利”这个概念或者说意象，在意大利人这里却呈现出另一种发展趋势。意大利史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关系一般有两种叙事结构：一是将“统一的意大利”追溯至古罗马时代，虽然那时的意大利人是罗马人，是罗马共和国或者罗马帝国的属民，但那是意大利的首次“统一”。如奥古斯都在记

1 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第30页。

2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三）：1955—1959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部分同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98页。

录一生功业和政治遗嘱的《功业录》中所写：“整个意大利都宣誓效忠于我。”屋大维采用“奥古斯都”称号，意为“圣域所在”，他被赋予了一层神性光环，由这位“第一公民”精心构建的新价值体系，通过装饰图案、建筑公式、社群仪典和日常活动广泛传播，渗透到罗马人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力覆盖所有阶层。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与统一化进程缓慢地持续进行，“它兼容了各民族的当地传统，如今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一统的意大利’（Tota Italia）这一概念当中”¹。而后，即使意大利半岛被蛮族入侵，分崩离析，但这种意大利的统一性却并未消失。

另一种叙事结构认为，虽然自公元前2世纪起，意大利式意识形态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在奥古斯都时期达到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政策的施行导致了任何一种意大利统一体的形成，或者并不意味着在古代事实上曾经实现了意大利统一”²。意大利史在古代就是罗马史的一部分，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意大利史存在于教会史、城市国家史中。直到19世纪复兴运动兴起，意大利人迫于落后现状和外国压迫才觉醒所谓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在意大利王国建立并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之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意大利人”，由此才需要“意大利史”。而实际上，无论哪种叙事结构，最终都只是表明“意大利”这个意象反倒不如“罗马”来得深刻。

正如马志尼所认为的“民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排他性的“想象的共同体”一样，19、20世纪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政治精英们在“意大利”这个民族概念或意象之中融合了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等元素，同时由于法西斯野心家的盗用和篡改，“民族”被打上了邪恶的战争罪魁祸首的标签。“二战”后，意大利人用“共和国”（Repubblica）这样没有缺陷和阴影的正面意象取代了“意大利”作为“民族”的那一面。他们开始强调自己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的艰苦卓绝，包括废除君主制似乎也是为了与万恶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进行彻底的切割，表明这是一个新的“意大利”。

1 意大利共和国文化部和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整理的“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Tota Italia: Alle origini di una nazione IV secolo A. C.-I secolo D. C.）中的叙事。这种观点还可在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中找到痕迹。

2 E. 伽巴：“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和意大利”，阿斯廷、沃尔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罗马与地中海世界至公元前133年》，陈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34页。

按罗伊·威利斯的说法，“意大利选择欧洲”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种判断有中肯之处。但还有必要注意的是，意大利其实从来没有另一种选择。换言之，意大利人对于他们在欧洲之中、与欧洲一体这个历史事实和现状从未产生过怀疑，这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历史记忆、文化心理上的。当然，欧洲对于他们也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在他们看来，为了具体的现实利益，采取何种结盟方式，与谁结盟并不重要，不过是解决问题的策略，但欧洲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根基，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将意大利的问题“分摊”到欧洲，他们也没有心理负担，因为对欧洲而言，他们是天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代意大利人会将欧洲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毋宁说，他们一方面不会放弃由来已久的“欧洲梦”，欧洲就是意大利人的传统之一，它已经如同宗教信仰一般刻入意大利人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会小心地维护眼前的现实利益，是他们作为尘世俗人的利益，包括个人的成功、家庭的幸福。极右的意大利兄弟党的口号“上帝、祖国和家庭”与欧洲共同体从本质上并不矛盾，“上帝”是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这种信仰塑造了欧洲，构成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之一；“祖国”所指的与其说是“意大利”，不如说是“二战”之后与欧洲共同体同步发展起来、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和国”；而“家庭”就是他们对现实个人需求的关注，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就牢固树立的价值观。所以，意大利人不论从理想还是现实角度，并不会轻易放弃作为共同体的欧洲。他们希望寻求在欧洲的更大话语权、更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将这种欧洲作为整体的力量为自己所用，解决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成功。

（信美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分期、理论进展与史学实践

| 黄 璐 |

摘 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肇始于19世纪末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拉布里奥拉、克罗齐与詹蒂利等人的相关阐释中，唯物史观的实践取向包含了对历史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两重批判。但是，克罗齐与詹蒂利对唯物史观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评与修正，这促使葛兰西试图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恢复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提出理论与行动同一的实践哲学历史观。葛兰西的相关主张为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提示了基本的理论旨趣与问题意识。自20世纪50年代起，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经历了以工人运动、农业革命等主题的政治史路径向社会史、经济史等社会科学取向的转变，时至今日，仍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关键词：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克罗齐 葛兰西

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历史研究传统，如以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传统及其同时代的博学研究；再如18世纪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1672—1750），他也被称为“意大利史学之父”；等等。至19世纪中后期，稍晚于与德、法等欧陆国家，意大利史学开启了科学化与职业化的进程。1846年，都灵大学设立了首个历史学讲席；1883年，意大利历史研究院（Istituto storico italiana）成立；次年，《意大利历史杂志》（*Rivista storica italiana*）创刊。这些都是这一进程的体现。

至19世纪末，意大利史学职业化进程或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达。其中，传统的博研究与语文学传统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 1827—1917）及其实证主义史学是当

时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流派；此外，还有19世纪末唯心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逐渐介入到历史领域。二是当代史研究（即统一以来的意大利史）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史学重要分支。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基本都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古代史、中世纪史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而至此时期，越来越多的历史哲学家与历史学家都将眼光投向当代史。如克罗齐、乔瓦尼·詹蒂利（Giovanni Gentile, 1875—1944）、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更晚一辈的费代里科·沙博（Federico Chabod, 1901—1960）、德利奥·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 1904—1966）等等，都将其研究视域拓展至当代。¹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伴随着这一当代史兴起与发展，逐渐成为意大利史学中的主流之一。首先需要交代的是，本文所指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包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实践，还包括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反思。换言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其史学实践方面，还体现在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方面。以拉布里奥拉、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上的反思（部分涉及意大利史的编撰问题），既从理论，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强有力地挑战了以克罗齐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史学主流，同时，也为“二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提供了灵感来源、问题框架与理论准备。

循着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体现在以拉布里奥拉、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二、三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等主流思潮的争鸣中，逐渐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演进与史学研究中所提示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二战”后更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依据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成果，投入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他们首先将目光聚焦于对意大利当代史的阐释，突出了统一运动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附属阶层的重要性；其次，他们也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国际关系、古代史、社会史等领域。及至20世纪70年代，

1 关于20世纪意大利史家的代际与流派划分，参见Gian Paolo Romagnani, “La storiografia modernistica del Novecento”, *Annali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o-germanico in Trento*, Vol. 35, 2009, pp. 211–238。有关20世纪意大利史家的群体研究另可参见Roberto Pertici, “Storici italiani del Novecento”, *Storiografia*, No. 3, 1999, pp. 1–327, 以及Giuseppe Galasso, *Storici italiani del Novecento*, Bologna: Il Mulino, 2008。

经过前后至少四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意大利史学的主流之一。

陈新曾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成拉布里奥拉时代（1895—1944）与葛兰西时代（1944—1968）。¹对此，我们或许可以稍加细化，并拓展为四个阶段：拉布里奥拉时代（1895—1915）；克罗齐与詹蒂利的“修正主义”时期（1916—1947）；葛兰西时代（1947—1968）；后葛兰西时代（1968—1991）。由于拉布里奥拉在1904年病逝后影响很快式微，两位受其影响的晚辈克罗齐与乔瓦尼·詹蒂利也都基本远离马克思主义，转而推动唯心主义哲学成为意大利思想主流。故而，拉布里奥拉时代可以终至1905年其最后一部作品出版。1906年起，则主要是克罗齐与詹蒂利的影响益隆，他们循着此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继而形成各自的哲学体系。1926至1935年，葛兰西在狱中写下了大量笔记与书信，其中提到要接续拉布里奥拉的传统，批判克罗齐与詹蒂利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过，这些文本在1947年才陆续面世。加之此时，詹蒂利已故、克罗齐垂暮，故我们或可将葛兰西时代调整为1947—1968年。

需要补充的是，1968年以后，我们很难再如前述找出具有如此影响的代表人物，故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或可将1968至1991年称为“后葛兰西”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年鉴学派的传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了其新一轮的范式转换。1991年，意大利共产党正式解散，此后虽数度重建，但影响式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党派性丧失了政治基础。相较此前，政治淡去、回归学院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趋势。

一、拉布里奥拉时代（1895—1905）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通常被誉为“意大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融合。之所以能有此影响，与他的思想经历密不可分。

1 陈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18页。

拉布里奥拉青年时期求学于那不勒斯，师从当时两位知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奥古斯托·维拉（Augusto Vera, 1813—1885）与贝尔特兰多·斯帕文塔（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以下简称“大斯帕文塔”）。维拉是典型的学院派，对黑格尔的理解讲求从文本到文本。大斯帕文塔是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试图利用黑格尔哲学来反对实证主义与天主教，以此体现出意大利哲学的个体性。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现实主义/历史化解读，一方面体现在剔除安东尼奥·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 1797—1855）与温琴佐·焦贝蒂（Vincenzo Gioberti, 1801—1852）的唯心论中的宗教因素，明确哲学的世俗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体现在恢复维柯的历史主义传统，明确个体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拉布里奥拉一度为维拉的学院哲学所吸引，但很快接受了大斯帕文塔的阐释路径。

事实上，大斯帕文塔不仅启发了拉布里奥拉，他还对表侄克罗齐以及詹蒂利、葛兰西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三人也分别是20世纪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蒂利后来曾在克罗齐的协助下，负责大斯帕文塔文集的编辑工作。身处狱中的葛兰西，在读到“黑格尔认为奴隶制是自由的摇篮”时，随即想起大斯帕文塔所说的“但摇篮不是生活。有人却想要我们永远生活在摇篮里”。¹他认为，是维柯与大斯帕文塔这两位地方性哲学家，将克罗齐与詹蒂利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在试图改造马克思主义时转向黑格尔哲学。

1871年起，拉布里奥拉先后任教于那不勒斯大学、罗马大学，讲授“历史的观念与基础”“关于维柯学说的批判性阐述”“历史哲学”等课程。尤须指出，他还首次开设有关社会主义的系列课程，从科学与实践两方面讲授社会主义的学说与发展。课堂之外，他热衷工人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

拉布里奥拉时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是许多革命者的一时之选。这其中既有最早将《资本论》译介到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 1846—1892）与埃米利奥·科韦利（Emilio Covelli, 1846—1915），也有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的实证主义者阿基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 1857—1943）；既有与索雷尔等法国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的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 1873—

1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Torino: Einaudi, 1975, p. 898.

1959)，也有马克思的激烈批评者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等。当然，还包括克罗齐与詹蒂利等。一时间，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了一个多种政治立场与学说交织的理论场。¹

1890年，他与恩格斯、考茨基、伯恩斯坦、阿德勒等第二国际核心建立通信。这一以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通信圈还包括索雷尔，以及“暂时着迷于社会主义”的克罗齐。1895年，在恩格斯等人的鼓励下，拉布里奥拉拟订了“唯物史观文集”写作计划，最终完成的有：《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论历史唯物主义：初步阐释》（1896）、《谈谈社会主义与哲学：与乔治·索雷尔的通信》（1897）、《世纪之交：回顾与展望》（1901）、《历史、历史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1902—1903）。其中，前两种均首先发表于索雷尔负责的《社会生成》（*Le Devenir Social*）杂志，并由克罗齐负责在意大利的出版；后两种则是克罗齐在拉布里奥拉病逝后整理出版。

随着“唯物史观文集”的推出，拉布里奥拉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独特地位。葛兰西与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都曾指出这一点：前者基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认为他是“试图给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框架”的第一人；后者则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认为他是尝试“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历史实践的哲学”的第一人。这两种说法的共同依据来自拉布里奥拉所提出的“实践哲学”。在1897年给索雷尔的信中，拉布里奥拉提出，实践哲学（*la filosofia della praxis*）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这是一种内在于已被哲学化的事物之中的哲学。从生活到思想，而不是从思想到生活；亦即，现实化的过程”²。

“实践哲学”的表述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要让黑格尔哲学以脚着地。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马克思哲学发动了一场针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存在论革命。海德格尔曾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称为柏拉图主义。它的一般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真理或现实属于超感性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感性世界中的某物是现实的，乃是由于其“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而所谓的存在论

1 相关研究参见Richard Drake, *Apostles and Agitat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以及Bellamy, Richard, *Modern Italian Social Theory: Ideology and Politics from Pareto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2 Antonio Labriola,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Torino: Einaudi, p. 702.

革命，则重新定义了感性与超感性世界的关系。其关键之一，是将“实践”——感性的或对象性的活动——确立为这一哲学的存在论基础。由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¹，因此，真理、现实只能通过人的实践——而不是从超感性世界中、从理念的角度——来把握。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实践”的论述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布里奥拉自然没有读过该文本，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实践原则的把握，并将这一原则视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所在。根据这一原则，他主要从历史与历史编纂学两个层面来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目的在于达成历史解释的“对象化”（obiettivizza，或译为“客观化”）与“自然化”（naturalizza）；不过，它并不停留于此，还将这一历史解释视为历史运动的一部分，是革命实践的一部分。对此，他还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做了进一步论述。以“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为例，他提出，历史与艺术、科学等学科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些学科的认知能够达成，不是因为它们把握到了某种规则或模式，而是因为它们“处于行动的历史本身”，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环节与断面”。²

拉布里奥拉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很快引发了克罗齐与詹蒂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883—1886年，克罗齐借居罗马西尔维奥·斯帕文塔（Silvio Spaventa，1822—1893，是大斯帕文塔的胞弟）家时，结识了拉布里奥拉，成为其私淑弟子。1896年，在拉布里奥拉的鼓励下，克罗齐发表了《论历史的唯物主义观》一文。当时詹蒂利正在比萨大学学习文学与哲学，其导师之一是大斯帕文塔的学生多纳托·亚亚（Donato Jaja，1839—1914）。他在读到克罗齐该文后，主动致信克罗齐，并在次年发表了回应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则批判》。二人也由此开启了一段持续近三十年的哲人友谊。

1899年，克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詹蒂利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研究》分别出版。它们都是二人此前论马克思主义系列文章的合集，分别从历史学与哲学的角度对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做了阐发。简言之，克罗齐仍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2 Antonio Labriola, *Scritti filosofici e politici*, pp. 796–799.

然坚持形而上学的传统（尽管自己做了改造），认为唯物史观的长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整体的、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历史方法论；但从哲学上说，它不以经济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仍然是从人类活动之外寻求其本体论基础，并不能称为一种新的哲学。詹蒂利的态度与之相反。他认为，唯物史观所提示的实践原则是对旧形而上学的超越，具有革命意义。不过，他将实践理解为思想的创造活动。他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翻译成意大利语，并援引维柯的“认识真理凭创造”，指出人的物质实践根源于思想。思先于行，是詹蒂利与克罗齐重释拉布里奥拉的共同基础。

拉布里奥拉病逝于1904年。次年，克罗齐为其整理出版了《政治与哲学杂集：已刊与未刊稿》作为纪念。此后，拉布里奥拉及其实践哲学很快被人淡忘，或被赋予其他内涵。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人们提起“实践哲学”时，更多指的是克罗齐的《实践哲学》（即《实践哲学：经济与伦理》一书）或詹蒂利的“行动哲学”（attualismo）。以二人为代表的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渐而成为彼时意大利思想主流。

二、克罗齐与詹蒂利的“修正主义”时期（1905—1947）

这一时期，克罗齐与詹蒂利都对此前有关唯物史观的阐释做了反思，并将眼光转向黑格尔哲学，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

针对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詹蒂利认为其问题在于只看到哲学（即普遍与抽象）与历史（个别与具体）的对立，忽略了二者在形式与内容层面的联系。因此，他建议克罗齐阅读黑格尔；克罗齐欣然接受，1905—1906年成为克罗齐的黑格尔阅读年。《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1907）便是这一阅读的初步成果，后扩展为《逻辑学》一书。至此，克罗齐也修正了其著名的《涵盖在普遍艺术观念之下的历史学》（1893）一文中所提出的历史学是艺术的观点，开始强调历史学的实践作用。这一历史观念的转变最终完成于《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1917）。该书作为克罗齐“精神哲学”的最后一块拼图，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此前《逻辑学》中提出的“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在历史观念批判中的运用。

詹蒂利从马克思哲学中“提取”出实践的观点之后，继续其对旧形而上学的改造。1916年《精神之为纯粹行动的一般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其行动哲学的形

成。在这一哲学体系中，历史与哲学作为“思想着的思想”（pensiero pensante）的环节，二者虽有差异却都同一于“思想的纯粹行动”这一唯一实在。他将历史与哲学视为同一物，主张“哲学就是哲学史”。

将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与《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精神之为纯粹行动的一般理论》比较，读者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某种亲缘性。尽管各自的论述策略、思想立场不同，却都聚焦在“实践”（或行动）这一枢轴性概念，都达成了思想与行动、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性这一共识（当然，各自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并不一致）。有趣的是，当詹蒂利读完《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后，他甚至认为克罗齐最终转向了“行动哲学”。但克罗齐显然并不同意。在《论现实的观念论》（Intorno all'idealismo attuale）一文中，他批评詹蒂利的“纯粹行动”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克罗齐曾将他与詹蒂利之间的思想关系表述为“争论中的和谐”。不过，1925年，随着詹蒂利转向法西斯主义，二人关系彻底破裂。哲学上的争论与政治上的对立，都反映在此后二人关于意大利国史（即1871年统一以来的意大利史）的阐释中。这主要体现在克罗齐的《1871至1915年的意大利史》（1928）与詹蒂利的《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与学说》（1929）之中。

略言之，克罗齐认为，自由主义是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核心精神。随着1871年意大利统一的完成，这一精神逐步从政治领域进入到公共生活与社会文化之中，直到1917年“一战”爆发方才中断；1876年历史左派取代历史右派，是这一扩展的标志，意味着意大利国家进入正常状态；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对自由主义国家带来挑战；但这一危机在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执政时期（1900—1914）得到解决，自由主义国家进入最好时期。詹蒂利则主张：马志尼主义（詹蒂利认为其核心是个体对普遍价值的服从）是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1861—1876年，意大利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但是，1876年历史左派取代历史右派，则抛弃了这一精神，意大利陷入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危机之中；这一危机直到“一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再度迎回马志尼主义方才告一段落，国家由此进入新时期。

这两种阐释虽然彼此针锋相对（如对1876年的评价、历史分期上的分歧），但也有相似之处。比如，意大利史都被呈现为某一精神的历史；再如，他们都认为存在

意大利的国家危机，都将唯心主义哲学视为解决途径。而从二人的生活来看，克罗齐将政治排除于历史的时间序列之外，专心于学术研究。詹蒂利注重实践（甚至不惜与法西斯合作），由他推动的教育改革影响深远，持续到70年代。就这一意义而言，二人恰也坚持了所谓的“思想与行动的同一”。正因此，更晚一辈的葛兰西，将二人都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有必要厘清其中隐含的马克思因素，以此完成对由这二人所代表的唯心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批判。

若按史学专业标准，克罗齐与詹蒂利的历史作品难以符合历史科学化的要求，但他们对当时的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过去的传统史学主流基本关注的是18世纪及此前的意大利史，而克罗齐与詹蒂利的相关研究——当然，还应包括贾基诺·沃尔佩（Giacchino Volpe, 1876—1971）与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 1873—1957）——使统一以来的意大利史（它在意大利被称为“当代史”）为许多年轻一辈所关注。战后，“当代史”开始成为意大利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此外，他们指导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战后意大利的史学巨擘，如莫米利亚诺、卡洛·安东尼、费代里科·沙博、德利奥·坎蒂莫里等。而沙博、坎蒂莫里等人的不少学生后来又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卡洛·金兹堡亦是坎蒂莫里的授业弟子）。

三、葛兰西时代（1947—1968）

（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历史论述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在1914年投身于都灵工人运动，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时期，他赞赏克罗齐与詹蒂利对意大利民族文化的改造，将二人的作品纳入工人夜校的阅读材料。他对拉布里奥拉亦有了解，被捕前曾向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索要拉布里奥拉与恩格斯的通信集（该书由梁赞诺夫作序）。葛兰西在社会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内主要从事教育与宣传工作，1924年当选意共总书记，1926年10月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37年4月，因病获释，旋即病逝于罗马。

“二战”结束后，克罗齐进入暮年，詹蒂利也已被共产党游击队击毙数年，意大

利思想界处于代际更迭中。在陶里亚蒂的主持下，葛兰西的狱中书信和笔记陆续整理出版。1947年《狱中书简》首先问世，克罗齐亦读到此书，将葛兰西称为“我们中的一员”。读书札记按照不同的主题被分成了六卷（此外，另有1975年的4卷本，这一版本按照读书笔记的原始顺序编排，是目前的通行版本）。1948年出版了第一卷《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戴托·克罗齐的哲学》。一个葛兰西时代由此逐步开启。

简要地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主要做了两部分尝试：一是重新确立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二是重新表述意大利史。“实践哲学”部分，葛兰西通过对克罗齐与詹蒂利哲学的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绝对历史主义”（其提出时间要早于克罗齐）历史观。意大利史部分，葛兰西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但仍可体现出他对克罗齐与詹蒂利前述意大利史表述的批评。

（1）实践哲学谱系与绝对历史主义

葛兰西首先给“实践哲学”下了定义：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哲学，“哲学与政治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对等或均等，即是实践哲学。一切都是政治，即便哲学，或者各种哲学（也是如此），唯一的‘哲学’就是行动中的历史，即生活本身”。照此，马克思主义史的发展谱系呈现为：“实践哲学”与现代唯心主义都源自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拉布里奥拉是“首次赋予其科学框架”的尝试者，列宁则“对‘实践哲学’有巨大的理论贡献”。¹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与物质（自然—生产的物质力量）之间诸矛盾在辩证发展中的统一”的体现，而“实践”则是这一学说在哲学中的集中体现，即“人类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²由此，他试图重新从拉布里奥拉的问题来展开。在他看来，克罗齐与詹蒂利虽有不同，但都是以思辨语言重新表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即拉布里奥拉所表述的“实践哲学”）：克罗齐哲学中，理论是先于实践的环节；詹蒂利哲学中，行动着的思想取代了“现实的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为此有必要在“历史与哲学的同一”中加上政治这一范畴，即历史、哲学与政治的同一。这也是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核心。

1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pp. 886, 1507, 1250.

2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p. 868.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来看，克罗齐虽然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政治实际上被他排除于历史认识的范畴；詹蒂利的“纯粹行动”则抹杀了现实与理念之间的差异，而差异恰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必要基础。“实践哲学”应当是历史、哲学与政治三者的同一。具体而言，首先，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意识，是对历史的抽象，但是这一抽象唯有指向现实时方才具有行动力；其次，政治作为一种激情，其行动主体需要批判意识才不至于盲动；最后，历史为哲学与政治的实在性保证，不存在脱离历史的反思与行动。唯其如此，绝对历史主义方才能够完成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真正克服”。¹

（2）意大利史叙述

除了“实践哲学”部分，需要提及的是葛兰西对意大利史的相关表述。尽管国内学界对《狱中札记》的解读都侧重于哲学与政治的方面，但其中意大利史尤其是复兴运动史的论述也占了相当篇幅。按照葛兰西的计划，《狱中札记》不是一部，而是多部著作的草稿。从1927年酝酿到1935年停笔，《狱中札记》的写作计划大致经历两次大的调整，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史始终贯穿其中，未曾变动。葛兰西把克罗齐与詹蒂利两种版本的意大利史叙述视为“民族传记”，其特点是预设了某种“总是存在着的某物”。为此，他试图提出一种更为真实的历史叙述。

按照他的观点，意大利史不是某种普遍性（自由主义或马志尼主义）的展开，而是普遍性（世界主义）与个体性（民族主义）的矛盾作用的体现。故意大利史首先要追溯至古罗马时期世界主义的形成（这也驳斥了法西斯的古罗马起源）。而现代意大利应始于1789年，因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意大利萌发了民族主义思想。故而他认为，但丁由于寄望于教会，只是“结束了中世纪”；而马基雅维利由于构建了关于世俗君主的直接行动理论，可看作“新世界的一个阶段的标志”。²此外，马志尼由于其世界主义理想亦被葛兰西纳入复兴运动的反题之中。而到了当代，克罗齐又成为这一世界主义的代表。

1 关于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论述另可参见陈新：《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历史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pp. 759–760.

在这一历史叙述中，葛兰西还纳入了领导权理论。他将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由派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称作“消极革命”，是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变革的革命。而这体现了构建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加富尔等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其反教会的政治主张，使其得以在复兴运动中通过调和各个社会集团的矛盾来建立其“政治领导”（*direzione politica*）。他们不仅实现对加里波第等人的“间接领导”，还通过吸收“对立集团的精英”，将这一领导发展成为“统治功能的一方面”。¹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默认的“真正的历史叙述”是包含明确的现实指向的。通过其历史叙述，“实践哲学”需要处理的核心是如何在伦理与政治层面实现领导权的问题。

（二）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形成

“二战”结束后，意共在陶里亚蒂等人的领导下，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在野党。意共一方面接受苏联的资助，另一方面也试图与其他党派合作。1956年的意共八大将议会制确立为其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20世纪70年代，意共书记贝林格提出“历史性妥协”（*Compromesso storico*），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合作，由此进入鼎盛时期。政治合作战略之外，意共还试图在文化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实际上放弃暴力革命后，构建新的文化领导权成为意共党内的共识。受此推动，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具体历史研究。从拉布里奥拉到克罗齐、詹蒂利，再到葛兰西，他们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理论反思。到了这一时期，风气发生变化，史学研究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重心。

意共除去推出葛兰西作品集之外，还先后资助创办了一系列文化机构、出版社与多种杂志。其中，机构主要有罗马的葛兰西基金会与各地的葛兰西学会。出版社主要有团结出版社（*Editore Riuniti*），负责出版马恩全集、历史研究著作及其他许多题材作品等。杂志主要有：《再生》（*Rinascita*，1944—1991）、《社会》（*Società*，1945—1961）、《南方纪事》（*Cronache meridionali*，1954—1964）、《工人运动》（*Movimento*

1 Antonio Gramsci, *Quaderni del carcere*, p. 2011.

operaio, 1949—1952)、《当代》(*Il Contemporaneo*, 1954—1965)、《马克思主义批判》(*Critica marxista*, 1963—)、《历史研究》(*Studi storici*, 1959—)等。其中,《再生》由陶里亚蒂领导创办,是意共官方喉舌;《历史研究》由罗马的葛兰西基金会运营,一直持续至今,是意大利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期刊。依托这些文化组织,成长、求学于“二战”时期的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投身于具体的史学实践。至5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俨然成为意大利史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流派。

葛兰西对于彼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其实践哲学(以及领导权理论)对庸俗唯物主义、机械论的批评,以及强调文化领域的相对自主性。这为年轻史家避开苏联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是史家的角色定位问题。葛兰西曾批评传统知识分子的自成一体与超然,提出知识分子要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中发挥组织与连接的功能,即做“有机知识分子”。这提示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担负的政治与文化责任。三是研究领域的开拓。俗文化(包括通俗文学、民俗、方言等)、附属阶层(*classi subalterne*, 又译庶民阶层等)、南方问题等一些葛兰西关注的主题,往往不见于自由主义史学主流的研究中。这成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突破口”。

在上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家中,较年长的坎蒂莫里是其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他师从詹蒂利等,主要从事宗教改革史研究,代表作有《16世纪意大利的异教徒》(*Eretici italiani del Cinquecento*)等。他曾负责编辑《日耳曼研究》杂志,对德国自德罗伊森至韦伯的思想史非常了解。他自认是在克罗齐及阿道夫·奥莫代奥(*Adolfo Omodeo*, 1889—1946, 詹蒂利的学生,后成为克罗齐主义者,是意大利自由主义史学的代表之一)等自由主义者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一辈,与沙博等人熟识。这些经历都使得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洞察唯心主义史学源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一。

面对年轻一代的政治热忱,坎蒂莫里提出,不应给克罗齐以降的自由主义史学贴上官方标签,从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面。其理由有:一方面,自由主义史学内部亦有代际更替,沙博与克罗齐对意大利史的阐释已经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像沙博、莫米利亚诺等这些主流代表实际都距离官方较远。实际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同意大利、德国的唯心主义史学相调和。

坎蒂莫里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贡献。他与葛兰西类似,

虽然都有现实的政治诉求，但仍然强调科学研究在方法上的独立性。一方面，他承认不存在绝对中立的方法论，“历史研究者离不开其诸种阐释原则，乃至某种哲学，或是世界观、意识形态观”¹。另一方面，他强调史学研究的目标应是追求真相，史学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要避免正在流行的唯意识形态论，而应当以语文学等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为核心。

萨尔沃托雷·塞基（Salvatore Sechi）认为，坎蒂莫里实际上是在提醒年轻一代史家，要避免构建某种自我隔绝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意大利的民族文化并非专属于自由主义，还可以也应当是新领导权的建基。以工人运动史为例，坎蒂莫里指出，“将工人运动置于地方史领域中心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机械地与以政治国家为核心的意大利史相比较，而是为另一种版本，即以整个市民社会中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意大利史做准备”²。

在葛兰西与坎蒂莫里等人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工人运动史、农村与农业史、社会主义史、党史等领域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有埃米利奥·塞雷尼（Emilio Sereni, 1907—1977）、乔治·坎代洛罗（Giorgio Candeloro, 1909—1988）、阿尔曼多·萨伊塔（Armando Saitta, 1919—1991）、保罗·斯普利亚诺（Paolo Spriano, 1925—1988）、朱利亚诺·普罗卡奇（Giuliano Procacci, 1926—2008）、弗朗哥·德拉佩鲁塔（Franco Della Peruta, 1924—2012）、加斯托内·马纳科尔达（Gastone Manacorda, 1916—2001）、罗萨里奥·维拉里（Rosario Villari, 1925—2017）、恩内斯托·拉焦涅里（Ernesto Ragionieri, 1926—1975）、埃利奥·孔蒂（Elio Conti, 1925—1986）、弗朗哥·德费利切（Franco De Felice, 1937—1997）等。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侧重于当代史、政治史。维拉里将它的主要进展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少见于官方史学）的研究促成了更为总体的意大利民族史的形成；二是在国家层面，既有传统的统治阶层的政治史研究，也有从经济结构、社会阶层、文化组织等领域展开的新研究范式。

1 Delio Cantimori, *Studi di storia*, Torino: Einaudi, 1975, pp. xi-xii.

2 上述有关坎蒂莫里的论述参见 Salvatore Sechi, “Delio Cantimori e la storiografia marxista in Italia”, *Il movimento di liberazione in Italia*, n. 91, 1968, pp. 3-39.

他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如缺乏对大众阶层的文化、心态、信仰等方面的考察，缺少跨国史研究等。¹

四、后葛兰西时期（1968—1991）

1972—1976年，艾伊纳乌迪出版社（Giulio Einaudi editore，简称Einaudi）酝酿多年的六卷版《意大利史》出版，坎蒂莫里、拉焦涅里、维拉里及其学生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坎蒂莫里还接替沙博参与了该项目的早期筹划，还有多位学生参与编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意大利史学主流之一的体现。

与此同时，1968年前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方法论上，跨学科研究方法逐步得到推广；研究领域上，在当代史以外，古代史或者前资本主义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在5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对古典史研究几乎没兴趣，只是翻译了部分苏联同行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其标志是《考古学对话》（*Dialoghi di archeologia*）与《历史笔记》（*Quaderni di storia*）两种新杂志的创办。

1967年考古学家拉努乔·比安基·班迪内利（Ranuccio Bianchi Bandinelli，1900—1975）创办的《考古学对话》，致力于将考古学从一门技术科学转变为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其成员大多是意共或左翼的考古学家与古代艺术史家。在创办之初，他们面临研究旨趣与政治立场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安德烈亚·贾尔迪那（Andrea Giardina）指出，他们的研究呈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由今及古，以阶级斗争理论检视过去；一是自然主义决定论，即主张只要某一问题在当下是有意义的，那这一问题的历史研究自然具有政治相关性。到了70年代，他们的研究重点则由政治转向考古、艺术与遗产保护。²

1975年由卢恰诺·坎福拉（Luciano Canfora，1942— ）创办的《历史笔记》，

1 AA.VV., “La storiografia marxista, risultati e prospettive”, *Rinascita*, a. XXX, n. 10, 1973, pp. 12–13.

2 Andrea Giardina, “Marxism and Historiography”, in Chris Wickham, ed., *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British Academy, 2007, pp. 18–19.

更凸显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缠绕。坎福拉是葛兰西基金会成员。他主导这一期刊表明“意共经由葛兰西研究所更为直接地介入到古代史研究中”。再者，芬利与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也是该杂志创办的重要推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不同于葛兰西”。因此，莫米利亚诺认为，该刊的编辑与作者面临驾驭“党的政治要求与新研究方法挑战”的问题。¹

还应注意的是葛兰西研究所下辖的《历史研究》杂志的转向。它一方面扩展了所关注的时段，另一方面开始强调社会史、经济史等新兴领域。1967年，维拉里接替马纳科尔达任该杂志主编。该杂志更为明确地将自身定位为一份涵盖古代、中世纪、现代与当代的通史性期刊。1974年，葛兰西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古代史研究团队。《历史研究》亦由此将其范围扩展至古代史领域，罗马史学者马里奥·马扎（Mario Mazza, 1936— ）加入杂志的编委会。中世纪研究亦受到重视，其关注点包括大众阶层的信仰与文化。与此同时，社会史、经济史成为这一时期的新兴领域。如为了应对社会史、计量史学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强调经济史的研究，其中议题涉及19世纪意大利的工业化、农业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社会史的兴起以德拉佩鲁塔为代表，主要关注的是大众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况等。在80年代，他与维拉里等主导了多卷本《意大利社会史》的编撰。

总的来说，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一方面，在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层面，它通过对唯心主义思想主流的批判，强调“实践”在历史中的本体论意涵。从其实际效果而言，这一批判为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从史学实践来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在不断更新，其关注领域经历了从政治史向社会史、经济史的转变，从最初聚焦于无产阶级运动，逐渐转向对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其中所包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底层取向，既是对唯心主义史学霸权的有力挑战，同时也弥补了过去意大利史中对底层民众关注不足的缺陷，推动了一种更为总体的意大利史编纂（它也是以金兹堡与乔瓦尼·列维为代表的微观史学的灵感来源之一）。需要提及的是，这些史学成就，同时也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

1 Arnaldo Momigliano, “Marxising in antiquit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 3842, 1975, p. 1291.

史家们在政治忠诚与学术研究之间所力图实现的某种平衡的结果。

还需提及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还有来自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学者的推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霍布斯鲍姆等。同时，伴随葛兰西思想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迅速扩展，其实践哲学、文化霸权理论、历史主义思想等对诸如E. 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时至今日，虽然苏东剧变后，意共的实力大大减弱，但由于葛兰西基金会等机构与《历史研究》等杂志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意大利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其未来未尝不可期。

（黄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英美史学界的古罗斯研究：知识传统与学术转型^{*}

| 周厚琴 |

摘要：古罗斯是中世纪东欧平原上重要的早期国家，也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大民族的共同起源。苏联解体以来，俄白乌三国展开了古罗斯遗产之争。随着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俄乌关系紧张，古罗斯史亦成为英美学界斯拉夫研究的焦点。英美对古罗斯国家的研究已有百年历程，在移民史学家和英美史学家共同建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传统，特别是强调拜占庭影响的研究传统。但进入21世纪以后，受到全球史研究的深刻影响，英美学界的古罗斯研究亦呈现出“全球转向”。年轻一代学者积极将古罗斯纳入“全球中世纪”的新视野，运用数字人文的新方法，研究罗斯物质交换和文化互动的内容，甚至进行“反事实”历史的新阐释，旨在重视古罗斯国家与中世纪西欧、北欧、欧亚草原等周边世界的交往与联系，及对古罗斯国家在中世纪世界历史定位的重新思考。这不仅有助于破除将古罗斯划入拜占庭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壁垒，反思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回归中世纪全面了解中东欧世界，亦更加客观地认识当前俄乌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变动。

关键词：古罗斯 英美史学 全球中世纪

欧洲有句谚语：“扒开一个俄国佬，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15世纪末随着莫斯科公国推翻蒙古统治后在欧洲的东边崛起，西欧的“恐俄症”便开始生成。¹马克思生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黑海通史研究”（项目编号：22JZD037）的阶段性成果。

¹ 关于西方的“恐俄症”，可参见吉·梅坦：《致命的偏见——俄罗斯—西方的千年之战》，侯艾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动地描述过西欧对莫斯科国家和俄罗斯帝国的最初认识：“惊惶的欧洲，当伊凡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被弄得目瞪口呆。”¹俄国史学家则说，蒙古的“铁幕”使处于鞑靼政权统治之下的东部罗斯在无知的欧洲人的意识中变成了“鞑靼国家”。²那西方世界如何看待蒙古入侵前的古罗斯国家？³

古罗斯是9—13世纪位于东欧平原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也被视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大民族的共同渊源。苏联解体后，俄白乌三国积极研究古罗斯史，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下争夺古罗斯历史遗产，形成了东斯拉夫中世纪研究的“中世纪动员”和“大分裂”现象。⁴比较而言，西方世界对古罗斯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以英美国家为例，古罗斯研究属于苏联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研究或乌克兰研究）中非常小众的一个学术领域。⁵古罗斯研究在中国学界也只是世界中世纪史和俄国史研究的一个小分支。⁶俄罗斯学界也很少全面关注外国

1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0页。

2 Пушкарев С. Г.,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Наука, 1991. с. 94.

3 “古罗斯”这一历史概念的时间范畴在中文学界多指9—13世纪初蒙古入侵之前的罗斯国家，在俄罗斯文学领域和历史领域常泛指9—15世纪甚至9—17世纪的俄国。本文采用狭义上9—13世纪初的古罗斯概念。此外，除了“古罗斯”，各国史学研究中还常用“基辅罗斯”一词指代9—13世纪的罗斯国家。鉴于“基辅罗斯”是19世纪史学家创造的术语，且当代俄乌两国学者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持有异议，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古罗斯”。

4 Филошкин А. И., Страна, Опрокинутая в Прошлое? Почему Общество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е и «Мобилизуе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Люди и тексты.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2017 (10), с. 132–143; Мартынюк А. В., «Великий Раскол»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ой Медиевистики: Семь Тезисов к Дискуссии // *Studia Slavica et Balcanica Petropolitana*, 2017, № 1 (21), Январь-Июнь, с. 145–153. 相关中文学术综述可参见周厚琴：《从“古罗斯”到“中世纪罗斯”：俄国中世纪研究的史学建构》，《世界历史》2024年第5期。

5 本文中“英美史学界”主要指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史学界。部分欧洲学者在英美出版的英文论著，移民英美国家的俄裔、乌裔和波兰裔等斯拉夫学者发表的英文论著，亦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人名备注时原则上均用英文，俄罗斯学者使用俄文。

6 古罗斯相关专著有齐嘉：《古罗斯国家起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周晓辉，孙连庆：《古罗斯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尹曲、王松亭：《基辅罗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杨翠红：《古罗斯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年；肖瑜：《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国内仅有一篇硕士论文综述过英美学者关于古罗斯具体问题的研究（杨彦平：《20世纪英美学者关于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更多是整体介绍英国和美国俄罗斯学/苏联学的著作，如万青松：《美国的俄罗斯学研究——一项基于学术史的批判性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封帅：《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王子晖：《冷战时期的美国苏联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学者的古罗斯研究成果。苏联学者常以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角度综述西方的研究，如舒沙林（В. П. Шушарин）的专著《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古罗斯》几乎是唯一的一部专著。该书探讨了西方（包括英美）学者对古罗斯问题的研究现状，并驳斥他们的主要观点（如古罗斯起源的“贸易理论”、诺曼说和古罗斯国家的非封建性等）。¹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编译出版了美国学界关于古罗斯研究的多篇代表性论文。²博尔沙科娃（О. В. Большакова）的《跨越障碍：冷战后的美国俄罗斯研究》几乎是一本当代美国俄罗斯研究的综合指南，但研究古罗斯史的学者只提及了两位。³最值得关注的是费多索夫（А. В. Федосов）的《罗斯王国：西方学者眼中的古罗斯》，该书借翻译美国学者专著之机，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古罗斯研究论著进行了系统介绍。⁴当然，一些书评也能窥见俄罗斯学者对英美相关研究的看法和评价。

然而，据学者统计，就古罗斯研究这一小众研究领域，仅2000—2020年英美学界相关学术成果就多达200余部（篇）。⁵这些成果充分展现了苏联解体后英美学者对古罗斯国家在中世纪世界历史地位的重视和新认知，亦反映了英美学界在俄罗斯研究和乌克兰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和新方法。鉴于此，有必要梳理英美学界古罗斯研究的学术脉络，剖析相关学者对古罗斯认知的思想谱系和知识传统，进一步揭示英美学界在中世纪东欧研究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学术转型，亦为国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世纪世界的罗斯国家提供镜鉴和参考。

1 Шушарин В. П., *Буржуаз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М., 1964.相关论著还可参见Шаскольский И. П., *Норманнская теор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М., Л.: Наука, 1965; Синицына Н. В., *Изучение в Англии истории феод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8, с.183—195; Державина Е. В., *Критика новейшей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Дис. ... канд. юр. наук, М., 1985。

2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усистика: Вех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Период Киевской и Московской Руси*,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мар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3 Большакова О. В., *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усистика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 РАН. ИНИОН, 2013; Куренкова Е. А.,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в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Нау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3, №. 20, с. 26—29.

4 Федосов А. В., Раффенспергер К.,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Русь.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21, с. 6—150.

5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UK and North American Rusiana, 2000–2020, *Russian Studies Hu*, Vol. 3, No. 2 (2021), pp. 11–31.

一、英美古罗斯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知识传统

与18、19世纪英美世界对俄国历史的关注相比，英美史学界对古罗斯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大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可划分为几个阶段：20世纪以前的几乎空白期、20世纪上半叶的移民熏陶期、冷战时期的显学研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发展期。

英美学界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对古罗斯的专题研究。英国对俄国的研究随着16世纪英俄关系的建立就已开始。但16—18世纪大多数探险家、旅行者和外交官关注的是对当时俄国（称之为“莫斯科维亚”¹）的直观描述和普及，很少研究其更早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英国的俄罗斯研究才真正具有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²同样，这一时期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亦方起步，“一战”以前，俄国研究在美国几乎不存在，更难说起对古罗斯国家的关注。

20世纪初历经“一战”、俄国革命爆发，20世纪20年代大批斯拉夫裔历史学家移民到英美国家，大大激发了英美学者对俄国早期历史的兴趣和关注。20世纪40年代，两位俄裔移民史学家卡尔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1888—1959，哈佛大学教授）和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1887—1973，耶鲁大学学者）策划了联合出版十卷本英文版《俄罗斯史》的项目。卡尔波维奇未完成，但维尔纳茨基写成了前五卷（共六册），讲述从远古时代到1682年彼得大帝登基的俄罗斯历史。作为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尔纳茨基在五卷中对俄罗斯历史做了极为“欧亚化”的诠释，试图将俄国历史置于从太平洋到匈牙利平原的草原民族历史背景之下。前三卷《古代罗斯》《基辅罗斯》《蒙古与罗斯》首次为英语世界展现了一部详尽的古罗斯史。³同期还有其他移民史学家研究古罗斯历史，如美国拜占庭研究的创始人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il'ev，1867—1953）出版了《860年罗斯进攻君士坦丁堡》等

1 当时文献中常使用 *Moscovia* 或 *Muscovy*（俄语为 *Московия*）。

2 封帅：《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3期，第3—36页。

3 George Vernadsky [and Michael Karpovich],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Haven. Vol. I: *Ancient Russia*, 1943; Vol. II: *Kievan Russia*, 1948; Vol. III: *The Mongols and Russia*, 1953. 维尔纳茨基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古罗斯研究的论文。

多部拜占庭—罗斯关系史的论著。¹费多托夫（Georgii Fedotov）出版了两卷本的著作《俄国宗教思想》，其中第一卷论述了10至13世纪罗斯的宗教意识。²可以说，正是维尔纳茨基和其他移民学者的著作将现代英美史学与革命前的俄罗斯史学联系在一起。1912年英国创办了重要的俄国研究学术交流平台《俄国评论》杂志。³移民学者们也开始纷纷在此刊发表古罗斯研究相关论文。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古罗斯史料，如哈佛大学的克罗斯（Samuel Cross，1891—1946）1930年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1953年再版又增加了注释、评注和前言。⁴作为一名专业的语言学家，克罗斯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古罗斯史的文章，尤其是关于瓦良格人对罗斯的影响。⁵不过，古罗斯的历史并不是这一时期英美历史学家最感兴趣、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这与德国学者和斯堪的纳维亚学者有很大不同，因为后两者与自己的东边邻国有着更密切和更长期的接触。20世纪美国出版的第一批俄国史著作更多关注的是俄罗斯向南特别是向东的扩张、俄罗斯外交史、1917年革命以及随后的内战。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开始，“苏联学”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古罗斯历史亦随之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在美国，成立较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1946）和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1948）。20世纪40年代，美国成立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AASS）⁶，并创办会刊《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⁷。1959至

1 Alexander Vasil'ev, *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 Cambridge Mass., 1946; Alexander Vasil'ev,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Old Russia*,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Vol. 4 (1931), pp. 314–334; Alexander Vasil'ev, *Was Old Russia a Vassal State of Byzantium?*, *Speculum*, Vol. 7 (1932), pp. 350–630.

2 Georgii Fedotov, *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 Vol. I: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1946.

3 1922年在《俄国评论》（*Russian Review*）基础上出版新的学术杂志《斯拉夫评论》（*The Slavonic Review*），1928年更名为《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该杂志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

4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 H. Cross, *Harvard Studies and Notes in Philology and Literature*, Vol. 12, Cambridge, Mass., 1930;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tzor, Cambridge, Mass., 1953. 该书于2012年再版。

5 Samuel H. Cross, *Yaroslav the Wise in Norse Traditions*, *Speculum*, Vol. 4 (1929), pp. 177–197; Samuel H. Cross, *Medieval Russian Contacts with the West*, *Speculum*, Vol. 10 (1935). 他还撰写过多篇关于罗斯与拜占庭关系以及古罗斯教堂建筑的论著。

6 2008年该组织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ASEEES），官网 <https://aseees.org/>。

7 《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61年更名为《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如今是英语学界斯拉夫研究方面最为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

1964年间，英美国家的苏联相关研究中心从17个增至33个，数量几乎翻了一番。20世纪70和80年代，仅在美国就有200多个俄罗斯及其历史研究中心。¹在移民史学家作品的引领和深入了解苏联历史的动力下，英美学者开始尝试研究古罗斯历史的一些具体方面。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瓦尔德·巴克斯（Oswald Backus）研究了罗斯分裂后西部罗斯贵族与莫斯科、立陶宛互动的历史。²杰罗姆·布鲁姆（Jerome Blum）最初专注于研究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为了进行比较史研究，他对俄国农民的地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创作了一部重要的专著《9—19世纪俄国地主与农民》。³不过，受移民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著作的影响，这一时期英美历史学家对俄国早期历史的兴趣点集中在“莫斯科第三罗马”这类思想、意识形态和神话交汇的主题下，致力于研究莫斯科政治理论的本质和起源。⁴70—80年代，英美学者已开始出版古罗斯的专题论著，如美国学者哈纳克（Walter Hanak，1929—2016）的《基辅罗斯王权的性质和形象（980—1054年）》，根据对书面史料的分析，研究了古罗斯王权思想的多重来源——拜占庭、哈扎尔、瓦良格、东斯拉夫。⁵戈登（Peter Golden，1941— ）发表了重要的论文《罗斯汗国问题》。⁶英美学者还整理出版了多部英文版的罗斯史料集，如《中世纪俄国：史料手册（850—1700）》和《中世纪俄国的史诗、编年史和故事》。⁷一些影响颇大、与古罗斯历

1 Игрицкий Ю. И., Буржуазная советолог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орьбе иде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79, № 11, с. 71; Филиатов В. П., Русские центры в США//*СШ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 1970, № 4, с. 111—112.

2 Oswald Backus, *Motives of West Russian Nobles in Deserting Lithuania for Moscow, 1377—1514*, Lawrence, Kansas, 1957.

3 Jerome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61.

4 Джордж П. Маджеск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усистика: Вех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Период Киевской и Московской Руси*,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мар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Введение.

5 该书1973年出版，2013年再版。Walter Hanak, *The Nature and the Image of Princely Power in Kievan Rus', 980—1054*, Leiden, 2013.

6 Peter Golden, The Question of the Rus' Qaghanat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2 (1982), pp. 77—97.

7 Basil Dmytryshyn, *Medieval Russia: A Source Book, 850—1700*, Fort Worth, 1997.《中世纪俄国：史料手册（850—1700）》是一本关于中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史料集，1967年初版，1997年再版。它提供广泛的、说明性的原始材料的英文译本，文本主要分两大类：中世纪俄国人编写的编年史、信件和官方文件的摘录；欧洲同时代人关于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思想的观察和评论。Serge A. Zenkovsky, ed., *Medieval Russia's Epics, Chronicles, and Tales*, New York, 1974.《中世纪俄国的史诗、编年史和故事》精选了60余篇中世纪文本译成英文并附背景介绍，该书1963年出版，1974年出修订版。

史密切相关的通论性著作和比较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俄裔英国学者奥博伦斯基（Dmitry Obolensky, 1918—2001）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名著《拜占庭共同体》，该著奠定了将古罗斯纳入拜占庭世界影响之下研究的经典范式。¹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从西欧而非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古罗斯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²波兰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 1923—2018），在《旧制度下的俄国》第一部分介绍了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并将12—17世纪俄国的政权类型称为“世袭制”国家。³因派普斯个人在政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颇为广泛，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冷战时期英美学者对古罗斯的历史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的爆发为“苏联学”中的独立分支——乌克兰研究——提供了契机，而古罗斯国家作为乌克兰研究的一个重点而备受关注。据统计，仅1947—1955年就约有8万乌克兰人去了美国，3万人去了加拿大。⁴冷战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发展空间。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乌克兰学生协会联盟的领导下，美国许多大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乌克兰研究运动。1968年，乌克兰裔学者普里察克（Omeljan Pritsak, 1919—2006）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任乌克兰历史讲席教授。1973年他积极筹建了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普里察克不仅创办了《哈佛乌克兰研究》英文期刊⁵，还出版了一系列古罗斯专著，如《基辅罗斯的历史书写》《罗斯的起源》《中世纪欧亚史研究》《从基辅罗斯到现代乌克兰：乌克兰民族的形式》。

1 Dmitry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New York, 1971。他还出版有多部与罗斯相关的著作，如《拜占庭与斯拉夫人》和《拜占庭与斯拉夫基督教：影响还是对话？》（Dmitry Obolensky, *Byzantium and the Slavs*, N. Y., 1994; Dmitry Obolensky, *Byzantium and Slavic Christianity: Influence or Dialogue?*, Berkeley, 1995）。

2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1974。中译本可参见：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英文首版于1974年，1993年以俄文出版，2004年再版。中译本参见：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郝葵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派普斯在20世纪70—80年代长期以学者身份出任美国政府高级顾问，为包括里根总统在内的美国鹰派政治家提供重要的政策咨询与路线指导。国内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广翔、李振文：《俄国保守主义的实质与变迁——关于理查德·派普斯俄国保守主义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16第6期；史旭超：《理查德·派普斯俄国史学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

4 何荣昌：《加拿大和美国的乌克兰研究》，《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第87—90页。

5 英文名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官网 <https://www.husj.harvard.edu/volumes>。

成》和《古罗斯度量衡与货币体系的起源》等。¹在英国，1949年格拉斯哥大学创办《苏联研究》杂志，成为冷战时期英国最权威的苏联学研究刊物之一。²1963年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专门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众多新兴的研究机构和传统俄罗斯研究重镇一起，构筑了当代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基本格局。在加拿大，1976年阿尔伯塔大学文学院创办了乌克兰研究所³，并出版《东/西：乌克兰研究》期刊。⁴可以说，这一时期普里察克等乌裔移民史学家积极在国外奔走呼号，为当代英美史学与乌克兰国内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综上，如果说，十月革命后移民英美的斯拉夫裔史学家成功激发了英美学者开启俄罗斯早期历史研究的兴趣，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冷战开启到90年代苏联解体的一系列事件，则为英美学者深入研究古罗斯历史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这一百年历程中，英美学者古罗斯研究的多元知识传统和学术谱系清晰可见。

其一，深受俄罗斯帝国史学观念和学术传统的熏陶。俄罗斯帝国史学观念和学术传统的影响大致从两个维度生成，一是20世纪20年代移民英美的斯拉夫裔史学家，将俄罗斯帝国史学中的古罗斯研究成果译介到了英美国家；二是维尔纳茨基等欧亚主义者关于古罗斯历史的英文著作，建立了英美世界对古罗斯的初步认知。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三次革命洗礼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移居国外的200余万俄罗斯人组成的“侨民俄罗斯”中，侨民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还是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赫尔岑命题”，即：俄罗斯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

1 Omeljan Pritsak,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Kievan Rus'*, Cambridge, Mass., 1980; 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 of Rus'*. Vol. I. *Old Scandinavian Sources other than the Sagas*, Cambridge, Mass., 1981; Omeljan Pritsak, *Studies in Medieval Euroasian History*, London, 1982; Mykhailo Hrushevsky, Omeljan Pritsak, Jr. John S. Reshetar, *From Kievan Rus' To Modern Ukraine: Formation of the Ukraine Nation*, Cambridge, Mass. 1984; Omeljan Pritsak, *The Origins of the Old Rus' Weights and Monetary Systems. Two Studies in Western Eurasian Metrology and Numismatics in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1998. 2019年，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还设立了“普里察克乌克兰研究图书奖”，旨在表彰每一年度出版的乌克兰研究领域的优秀书籍，也为纪念普里察克在乌克兰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

2 1993年《苏联研究》(*Soviet Studies*)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至今仍是英国俄罗斯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

3 <https://www.ualberta.ca/canadian-institute-of-ukrainian-studies>

4 英文名 *East/West: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官网 <https://ewjus.com>。

罗斯应该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20年代初，侨民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欧亚主义思潮。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独特地理环境中寻找“赫尔岑命题”的答案，试图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¹侨民史学家也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追寻答案，在英美世界的俄罗斯研究中开启了古罗斯历史的熏陶。

其二，形成了古罗斯研究的拜占庭范式。拜占庭范式因俄裔学者奥博伦斯基的专著《拜占庭共同体》在英美学界影响甚广，英国史学至今一直延续着对拜占庭与罗斯关系这一主题特别关注的学术传统，始终传承着将罗斯置于拜占庭影响之下的研究范式。20世纪美国学者对古罗斯的关注相对更为多元，但美国拜占庭研究依然是俄裔侨民史学家所创立的，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仍然是他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容忽视。冷战后形成了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也难免打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20世纪50年代移民英美的乌裔史学家，为英美世界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帝国叙事和苏联叙事的古罗斯史。乌克兰地方史编撰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业已形成，20世纪上半叶发展成熟，完成了从民俗学到史学的民族历史文化建构，在此基础上²，以普里察克为代表的乌克兰裔移民学者，继续将古罗斯史纳入乌克兰民族主义史学的叙事框架中。而冷战形势下英美国家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力支持，大大推动了英美学界对古罗斯史的关注。

二、苏联解体后英美古罗斯研究的学术拓展

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研究一样，英美国家的古罗斯研究也经历了短暂衰落和重新整合，俄白乌三国独立发展的现实也促使英美学者进一步拓展古罗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现今在美国教授和研究早期俄罗斯史的大多是战后一代历史学家的学

1 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32—38页。

2 庄宇：《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地方史的编撰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7—140页。

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学术骨干队伍。1987年，他们成立了早期斯拉夫研究协会（ESSA），致力于18世纪以前斯拉夫世界的研究，以“促进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作为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协会活动的一部分，会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早期斯拉夫研究协会支持该领域的内部学术研究和更广泛的学术项目。该协会每年出版两期通讯，并设立网站¹，使其成员能够及时了解其专业领域的学术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的俄罗斯研究体系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改革和重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状态的集中反映。2012年英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协会（BASEES）²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有将近30家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在从事俄罗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事俄罗斯及斯拉夫东欧问题研究的共有600多人。截至2015年，在英国高等院校中，共成立了七个专门的俄罗斯问题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构成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主要基地。³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古罗斯国家的研究著作喷涌而出，无论是专题问题，还是一般性问题的研究都有了很大拓展。

首先，由英美学者撰写的古罗斯研究大部头学术专著问世。最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初，剑桥大学出版了三卷本的《剑桥俄国史》，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分章编写，至今仍是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其中第一卷《从古罗斯到1689年》由英国伯明翰大学佩里（M. Perrie，1946— ）主编，剑桥大学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ard，1948— ）和西蒙·富兰克林（Simon Franklin，195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丁·迪姆尼克（Martin Dimnik，1941— ）、美国迈阿密大学珍妮特·马丁（Janet Martin，1956— ）和哈佛大学的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1945— ）等参编，俄罗斯学者B.亚宁（Валентин Янин，1929—2020）也参与撰写了“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一节，这些学者均是古罗斯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代表作基本上是英美学界古罗斯研究的前沿专题之作，如谢泼德与富兰克林合著的朗文俄国史系列第一卷《罗斯的出现（750—1200）》⁴，富兰克林的《古罗斯的

1 <https://www.earlyslavicstudies.org/>

2 <https://basees.org/>

3 封帅：《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英国学派”：历史沿革、思想谱系与时代特征》，第3—36页。

4 Simon Franklin, 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1996.

写作、社会与文化（950—1300）》¹，迪姆尼克的《中世纪俄国的危机（1200—1304）》《切尔尼戈夫王朝（1054—1146）》和《切尔尼戈夫王朝（1146—1246）》《基辅罗斯的权力政治：莫诺马赫与他的王朝（1054—1246）》²，马丁的《暗黑之地的宝藏：毛皮贸易及其对中世纪俄国的意义》《中世纪俄国（980—1584）》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欧洲、拜占庭与罗斯文化的“知识沉默”》等。³这些著作也是英美高校俄国史学生的必读书目。

其次，重视对古罗斯进行语言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多维研究，并出版多部重要的研究工具书。200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牵头重译的《往年纪事》，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译注的版本，他采用了多版本逐行对比、嵌套加译注的方式，为从事早期罗斯研究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呈现了一部两千多页的严谨参考书。⁴波兰裔学者的《〈加利奇-沃伦编年史〉与中世纪罗斯的历史汇编》，论证了《加利奇-沃伦编年史》如何成为中世纪罗斯创造新史学实体的历史汇编的一部分。⁵这一时期既有古罗斯政治方面的专题著作，如《罗斯的启蒙者：弗拉基米尔的跨世纪形象》，对弗拉基米尔从11至18世纪初的政治形象演变进行了详尽研究⁶；也有古罗斯概念和史料考证的专著，如基南（Edward L. Keenan，1935—2015）的《多布罗夫斯基与〈伊戈尔远征记〉的起源》，该书深入研究《伊戈尔远征记》的出版史，并对其语言进行细致分析，证明该文本不是真正的12世纪的文献，而是18世纪后期的产物。⁷印第安纳大学哈尔佩林（Charles J. Halperin，1946— ）的《罗斯国家神话的兴起与消亡》，从概念史的视角追溯了10—17世纪“罗斯土地”一词的使用，解构了从“罗斯土地”

1 Simon Franklin, *Writ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Rus, 950–1300*, Cambridge, 2002. 该书2010年被翻译为俄文，参见 Саймон Франклин, Перевод Д. М. Буланина,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о и культура в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около 950–1300 гг.)*,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10。

2 Martin Dimnik, *Power Politics in Kievan Rus': Vladimir Monomakh and His Dynasty, 1054–1246*, Toronto, 2016.

3 Donald Ostrowski, *Europe, Byzantium and the "Intellectual Silence" of Rus' Culture*, Leeds, 2018.

4 Donald Ostrowski, David J. Birnbaum, Horce G. Lunt, *Povest' vremennykh let: an Interlinear Collation and Paradosis*, Cambridge, Mass., 2004.

5 Adrian Jusupović, *The Chronicle of Halych-Volhynia an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in Medieval Rus'*, Ea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450–1450, Leiden, 2022.

6 Francis Butler, *Enlightener of Rus': Images of Vladimir Sviatoslavich across the Centuries*, Bloomington, 2002.

7 Edward L. Keenan, *Josef Dobrovsk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gor' Tale*, Cambridge, Mass., 2003.

到“俄罗斯国家”的现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历史神话。¹此外，既有对古罗斯研究拜占庭范式的传承，也有对欧亚世界更广阔视域的拓展。如马克·惠托（Mark Whittow，1953— ）的《拜占庭的形成（600—1025）》继承了奥博伦斯基的研究范式来看待古罗斯²；西蒙·富兰克林的学生们撰写的《拜占庭与维京世界》《拜占庭和罗斯的军事圣徒，900—1200年》《拜占庭和早期罗斯的礼仪历史》都继续关注拜占庭与罗斯的主题。³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 ）《俄国、中亚和蒙古史》的第一卷《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则展现了俄国、中亚和蒙古从人类定居到1260年蒙古帝国分裂时的历史。⁴佛罗里达大学中世纪历史和考古学教授弗洛林·库尔塔（Florin Curta，1965— ）的《斯拉夫人的形成：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重新审视了斯拉夫语欧洲部分地区（即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考古证据。⁵《中世纪俄国历史词典》《中世纪东欧历史和考古学指南》和《中世纪中东欧研究手册》⁶，则是研究中世纪东欧历史和考古学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

1 Charles J. Halperin,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Myth of the Rus' Land*, Leeds, 2022.

2 Mark Whittow, *The Formation of Byzantium, 600–1025*, Berkeley, 1996.

3 Monica White, *Military Saints in Byzantium and Rus, 900–1200*, Cambridge, 2013; Monica White, Jonathan Shepard, Fedir Androshchuk, *Byzantium and the Viking World*, Uppsala, 2016; Sean Griffin, *The Liturgical Past in Byzantium and Early Rus*, Cambridge, 2019.

4 David Christian,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Vol. 1: Inner Eur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Malden, MA, 1998. 中译本可参见：大卫·克里斯蒂安：《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潘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从欧亚视野看待古罗斯的还有《草原上的维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罗斯人和突厥世界（750—1050年）》（Csete Katona, *Vikings of the Steppe: Scandinavians, Rus', and the Turkic World (c. 750–1050)*, Abingdon, Oxon, 2022）。

5 Florin Curta, *The Making of the Slav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Lower Danube Region, c. 500–700*, Cambridge, 2001. 该书2020年更名再版Florin Curta, *Slavs in the Making: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Archaeology in Eastern Europe, c. 500–700*, London, 2020.

6 Lawrence Lang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dieval Russia*, Lanham, Maryland; London, 2002. 该词典2021年再版。Florin Curta,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Boston, 2019; Florin Curt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500–1300*, London, 2021. 《中世纪中东欧研究手册》涉及25种语言，超过60000个条目，涵盖了从500到1241年蒙古入侵相关语言的所有出版物，全面展现中世纪东欧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欧、欧亚大陆草原以及拜占庭的关系。近四分之一（24.1%）是俄文，英语（12.3%）、德语（10.2%）和法语（4.3%）一起占四分之一以上。超过一半的作品（56.2%）是1989年以后出版的。除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外的所有标题均有英译。

再次，翻译出版帝俄和苏联时代学者的古罗斯研究经典著作。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主持的“格鲁舍夫斯基的十卷本《乌克兰-罗斯史》英译”项目，从1997至2021年，历经二十余年终于出版完成。¹格鲁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 1866—1934）是19世纪末乌克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乌克兰-罗斯史》虽然最终只写到17世纪，但被视为对乌克兰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最全面的描述。有趣的是，英译本十卷十二册中第一卷《从史前到11世纪》是最早翻译出版的，第二卷《11—13世纪》却是最后出版的。²这两卷已成为当今英语学界研究古罗斯的必读之作，许多英美学者为各卷英译本写了书评。评论者称之为“东斯拉夫中世纪研究领域中最有价值的”乌克兰语作品，除了乌克兰及欧洲和北美的乌克兰侨民圈读者外，几乎没有人打开或使用过。³这一历经二十余年的翻译项目“为英语世界带来了无论是其写作的当时，还是在当下研究中关于罗斯的最佳论述”。评论者认为，格鲁舍夫斯基的学术影响力远不及他同时代的帝俄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 1841—1911），但与之将罗斯与拜占庭相联系，罗斯国家的起源与俄罗斯一脉相承，重在阐释俄罗斯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的叙事体系相比较，格鲁舍夫斯基笔下的罗斯显然是中世纪欧洲的一部分。⁴浦洛基（Serhii Plokhyy, 1957—）在《解构俄罗斯帝国：格鲁舍夫斯基与乌克兰的历史书写》一书中也持类似的评价。⁵浦洛基正是该英译项目的主持者，也是乌克兰裔史学家，曾在

1 Mykhailo Hrushevskyi, *History of Ukraine-Rus'*, 10 vols. [in 12 books], Edmonton and Toronto, 1997–2021. 《乌克兰-罗斯史》于1898—1937年以乌克兰语陆续出版，1906年第一卷译成德语出版，1911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俄语译本。

2 前两卷为古罗斯史部分。Volume 1, *From Prehistory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trans. Marta Skorupsky, ed. Andrzej Poppe and Frank E. Sysyn, with Uliana M. Pasiecznyk, Edmonton and Toronto, 1997; Volume 2, *The Elev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trans. Ian Press, ed.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and Frank E. Sysyn, with Tania Plawuszczak-Stech, Edmonton and Toronto, 2021.

3 Paul Hollingsworth, *Hrushevsky's Vision of Medieval Ukraine: Reclaiming History and Revolutionizing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Ukraine-Rus'*, Volume 2, *The Eleve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by Mykhailo Hrushevsky, Edmonton and Toronto, 2021, p. xxviii.

4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Mykhailo Hrushevsky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Rus,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2021, Vol. 38, No. 1/2 (2021), pp. 71–86.

5 Serhii Plokhyy,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05, pp. 146–148.

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工作，现任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所长。¹同时他也是一位古罗斯研究专家，他的《欧洲之门》审视了自希罗多德时代至今的乌克兰通史²，另一部重要著作《斯拉夫各民族的起源：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前现代身份》，则剖析了东斯拉夫世界罗斯遗产继承这一纷繁复杂的问题。³

可见，1991年是英美史学界俄罗斯历史研究的转折点，更是重新看待古罗斯历史的新起点。如佩里在《剑桥俄国史》序言中指出，外国史学，“包括前彼得时期的俄国史学，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最为严重，苏联解体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终结”⁴。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变革，带来的必然是古罗斯史研究的全新拓展，同时呈现出一体两面、颇为矛盾的学术趋向。

一方面，英美学者古罗斯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保持着帝俄史学传统。正如俄罗斯学者费多索夫所言，“如今俄罗斯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革命前的传统。现在，国内史学正与英美史学趋同，而英美史学的基本立场几十年来一直未变”⁵。就古罗斯研究而言，如果说，苏联解体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主流地位的丧失，近年来俄国史学家对古罗斯史的研究有回归到帝俄时期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观点的趋向⁶，那么，英美学界对古罗斯的关注恰恰源起于移民史学家带来的帝俄史学传统，且没有经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二者学术路径反而愈加趋

1 浦洛基因其苏联史研究成果丰硕而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多部著作已被译介到中国，如《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等。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年正策划出版浦洛基作品集五部，包括《被遗忘的倒霉蛋：苏联战场的美国空军与大同盟的瓦解》《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失落的王国：追寻俄罗斯民族的历程》。

2 Serhii Plokhy, *Gates of Europe*, New York, 2015. 中译本参见：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曾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俄文版参见：Врата Европы.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ы/Сергей Плохий; пер.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С. Лунин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CORPUS, 2018。

3 Serhii Plokh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2006. 学者对该书评价颇高：“现有的大多数关于罗斯的学术著作都歪曲了过去的历史，将罗斯仅仅理解为俄罗斯，而实际上，罗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人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东西。浦洛基的书很好地纠正了这些错误。”书评参见：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view: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by Serhii Plokhy, *Social History*, Vol. 32, No. 4 (Nov., 2007), pp. 480–482。

4 Maureen Perri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 1: From early Rus' to 1689*, Cambridge, 2006. p. 11.

5 Федосов А. В., Раффенспергер К.,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Русь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21, с. 17–18.

6 周厚琴、曹维安：《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第98—110页。

同。不过，21世纪以来，西方和俄罗斯史学之间呈现出不小的差距，“只有一小部分更年轻、更具流动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努力吸收外国史学研究的现代方法”¹。显然，英美学者对俄罗斯学者古罗斯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引用，远大于俄罗斯学者对英美学术研究成果的关注。

另一方面，英美学者的古罗斯研究致力于超越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叙事。随着苏联解体，经历了衰落与整合的英美俄罗斯研究在经费、机构方面更加精简，也逐渐摆脱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冷战时代专门研究俄罗斯、苏联的学者，研究视域开始拓展到“后苏联空间”及更广阔的欧亚世界。特别是，英美学者在与21世纪勃兴的乌克兰民族史学叙事的互动交流中，更倾向将古罗斯视作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遗产。在具体研究中既传承强调罗斯与拜占庭关系的拜占庭研究传统，也力图突破这一范式的禁锢，在中世纪西欧、维京世界和突厥世界之间寻找古罗斯的新坐标。作为“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的《史前至蒙古帝国时期的内欧亚大陆史》堪称这类研究的典范之作，如此研究路径反而有利于学者们超越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古罗斯叙事。

三、英美古罗斯研究的“全球转向”

与“大历史”相呼应，全球史（Global History）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得到发展，同时也首先在美国发展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分支学科。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历史研究领域，主要关注跨国家、跨文化和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将某些历史现象置于更广阔的情境中来理解，弥补了传统民族国家史研究中的不足。²古罗斯国家虽然一直不是英美学界斯拉夫研究的主要焦点，但在去殖民化、全球史的研究浪潮下，也已逐渐成为欧洲中世纪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由此，英美学界的古罗斯研究也呈现出“全球转向”的学术转型，一批青年学者致力于在“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的视野下重新认识古罗斯。

1 Большакова О. В., *Поверх барьер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усистика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 РАН. ИНИОН, 2013, с. 40.

2 刘文明：《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第98—102页。

近十年来成果颇丰，备受英美学界甚至俄罗斯学界关注，最能代表古罗斯研究学术转型的是美国学者拉芬斯伯格（Christian Raffensperger，1977— ）。他的专著《重构欧洲：中世纪世界的基辅罗斯（988—1146）》，旨在挑战英国学者奥博伦斯基的拜占庭共同体研究范式，强调古罗斯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政治联姻、经济贸易和宗教关系等方面论述了中世纪罗斯与欧洲的联系。该著作2012年出版后，在英美学界甚至俄罗斯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诸多讨论。¹拉芬斯伯格近年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古罗斯研究专著，皆强调古罗斯以及整个东欧世界与西欧的联系与互动，如《亲属关系：基辅罗斯的家谱和王朝婚姻》《罗斯王国》《中世纪东欧的冲突、谈判与亲属网络》以及与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合著的《中世纪东欧肖像（900—1400）》《罗斯的统治家族：氏族、家庭和王国》等。²拉芬斯伯格是美国威腾堡大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研究员。³他活跃于多个学术组织，在北美拜占庭研究会的理事会和俄亥俄州历史学会的理事会任职，是“超越中世纪欧洲”的丛书

1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988–1146*, Cambridge, Mass., London, 2012. 相关英文书评可参见：Eve Levin, Review: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by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No. 2 (APRIL 2013), pp. 566–567; Simon Franklin, Review: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by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Slavic Review*, Vol. 72, No. 1 (SPRING 2013), pp. 118–120; David Goldfrank, Review: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by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Speculum*, Vol. 91, No. 2 (APRIL 2016), pp. 551–553; Roman K. Kovalev, *Reimagining Kievan Rus' in Unimagined Europe*, *Russian History*, Vol. 42, No. 2 (2015), pp. 158–187; Charles J. Halperi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Kievan Rus', *Russian History*, Vol. 42, No. 2 (2015), pp. 149–157. 俄罗斯学者书评可参见：Fjodor Uspenskij, Reviews: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Reimagining Europe: Kievan Rus' in the Medieval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lověne*, No. 2 (2012), pp. 153–159.

2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Ties of Kinship: Genealogy and Dynastic Marriage in Kyivan Rus'*, Cambridge, Mass., 2016;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The Kingdom of Rus*, Kalamazoo, Mich., 2017;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Conflict, Bargaining, and Kinship Networks in Medieval Eastern Europe*, Lanham, Md., 2018; Donald Ostrowski,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Portraits of Medieval Eastern Europe, 900–1400*, London, 2017;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Donald Ostrowski, *The Ruling Families of Rus: Clan, Family and Kingdom*, London, 2023. 其中《罗斯王国》2020年被翻译为俄语出版，参见 Федосов А. В., Раффенспергер К.,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Русь.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21. 拉芬斯伯格2024年还将出版两部微观研究的新著《无名氏：一位罗斯王后的生平》和《伊兹亚斯拉夫与格特鲁德：中世纪欧洲枢纽上的罗斯国王和王后》（Christian Raffensperger, *Name Unknown: The Life of a Rusian Queen*, London, 2024;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Izyaslav and Gertrude: The King and Queen of Rus' at the Nexus of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Mass., 2024）。

3 个人学术主页 <https://craffensperger.com/>。

主编，也是《全球中世纪》杂志编委会的创始成员，同时致力于开发“罗斯家谱数据库”“中世纪欧洲边缘的比较政治发展”等多个数字人文方面的项目。

与拉芬斯伯格一样致力于在“更广阔的欧洲”研究古罗斯的还有米哈伊洛娃（Yulia Mikhailova），其代表作《1000—1236年罗斯与拉丁欧洲的财产、权力和权威》将罗斯纳入拉丁欧洲世界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作者认为罗斯是欧洲社会的一个地区变种，强调之前的阐释体系过于强调中世纪西方的独特因素，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泛欧进程。¹她利用对《加利奇-沃伦编年史》等资料进行语言学的深入分析，通过研究城镇相关词汇及其含义，以及为何如此命名等问题，对“罗斯与中世纪西方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她熟练运用多语言原始史料，这是她的观点能够被中世纪研究者（他们倾向于关注西欧）和罗斯研究者都广泛接受的关键。另一位青年学者纳塔利娅·扎雅克（Natalia Zajac）也正在积极挑战“罗斯不是中世纪欧洲一部分”的传统观点。她特别关注物质文化，发表了多篇关于罗斯人与其他人（主要是女性）之间物质联系与交流的代表性物品的论文。²扎雅克还积极与研究英国、法国和伊比利亚的学者一起出版文集，从而在另一种层面上巩固了罗斯在欧洲的地位。³此类研究有助于将罗斯研究与更广泛的学术话语联系起来，因为罗斯研究往往落后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发展。

这批青年学者积极将前沿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古罗斯研究中，以实现古罗

1 Yulia Mikhailova, *Property, Power, and Authority in Rus and Latin Europe, ca. 1000–1236*, Leeds, 2018. 她还发表了一系列古罗斯研究论文，参见：Yulia Mikhailova, “He Sighed from His Heart and Began to Gather Soldiers”: Emotions in Russian Political Narratives, *Studia Slavica Et Balcanica Petropolitana*, Vol. 20 (2016), pp. 17–29; Yulia Mikhailova, “Christians and Pagans” in the Chronicles of Pre-Mongolian Rus: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Good Us” and “Bad Them”, in *Geschichte der Slavia Asiatica: Quellenkundliche Probleme*, ed. Christian Lübke, Ilmira Miftakhova, Wolfram von Scheliha, Leipzig, 2013, pp. 22–51; Yulia Mikhailova (with David Prestel), Cross Kissing: Keeping One’s Word in Twelfth Century Rus’, *Slavic Review*, Vol. 70 (2011), pp. 1–22.

2 Talia Zajac, The Social-Political Roles of the Princess in Kyivan Rus’, ca. 945–1240, *A Companion to Global Queenship*, ed. Elena Woodacre, Leeds, 2018, pp. 125–146; Talia Zajac, Remembrance and Erasure of Objects Belonging to Rus’ Princesses in Medieval Western Sources: The Cases of Anastasia Iaroslavna’s “Saber of Charlemagne” and Anna Iaroslavna’s Red Gem, *Moving Women, Moving Objects (400–1500)*, ed. Tracy Chapman Hamilton, Mariah Proctor-Tiffany, Leiden, Boston, 2019, pp. 33–58; Talia Zajac, Regina Binomia: Re-Examining the Evidence for Re-Baptism and Renaming of Latin Christian Brides in Pre-Mongol Rus’, *Byzantinoslavic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Vol. 77, No. 1–2 (2019), pp. 264–290.

3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UK and North American Rusiana, 2000–2020, *Russian Studies Hu*, Vol. 3, No. 2 (2021), pp. 11–31.

斯研究的“全球转向”。首先，在理论上，将古罗斯置于“全球中世纪”的研究视野中，使罗斯与更广泛的中世纪世界联系起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中世纪”的概念在欧美中世纪史学中逐渐兴起，并成为打破“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进路。学者们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中世纪研究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互鉴，以重构5—15世纪的全球流动图景。¹米哈伊洛娃指出，罗斯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的边缘位置，使之成了“西方中心叙事的最后堡垒”。中世纪历史的主要叙事排除了罗斯，因为“俄罗斯过去不是西方的受害者，现在也不是西方的一部分”²。这种传统叙事的最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将罗斯与其他东正教政体一起视为反西欧的拜占庭共同体的一部分。与这一悠久的传统相对，拉芬斯伯格的《重构欧洲》力图证明，对拜占庭的头衔、习俗、法律、造币、艺术和建筑的模仿并不只是东正教世界所独有，而是一种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现象，他们都试图通过与罗马帝国的残存联系来获得合法性和威望；而来自不同史料的罗斯精英女性的信息表明，罗斯统治者的大多数婚姻关系都与拉丁欧洲有关，这也反映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联系；来自其他领域如钱币学、专名学、艺术史、经济史和考古学的证据，均可以指向罗斯在一个更大的欧洲中世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其二，在内容上，重视罗斯在中世纪世界的物质交换与文化互动。21世纪初去世的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1938—2001）是研究罗斯与可萨汗国关系的权威专家，也是一名钱币收藏家，著有《750—900年伊斯兰世界、罗斯和维京人：钱币证据》《拜占庭钱币在基辅罗斯的流通》等大量关于早期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可萨经济史的著作。他的研究将罗斯与中亚、高加索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³他的两名学生在新世纪继续进行相关考古工作，探索罗斯在中世纪世界的物

1 李腾：《“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批判性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85—96页。

2 Yulia Mikhailova, *Reimagining Medieval History: Against the Last Bastion of the West-centric Master Narrative*, *Russian History*, Vol. 42, No. 2 (2015), pp. 188–203.

3 Thomas S. Noonan, *The Islamic World, Russia and the Vikings, 750–900: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London, 1998; Thomas S. Noonan, *Fifty Years of Soviet Scholarship on Kievan History: A Revent Soviet Assessment*, Twin Cities, Minn., 1980; Thomas S. Noonan, The Circulation of Byzantine Coins in Kievan Rus, *Byzantine Studies*, Vol. 7, No. 2 (1980), pp. 143–181; Thomas S. Noonan, Medieval Russia, the Mongols, and the West: Novgorod's relations with the Baltic, 1100–1350, *Mediaeval Studies*, Vol. 37 (1975), pp. 316–339.

质交换与文化互动。一位是执业考古学家罗曼·科瓦廖夫（Roman Kovalev），他继承努南在钱币学方面的工作，扩大对东欧贸易网络的了解，将更多罗斯考古史知识传播到北美学术界¹；另一位海蒂·谢尔曼（Heidi Sherman）发表了多篇关于中世纪诺夫哥罗德服装与纺织品，特别是关于亚麻和亚麻生产的文章。²她的研究填补了英语学界关于罗斯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谢尔曼在建造和维护维京长屋方面的实验考古工作，对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与罗斯历史的公众形象都将产生持久的影响。此外，还有雷娜塔·霍洛德（Renata Holod）及其团队、艺术史学家沃伦·伍德芬（Warren Woodfin），他们对黑海以北草原上的一座库尔干（古坟）进行发掘和分析已有数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对世界范围内的罗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³塞特·卡托纳（Csete Katona）的《草原上的维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罗斯与突厥世界（750—1050年）》，重点论述了维京时代欧亚草原的突厥（游牧）文化对斯堪的纳维亚-罗斯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以及日常习俗、礼仪传统和宗教观念方面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将这两种通常被认为截然不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商业需要和可能的交流渠道。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欧洲、拜占庭与罗斯文化的“知识分子沉默”》，则通过比较罗斯、拜占庭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活动，将罗斯与更广阔的中世纪欧洲世界联系在一起。⁵

其三，在方法上，积极运用数字人文研究，开发罗斯家谱数据库和网络图集。拉芬斯伯格认为，“虽然数字人文学科看起来是学术界一种新的趋势，但它实际上也

1 Roman K. Kovalev, The Role of Khazaria and Volga Bulgaria i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ar East and European Russia During the Tenth Through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18 (2011), pp. 43–155; Roman K. Kovalev, Grand Princess Olga of Rus' Shows the Bird: Her "Christian Falcon" Emblem,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Vol. 39, No. 4 (2012), pp. 460–517; Roman K. Kovalev, Were there Direct Contacts Between Volga Bulgaria and Swede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20 (2013), pp. 67–102.

2 Heidi Sherman, From Flax to Linen in the Medieval Rus Lands, *Medieval Clothing and Textiles*, Vol. 4 (2008), pp. 1–20; Heidi Sherman, The Flax and Linen of Medieval Novgorod, *Textiles and the Medieval Economy: Production, Trade, and Consumption of Textiles, 8th–16th Centuries*, Oxford, 2014, pp. 104–112.

3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UK and North American Rusiana, 2000–2020, *Russian Studies Hu*, Vol. 3, No. 2 (2021), pp. 11–31.

4 Csete Katona, *Vikings of the Steppe: Scandinavians, Rus', and the Turkic World (c.750–1050)*, London, 2022.

5 Donald Ostrowski, *Europe, Byzantium, and the "Intellectual Silence" of Rus' Culture*, Leeds, 2018.

是人文学科中最古老的趋向：利用我们现有的任何工具，来回答我们想问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问题，以及之前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项目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利用现有的技术，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以新的方式投射这些信息，看看能找到什么不同的答案”¹。为此，他创建了一个罗斯研究的数字人文项目，分成两个不同的网站。其一是罗斯家谱数据库²。该数据库是一个允许人们阅读和查看罗斯王国统治家族的家谱和王族婚姻的网站。与所有中世纪家族一样，留里克家族有着一系列复杂而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个人都有多次婚姻和许多子女，而且名字相似。该网站允许用户查看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末的所有家庭、他们的婚姻、子女及其统治区域。该数据库还有一个后端数据库——XMI数据库，其中包含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日期、王室家谱、婚姻、亲子关系以及所有信息的来源等基础信息。³其二是罗斯家谱网络地图⁴。该图集是哈佛乌克兰研究所一个更大的乌克兰数字地图集项目的一部分，也得到乌克兰研究所的资助。该项目使用与罗斯族谱数据库相同的后端数据库，所以信息一致，并且与后端数据库同步更新，但该网站主要是通过地图代替文本来提供数据。这些图文结合的可视化数据，非常清晰地展现了罗斯与中世纪欧洲的相互联系：11世纪时，78%的罗斯王室成员与西方国家有联姻；同时也可以通过时间滑块看到一些动态变化，如12世纪罗斯与西方的联姻越来越少，内部婚姻则越来越多。作者认为，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数字人文模型在创建全球互联互通方面的效用，它当然是中世纪学者可以而且也应该研究利用的工具，从而更容易（相当真实地）构建一个全球中世纪”⁵。这些数据库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成为一个长期项目，可以不断成长、扩展以及换代升级并实现在线共享，为罗斯以及中世纪研究提供持续可靠的资料。

1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Visualizing Prosopography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The Case for Rus', *Medieval Prosopography*, Vol. 34 (2019), pp. 207–220.

2 Russian Genealogical Database, 官网 <http://genealogy.obdurodon.org/>。

3 David J. Birnbaum,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Mapping History: using technology to showcase Medieval Familial interconnectivity,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orysia Karapinka, 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Vol. 37, No. 4 (2010), pp. 317–318.

4 Mapa: Rus' Genealogy Web Map, 官网 <https://maps-huri-ws.net/rusgen/>。

5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Visualizing Prosopography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The Case for Rus', *Medieval Prosopography*, Vol. 34 (2019), pp. 207–220.

其四，在阐释上，使用历史建模对罗斯历史进行“反事实”分析，展现其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1世纪初，历史建模已成为现代历史学蓬勃发展的热门方向之一。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当今史学研究更侧重于“树叶”¹，即个别事件和事实。历史学家常常从重建真实事件转向模拟另类历史，即那些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件，以及它们可能对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这种历史建模，可以展现历史不是一个单向的、严格定义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实际发生的事件和未实现的变体组成的整体网络。自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未曾发生的历史》²中对反事实历史进行系统论述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只要反事实推演是有依据且合理的，便可被视作一种有益的思想实验，能够为史学提供认知价值。反事实假设一方面可用以破除历史必然性的迷思，另一方面亦可充当一种有效的历史解释形式。³拉芬斯伯格的《大胆的弗拉基米尔：11世纪罗斯的反事实历史》一文是这类尝试的代表。他利用反事实分析的阐释方式，提出在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长子弗拉基米尔⁴未早亡并继承基辅王位的情况下，罗斯和东欧世界可能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若如此，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包括王朝的不同分支在罗斯和东欧政治中的作用，甚至罗斯在整个欧洲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其结果很可能是，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⁵可以说，研究微小决定或事件的潜在影响，正是反事实历史研究的有趣之处。它虽然并不会让描述的事件变得更加真实，但它有助于历史学家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并以这种方式帮助揭示一些迄今为止

1 来自F.安克斯密特的比喻，他把历史比作一棵树：早期现代主义强调树干，探索历史的机制，强调其视野的整体性。历史主义和晚期现代主义侧重于树枝，试图提供新的历史方法（如思想史），但也希望对树干有所论述。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树叶，即个别事件和事实，将一般的、全球性的历史问题排除在研究之外。

2 Niall Ferguson,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London, 1997. 有两个中译本，可参见：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尼尔·弗格森：《虚拟的历史》，颜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3 冉博文、董立河：《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年度盘点——以〈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为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第2期，第250—274页。

4 史学界通常以1054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为罗斯国家分裂的标志。雅罗斯拉夫的长子（王位继承人）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维奇在1052年先于父亲去世，于是1054年诸子陷入内讧，各据一方。

5 Christian Raffensperger, Volodimer the Bold: A Counter-factual History of Eleventh-Century Rus', *Russian History*, Vol. 44, No. 2-3 (2017), pp. 398-410.

止尚未得到充分审视的历史。当然，反事实历史的分析局限性和哲学困境亦是明显的¹，能不能将之运用于严肃的历史研究也是学者们反复争论的问题。

英美的年轻一代学者们在古罗斯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内容和新阐释成果斐然，在更大的中世纪欧洲，甚至更广阔的欧亚世界展现了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地位、与周边世界的互动与联系、文明的特点与潜在的发展可能性，也在多语言的比较和全方位的联动基础上，赋予了冷门的古罗斯研究新的生命力。

结 语

梳理英美史学界古罗斯研究的学术脉络，能窥见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不同阶段斯拉夫裔移民史学家的贡献，另一方面归功于英美学者对俄国学术成果的积极吸收、利用和批判。其中，移民史学家以俄裔和乌裔史学家为主，俄裔史学家以欧亚主义学派为代表，为英美学界输送了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古罗斯研究成果，乌裔史学家以普里察克为代表，为英美学界提供了反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另一种叙事。20世纪英美史学界古罗斯研究，总体上在奥博伦斯基开创的拜占庭研究范式下，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深入，古罗斯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视野重新审视。以拉芬斯伯格为代表，英美史学界古罗斯研究呈现出“全球转向”的学术转型。剖析这种知识传统与学术转型，对国内俄国史和世界史中尚较薄弱的古罗斯研究大有裨益，有助于我们回归中世纪全面了解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综述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发现，古罗斯研究从来不是英美斯拉夫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而在去殖民化、去欧洲中心的叙事下，古罗斯却成为全球中世纪研究亟待深入的重要主题。从英美斯拉夫研究、俄国史研究的真实现状来看，“现在人们对罗斯史和近代俄国史的关注越来越少，教师们也抱怨，由于古罗斯史和中世纪俄国史课程越来越不受学生欢迎，他们的课堂无法满员。俄国史研究被简化为对苏联

1 陈常荣：《是否存在严肃的反事实历史？》，《思想与文化》2022年第1期，第263—276页。

和后苏联时期艺术（主要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和电影）的研究”¹。同时，英美国家研究古罗斯历史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主要集中于冷战期间开始从事学术活动的那批学者，专注于古罗斯研究的年轻学者只是极少数。但从全球互动和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中世纪世界的古罗斯，看似居于欧洲的边缘地带，却恰恰是“黑暗时代”西欧与欧亚草原的东西连接点，也是北欧维京世界与拜占庭世界的南北交汇处。在全球史的书写下，边缘成为另一种中心，古罗斯研究成为全球中世纪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掀起了对西方斯拉夫学研究的反思。美国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协会（ASEEES）2023年11月30日—12月3日在费城召开的第55届年会主题为“去殖民化”。²在英国，剑桥大学于2022—2023年举办了一系列以“重新思考斯拉夫研究”为主题的讲座，其中包括“看不见的罗斯：被遗漏的东欧历史”。³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想我的优势之一是，作为一名美国学者，我在研究俄罗斯历史时没有（显性或隐性的）意识形态包袱。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乌克兰人。我也不生活在中世纪的历史中。虽然美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传统，但它并没有延伸到中世纪的过去，并不影响我的工作。因此，我认为这些都是帮助我客观研究不同材料的优势”⁴。如何打破帝俄史学和苏联史学的叙事，如何批判性继承不同族裔移民史学家对古罗斯的构建，以及如何摆脱当下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的影响，依然是英美学界古罗斯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1 Федосов А. В., Раффенспергер К.,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Русь.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21, с. 41.

2 <https://www.aseees.org/convention/past-aseees-conventions>

3 <https://www.mml.cam.ac.uk/news/slavonic-section-presents-rethinking-slavonic-lecture-series-2022-23>

4 Федосов А. В., Раффенспергер К.,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Русь.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глазами запад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М.: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21, с. 11.

苏联社会史家中的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学派

| 霍佳科夫 著 颜敏翔 译 孙熠智 校 |

摘要：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历史学派有着自19世纪以来的悠久史学传统，并且至今依然活跃在世界史学的舞台上。自十月革命以来，该学派就开始持续关注苏俄、苏联史研究。本文梳理了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历史学派苏联社会史研究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指出了该学派学者对于史料文献，尤其是档案分析及运用的重视。

关键词：圣彼得堡历史学派 列宁格勒历史学派 苏联学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一、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的“旧学派”史家及史学研究中心的创立

1917年革命对历史学家的命运带来深远影响。其中一部分人无法接受俄罗斯发生的巨变而选择侨居国外，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观点形成于19与20世纪之交。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术组织中无法忽视“旧学派”（Старая школа）¹学者的参与。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与图书馆学家西吉兹蒙德·纳塔诺维奇·瓦尔克（Сигизмунд Натанович Валк，1887—1975）是苏联社会史家培养的奠基人之一。瓦尔克于1913年毕业于皇家圣彼得堡大学（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18年中，瓦尔克进入档案总局（Главархив）下属彼得格勒革命历史档案

1 文中“旧学派”即指俄罗斯帝国时期所形成的圣彼得堡历史学派。——译注

馆（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сторик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архив）工作，先是担任负责警政司（Департамент полиции）文件的档案管理员，1919年2月至1926年6月1日期间任该部门负责人。任职期间，瓦尔克致力俄国革命运动历史文献（包括传单）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为刊印革命运动史史料准备基础版本，并于《红档》（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杂志多有襄助。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叶，瓦尔克发表了大量关于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史的论文和书评，刊布众多相关史料。

几十年来，瓦尔克的学术与教学活动始终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отдел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ЛОИИ，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ПБНИИ РАН〕）¹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ЛГУ，即今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紧密相连。1934年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恢复办学，瓦尔克其后在此工作，成绩斐然。

1936年瓦尔克免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从本年起担任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苏联历史组（секция/сектор истории СССР）组长。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瓦尔克留在列宁格勒继续教学，但在1941年11月即作为有博士学位的科学院研究员，搭乘飞机从列宁格勒撤离，随后与研究所一起疏散到塔什干。瓦尔克还去过萨拉托夫，其母校列宁格勒大学当时就在那里。1944年，瓦尔克拒绝了在莫斯科的显耀职位，并作为首批大学教授中的一员，返回列宁格勒，致力于恢复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工作，同时留任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组长。瓦尔克在列宁格勒大学被评为苏联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СССР）教授。1950年，在该教研室划分为若干研究组后，他成为“19世纪以前苏联史”（Секто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до XIX века»）研究组的负责人。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瓦尔克一直从事农业、农民和农民运动史的研究。²

1 Соболев Г. Л. «...Старейший и в своем роде несравненны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ученика о профессоре Сигизмунде Натановиче Валке (часть I) //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23. Т. 13, № 4. С. 790–804.

2 Чернуха В. Г.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С. Н. Валка (13 декабря 1887 г.–5 февраля 1975 г.) // История и историк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78/отв. ред. М. В. Нечкина. М., 1981. С. 171–180.

在瓦尔克的学术遗产中，其对史料出版规范的制定占有特殊地位，正是其制定了整理刊布革命历史文献的统一规则，并成为撰写第一份关于整理非法传单体例的作者之一（1919）。瓦尔克是列宁档案文献编目体例的作者，还提出了列宁著作的出版规则，这些规则后来被普遍接受（1926）。在瓦尔克的参与下，《历史文献出版规则》（Правила изд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1955）和《苏维埃时期文献出版规则》（Правила изд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1960）先后问世。¹

瓦尔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苏联历史学家，在文献学、档案学、史料学和相近的历史学辅助学科（专业）方面，他对自己的学生来说始终是最高权威，作为“历史学经典作家”（класс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可谓当之无愧。

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出现的历史学术机构中也主要汇集了“旧学派”历史学家。1919年，在皇家考古学院（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物质文化史学院（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стори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ГАИМК）。1921年，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格勒大学组建了历史研究所。两年后，上述历史研究所和其他历史学研究机构改组为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РАНИОН）。

物质文化史学院、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历史研究所和地方史志组织，是“旧学派”历史学家作为专业人员可以开展工作的领域。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新政权密切合作，并在历史研究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前皇家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主任谢·费·普拉托诺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曾任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彼得格勒分局（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отделение Главного арх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领导、古文献委员会（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主席、重建后的彼得格勒考古研究所（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所长、“普希金之家”（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²负责人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馆长（Библиотека АН СССР）。1929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人文科学部院士秘书（академик-секретарь）。彼得格勒（列宁格勒）

1 Ганелин Р. Ш., Чернуха В. Г. Сигизмунд Натанович Валк-к 12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Клио. 2013. № 10 (82). С. 124–126.

2 “普希金之家”为俄罗斯（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代称。——译注

大学的古罗斯史学家亚·叶·普列斯尼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Пресняков）教授曾领导彼得格勒众多的历史研究机构。帕·叶·肖戈列夫（Павел Елисеевич Щёголев）曾任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彼得格勒分局局长，也是彼得格勒革命历史档案馆的组织者之一（1918），该档案馆位于前参议院（Сенат）大楼内。

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革命和国内战争史学派的形成

列宁格勒大学的俄罗斯现代史教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系，及稍后语言学与物质文化系建置时期。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大学上述科系的课程包括革命史和俄国国内战争史。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社会史研究为联共（布）党史所取代。即便如此，对20世纪民政史（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стория）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需求已经出现，未来专业化的基础正在奠定，专业历史学家的培训也在进行。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苏联社会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今为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的成立与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奥夫相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Овсянкин，1909—1985）的名字紧密关联。奥夫相金是杰出的学术组织者、才华横溢的教师和俄罗斯国内战争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其整个一生，包括在动荡而悲惨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都与历史系联系在一起，是苏维埃国家整体历史时代的反映。¹

20世纪50年代，弗·亚·奥夫相金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能力，成功地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史学史和史料学研究问题的全苏和市内会议，并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发起了苏联社会史研究。与此同时，奥夫相金还负责20世纪苏联史教研室内的同名研究组，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本国现代史为科研兴趣范围的历史学家群体。²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研究组已基本成为系里的一个独立部门，在其例会上，大量不同主题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付诸讨论并建议送交答辩。

1 有关奥夫相金具体生平请参见：Ходяков М. В. Кафедра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34–200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Отв. ред. А. Ю. Дворниченко. СПб., 2004. С. 102–135.

2 Иванов Н. Я. 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Сб. статей. Л., 1984. С. 4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奥夫相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功地预见到了人们对俄罗斯现代史的浓厚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一国家历史阶段重要性的人。1967年10月，在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召开了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奥夫相金令人信服的发言之后，委员会采纳建议，支持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设立苏联社会史教研室。在奥夫相金的努力下，1968年6月1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发布命令，在列宁格勒大学设立苏联社会史教研室。¹自然而然，奥夫相金成为首位教研室主任。当时，他已担任苏联历史教研室苏联社会史研究组主任二十多年。²从1968到1974年，奥夫相金一直担任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教研室获得开展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和人员增长的机会。因此，1970/1971学年有12人在该教研室工作。³

遗憾的是，奥夫相金没能最终实现他设想的重组教研室工作和更新人员的计划。他不仅留下了无数学生对老师的美好回忆，还留下了他亲手创建的教研室——卓有成效的学术组织活动的主要成果。

1974—1977年，西方苏联社会史研究批判的权威专家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奥列格金娜（И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Олегина，1937—2017）担任教研室主任。⁴

从1977年6月起，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伊万诺夫教授（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Иванов，1912—1987）主持苏联社会史教研室工作。伊万诺夫是研究1917年俄国革命运动方面的知名历史学家，论著众多，其中以其作为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送交答辩的专著《1917年俄国的反革命及其失败》（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917 году и ее разгром）最为著名。⁵尼·雅·伊万诺夫在学术会议上总是侃侃而谈，并毫不妥协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对于对手的粗暴政治指责从不屈服，而这在当时是其他历史学家经常犯的错误。伊万诺夫在大学讲堂是出色的教师，拥有罕见的博学和独特的

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ЦГА СПб). Ф. 7240. Оп. 22. Д. 135. Л. 56.

2 В. А. Овсянkin (к 6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Вестник ЛГУ. 1969. № 20. С. 174.

3 ЦГА СПб. Ф. 4390. Оп. 1. Д. 88. Л. 8.

4 Олегина И. Н. 1)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СССР в английско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Л., 1971; 2) Критика концепц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ССР. Л., 1989.

5 Иванов Н. 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1917 году и ее разгром. М., 1977.

记忆力，能随口引用许多列宁著作。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成为该教研室最早的史料学家之一¹，并在那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其同事、大学生和副博士研究生（аспирант）的记忆中，伊万诺夫是一位聪明的、热爱自己事业的教师，也是一流的专家。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对苏联历史上有争议和不为人知的问题的兴趣急剧增加，促使历史系进行改革。苏联社会史教研室（1991年起更名为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86年3月，根据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科学部关于“加强干部构成”的建议，在科学院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并通过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的根纳季·列昂季耶维奇·索博列夫（Геннад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Соболев，生于1935年），从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调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任苏联社会史教研室教授。回到母校一年后，在克鲁普斯卡娅文化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ы имени Н. К. Крупской）兼任职教近十年，获得俄罗斯史教授职衔的根·列·索博列夫经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当选为系主任。与此同时，同样作为英美史学史的著名专家²，索博列夫应邀前往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社会科学教师高级培训班，讲授国外研究苏联社会的史学史课程。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教研室人员得到了大量补充，新的年轻研究员加入了教研室——副博士维·格·博尔特涅夫斯基（Викто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ортневский）、阿·哈·达乌多夫（Абдула Хамидович Даудов）、瓦·亚·拉奇科夫斯基（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ачковский）、米·弗·费奥多罗夫（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Федоров），以及当时教研室博士研究生（докторант），后来成为教授的马·费·波雷洛夫（Матв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олюнов）。同时，该教研室还从最优秀的学生中培养自己的研究者。

历史学博士弗拉季斯拉夫·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图佐夫（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тузов，1933—2016）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教师之一。他于1991年从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и）调入历史系，担任俄罗斯现代史

1 Иванова Н. Я. 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Сб. статей. Л., 1984. С. 42–54.

2 Соболев Г. Л.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1917–1970-е годы. Л., 1979.

教研室教授。25年前库图佐夫曾在该教研室从事助教工作。在苏联史研究的新形势下，库图佐夫的知识和博学尤其受到欢迎，所开设的独特专业课程——“列宁格勒案件”（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苏联情报机关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苏联和俄罗斯特工机关史”（История спецслужб СССР и России）——深受学生欢迎。

苏联社会史教研室的科研和教学权威得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俄罗斯现代史方面首席专家建立了密切联系。知名学者、历史学博士瓦·米·科瓦丘克（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вальчук，1916—2013）和米·帕·伊罗什尼科夫（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Ирошников，1934—2019），应邀就20世纪俄罗斯史的热点问题开设新的专业课程：伟大卫国战争史（科瓦丘克），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史（伊罗什尼科夫）。

苏联社会史教研室（自1991年起更名为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尽力应对“改革”时期（перестроечная пора）¹的所有事件，其成员参加了通过电视和广播进行的激烈讨论，但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在新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发生的变化调整教育进程。教研室开设了关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史、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侨民史的新学科和专业课程。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教研室的成员都能满足新的要求，他们逐渐停止教学活动，相继退休。但从总体上看，教研室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来自伏尔加河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众多研究生的入学即是证明。来自美国、法国、芬兰、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第一批交换生也来到了教研室。

在根·列·索博列夫的领导下，教研室的成员发表了400多篇学术作品，总计约1000印张。这些年研究方向的特点是，教研室在任何时候都以革命史问题为传统，首先是以根·列·索博列夫本人及他最亲密的同事和学生的著作为代表²，同时对国内战争、白军、十月后侨民问题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与此同时，还继续开展国外关于工业化、民族国家建设和20世纪40至50年代苏联政治史的史学史研究。

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史系领导层委婉地以“恢复俄罗斯历史的

1 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译注

2 *Соболев Г. Л.* 1)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гарнизон в борьбе за победу Октября. М., 1985; 2)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авангард в 1917 году: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орьб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абочих Петрограда. СПб., 1993.

有机统一”为借口，尝试合并两个相关的教研室——俄罗斯历史教研室和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结果，到1997年，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基本上被解散了，包括教研室主任在内的一些教师被迫离开了历史系。设立俄罗斯史“联合教研室”的试验被证明是罕见的失败。由于学院旧管理层考虑不周，在20世纪俄罗斯史方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培养水平大幅下降。

直到2001年历史系人事变动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恢复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的问题。在历史系新任系主任安·尤·德沃尔尼琴科（Андрей Юрьевич Дворниченко）和大学校长的共同努力下，教研室于2003年上半年得以重建。根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术委员会2003年5月26日的决定，重新组建了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2003年6月2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第658/1号令）。新任系主任德沃尔尼琴科教授正确地指出，这种状况“无疑将有助于更有效地研究和教授俄罗斯历史”¹。

在现代条件下，自2003年以来一直由米哈伊尔·维克托洛维奇·霍佳科夫教授领导的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显然，需要将教育质量保持在适当水平，使毕业生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为此，教研室正在发展新的学术方向，加强对俄罗斯革命史、国内战争史、社会经济转型史、政府管理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同时，还对20世纪俄罗斯打击犯罪的历史进行研究，并正在研究20与21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现代政治结构、社会经济政策等问题。

2011年，教研室工作人员发起创办了一份新的跨学科学术理论期刊《俄罗斯现代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该期刊在短时间内不仅在俄罗斯国内，而且在外国都已成为主要且“显著”的历史期刊之一。教研室汇集了一批从事苏维埃国家问题研究的一流历史学者，其主要任务仍然是集中精力解决优先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教研室集体的学术和教学活动的基础。与此同时，教研室还努力开发旨在更新历史观念的课程，采用多因素路径（многофакторный подход）与研究方法多样性，更为积极地处理“历史中的人”（человек в истории）的问题。

早在1984年，教研室主任尼·雅·伊万诺夫在总结教学工作的中期成果时，就

1 Брачев В. С.,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Кафедра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834–2004). СПб., 2004. С. 372.

给出了该教研室有1469名毕业生的惊人数字。他还指出,“如果算上苏联社会史研究组的毕业生”(截至1968年),这个数字将超过2500人。¹算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教研室学习的学生(约有500名专家毕业生²)和最近15年的大学生,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研究组”(сектор социализма)存在期间和教研室作为历史系(自2014年起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ПбГУ)的一个下属单位开展工作期间,共培养了约4000名专家、学士、硕士和副博士研究生。

三、苏联社会史家中列宁格勒-彼得堡学派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方向

在俄罗斯古代和中世纪史学史中,“旧学派”历史学家的立场最为坚定。与此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俄罗斯近现代史的研究。因此,亚·叶·普列斯尼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Евгеньевич Пресняков, 1870—1929)开始研究18至19世纪国际关系史、十二月党人起义史、第一次俄国革命史³等问题,审读有关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俄国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文献出版物。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联共(布)的领导层开始更加积极地影响历史学的发展。该进程的目的在于制定苏联官方史学的概念。新出现的著作自然受到了联共(布)方针的影响。尽管如此,列宁格勒历史学家,特别是教师尼·阿·科尔纳托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Арсеньевич Корнатовский, 1940年起为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如《为红色的彼得格勒而斗争》[Борьба за Красный Петроград])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它们不断再版,并受到读者的欢迎。⁴

攻击知识分子和不信任“老专家”(стар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的政策导致了1929—1930年间所谓的“科学院案”(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дело)或“普拉托诺夫院士案”(Дело

1 Иванова Н. Я. 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53.

2 “专家”是苏联和现今俄罗斯教育体系中学位的一种,学制五年,大致相当于我国本硕连读的硕士学位。——译注

3 即1905年俄国革命。——译注

4 Корнатовский Н. А. Борьба за Красный Петроград (1919). Л., 1929; Корнатовский Н. А. Борьба за Красный Петроград. М., 2004.

академика Платонова)。包括列宁格勒历史学家谢·费·普拉托诺夫、叶·维·塔尔列(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尼·彼·利哈乔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Лихачёв)、谢·瓦·罗日杰斯特文斯基(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等在内的115人被指控成立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反革命保皇组织。

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前的具体目标,首先是研究苏联社会史。为此,1931年联共(布)中央支持作家高尔基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出版《苏联国内战争史》(Истор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СССР)和《工厂史》(История фабрик и заводов)的两项决议。

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来,列宁格勒学派苏联社会史家的重要研究领域,除了国内战争史和苏联工人阶级史之外,还着手进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研究,以及伟大卫国战争史和1941—1944年列宁格勒围城史研究。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当时该所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历史学家团体,完成了一系列严肃而扎实的著作,其中包括尤·谢·托卡列夫(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Токарев, 1925—1972)、维·伊·斯塔尔采夫(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тарцев, 1931—2000)、奥·尼·兹纳缅斯基(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наменский, 1927—1993)和根·列·索博列夫。他们成为从事1917年俄国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中列宁格勒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出版的每部著作都为研究一系列综合学术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¹

在当时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氛围中,研究所领导层萌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那就是为十月革命50周年编写一部集体作品《十月武装起义——彼得格勒的1917年》(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в Петрограде)。不同年代的历史学家参与了这部基础性著作的编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撰写一部具有独创性的高质量新作。集体写作团队包括伊·阿·巴克拉诺娃(И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Бакланова)、贝·达·加尔佩林

1 Токарев Ю. С. 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творче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арт—октябрь 1917 г.). М.; Л., 1965; Старце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гвардии и рабочей милиции (март 1917—апрель 1918 г.). М.; Л., 1965; Соболев Г. 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г. Период двоевластия. Л., 1973; Знаменский О. 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 крушения. Л., 1976.

娜（Берта Давидовна Гальперина）、拉·肖·加涅林（Рафаил Шоломович Ганелин）、弗·尼·吉涅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инев）、奥·尼·兹纳缅斯基、米·帕·伊罗什尼科夫、埃·爱·克鲁泽（Эльза Эдуардовна Крузе）、瓦·安·纳尔多娃（Валерия Антониновна Нардова）、谢·伊·波托洛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Потолов）、维·伊·斯塔尔采夫、扎·瓦·斯捷潘诺夫（Заха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тепанов）、尤·谢·托卡列夫、安·列·弗莱曼（Антон Львович Фрайман）。“这是一次真正的集体劳动，”维·伊·斯塔尔采夫回忆道，“作者们互相阅读彼此撰写的章节，提出批评，表达意见。”¹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维·伊·斯塔尔采夫本人及其在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同事们，就一直致力于研究俄国临时政府的组建、运作以及所奉行的政策等问题。斯塔尔采夫就该问题出版了多部专著，并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害怕权力”；相反，它们一直在寻求组建自己的政府。斯塔尔采夫的著作对研究俄国共济会成员（масоны）在建立临时政府时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稍后，斯塔尔采夫在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Герцена, РГПУ）工作期间，又注意到“德国资金”（немецкие деньги）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²

1965年，根据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的建议，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员科瓦丘克和索博列夫撰写了一篇专文（《列宁格勒“安魂曲”——关于列宁格勒人民在战争和围城期间的牺牲者》[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реквием» (О жертвах насел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а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блокады)]），以非常简短的形式发表在当年最后一期，但没有发表在刊物主体的“论文”（Статьи）部分，而是刊载于“札记”（Заметки）一栏。可能是编辑部不想引起人们对这一刊文的特别关注。然而，即使是缩写本，专文不仅在国内受到关注，也被国外许多历史类出版物转载。当时，关于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总损失的新数据尚未得到官方承认，苏联历史学家将这一材料（被称为《列宁格勒“安魂曲”》[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реквием”]）的

1 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В 2 кн./Отв. ред. А. Л. Фрайман. Л., 1967.

2 Старцев В. И. 1)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ласть: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и 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марте-апреле 1917 г. М., 1978; 2)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ервого состава. Л., 1980; 3) Тайны русских масонов. СПб., 2004; 4) Немецкие деньг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е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й роман Фердинанда Осендовского. 3-е изд. СПб., 2006.

出版视为历史学科“解冻”（оттепель）的标志之一。¹

根据对已刊资料和档案资料（当时档案已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机构划出）的分析，科瓦丘克和索博列夫甚至在论文的缩写本中指出，1945年确定的损失数字不能被视为最终数字，实际上列宁格勒在围城中不少于80万平民死亡，随后在1967年出版的五卷本《列宁格勒历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Ленинграда）中提及了这一数字。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试图在学术交流中引入关于列宁格勒居民在围城期间死亡情况的新数据引起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德·瓦·巴甫洛夫（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авлов）——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巴甫洛夫在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间，作为国防委员会负责向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列宁格勒市民提供食品的特派员（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й）留在围城之中。

巴甫洛夫动用他的全部影响力，使刚刚引入到列宁格勒保卫战相关文献中的围城期间死亡率的新数据从学术交流中消失。巴甫洛夫主张保留旧有数据的主要论据是：“在30年内把全世界都知道的数字（64.2万）改成另一个数字（80万），不会带来任何有用的东西，只会破坏我国政府官方声明的稳定性。谁会从中受益呢？请不要允许公布另一个数字。”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一书也被进行了某种“外科手术”。在作者生前的版本（1974年版）中，他支持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试图明确在列宁格勒围城中牺牲者人数的权利。而在朱可夫逝世后于1978年出版的《回忆与思考》第三版中，提出的观点却完全相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随后几年，科瓦丘克和索博列夫在军事类主题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专门探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瓦丘克积极研究围城期间的交通通讯问题。³

1 Ковальчук В. М., Соболев Г. Л.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реквием» (О жертвах насел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а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блока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5. № 12. С. 191–194.

2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Т. 5: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1945 гг./отв. ред.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Л., 1967.

3 Соболев Г. Л. Ученые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М.; Л., 1966; Ковальчук В. М. 1) Ленинград и Большая земля: История Ладужск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блокирован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1941–1943 гг. М., 1975; 2) Дорога осажденного блокад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 Шлиссельбург—Поляны в 1943 г. Л., 1984; 3) 900 дней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 1941–1944. СПб., 2005; и др.

在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工作的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家，研究俄罗斯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工业化史和工人阶级史。同时，教研室开始拓展新的研究领域，首先是卫国战争史、苏联外交政策、苏联社会史学史和史料学。¹在教研室组建的艰难阶段，20世纪70年代相继有尼·雅·伊万诺夫、维·安·叶若夫（Виктор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Ежов）、伊·雅·特里弗诺夫（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Трифонов）、尼·阿·科尔纳托夫斯基、利·叶·安库季诺娃（Лидия Ефимовна Анкудинова）、罗森科（Иван Архипович Росенко）等进入教研室工作。

一段时间后，教研室教师成为《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列宁格勒大学》（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一书的主要作者。该书出版于1990年，尤·德·马尔戈利斯（Юрий Давидович Марголис）教授主编。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维·格·博尔特涅夫斯基、瓦·亚·拉奇科夫斯基和根·列·索博列夫撰写了关于列宁格勒大学学者的宣传鼓动活动、列宁格勒大学教职员在列宁格勒围城和疏散期间的学术工作、列宁格勒大学学者对战胜纳粹德国所做贡献的宝贵章节。《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列宁格勒大学》一书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²

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出现编制《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纪念册》（Книги Памят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的问题时，当根据1993年5月11日“关于筹备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纪念”的校长令，成立一个由主管学术研究的副校长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时，圣彼得堡大学学术委员会将编制《纪念册》的工作直接委托给历史系和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作小组主要由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的工作人员组成，需要处理大量工作。《纪念册》的宗旨是，收录所有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包括从院士到门卫在内的列宁格勒大学教职员。《纪念册》收录所有牺牲的大学生：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那些在列宁格勒围城中死于饥饿、

1 Анкудинова Л. Е.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ССР. (1917–1920 гг.). Л., 1963; Ежов В. А. 1) Рабочие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6–1950). Л., 1968; 2)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Л., 1974; 3)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в годы девятой пятилетки (1971–1975 гг.). Л., 1978; 4)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ведущая сил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а, 1943–1950 гг. Л., 1982; Трифонов И. Я. Ликвидация эксплуататорских классов в СССР. М., 1975; Росенко И. А.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вязи рабочих Ленинграда (1921–1937 гг.). Л., 1977; и др.

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Очерки/отв. ред. Ю. Д. Марголис. Л., 1990.

轰炸和炮火的人；那些在疏散过程中牺牲的人；以及那些回到家乡，但没能活着看到1945年5月9日胜利日的人。工作组采用的方法并没有贬低从军学生的功绩，而是恢复了历史的公正：毕竟，各院系的退伍军人委员会和“搜寻”小组的主要工作是确认前线牺牲人员。然而，这种方法需要进行新的文献搜索，因为从各院系获得的原始材料远远不够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准确无误。因此，不仅需要找到牺牲学生的文献依据，还需要全面清查以确定列宁格勒大学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损失。了解民兵（志愿兵，列宁格勒大学的志愿兵总人数至少达到1500人）的命运尤其困难。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必要痛心指出，在过去的岁月里，并没有尽一切努力来收集有关列宁格勒大学民兵战士的确切信息。当然，工作组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其成员努力寻找和研究保存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的文献。当然，民兵幸存者的证词也有所帮助。

确认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因饥饿而死的研究员、教师、研究生、大学生、工人和职员的身份也同样困难重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1—1942年冬季极高的死亡率中与学校失去了联系，也因为大多数院系在战后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类死去的学生。以“因死亡除名”（Исключить за смертью）这一简洁措辞开头的校长命令，只记录了在大学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天的那部分教职工的死亡。大部分因饥饿而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似乎都消失在围城的黑洞中……根据经整理的文献，记录在第一期《纪念册》中的饿死者，只是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死亡的所有大学员工中的一部分。

由于文献搜检的工作量巨大，而《纪念册》编纂时间有限，工作组无法找到所有已确定姓名的大学生牺牲者的必要材料。这也是第一期《纪念册》没有收录当时公布的所有牺牲者名单的原因。但在筹备过程中，发现了几十个未列入任何名单的名字，其中有学者、研究生、大学生、工人和职员。在第一期《纪念册》中，厘清了625名大学生的生平境遇，此外，还在附录中公布了300多名无法确认必要信息的大学生牺牲者名单。

1995和2000年出版的两期《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纪念册》¹，受到了高教界的

1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41-1945. Вып. 1/Отв. ред. Л. А. Вербицкая, Г. Л. Соболев. СПб., 1995; Вып. 2. СПб., 2000.

高度赞赏，证明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的学术潜力、提出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教研室教授们继续开展对大学战时历史的研究工作。¹

弗·亚·库图佐夫教授是积极撰写《纪念册》的人之一。他是俄罗斯历史学家中第一位开始深入和认真研究诸如“列宁格勒案件”这样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的学者，并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社会政治学和历史学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库图佐夫于1990年出版了《列宁格勒案件》（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一书（与维·伊·杰米多夫 [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Демидов] 合著），该书所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其客观分析至今仍是无与伦比的。²从这本书中，公众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构成所谓“列宁格勒案件”的一系列伪造“案件”，成千上万的党、苏维埃、经济、工会、共青团、军事领域的工作者，学者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因此受到镇压。³库图佐夫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的重要性还在于，在“列宁格勒案件”中，历史系的一大批教师也受到冲击，包括弗·瓦·马夫罗金（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авродин）、弗·亚·奥夫相金、尼·阿·科尔纳托夫斯基等人。⁴

深谙20世纪俄罗斯政治和社会史、国家机关史、苏联政权和管理史、外交史、战争史和军事艺术、特务机关史和犯罪史等多方面研究的维·亚·伊万诺夫（Витк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ванов）教授，于2008年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无疑加强了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的实力。维·亚·伊万诺夫轻松自如地融入了新团队，所撰写的著作则分析了若干鲜有研究的问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俘问题。⁵

教研室毕业生亚·谢·普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ченков）为国内战争

1 *Соболев Г. Л., Ходяков М. В.* Потер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История. Вып. 2. С. 14–23.

2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сост. В. И. Демидов, В. А. Кутузов. Л., 1990.

3 参见：*Соболев Г. Л.* 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тузов (к 8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Труд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СПбГУ. Т. 21. Путь России и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ка: Сб. статей/отв. ред. М. В. Ходяков. СПб., 2015. С. 7–14.

4 *Ходяков М. В.* Кафедра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 102–115; *Болдовский К. А.* «Прошу оказать мне доверие, так как другой жизни помимо жизни в партии и с партией у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нет и не будет...»: «Дело Н. А. Корнатовского»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ркома ВКП (б) 1949 г.//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14. № 2 (10). С. 257–307.

5 *Иванов В. А., Колошинская Н. В.* Военный плен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1940–х год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СПб., 2014.

时期的南俄和乌克兰研究增添了新的色彩，其专著¹受到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四、苏联社会史家和文献刊布

如果没有档案机构所藏文献的出版，新的苏联史研究就不可能出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研究人员开始有机会在工作中使用早先未知的史料。

经过长时期的中断以后，历史学家的文献刊布活动得以继续。²1960—1980年间出版了许多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学术著作。³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献出版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1917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文献资料（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и отчеты, резолю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бщих собраний, собраний секций,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кома и фракций, 27 февраля–25 октября 1917 г.）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早在1966年——伟大十月革命史研究的鼎盛时期，就萌生了出版这些资料的想法。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研究员维·伊·斯塔尔采夫、贝·达·加尔佩林娜、尤·谢·托卡列夫和奥·尼·兹纳缅斯基参与了出版的筹备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出版物的第一卷直到1991年才得以出版，而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则出版于2003年（编纂者最初计划出版五卷）。资料集的问世对客观研究1917年革命事件起到了巨大作用。⁴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和21世纪初出版的诸多资料集，对历史学家和广大读者而

1 Пученков А. С. 1)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генерала А. И. Деникина, весна 1918–весна 1920. 2-е изд. М., 2016; 2) Украина и Крым в 1918–начале 1919 года. Очер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2013.

2 900 героических дней.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1941–1944 гг./Сост. Х. Х. Камалов, Р. В. Серднук, Ю. С. Токарев. М.-Л., 1966; На защите невосковой твердын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а. Войны. Л., 1965; В годы суровых испытаний.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А. Р. Дзенискевич,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А. П. Крюковских и др.; редкол.: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науч. ред.) и др.]. Л., 1985.

3 Районные Совета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резолю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бщих собраний и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комитетов/Отв.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 И. Старцев. М.; Л., 1964. Т. 1; 1965. Т. 2; 1966. Т. 3.

4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Совет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и отчеты, резолю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бщих собраний, собраний секций,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кома и фракций, 27 февраля–25 октября 1917 г. Т. 1/под общ. ред. П. В. Волобуева. Л., 1991; Т. 4. М., 2003.

言都是一件大事。¹除专书以外，还开始出现了关于圣彼得堡和联邦各级档案馆所藏文献资料的期刊出版物。²最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版了若干综合性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以文献为基础，而且还将文献作为叙事要素或文献附录完整引述。如今，出版商们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使用与最现代技术相应的出版形式。

随着2005年所谓的“Д”计划（Плана “Д”）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圣彼得堡事务署档案馆（Архив Упра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у）的文献——的公布，与1941年秋季列宁格勒布雷有关的各种猜测以及针对列宁格勒防务领导层（克·叶·伏罗希洛夫、安·亚·日丹诺夫、阿·亚·库兹涅佐夫）懦弱和恐慌的指责也随之终结。从公布的计划中可以看出，列宁格勒布雷的决定是由莫斯科最高层做出的。1941年9月13日，内务副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Всеволо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ркулов）受国防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Обороны, ГКО）委托前往列宁格勒，准备在列宁格勒事态出现不利发展时采取措施。发给梅尔库洛夫的委任书上写明，他是“负责特殊情况”的国防委员会专员。

当然，国防委员会的授权使其责任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所有必要的问题，让党和苏维埃的高级干部完成其负责的任务。1941年9至10月，梅尔库洛夫多次在斯

1 Ленинград в осад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е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4./отв. ред. А. Р. Дзенискевич. СПб., 1995; «Горячешный и триумфальный город». Петроград: от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к НЭПу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сост. М. В. Ходяков. СПб., 2000; Журнал посещений А. А. Жданова. 1941–1944 гг./отв. ред. К. А. Болдовский. СПб., 2014. 396; Из районов области сообщают...: Свободные от оккупации районы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ред. А. Р. Дзенискевич; отв. сост. Н. Ю. Черепенина. СПб., 2007; Ломагин Н. А. В тисках голода. Блокада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герман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НКВД и письмах ленинградцев. СПб., 2014; Мы с тобой Ленинград! (к 70-летию снятия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2014.

2 Болдовский К. А., Соболев Г. Л., Ходяков М. В. «Вы просто н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 и не чувствует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вои действия»: из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Ленинградом в 1941–1942 гг.//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14. №1 (9). С. 275–292; Газиева Л. Л. «При всех золотых качествах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иходится все время следить, чтобы никто не вешал нос на квинту...». Из личной переписки А. А. Жданов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в 1941–1942 гг.//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5. № 3. С. 31–35.

3 «План “Д”». План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водимых во врем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по общегород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гор. Ленинграда/сост. С. К. Бернев и Н. А. Ломагин. СПб., 2005.

莫尔尼宫与日丹诺夫会面。¹1941年9月15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库兹涅佐夫和梅尔库洛夫制定的最后阶段特别措施计划。根据该计划，380家企业将停产，其中超过250家被列为最重要的企业。根据“Д”计划，共有58510处设施将停止运行，其中4900多处将被炸毁，其余的将用机械手段拆毁。²

“Д”计划出版资料中关于特别措施总体计划的文件非常重要，但需要指出，在保卫战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关于让城市企业和机构停止行动的具体建议被保留下来。因此问题在于，在有必要执行“Д”计划的情况下，“Д”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旅对工业企业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企业缺乏爆炸物和爆炸专家。

最近在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³发现的《1941—1944年安·亚·日丹诺夫访客日志》（Журнал посещений А. А. Жданова. 1941—1944 гг.）再次让我们确信，我们的档案馆中仍然保存着许多重要的珍贵文献。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角色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并反映在历史文献上，而很多年来《日志》就放在他的文件堆里。随着《日丹诺夫访客日志》的出版，有关“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谁是列宁格勒围城的领导者？”的问题，就在文献上得到了有利于前者的解答。据统计，1941—1944年间，近600名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军事、党务和苏维埃领导人到访日丹诺夫在斯莫尔尼的办公室，其中最多的是库兹涅佐夫——约300次。⁴

当然，《日丹诺夫访客日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解决谁是城市防御第一负责人的问题，其中的新史料包含了极为宝贵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加密的，但却说明了在围城期间，哪些城防问题得以解决（或没有解决）。因此，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他们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作用在国内，尤其是在苏联史学史中是否被夸大了？

1 Журнал посещений А. А. Жданова. 1941—1944 гг./отв. ред. К. А. Болдовский. СПб., 2014. С. 344.

2 «План “Д”». С. 20.

3 即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 Институт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译注

4 据《日丹诺夫访客日志》所附人名索引进行统计。Журналам посещений А. А. Жданова. С. 300—382.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21世纪初，还没有关于国家支援列宁格勒围城的专门文献出版物，尽管从战时开始就有一些关于援助的文件刊布在各种资料集中。2002年出版的资料集《1941—1945年国家支援列宁格勒》（Страна-Ленинграду. 1941-1945）¹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该资料集由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与圣彼得堡诸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共同编纂。除了来自中央、列宁格勒和本地刊物的资料外，资料集还包含来自圣彼得堡国立中央历史和政治文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圣彼得堡国立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和圣彼得堡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的新见重要文件。

该资料集集中发表的文件令人信服地表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并没有听天由命，来自全国的帮助和关怀成为人民为城市而战的重要精神因素。在我们看来，这项工作应该继续下去，因为多年来当地已经积累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各地给予列宁格勒兄弟般援助的资料。

今天，在讨论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围城时期历史文献的出版新前景时，应特别关注促进历史学家与圣彼得堡各档案馆之间的合作，众多合格的专家在这些档案馆中供职。正是由于这种合作，《900个英雄的日子》（900 героических дней, 1966）、《围困中的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 в осаде, 1995）和《国家支援列宁格勒》（2002）等资料集才得以问世，成为列宁格勒防御和围城史文献的里程碑式出版物。然而，这只是圣彼得堡诸档案馆所拥有的文献财富的一小部分。圣彼得堡档案学家娜杰日达·尤里耶夫娜·切列佩宁娜（Надежда Юрьевна Черепенина）于2017—2018年整理出版的二卷本圣彼得堡国立中央档案馆藏《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Стенограммы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ком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证实了这一点。²即使只是初步了解这些材料，我们也可以认为，已出版的

1 Страна-Ленинграду. 1941-1945: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ред.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сост. Л. И. Ильина,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 А. П. Купайгородская, Р. В. Сердник. СПб.; Кишинев, 2002.

2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ком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Ноябрь 1941-декабрь 1943 гг.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ред. А. Н. Чистиков; отв. сост. Н. Ю. Черепенина. СПб., 2017-2018.

文献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列宁格勒市民在围城期间的生活，以及市、区机关为恢复和保护城市基础设施所采取的措施的了解。

切列佩宁娜负责编纂的另一部独特的出版物——包含列宁格勒市民在战争和围城时期日常文书的图册（《战争与围城时期列宁格勒市民的日常文书》[Повседне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ленинградцев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блокады]），展示了在极端条件下记录个人几乎所有生活和活动领域的复杂面向。¹

正是这些情况促使围城居民向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写信。根据这些残存的信件，历史学家得以追溯当局为解决最棘手的国内和社会问题而持续开展的工作。²

圣彼得堡历史学家出版的三卷本资料集《1941—1944年列宁格勒党务领导机关决议中的围城》（Блокада в решениях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ов Ленинграда. 1941—1944 гг.），则是史学史上的显著成果。³所收文献出自圣彼得堡国立中央历史和政治文献档案馆。该资料集首次全文公布了，在列宁格勒围城的最困难时期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所有决议和会议记录。列宁格勒市委与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是主要的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国防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并管理列宁格勒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本资料集揭示了联共（布）在战时列宁格勒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并证明其如何做出影响围城生活的关键决策。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发起出版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议》（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фронта），也将有助于在相关论著中对列宁格勒战役进行更全面的报道和更平衡的评估。⁴

1 Повседне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ленинградцев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и блокады/отв. сост. Н. Ю. Черепенина. СПб., 2020.

2 Обращ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цев к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исьма граждан в Исполком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рсовета: июнь 1941—январь 1943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сост. Н. Ю. Черепенина. СПб., 2023.

3 Блокада в решениях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ов Ленинграда. 1941—1944 гг.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Бюр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х горкома и обкома ВКП (б) и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заседаний. Часть I: Июнь 1941 г. —март 1942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сост. К. А. Болдовский. СПб., 2018; Часть 2: Март—декабрь 1942 г. СПб., 2020; Часть 3: В 2-х книгах. Январь 1943 г.—январь 1944 г.: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Пб., 2022.

4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фронта. Часть 1 (август 1941 г.—март 1942 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отв.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К. А. Болдовский. СПб., 2023.

五、现阶段苏联社会史家中的彼得堡学派

大量文献的出版给予研究人员广泛利用档案资料的机会，既扩大了研究领域，也使研究苏联社会史的圣彼得堡历史学派中的代表出版了大量著作。

尽管在2000年代，俄罗斯革命史研究问题在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工作中不再占据中心地位，但这一问题并没有退居其次。例如，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俄罗斯历史教研室主任安·鲍·尼古拉耶夫（Андр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教授广泛利用各方史料，积极研究国家杜马在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¹

2005—2006年，圣彼得堡国立文化艺术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教授阿·亚·斯米尔诺娃（Алл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мирнова），出版了二部内容丰富的专著²，分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揭示了孟什维克在1917年上半年崛起的原因。作者还指出了导致社会主义者执政失败，以及他们在工人和农民中的声望急剧下降的原因。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团队（尼·尼·斯米尔诺夫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ирнов]、亚·尼·契斯季科夫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истиков]、亚·伊·鲁帕索夫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Рупасов]、瓦·伊·穆萨耶夫 [Вадим Ибрагимович Мусаев]、帕·根·罗戈兹内 [Павел Геннадьевич Рогозный]），对俄罗斯的社会政治与革命运动、侨民史、战后史以及社会史、俄罗斯东正教、日常生活史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深有研究，成果斐然。³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继续在传统的革命主题框架内开展研究。根·列·索博列夫、伊·谢·拉季科夫斯基（Илья Сергеевич Ратьковский）、

1 *Николаев А. Б.* 1) Революция и власть: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27 февраля–3 марта 1917 г. СПб., 2005; 2) Дум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27 февраля–3 марта 1917 года. В 2 т. СПб., 2017; и др.

2 *Смирнова А. А.* 1) На тернистом пути к нежеланной власт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феврале–мае 1917 года. СПб., 2005; 2) От коалиции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мае–ноябре 1917 года. СПб., 2006.

3 *Смирнов Н. Н.* На перелом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итель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дни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СПб., 1994; *Чистиков А. Н.* Партий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юрократи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7–1920-х гг. СПб., 2007; *Рупасов А. И.* 1) Советско-финлянд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редина 1920-х–начало 1930-х гг. СПб., 2001; 2)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офили. СПб., 2021; *Мусаев В. И.* 1)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и борьба с ней. СПб., 2001; 2) Россия и Финляндия: 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и положение диаспор (конец XIX в.–1930-е гг.). СПб., 2007.

米·维·霍佳科夫、奥·亚·加夫里洛娃（Ольг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Гаврилова），在著作中¹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期间俄德接触的问题、国内战争期间货币流通史、1917年“地方自治”（земства）的活动，厘清其在史学史上的混淆与偏见之处。

2016年，著名学者、历史学博士安·亚·伊万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ванов），从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转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拓宽了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的研究领域——得以更为深入地研究20世纪初俄罗斯议会史、政党和意识形态史（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政策。²

教研室还在其他学术方向有所拓展：不仅对研究尚不足的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国家建设问题进行分析（伊·谢·拉季科夫斯、亚·谢·普琴科夫）³，还对20世纪国家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特殊性（米·维·霍佳科夫、叶·德·特维尔久科娃 [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Твердюкова]）加以探讨。⁴教研室一些教师正在积极

-
- 1 Соболев Г. Л. 1) Тайна «немецкого золота». СПб.; М., 2002; 2) Тайный союзник.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СПб., 2009;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Красный террор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ЧК в 1918 году. СПб., 2006; Гаврилова О. А. Зем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СПб., 2009; Ходяков М. В. Деньг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1917–1920 гг. СПб., 2009; Khodjakov Mikhail. V. Mone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0. Newcastle, 2014; и др.
 - 2 Иванов А. А. 1) Последние защитники монархии. Фракция правых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14–февраль 1917). СПб., 2006; 2) Владимир Пуришкевич: опыт биографии правого политика (1870–1920). М.; СПб., 2011; 3) Правые в русском парламенте: от кризиса к краху (1914–1917). М.; СПб., 2013; 4) «Дело чести»: депута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и дуэльные скандалы (1906–1917). СПб., 2018; 5) Пламенный реакционер 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Пуришкевич. СПб., 2020; 6) Вождь черной реакции: Никола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Марков. СПб., 2023; др.
 - 3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1) Дзержинский: от «Астронома» до «Железного Феликса». М., 2017; 2) Хроника красного террора ВЧК. Карающий меч революции. М., 2017; 3) Хроника бел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России. Репрессии и самосуды (1917–1920). М., 2016; 4)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охота на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их вождей (1917–1920). М., 2021; 5) Сталин, Троцкий,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жди и их здоровье. М., 2022; 6) Сталин. 5 лет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1917–1922 гг. СПб., 2023; Пученков А. С. 1)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Деникина (весна 1918–весна 1920 г.). М., 2016; 2) Духовный форпост Росс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 Крыма в 1914–1920 годах. СПб., 2020; 3) Первый год Добровольческой армии: от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Алексеев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до созда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 Юге России (ноябрь 1917 г.–декабрь 1918 г.). СПб., 2021; и др.
 - 4 Ходяков М. В. 1) Децентрализм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1917–1920 гг. СПб., 2001; 2) Деньги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17–1920 годы. 3–е изд. СПб., 2019; Твердюкова Е. Д. 1)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без жертв»: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ая охрана совет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предвоен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СПб., 2010; 2)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внутре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в СССР (конец 1920–х–середина 1950–х гг.).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СПб., 2011; 3) Защита прав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по советскому уголовному праву. СПб., 2019.

研究“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初宪政危机的历史以及各政党在20至21世纪之交的活动(马·费·波雷洛夫、叶·亚·塔拉斯娃 [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Тарасова]、亚·谢·普琴科夫)。¹

和以前一样,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围城问题在教研室研究人员的科研计划中占有特殊地位。在这方面,近年来的代表成果是出版了根·列·索博列夫的三卷本研究专著,其中探讨了1941—1944年城市生活的主要问题。²在此之前,作者还就研究主题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文章。

索博列夫著作的出版,以及对以前封闭的档案资料的广泛利用,推动了新问题的出现,并试图在现代历史现实中理解这些问题。因此,霍佳科夫分析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外国战俘营网络的形成过程,研究战俘关押的卫生和生活条件、逃跑的原因和规模,并对战俘与战俘营领导层的关系、金钱在战俘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亲友通信的重要性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³

在列宁格勒解除纳粹包围(1941—1944)80周年纪念前夕,作为苏联社会史家的主要课题之一的围城史研究方面得到了加强。2021年10月,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为落实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列宁格勒围城史”工作室(лаборатория «История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其中既有公认的专家学者,也有参与整理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的青年研究员。工作室由围城史和战后苏联社会史方面著名学者基·阿·波尔多夫斯基(Кирилл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Болдовский)领导。⁴

1 Тарасова Е. 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кризисы 1992–1993 годов в России. СПб., 2007; Полюнов М. 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в СССР. СПб., 2010; Тарасова Е. А. Потерянн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в 1990–1993 гг. СПб., 2012; Полюнов М. Ф. 1)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Горбачева. 1985–1991 гг. СПб., 2014; 2) СССР: от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 горбачев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940–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80–х гг. СПб., 2021; М. С. Горбачёв: pro et contra, антология. 2–е изд./сост. А. С. Пученков. СПб., 2023.

2 Соболев Г. Л. 1) Ленинград в борьбе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в блокаде.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июнь 1941–май 1942. СПб., 2013; 2) Ленинград в борьбе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в блокаде.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июнь 1942–январь 1943. СПб., 2015; 3) Ленинград в борьбе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в блокаде. Книга третья: январь 1943–январь 1944. СПб., 2017.

3 Ходяков М. В. Иностранцы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в лагерях НКВД–МВД Эстонии. 1944–1949 гг. СПб., 2016.

4 Болдовский К. А. Падение «блокадных секретарей». Партаппарат Ленинграда до и посл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дела». СПб., 2018.

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在最近成立的“列宁格勒围城与保卫战历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обороны и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的框架内进行的，该研究所是列宁格勒围城与保卫战国家纪念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емор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обороны и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的下属部门。该研究所（部）的负责人是列宁格勒围城史方面的权威学者尼·安·洛马金（Никита Андреевич Ломагин），他多年来一直从事该问题的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¹

圣彼得堡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没有忽视围城问题。例如，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亚洛夫（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Яров, 1959—2015）从1988年起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从1998年起担任圣彼得堡欧洲大学（Европ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教授。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列宁格勒围城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著作主要立足于回忆录和日记等个人史料来反映围城时期的日常生活问题。²

在科学院系统工作的安·罗·杰尼斯凯维奇（Андрей Ростиславович Дзенискевич, 1932—2012）和亚·扎·瓦克谢尔（Александр Завелевич Ваксер, 1921—2020），致力于研究与工业生产、主要工业部门状况分析和战后列宁格勒经济恢复有关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涵盖组建民兵时的志愿性、民兵的社会心理以及民兵队伍的军事纪律等问题。³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弗·列·皮亚凯维奇（Владими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нкевич）教授，通过对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经历过围城的列宁格勒居民的口述访谈展开研究⁴，发现在被围困的灾难中，市民们不仅缺乏食物和热量，信息“饥饿”的痛苦和致命程度丝毫不亚于食物饥饿。官方报告的匮乏或不可靠迫使他们依赖非正式消

1 Ломагин Н. А. 1)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блокада. В 2 кн. 2-е изд. М.; СПб., 2002; 2) В тисках голода. Блокада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германских спецслужб, НКВД и письмах ленинградцев. 3-е изд. СПб., 2019.

2 Яров С. В. 1) Блокадная этика. М., 2012; 2)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блокад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М., 2014.

3 Дзенискевич А. Р. 1) Фронт у заводских стен. Малоизуч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обороны Ленинграда (1941–1944). СПб., 1998; 2) Блокада и политика. Оборона Ленинград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е. СПб., 1998; Ваксер А. З.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индустрии. 1945–начало 1950-х гг. СПб., 2015.

4 Пянкевич В. Л. Люди жили слухами: неформально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локадного Ленинграда. СПб., 2014.

息：谣言、排队时的谈话以及自发组织起来的人群中的“闲话广播”（сарафанное радио）。绝望与希望之间源于未知的徘徊，构成了无休止的围城中每一天的现实。

2016年，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为纪念杰出历史学家科瓦丘克对围城研究所做的贡献，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在文集中收入了同仁对这位学者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¹

科瓦丘克的年轻同事们继续对围城史进行研究。圣彼得堡国立邦契-布鲁也维奇通信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имени профессора М. А. Бонч-Бруевича）教师安·瓦·佐托娃（Анастасия Валерьевна Зотова），在其著作中专门论述列宁格勒围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利用史料分析围城的经济状况，重点探讨银行系统、公用事业、邮政、电话局的运作以及研究机构的活动。²

与外国同行间的交流是俄罗斯历史学家进一步开展研究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与叶利钦总统图书馆〔Президент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Б. Ельцина〕合作），于2013年主办了题为“俄罗斯的国家性：20世纪的政权与社会”（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в XX веке）的大型国际会议。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德国、意大利、以色列、土耳其和捷克的19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2017年10月19日至21日，在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学术论坛“俄罗斯大革命：记忆与理解。1917—2017”（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амять и осмысление. 1917—2017）的框架下，教研室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了来自俄罗斯各城市 and 国外的大批历史学家与会。会议分为若干议程，其中包括主题为“中俄历史中的1917年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的中俄圆桌会议。

1917年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已成为联系中俄两国研究者之间的一种纽带。2017年6月，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学术研讨会，致力于了解1917年

1 Война и блокада.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В. М. Ковальчука/отв. ред. А. Н. Чистиков. СПб., 2016.

2 Зотова А. В. Экономика блокады. СПб., 2016.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教训。¹通过在教研室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前来交流的中国青年学者，中俄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得以加强。

教研室教师多次前往哈尔滨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专题报告，加强了中俄研究者间的学术合作，双方就共同参与实施关于中东铁路沿线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达成协议。项目的实施使得集体编纂的相关专著的面世成为可能。²

2023年启动了一项新的中俄联合项目——“中东铁路作为跨境社会文化系统：基于建造历史与数字信息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研究”（Китайско-Восточн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как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ая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истема: истор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ов охраны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该项目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实施。

在总结苏联社会史家中的彼得堡—列宁格勒学派的活动时，应当指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其学术追求中始终将“文献至上”（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документ）和国家方针作为其研究的中心，而不是探讨历史事件中的肤浅或揭发性的面向（легковесные или разоблачительные верс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在这方面，他们显然遵循了“旧学派”代表在研究俄罗斯历史问题时所确立的规则。

（霍佳科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俄罗斯现代史教研究主任；

颜敏翔，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候选人；

孙熠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俄罗斯现代史教研室助理研究员）

1 Самойлов Н. А., Ходяков М. В., Янченко Д. Г. Научный семинар в Пекине, посвященный 100-летию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17. № 4 (21). С. 179–201.

2 Центр и регион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а окраин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894–1917)/Д. Г. Янченко, М. В. Ходяков (отв. ред.), А. А. Иванов, А. Э. Котов, В. Л. Степанов, А. В. Мамаев, Э. О. Сагинадзе, Е. О. Старовойтова, Б. А. Алимджанов, Г. М. Слободзян. СПб., 2020.

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 姚汉昌 |

摘要：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英国在16世纪兴起的古物学，威廉·卡姆登在1586年发表的《不列颠尼亚》是第一部对罗马不列颠时期遗迹进行系统调查的著作。随后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在“现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之父”哈弗菲尔德的推动下，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门科学学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以柯林武德和惠勒为首的考古学家的努力，该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牛津大学在1956年设立“罗马帝国考古学教席教授”，柯林武德的学生李奇曼担任首任教席教授，这标志着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罗马不列颠时期在英国历史上的特殊性以及涉及该时期的文献资料较为贫乏，使得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即是了解英国该时期历史最重要的手段。笔者认为，通过叙述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能够理清该学科知识生产的机制，从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罗马不列颠考古学 哈弗菲尔德 “罗马化” 哈德良长城

恺撒在公元前55和前54年两次试探性地入侵不列颠，除了给后世历史学家留下恺撒为何入侵不列颠这一谜题外¹，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把罗马人的眼光引向这一海岛，为一个世纪后的克劳狄再次入侵不列颠并最终征服这一海岛（英格兰、威尔士、

1 关于恺撒为何入侵罗马不列颠的历史问题，读者可参见Charles G. Salas, “Collingwood’s Historical Principles at Work”,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6, No. 1, 1987, pp. 53–60。

苏格兰南部)奠定了基础,从而把英国带入了文明史时期。直到5世纪初罗马帝国军队撤出海岛为止,罗马不列颠作为罗马帝国的边陲行省,一直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罗马不列颠属于军事行省,因此罗马不列颠时期留下的遗迹,多数与军事设施有关,尤其是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即是有力的证明。然而,正是由于罗马不列颠作为军事行省的地位和地处帝国西北边陲的现实,导致古典作家较少关注罗马不列颠,因此也没有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从而使现代历史学家仅凭文献资料无法构建罗马不列颠清晰的历史面貌。¹另外,5世纪初罗马帝国军队撤出不列颠后,占据海岛的居民明显没有延续罗马帝国文明,更是使罗马不列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故而,考古材料成为了解或构建这一时期历史最主要的资料,也使得考古学在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历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不用说人们有意地去研究罗马不列颠时期的遗迹。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土地财产概念在英国的形成,寻找土地的历史来源成了宣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手段之一。因此,英国的古物学家开始把眼光投向英国历史上的遗迹。同时,英国皇家需要找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历史上曾经统一的证据,罗马不列颠时期引起了古物学家极大的兴趣。在此背景下,罗马不列颠的遗迹首次得到系统的考察和记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对罗马不列颠时期遗迹的收集和研究一直是英国知识分子的爱好。19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向帝国转变,推动着罗马不列颠考古学进入新的阶段,表现为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考古协会大量地涌现,罗马不列颠的遗址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挖掘,尤其是哈弗菲尔德的推动以及从蒙森那里引进了“罗马化”观念,使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也使罗马不列颠这一时期的历史开始得到重视并进行书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英国政府发起了抢救性考古挖掘运动,更是推动了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从而使罗马不列颠成了罗马帝国众多行省中得到最为充分研究的行省。²

1 古典时期的作品涉及罗马不列颠的有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塔西佗的《编年史》《阿古利可拉传》,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史》等。

2 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行省和高卢行省也得到充分的研究,尤其是在德国,涌现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

一、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兴起

早在中世纪时期，历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516?—约570）就已提到不列颠受到罗马帝国入侵和占领的历史，在其著作《不列颠的毁灭与征服》（*On the Ruin and Conquest of Britain*）中叙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¹比吉尔达斯稍晚一点的内尼阿斯（Nennius）写了《不列吞史》（*The History of the Britons*），记述了直到796年为止的英吉利诸王的世系。²然而，这两本史书作为史料对了解罗马不列颠历史的价值并不明显。直到被誉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Bede，673—735）写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该书从不列颠的史前时代开始写起，其中记载了恺撒和克劳狄入侵不列颠的历史。虽然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涉及罗马不列颠的篇幅不大，但由于它相较于之前的史书更具可靠性，因此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重视，“在材料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写作技巧方面，在所有中世纪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其他作品可以比得上它”³。进入12世纪后，早期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95—约1143）、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1118）和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约1088—约1157），后期的豪顿的罗杰（Roger of Howden，?—约1202）和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约1146—约1223）等历史学家，都对罗马不列颠产生兴趣，并留下丰富的著述。值得一提的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是第一个记录罗马碑铭的英国人，虽然他对碑铭的解读并不准确。⁴虽然从中世纪开始，英国历史学家对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历史就充满兴趣，但是由于现代考古学还没有建立，无法为中世纪历史学家构建该时期的历史提供坚实的材料，使得对罗马不列颠时期的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各国纷纷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而位于欧洲西北边陲的英国更是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活动。同时，英国

1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0—261页。

2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261页。

3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266页。

4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in Malcolm Todd ed., *A Companion to Roman Britai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 443.

的土地财产概念开始形成，寻找土地的历史来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土地贵族宣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对外需要一种理论作为殖民扩张的依据，对内则需要寻找古物遗迹为新兴的土地财产概念服务。因此，古物学家（Antiquaries）把目光投向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历史遗迹。然而，把不列颠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要归功于威廉·卡姆登。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被誉为英国近代最伟大的古物学家，他的巨著拉丁文版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出版于1586年，是第一本详细论述罗马行省不列颠的历史遗迹的著作。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卡姆登在1587、1590、1594、1600和1607年发表了修订版。该书不但在英国本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在欧洲大陆得到回应。1610年该书由菲尔蒙·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 1552—1637）译为英文，使之能够为更多的读者所阅读，并且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即“地志描述”（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地志学（Chorography）起源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在近代英国被用来描绘英格兰的地貌类型。¹地志学的复兴反映了从16世纪开始英国土地财产概念的形成，通过地志学，土地贵族可以通过追溯土地的历史来源来确保其拥有土地的合法性。而对皇家来说，“因为罗马不列颠包括大不列颠的大部分——英格兰全部、威尔士和南苏格兰的大部分——这可以被视为大不列颠再次统一的历史榜样”²。由此可见，该时期的古物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古物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这样评价卡姆登，“培根自己的同时代人卡姆丹，已经根据最优秀的文艺复兴传统在研究不列颠的地形学和考古学了；他指出未经记忆的历史怎样能够根据多少有点像是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在使用数据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那样的数据而能够重行建立起来”³。

在18世纪为罗马不列颠研究开辟新道路的是古物学家和长老会牧师（Presbyterian

1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j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 by Philemon Holland, London: Impensis Geojii & Ioannis Norton, 1610.

2 Richard Hingley, *The Recovery of Roman Britain, 1586–1906: A Colony So Ferti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2.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杨·冯·德·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minister) 约翰·霍斯利 (John Horsley, 1685—1732), 他把对罗马不列颠的研究引导到了一条新的、富有成效的道路上。¹霍斯利的生平信息较为模糊。目前认为霍斯利出生在苏格兰的穆塞尔堡 (Musselburgh), 随后在纽卡斯尔皇家文法学校 (Royal Grammar School, Newcastle) 学习, 1701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曾在纽卡斯尔教授自然科学。由于他工作和专业的便利与需要, 他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广泛的旅行, 与此开始系统地记录这些地区的遗址、雕像和铭文。霍斯利最重要的著作是1732年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的《罗马不列颠》(*Britannia Romana*, 或者《不列颠的罗马古物》[*The Roman Antiquities of Britain*]), 这是1900年之前出版的对罗马不列颠地区进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²霍斯利的《罗马不列颠》在罗马不列颠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该书“第一次涉及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用于罗马-英国古物的解读”³。另外, 霍斯利的主要贡献还有对哈德良长城等北方军事设施的研究, 这为20世纪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研究哈德良长城揭开了序幕。⁴

继霍斯利之后较为关键的古物学家是威廉·斯蒂克利 (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 斯蒂克利是“伦敦古物社团”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的创始成员 (1707)。⁵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 当时的社会上流阶层还是以土地贵族为主, 由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对古物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个时期除了一些著名的古物社团外, 同时还出现了众多小团体。也是在这个时候, 考古学开始出现, “在18世纪40年代, 一个叫约翰·斯泰尔 (John Stair) 的本地人, 对位于斯尔切斯特 (Silchester) 的罗马城镇遗址进行了首次挖掘, 并制定对城墙、街道体系和中央广场进行挖掘的计划”⁶。纵观这个时期对罗马不列颠时期历史的重建, 它反映了英国精英

1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p. 447.

2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p. 447. 霍斯利的《罗马不列颠》一书出版于1732年的3或4月份, 但霍斯利逝世于该年的1月份, 享年46岁。

3 George MacDonald, “John Horsle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2, Part 2, 1932, p. 161.

4 George MacDonald, “John Horsley”, p. 162.

5 John Schofield, John Carman and Paul Belfor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in Great Britain: A Heritage Handbook*,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1, p. 27.

6 Richard Hingley, “Early Studies in Roman Britain: 1610 to 1906”, in Martin Millett, Louise Revell and Alison Moor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

不断增长的帝国野心。这种野心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类比法，即罗马帝国对不列颠的征服就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就相当于过去罗马帝国对不列颠的殖民。

同样在18世纪为罗马不列颠研究做出贡献的还有威廉·罗伊（William Roy, 1726—1790）。罗伊和霍斯利都是苏格兰人，而且两人对苏格兰的罗马不列颠遗迹的关注与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基于原始田野调查的最优秀、最具原创性的著作是由苏格兰人威廉·罗伊发表的。”¹罗伊本人是军队工程师和军事测量员，这种专业素养为罗伊介入古物学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苏格兰长期绘制地图的过程中，罗伊形成了对罗马不列颠的兴趣，“18世纪中叶，苏格兰南部仍能看到大量的罗马遗迹，这激发了威廉·罗伊对古物学的兴趣”²。1754年，罗伊在爱丁堡与罗伯特·梅尔维尔（Robert Melville）相遇，两人后来终生保持着友谊，这对罗伊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罗伊通过对罗马在北方战役的卓越了解，为他在1793年出版《英国罗马人的军事古物》（*Military Antiquities of the Romans in Britain*）奠定了基础。³当然，作为一位专业的制图员，他的地图和图纸可信且富有价值，尤其是他所绘制的安东尼长城的地图，但罗伊对历史的解读却是另一番景象。

到了19世纪早期，新的职业阶层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对遗迹也开始有了兴趣。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理查德·柯尔特·霍尔（Richard Colt Hoare, 1758—1838）和威廉·坎宁顿（William Cunnington, 1754—1810）。⁴霍尔是古物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和旅行者，出生于一个银行家家庭。霍尔是第一个对自己的家乡威尔特郡（Wiltshire）进行考古研究的学者。而坎宁顿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商人，坎宁顿的考古挖掘工作得到霍尔的赞助。也是在这个时期，“塞缪尔·莱森斯（Samuel Lysons）在1789和1819年之间对英格兰东南部的几处罗马庄园的遗址进行了一次卓越的挖掘”⁵。

1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p. 447.

2 R. A. Gardiner, “William Roy, Surveyor and Antiqua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3, No. 3, 1977, p. 443.

3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p. 447.

4 John Schofield, John Carman and Paul Belfor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in Great Britain: A Heritage Handbook*, p. 28.

5 Richard Hingley, “Early Studies in Roman Britain: 1610 to 1906”, p. 9.

19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奥古斯都·皮特·里费斯（Augustus Pitt Rivers, 1827—1900），对罗马不列颠的考古挖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古斯都·皮特·里费斯着手考古挖掘，其挖掘范围包括约克郡、苏塞克斯、伦敦和爱尔兰。在1880年，他继承了在克兰伯恩（Cranborne）28000英亩的地产，这给他提供了重要的财富和原始挖掘场地”¹。后来，牛津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收藏了他收集的22000件古物。

从近代以来，众多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对罗马不列颠历史的发现和重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然而，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却要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才最终形成，“虽然古物学家对罗马不列颠兴趣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当前该学科的起源还是来自19世纪最后的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两个明显的趋势是：首先，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工业化和基础设施飞快发展而来的是古物数量的增加。其次，对考古兴趣的增长，加上财富的大量集中，推进考古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²。但是，不应该低估，这几个世纪里古物学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形成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通过众多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时机才臻于成熟。

二、哈弗菲尔德与现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建立

借助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料积累并依靠一系列最新的挖掘成果，包括哈德良长城艾尔斯福德段（Aylesford）、克兰伯恩狩猎场段（Cranborne Chase）和斯尔切斯特段的考古挖掘，哈弗菲尔德等那一代考古学家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罗马不列颠的认识。³在这种背景下，哈弗菲尔德通过自己所在的学术圈和私人关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罗马不列颠的研究团队。1910年，“罗马研究促进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1 Malcolm Todd, “The Rediscovery of Roman Britain”, p. 456.

2 Martin Millett, “Roman Britain since Haverfield”, in Martin Millett, Louise Revell and Alison Moor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oman Britain*, pp. 22–23.

3 Richard Hingley, “Early Studies in Roman Britain: 1610 to 1906”, p. 13.

Roman Studies) 成立, 为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哈弗菲尔德, 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协会的首任主席。同时, 英国的罗马不列颠考古工作与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然而, 在哈弗菲尔德所处的时代, 罗马不列颠考古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时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普遍是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在20世纪的上半叶, 由于英国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 考古挖掘虽然得以继续, 但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¹

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与哈弗菲尔德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他不仅首次定义目前正在研究的证据类别, 在为这一主题创建历史框架时, 还建立了评估罗马占领这些岛屿后果的解释框架”²。哈弗菲尔德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德国引进并完善“罗马化”观念, 推动“罗马研究促进协会”的建立以及创办《罗马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Francis J. Haverfield, 1860—1919)于1860年出生在沃里克郡斯托尔的西普斯顿(Shipston on Stour in Warwickshire), 父亲为教区的牧师。欣格利(Richard Hingley, 1951—)认为, “1868年在巴斯(Bath)的罗马遗址重大发现, 可能给正在学习拉丁文的哈弗菲尔德一种特别的真实感”³。英国巴斯地区在19世纪以出土众多罗马时代的澡堂遗址而闻名于世。随后哈弗菲尔德分别在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求学, “在牛津大学时期, 他在Honour Moderations考试中获得第一等的荣誉等级, 却没能在*Greats*获得好成绩, 是源于对哲学的不感兴趣”⁴。随后他成为兰辛学院(Lancing College)的老师, 这给了他在假期到国外进行研究的机会, 借此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遗址。也就是在兰辛

1 I. A. Richmond, “Roman Britain, 1910–1960”,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0, Parts 1 and 2, 1960, pp. 173–191.

2 P. W. M. Freeman, *The Best Training-Ground for Archaeologists: Francis Haverfield and the Invention of Romano-British Archaeology*, Oxford: Oxbow Books, 2007, p. xi.

3 Richard Hingley, *R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Roman Arch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2.

4 Richard Hingley, *R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Roman Archeology*, p. 12. Honour Moderations是牛津大学“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不包括哲学, 考试时间在第二学年, 而*Greats*的考试则在第四学年。*Greats*即“人文学科”(Literae Humaniores), 是牛津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古典学学科, 所学习的范围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文学、希腊和罗马历史、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哈弗菲尔德缺乏哲学思想这一事实, 后来受到他的学生柯林武德委婉的批评。

时期，哈弗菲尔德在德国遇到了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哈弗菲尔德通常被视为“现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之父”。¹ 哈弗菲尔德早期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碑铭上，但很快就转到罗马不列颠的考古学上来，并在1892年获得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高等研究员的职位。在1907年，他被任命为卡姆登古代史教席教授（Camden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接替好友亨利·佩勒姆（Henry Francis Pelham，1846—1907）的位置。在德国接触蒙森成为哈弗菲尔德把“罗马化”观念引进英国的关键，在其最为重要的文章——《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中，哈弗菲尔德完整地阐述了“罗马化”观念，其重要性在于给罗马不列颠的定位，“罗马不列颠只是一个世界帝国的一个行省，需要研究它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他所研究的东西是一个伟大帝国的生活和文明的表现。他认为罗马不列颠不是英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省份”²。从《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一文中不难看出，哈弗菲尔德认为，不列颠不仅仅是罗马帝国中的一个军事行省，罗马帝国在征服不列颠后，不列颠就开始了罗马化的进程。

事实上，哈弗菲尔德服务于多个考古委员会，但在1911年成为“罗马研究促进协会”首任主席的意义更为深远。该协会的缘起与“罗马英国学校”（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相关，该机构的负责人阿什比在1908到1909年之间给“希腊协会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Hellenic Society）送去一份备忘录，请求该机构能够获得与“雅典英国学校”（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相等的资助。虽然“希腊协会委员会”无法满足这一请求，但提议“希腊协会”的成员、“古典协会”（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和其他团体重视拉丁研究和支持其他能够满足“罗马英国学校”财政需求的措施。最后大多数成员倾向于创建一个与“希腊协会”并行的团体，用以推动拉丁文化研究。“罗马协会委员会”在1910年10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哈弗菲尔德被提名为主席，这一职位他一直保留到1919年逝世为止。会议上协会任命“英国皇家考古研究所”（the Royal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的秘书G. 哈丁·泰勒（G. Hardinge-Tyler）为协会的秘书和协会主办并出版的《罗马研究期刊》的主编，哈弗

1 Christopher Stray, “‘Patriots and Professors’: A Century of Roman Studies, 1910–2010”, *Britannia*, Vol. 41, 2010, pp. 1–31.

2 H. H. E. Craster, “Francis Haverfiel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35, No. 137, 1920, pp. 63, 69.

菲尔德执笔了该期刊的发刊词。¹在发刊词中，哈弗菲尔德定义了协会的宗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大学更有必要提供帮助，因为近年来，整个罗马考古和历史，变得比我们大多数人开始学习时更加困难和技术性更强，因此，罗马帝国的一般知识对罗马不列颠的学生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如果我们的协会能够做任何事情，来促进大学职工和全国各地考古人之间的良好理解，我们就不会徒劳地建立它”²。

“罗马研究促进协会”主办的《罗马研究期刊》是英国第一份刊登罗马不列颠研究成果的全国性期刊，这对推动罗马不列颠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期刊努力通过保持最早几卷中设定的高标准来满足成员的要求；它是为了发表研究成果，并试图跟上研究的步伐，同时保持学科和时代的平衡，特别是在历史和考古方面；它的成果包括从新的角度对问题或人物的一般处理”³。当然，《罗马研究期刊》除了刊登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属于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尼亚》（*Britannia*）期刊的出现，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才真正拥有自己的专门期刊。当然，需要提及的是，《罗马研究期刊》并不是英国唯一刊登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刊物。自16世纪以来，英国知识界对罗马不列颠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物就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涌现了众多的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出现了众多地方性的考古学研究协会和研究期刊，如“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古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Newcastle upon Tyne）、“坎伯兰和威斯莫兰古物和考古学会”（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等学会的会刊。⁴但

1 F. Haverfield, “An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Firs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11 May, 1911”,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1, 1911, pp. xi-xx.

2 F. Haverfield, “An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First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11 May, 1911”, p. xx.

3 M. V. Taylor,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 1910-60”,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0, Parts 1 and 2, 1960, p. 132. 泰勒一生与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紧密相连，曾多次与柯林武德联名在《罗马研究期刊》上刊登文章。

4 *Archaeologia Aeliana* 是英国最古老的地方考古学协会“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古物协会”的官方刊物，而 *CW* 则是“坎伯兰和威斯莫兰古物和考古学会”（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官方刊物，*CW* 是《坎伯兰和威斯莫兰古物和考古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缩写。两个协会作为姐妹协会，共同组织哈德良长城的朝圣之旅（Hadrian's Wall Pilgrimage）。

是，由于《罗马研究期刊》是全国性的专业刊物，其影响力是地方期刊所无法比拟的。

除了引进“罗马化”观念、推动“罗马研究促进协会”建立和创办《罗马研究期刊》之外，哈弗菲尔德的另一成就就是参与蒙森主编的《拉丁碑铭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1847年，蒙森等人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收集、编订并出版一套系统的拉丁铭文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数百名学者对这些铭文进行了零散的描述。随着罗马帝国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知识界迫切需要新的碑铭材料，需要对这些零散的材料进行整合，以便于学术界使用。蒙森作为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自然而然地成为该丛书的主编。每个分卷编者的主要工作涉及对遗址和纪念碑进行检查，并采用手绘的形式试图尽可能多地复制原作。在那些原件已经消失或者毁坏的情况下，主编需要通过比较之前作者作品中已发表铭文的版本来获得准确的解读。《拉丁碑铭汇编》目前共有17卷。¹其中，由埃米尔·希布纳(Emil Hübner, 1834—1901)主编的分卷《不列颠拉丁碑铭》(*Inscriptiones Britanniae Latinae*)于1873年出版。然而，由于希布纳主编的版本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部分是因为希布纳本人不是英国人，虽然他能够通过英国的朋友获得碑铭材料)，这一卷迫切需要新的版本，而由于哈弗菲尔德在碑铭研究领域具有国际性声誉，因此提供新版本的重任就落在了哈弗菲尔德的身上，最后由柯林武德所完成。

由于哈弗菲尔德等人的努力，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飞速的发展。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Luftwaffe)对英国本土的轰炸，给英国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同时也为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1 Vol. I: *Inscriptiones Latinae antiquissimae ad C. Caesaris mortem* (1893); Vol. II: *Inscriptiones Hispaniae Latinae* (1892); Vol. III: *Inscriptiones Asiae, provinciarum Europae Graecarum, Illyrici Latinae* (1873); Vol. IV: *Inscriptiones parietariae Pompeianae, Herculenses Stabianae* (1871); Vol. V: *Inscriptiones Galliae Cisalpinae Latinae* (1872); Vol. VI: *Inscriptiones Urbis Romae Latinae* (1876); Vol. VII: *Inscriptiones Britanniae Latinae* (1873); Vol. VIII: *Inscriptiones Africae Latinae* (1881); Vol. IX: *Inscriptiones Calabriae, Apuliae, Samnii, Sabinorum, Piceni Latinae* (1883); Vol. X: *Inscriptiones Bruttiorum, Lucaniae, Campaniae, Siciliae, Sardiniae Latinae* (1883); Vol. XI: *Inscriptiones Aemiliae, Etruriae, Umbriae Latinae* (1888); Vol. XII: *Inscriptiones Galliae Narbonensis Latinae* (1888); Vol. XIII: *Inscriptiones trium Galliarum et Germaniarum Latinae* (1899); Vol. XIV: *Inscriptiones Latii veteris Latinae* (1887); Vol. XV: *Inscriptiones Urbis Romae Latinae. Instrumentum domesticum* (1891); Vol. XVI: *Diplomata militaria* (1936); Vol. XVII: *Miliaria Imperii Romani* (1986).

一个重要的契机。由于需要对被破坏的遗址进行抢救性的挖掘，政府加大了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力度。这个时期承担考古挖掘工作任务的团体，除了专业的考古人员之外，普通民众也加入了这一抢救运动中，并把它当作一种业余的追求。艾琳·福克斯（Aileen Mary Fox, 1907—2005）、威廉·弗朗西斯·格莱姆斯（William Francis Grimes, 1905—1988）、凯斯琳·M. 凯尼恩（Dame Kathleen Mary Kenyon, 1906—1978）和谢泼德·弗里尔（Sheppard Sunderland Frere, 1916—2015），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学家。弗里尔的代表作《不列颠尼亚：罗马不列颠史》（*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首次出版于1967年。在他的影响下，以发表罗马不列颠考古挖掘研究成果为对象的期刊《不列颠尼亚》，在1970年发布了首卷，弗里尔作为第一任主编（1970—1980）。《不列颠尼亚》的出现意义非凡，除了推动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之外，也标志着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拥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期刊。《不列颠尼亚》与欧洲大陆早已存在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 1918）期刊和《高卢》（*Gallia*, 1943）期刊，一同构成了罗马帝国行省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高校纷纷设立了考古学系，罗马不列颠作为考古学系中的主体，开始受到高校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伊恩·李奇曼（Ian A. Richmond, 1902—1965），在牛津大学期间就被柯林武德推荐到惠勒的挖掘现场进行考古挖掘¹，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奇曼在1956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任“罗马帝国考古学教席教授”（Professor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oman Empire），李奇曼逝世后，弗里尔成为第二任教授。除了牛津大学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各个高校纷纷成立考古学系，“在60年代，已有的考古系得到壮大并开始给本科生提供考古学学位（之前大多数大学的考古学只是以一门辅助学科的形式存在）。另外，新建立的大学，如南安普顿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莱斯特大学都把考古学当作一个重点支持的学科。因此，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提供学位的考古课程纷纷出现，学院教职也相应诞生，其中大多数活跃在罗马不列颠的研究领域中。一些已有该学科基础的大学则加强优势，牛津大

1 S. S. F., “Ian Archibald Richmond, 1902–65”,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5, No. 1/2, Parts 1 and 2, 1965, pp. xiii–xiv.

学在1956年就设立了‘罗马帝国考古学教席教授’，让古典学和历史学的学生也学习考古学。杜伦大学建立了学科齐全的考古系，同时保持扩大对罗马不列颠的研究力度”¹。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支持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自此，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才真正在学院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对于之前的由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充当的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学院终于有了专门的教职。

三、《不列颠罗马碑铭集》与其他史料

柯林武德逝世后，有人把《不列颠罗马碑铭集》视为柯林武德留给世人最重要的著作。碑铭对构建罗马不列颠时期的历史具有关键的作用，由于文献资料的稀缺，使得碑铭成为书写罗马不列颠时期历史最重要的材料。因此，自12世纪开始，英国知识分子就开始注意收集拉丁碑铭。但是，第一本对碑铭进行系统收集的著作却要等到18世纪才面世。霍斯利的《罗马不列颠》出版于1732年，其中对罗马不列颠所有已知铭文的收录，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霍斯利用等比例的方式绘画他自己能够检查的所有东西，或者请朋友为他检查和绘制。²采用手绘的方式一直是英国考古学界的传统，尤其是柯林武德，更是把这一传统推向了巅峰。1873年希布纳的版本出现后，霍斯利的版本被取代。但是，作为一位德国人，希布纳的版本存在着众多缺陷，促使英国本土的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哈弗菲尔德。哈弗菲尔德的杰出能力使他成为新版本《不列颠罗马碑铭集》（*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的主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进程。

哈弗菲尔德曾经希望在奇斯曼（G. L. Cheesman, 1884—1915）的协助下完成碑铭集的工作。然而，1915年8月10日，奇斯曼在苏弗拉湾（Suvla Bay）阵亡，使得哈弗菲尔德的希望落空。奇斯曼的阵亡是罗马不列颠考古学领域的重大损失，使得哈弗菲尔德采用一种不常见的方式悼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即在《罗马研究期刊》

1 Martin Millett, “Roman Britain since Haverfield”, p. 33.

2 Eric Birley, “Reviewed Work (s):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I: Inscriptions on Stone* by R. G. Collingwood and R. P. Wright”,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6, Parts 1 and 2, 1966, p. 226.

刊登讣告，“一般来说，《罗马研究期刊》不刊登讣告。但是，一位最有前途的年轻历史学家，一位该期刊的撰稿人，同时也是我们协会的成员，他的去世无论如何都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他为国家而死时，几句记录和遗憾的话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¹。罗马辅助军队研究专家奇斯曼是哈弗菲尔德最为优秀的学生之一，先后获得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1903—1907）的奖学金。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后，奇斯曼最开始在基督教会学院任职，一年后回到新学院任研究员（1908年7月）。在新学院经费的支持下，他有一年的时间到罗马帝国的行省旅游。1910年后，他开始定期授课和演讲，并着手自己在罗马史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罗马辅助军团的研究。1911年他凭借一篇关于罗马帝国辅助军队的文章获得阿诺德奖（Arnold Prize）。同时他还为《罗马研究期刊》和《古典评论》（*Classical Review*）写文章。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在英国科布里奇（Corbridge）和里本切斯特（Ribchester）的罗马遗址考古挖掘。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奇斯曼一本关于罗马辅助军团的著作已经接近完成了。²

奇斯曼的阵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哈弗菲尔德的早逝，哈弗菲尔德眼中的奇斯曼是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他阅读速度快，能精确记住他阅读过的东西，能把知识很好的记住和运用。他也是身体力行的人；在研究罗马军队时，他进行对比研究，并寻找对现代人和现代军队体系有帮助的建议。总之，他有令人信服和明确的历史判断；他能提出原创性的观点并进行证明”³。奇斯曼的研究专长是罗马不列颠辅助军队领域，如果奇斯曼能够在战场中存活下来，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⁴奇斯曼死后，哈弗菲尔德又希望，因十月革命从俄罗斯流亡到英国的历史学家M. I. 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Ivanovich Rostovtzeff, 1870—1952）能够继承他的工作，完成罗马不列颠碑铭集的出版，但罗斯托夫采夫之后去了美国。由于柯林武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了哈弗菲尔德唯一留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哈弗菲尔德，这个学科里的大师，死于1919年；他大多数的学生死于战争，我是唯一一个被他训练成罗马不列颠的专家并留在牛津的人；即使

1 F. Haverfield, “Leonard Cheesma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 1915, p. 147.

2 George Leonard Cheesman, *The Auxilia of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3 F. Haverfield, “Leonard Cheesman”, p. 147.

4 Martin Millett, “Roman Britain since Haverfield”, p. 24.

我的哲学研究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为了哈弗菲尔德，我想我自己有义务使他建立的罗马不列颠的研究持续下去，把他教给我的方法传播开去，并利用他留给牛津大学的专业图书馆。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我谢绝了战后所有教席和其他的邀请”¹。也因此，日后柯林武德才成为《不列颠罗马碑铭集》新主编。

柯林武德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使他成了接手这一重任的人选。²因此，哈弗菲尔德遗产（Haverfield's Bequest）的管理员，委托柯林武德承担《不列颠罗马碑铭集》的收集及出版工作。于是，收集“罗马不列颠拉丁碑铭”就成了柯林武德20世纪20到30年代的主要工作。在一篇探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之区别的文章开头（其文风很容易让人想起贝克莱的名著《海拉斯和斐洛诺斯对话三篇》），柯林武德写道，“旅馆灰蒙蒙地伫立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路上，靠近悬崖边上。一英里之内没有村庄，十英里之内也没有城镇；唯一的声是海拍打悬崖的声音和狂风。但在里面，我发现另外两个临时流浪汉，一边喝茶一边吃培根；当他们说完之后，他们似乎又开始了一场长期的争论。在我原先的饥饿感被消除之后，我就开始注意这场争论”³。相较于贝克莱在《海拉斯和斐洛诺斯对话三篇》开篇中的安逸，柯林武德文章的开头呈现的是收集碑铭过程中的艰辛。

柯林武德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利用有限的经费和假期，跑遍了整个英国，甚至有些地方还不止造访一次。相对于蒙森主编的《拉丁碑铭汇编》版本，柯林武德主编的版本基本上采用手绘的方式收集碑铭。这种收集方式能够呈现重要的信息。然而，30年代后柯林武德的健康逐渐影响了其学术工作，迫使他不得不把该项工作移交给怀特（R. P. Wright）。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柯林武德和怀特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在准备把材料送往柏林出版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出版计划再一次被打断。最后，直到1965年，《不列颠罗马碑铭集》第一卷才由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现在，在《拉丁碑铭汇编》第7卷出版92年后，在哈弗菲尔德去世46年后，柯林武德去世22年后，哈弗菲尔德计划的这部作品的第一卷，也是主要的一卷终于出

1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 120.

2 I. A. Richmond, "Appreciation of R. G. Collingwood as an Archaeologis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29, 1943, p. 476.

3 R. G. Collingwood, "Science and History", *The Vasculum*, Vol. 9, 1923, p. 52.

版，柯林武德和怀特分享了在这部作品上共同署名的荣誉”¹。第二卷在1990年面世²，第三卷则在2009年出版。³至此，距离蒙森在1847年开启这项工作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几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者，致力于推动碑铭收集、出版工作的进展，为了推进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了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准确和可靠的材料，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不列颠罗马碑铭集》作为第一部英国人主编的大型资料汇编，不仅在英国国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外也受到欢迎，对推动罗马不列颠研究具有非凡意义。除了《不列颠罗马碑铭集》外，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还编订了其他资料集。《罗马世界雕像汇编》（*Corpus Signorum Imperii Romani, CSIR*）出版工作于1963年在巴黎宣布启动，第一卷由阿尔弗雷德·诺依曼（*Alfred Neumann*）题词，并由CSIR奥地利委员会主席弗里茨·艾克勒（*Fritz Eichler*）作序，于1967年出版。为了收集并出版罗马不列颠的雕像，英国成立了一个由李奇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计划用三卷的篇幅收集罗马不列颠的雕像。⁴第一卷出版于1977年，截至2023年，共有11册面世。⁵由喀什等人（*Stephen R. Cosh and David S. Neal*）主编的四卷本《不列颠罗马马赛克》（*The*

1 Eric Birley, “Reviewed Work (s):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I: Inscriptions on Stone* by R. G. Collingwood and R. P. Wright”, p. 226.

2 R. G. Collingwood,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Volume II: Instrumentum Domesticum* (with R. P. Wright), edited by S. S. Frere, M. Roxan and R. S. O. Tomlin, Gloucester: Alan Sutton. In eight fascicules, published from 1990 to 1995. Fascicules 2–8 edited by S. S. Frere and R. S. O. Tomlin. Volume of Epigraphic Indexes compiled by S. S. Frere. (Contains 115 drawings by Collingwood.)

3 Jonathan R. W. Prag, “Reviewed Work (s): *The 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Volume III: Inscriptions on Stone*, found or notified between 1 January 1955 and 31 December 2006. By Tomlin, Wright and Hassall. Oxbow Books, Oxford and Oakville, 2009”, *Britannia*, Vol. 43, 2012, pp. 459–461.

4 Vol. I: *Fascicules of sculpture from Roman Britain*; Vol. II: *Fascicules of Roman sculpture from abroad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III: *Fascicules of Roman sculpture from abroad in othe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Britain*.

5 1. *Corbridge, Hadrian's Wall East of the North Tyne*, by E. J. Phillips, 1977; 2. *Bath and the Rest of Wessex*, by B. W. Cunliffe & M. G. Fulford, 1982; 3. *Yorkshire*, by Sergio Rinaldi Tufi, 1983; 4. *Scotland*, by L. J. F. Keppie & Beverly J. Arnold, 1984; 5. *Wales*, by Richard J. Brewer, 1986; 6. *Hadrian's Wall West of the North Tyne, and Carlisle*, by J. C. Coulston & E. J. Phillips, 1988; 7. *Roman Sculpture from the Cotswold Region, with Devon and Cornwall*, by Martin Henig, 1993; 8. *Roman Sculpture from Eastern England*, by Janet Huskinson, 1994; 9. *Roman Sculpture from the North West Midlands*, by Martin Henig, 2004; 10. *Roman Sculpture from London and the South-East*, by Penny Coombe, Francis Grew, Kevin Hayward & Martin Henig, 2015; 11. *The Hinterland of Hadrian's Wall and Derbyshire*, by Lindsay Allason-Jones, 2023.

Roman Mosaics of Britain), 则收集了罗马不列颠所遗留的马赛克艺术。¹ 由里维特和斯密斯 (A. L. F. Rivet and Colin Smith) 主编的《罗马不列颠的地名》(*The Place-Names of Roman Britain*), 关注的是罗马-英国城市名字两个方面的内容: 它们的身份和语言方面。第一部分包括对地名、托勒密的《地理学》、《波伊廷格表》、《安东尼行程表》、《拉文纳宇宙学》和《百官志》的文学参考。第二部分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称列表, 每个名称都给出了来源、标志和语言推导。这些材料构成了罗马不列颠研究的基本材料, 是进行罗马不列颠历史构建的核心材料之一。²

四、柯林武德和“伯利学派”

哈弗菲尔德去世后, 柯林武德成了哈弗菲尔德唯一留在牛津大学的学生, 这使柯林武德对哈弗菲尔德、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具有一种使命感, “哈弗菲尔德, 这个学科里的大师, 死于1919年; 他大多数的学生死于战争, 我是唯一一个被他训练成罗马不列颠的专家并留在牛津的人; 即使我的哲学研究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为了哈弗菲尔德, 我想我自己有义务使他建立的罗马不列颠的研究持续下去, 把他教给我的方法传播开去, 并利用他留给牛津大学的专业图书馆。正是出于这种责任, 我谢绝了战后所有教席和其他的邀请”³。从1919到1939年之间, 柯林武德发表了大量关于考古学的文章和著作, 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学术荣誉。因此, 柯林武德虽然现在以《历史的观念》闻名于世, 但他生前作为考古学家比他作为哲学家更为人所知, 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视为罗马不列颠考古领域的权威。

作为考古学家的柯林武德, 他延续了哈弗菲尔德在牛津大学开创的“罗马化”研究传统; 他撰写的《罗马不列颠考古》是该领域第一本权威的研究手册, 在1967

1 Stephen R. Cosh and David S. Neal eds., Volume I: *NORTHERN BRITAIN, incorporating the Midlands and East Anglia*,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2002; Volume II: *SOUTH-WEST BRITAIN*,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2006; Volume III: *SOUTH-EAST BRITAIN*,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2009; Volume IV: *WESTERN BRITAIN, including Wales*,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2010; Volume V: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since 2010*,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2024.

2 A. L. F. Rivet and Colin Smith, *The Place-Names of Roman Britai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p. 120.

年弗里尔的《不列颠尼亚：罗马不列颠史》出版之前，一直是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唯一的参考手册。¹杜森给予《罗马不列颠考古》极高的评价，“《罗马不列颠考古》大概是柯林武德最为成功的著作，并且它在考古学界的影响能够媲美《历史的观念》在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影响”²。他收集和主编的《不列颠罗马碑铭集》是研究罗马不列颠的原始史料，有评论者把这一著作视为柯林武德留给世人最大的成就。³他在1913到1939年之间撰写了150余篇考古文章，全面反映了该时段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进程。⁴最为重要的是，柯林武德总结并传播的考古原则如今成为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柯林武德的考古思想对他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考古实践为他历史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一言以蔽之，柯林武德成功地延续了哈弗菲尔德在牛津大学所开创的传统，并推动牛津大学成为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柯林武德无疑是罗马不列颠领域的主要权威：“哈弗菲尔德死后，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柯林武德成了这领域的‘大师’：他接手哈弗菲尔德的工作并成为这领域的主要权威，所有年轻的学者都把柯林武德当作导师和指导员。”⁵而另一位较为重要的考古学家是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1890—1976）。⁶惠勒的考古挖掘生涯开始于191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惠勒成为一名军官，并在科尔切斯特的巴尔卡门（Balkerne Gate, Colchester）挖掘了一个地下酒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先在威尔士进行考古挖掘，在那里他成了威尔士国家博物

1 R. G. Collingwood, *The Archaeology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Methuen, 1930, 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I. A. Richmond, London: Methuen, 1969.

2 Jan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R. G. Collingwood*,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p. 199.

3 M. I. H. [Henderson], “Review of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5, 1945, p. 148.

4 这些文章基本上刊登在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和 *CW* 上。柯林武德一生与“坎伯兰和威斯莫兰古物和考古学会”紧密相连。柯林武德出生在兰开夏郡，该郡紧挨着坎伯兰郡和威斯莫兰郡，在“坎伯兰和威斯莫兰古物和考古学会”成立之初，柯林武德的父亲就加入该学会，随后成为学会的主席、学会会报的主编。柯林武德与其父亲一样，先是成为学会的会员，后成为学会会报的主编、学会的主席和荣誉主席。

5 P. W. M. Freeman, *The Best Training-Ground for Archaeologists: Francis Haverfield and the Invention of Roman-British Archaeology*, pp. 536–537.

6 S. Piggott, “Robert Eric Mortimer Wheeler. 10 September 1890–22 July 1976”,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Vol. 23, 1977, pp. 623–642.

馆（National Museum of Wales）的馆长，随后在英格兰的利德尼（Lydney）、维鲁拉米翁（Verulamium）和梅登堡（Maiden Castle）进行一系列大型的挖掘。他的妻子特莎·弗尼·惠勒（Tessa Verney Wheeler, 1893—1936）于1936年英年早逝之前，为这些工作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惠勒的考古贡献体现在“他树立了考古挖掘的标准，那些与他一同工作的人传播了这些方法，因此他们在20世纪中期占据了主导地位”¹。

然而，在众多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当中，柯林武德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柯林武德的专业是哲学，但在牛津大学期间与哈弗菲尔德的相遇促使他走向罗马不列颠考古学。虽然哈弗菲尔德的大部分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但还是有一批学生存活了下来。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了罗马不列颠考古领域里的中流砥柱，如长期担任英国罗马学校主任的托马斯·阿什比（Thomas Ashby, 1874—1931）和约翰·加斯坦（John Garstang, 1876—1956）。同样，柯林武德也有自己的学生，其中李奇曼和伯利就是比较出色的两位，尤其是伯利在哈德良长城领域的研究。伯利在杜伦大学长达40年的执教生涯中，以哈德良长城和罗马边界设施研究闻名于世，他能在一团乱麻中看到事物的本质，正如著名的古代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曾经注意到，在一次哈德良长城的旅行中，伯利能够用两张车票重构这段历史。²

艾瑞克·伯利（Eric Birley, 1906—1995）出生于兰开夏郡的斯温顿（Swinton in Lancashire），在贝克韦尔小学（Bakewell Primary School）接受初级教育。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伯利一次在参观一个位于皮克区（Peak District）的史前洞穴过程中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³伯利原本想前往拉格比公学（柯林武德曾经就读的公学）就读，但他哥哥建议他尝试难度更高的克利夫顿公学（Clifton School）。在公学期间，伯利深受校长诺曼·沃特利（Norman Whatley）的影响，也得到诺曼的鼓励。而诺曼是奇斯曼的朋友，因此也对罗马不列颠考古学深感兴趣。因此，早在公学期间，伯利已经开始接触到罗马不列颠辅助军团的知识，也是从这里开始，伯利对罗马军团的

1 Martin Millett, “Roman Britain since Haverfield”, p. 25.

2 John Wilkes, “Obituary: Professor Eric Birley”, *The Independent*, 26 October, 1995.

3 Brian Dobson, “Eric Barff Birley, 1906–1995”,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97, 1998, pp. 215–216.

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伯利进入牛津大学后，他的古代史导师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要求伯利学习德语，这为伯利日后建立国际性，尤其是在德国的学术声誉起到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为伯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语言上的帮助，并对战争的走向起到重要的影响。¹

伯利与柯林武德的相识颇具戏剧性，在1977年9月16日一封写给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的信中，伯利回忆起他与柯林武德相识的经过。伯利的哲学导师詹金森（Jenkinson）认为伯利并不适合学哲学。而当詹金森得知伯利在1926年的长假中想加入惠勒的考古团队中时，他推荐伯利到班布里奇（Bainbridge in Wensleydale）有柯林武德参与的挖掘现场，这是伯利第一次参与考古挖掘。²在柯林武德的影响下，伯利对哈德良长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伯利在辛普森（F. G. Simpson）的领导下，在伯德奥斯瓦尔德（Birdoswald）罗马堡开始对哈德良长城进行挖掘。也就是在1929年，伯利发现了两块碑铭，证明了哈德良长城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摧毁的日期，从而解决了以往古物学家对长城划期的历史问题。而在伯利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事件是，1930年接替辛普森成为杜伦大学发掘委员会的主任。第二年在霍尔罗伊德的推荐下，伯利被任命为阿姆斯特朗学院（Armstrong College）的讲师，该学院随后成为杜伦大学的一部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利服务于情报部门外，直到1971年退休，伯利在杜伦大学执教长达40年，这为他在考古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打下了基础，并围绕他形成了“伯利学派”（Birley School）。

“伯利学派”的形成是伯利最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学派的成员由伯利的学生所组成。吉拉姆（John Gillam）后来成为纽卡斯尔大学的教授。乔比（George Jobey）也成为纽卡斯尔大学的教授。斯蒂尔（Kenneth Steer）对罗马不列颠时期杜伦城的研究，则使他成为苏格兰古代和历史遗迹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f Ancient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Scotland）的秘书。除此之外，还有温汉姆（Peter Wenham）、沃森（Ronald G. R. Watson）、卡伦德（Maurice Callendar）都是伯利较为

1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知识分子在战时供职于情报部门是普遍现象，他们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James Connelly, Peter Johnson, Stephen Leach, R. G. Collingwood: *A Research Companio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70–71.

出名的学生。¹在杜伦大学期间，伯利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第一，他给予学生自由，并与他们共享自己的资料。第二，伯利并不看重第一学历是不是考古学。第三，伯利能够一对一对他们进行指导。在伯利和“伯利学派”的努力下，杜伦大学的考古学系在罗马不列颠乃至英国考古学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伯利是“国际罗马边疆研究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的创始人。在罗马军队研究中，伯利被视为阿尔弗雷德·冯·多马斯泽夫斯基（Alfred von Domaszewski, 1856—1927）的继承者。伯利发表了众多的考古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老师。²在伯利的时代，哈德良长城和军事设施研究是罗马不列颠考古研究领域的主流，尤其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众多考古学家对罗马不列颠的军事设施倾注大量的心血，包括李奇曼和伯利的众多学生，共同构成了这一主流，使杜伦大学考古学系成了英格兰北方考古研究的重镇，而这一切与伯利紧密相连。因此，当伯利在1995年与世长辞的时候，对英国考古学界来说是一大损失，无怪乎一位作者写道，“艾瑞克·伯利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³。

五、“罗马化”研究范式

罗马帝国，在哈弗菲尔德的笔下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帝国”或者“帝国主义”在英国还是一个负面的术语。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帝国”一词被当作专制的同义词，从而使英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而，当印度在1858年被纳入英国的版图后，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如何为英国殖民印度提供合法的依据，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试图在罗马不列颠找到先例。因此，在哈弗菲尔德看来，罗马—不列颠与英国—印度就成了可以对比的例子。如果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印度被英国征服也具有进步意义。在这组对比中，都是文明对落后的征服，把落后地区纳入文明地区的管辖下。反过来，落后地区在被

1 Brian Dobson, “Eric Barff Birley, 1906–1995”, p. 220.

2 Brian Dobson, “Eric Barff Birley, 1906–1995”, p. 232.

3 David J. Breeze, “Eric Birley (1906–1995): Vice-President 1951–1995”, *Britannia*, Vol. 27, 1996, p. xi.

征服后，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从而摆脱落后的状态。由于哈弗菲尔德强调罗马帝国在“罗马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所以，他无比重视罗马帝国的边境政策和军事考古。这种研究取向，影响了后面两代人的研究重点，例如奇斯曼、柯林武德、伯利、布雷兹（David John Breeze，1944— ）和多布森（Brian Dobson，1931—2012）等等。¹

“罗马化”（Romanization）本意指罗马文明在意大利和罗马行省的传播。“罗马化”观念最早在德国形成，在19世纪由德国历史学家蒙森所提出，在学者受到后殖民主义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之前，该观念都被不加反思地加以运用，即考古学家都以肯定的眼光看待罗马文化在意大利和罗马行省中的传播。²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现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之父”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是“罗马化”观念的缔造者，并为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³事实上，一个观念从诞生到为大众所接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不应忽视蒙森在“罗马化”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考虑到蒙森在罗马史领域的地位，以及哈弗菲尔德是蒙森的学生，两者可能共同分享着这一观念。在哈弗菲尔德看来，“罗马化”等同于“文明化”（civilization），罗马不列颠时期是英国进入文明时期的开端。哈弗菲尔德在1905年完整地提出这一观念，“在一篇于1905年提交给英国国家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的论文中，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总结了他自己‘罗马化’的研究方法，把早期的罗马不列颠的观念变成新的知识框架。他认为罗马不列颠全部参与到罗马帝国的国际文化活动去，这种观点与之前把罗马不列颠看成军事化的北部行省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⁴。

1 关于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参见Richard Hingley, *The Recovery of Roman Britain, 1586–1906: A Colony So Ferti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Esther Eidinow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283;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67.

3 Richard Hingley, “Early Studies in Roman Britain: 1610 to 1906”, p. 13

4 Richard Hingley, *The Recovery of Roman Britain, 1586–1906: A Colony So Fertile*, p. 313。哈弗菲尔德论述“罗马化”的文章可参见F. J. Haverfield, “Romanization And Roman Brita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05–1906, pp. 185–218。1912年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了在该论文基础上修订和扩充的文本，文本达到70页，是论文篇幅的两倍。1915年第三版时又增加到91页（*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5）。哈弗菲尔德在该书中全面阐述了罗马帝国文化如何促进被征服地区文化的进步，肯定罗马帝国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从哈弗菲尔德开始，“罗马化”观念作为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深深影响了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哈弗菲尔德、R. G. 柯林武德、李奇曼、伯利、多布森、萨尔维（Peter Salway, 1932— ）、布雷兹等考古学家，都自觉地接受了“罗马化”研究范式。换言之，“罗马化”作为他们的学术价值取向，让我们能够把他们归在同一个团体内。比如，柯林武德是继哈弗菲尔德之后，牛津大学罗马不列颠考古学领域的权威与导师，李奇曼和伯利深受柯林武德的影响，伯利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罗宾。萨尔维作为李奇曼的学生，虽然重写了柯林武德的著作¹，但依然接受了“罗马化”的观念。而多布森作为伯利的学生，继续推进哈德良长城的研究，而这是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正因为他们共同拥护“罗马化”这一观念，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它当作一条线索，探讨他们的著作。尤其是探究哈弗菲尔德“罗马化”观念的建构，以及“罗马化”观念在拥护者著作中的演变，展示“罗马化”的动态演变。

需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并没有完全接受哈弗菲尔德的观点，即不列颠原住民在接受罗马文化过程中处于被动的状态下。在罗马帝国征服不列颠之前，曾经流行着凯尔特文化，并呈现一幅繁荣的景象。但罗马人到来之后，这种文化很快地被取代了。因此，哈弗菲尔德认为，凯尔特文化在罗马不列颠时期完全中断了。²然而，这种说法在柯林武德看来存在着一个难题，即为什么一种文化可以在消失了几个世纪后重新出现？对此，柯林武德梳理了三种普遍的观点。第一，有人认为，凯尔特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一直存在着。第二，有人认为，不是所有的凯尔特人都归顺了罗马帝国，因此保留了凯尔特文化。第三，有人认为，凯尔特文化是一种“凯尔特气质”的产物，而这种气质融入某种艺术的表达之中。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柯林武德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是真的，但没有证据证明。而对于第三种，柯林武德认为，“凯尔特气质”是一种比较玄乎的说法，这种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换言之，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凯尔特气质”的东西。³在这里，柯林武德的哲学观念

1 柯林武德的《罗马不列颠和英国定居点》最终被萨尔维的《罗马不列颠》所取代，但两书都分享“罗马化”这一观念。

2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p. 137.

3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pp. 138-139.

显露出来了。因为在柯林武德看来，心灵是一种流动的东西，而不是固定不动的本质。柯林武德认为，“凯尔特文化”在罗马不列颠结束后再次兴起，原因是“凯尔特文化”一直没有消失，而是融入罗马文化当中，这就是著名的“融合论”。哈弗菲尔德认为，不列颠对罗马文化的影响是被动接受，而柯林武德的“融合论”更加强调文化的传播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1978年，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出版了《东方学》，使萨义德成为享誉世界的知识分子，该书也成了后殖民时代研究领域的基础文本。《东方学》造成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我们反思，西方在18、19世纪对东方的建构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以便于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另一方面，《东方学》也促使西方学者对本国历史建构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表明，任何一种历史建构都是时代背景影响下的产物。¹例如，理查德·欣格利就认为，“罗马化”只是罗马不列颠考古学家的建构，因为从反拿破仑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术语，而只是等到大英帝国把印度纳入殖民体系后，它才慢慢变成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术语，罗马帝国的形象也慢慢变得正面起来。²欣格利认为，在当前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代替“罗马化”这种具有立场明显的术语，从而改变了“罗马化”观念的内涵。“罗马化”从一个带有积极含义的术语，慢慢走向它的反面，这贯穿了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史。

舍温-怀特（A. N. Sherwin-White，1911—1993）既不认同哈弗菲尔德自上而下的“罗马化”过程，也不认同柯林武德所谓的“融合论”，而是认为，“罗马化”的过程就是本土原住民放弃本身的文化，主动接受罗马文化的过程。舍温-怀特由于过度强调原住民的积极性而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因为看起来原住民不太可能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文化而接受罗马文化。³因此，马丁·米莱特提出一种更为温和的观点，

1 Bruce G. Trigger,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Vol. 2, No. 1, 1994, p. 115.

2 Richard Hingley, *Roman Officers and English Gentlemen: The Imperial Origins of Roman Archeology*, pp. 1–15.

3 Lindsay McNeill, “Romanization and Ancient Iberia: Religion and Ideology”, *Student Theses, Papers and Projects (History)*, 2005–05–03.

认为“罗马化”是一种是由行省本土精英引导的模仿（native-led emulation）过程。¹米莱特强调地方精英在“罗马化”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由于米莱特认为“罗马化”是一种和平的过程，因此他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经济与文化层面上，把中心从军事史与城墙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层面。从强调“罗马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到提升本土原住民在“罗马化”进程中所起的主动作用，这无疑受到后殖民思潮的影响，但同时也是考古学家对本国历史的一种自觉的反思。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化”开始受到质疑，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被考古学家接受的替换词，但我们能够见到“罗马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显得不适用了，而在探讨新的替换词的众多考古学家之中，欣格利是较为突出的一位。

欣格利坦诚深受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也是在后殖民主义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位考古学家的。因此，当他进入罗马不列颠的考古领域时，对“罗马化”的解构就成了《罗马军官和不列颠绅士》一书的主题。欣格利在该书详细地分析“罗马化”兴起的时代背景，重点分析哈弗菲尔德对“罗马化”观念的建构以及“罗马化”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在欣格利看来，这种建构完全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英国对外殖民的需要。换言之，“罗马化”完全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回应。因此，在当前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罗马化”这种带有殖民时代印记的术语显得过时，因此他建议采用“全球化”进行代替。从这种变化中，我们能够见到，每个时代都面临不同的时代问题，柯林武德就曾强调没有永恒的问题，因此霍布斯笔下的国家（State）和柏拉图笔下的城邦（State）不是同一种事物。“罗马化”也一样，它起先是知识分子面临英国殖民印度的需要而建构的一种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的作用被凸显出来，这是英国殖民地体系遭受瓦解的原因。

六、结 论

罗马不列颠作为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从英国近代以来一直受到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在罗马帝国近4个世纪的统治下，不列颠经历了一场被后世称为“罗

1 Martin Millett, *The Romanization of Britain: An Essay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马化”的历史过程。然而，是从罗马帝国的角度出发把不列颠视为一个行省进行历史书写，还是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把罗马不列颠时期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却一直困惑着英国的知识分子。显然，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和强调民族国家的时期，罗马不列颠往往被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在英国进入帝国阶段后，情况又反过来了，罗马不列颠被视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决定了英国知识分子对罗马不列颠历史书写方式的选择。例如，1724年，乔治一世分别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了皇家钦定现代史教授，即指中世纪以后的历史。19世纪以后，把罗马不列颠时期作为一个阶段纳入英国历史的做法，越来越成为主流，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牛津英国史》，罗马不列颠时期作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该书第一卷前四册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学术与时代紧密相连，这也是爱德华·卡尔所提醒的，要考察一个历史学家的著作，首先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

构建罗马不列颠时期历史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史料的来源和性质上。不列颠作为罗马帝国的军事行省，古典时期涉及它的文献相对稀少。因此，在考古学还没有形成的时代，对罗马不列颠时期历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没有足够的材料构建该时期的历史，同时也为伪史的出现提供了沃土。例如，18世纪的查尔斯·伯特伦（Charles Julius Bertram, 1723—1765）伪造了《不列颠的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一书，声称该书是中世纪学者西伦塞斯特的理查德（Richard of Cirencester）的著作。伯特伦的伪书得到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甚至连吉本都接受了伪书中的罗马城市列表。虽然该书在18世纪末被人揭露，但是其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这件事也表明了建立一门科学考古学的迫切性，从而利用考古学材料构建罗马不列颠时期的信史，避免再次陷入伪史的迷雾中。

现代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建立是人们了解罗马不列颠时期英国历史的关键。从19世纪末期开始，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一直往前推进。罗马不列颠考古学从一门辅助学科发展成独立学科，从一门业余爱好者的智力活动变成一门专业化的学科，哈弗菲尔德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而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的发展，也使得不列颠成了罗马帝国行省中研究最为充分的地方。这些事实的背后，是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是英国历史在近代以来变化的反映。如今，罗马不列

颠考古学继续在推进，但已经淡出帝国框架的书写范式，转而从地方化或者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研究，即研究日常生活物质或者从全球的视野看待罗马文化在不列颠传播的进程。从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百年演变史中可以看出，并没有永久不变的研究范式，而是研究者一直不断地在回应时代的需求。

（姚汉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

加勒比区域史的研究历程、特点和未来展望^{*}

| 陶万勇 |

摘要：本文在分析《加勒比通史》（六卷本）的基础上考察加勒比区域史研究现状。《通史》以文章合集的方式，回顾了加勒比区域史前至20世纪末的历史演变，重点关注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史与去殖民史，另外提及前殖民史、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史学史，此即《通史》的完善之处。其缺陷之处体现在，淡化或忽视同样常见的海洋史、疫病史与国别史。从所有这些领域中产生了加勒比区域史中绝大多数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话题，是加勒比区域史研究入门与走向精深均无法回避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加勒比区域史 《加勒比通史》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确定为中国研究生教育一级学科。这是一门以世界各区域、地区和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助于提升我国对世界的认知，推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强我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合作，同时为我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是年末，在由光明日报理论部牵头举办的评选该年度十大学术热点的会议上，经过专家组讨论、评选，包括“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在内的十个研究主题上榜，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主张以不同学科或学科交叉的理论解释、发展、完善区域国别学。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在点评时指出，“理解世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向世界解释中国离不开中国自己

^{*} 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17世纪英国突发性事件应对策略研究”（项目号：2023AH050954）阶段性成果。

的声音，这取决于我们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达程度，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成为热点是必然结果。区域国别研究是能够兼顾学术与国家需要的战略学科，不仅是区域国家之间相互理解从而构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更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途径”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设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意在突破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基于公平公正对待区域之间不同历史进程的立场，客观解释区域史与全球史，消除由经济发展不平等带来的历史书写不对称的破坏性影响，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尽管如此，世界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艰巨工程，纵观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欧美史、日本史始终是热门研究领域，非洲史、中东史近年来异军突起，除此以外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对而言受到的关注少得多，如拉美史、澳洲史等，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区域国别学接下来的重点任务之一。鉴于此，本文拟简要梳理加勒比区域史的学术史，为深化我国区域国别学之拉美史研究准备一些必要的前期工作。本文以六卷本《加勒比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以下简称《通史》）为切入点，在分析《通史》文本结构、主要内容和所持观点的基础上，考察其在表现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主要领域方面的得与失，由此进一步思考我国的加勒比区域史研究发展方向与可行办法。

一、《通史》所讲、所论、所值与所“欠”

《通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整体和区域史”（General and Regional Histories）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²，以撰写加勒比人眼中的加勒比区域史为立项目标，

1 光明日报理论部等：《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0日第11版。

2 “整体和区域史”项目旨在通过更多利用各区域当地人的意识和知识，撰写一种“新”历史，“新”在突破以往历史被主要人物、事件和对象占据的修史牢笼，突出所谓边缘角色和区域的史学价值，探讨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区域内部文化交流与互动、区域内外沟通与联系对区域发展的正反面影响等史学方面，该项目共发行六种成果，分别是《人类史》（*History of Humanity*, Vol. I-VII）、《非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I-VIII）、《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VI）、《拉丁美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I-IX）、《加勒比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 I-VI），参见<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84161/PDF/184161eng.pdf.multi>，访问日期：2024年5月13日。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落实该子项目而成立的起草委员会中，成员总数为19名，其中12名来自加勒比海地区，7名来自非洲、印度、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外的美洲。¹在《通史》立项之前，以加勒比海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史论著实则不多，比较著名的包括《加勒比海地区：英国、荷兰、法国、美国》（*The Caribbean: British, Dutch, French, United States*）、《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1492至1969年的加勒比史》（*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492-1969*）、《加勒比传记》（*Biografía del Caribe*）等。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加勒比海地区长期被以英国、西班牙为主的欧洲国家殖民，各国对自身的加勒比属地的关注远远超过加勒比整体区域，惯于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身属地的历史。《通史》的出现无疑为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同时为加勒比区域史的书写树立了一个典型。它打破了加勒比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撰史传统，强调地区融合与文化多元的撰史意义，以撰史促进加勒比人身份认同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通史》基本实现了它的立项初衷，在它之后，关于加勒比区域的整体史研究进步显著，不断出现这方面的论著，如《加勒比史：从殖民前起源至今》（*Caribbean History: from Pre-coloni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两卷本《加勒比历史与文明》（*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e la Caraïbe, Tome 1 et 2*）等。

掀起针对加勒比区域的整体史研究浪潮只是《通史》的主要价值之一，它的另一个主要价值是总结了长期以来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中的经典主题，这些主题是了解和研究加勒比区域史时始终无法绕开的内容。在探讨这些主题之前，有必要简析一下《通史》的文本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通史》分六卷本，一共收录86篇专论，就加勒比早期史、殖民史、民族觉醒、去殖民化、一体化、史学史等重要方面展开研究。这些重要方面并没有分别集中在某一卷中，某一重要方面会在不同卷中反复探讨，任何一卷都会包括不同的重要方面，这主要是因为《通史》是按照年代顺序而非研究专题安排卷目的。在第一至五卷中，每一卷对应的时期大致分别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之前、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17至19世纪初、19世纪、20世纪。第六卷不在这一时代顺序之内，它除了再次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外，还提到了加勒

1 Jalil Sued-Badillo,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 *Autochthonous Societi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p. ix.

比各组成部分的史学史，包括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海地、牙买加、背风群岛、维尔京群岛、巴巴多斯、迎风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里南、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法属圭亚那、巴哈马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开曼群岛、伯利兹。¹《通史》起草委员会主席F. R. 奥吉尔爵士的点评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通史》第一卷讲土著社会，涉及最早的加勒比民族起源的历史；第二卷讲16世纪欧洲人入侵下的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第三卷讲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及其影响；第四卷讲加勒比社会在19世纪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五卷讲20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万象；第六卷讲加勒比区域的研究方法论与史学史”²。

《通史》第一卷包含9篇文章，主要讨论加勒比海地区的土著社会与历史，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这里的发展进程。前八篇文章集中探讨加勒比土著史及其涉及的资料，它们的结论表明这方面资料异常丰富，首批殖民者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原始资料，后世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的成果则确保了这些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重要的补充。末篇文章研究了以哥伦布为代表的西班牙殖民者奴役加勒比土著人的历史和思想渊源。路易斯·N. 里韦拉·帕干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传统长期以来保持着对奴隶制的默认，西班牙殖民者凭借这一信念肆无忌惮地奴役加勒比土著人，这一行为拉开了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久的黑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序幕。³第二卷收录10篇文章，除了继续讨论加勒比早期社会与历史外，重点提到了欧洲列强在加勒比海地区前期殖民统治的过程与特点。弗兰克·莫亚·庞斯指出，西班牙人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早期殖民活动，发生了从寻求金银到重视种植业的转变；尼尔·L. 怀特海德考察了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加勒比海地区时与土著的互动模式；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列罗-卡尔沃讨论了美洲西班牙式城市的特点与内涵；古斯塔

1 需要注意的是，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与伯利兹位于美洲大陆，前三个位于南美洲北海岸，第四个位于中美洲东海岸，这四个地区是美洲大陆仅有的被英法殖民过的国家，剩余的国家均一直被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这四个地区的身份和民族认同倾向于加勒比海地区，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上的站位也主要与加勒比岛屿保持一致，因而从习惯和学术两方面均可将其视为加勒比国家。

2 Jilil Sued-Badillo,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 *Autochthonous Societies*, p. x.

3 Jilil Sued-Badillo,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 *Autochthonous Societies*, pp. 134, 195–196, 295, 317–318, 321, 346.

沃·马尔丁-弗拉加尚分析了欧洲意识形态在接触美洲土著文明后的反应和变化，他强调，殖民活动并非欧洲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它也在殖民过程中不断受到美洲土著文明的改造。¹

第三卷包括10篇文章，论述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与社会状况。科林·A. 帕尔默认为，加勒比殖民制度的建立导致这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土著人口的急遽减少和非裔人口的激增。斯坦利·L. 恩格曼和B. W. 希格曼同样认为，1700至1900年加勒比海地区人口取得显著增长，这主要归因于殖民统治对劳动力的需求，到19世纪末，加勒比海地区首次成为人口输出国。²西尔维娅·W. 德格罗特等学者考察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马鲁恩社区（maroon society），这是一种由逃亡奴隶后裔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的存在反映了黑人奴隶的反抗史，以及对属于自身的自由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希拉里·麦克唐纳·比克尔斯指出，加勒比奴隶社会存在严密的控制网络，如法律法规、思想灌输等，殖民者通过这种网络牢牢控制奴隶，以使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迈克尔·克拉顿研究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反抗史，他反对将奴隶反抗局限在暴力起义，认为奴隶反抗伴随奴隶制始终，是一种包括叛乱在内的所有能够表达不满的活动集合。富兰克林·W. 奈特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加勒比奴隶社会，提出随殖民统治的建立而不断引入的多民族和种族，与加勒比土著相互影响并做出反应，导致一种名为克里奥尔（creole）的多元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生成模式在所有移民地区皆会出现。在另一篇讨论废除奴隶制的文章中，奈特指出废奴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就经济因素而言，埃里克·威廉斯的解释体系相对比较有说服力。玛丽·特纳则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审视加勒比奴隶社会，她认为，宗教信仰在塑造各类群体的社会性行为方面作用显著，奴隶也不例外，他们融合欧洲、非洲和加勒比土著思想元素，以新的普遍适用于奴隶群体的精神观念对抗残酷的殖民统治。³

1 Pieter C. Emmer and German Carrera Damas,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 *New Societies: the Caribbean in the Long Sixte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3, pp. 114–115, 127, 159–160, 180, 198–200, 301, 317.

2 Franklin W. Knight,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I: *the Slave Societies of the Caribbean*,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3, pp. 9–10, 95–96, 130, 138–139.

3 Franklin W. Knight,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I: *the Slave Societies of the Caribbean*, pp. 169, 191, 271, 287, 339–340.

第四卷的内容聚焦于19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革命、改革与社会变化，收录的文章数量陡然涨到17篇，这一定程度反映了19世纪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重要性。戴维·盖古斯等学者回顾了1789—1804年的海地革命，认为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殖民统治，导致海地建成主权国家，尽管如此，建国后的海地始终面临着政治分裂、经济衰落、外患不断等困境。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和希瑟·卡托，分别研究了废奴之前与之后种植园的危机种类及影响。这些危机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化、奴隶反抗、技术革命等，其影响最终均会引发种植园效益的剧烈波动并促成种植园结构的调整。佩德罗·L. 圣米格尔与凯瑟琳·蒙蒂思考察了加勒比海地区除糖种植以外的经济活动，如个体户农业、金融、信贷、矿业等。凯文·耶尔文顿等学者侧重于揭示19世纪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结构，尤其会区分不同宗主国对各自殖民地施加的影响。丹尼斯·本以文本资料为基础，分析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加勒比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想。¹ 豪尔赫·伊巴拉探讨了西属加勒比殖民地民族认同问题。这些殖民地主要指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古巴、伊斯帕尼奥拉、波多黎各等，其中伊斯帕尼奥拉比较特殊，它在被西班牙殖民后接着被法国殖民，它的民族认同问题也相对更复杂。安东尼奥·加斯切比德·盖格尔等学者研究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劳工运动，他认为，工人阶级兴起于奴隶制废除之后，其主体是之前的奴隶，但种植园保持了之前的农业结构和利用大规模、非熟练劳动力的剥削制度，因而工人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化是从城市开始的。²

第五卷包含18篇文章，主要讨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末的加勒比区域史。罗伯托·卡萨论述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变化。他发现这种经济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糖种植园的工厂化和农民的工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系统的大幅优化，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导致美国开始介入对这里的殖民掠夺。富兰克林·W. 奈特接着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的加勒比海地区，他认为这十年是加勒比海地区一个异常痛苦且鲜明的时期，这里发生了从少数人主导的旧加勒比社会向基于成人普选权的更开放和现代的社会转变。克洛·菲尔贝格-施托尔贝格则接着探讨

1 K. O. Laurence and Jorge Ibarra Cuesta,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V: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Nineteenth-century Transformation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1, pp. 191–192, 224, 259, 370–371.

2 K. O. Laurence and Jorge Ibarra Cuesta,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V: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Nineteenth-century Transformations*, pp. 430, 453–454, 512–514, 545.

了“二战”时的加勒比海地区。他认为加勒比海地区对欧洲战场同盟国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二战”也为美国更多地介入加勒比事务创造了机会，这加剧了大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竞争，并导致加勒比海地区产生诸多有利于战后去殖民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帕特里克·布赖恩考察了1940至1990年加勒比海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认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段时间进步显著，并取得不少重大成就，岛屿之间无产阶级队伍的相互补充则强化了区域无产阶级的力量，但他们的努力和意识形态远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国际和国家问题以及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均不允许他们促成无产阶级革命。詹姆斯·米莱特与布赖恩不同，他径直讨论了“二战”后至1970年加勒比海地区的非殖民化浪潮及其引发的独立建国运动。¹安东尼·梅因戈特紧接米莱特，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进程。安东尼·T. 布赖恩分析了20与21世纪之交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并提出必要的应对之策；他认为，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发生剧烈转型，加勒比国家应该在加强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团结的基础上，深化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开展利于本区域发展的外交关系。²

第六卷收录22篇文章，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回顾前面各卷已经探讨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新方法、新资料提出新的解释；其二探讨加勒比各国和地区的史学史研究。在第一方面的内容中，本卷与前面各卷的主要区别是，将讨论过的各主题时间线拉长，将这些主题置于资料增多、历史背景变动的情况下加以考察，从而完善关于这些主题的已有结论。该卷的亮点在于第二方面的内容，即探讨该区域的史学史研究。史学研究是任何国别或地区社会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其真实与否关系到社会文化其他方面存在的合法性，甚至关系到国别或地区存在的合法性。加勒比海地区长期遭受欧洲国家的殖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美国也参与进来，即便“二战”后不少岛屿走上民主独立道路，但该区域受欧美国家控制的事实基本没有改变，并且在长期殖民与控制下，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不由自主地加速欧美化，因而，

1 Bridget Brereton et al.,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V: *the Caribbe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3, pp. 42, 82–83, 172–174.

2 Bridget Brereton et al.,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V: *the Caribbe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81, 344, 399–400, 505.

该地区历史学研究所面临的形势相比其他地区显得更为紧迫且严峻。受殖民影响，该地区传统的史学研究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殖民者手中，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倾向于或美化殖民统治，或忽视被殖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致使被殖民者在加勒比区域史中的作用长期被边缘化，加勒比区域史成为欧美史的“延伸”。此种一边倒的情况在本卷中得以纠正，本卷基于行政区划展开对区域史学史的介绍，将区域史学史细分为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等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史，并且通常选择当地史学家为执笔人。史学史研究不仅对地区史有所介绍，而且总结了地区史研究资料，为后续针对各国和地区的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因而，本卷中的史学史研究既是开创性工作，也是基础性工作。

《通史》的重要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第六卷中对加勒比区域史学史的研究，除此以外，至少还包括如下三点价值。首先是年代上的全面性，除了交代必要的15世纪至今的历史外，《通史》花了将近一卷的篇幅论述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前的历史，这在关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通史著作中很罕见。编者的此举意在表明，加勒比海地区存在丰富的土著史，以此试图削弱西方人在加勒比区域史中的主导地位。对加勒比土著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考古技术，这是因为加勒比土著有语言但没文字，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最早关于土著的记载出自哥伦布一行人。这类记录很宝贵，因为之后很难再有类似的资料。哥伦布一行人以及之后的殖民者的到来导致土著近乎灭绝，那些幸存的土著被迫为奴，他们与之后被贩卖过来的黑人奴隶一起成为殖民者的免费劳动力，低下的地位使得他们的历史不太可能受到关注，因而不太会出现任何针对他们的口述史研究。尽管如此，土著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他们在与其他种族的融合中，将自身的文化保留下来并在混合社会中发挥作用，弗拉加尚在第二卷中指出，“新世界与欧洲第一次接触后，发现者和征服者带来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以这些意识形态创造新社会，美洲印第安人与非洲人同样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帮助形成了新社会，尽管很多时候，这些知识体系由于隐藏或伪装而很难被确认”¹。戈登·K. 刘易斯讲得更为具体，他提到，“哥伦布的发现之旅打破了新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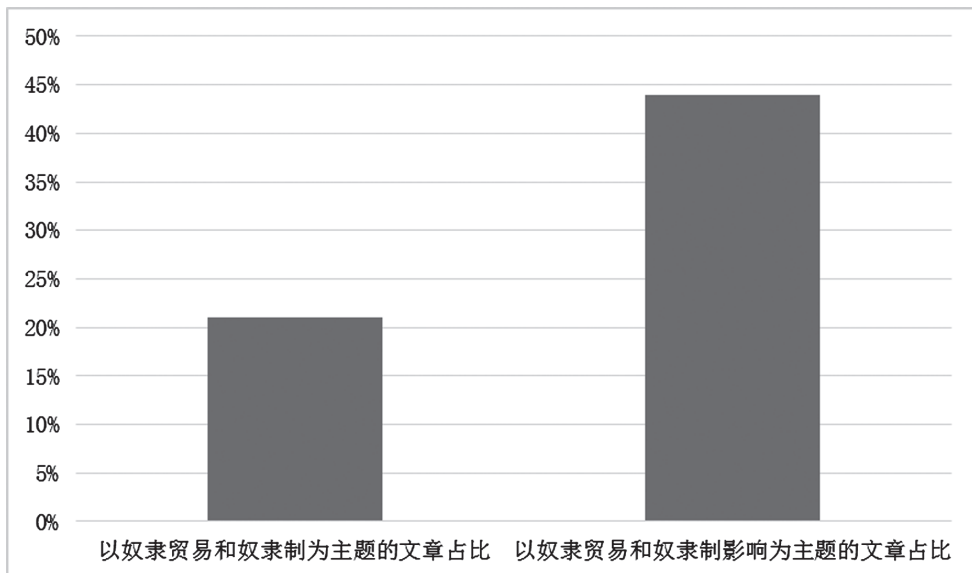
1 Pieter C. Emmer and German Carrera Damas,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 *New Societies: the Caribbean in the Long Sixteenth Century*, p. 247.

世界的隔绝状态，在此之后，加勒比人民及其文化与整个美洲新世界的浪漫主义观念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¹。因而，否认土著在加勒比区域史中的价值或将其边缘化均是错误举动，从文化入手仍然可以探寻到加勒比土著的历史影响痕迹。

其次是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反复强调。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充满罪恶、血腥，甚至是反人类的，这些是任何言辞都无法美化的事实；尽管如此，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加勒比区域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从时间跨度上看是如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今也才500年多一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占据将近一半的岁月。从内容和影响上看更是如此，黑人奴隶的到来迅速填补了土著近乎灭绝引发的劳动力巨大缺口。他们见证了种植园制度的黑暗与暴虐，以及以此为代价的殖民者的发家致富；他们构成人口中的主要成分；他们与殖民者、土著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上的融合提供了后殖民社会的精神基础，欧洲价值观在这种基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通史》前五卷总共64篇文章中，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为主题的文章占比21%，而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影响为主题的文章占比44%（如图1所示），若将第六卷撰述史学史的文章也考虑进来，比例会更高。这些数据有利地证明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在加勒比区域史中的分量之重，同时表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之后的加勒比社会深受这项严重践踏人的尊严的制度之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影响为主题的文章重点讨论了加勒比社会的其他方面，如奈特研究的多元主义、盖古斯研究的海地革命、耶尔文顿研究的19世纪加勒比社会结构等，如此便引出这套书的又一个重要价值，即内容的广博。作为通史，这套书的确需要这样的布局——精与广的结合、点与面的共存，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涉及诸多最新的研究领域和史学方法，如有两篇文章讨论性别史，一篇文章讨论家庭史，这两个史学领域均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最后，这套书的参考文献值得关注一下，总共458页并且基本不重复。这是个不小的数字，这套书的第二、三卷均没有458页，第一卷也才超出一点，这么多的参考文献同样彰显了这套书在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中的分量之重。

1 Gordon K. Lewis, *Main Currents in Caribbean Though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aribbean Society in Its Ideological Aspects, 1492-190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图1 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文章性质统计（以前五卷为基数）



除了丰富的内容和上述优点,《通史》也存在可以继续优化的不足之处。首先,“通”得不够清晰,与常见的区域或国别通史不同,这套书是以一篇篇文章“凑”起来的通史,如此很容易导致上下文结构不严谨,甚至出现上下文脱节的情况。例如,第二卷第九篇写“新世界文化的知识、艺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第十篇即刻转到“1500—1650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制图”,尽管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放在一起作为上下文不免令人心生突兀感。同样地,以篇作章导致各卷的论述不够彻底,《通史》前五卷涉及的年代大致分别对应前殖民史、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17至19世纪初、19世纪和20世纪,事实上,不同世纪之间存在一直延续的方面,比如地理环境、法律制度、商业贸易等,但这套书的各卷偏向于论述所大致对应世纪中比较重要的方面(比如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18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忽视那些存在且可以延续的方面,由此给人以内容上的断裂感。尽管如此,瑕不掩瑜,《通史》在刚出版的那个年代无疑是了解加勒比海地区的一扇重要的“窗口”,即便放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区域史力作!

二、《通史》反映的热点领域——殖民史

《通史》的价值远远不止于第一部分介绍的书中内容，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总结并引领了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其中一部分是研究加勒比区域史时必然会涉及的领域，主要指殖民史、去殖民史，《通史》第二、三、四、五卷的主要内容均与殖民和去殖民史有关；另一部分是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中渐成气候的领域，如前殖民史、社会史、新文化史、史学史等，《通史》第一卷重点关注前殖民史，第六卷关注史学史，而在第四、五卷中提及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显然，相比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探讨的内容要广泛且新颖得多，采用的方法也更为新式，在日益提倡学科交叉与区域国别学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在重要性上有赶超传统的殖民史与去殖民史的趋势。

殖民史是加勒比区域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领域，哥伦布的发现之旅开启了西方国家殖民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直到如今仍有不少岛屿受西方国家的控制。西方殖民者在加勒比海地区抢占地盘，奴役土著，建立种植园制度，在土著成批死亡后从非洲运来数百万（加上途中死亡的人数，总数达上千万）黑人奴隶，废除奴隶制后又从亚洲、非洲等地雇来大量契约工充当种植园新劳动力。也就是说，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被废除后，殖民者依然维持着这里的种植园制度，以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行殖民之事。由此可总结出殖民史的一些突出方面：征服史、奴役史（分为土著奴役史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史）、殖民经济史、以政治控制和经济渗透为表现的新殖民史。

1. 征服史

最早关于殖民者征服行动的历史书写出自殖民者本身。哥伦布总共进行了四次面向新世界的航行之旅，在此过程中他创作了不少笔记、日记和信件，理查德·亨利·梅杰将其编纂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信件节选，以及其他与其四次航行至新大陆有关的原始文件》（*Select Lette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with Other Origin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His Four Voyages to the New World*），为后人了解哥伦布一行人的航行之旅和当时的土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哥伦布是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向西航行的，他对新世界的发现首先引起西班牙人对这里的探险、传教与殖民。

弗雷·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久后来到了加勒比海地区，主要活动是传教，曾撰写《印第安人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西印度毁灭述略》(*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等论著。他以宗教同情的心态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给西印度群岛及其土著造成的巨大破坏。卡萨斯之后不久，同为西班牙人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完成《征服新西班牙信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¹他以胜利者的心态赞美西班牙人的英勇气概，同时贬低印第安人的信仰与习俗。与卡斯蒂略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出书描写了卡斯蒂略所在部队领袖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英勇事迹，但他的浮夸写法遭到时人的批评。尽管如此，卡斯蒂略、德戈马拉而非卡萨斯才是当时西班牙人的主流形象，描写新大陆的西语论著也主要保持与卡斯蒂略这类人相似的基调。关于西班牙早期殖民时期的档案文献，20世纪加勒比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在其著作《1492至1655年西印度史文件》(*Documents of West Indian History, Vol. I, 1492-1655*)中有所总结。

西班牙的殖民行动很快引起英、法、荷、葡等欧洲国家的注意，它们不约而同地派遣人员来到这片神秘的土地，后来者的目的与西班牙人一样，即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奴役土著，这些国家的征服史学也随着这些人的到来而被确立起来。约翰·斯托曾于16世纪末出版《英国年鉴》(*The Annales of England*)，书中提到约翰·霍金斯将烟草与红薯带回英国。霍金斯作为商人活跃于16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时常以经商的名义从事走私、劫掠、买卖奴隶以及考察殖民地等活动²，斯托却将其作为歌颂英国的素材。约翰·斯托手稿整理者暨编年史家埃德蒙·豪威斯，在描写英国海员时采取了类似的态度，比如夸耀同为海员且与霍金斯共事过的弗朗西斯·德雷克年轻有为。³到17世纪，英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觊觎和征服行动均有更

1 《西印度毁灭述略》与《征服新西班牙信史》已经有中文版，分别参见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孙家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上、下册），江禾、林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 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第一册），寿进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83页。

3 Edmund Howes, *The Annales or Generall Chronicle England, Begun First by Maister John Stow and after Him Continued and Augmented with Matters Forreyne and Domestique, Auncient and Moderne unto the Ende of this Present Yere 1614 by Edmund Howes*, London: Thomas Adams, 1615, p. 807.

加显著的表现，相关的历史书写也日益丰富。罗伯特·哈考特叙述了一次去圭亚那的航行之旅¹；一位名叫纳撒尼尔·里奇的爵士通过信件了解其百慕大岛屿的产业情况，而这些信件既证明英国对百慕大岛屿的控制，也成为了解彼时百慕大岛屿的原始资料之一²；理查德·利根则对巴巴多斯岛进行了详细的叙述。³征服行动在18世纪上半叶仍在激烈地进行着。约翰·阿特金斯以医生的身份跟随英国海军在大西洋两岸四处征战，将自己的随军经历编纂成两部著作：《海军外科医生》（*The Navy Surgeon*）与《几内亚、巴西和西印度群岛之旅》（*A Voyage to Guinea, Brazil and the West Indies*）。在后一部书中，他给予非洲黑人低人一等的文本地位。理查德·霍尔从法律的角度考察英国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对巴巴多斯的统治。⁴

法国、荷兰在征服时代出现类似的历史书写模式，史学家们以书写的方式支持国家的殖民行为。17世纪法国宗教史家雅克·布东长期入驻法属马提尼克岛，他以征服者的视角记述了该岛土著居民与社会，以更好地为殖民服务。他的这些记录部分汇总在其著作《1635年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定居以来的记录》（*Relation de l'établissement des François depuis 1635 dans l'isle de la Martinique*）中。同时代另一位法国人布瓦耶·德佩蒂·皮伊完成《布雷蒂尼先生访问西边美洲期间发生的一切的真实记录》（*Veritable relation de tout ce qui s'est fait et passé au voyage que Monsieur de Brétigny fit à l'Amerique occidentale*），从布雷蒂尼的视角看待法国对加勒比岛屿的殖民行为；不久后，传教士雷蒙·布雷东发表《论瓜德罗普岛》（*Relations de l'île de la Guadeloupe*），将瓜德罗普置于法国殖民统治的语境下加以叙述。让·巴蒂斯特·迪泰尔特发表涵盖范围更广的《安的列斯群岛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Antilles*），其希望法国占领全部加勒比岛屿的想法一览无余。法国神学家、植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巴，结合自身经历完成关于加勒比群岛的六卷本历史《前往美洲群岛的新航行》（*Nouveau voyage aux isles d'Amerique*），为了解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加勒比

1 Robert Harcourt, *A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Guiana*, London: W. Welby, 1613.

2 Vernon A. Ives, ed., *The Rich Papers: Letters from Bermuda, 1615–1646*, Bermuda: Bermuda National Trust, 1984.

3 Richard Ligon, *A True and Exact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Barbados*, ed. and intro. Karen Ordahl Kupperma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11.

4 Richard Hall, *Acts Passed in the Island of Barbados, 1643–1764*, London: Printed for Richard Hall, 1764.

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保留了珍贵史料。有时，学者们也会通过文字抨击殖民对手。自身做过海盗的法国人亚历山大·奥利维耶·埃克斯克梅林，于17世纪后期出版《美洲海盗》(*De Americaensche Zee-Roovers*)，大肆谴责英国人的海盗行径以及英国政府对海盗行为的纵容。在荷兰方面，17世纪荷兰地理学家约安涅斯·德拉埃特，根据新大陆传回的信息完成《新世界或西印度群岛的描述》(*De Nieuwe Wereldt ofte bechrijvinghe van West-Indien*)，试图从自然知识的角度确立荷兰在新大陆的话语权；探险家阿德里安·范贝克尔记录了荷兰人定居圭亚那和苏里南的历史；教会史家吉拉特·勃兰特为荷兰著名海军将领米希尔·德·勒伊特创作《米希尔·德·勒伊特将军传记》(*Het leven en het bedrijf van den Heere de Michiel de Ruyter*)，纪念这位将军英勇的一生，勒伊特曾在加勒比海地区多次与英法海军交战，以打击英法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

到18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征服行动基本结束，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基本确定下来，西班牙占据古巴、波多黎各、伊斯帕尼奥拉等安的列斯群岛；英国、法国、荷兰占据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中南美洲部分沿岸地区，其中英国占据的土地最多。尽管如此，征服史书写并未被边缘化，各宗主国的执笔人需要通过回顾自己国家的征服历史来烘托国家的强盛。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各宗主国对殖民岛屿的稳定占有，征服史书写的主流地位逐渐让位于以奴役史和殖民经济史为核心内容的殖民地治理史书写。

2. 奴役史

殖民者在征服的土地上发展采矿、种植等殖民经济，先是以土著人和欧洲契约工为劳动力，待土著人丧失殆尽以及发现欧洲契约工不胜苦力后，又运来非洲黑人奴隶填补劳动力缺口，正如帕尔默的解释，“印第安人的减少和殖民经济的必要性为大规模进口黑人奴隶提供了直接的理由”¹。如果说殖民史是加勒比区域史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奴役史和殖民经济史算得上是殖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奴役和殖民经济成为加勒比海地区殖民统治的两个重要方面。

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在加勒比海地区推行奴隶制，他们起初奴役的对象主要是土

1 Franklin W. Knight, e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I: *the Slave Societies of the Caribbean*, p. 13.

著人，因而土著人的近乎灭绝与他们脱不了干系。在19世纪下半叶首版的多达上百卷的《西班牙史未出版文件集》（*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中，存在大量关于西班牙人在16、17世纪奴役加勒比土著人的记录。西班牙是纯正的天主教国家，虔诚的信仰促使不少传教士反思新世界土著人身份与权利的根源以及奴役他们的正当性。16世纪中叶面世的四卷本《正义与法律》（*De la justicia y del derecho*）载有许多关于这方面思想的讨论；此外，利诺·戈麦斯·卡梅多，在1977年出版的《福音与征服：方济各会在拉丁美洲的经历》（*Evangelización y conquista: experiencia franciscana en Hispanoamérica*）中，收录了方济各会修士在美洲传教的部分原始资料，其中不乏关于土著人的人性、权利与自由的讨论。在英、法、荷殖民者大规模到来后，土著人已经所剩无几，远远无法满足殖民者对劳动力的贪婪需求。他们尝试过从欧洲引进白人契约工，除了数量太少无法补全劳动力缺口外，白人明确的权责观念常常导致殖民者付出比他们愿意付出的更多的成本，这是殖民者无法忍受的。英国废奴主义者（先前做过奴隶贸易商）约翰·牛顿，在1788年出版的《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中谈到过这一问题。之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才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它们成就了殖民者，却毁掉了加勒比以及非洲地区。

关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讨论是《通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占了几乎整个第三卷，在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相当丰富，这主要与时代背景有关。英国凭借强大的海军重创其他宗主国的海上力量，抢占加勒比以及北美大片殖民地，并且垄断了奴隶贸易。英国人对本国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加上擅长经商的他们向来有记录的习惯，一时间，关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记载铺天盖地；与此同时，18世纪下半叶英国部分殖民者在北美独立建国，这促进了英语的传播，由此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记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语言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垄断奴隶贸易的是英国，最先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也是英国。两种事实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英国废奴原因的激烈争论，其中有一种声音就认为，英国废奴的主要原因是18世纪下半叶渐成规模的人道主义者的不懈努力。换言之，废奴是人道主义者的胜利，这种声音在威廉斯出版博士论文后便饱受质疑，关于废奴原因的争论由此成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史学书写中的重要一方面。

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对象主要是非洲黑人，因而这方面的史学书写不可避免会涉及非洲，但在众多牵扯到非洲的这方面文献中，记录者除了希望保留客观事实外，还希望强调被贩卖为奴的那些黑人在非洲本土就已经被压迫为奴，他们是由他们的同胞售给欧洲贸易商的。若论罪恶，他们的同胞才真的有罪，他们应该感谢欧洲贸易商，是后者将他们从他们的同胞手里解救出来的。可以说，这种观念在那些描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非洲方面的记录者中相当普遍，詹姆斯·休斯顿、威廉·博斯曼、威廉·斯涅尔格拉夫等人，在关于几内亚的描述中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观念。¹伊丽莎白·唐南于20世纪30年代编纂出版四卷本《向美洲贩卖奴隶的说明性文件》(*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主要收录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之非洲部分的原始材料。但事实是，殖民者不可能是黑人奴隶的解放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黑人奴隶推向更黑暗的深渊，从在非洲交易黑人、运送黑人跨越大西洋到强迫黑人在美洲种植园中劳动，黑人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巨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同样是唐南，她曾在文章《1711—1718年的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 1711-18*)中引用18世纪的贸易资料，证实奴隶运输有时一趟下来只有4%的奴隶能够成功登岸。或许这只是个例，但奴隶在贩卖过程中的极高死亡率是当时的一种常见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疾病、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贸易商们的非人对待。

成功登陆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也好不到哪去，他们需要为购买他们的奴隶主做任何要求他们做的事，最常见的是在种植园里做苦力，其他工作包括家庭仆人、采矿工、性奴等。极少数表现出色的奴隶会获得奖励，但绝大多数奴隶无论表现如何，面对的均是极其繁重的工作以及来自奴隶主的无情虐待。不少奴隶无法忍受这样的生存环境，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抵抗奴役，对此，殖民者早有准备，他们制定严苛的治安法律，设置强大的治安力量，以随时镇压奴隶的抵抗。在英国编

1 分别参见James Houston, *Some New and Accurate Observations, Geographical, Na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aining A True and Impartial Account of the Situation, Product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Guinea*, London: Printed for J. Peele, 1725; William Bosman, *A New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 London: Printed for Sir Alfred Jones by Ballantyne, 1907, 该书首版是在1705年。William Snelgrave, *A New Account of Some Parts of Guinea and the Slave Trade*, London: Printed for James, John, and Paul Knapton, 1734.

纂的《下议院记录与文件》(*House of Commons Accounts and Papers*)之18世纪部分中,保留了众多殖民地官员请求议会增兵或更新法律的提案,殖民者的严酷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比《下议院记录与文件》规模更庞大的是由英国在1838年成立的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整理收集的资料。该机构成立之主要目的是搜集保存一切被四处存放或可能佚失的政府和各部门机构的档案,它是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史在该机构保存的殖民史料中占据突出地位,相关资料为研究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各种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巧合的是,该机构是在英国废除奴隶制五年后成立的,当时关于英国废奴之主要原因的争论逐渐兴起,该机构作为官方主要档案收集机构,保存了与废奴有关的大量一手资料,有助于深化对作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史研究中最重要方面之一的废奴史的研究。

关于英国废奴的主因,上文提及,人道主义废奴论一度大行其道。¹该观点认为,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代,英国社会不断出现持废奴意见的有良知的人,他们著书立说、四处游说,抨击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反人类特征,他们的良知激发了社会更大的善意,终于在18世纪末掀起声势浩大的废奴情愿运动,并使这种运动常态化,当局迫于压力通过了废奴法案。英国在废奴研究中的此种解释倾向与时代背景有关,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加持下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霸占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因而又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强大的国力导致的自信心理影响了英国人的史学书写,史家们极力表现英国人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中良知的一面,有意淡化那些沾满鲜血的历史,以树立英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正义者形象。与此同时,展示良知本身亦有掩盖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中黑暗元素的效果,并且可以弱化殖民统治引发的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敌视情绪,减少殖民统治受到的阻碍,以便于统治。然而,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以及各被压迫民族的逐渐觉醒,人道主义废奴论开始受到质疑。1944年,威廉斯将其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此即影响深远的《资本

1 持该观点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包括但不限于: James Anthony Froude, *The English of the West Indies, or the Bow of Ulyss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8; John Kells Ingram,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95; Thomas Wright,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Cowper*, Vol. I-IV,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4; Reginald Coupland, *Wilberforce: A Narra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 Slavery*)。¹书中他提出著名的经济因素废奴论,他认为,英国废奴的主要原因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已经无法再给英国带去利益,成为英国经济的累赘,在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英国需要更加廉价的原料和广泛的市场,而这些显然是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加勒比殖民地所无法提供的。此观点一出,立刻在学界引起反响,史学家们围绕此书发起了关于英国废奴主因的新一轮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另一重要价值是,肯定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对英国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为驳斥认为黑人天生低劣的种族主义观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结束对奴役史研究的梳理之前,有必要补充一点,英国对奴隶贸易的垄断是一种质而非量的判断。事实上,其他宗主国贩卖奴隶的行为始终存在,在奴隶贸易早期和英国于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后尤其如此,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加勒比殖民地过于狭小,或者政治重心不在加勒比海地区,他们贩卖的奴隶数量以及对奴隶贸易的重视远远不如英国,相关记载亦如此。因而本节没有对关于它们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史的研究有所着墨,但实际上存在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必要时应该予以重视。

3. 殖民经济史

殖民经济是殖民统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殖民地政治与法律、殖民地去殖民化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对殖民经济的研究往往是了解殖民与去殖民史的一个有效的切入口。殖民经济的出现始于受哥伦布一行人吸引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加勒比群岛的占领,西班牙殖民者此番前来主要目的是搜寻重金属、开拓市场以及获取廉价原材料。庞斯认为,“贵金属枯竭、连年战争、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经济停滞,是欧洲向外探险的最主要原因”²,因而,殖民经济首先与采矿和基于广袤且肥沃的土地的农业活动有关。上文提及的卡萨斯是最早提及西班牙人采矿史的学者之一,他对印第安人的同情有一部分是基于西班

1 其博士论文名叫《废除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经济方面》(*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West Indian Slave Trade and Slavery*),虽说和《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书名差别很大,但两本书的核心观点并无不同。

2 Pieter C. Emmer and German Carrera Damas, ed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Volume II: *New Societies: the Caribbean in the Long Sixteenth Century*, p. 62.

牙人采矿活动导致的大量印第安人死亡。厄休拉·兰姆曾为西班牙人弗雷·尼古拉斯·德奥万多作传，叙述他在1501至1509年间担任伊斯帕尼奥拉总督时的历史，其中提到他致力于搜刮这里的黄金和收入以充盈西班牙国王的金库。¹阿梅里科·卢戈聚焦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历史，这段时期见证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走向成熟，同时开始受到英、法、荷等后来殖民者的侵扰。²托马斯·G. 马修斯的研究则从侧面反映西班牙殖民者对矿业和农业的执念，他们曾短暂占领圣马丁岛，怎奈这里缺乏矿产以及可供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于是便将其拱手让出。³胡恩托·L. 德尔·里奥·莫雷诺在1991年出版《1492—1542年新世界欧洲农业的开端》（*Los Inicios de la agricultura Europea en el Nuevo Mundo, 1492-1552*）。书中回顾了殖民者在新世界引入并普及欧洲植物的历史，以及新世界种植园和商业农业制度的建立对欧洲与新世界的双向影响，新世界农业的这些变化与西班牙人的早期殖民行为有关。

加勒比海地区的贵金属矿产并不丰富，为追求更多的贵金属，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将殖民重心转移至中南美洲，这其实导致他们在加勒比殖民地的农业产业也不是很繁荣。尽管随着之后黑人奴隶的引进，他们的农业产业有所发展，但相对于英法等后来殖民者发展的种植园经济而言，仍显得规模较小；主要由英法控制的以黑人奴隶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经济成为接下来近两个世纪殖民经济的主角，比如英国殖民者不止一次地夸耀他们的殖民地（如牙买加、巴巴多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公共档案局收录的文献资料也为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最丰富的证据来源，《通史》第三卷中论述加勒比奴隶经济的文章将公共档案局的资料作为主要援引对象之一。伊格尔·霍尔研究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早、中期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糖种植业的历史，尤其揭示了糖与奴隶何以是殖民经济的两大核心要素。⁴克里斯蒂安·施纳肯堡统计了奴隶人口变化、种植园面积等重要数据，以简要表现法属殖民地瓜德罗普

1 Ursula Lamb, *Frey Nicolas de Ovando: gobernador de Las Indias (1501-1509)*,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Instituto '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 1956.

2 Américo Lugo, *Historia de Santo Domingo desde el 1556 hasta 1608*, Ciudad Trujillo: Editorial Librería Dominicana, 1952.

3 Thomas G. Mathews, "The Spanish Domination of Saint Martin (1633-1648)", *Caribbean Studies*, Vol. 19, No. 1 (Apr., 1969), pp. 3-23.

4 Eagle Hall, *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23-1775*, Barbado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1974.

和马提尼克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经济发展史。¹沃茨在《西印度群岛：1492年以来的发展、文化和环境变化模式》（*The West Indies: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since 1492*）中系统论述了殖民统治下加勒比海地区糖种植业的发展历程，同时分析了糖种植经济与环境、人口等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克拉伦斯·J. 芒福德探讨了法国人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早期阶段的角色，他的论述重点在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背景下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因而他的研究可被划归奴役史范畴，尽管如此，他为论证种植园经济是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根本动力而进行了大量关于种植园经济的描写。²类似的文献还有许多，尤以英语文献为甚³，它们讨论种植园经济的角度或许不尽相同，但它们如此密集地聚焦于种植园经济这一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种植园经济在殖民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英国在1803年废除奴隶贸易后，英属殖民地种植园经历了短暂的劳动力短缺，不久后以印度人和中国人为主的契约工的引入才缓解了这一困难，英属殖民地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向以契约工为主的种植园经济转变（为方便区分，可称后者为契约工经济，但实际上，在描述这类经济的史学论著中，学者们仍习惯用“种植

1 Christian Schnakenbourg, “Statistique pour l’histoire de l’économie de la plantation en Guadeloupe et Martinique (1635–1845)”,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a Guadeloupe*, No. 31 (1er tri., 1977), pp. 3–121.

2 Clarence J. Munford, *The Black Ordeal of Slavery and Slave Trading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 1625–1715*, Vol. I–III, Lewiston: E. Mellon, 1991.

3 例如：Richard Ligon, *A True and Exact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Barbados*. Noel Deerr, *The History of Sugar*, London: Chapman & Hall, 1950. Douglas Hall, *Free Jamaica, 1838–65: An Economic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Richard B. Sheridan,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8, No. 2 (1965), pp. 292–311. 三年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发文《旧帝国的糖殖民地：英国的得与失？》（*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ld Empire: Profit or Loss for Great Britain?*）批评了谢里登的观点，谢里登随即通过文章《18世纪牙买加的财富：一次反驳》（*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joinder*）进行了回应。Vera Rubin and Arthur Tuden,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lavery in New World Plantation Societie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7. Jerome S. Handler and Frederick W. Lange, *Plantation Slavery in Barbados: An Arc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hn Robert McNeill, *Atlantic Empires of France and Spain: Louisbourg and Havana, 1700–17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在这部著作中，麦克尼尔清楚地表明，就糖种植经济而言，作为西属加勒比最大的殖民地，古巴除了在圣多明戈奴隶叛乱后略微超过法属殖民地，在1833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后超过英属殖民地外，一直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的殖民地。Robert Louis Stein, *The French Sugar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lwyn H. H. Carringto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8.

园经济”一词)。吉塞拉·艾斯纳在《1830—1930年的牙买加：一项经济增长的研究》(*Jamaica, 1830–1930: A Study in Economic Growth*)中指出, 契约工经济是那段时期牙买加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菲利普·D. 柯廷解释了印度和中国“苦力”引入牙买加的原因, 并且揭示了他们在殖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¹; 威廉斯在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时也强调了契约工经济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的深远影响。²在殖民统治下, 是否引入契约工最终由宗主国政府决定, 因而契约工议题时常会出现在宗主国政府官方文件中, 这些是研究契约工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 如《英国议会文件》(*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随着英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 法国、荷兰等宗主国也相继出台类似的法律, 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大为缩水, 奴隶制也濒临瓦解。尽管如此, 二者并未消失, 西班牙和美国均未加入废奴队伍, 西属加勒比殖民地和美国南部种植园依旧盛行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 并取代了之前由英属加勒比种植园经济占据的统治地位。斯卡拉诺考察了19世纪上半叶波多黎各奴隶制和糖种植业的发展状况³; 奈特则将研究重点置于19世纪古巴的奴隶社会⁴; 弗拉希纳尔斯等学者则将视野扩大至整个西属加勒比殖民地, 探究了这些殖民地如何依靠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走向繁荣, 以及在废奴大趋势下如何尝试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过渡至契约工经济。⁵

4. 新殖民史

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废除并没有改变废奴地区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契约工的引进完全填补了废奴造成的劳动力缺口, 这导致废奴地区的种植园甚至比废奴前更加繁荣, 至于那些拖延废奴的地区, 繁荣程度相较废奴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 各项技术突飞猛进, 世界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 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心位置的美国暴露扩张野

1 Philip D. Curtin, *Two Jamaicas: the Roles of Ideas in A Tropical Colony, 1830–186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2 Eric Williams,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Trinidad and Tobago*, New York: Frederik A. Praeger, 1964.

3 Francisco A. Scarano, *Sugar and Slavery in Puerto Rico, 1800–185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4 Franklin W. Knight, *Slave Society in Cub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5 Manuel Moreno Fraginals et al., eds., *Between Slavery and Free Labor: the Spanish-Speaking Caribbe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企图打破老牌殖民国家垄断的世界格局。作为美国的近邻，加勒比海地区成为美国向外扩张的“首发站”，美国以经济为武器向加勒比海地区各领域渗透自己的力量，美国政客很早就叫嚣加勒比海是“美国的地中海”。为与之前的殖民史相区别，笔者将美国主导的以经济控制为手段的殖民历史称为新殖民史。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著有《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The Lati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系统阐述了美国自19世纪起制定的干涉、控制拉丁美洲事务的法律与政策，以此为主题的还有戈登·康奈尔-史密斯、艾伯特·K. 温伯格等学者的研究。¹ 菲利普·S. 福纳考察了美国与古巴的关系²，这项成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讲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与美国的关系，这段时期两个地区的关系其实包括两个殖民地间的关系以及之后的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讲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与美国的关系，这段时期亦是美国介入古巴事务的重要时期。美国趁“一战”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走向衰落时，加快了向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的步伐，利用其彼时取得的世界头号强国威望与实力树立在拉丁美洲的统治地位。到了“二战”爆发前，美国基本实现了将加勒比海变为“美国地中海”的目标，“二战”爆发后在此建立多个军事基地。鲁道夫·冯·阿尔贝蒂尼讨论了美国在“一战”与“二战”之间对已沦为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众多地区之事务的介入，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³

三、《通史》反映的热点和新兴领域

——去殖民史、前殖民史、社会史、新文化史与史学史

与殖民史相伴而生的是去殖民史，自从欧洲殖民者开始拓殖加勒比海地区，受压迫群体的反抗行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殖民统治大致可分为奴隶制和非奴隶

1 分别参见 Gordon Connell-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Heinemann Education, 1974.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58.

2 Philip S. Foner,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2-1963.

3 Rudolf von Albertini, "Die USA und die Kolonialfrage, 1917-45,"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13, 1965, pp. 1-13.

制两种背景，反抗行动也可大致分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期的破坏、起义等形式，以及废奴后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相应的史学书写也有区别。

（一）去殖民史

1. 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期的去殖民史

鉴于印第安人受到奴隶般的对待，奴隶贸易兴起之前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印第安人反抗行动，亦可被归入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期的去殖民范畴，尽管如此，这方面的史学记载并不是很多。威廉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El negro en el Caribe y otros textos*）中强调，黑人的反抗意识自奴隶贸易开始时就已经出现，昔日奴隶贸易商艾萨克·威尔逊详述过黑人在贩卖过程中的各种消极行为，“他们不时发出悲叹，甚至想方设法毁灭自己”¹。威廉斯同时代人且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勒比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分析奴隶制经济的价值时提到过奴隶在劳动中的逆反心理²；威廉斯另一个同时代人C. L. R. 詹姆斯也曾对奴隶的反抗行为有所讨论。³尽管受压迫群体的反抗行动贯穿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始终且多种多样，但不得不承认，奴隶起义（或叛乱）受到的关注以及对殖民统治的打击，远远超过其他的反抗行为。种植园主爱德华·朗曾撰写两卷本《牙买加史》（*History of Jamaica*），其中提及18世纪牙买加爆发的多次奴隶起义，如第一次马隆人战争（First Maroon War）、塔基叛乱（Tacky's Revolt）等。上节引用的詹姆斯文献其实主要是讲杜桑·卢维杜尔与圣多明戈起义，奴隶卢维杜尔凭借勇气与智谋引领圣多明戈起义走向胜利，为海地独立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可见，该文献是一份关于圣多明戈奴隶起义的宝贵材料。托马斯·O. 奥特与詹姆斯互为补充，他径直研究了圣多明戈奴隶起义的海地革命部分，他的书名《1789至1804年海地革命》（*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希拉里·比克尔斯考察了巴巴多斯的奴隶起义史，并且曾辟专著研究女

1 John Kenrick, *Horrors of Slavery*, Cambridge: Printed by Hilliard and Metcalf, 1817, pp. 10–11.

2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55, p. 107.

3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p. 15–16.

性奴隶在起义中的作用；何塞·佛朗哥、丽贝卡·斯科特则对西属殖民地的奴隶叛乱进行了研究。¹

2. 废奴之后的去殖民史

废奴对加勒比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劳动力问题上，广大黑人奴隶转身变为自由人，殖民者从印度、中国等地引入契约工，以填补劳动力缺口。契约工毕竟不是奴隶，他们属于受合同约束和保护的劳动者，他们与解放的黑人共同构成加勒比新社会的劳工阶层。在观念上，殖民者自己承认奴役他人是非法的，尽管他们仍尽其所能施展剥削手段，但他们再也不敢像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期那样肆无忌惮地奴役劳动者。受此鼓舞，新出现的劳工阶层心生要求更多权利的想法，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也传到那些依然盛行奴隶制的西属殖民地，如古巴、波多黎各等。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形势的变化，这些想法汇聚成争取地区自治甚至独立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并且这些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变为现实。由此，民族民主独立运动是废奴之后去殖民史的主要内容。肯尼斯·D. 比尔比回顾了19世纪牙买加的黑人运动，认为黑人运动对殖民政府向劳工群体的权利诉求让步产生了影响。² 奥尔加·卡夫雷拉研究了19世纪古巴烟草业中的自由劳动力，他们开始创建工会、协会等组织，为阶级意识的出现和对劳资纠纷的关注奠定了基础。³ 卡夫雷拉继续在《那些靠自己双手生活的人》（*Los que viven por sus manos*）一书中讲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古巴工人运动及其与政府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⁴ 安赫尔·G. 金特罗·里韦拉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波多黎各的工人运动，包括抗议、罢工、形成组织、创建刊物等。⁵ 布兰卡·西尔韦斯特里尼同样关注了这一主题，所不同的是，他更侧重于波多

1 分别参见 Hilary McD. Beckles, *Black Rebellion in Barbados: the Struggle Against Slavery, 1627–1823*, Bridgetown: Antilles Publications, 1984; *Natural Rebels: A Social History of Enslaved Black Women in Barbado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becca Scott, *Slave Emancipation in Cuba: the Transition to Free Labor, 1860–189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Kenneth D. Bilby, “‘Two Sister Pickin’: A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Dual Ethnogenesis in Eastern Jamaica”, *Caribbean Quarterly*, Vol. 30, No. 3 & 4, 1984, pp. 10–25.

3 Olga Cabrera, “Enrique Creci, um patriota obrero”, *Revista Santiago*, No. 36 (Dec., 1979), pp. 50–68.

4 Olga Cabrera, *Los que viven por sus manos*, Hav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1985.

5 Angel G. Quintero Rivera, *Conflictos de clase y política en Puerto Rico*, Río Piedras: Ediciones Huracán, 1978.

黎各工人阶级创建社会政党的历史。¹伯努瓦·若阿基姆注意到19世纪末海地零星的工人反抗活动，他指出，发生这些活动的根本原因是工人的极度贫困。²雷蒙多·冈萨雷斯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工人运动，这些运动源于对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内政的抵制。³

阿尔芒·尼古拉斯的研究《1870年9月马提尼克岛南方暴动》(*L'insurrection du sud à la Martinique, Septembre 1870*)，聚焦于黑人与黑白混血儿一次著名的联合叛乱，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揭示彼时法属殖民地的高压政治生态，并且，尼古拉斯认为这次叛乱为之后的工人运动铺平了道路。自19世纪末起，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开始出现工人运动。理查德·哈特探究了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工人阶级的起源与发展，他认为至少到1913年，这里的工人运动都是自发的，缺乏支持工人运动的组织。⁴尽管如此，在另一份成果《从占领到独立：讲英语的加勒比海地区人民简史》(*From Occupation to Independenc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 Region*)中，哈特提到，从19世纪末开始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已陆续建立工匠工会，这是一种由木匠、鞋匠、砖瓦匠等群体组成的工会。托马斯·C. 霍尔特认为，这些工会在20世纪初寻求过与宗主国类似组织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工会的发展。⁵“一战”之后，宗主国加紧对加勒比殖民地的经济掠夺，这激发了加勒比工人阶级更为激烈的反抗，工人运动日益走向成熟，并且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重在为劳工阶级争取权利的工人运动，逐渐向以自治甚至独立为目标的民族民主运动转变。阿什顿·蔡斯、B. 萨马鲁、H. 古尔伯恩等学者，分别讨论了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

1 Blanca Silvestrini, *Los trabajadores puertorriqueños y el Partido Socialista (1932–1940)*, Río Piedras: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73.

2 Benoît Joachim, “Las luchas campesinas de los años de 1911–1915”, in Johanna von Graffenstein, ed., *Haiti 2*,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osé María Luis Mora, 2000.

3 Raimundo González, “Notas sobre el movimiento sociopolítico dominicano”, *Estudios Sociales: Pensamiento Dominicano*, Vol. 20, No. 67 (Jan.–Mar., 1987), pp. 1–22.

4 Richard Hart,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aribbean Area, 1887 to 1937*, Reading: Community Education Trust, 1982.

5 Thomas C. Holt, *The Problem of Freedom: Race, Labor and Politics in Jamaica and Britain, 1832–193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和多巴哥、牙买加等国工人运动的这种转向。¹上文提及的威廉斯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亦是关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方面历史的一部力作。20世纪30年代，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发生多次大规模劳工运动，其中不乏骚乱、暴力事件，这些运动最能表达劳工们在正式发出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之前所怀有的对殖民统治的不满，O. 奈杰尔·博兰对此有专门的研究。²“二战”后，以争取劳工权利为目标的劳工运动逐渐让位于以自治或独立为目标的民族民主运动，以这方面历史为主题的论著不胜枚举。³

（二）前殖民史

加勒比前殖民史在哥伦布时代即已存在，哥伦布在书信和日记里多次提及加勒比土著人、自然与社会，这些资料成为日后研究加勒比前殖民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在哥伦布之后相当长的殖民年代里，土著人被殖民者压迫为奴，承担各种能帮助殖民者创造利益的任务，他们的生死则被忽视，他们一直以弱者和负面的形象出现在殖民者主宰的社会里，由此在历史书写里也始终被边缘化。“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加勒比前殖民史才真正受到重视。不同的是，现在的重视是为了摘掉之前殖民者所固有的“有色眼镜”，客观平等地看待加勒比土著及其社会。该领域出现了不少拉丁美洲学者，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这表明拉丁美洲学者对在该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充满信心和兴趣，该领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G. G. 辛普森、S. D. 韦布、G. E. 阿尔瓦拉多等学者，考证了加勒比史前自然环境及其与美洲其他地区的

1 参见 Ashton Chase, *A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in Guyana, 1900–1961*, Georgetown: New Guyana Co., 1964. B. Samaroo, “The Trinidad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pular Protest in A Crown Colony”, *Social & Economic Studies*, Vol. 21, No. 2 (Jun., 1972), pp. 205–222. H. Goulbourne, *Teachers,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Jamaica 1892–1972*,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

2 参见 O. Nigel Boland, *On the March: Labour Rebellion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934–1939*, Kingston: Ian Randle, 1995.

3 这些论著包括：Rudolf von Albertini, “The Impact of the Two World Wars on the Decline of Colon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 No. 1 (Jan., 1969), pp. 17–35. Juan Angel Silén, *Hacia una visión positiva del Puertorriqueño*, Bilbao: Edil Inc., 1970. Henri Grimal,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French, 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Franz Anspreng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Lerone Bennett, *The Shaping of Black America: the Struggles and Triumphs of African-Americans, 1619 to the 1990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生物大交换¹，从考古证据上支持加勒比海地区早期居住史的可能性。J. 加西亚·巴尔塞纳、D. E. 普利斯頓、贡萨洛·科雷亚尔·乌雷戈、H. 比格尔等学者，考察了中南美洲加勒比海沿岸早期人类定居点²，完成测算年代、分析社会性质等工作，为加勒比海地区“早期居民迁徙说”提供证据。马尔西奥·维洛兹·马焦洛在尼加拉瓜加勒比海沿岸发现了距今约9000—4000年的人类遗址，该遗址出土多种与“海洋经济”有关的石制工具³，从哥伦比亚至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岸，也出现不少类似的遗址，这进一步证明“早期居民迁徙说”的合理性。E. 塔比奥研究发现，距今约8000年，加勒比海平面曾大幅下降⁴，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指出，在之后的岁月里海平面上下波动相当明显，这些发现与加勒比群岛最早出现早期人类的时间有关。

马焦洛等学者通过考古挖掘提出，目前加勒比群岛最早的人类遗址出现在特立尼达岛，距今约7300—5500年；塔比奥和埃斯特雷利亚·雷伊在古巴发现年代类似的遗址，由此提出，这里也是加勒比人最早生存的地方之一⁵；P. 皮纳等学者在伊斯帕尼奥拉发现了年代更晚的人类遗址，距今约4450年。⁶这并不是说早期人类从南边（特立尼达）和西边（古巴）进入加勒比群岛，然后逐渐向中间岛屿靠拢。阿伽

-
- 1 参见G. G. Simpson, “Zoogeography of West Indian Land Mammals”,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No. 1759, 1956, pp. 1–27. F. G. Stehli and S. D. Webb, eds., *The Great American Biotic Interchang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G. E. Alvarado, “Centroamerica y las Antillas: puente, barrera y filtro biológico entre Norte y Sudamerica (Cretácico al Presente)”, *Geostmo*, Vol. 2, No. 1, 1988, pp. 9–20. J. C. Briggs, *Biogeography and Plate Tectonics*, Amsterdam: Elsevier, 1987; 这部著作的第三章《加勒比联系》(The Caribbean Connection)，解释了加勒比海地区何以出现陆地和淡水生物群的三种假说。
 - 2 相关成果参见J. García-Bárcena, *El precerámico de Aguacatenango, Chiapas, Mexico*, Mexico City: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82. D. E. Puleston, “Richmond Hill, A Probable Early Man Site in the Maya Lowlands”, in José Carlos Chiaramonte, ed., *Actas del XL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Americanistas, México, 2 al 7 de septiembre de 1974*, Vol. 1, Mexico City: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1975, pp. 522–533. Gonzalo Correal Urrego et al., “Artefactos líticos de abrigos rocosos en El Abra, Colombia”, *Revista Colombiana de Antropología*, Vol. 14, 1970, pp. 9–52. H. Bürgli, “Artefactos paleolíticos de una tumba en Garzón, Huila”, *Revista Colombiana de Antropología*, Vol. 6, 1957, pp. 7–30.
 - 3 Marcio Velóz Maggiolo, *Medioambiente y Adaptacion Humana en la Prehistoria de Santo Domingo*, Tomo 1, Santo Domingo: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1976.
 - 4 E. Tabío, *Introducción a la Arqueología de las Antillas: Arqueología*, La Habana: Edit. Ciencias Sociales, 1988.
 - 5 E. Tabío and Estrella Rey, *Prehistoria de Cuba*, Segunda edicion,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1985.
 - 6 P. Pina et al., *Esquema para una revisión de nomenclaturas arqueológicas del poblamiento precerámico en las Antillas*, Santo Domingo: Ediciones Fundacion Garcia Arevalo, 1974.

门农·古斯·潘特尔认为,早期人类从古巴和特立尼达进入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到达了加勒比各岛屿,原因是他在波多黎各发现了与古巴和特立尼达年代相近的人类遗址。¹雅克·珀蒂让·罗热考察了加勒比群岛早期人类的农业生活,认为苦木薯是他们主要依赖的作物,此外,他们也可能种植红薯、辣椒以及番石榴、菠萝等水果。²P. 布伦·里普利根据巴哈马群岛、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出土的某些瓷器成色与质地相似,判断存在一批稍晚进入加勒比群岛的农业定居人群,该农业群体来自北边的佛罗里达,在他们到来时加勒比群岛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定居点。³尽管如此,费尔南德斯·门德斯、梅拉·庞斯·德阿莱格里亚等学者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如今的加勒比土著居民留有其数千年之前从大陆过来的祖先的文化印记。⁴原因是从距今约1000年开始,加勒比群岛基本与大陆隔绝开来,岛上的人民过上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近现代以后,他们才重新与美洲大陆加勒比沿海地区的人群产生交集,而这时双方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三) 社会史、新文化史、史学史

在社会史方面,《通史》中涉及城市、人口、家庭、妇女等主题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加勒比区域史中发展比较快的研究。C. G. 克拉克研究了牙买加金斯敦自17世纪末以来的城市演变史;何塞·路易斯·罗梅罗论述了拉丁美洲城市及其理念简史,这两个方面无不与殖民者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⁵罗伯特·V. 韦尔斯系统探讨

1 Agamemnon Gus Pantel, *Stage II Cultural Resources Evaluation of the Maruca Precolumbian Site: Ponce, Puerto Rico*,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San Juan, Puerto Rico, 1994; "Evaluacion Arqueológico Fase II del Yacimiento Precolombino Maruca: Ponce, Puerto Rico", Archivos del Instituto de Cultura Puertorriqueña, Viejo San Juan de Puerto Rico, 1994.

2 Jacques Petitjean Roget, "A propos des platines à manioc",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CSPCLA, Guadeloupe*, 1976, pp. 76-81.

3 Ripley P. Bullen, "Similarities in Pottery Decoration from Florida, Cuba, and the Bahamas", i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 Actas del XXX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Americanistas*, Vol. II, San José, Costa Rica: Lehmann, 1959, pp. 107-110.

4 参见Eugenio Fernández Méndez, *Art and Mythology of the Taino Indians of the Greater Antilles*, San Juan: Ediciones El Cemí, 1972. Mela Pons de Alegría, "Las figuritas de barro de la cultura Saladoide de Puerto Rico",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CSPCLA, Santo Domingo*, 1983, pp. 121-129.

5 参见C. G. Clarke, *Kingston, Jamaica: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1692-2002*,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2006. José Luis Romero, *Latinoamérica: las ciudades y las ideas*, Capital Federal: Industria Gráfica Argentina, 2001.

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¹；约翰·哈尔托赫、安克·克洛普、O. 奈杰尔·博兰等学者，则考察了各具体地区的历史，人口变化是其主要方面之一。² M. G. 史密斯、伊迪丝·克拉克、芭芭拉·布什等学者围绕家庭和妇女的主题进行研究。³ 相比而言，东加勒比海地区发起的“加勒比项目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Caribbean Project）项目，对家庭和妇女的关注与研究要系统得多。该项目融入了多种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促进了加勒比家庭史、妇女史领域的更新与转变，为这两个领域积累丰富的资料，并且贡献诸多有益成果。除了这些广受关注的领域，移民方面的历史也日益受到重视。G. W. 罗伯茨和J. 伯恩合作研究了奴隶制废除初期契约移民的动因与过程。⁴ 勒内·亚琛以马提尼克为案例，揭示19世纪末加勒比社会关于契约移民的舆论导向。⁵ 事实上，契约移民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即已存在，埃斯特拉·西弗雷·德洛夫列尔重点考察了19世纪前往波多黎各的移民，尽管以白人为主，但其中不乏契约劳工⁶；P. C. 埃默编著了《殖民主义与移民：奴隶制前后的契约劳工》（*Colonialism and Migration: Indentured Labor before and after Slavery*），其中收录的12篇论文集中探讨了这一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广泛的移民史应该包括贩卖奴隶，奴隶贸易造成了跨大西洋区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相关论著在上文已有所涉及。

1 Robert V. Wells,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before 1776: A Survey of Census Dat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相关成果如下：Johan Hartog, *Aruba: Past and Present: from the Time of the Indians until Today*, Oranjestad: D. J. DeWit, 1961. Johan Hartog, *Bonaire: Ban Indianen tot toeristen*, Aruba: Gebroeders de Wit, 1957. Ank Klomp, *Politics on Bonaire: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Assen Maastricht: Van Gorcum, 1986. O. Nigel Boll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lonial Society: Belize, from Conquest to Crown Colon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相关成果如下：M. G. Smith, *West Indian Family Struc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2. Edith Clarke, *My Mother Who Fathered Me: A Study of the Family in Three Selected Communities in Jamaica*, 2nd edn,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66. Barbara Bush, *Slave Women in Caribbean Society, 1650-183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G. W. Roberts and J. Byrne, “Summary Statistics on Indenture and Associated Migration Affecting the West Indies, 1834-1938”,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0, 1966, pp. 125-134.

5 Rene Achen, “The Problem of East Indian Immigration at the Bar of Public Opinion in Martinique, 1882-1886”, The 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aribbean Historians: Immigrant Labourers in the Caribbe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na, Kingston, 1972.

6 Estela Cifre de Loubriel, *La inmigración a Puerto Rico durante el siglo XIX*, San Juan, Puerto Rico: Instituto de Cultura Puertorriqueña, 1964.

关于新文化史，这是近三十年来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史学潮流，重在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故而又称“社会文化史”，就此而言，《通史》涉及的制图史、迁徙史等属于这一领域。“制图”在殖民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词汇，而且代表殖民者对殖民地认识 and 控制的加深，因而又是一个殖民词汇。《通史》第二卷第十章提到1500至1650年的加勒比制图史，这段时期对应西班牙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在此之后，制图史随着其他国家殖民者的到来而不断得到拓展与丰富，制图的内容从加勒比海和各岛屿的轮廓延伸至各岛屿内部的地形地貌。18世纪爱尔兰医生暨植物学家帕特里克·布朗曾实地走访牙买加，详细记录其动植物、山脉、河流等自然因素。¹稍晚时候来自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爱德华·朗曾久居牙买加，通过著作《牙买加史》同样对牙买加自然地理和山川地貌进行了详细描述。类似布朗、朗这样的殖民时代自然史家不在少数，他们未必都会怀揣殖民与征服的梦想去考察殖民地的大自然，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活动象征着殖民宗主国的知识霸权如同政治军事霸权一样笼罩着殖民地，理查德·德雷顿、杰斐逊·迪尔曼等学者在其论著中体现了这一观念。²与制图史类似，加勒比迁徙史反映的并非表面上交通工具的变化或迁徙路线的变化，而是更深层次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政治格局的调整。加勒比海地区自废除奴隶制之后一直处于繁忙的迁徙状态中，美国是他们迁徙的最重要目的地之一，原因不言而喻。迁徙与移民在概念上是相似的，但二者存在区别，迁徙指代的内容比移民更为宽泛，像旅行、偷渡这些属于迁徙范畴的活动未必等同于移民。罗斯玛丽·布拉娜-舒特系统总结了加勒比迁徙史方面的参考文献³，这份成果的亮点在于试图在迁徙和移民的概念之间寻找共同点，并将二者纳入统一的书写范畴之中，拓宽二者的研究范围。

1 Patrick Browne, *The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756.

2 参见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Jefferson Dillman, *Colonizing Paradise: Landscape and Empire in the West Indie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5. Susan Scott Parrish, *American Curiosity: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in the Colonial British Atlantic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3 Rosemary Brana-Shute, *A Bibliography of Caribbean Migration and Caribb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Gainesvill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83.

在史学史方面,《通史》全六卷均与此有关,原因是作为史学研究的历史,任何领域的史学书写均可被纳入史学史范畴;不仅如此,《通史》第六卷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探讨加勒比各地区的史学史,为进一步深化加勒比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学讲究“让史料说话”,可以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灵魂”,研究能不能开展或开展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史料,史学史为解决史学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史学史最大的价值之一是总结资料,它的英文单词叫“Historiography”,该词亦有历史编纂学的意思,因而史学史即是对过去研究各阶段历史的资料的编纂,这一价值对加勒比区域史研究而言弥足珍贵。加勒比海地区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直到如今仍存在殖民统治的诸多残留问题,这导致关于这方面的史学研究始终无法摆脱殖民宗主国的影响,甚至径直掌握在殖民宗主国手中。近几十年尽管随着去殖民化政治思潮的盛行,加勒比不少怀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史学家投身于该区域的史学研究,但由于大量资料被殖民宗主国控制,他们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通史》对史学史的重视意在打破这样的僵局。在《通史》之前已经存在关于加勒比史学史的研究,亨利·H. 布林的《圣卢西亚:历史、统计与描述》(*St. Lucia: Historical, Statistical, and Descriptive*)、威廉斯的《英国历史学家和西印度群岛》(*British Historians and the West Indies*)等均属于这类论著。巧合的是,与《通史》出版几乎同一时间,英国剑桥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11卷的《剑桥拉丁美洲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atin America*),其中包括对加勒比史学史的系統介绍,这说明加勒比史学史当时在学界已经引起普遍的重视。

四、《通史》仍需更“通”一些——兼论海洋史、疫病史与国别史

二、三两节概述了《通史》强调的加勒比区域史中一直占重要地位或最近几十年日益受重视的史学领域,无论从量还是质上看,对这些领域的强调都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尽管如此,《通史》仍旧不能称之为完美,其忽略的某些部分成为其瑕不掩瑜的细微缺陷,但这些部分对于深化有关加勒比区域史的研究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在《通史》忽略的领域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洋史、疫病史与国别史。

（一）海洋史

海洋史同样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种史学领域，主旨是将海洋的角色与社会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与纯科学性的海洋技术学科存在本质的区别，同时它也迎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需求，多角度阐述海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海洋史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它主要适用于那些与海洋接触的区域，它的这一局限却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加勒比海地区是指加勒比海及其周边沿岸地区、海中群岛以及附近岛屿组成的一片区域，更有甚者，将墨西哥湾及其周边沿岸地区也纳入进来。无论如何，加勒比海地区的核心是海洋，因而在研究这片区域的历史时，海洋史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尽管加勒比海洋史研究亦是在近几十年才兴起，但在加勒比史学书写中涉及海洋方面则是从殖民初期就开始了。一些殖民者会记录下欧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航行图，或者会记录海上天气、海上事故等，这些活动无不体现他们下意识地注意到海洋对殖民的影响。显然，这个阶段的海洋史研究主要是为殖民服务的，主导权掌握在殖民者手中。“二战”后，加勒比海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独立浪潮，不少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主独立国家，建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否则很容易重新落入以经济为诱饵的新殖民主义陷阱。海洋作为加勒比国家经济依赖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加勒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因而对海洋史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性。

在早期殖民者的笔下，加勒比海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象。法国神父安托万·比耶曾将前往南美洲卡宴岛（Cayenne）的经历记录下来¹，为研究法国殖民者在该岛的活动以及海上的贸易与争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法国传教士曾记载威廉·杰克逊船长在美洲的故事²，尤其提到他率军抗衡西班牙海上舰队以扩大英国势力的历史。17世纪法国作家拉博尔德（La Borde），在其著作《包含对美洲安的列斯群岛与世隔绝的加勒比人准确描述的旅行》（*Voyage qui contient une relation exacte des caraïbes*

1 Antoine Biet, *Voyage de la France équinoxiale en l'isle de Cayenne*, Paris: Chez François Clovzier, dans la Cour du Palais, 1664.

2 Raymond Breton, "The Voyages of Captain William Jackson (1642-1645)", in V. T. Harlow et al., eds., *Camden Miscellany*, Vol. XIII, London: Offices of the Society, 1923.

sauvages des Antilles de l'Amerique) 中, 记录了从法国航行至美洲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尽管主角是美洲土著居民, 但加勒比海在其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不出意外的是, 加勒比海与那里的土著居民一样总是以“野蛮”的形象出现, 那里的风高浪急、阴晴不定得到特别的关注。与此不同的是, 胡安·包蒂斯塔·穆尼奥斯在《新世界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中给予了新世界包括海洋在内的大自然很大的褒奖, 它们本身奇特且壮观, 给哲学、科学带来新的启示; 同时它们的物产丰富也引起殖民者的觊觎, 一望无际的海洋更是成为殖民者的贸易通道, 促成了殖民者对这里的征服与破坏。这部著作除了过于贬低美洲土著居民外, 写作态度尚属客观与公正。华金·F. 帕切科编纂过42卷本的关于西班牙拓殖美洲和大洋洲的史料¹, 在美洲部分不乏诸多探险航行时的记录, 这些是研究海洋史的宝贵文献, 美中不足的是, 这些只能揭示西班牙人眼中的加勒比海史。菲利普·D. 摩根等学者总结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19世纪中叶加勒比海地区的海洋演变及其所涉及的文献资料², 其中不乏英文资料, 不失为对帕切科成果的一种有益补充。可见, 早期殖民者关于加勒比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描述, 主要局限在对其航道、贸易、战场等功能的关注, 并且惯于将加勒比区域的海洋置于更广阔的美洲史范畴内进行研究, 缺乏针对海洋史的专门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 海洋在加勒比区域发展中表现出愈益显著的作用, 对海洋的研究也开始走向广博且精细化。“一战”前夕, 殖民列强开始在加勒比海集中开采石油资源, 这重新激发了他们本已懈怠的对这里的殖民热情, 让海洋史向加勒比区域史学书写中重要地位靠拢的学术齿轮就此转动。石油的发现引起殖民列强将资本大规模投向加勒比海地区, 在这里建起一个个石油公司, 对这里进行经济渗透, 同时导致工人力量不断壮大, 为接下来更猛烈的工人运动浪潮拉开了序幕。塞尔温·瑞安在专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种族与民族主义: 多种族社会中的去殖民化研究》(*Race and Nationalism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 study of decolonization in A multiracial*

1 Joaquín F. Pacheco et al., eds.,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de indias relativas al descubrimiento, conquista y colonización de las posesiones españolas en América y Oceanía*, 42 Vols, Vaduz: Kraus Reprint, 1864–1884.

2 Philip D. Morgan et al., *Sea an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society) 中详细论述了石油工业在20世纪上半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罗梅尔·埃尔南德斯在普及性读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 Tobago) 中直言石油是“黑色黄金”(black gold), 主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济长达半个世纪。胡里奥·勒里弗伦德则转向古巴, 他指出古巴石油资源丰富, 石油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巨大, 但这种经济长期为外国势力控制, 由此政治也受外国势力影响, 直至20世纪50年代革命之后, 古巴才将石油经济国有化, 石油经济迎来新的繁荣。¹ 其他如波多黎各、英属圭亚那等地亦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石油在国家经济中同样占有很大的比重, 相关的史学书写也都涉及这一点。

石油经济的繁荣引发诸多海洋问题, 其中一点即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 尽管如此, 除了石油, 加勒比海地区也出于以下两个因素而容易出现污染问题: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导致的繁荣的交通往来、季节性洋流。20世纪中叶以后, 海洋污染成为加勒比海洋史研究中的热点主题之一, 具体包括污染的类型、起因、影响、治理与法律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鉴于污染问题文理兼容的性质, 多种学科介入了对污染问题的研究, 非历史学科的不少成果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开展, 由此值得借鉴。西尔维娅·米凯莱·迭斯的专著《加勒比海地区的海洋污染: 迫在眉睫》(Marine Pollution in the Caribbean: Not A Minute to Waste), 多角度分析了加勒比海洋污染问题; 彼得·爱德华兹、D. K. 阿特伍德等学者就污染的类型展开专项研究²; 戴维·弗里斯顿、克莱夫·斯科菲尔德等学者则对污染源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石油作业是

1 Julio Le Riverend, *Breve historia de Cuba*,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1999.

2 涉及的类型包括化学品、重金属、塑料、石油、营养物等, 具体成果如: Peter Edwards, *Impact and Amelioration of Sediment and Agro-chemical Pollution in Caribbean Coastal Waters: the Fate of Agro-Chemicals in the Land Water Interface, with Reference to Jamaica and the Wider Caribbean*, DFID Natural Resources Systems Programme/DFID NRSP Project R7668 (Report 5), 2001. Adolfo Fernandez et al.,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race Metals and Organic Compounds of Anthropogenic Origin in the Wider Caribbean Region”,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Vol. 54, No. 11 (Dec., 2007), pp. 1681–1691. Kara Lavender Law et al., “Plastic Accumula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 Subtropical Gyre”, *Science*, Vol. 329, Issue 5996 (Aug., 2010), pp. 1185–1188. D. K. Atwood et al., “Results of the CARIPOL Petroleum Pollution Monitoring Project in the Wider Caribbean”,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Vol. 18, No. 10 (Oct., 1987), pp. 540–548. T. Tomascik and F. Sander, “Effect of Eutrophication on Reef-Building Corals, I. Growth Rate of the Reef-Building Coral *Montastrea Annularis*”, *Marine Biology*, Vol. 87, Issue 2 (Jan., 1985), pp. 143–155.

主要的污染源之一。¹张秀雯的研究对考察加勒比海洋污染的影响有所启发，她认为污染对旅游业有一定的冲击²，阿特伍德持有类似的观点；拉达纳·K. 坎海认为海洋污染会危害渔业资源；贾米森·安妮·洛则认为海洋污染会引发导致鱼群成批死亡的水体富营养化。面对危害重大的海洋污染，防治污染成为加勒比各国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难题。陶万勇简述了加勒比海洋污染防治与法律演变之间的关系³，这也揭示了法律、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加勒比海洋污染防治过程中的重要性。⁴温斯顿·安德森是最早研究加勒比海洋污染防治的学者之一，在《加勒比海洋污染法》（*The Law of Caribbean Marine Pollution*）中，他系统阐述了加勒比海洋污染类型、成因、影响以及最关键的防治举措。

海洋污染存在多种影响，无论是哪一种，最终影响的都是加勒比各国的国家收入，这是各国积极开展海洋污染防治合作的根本原因。到20世纪后期，各国防治海洋污染的热情显著提高，原因是海洋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进一步提升，相应地，海洋史研究的经济面向也受到更多的重视。阿兰·雅库编辑出版了《安的列斯群岛的自然灾害：从苏弗里耶尔火山开始》（*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aux Antilles: D'une Soufrière à une autre*），书中提到火山喷发、地震、风暴等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重点关注苏弗里耶尔火山所在岛屿瓜德罗普所受的影响。斯图尔特·B. 施瓦茨研究了殖民时代至今的加勒比飓风史，他认为飓风因其巨大的破坏力一方面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灵创伤，另一方面也会引发难以挽回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⁵；理查德·洛布德尔则直接测算了飓风在加勒比海

1 David Freestone and Clive Schofield, "The Caribbean Sea and Gulf of Mexico", in Donald R. Rothwell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rne Jernelöv and Olof Lindén, "Ix-toc I: 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s Largest Oil Spill", *Ambio*, Vol. 10, No. 6 (Jan., 1981), pp. 299–306.

2 Avril Siung-Chang, "A Review of Marine Pollution Issues in the Caribbean",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and Health*, Vol. 19, No. 2 (Jun., 1997), pp. 45–55.

3 陶万勇：《20世纪下半叶海洋法演变与加勒比国家海洋污染防治》，《史林》2023年第6期。

4 与加勒比海洋污染防治有关的区域、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环境规划署等；法律政策文件包括《1973年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3年卡塔赫纳公约》以及前述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咨询报告等。

5 Stuart B. Schwartz, *Sea of Storms: A History of Hurricanes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from Columbus to Katr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¹；路易·佩雷斯同样以飓风为主题，他所关注的是飓风与19世纪古巴社会经济转变之间的有机联系。²彼得·克莱格等学者于2021年出版合作编著的《加勒比蓝色经济》(*The Caribbean Blue Economy*)，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角度阐述海洋与经济之间的融合关系。该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其中收录了很多尚未落实的海洋开发倡议，尽管如此，它通过以模型构建、逻辑推导和数据分析为主的书写范式突出了海洋在加勒比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激发了各国进行海洋研究的更大的热情。以旅游业为例，这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创造可观利润的产业却始终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多个国家未能在经济上摆脱对大国的依赖，大国阻碍它们开发有利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旅游业，并且通过控制航空公司攫取旅游业所创利润中的大部分，加勒比各国在低利润和大国阻拦的双重打击下对旅游业兴趣低迷。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防治污染合作的日益展开，以及海上游轮旅游新形态逐渐风靡，加勒比各国尝到旅游业的甜头，下意识地旅游业投入更多的资金与精力。鉴于此，提倡加勒比蓝色经济的学者们认为，加勒比各国应加强海洋管理、海上运输等方面的研究，为发展旅游业提供更多可资参考的数据与资料。

(二) 疫病史

疫病在加勒比区域史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作家们在描述该区域历史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疫病方面的史实，尽管如此，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作家将疫病作为作品的主题，这主要与疫病史特殊的性质有关。疫病史的核心要素是疫病，而疫病属于医学范畴，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才能真正了解它，加勒比海地区长期被殖民，殖民者只是将这里作为生财的暂居地，视被殖民者为他们生财工具，他们不会真正去关心疫病及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毕竟被殖民者是廉价甚至免费的。此外，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殖民地各阶层人士很自然地会将许多疫病视为上帝对破戒之人、非基督徒或无信仰之人的惩罚，由此省去了对疫病进行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

1 Richard Lobdell,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urricanes in the Caribb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 1990, pp. 178-190.

2 Louis Pérez, *Winds of Change: Hurrican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Cub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观察。由此，殖民时代对疫病的书面记录主要出自医学专业者之手，并且主要是为殖民者所作。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贝尔曾前往英属加勒比海地区，调查疫病的成因以及人们预防疫病的方法¹；同样是苏格兰医生的詹姆斯·克拉克在多米尼克担任医生时，调查过该岛在18世纪末多次发生的黄热病²；尼古拉斯-皮埃尔·吉贝尔作为法国随军医生，曾详述法属圣多明戈的医学史，不过他的侧重点是法国军队在该地医学史中的角色³；英国随军外科医生罗伯特·汉密尔顿阐述了随军外科医生的职责，由此扩展到对英属殖民地医学史的探讨⁴；另一位英国随军外科医生约瑟夫·麦克里尔曾在西印度群岛、埃及、美国等地逗留过，著有《黄热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一书，书中除了描述黄热病的主要症状以及有效的治疗方法外，还将美国的黄热病与西印度群岛的相比较，加深了人们对黄热病的认识。总体而言，涉及疫病史的资料算不上特别丰富，各种各样的日记是其中谈论疫病比较频繁的一类文献⁵，这一点与海洋史很接近。尽管如此，这些零散的资料却为新时代加勒比疫病史研究提供了坚固的文献基础。

“二战”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研究思潮兴起，之前不受重视或还未出现的史学领域和方法论逐渐登上研究的中心舞台，如海洋史、医疗社会史（即本节提到的疫病史）、全球史、微观史、计量史学等。这些“时髦”的史学领域和方法论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丰富了研究内涵，与

1 John Bell,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Which Produce, and the Means of Preventing Diseases among British Officers, Soldiers, and Others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 Printed for J. Murray, 1791.

2 James Clark, *Treatise on the Yellow Fever as It Appeared on the Island of Dominica in the Years 1793, 1794, 1795, and 1796*, London: Printed for J. Murray and S. Highley, 1797.

3 Nicolas-Pierre Gilbert, *Histoire médicale de l'armée française à Saint-Domingue en l'an dix*, Paris: Chez Gabon, 1803.

4 R. Hamilton, *The Duties of A Regimental Surgeon Considered*, 2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George Woodfall, 1794.

5 例如：Thomas Ashe, *Carolina,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 London: Printed for W. C., 1682. Anonymous, *A Letter Giv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Isthmus of Darien*, Edinburgh: Printed for John Mackie, 1699. Roderick Mackenzie, *An Exact List of All the Men, Women and Boys that Died on Board the Indian and African Company's Fleet, during their Voyage from Scotland to America, and since Their Landing at Caledonia, together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Qualities, the Several Days of Their Deaths, and the Respective Distempers or Accidents of Which They Died*, Edinburgh: Printed by George Mosman, 1699. Anonymous, *An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to Carthage*, London: Printed for J. Roberts, 1744. Anonymous, *An Authentic Journal of the Siege of the Havana*, London: Printed for T. Jefferys, 1762. Bertrand Bajon,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Cayenne et de la Guyan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Grangé, 1777-1778.

此同时，它们也有助于打破殖民者在书写内外的主导地位，突出加勒比海地区和人民的重要性，为其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积累支撑性素材。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根据某些殖民作家的作品节选，讨论了殖民时代海员的健康问题¹，劳埃德此举是为了激发人们对英国海军及其医学史的兴趣。里卡多·阿奇拉考察了委内瑞拉的医学史，尤其突出殖民前后的变化；克里斯东·阿谢尔回顾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地的健康与医院护理状况；何塞·G. 里高-佩雷斯的研究重点在于蚊子引发的黄热病，这场瘟疫在1804—1805年的波多黎各圣胡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戴维·艾金考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属圭亚那产糖殖民地的健康、医药和国家状况，他认为废奴间接推动了该地医疗水平的提高；达马拉特尼·阿马拉孔等人尝试在加勒比登革热发病规律与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起联系。²2003年，马丽奥拉·埃斯皮诺萨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黄热病对古巴独立战争以及建国早期政治社会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推动了国家公共健康部门的建立。³2007年，杰弗里·L. 赫德森编著的《英国军事与海军医学，1600—1830年》（*British Military and Naval Medicine, 1600—1830*）出版，其中有篇文章考察了医学视域下18世纪下半叶英国军队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活动。

尽管以地区、历史事件或片段为主题的传统书写范式一直保持至今，但从很早时候起，加勒比疫病史研究就引入了作为后起之学的全球史方法论，并留下了一些经典之作。1972年，小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出版《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的

1 Christopher Lloyd, ed., *The Health of Seamen: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Dr. James Lind, Sir Gilbert Blane and Dr. Thomas Trotter*,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65.

2 分别参见Ricardo Archila,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en Venezuela, época colonial*, Caracas: Tip. Vargas, 1961;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en Venezuela*, Mérida: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1966. Christon Archer, “Combating the Invisible Enemy: Health and Hospital Care in the Army of New Spain, 1760–1810”, *New World*, Vol. 2, 1987, pp. 49–92. José G. Rigau-Pérez, “Muerte por mosquito: la epidemia de fiebre amarilla en San Juan de Puerto Rico 1804–1805”, *Boletín de la Asociación Médica de Puerto Rico*, Vol. 83, 1991, pp. 58–60. David Aickin, *From Plantation Medicine to Public Health: the State and Medicine in British Guiana, 1838–1914*, Ph. 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2001. Dharmaratne Amarakoon et al.,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Patterns of Dengue in the Caribbean”, *Faculty of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s Newsletter*, Vol. 15, No. 1, 2004, pp. 1–3.

3 Mariola Espinosa, *Epidemic Invasions: Yellow Fever, Public Health, and the Limits of Cuban Independence, 1878 through the Early Republic*, Ph. D. dissert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3.

生物和文化征服》(*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书中他从疫病的视角驳斥了西班牙殖民者导致美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的“黑色传说”，认为尽管西班牙殖民者极力剥削、残害美洲土著居民，但真正导致土著居民大量死亡的原因是跟随殖民者来到新大陆的传染病。这一观点影响了之后的疫病全球史家，马克·哈里森在2004年的著作《1500年至今的疾病与现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中提出类似的观点，“随着人类的迁徙，微生物的传播也随之而来，加速了埃曼纽·勒华拉杜里所谓的‘疾病统一全球’。虽然细菌的分布比以前广泛得多，但疾病的负担却远远不平等，长期接触天花和麻疹等传染病，使欧洲人获得了美洲和太平洋地区人民所缺乏的免疫力，然而，一旦他们登上新大陆，这些传染病就会在当地居民中迅速传播并致命，而欧洲人则相对毫发无损”¹。兰德尔·M. 帕卡德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疟疾，他描绘出从古至今疟疾的传播轨迹，这种原本只是非洲一角的地方性疾病，随着人类活动很快成为遍布各地的世界性烈性传染病。他进一步提出，加勒比海地区以农业工人为基础的大型种植园生产方式，为疟疾发展成当地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提供了优良的条件，疟疾则成为阻碍该区域发展的最棘手问题之一。²著名环境史家约翰·R. 麦克尼尔采用了与卡帕德类似的书写模式，论述了蚊子影响泛加勒比区域社会发展的史学过程。具体地讲，麦克尼尔展示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如何改变泛加勒比区域的生态，生态变化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泛加勒比区域17至20世纪初的帝国、战争和革命的命运，蚊子是此处“生态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³

(三) 国别史

最后一个在《通史》中遭冷落却也值得一提的史学领域是国别史。加勒比海地区水多地少，人们提及此地时习惯统称其为“加勒比海地区”，很少注意到这是一

1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td., 2004, p. 72.

2 Randall M. Packard, *The Making of A Tropical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Malar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J. R. 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个岛屿林立、国家众多、文化多元的地区综合体。《通史》提及的某些方面已接近国别史范畴或为开展国别史研究提供了条件。首先是区域一体化，这本来属于新时代去殖民化方面的研究，但也可以纳入“二战”后兴起的区域国别研究。从殖民时代开始，加勒比海地区已出现领土整合运动，但受殖民者以利益为导向的政策的影响，这些运动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二战”爆发后，英美打着加强在加勒比海地区合作的旗号，主导建立了英美加勒比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加勒比委员会）。该组织可被视为加勒比一体化在新时代的重新尝试，其在“二战”期间也确实推动加勒比海地区取得一些进步，至少在使该区域免于更多地卷入战争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这毕竟是殖民列强为应付“二战”而建立的区域合作组织，“二战”结束后，其活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英属加勒比人要求建立加勒比人自己的一体化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在与英当局反复商议后，于1958年建成英属加勒比联邦；该联邦赋予英当局主要权力，且成员国之间利益无法统一，由此仅仅存在四年便解散了。加勒比委员会和英属加勒比联邦的悲剧收场表明，指望大国引领实现加勒比一体化是行不通的，加勒比事务应该由加勒比人做主。在此想法的激励下，英属加勒比联邦原各成员国反复协商并于1973年建成加勒比共同体，这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旨的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为政治合作树立了样板，二十年后，加勒比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加勒比共同体的基础上合作建成加勒比国家联盟。¹其次是各地区的史学史研究，这虽然与国别史有所区别，却为包括国别史在内的各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显然，区域一体化和各地区史学史研究均无法代替国别史研究，加勒比一体化正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但这无法改变加勒比各国、各地区之间各不相同的事实，国别史研究无疑是了解这种不同以及各国、各地区自身历史脉络的大前提。在加勒比海地区，那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关注，包括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波多黎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古巴是最早受到欧洲殖民者青睐的加勒比岛屿之一，自西班牙殖民时代开始，便出现关于该岛屿的整体

1 关于加勒比一体化的历史渊源与推进过程，可参见陶万勇：《埃里克·威廉斯与20世纪英属加勒比一体化》，《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

史研究，这种传统在古巴独立后也一直保留着。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处于一个叫伊斯帕尼奥拉的岛上，它们在19世纪中叶才正式分开，之前叫圣多明戈或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一样，这里是最早被殖民的加勒比岛屿之一，由此史学书写也从很早时候就开始了。19世纪初，该岛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拉丁美洲第一个共和国，史学书写从此走向兴盛。牙买加也曾被西班牙殖民，但之后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加勒比殖民地之一，其整体史研究亦起源较早。波多黎各先是被西班牙殖民，后被美国据为己有，直到如今仍由美国控制，不过关于该岛的史学研究一直都很火热。巴巴多斯与特立尼达是英国另外两个著名的加勒比殖民地，巴巴多斯的产糖量一度跃居英属加勒比殖民地之首，而在废奴之后，特立尼达的地位逐渐超过巴巴多斯。¹国别史研究不以独立为标准，以这些岛屿为例，其中有些很晚才独立，不能就此认为它们的国别史研究在独立后才出现。国别史应以地区、民族或种族共同体为界限，不管是否被殖民，以地区、民族或种族共同体为内核的整体史或编年史研究均可被称为国别史研究。

在此定义下，除这些地区之外的加勒比岛屿也都应该有自身的国别史研究，但受地小人少的影响，这些岛屿的国别史研究很少受到重视，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深化加勒比国别史研究提供启发。约翰·约翰逊、弗拉纳根夫人均自

1 有关这些地区国别史的著名论著，包括：古巴方面，如D. Jacobo de la Pezuela, *Historia de la isla de Cuba*, 4 Vols, Madrid: Carlos Bailly-Bailliere, 1878. M. R. Harrington, *Cuba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Heye Foundation, 1921. Gerardo Castellanos, *Panorama histórico, ensayo de cronología cubana desde 1492 hasta 1933*, Havana: Ucar García, 1934. 伊斯帕尼奥拉方面，如François Xavier Charlevoix, *Histoire de l'isle Espagnole ou de St-Domingue*, Paris: Hippolyte Louis Guerin, 1730. Frank Moya Pons, *La Espanola en el siglo XVI*, Santiago: Universidad Catolica Madre y Maestra, 1971. 牙买加方面，如Francisco Morales Padrón, *Jamaica española*, Sevill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1952. Beryl M. Allen, *A Junior History of Jamaica*, Kingston: Heinemann Publishers (Caribbean) Ltd, 1989. 波多黎各方面，如Salvador Brau, *La colonización de Puerto Rico: desde el descubrimiento de la isla hasta la reversión a la corona española de los privilegios de colon*, San Juan: Herald Espanol, 1907. Loida Figueroa, *Breve historia de Puerto Rico*, Río Piedras: Editorial Edil, 1970-1977. 巴巴多斯方面，如George Frere, *A Short History of Barbados from Its First Discovery and Settlement to the End of the Year 1767*, London: Printed for J. Dodsley, 1768. Hilary McD. Beckles, *A History of Barbados from Amerindian Settlement to Nation-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特立尼达方面，如Pierre-Gustave-Luis Borde, *History of Trinidad under the Bibliography Spanish Government*, 2 Vols, trans. James Alva Bain and A. S. Mavrogordato, Port of Spain: Paria Publications Co., 1982. Eric Williams,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Trinidad and Tobago*.

羽详细描述过安提瓜从土著人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这些是宝贵的原始材料¹；吕克·奥夫斯等人整理编排了阿鲁巴在20世纪之前的原始资料，形成编著《阿鲁巴记忆：石油工业到来之前的阿鲁巴随笔》（*Arubaans akkoord: opstellen over Aruba van vóór de komst van de olieindustrie*）；路易斯·达尔则系统论述了荷属加勒比殖民地（包括阿鲁巴、博奈尔、库拉索、萨巴、圣尤斯特歇斯、荷属圣马丁）的历史，其中包括这些小岛的当代史。²盖伊·H. 本杰明以回忆录的形式书写了美属维尔京群岛现代化的过程；特奥多尔·德博伊则以财产拥有者的视角叙述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历史，并将其与英属加勒比群岛做比较。³罗杰·C. 史密斯研究了开曼群岛的航海遗产，具体指一群岛民以该群岛为基地探索海洋的历史⁴，开曼群岛作为英属加勒比最小的殖民地之一，其历史基本由海洋史构成。乔治·S. S. 赫斯特以点评的形式叙述了开曼群岛史⁵，这不是一部标准的国别史作品，却贡献了诸多精彩的论述和史料。托马斯·阿特伍德详述了多米尼克岛的历史⁶，他认为该岛长期不受殖民者的重视，它的价值比它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巴哈马群岛是这些岛屿中受到关注相对较多的地区，保罗·阿尔伯里、迈克尔·克拉顿介绍过该岛屿的历史⁷；格林纳达是另一个资料较为丰富的岛屿，贝尼涅·布雷松在17世纪就已撰写过该岛屿的历史⁸，格林纳达前总理乔治·I. 布里赞著有《作为冲突之岛的格林纳达：从美洲印第安人到人民革命，

1 分别参见：J. Johnson,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on Account of Antigua*,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830. Mrs Flanagan, *Antigua and the Antiguan: A Full Account of the Colony and Its Inhabitant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rib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2 Luis H. Daal and Ted Schouten, *Antilliaans verhaal: geschiedenis van Aruba, Bonaire, Curaçao, Saba, St Eustatius en St Maarten*, Zutphen: Walburg Pers, 1988.

3 参见Guy H. Benjamin, *Me and My Beloved Virgin: St John, U. S. A.*, New York: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Theodoor de Booy and John T. Faris, *The Virgin Islands: Our New Possessions and the British Islands*, Philadelphia: J. P. Lippincott Company, 1918.

4 Roger C. Smith, *The Maritime Heritage of the Cayman Islands*,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and M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George S. S. Hirst,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ayman Islands*, Kingston: P. A. Benjamin Manuf. Co., 1910.

6 Thomas Atwood, *The History of the Island of Dominica,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Its Situation, Extent, Climate, Mountains, Rivers, Natural Productions, etc.*,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1791.

7 参见Paul Albury, *The Story of the Bahamas*, London: Macmillan Caribbean, 1975. Michael Craton, *A History of the Bahamas*, Third Edition, Waterloo, Canada: San Salvador Press, 1986.

8 参见Bénigne Bresson, *Histoire de l'isle de Grenade en Amerique*, edited by Jacques Petitjean Roget, Collection Recherches Caraïbes, Montreal: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eal, 1975.

1498—1979年》(*Grenada, Island of Conflict: from Amerindians to the People's Revolution, 1498-1979*), 从重大事件入手陈述格林纳达的历史。其他如圣卢西亚、蒙特塞拉特、马提尼克等岛屿也受到较多的关注, 还有如百慕大、特克斯和凯科斯等群岛虽然拥有的资料相对较少, 但重要性不容忽视。

五、基于过去、面向未来的加勒比区域史展望

众所周知, 加勒比海地区常年飓风不断, 无论是怎样的飓风, 都是起于“青萍之末”, 加勒比区域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何尝不能刮起“史学飓风”? 本文通过分析《通史》文本结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简要梳理了国外加勒比区域史研究动态、趋势以及一些重要的成果, 这些信息或许能在我国加勒比区域史当前发展阶段产生有益的影响。需要留意的是, 一味地参考外国研究成果, 极易落入西方话语权的窠臼, 因而, 有必要从原始文献入手, 采取形势需要的视角对加勒比区域史重新加以考察。加勒比区域史原始文献数量庞大, 远非本篇文章所能涵盖, 欧洲国家众多资料机构在收藏这些原始文献方面做足了功课, 值得我们关注。与此同时, 随着加勒比各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它们对保存各自的史料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 因而加强与加勒比各国的文化交流并非不值得考虑。加勒比海地区与我国相隔万里, 长期被我国忽略自然不足为奇, 但这种情况在未来应该得到扭转, 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曾指出, “中国作为大国, 应该具备了解世界历史的学术力量”。当下我国学术界兴起区域国别学研究, 加勒比海地区作为世界热点区域之一, 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并且, 加勒比区域史作为一种史学领域, 本身就能提供巨大的史学价值。“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兴起不久的加勒比区域史无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陶万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师资博士后)

越界与回响：动物史研究的起源、发展与现状^{*}

| 刘晓晨 包颖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动物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现状。动物史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章比较了动物史与动物学史、动物研究等相关概念，阐述了动物史与环境史、政治史等不同史学领域的关系，并概述了欧美和中国学术界在理论定义、研究议题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动物史研究现状。动物史研究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推动建立更加可持续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关系。

关键词：动物史 动物研究 环境史 人类中心主义 跨学科

其他动物一直都是人类漫长发展历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类早期狩猎采集生活宏大史诗的背景，是通过畜牧、务农与加工改变人类生存境遇的依赖，是宗教思想与文化习俗中自然的图腾与神秘的象征。但从动物自身的角度来说，却从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¹至20世纪50—60年代，欧美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女权运动的兴起，激起了学者们的同情心。相应地，处于类似境遇，在社会中一样缺乏话语权、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其他动物的存在，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同情与思索：为什么动物长期处于历史书写中的“弱势”或“附属”地位，甚至其存在与理论意义在某些学科理论中被“隐形”²，并常被历史上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类加以利

^{*} 本文是上海师范大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培育项目“‘一带一路’与东亚的文明交流互鉴研究”（310-AW0203-23-005408）的阶段性成果。

¹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9, No. 2, 2004, p. 204.

² Richard York and Philip Mancus, “The Invisible Animal: Anthrozoology and Macro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1, No. 1 (2013), pp. 75-76.

用且“代为发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动物史相关研究逐渐活跃繁盛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专著，为人类—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的学者们提供了多种研究的切入点。不同于侧重研究真实动物的生物学史，或者传统历史地理学者所研究的动物历史，动物史是“受到欧美地区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理论影响下的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理论影响”¹而出现的一个新兴历史学研究领域。

与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进行叙述与书写的史学研究不同，过去的四十年里，在两位著名历史学者哈丽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²和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³的开创性工作之下，动物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主流”⁴的领域。作为动物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国际权威与先驱，哈丽特·里特沃号召，人类的历史与其他物种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应当尊重无处不在与我们共享时间和空间的其他动物，并坚持将动物作为历史研究严肃对象的可能性。⁵从里特沃教授自1987年出版第一本书《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其他生物》（*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到她目前的著作《野性的边缘》（*The edges of wild*），也恰好展现了动物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到日益制度化的过程。《动物产业》一书中，里特沃主要讲述的是家养动物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阶级、帝国象征之间的关系，且认为关于动物的讨论应被理解为自己而非对动物的主张，动

1 陈怀宇：《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第115页。

2 哈丽特·里特沃曾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现为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主要从事环境史、人与动物关系史、英帝国史、自然史等领域的研究。她在各种期刊上发表了文章和评论，其主要著作有《绿色黎明曼彻斯特、瑟尔米尔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其他生物》《鸭嘴兽和美人鱼及其他分类想象的虚构动物》等。

3 理查德·布利特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主要研究中东历史，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和制度史、技术史，以及人与动物关系史。主要著作有《伊斯兰—基督教文明案例》《伊斯兰教：从边缘看世界》《猎人、牧者和汉堡包：人与动物关系的过去与未来》。

4 Albert G. Way et al., “Roundtable: Animal History in a Time of Crisi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94, No. 3, 2020, p. 446.

5 The Animals & Society Institute: Defining The Animal Turn with Harriet Ritvo, <https://www.animalsandsociety.org/resources/resources-for-scholars/defining-human-animal-studies-an-asi-video-project/defining-the-animal-turn-with-harriet-ritvo/>, 访问日期：2023年1月22日。

物是研究人类主体的一种语言，是解构人类权力结构的抽象概念；而在《野性的边缘》一书中，她不仅增加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区别的内容，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两者与人类及其他动物所形成的关系动态及相应影响。这种书写形式显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动物进入历史书写中心的期待。

动物的历史早已经与人类的历史密不可分，基本涵盖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历史分支学科，如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及环境史等领域，以至于最初开始研究人与动物关系史的历史学家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一个如此新异的领域。¹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零散的关于动物的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就已经开始进行。进入21世纪，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关于动物的历史作品。²正如哈丽特·里特沃2007年在刊物《代达罗斯》(Deadalus)上发表的文章所说，历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的趋势³，研究动物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种“潮流”，它将成为同时揭示过去与未来的一种持续性存在，提出一些不仅限于历史学，也涵盖语言学、哲学与道德理论方面的关键方法论和理论问题。

一、动物史的历史发展背景

在欧美学术界，最初的动物历史是一种“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实践，用来记录人类特别是动物饲养者和贸易商对动物的利用。⁴传统史学，如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关注动物的开创性工作，多建立在动物学基础上，并没有将其纳入历史研究

1 哈丽特·里特沃在写《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生物》一书时，实际上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研究人与动物关系史这一新领域。她只是认为，19世纪的动物是一个适合写历史专著的话题，而并非“一个新领域的基石”。详见Nelson Aprobato, “Animal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arriet Ritvo”, *História, Ciências, Saúde-Manguinhos*, Vol. 28, Suppl. 1, 2021, pp. 209–220.

2 David Gary Shaw, “A Way With Animal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2, No. 4, THEME ISSUE 52: Does History Need Animals? (December 2013), pp. 7–8.

3 史学界所产生的“动物转向”这一说法来源于Harriet Ritvo, “On the Animal Turn”, *Deadalus*, Vol. 136, No. 4, 2007, pp. 118–122. 相关具体论述可参见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第59—64页。

4 Susan Nance, “Animal History: The Final Frontier?”, <https://www.oah.org/tah/issues/2015/november/animal-history-the-final-frontier/>, 2016, 访问日期：2022年9月6日。

的主流。¹从古典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动物志》一直是有关动物的主要书面信息来源,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远不能控制自然秩序,只能“任其摆布”,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也具有偶然性。

至启蒙运动初期,人们尚认为自己处于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而随着相关获取和应用知识的新方法取得更多成果,科学和工程开始使自然界的许多板块更容易受到人类的控制。在实用层面上,畜牧业、兽医学和武器技术等领域的进步使得动物更方便管理。到了18世纪末,受启蒙运动理性哲学思想的影响,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纪尧姆·托马斯·弗朗索瓦·雷纳尔(Guillaume Thomas François Raynal)、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等历史学家,先后对动物研究产生了兴趣,强调动物的使用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历史学家才开始认真关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更多地关注动物在人类进步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而非关于其道德本性的传统辩论²,使动物在启蒙运动后期的历史学新型话语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尽管是被动的)主角”。

他们的思想对于动物在人类文化中作用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从西方现代早期的观点(如以笛卡尔为首的“野兽机器理论”³,认为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标准是理性,动物是一种野兽机器而无法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因此被首先排除在关于理性本质的讨论之外,也被排除在人类的进化论之外),到更具历史意义的观点(现代工业社会从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更加依赖动物的使用,伦理方面对动物遭受痛苦的道德敏感性日益增长,但对动物更大的关注,更多的是对它们遭受剥削的反应,而不是对真正改善它们处境的要求)的转变。

如里特沃所说,“一旦大自然不再是永恒的对立面,人们就会对它产生好感,甚

1 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第146—156页。

2 Nathaniel Wolloch, “Animals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75, No. 1, 2012, pp. 53–68.

3 野兽机器理论(the beast machine),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即基本上把动物看作机器,动物也是机械零件的集合体,因此无法思考,也没有意识,动物和人类截然不同。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可参见: Erica Fudge, *Brutal Reasoning: Animals,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至在天平向人类一边倾斜时，还会对它产生怀念之情。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对宠物个体和一般低等生物的情感依恋——这是维多利亚人的普遍特征——变得十分普遍”。从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晚期，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使得人类对其他动物的态度与心理发生转变。动物不仅在物质世界里更容易受到人类的支配，在话语世界中也逐渐成为英国人在等级社会中对不同社会阶层态度的隐喻与象征。

英国最早有记载的法律隐含地赋予动物以人的权利和责任，如1679年，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将一只杀死小孩的熊用诱饵诱杀；或在没有人类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根据法典，狗、猫和鸡被允许出庭作证，至少它们的出庭被认为会加强受害户主的控诉。到19世纪，英国当局已不再判处动物因犯罪而受苦或死亡，事故责任的承担者只归为遇到或拥有动物的人类身上，“高雅和人道主义的现代司法理念”正在战胜“粗暴和野蛮的中世纪理念”。当动物不再需要对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时，隐含在人类主观赋予动物的蓄意违法能力中的独立性和权力感也随之消失了。

19世纪的英国法律将动物简单地视为人类所有者的财产，成为被人类操纵与驱使的对象。与之相对应地，人类被赋予了理智的特权，能够使一切服从于他的需要，并被区分为承担更高的职责和拥有更崇高命运的生物。即使这一时期英国与动物有关的论述如此丰富而多元，但写作者主要的动机可能只是出于情感（宠物饲养）、经济（动物饲养）和好奇（自然史）。

由于现实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欧美学术的专业化、战争后果，以及城市化的急剧发展，推动动物史从自然史之中分离，走向具有“科学的权威性”的科技史。基因研究、畜牧农业与动物饲养、食品加工等行业不断发展，研究者实际关注层面限于如何让动物为人类提供服务，具有十分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类似尊重动物自身的权利、地位与历史书写的主体性的学术研究，受到关注相对较晚的原因，哈丽特·里特沃认为主要是研究者身受特定时代发展的限制。学者身处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其选择探索的问题也往往受时代限制。因此，动物可以被视为学术研究“民主化”趋势的最新受益者。¹

1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p. 205.

20世纪50—60年代，欧美劳工运动、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女权运动的兴起，激发了学者们的同情心。相应地，处于类似境遇，在社会中一样缺乏话语权、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其他动物，也引起了曾支持过捕鲸、偷猎老虎、弃养宠物狗等现象的激进鼓吹者的同情。但至70年代，在“社会和文化造史”（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making）的新发展中，还并未将动物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

艾瑞卡·福吉（Erica Fudge）在刚着手动物研究历史写作时，关于动物的历史学问题“几乎没有人写过文章”¹。事实上，关于这个话题最广泛的讨论之一可能就是一个“玩笑”。随着当时越来越多的群体意识到其在历史上受到的压迫，并尝试书写自身的社会历史，某个化名为查尔斯·菲尼斯（Charles Phineas）的人，在1974年发表于《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上极具讽刺性意味的《家庭宠物与城市异化》（*Household Pets and Urban Alienation*）一文中，提出了对于宠物历史的研究需求。查尔斯·菲尼斯问道，现在是不是该轮到讲一讲动物的社会历史了：

认为宠物将成为社会历史上下一个“潮流”主题，似乎有些轻率，但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不同种族（现在是女性）之后，可能需要一个新玩具。……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没有政治权力或主张，宠物很难引起激进社会历史学家的兴趣。²

《社会史与文化史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动物史学者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在第八章“动物与人类的历史”引言部分，同样首先承认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通过强调那些被忽视或未被写进标准历史的行为，使新的主题和人物受到历史的审视。³然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造史”的新发展中，并没有出现将动物作为历史的重点，甚至是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的历史转向。以动物作为历史研究严肃对象的作品，在

1 Erica Fudge,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Nigel Rothfels ed., *Representing Anima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2 Charles Phineas [pseud.], “Household Pets and Urban Alienatio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7, No. 3, 1974, p. 339.

3 Sasha Handley et.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pp. 180–181.

当时并没有与关于阶级和性别的书籍一起发展起来。¹

新动物史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动物权利运动以及该运动的基础性哲学著作²，即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和后来汤姆·里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案例》（*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动物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受到广泛重视，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专门的史学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如哈丽特·里特沃在1987年出版的《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其他生物》一书，主要讨论了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末，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变化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四足动物的不同态度和分类方法，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人类心理需求和社会政治愿望的隐喻。该书是第一部真正以动物为主题的系统研究著作，曾被评为哈佛大学出版社100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由此奠定了哈丽特·里特沃在动物史领域的重要地位。

但实际上，哈里特·里特沃在出版她的第一部书之前，仍存在一些方面的不解与阻力，“当我刚开始在这个领域工作时，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动物似乎不是一个适合进行严肃历史研究的主题”³，“我在康奈尔大学做了几次演讲。一次是在兽医学校，在那里我当然不用解释我为什么关注动物。但我还在康奈尔人文学会做了另一个演讲，一位文学评论家介绍我说：‘最近人文学科中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这个是最奇怪的。’”⁴

同一时期还有詹姆斯·瑟普尔（James Serpell）以宠物饲养为研究主题的《在动物的陪伴下》（*In the Company of Animals*, 1986）与卡罗尔·亚当斯（Carol Adams）等人在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⁵领域所做的各类重要贡献。

1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173–189.

2 Cary Wolfe, “Human, All Too Human: ‘Animal Studies’ and the Humanities”, *PMLA*, Vol. 124, No. 2, 2009, p. 565.

3 Nelson Aprobato, “Animal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arriet Ritvo”, pp. 209–220.

4 Eve Gerber, “The best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Animals recommended by Harriet Ritvo”, <https://fivebooks.com/best-books/animal-history-harriet-ritvo/>, 访问日期：2023年11月22日。

5 生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Feminism）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该名词由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索瓦丝·德·欧邦（Franç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创造，强调男权社会（或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待自然和女性的方式。现代生态女权主义运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张将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结合起来，以促进对妇女和自然世界的尊重。生态女权主义者研究性别范畴的影响，以证明社会规范对妇女和自然施加不公正支配的方式。

除了20世纪70年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大力推动，以及新文化史浪潮下，史学家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物种的角色与定义”的重点研究与反思¹，环境史、兽医史、全球史等诸多史学领域对于动物的高度关注，也可以作为“动物转向”的一个解释或侧写。

动物史领域的发展有其自身史学传统的延续与传承，陈怀宇认为其具体表现为“历史学与宗教学研究转向”²。欧美史学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三次转向，阶级、性别、物种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兴概念，使得学界更为关注那些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群体，并分析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在此基础上辐射到宗教学层面，则出现“物质主义转向”（materialistic turn）与“情动转向”（affect turn），从而让人们的视野转而聚焦于身体、物品及其物质性的研究。

陈怀宇教授将欧美学术史脉络中动物的历史研究分为“自然史”“科技史”“（新）动物史”三个阶段，分别代表动物史早期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史学的三个传统。³在自然史阶段，科学地认识动物并对其进行分类的实证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兴起，这一时期的动物史研究显然是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影响的动物史。陈怀宇认为，与西方自然史相区别的中国博物学，其有关动物的研究应该被视为“前现代史学”（premodern historiography）中的动物历史研究，即以文献考订为方法、以名物考订为目标的历史上动物文献学研究（textual studies of animal in history）。他还详细论述了中国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史在宗旨和实践两方面的不同。

这并不意味着在动物史兴起之前，中国史学界就没有人注意到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没有对动物进行研究和关注的相关论著。从实际来看，中国史学家对于动物的相关研究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认识较早，具体可以体现在各类古代官修、私修史书与各地地方志对动物的描写之中，并在后续研究中“依然扎根于中国

1 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第61页。

2 陈怀宇：《动物史研究的源流与旨趣》，《澎湃新闻》2022年10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126375，访问日期：2023年1月16日。

3 陈怀宇：《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16页。

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在不同研究点上持续发展”¹。如周代时所著的《尔雅》中，就已建立虫、鱼、鸟、兽四大动物学分类系统，“特列释畜一章，表明对畜牧业的重视，列举马、牛、羊、狗、鸡的品种，记叙动物290种，确为中国百科全书的首选书”²。然而，此时关于动物虽有着较多的历史叙述，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动物在农业、商业等方面的价值。

对于当前的动物史研究，艾瑞卡·福吉认为存在三种主要思路，即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文史（humane history）和整体史（holistic history）。³第一种思路即智识史主要探讨动物如何被想象、描绘、叙述，如何被用作比喻、用于寓言来描绘构成过去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可能是史学家们对动物感兴趣的历史中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如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人与自然世界》（*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一书，主要探索了现代早期英国人对动物态度的变化，以及其如何与这片土地上社会和基础设施结构的变化相互交织的问题。智识史侧重探讨人类如何理解和书写动物，并用之来建构中世纪人类的自然观和宗教秩序，大体可以理解为从人类角度出发，探讨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进行人类世界的建设与发展。

从人文史角度进行探讨的作品，如希尔达·基恩的《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这类作品，相比智识史类型更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但侧重从动物的角度来讨论人的生存处境和状况。

第三种思路即整体史，以哈丽特·里特沃的《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与其他生物》和凯瑟琳·凯特（Kathleen Kete）的《闺房里的野兽》（*The Beast in The Boudoir*）为代表。作为“探索19世纪英国和法国（特别是巴黎）文化”⁴的一种方式，里特沃和凯特在创造所谓的“整体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动物的描述被视为一种反思文化的方式。如《动物产业》研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关于动物观点的不同与变化和动物的象征性用途，并将人与动物的关系定位在英国社会和文化

1 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第131—132页。

2 郭鄂、钱燕文、马建章主编，张永文副主编：《中国动物学发展史》，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 Erica Fudge,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pp. 8–11.

4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176.

认同的最中心。总体而言，此类著作一方面继承了人文史的思路，注重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却又从动物的角度重新思考“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定义问题”。动物参与并塑造了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生活，通过这些线索，它们又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定义人类自己。¹

二、动物史与现有史学领域的关系

建立于传统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的基础之上，动物史本身跨学科的性质使其对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样具有吸引力。环境史、全球史、兽医史等多种史学领域的研究与动物史的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欧美地区风行的动物研究影响，历史学者们试图改变动物以往在人类历史中的配角形象，并试图发掘动物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可能性，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以动物的利益和权利为出发点，为“不善言谈”的动物争取历史叙述中的一席之地。

（一）动物史的理论定义

想要了解动物史与现有各史学领域的关系，对动物史进行理论内涵上更精确的定义，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动物史”（animal history）与“动物学史”（the history of zoology）、“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动物-人类研究（animal-human studies）以及批判性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等术语的区别与联系。

1. “动物史”与“动物学史”

动物史受欧美动物权利运动与动物研究思潮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与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酝酿下产生的新动物史不同，动物学史是科学史上一个成熟的分支，与达尔文提出的进化思想有明显的关联。²

动物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从古代到现代对动物界的研究。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动物学的开创性工作，并著有《动物志》一书，将动物看作有生命的有

1 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第57—59页。

2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p. 205.

机体，研究它们的结构和属性，考察它们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其对于动物学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多年。19世纪被一些人认为是动物学的黄金时代，动物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学科。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通常被认为标志着生命研究新时代的开始，取代了几代博物学家精心设计的以人为主导的静态等级制度。进化论彻底改变了包含动物学在内的所有自然科学，对动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¹

动物学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仅仅将动物看成学术研究处理的对象、客体，并不关注动物本身的处境、权利与待遇。其研究的目标只限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即生物意义上的动物，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观察、解剖与分类。

动物史则试图理解并揭示动物作为历史书写与研究主体的可能性，增加了关怀动物生存状况的伦理维度，因此为传统科技史、科学史增加了人文面相。此外，新动物史的研究目标不局限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动物，也同样关注虚构的动物，即人类心理上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动物。这些动物会对人的心理体验、文化认知与政治经验产生作用，比如凤凰、龙，都不是现实中的动物，但它们对于人类的文化、政治意义不可低估。

2. “动物史”与“动物研究”

动物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基础之上。从事动物研究的学者，可能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通过运用各种理论视角来理解“动物”，研究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与伦理意义，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和生态影响。

动物研究受到欧美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文化研究影响，对整个人文学科的不同方面都有很大影响，比如文学、史学、宗教学等等，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²，在史学上的影响则体现为动物史。动物研究本身更接近于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和文化研

1 Colin Alistair,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 Abridgement of Joseph Needham's Original Text*,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1.

2 陈怀宇：《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16—117页。

究，它经常抽象地看待动物。在许多方面，历史则更贴近原材料。

进入21世纪，动物研究、动物-人类研究或批判性动物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欧美学界成为显学。¹实际上是不同学者受不同理论思潮的影响，对动物史研究的认识存在差异，因而产生的不同表述。除此之外还有“人类动物学”（Anthrozoology）、“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等，但这些跨学科性质的潮流都是对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关系的伦理反思，注重用批判理论重新看待动物和人类的区别与相互关系，且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动物在社会中的作用。

“动物研究”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一个“局限性很强”的词，太容易被误认为是对“实际动物进行研究的统一倡导与呼吁”²，但实际上却适用于那些参与记录和理解人类与其他动物互动的最“激进”的研究人员。³在完全去除人类的过程中，非人类动物的地位得到了优先考虑，以前被压制和物化的其他动物得到了发言权。因此动物研究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寻求将非人类置于类似“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和“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对其研究主体的关切下，将动物作为自主行为者，以此纠正以前不平衡或者缺乏的学术关注。

对于那些针对人类与其他动物相互关系的研究来说，人类动物学是“最合适的标签”。但它实际上优先通过人类的角度研究问题，并在意图和目的上将所涉及的动物客体化或者物化。这种客体化反映了传统动物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人类动物学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甚至可以作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桥梁。社会人类学家所进行的人类动物学研究，并非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是人类学家更期望承认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无论研究者的学科方向如何，它从纯粹的人类角度记录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互动。因此，它也许是适用于大多数社会人类学家伦理学材料的最恰当术语，他们记录人类与动物的互动，但总体上保留了人类的视角。

人类-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一般简称为“HAS”）与人类动物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入”动物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动物研究”中的连字符

1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177.

2 Michael Lundblad, "From Animal to Animality Studies", *PMLA*, Vol. 124, No. 2, 2009, pp. 496-497.

3 Samantha Hurn, "What's in A Name? Anthrozoology, human-animal studies, animal studies or...?",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6, No. 3, 2010, pp. 27-28.

将所有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认识到人类与我们的同类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二）动物史与现有史学研究领域的关系

1. 动物史与环境史

20世纪以后，动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更多层面、更为丰富的展现”¹。例如，环境史学家们总是对于动物保持着高度的“兴趣”²，而环境史本身的蓬勃发展也有助于引导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关注动物，本杰明·布林（Benjamin Breen）甚至认为“动物研究通常被归类为环境史”³。

环境史作为长期关注动物的一个研究领域，其对于动物史的研究也被认为常依赖于普遍性和综合性的环境观。动物们的无处不在，帮助建立了城市和郊区作为环境史研究的适当环境，然而从动物自身角度来看“尚不圆满”的结局，可能是动物在环境史学家和相关学科学者的工作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环境历史或其他学术研究和环境政治的交叉点上，其中许多困难问题都需要考虑到动物层面，甚至是一个由动物引发的“爆发点”：保护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过度开发资源（如渔业）、新出现的疾病和克隆等等。⁴

当哈丽特·里特沃刚开始研究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历史时，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动物是环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可能连环境史学家们也没有意识到环境史与动物史的研究有多接近。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将动物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并受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多类学科的影响，注重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于一个“复杂多元的、互相联系的、动态发展”的“生态网络”中进行考察，体现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行反思。⁵

1 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第131页。

2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pp. 205–206.

3 Benjamin Breen, “Animal History: An Emerging Scholarly Trend”, 2014, <https://daily.jstor.org/animals-in-the-archive/>, 访问日期：2022年9月6日。

4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pp. 204–206.

5 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第146—156页。

如哈丽特·里特沃所言，环境史学家并不是唯一对动物有高度兴趣的人，学术界对动物的关注也并非全新。畜牧业在传统上吸引了专注于农业的经济史学家的注意；与动物相关的重要机构，从人道协会到动物园，都有他们的编年史家；动物学史是科学史上一个成熟的分支。

2. 动物史与全球史

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壮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主要通识课程。但由于大学通识教育的需要，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侧重于通史教材编撰。

书写人与动物关系的全球通史是当前全球史“动物转向”的一个重要面相，将动物或动物与人类关系作为叙事主体的全球通史，也同样面临着历史分期的问题。学者沈宇斌在《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中提出，不同于传统的以地区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新世界史或全球史侧重于从“联系”和比较入手考察整体人类世界的形成。相应的动物的全球史研究也大体上可以分为“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与“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¹目前欧美学界在有关全球联系的动物史研究中，主要研究的议题有动物与近代欧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近代欧美帝国主义扩张与动物的濒危和灭绝、科学与动物的关系等等。在科学与动物的关系这一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分支议题类似动物试验、兽医、动物园、进化史和病媒昆虫等等，显然都与现阶段人类现实生活方式或话题息息相关。

3. 动物史与公共历史

希尔达·基恩在《社会史与文化史新方向》“公共历史与遗产：动物纪念活动与仪式”小节中认为，在文化史的学术构建之外，在相对较新、涉猎较为广泛的公共历史和遗产（public history and heritage）领域，逐渐呈现“以动物为中心”的历史的发展，“虽然动物尸体通常只是博物馆中自然历史收藏的对象，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让动物成为博物馆中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一部分”。²

1 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第122—123页。

2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182–183.

如2014至2015年在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生机勃勃：澳大利亚马的故事”（Spirited: Australia's Horse Story），旨在通过将马定位为它们自己故事的中心，挑战博物馆场景下对动物表现的主流理解，试图展示马作为国家发展的活跃参与者所起到的作用，关注马本身，而非人们对它们的感知。

究其原因，也许是公共史学经常强调的是“创造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主题内容本身，这意味着学者们可以更热情地把握创造新的动物与人类历史（animal-human history）的机会。在动物研究的大框架下创造的历史，开始更明确地展示动物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支撑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学，不仅有助于促进对动物与人类关系的思考，而且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历史本身的本质。无论是否只有个别历史学家对非人类动物史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都值得更多历史学者来关注。

综上所述，动物史是欧美历史学术脉络内部演变与现实各类进步社会思潮、运动及其影响下产生的诸多哲学著作各种内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动物在历史学中的出现并不是单一运动或特定分支领域的结果，而是可以通过环境史、文化史、世界史等多种路径进入史学家们的视野。¹“动物转向”扩大了一些学科潜在研究课题的范围，提出了学者和他们研究对象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对动物在过去和现在作用的新理解，其他学科对于动物的关注同样有利于提高史学界对于动物史研究的关注。

三、国内外学术界动物史研究现状分析

21世纪以来，动物史领域相关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这样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传统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等史学基础之上。由于动物史自身的跨学科性质，一个好的动物史学者需要掌握不同学科的技术知识，精通人文学科外的其他学科，并与动物行为学、生态学、动物福利学、动物学、比较心理学、兽医学学者们进行科学合作，追踪动物在历史资源中的作用。

2016年6月10日至11日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野性的呼唤”研讨会，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哈丽特·里特沃和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莎莉·沙特尔沃思（Sally

1 Dan Vandersommers, “The ‘Animal Turn’ in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Nov 3, 2016.

Shuttleworth)邀请了一批学者和科学家参加跨学科对话,他们从不同视角探讨“野性”(wild)这个多义词的含义。¹野性和驯服的概念因人类而存在,是根据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而定义的。随着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共频程度已经加强:野生动物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随着野生动物价值的改变,围绕其定义的利害关系也在增加,这又对畜牧养殖和环境保护等多种多样的产业产生了影响。

2022年8月21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召开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进行的第一场主题发言“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Intertwined Pathways: Animals and Human Histories),回顾了动物与人类在历史上的亲密互动,反映了当代史学试图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史学传统的历史趋向。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印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指出,今后的历史研究,需要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视角,更多地从地球出发来考察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动物史、环境史和地球史或“大历史”研究共享着同一个基本前提,即希望看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并非主宰一切,而是与所处的环境和其他生物有着密切关联。而它们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新兴的史学流派之间水乳交融、互相融合,没有明确的界限。²

“兼而有之”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总体趋向,我们已经无法用之前固有的学派来划分或概括某人或某项研究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项动物史研究可以同时是政治史、文化史和动物史,一个好的动物史研究应该会引起不同领域读者的兴趣和思考。

1. 欧美学界动物史研究现状

动物史目前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尚未出现国际性学会与组织,在全球大学与研究院也仍没有配套学系与研究所等学科建制,仅在美国纽约大学等少数欧美学校设立了主修动物研究的专门学位。³但是存在一些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小型学术聚

1 Alison Laurence, Workshop Report: “Call of the Wild”, 2016.

2 王晴佳:《史学流派的消失和融合: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侧记》,《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2年9月24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27626, 访问日期:2023年1月17日。

3 陈怀宇:《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光明日报》2023年1月9日第14版, https://share.gmw.cn/news/2023-01/09/content_36286611.htm, 访问日期:2023年1月16日。

会及若干学术期刊，有大量国际项目与合作计划¹，定期宣传部分动物史相关研究会议与著作的H-Animal网络讨论组。还有出版社出版动物史相关著作，如2002年奈杰尔·罗斯费尔斯（Nigel Rothfels）编辑出版的《描述动物》（*Representing Animals*），以及2018年希尔达·基恩与菲利普·豪威尔（Philip Howell）共同编辑出版的《劳特利奇动物-人类历史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该书更侧重于介绍动物与人类关系的历史，强调动物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与比重。

2021年米克·罗舍尔（Mieke Roscher）、安德烈·克雷伯（André Krebber）和布雷特·米泽尔（Brett Mizelle）主编的《历史动物研究手册》（*Handbook of Historical Animal Studies*）一书认为，《劳特利奇动物-人类历史指南》一书并没能从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实践角度来介绍动物史研究，因而试图在本书中强调历史作为人类-动物研究中一门学科的作用，通过总结已有研究，为动物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结构化的引导。²因此本书按时间、区域、史学领域、人与动物相互作用等历史研究方法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讨论动物研究与不同历史研究领域交叉下所形成的动物历史与具体研究路径。

2. 中文学界动物史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动物史的学术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在中国农史、历史地理、生物科学史等领域，已经有不少与动物史相关的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研究20世纪末已有一本相关专著，即郭郭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³。对新动物史与“动物转向”思潮投以关注并进行研究的相关论作也有所增多，如中文学者陈怀宇的《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王晴佳的《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等论文。此外张博的《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⁴、沈宇斌的《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⁵，分

1 如一些动物研究倡议，包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人类动物小组、奥地利维也纳的因斯布鲁克大学和梅塞利研究所的人类动物研究小组、英国知山大学的人类动物研究中心和谢菲尔德动物研究中心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人类动物研究网络。

2 Mieke Roscher et 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Anim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11.

3 郭郭：《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4 张博：《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第129—140页。

5 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第122—128页。

别就现有环境史、全球史领域动物研究发展动向进行了系统探讨。冷战史、外交史尤其是“动物外交”领域则有刘晓晨¹、姜鸿²等学者关于民国以降动物史方面的相关论作。

刘晓晨在《从东方到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国的熊猫外交》³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动物外交”的概念，并在《兄弟之盟：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外交》中，就中国与苏联、东欧，以及部分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同动物园这一场所紧密联系的“动物外交”过程进行了简要系统概述。他将“动物外交”的定义对象从“熊猫外交”扩展到如东北虎、非洲狮、北极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对外交流活动，正如其所说：“关于中国的动物外交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上，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熊猫外交’。有关动物外交的其他方面涉及较为有限。‘熊猫外交’的研究，一类是基于生物学的考量；其余多是从民间交流、民间外交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和论述。”⁴

2012年，陈怀宇早期代表作《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在中国首次出版，主要研究倾向是“从宗教史与宗教文献学转向比较宗教学并逐渐进入物质文化和动物研究”，试图提出一个新范式，即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可以看成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⁵。其2023年出版的新作《虎蛇之地：在中国中古宗教中与动物共生》等论著，试图让“中国研究”学界与“动物研究”学界相互了解。动物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对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助于启发学者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的议题，因为“动物本身对于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动物研究本身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人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一种“政治史”。

1 刘晓晨：《兄弟之盟：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外交》，《史林》2015年第2期，第166—174、221—222页。

2 姜鸿：《科学、商业与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74—89、161页。

3 刘晓晨：《从东方到西方：冷战背景下中国的熊猫外交》，《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92—212页。

4 刘晓晨：《兄弟之盟：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外交》，第166—174、221—222页。

5 燕舞：《21世纪以来的“动物转向”——专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陈怀宇》，《信睿周报》2023年第3期，第3—5页。

此外，陈怀宇还提出，现在国际上存在一种可以称为“亚洲学界的动物转向”和“动物研究学界的亚洲转向”的趋势，即研究亚洲的学者开始关注动物，做动物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亚洲区域。由他2020年主持的第4期《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动物研究”专号与2021年主持的上海《世界历史评论》秋季号专辑“欧亚历史上的动物与人类”，成为中文学界三年来最令人瞩目的动物研究前沿成果。

除了张博、沈宇斌、刘晓晨等学者在自身史学研究领域中关注动物史所作的相关论文外。台湾学界近年来对于动物的关注，以及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也在持续发酵。台湾学界动物历史研究较为勃发，如2018年台湾社会学年会、台湾科技与社会研究会年会、台湾文化研究会等年度学术会议，皆有动物研究相关子议题，当中也不乏历史学者之参与。同年，东华大学大众史学研究中心也率先举办了一场“动物转向”后的历史研究工作坊。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三台史所及台湾历史博物馆合办的“2016—2017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会议，也在当中新史学论坛设置了动物史主题，引发与会学者热烈讨论。¹此外成功大学所主办的《成大历史学报》2020年第58号为动物史专号，共刊登了菲利普·豪威尔、李鉴慧、郑丽榕、龙缘之等动物史学者的8篇相关文章。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郑丽榕撰写过多篇动物史相关文章，如《跨海演出：近代台湾的马戏团表演史（1900—1940年代）》²《战争与动物：台北圆山动物园的社会文化史》³；也有相关书籍，如2020年出版的《文明的野兽：从圆山动物园解读近代台湾动物文化史》，着眼于台湾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台北圆山动物园，集中探讨动物园在民间、国家、战争与环境变迁之际呈现出哪些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是如何被凝视、想象与操作的。

大陆学界已有论述近代中国动物园的相关研究，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清末的京师万牲园以及由其演变而成的北京动物园。涉及上海动物园的文章主要有朱英的

1 李鉴慧：《动物史学专号前言》，《成大历史学报》2020年第58号，第2—5页。

2 郑丽榕：《跨海演出：近代台湾的马戏团表演史（1900—1940年代）》，《“中央”大学人文学报》2010年第43期，第1—46页。

3 郑丽榕：《战争与动物：台北圆山动物园的社会文化史》，《师大台湾史学报》2014年第7期，第77—112页。

《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且该论文仅讨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动物园初步创立时期的历史¹，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及各地动物园制度与场所的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相关研究实际仍十分匮乏。

但总体来看，目前中文学界对于新动物史发展过程的梳理与研究总体较少，不仅主要集中于人类视角下动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生物科学领域的动物历史与史学研究领域下以动物为主体的研究，两者如何区分，此类种种问题尚未得到学界关注，较少学者参与到动物作为历史书写主体可能性的讨论当中。

新兴的中文动物史学研究数量仍较少，长期存在的相关主要研究实际多仍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局限，对于中西方史学界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动物史系统并未加以区分与阐释，缺乏对中国本土自古以来所发展的动物学史及其与各史学领域的关系等方面的新兴研究。在坚持本身优势的同时，或许应当对西方动物研究的长处进行辩证的借鉴，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动物等生物因素，以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动物作为严肃历史研究主题的可能性。

3. 动物史研究的三个挑战

除此之外，希尔达·基恩还在《社会史与文化史新方向》中提出了目前动物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三个挑战²：（1）人是否可以认知动物的感受和经验，并由此理解动物的行为？（2）动物是否具有历史的主体性、能动性（agency），能否通过其在社会和地理环境中的存在对社会施加影响？（3）动物在历史上只是对于人类文化的再现，还是具备自身价值的生命体？

动物是“不善言谈”的，它们不会留下档案文件。³这需要历史学家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重新翻阅人类留下来的口述或者书面文献，抑或是重新寻找更有说服力的新史料。但动物本身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文本”。在这一论点的基础上，乔纳森·伯特（Jonathan Burt）认为，如果动物只是被当作图标和符号，那么历史研究显然就矛盾地将动物置于历史之外了。⁴基恩指出，其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

1 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第31—45页。

2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178–180.

3 Charles Phineas [pseud.], “Household Pets and Urban Alienation”, pp. 338–243.

4 Jonathan Burt,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Animal Kingdom: The Role of Light and Electricity in Animal Representation”, *Society and Animals*, Vol. 9, 2001, pp. 203–204.

不尽相同，但如果不满足于在现有历史框架中加入“动物”，而是通过强调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与探索，“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充分的探讨”¹。此外，还有些人认为，动物不具备直接改造人类社会结构的能力，所以它们不能被视为历史主体。

虽然非人类动物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始终，但从传统的学科观点来看，历史研究方法倾向于将动物视为物体、事物和资源，视为家具、配件和附加物。事实上，近年来推动动物文学作品呈爆炸式增长的大量动物史研究可能就是这样——关注人类如何对待和处理动物的历史。虽然这是一个研究层出不穷的领域，但研究这些的学者往往对动物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即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他们写的是包含动物在内的历史，而不是坚持探讨动物作为书写主体的动物史。

动物史学者约书亚·斯佩希特（Joshua Specht）认为，从广义上讲，历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帮助我们面对目前的挑战：第一点，追溯我们是如何陷入目前的困境的；第二点，帮助解释社会、政治和环境运动的动态。动物史则可以在这两方面都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²动物史当然可以帮助我们驾驭人类世所带来的影响，发展与非人类世界相关的新模式，也许还可以找到建立政治力量的工具来进行变革。在目前的危机中，人类历史和动物历史像以往一样交织在一起，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与动物们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动物史并不是对人类关于动物的想法和用途的描述。虽然它可以包括著名动物的传记，但动物史试图解释无数的无名动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历史学家们不会回避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断尝试突破人类历史研究的边疆；同时，他们对于人类过去历史的研究，总带有不可否认的对于人类未来的前瞻性。动物史研究者们似乎常抱有一种动物与人类境遇之间互通的同理心，并相信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或许总有一天会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人类身上。苏珊·南斯（Susan Nance）在《动物史：最后的边疆？》（*Animal History: The Final Frontier?*）一文的末尾指出：

1 Sasha Handley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p. 180–181.

2 Albert G. Way et al., “Roundtable: Animal History in a Time of Crisis”, p. 465.

对一些人来说，动物的历史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人类的麻烦和政治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我遵循古老的动物研究和动物福利科学的真理，即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人身上，所以在研究动物的生活时，我们也会学到关于人类的知识。从我们讲述的过去中提取动物是一种选择，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它忽视了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物种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¹

进入人类世以来，动物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动物史的力量所在就是认识到动物在我们如何理解，并重新评估自己作为人类的中心地位所起到的重要作用。²动物史可以帮助我们驾驭人类世所带来的影响，发展与非人类世界相关的新模式，也许还可以找到建立政治力量的工具来进行变革。在目前的危机中，人类历史和动物历史像以往一样交织在一起，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与动物们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近20年来，动物史不断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与书写传统。动物已经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焦点，由于它扩大了一些学科可能的研究课题的范围，“动物转向”也提出了学者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对动物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的新理解。通过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为重新审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究历史研究的新观念、新方法提供了存在更多可能性的出路。至于如何在动物史领域向世界输出中国学界的独到见解与贡献，似乎仍是一个任重道远、值得思考的问题。

（刘晓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讲师；

包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师范〕2019级学生）

1 Susan Nance, “Animal History: The Final Frontier?”.

2 Erica Fudge,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p. 11.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的工作与经济地位

| 黄嘉欣 |

摘要：英国妇女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学者们将关注重心从上层妇女转移至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妇女，试图从经济史视角探究普通妇女的社会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地位的探讨逐渐进入高峰期，一派学者相信中世纪晚期是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的“黄金时代”，另一派学者持反对意见，坚定地认为此时的妇女仍处于经济边缘地位。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这一争议的关注热度下降，但有许多论著仍间接回应了这一争论。并且，由于新材料和新方法的运用，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活动相关的论著，产生了新的研究重心和趋势。

关键词：中世纪晚期英格兰 妇女经济地位 黄金时代 家庭经济 社会转型

女性的经济独立是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女性如何实现经济独立？如何在职场和家庭中争取更多的经济话语权？已婚妇女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这些问题叩击着每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心灵。相较于古代妇女，现代女性因教育、科技和文化观念的进步有机会实现经济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妇女对于财富和经济权利无欲无求、无动于衷。相反，古代世界的妇女虽受限于家庭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但她们仍活跃于家庭经济中，乃至成为某些行业的主导者，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探究可以为当代女性寻求经济独立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的经济生活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妇女的工作与经济地位是其中的重要问题。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妇女史经历重大转折，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价值

观，呼吁妇女进入历史书写。“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的兴起也要求关注女性的行为与意识，并倡导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使得历来被忽视的原始资料如教区记录、庄园档案、人头税簿等得到广泛发掘与利用，拓展了妇女史的研究范畴，使得深入研究乡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成为可能。本文将追溯早期英国妇女史的经济史视角，在此基础上辨析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的经济地位，而后探究21世纪学术界对这一重要争论的回应及由此拓展出的新的研究重心和趋势。国内学术界则紧跟国际前沿，对中世纪晚期妇女经济生活与地位展开了诸多研究。

一、早期英国妇女史与经济史视角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英国妇女史研究的初始阶段，一些业余女性史家描述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妇女的形象，路易莎·科斯特洛（Louisa S. Costello）、莉娜·葛堪斯泰因（Lina Eckenstein）和爱丽丝·克拉克（Alice Clark），分别关注了上层妇女、中世纪修女和17世纪的劳动妇女。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第一波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妇女史研究的职业化。艾琳·鲍尔（Eileen Power）是妇女史职业化的奠基人，她将目光对准中世纪的英格兰妇女，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论著，如《中世纪的英国女修道院》（1922）、《中世纪人》（1924）、《妇女的地位》（1926）等。²鲍尔尤其关注普通妇女，在她的遗作《中世纪的妇女》的第三章中论述了农村和城市妇女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中世纪的女性和男性之间不仅没有明显的地位高低之分，而是享有一种“大体上的平等”（rough and ready equality）。³

1 徐浩：“序”，王向梅：《中世纪英国农村妇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Alice Clark,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2 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 1275–15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另参见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39537/39537-h/39537-h.htm>, 访问日期：2024年5月9日；Eileen Power, *Medieval People*, 10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艾琳·鲍尔：《中世纪人》，韩阳、罗美钰和刘晓婷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Eileen Pow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 G. Crump and E. F. Jacob eds., *The Legacy of Middle Age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3 1940年鲍尔突然离世，本书未及出版，直到1975年她的丈夫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M. Postan）才将此书整理出版。Eileen Power, *Medieval Women*, 6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同一时期的艾薇·彭齐贝克（Ivy Pinchbeck）也有相近观点，她在1930年出版的《妇女劳动者和工业革命》一书中也强调工业革命对妇女的消极影响，赞同18世纪之前妇女处境更好，可与男性比肩工作或在家中生产手工产品，男性和女性在经济上几乎平等。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史经历重大转折，女权运动的浪潮重重冲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史学研究，妇女逐渐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新社会史倡导计量的方法和人类学的方法等，大量原始资料，如庄园档案、教会登记簿、遗嘱和税簿等，为妇女史研究提供丰富史料，乡村和城市妇女的经济活动广受学者关注。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 Hilton）较早认识到妇女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性。1975年，他在福特讲座文集《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第六章中考察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和手工副业活动，运用民事法庭卷宗、沃斯特教会档案和主教地产登记簿等材料，发现妇女的经济能力促进了个人能动性的产生。他对农村妇女的地位持乐观态度，并将瘟疫后的农村妇女与上层阶级妇女进行比较，认为劳动妇女的经济独立性远高于上层阶级妇女。²

同时期的其他妇女史研究侧重从社会史的视角探究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苏珊·莫舍·斯图亚德（Susan Mosher Stuard）在1976年出版的文集《中世纪社会中的妇女》便是如此，其中两章关注英格兰的妇女。芭芭拉·哈纳瓦尔特（Barbara A. Hanawalt）运用巡回法庭和王座法庭的卷宗、庄园法庭档案和验尸官案卷等探究14世纪的女性重罪；苏·谢里丹·沃克（Sue Sheridan Walker）则使用中世纪的经典法律作品、王室日志文书和王座法庭卷宗等讨论封建法下寡妇对未成年幼子遗产的监护权。³尽管没有直接探究妇女的经济身份，但女性犯罪和寡母的监护权都有经济因素的参与，可以从侧面反映女性的经济困境。

1 Ivy Pinchbeck, *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30.

2 R. H. Hilton,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95–110, esp. at 105.

3 Barbara A. Hanawalt, “The Female Felon i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Susan Mosher Stuard ed., *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 pp. 125–140; Sue Sheridan Walker, “Widow and Ward: The Feudal Law of Child Custody in Medieval England”, in Susan Mosher Stuard ed., *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 pp. 159–172.

二、“黄金时代”还是边缘地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妇女史研究迎来了繁荣时期，社会性别视角进入中世纪欧洲妇女史并引领了研究潮流。1987年，朱迪思·贝内特（Judith M. Bennett）在《中世纪英国乡村中的妇女：瘟疫前布里格斯托克的社会性别与家庭》一书中提出，家庭内部的地位和社会性别同时影响了乡村中的两性关系；邦尼·安德森（Bonnie S. Anderson）和朱迪斯·津泽（Judith P. Zinsser）在1988年主编的文集《她们的历史：从史前至今天的欧洲妇女》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性别是塑造欧洲妇女的最重要因素。¹在涉及中世纪普通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妇女参与经济生活、妇女的身份差异等重要问题上可谓百家争鸣。

有关中世纪妇女经济地位的讨论，可以从1983年苏拉密斯·沙哈尔（Shulamith Shahar）发表《第四等级》谈起。沙哈尔认为，自11世纪开始，欧洲社会按照身份分为三个等级：僧侣、武士和劳动者。他们分别负责祈祷、保护和生产，三等级制显然没为妇女留下一席之地。12世纪社会变革后，新的社会概念将人按照职业划分为更具体的阶层，妇女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这就是所谓的“第四等级”。妇女不仅被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权利，而且在法律地位上从属于父亲和丈夫，在经济参与中处于边缘位置。尽管妇女的劳动可改善家庭经济，但当劳动给她们带来财富和地位，或与男性产生竞争并威胁男性的生产活动时，妇女的经济参与便受到压制，因而“第四等级”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远低于男性。²

沙哈尔的“第四等级”很快受到卡罗琳·巴隆（Caroline Barron）的批评。巴隆认为：13世纪早期英格兰的普通法规定，结婚后丈夫、妻子组成一个新整体，妇女的法律地位合并到男性之下，已婚妇女丧失了支配家庭财产（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但是《大宪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寡妇的权利，规定在丈夫死后，寡妇可使

1 Judith M. Bennett, *Women in Medieval English Countryside: Gender and Household in Brigstock before the Plag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onnie S. Anderson and Judith P. Zinsser eds., *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2 苏拉密斯·萨哈：《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林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1、220—221页。

用寡妇产土地直至去世，可在亡夫的住宅内继续居住40天。到14、15世纪，寡妇权利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丈夫死后，寡妇可享用家庭房屋直到再婚，寡妇也可拿回父母赠予的嫁妆和继承自亡夫的寡妇产。尽管丈夫对家庭动产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但普通法给予寡妇以较大继承权，她们可继承1/3至1/2的家庭财产。到1300年前后，伦敦的商业化发展促使法律允许“独立妇女”(*femme sole*)的存在，已婚妇女和寡妇在参与商业活动时，可以个人名义签订商业合同，甚至在其丈夫死后自由支配土地。巴隆认为，“婚姻一体化”理论在伦敦实际鲜少运用，中世纪晚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妇女参与的职业范畴广阔，从富有的寡妇到街头兜售食品的穷苦女人，“中世纪伦敦的妇女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她们的工作机会、财富与男性相差无几”。巴隆编辑的论文集《中世纪伦敦的寡妇：1300—1500》广泛使用遗嘱、宣誓词、法庭卷宗和古代诗歌等史料，并注重个案研究，试图重构中世纪寡妇的经济生活及她们享有的经济自由。¹

杰瑞米·戈德伯格(Jeremy P. Goldberg)的观点与巴隆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中世纪晚期妇女经历了经济和人口结构变迁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380—1410年，黑死病后劳动力短缺，妇女获得巨大的工作机遇。1410—1450年为第二阶段，此时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持续的人口下降使劳动力锐减，妇女相对从前有较高的薪资待遇和较强竞争力，妇女经济活动在这一时期到达繁荣的巅峰。第三阶段是1450—1500年，随着商业化的发展，行会为了保护男性家长的权威，将女性排除在多数行会之外，此时女性被迫处于低薪酬的边缘地位。²戈德伯格还批判性地补充了希尔顿的观点，认为黑死病后妇女的经济自由有利于婚姻选择，但到15世纪时，随着妇女工作机会的减少，女性早婚成为普遍现象，较大的婚姻年龄差使寡妇数量增加，她们因独立的法律身份而享有与男性大致同等的自由。

巴隆和戈德伯格推崇中世纪晚期为妇女经济参与之盛期，这一大胆的观点遭到

1 Caroline M. Barron, "The 'Golden Age' of Women in Medieval London", *Reading Medieval Studies*, XV 1989, pp. 35-58 esp. at pp. 40, 47; Caroline Barron and Anne F. Sutton eds., *Medieval London Widows 1300-1500*, London: The Hambledon Continuum, 1994.

2 Jeremy Goldberg, *Women, Work and Life Cycle in A Medieval Economy: Women in York and Yorkshire*,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36-37.

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玛丽安娜·科娃雷斯基（Maryanne Kowaleski）在探讨14世纪埃克塞特的社会经济时注意到，妇女为其丈夫的商业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妇女也积极投入个人商贸，特别是地方习惯法赋予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和自由支配财产的权利，妇女可参与商业以获得财产。但即便如此，妇女通常被排除在独立、高薪的工作之外，很少得到劳动技能的训练，即便在个体贸易中也处于地位低下的边缘境地，经济主导权仍掌握在男性手中。科娃雷斯基汇总了埃克塞特的法庭卷宗、遗嘱中的集市罚款记录、债务纠纷等数据信息，以计量形式表现了妇女相对男性的劣势经济地位。¹

朱迪思·贝内特是批判“黄金时代”论断的重要旗手，她认为中世纪晚期妇女经济地位的转变不值一提，延续了中世纪“低地位、低薪资和低技能”的模式，父权体制下的中世纪妇女，不仅不能自由支配劳动收入，还牢牢为家庭所控制。前文提及，贝内特运用黑死病前布里格斯托克的庄园档案研究乡村女性的家庭生活²，研究女性作为女儿、妻子和寡妇等不同社会身份承担的家庭责任。她发现家庭地位和社会性别同时影响着乡村中的两性关系，妇女因性别而受到各方限制。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成为其政治和法律层面权威的基础，也是女性附属于他们的依据；妻子一旦成为寡妇则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威，承担乡村生活的责任。贝内特的研究不只是对地方乡村女性的狭隘研究，更是对中世纪后期农民生活、村社权力结构的探索。她反对黑死病后女性劳动处于“黄金时代”的论断，发现人们期望女性对男性顺从，她们在公共事务中不像男性那样积极参与，这种限制并非源于国家形态，而是植根于夫妻关系和核心家庭的传统关系。

贝内特的另一著作《麦芽酒、啤酒和酿酒师》一书，研究1300—1600年间酿酒行业的转变，她认为，在酿酒业由妇女主导向男性控制转变、由麦芽酒向啤酒转变的过程中，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未发生巨大变迁。1300年前后，妇女酿酒规模小、售酒范围有限、获利微薄，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妇女在15世纪主导了酿酒业；到15世

1 Maryanne Kowaleski, *Local Markets and Regional Trade in Medieval Exe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yanne Kowaleski, "Women's work in Market Town: Exeter in late fourteen Century", in Barbara A. Hanawalt ed., *Women and Work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5-164.

2 Judith M. Bennett, *Women in Medieval English Countryside: Gender and Household in Brigstock before the Plague*.

纪下半叶，酿酒女的工作机会减少，啤酒的大规模专业化生产逐渐将妇女排除在行业竞争之外；到1600年左右，妇女被限制在酿酒业底层，只能以小批量或零售的方式进行生产。贝内特尤其反对“中世纪妇女与男性享有粗略的、大体上的平等”“1500年后妇女从天堂坠落”的说法，她认为，即便是中世纪最好的女性工作也是谦卑、低级、利润微薄的，遑论其他，1300—1600年间，酿酒女一直处于“低工资、低地位和低技能”的艰难处境。¹

随着妇女史专门化程度不断加深，历史学家的关注焦点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城市妇女转向农村妇女或城镇底层女性，同时关注妇女的婚姻状况，将婚姻状况与妇女的经济地位相联系。麦维斯·梅特（Mavis E. Mate）于1998年出版《黑死病之后苏塞克斯郡的女儿、妻子和寡妇》，对比考察了同时期不同地区已婚妇女、单身女性和寡妇的经济生活状况、婚姻模式、财产权利、阶级与性别的关系。梅特对中世纪妇女经济地位持有一种极其悲观的态度：小农的妻子因贫困而处于劣势，约曼农的妻子则被丈夫承包的农场和家务所束缚；婚姻消解了妇女在社会上的独立性，即便寡妇也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农村妇女过早成家，且家庭农场难以为妇女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她相信“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社会经历的一系列经济变化，很难改变根深蒂固的经济结构”。²

1999年，梅特出版《中世纪英国社会中的妇女》一书，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妇女史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概括。她反驳戈德伯格所持“黑死病以来妇女倾向于延迟结婚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一观点，认为15世纪婚姻年龄趋向年轻化这一变化，恰是由于女性劳力不再为社会所需要。显然，梅特毫不留情地抵制，甚至试图推翻希尔顿、巴隆和戈德伯格所提倡的“中世纪晚期是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揭示妇女在中世纪晚期遭受的深层局限。³

1 Judith M. Bennett, *Ale, Beer and Brewsters in England: Women's Work in a Changing World, 1300–1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Mavis E. Mate, *Daughters, Wives and Widows after the Black Death: Women in Sussex, 1350–1535*,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8.

3 Mavis E. Mate, *Women in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 Prepared for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马乔里·麦金托什（Marjorie K. McIntosh）反驳贝内特所认为的“近代早期妇女低下的经济地位沿袭自中世纪”的说法，强调中世纪酿酒女在地方经贸活动中的参与以及妇女对家庭生活的经济贡献，自中世纪晚期始，妇女具有了一定的职业意识，一些嫁给富有阶层的妇女甚至可以在行会中担任职务。但她同时也认为，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比较有限，在人口衰减的背景下，仅有少数寡妇继承亡夫的职业，大多数妇女不可避免地流向薪资更低的工作，并且由于16世纪中期后人口回升，妇女逐渐被排挤出商业活动。有关“妇女信用”（women's credits）的探讨贯穿全书，麦金托什认为，妇女很难建立独立于丈夫之外的个人信用，即便中世纪的伦敦法律规定妇女可获得“独立妇女”的权利，但由于面临较大风险而迫使她们放弃这一独立身份。¹基于此，麦金托什反对巴隆的“黄金时代”，同时又承认，妇女在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中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并非贝内特所认为的延续自中世纪“低工资、低地位和低技能”的地位。贝内特重视延续性甚于变化，麦金托什不仅关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妇女经济地位的延续，更关心这一过程中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转变。她具体分析了五个市镇中酿酒女人数的变化及趋势，说明中世纪晚期酿酒业从麦酒转向啤酒、女性控制转向男性主导的变化过程确实存在，并从疾病、人口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转变的原因，强调直到16世纪社会转型后妇女的经济地位才开始衰落。²

三、新世纪的回响与趋势

有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进入21世纪后相关论著有所减少，但仍有相当研究成果通过探讨妇女的经济生活间接回应了这一争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新材料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妇女经济生活相关的一些成果产生了新的研究取向。

1 Marjorie K. McIntosh, "The Benefits and Drawbacks of Femme Sole Status in England 1300–163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44, No. 3 (Jul., 2005), pp. 410–438; Marjorie K. McIntosh, "Women, credit,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England, 1300–1620",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2 (Apr., 2015), pp. 143–163.

2 Marjorie K. McIntosh, *Working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300–16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一，劳动工资是考察妇女经济地位的具体标准。妇女作为劳工的重要组成，妇女的“黄金时代”通常也被等同于劳工的“黄金时代”，因而，有关中世纪晚期是否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的“黄金时代”的争论，也应放在劳工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早在1987年西蒙·佩恩（Simon J. Penn）便提出，黑死病后劳动力短缺带来了更多平等，女性劳动力变得更加重要，不仅承担传统家务，还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了酿酒、纺纱和织布、割麦等经济活动。佩恩分析了萨默塞特法庭卷宗中违反《劳工法令》、索取高额工资而导致罚金的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短缺促使女性在讨论酬劳时处于讨价还价的优势地位，她们往往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工资。¹佩恩支持戈德伯格和巴隆等人提出的中世纪晚期是妇女地位上升的“黄金时代”的论断，但桑迪·巴兹利（Sandy Bardsley）对佩恩的观点提出异议，批评佩恩对劳工法官诉状的案例运用缺乏劳动工资的整体语境。巴兹利提出，酬劳最高的女性与酬劳最低的男性工资基本相同，男性只有在年幼、年老或因其他原因残疾时，才会接受与女性相同的工资；健康的成年男性的工资总是高于健康的成年女性。巴兹利对威斯敏斯特的埃伯里庄园法庭的档案分析得知，男性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为2.16便士，相应女性平均工资为1.58便士，男女两性工资比约为10:7，性别是导致工资差别的重要因素。²

巴兹利性别决定劳动工资差异的结论，遭到约翰·哈彻（John Hatcher）的强烈质疑。哈彻发现，中世纪劳动工资有两种支付方式，即日工资（按时间支付）和计件工资（按工作量支付），男性和女性的计件工资是相同的，只有日工资不同。他相信，黑死病后因实际工资上涨和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妇女的经济地位有实际提高，但巴兹利将女性工资相对男性工资的比重夸大到0.7是不合理的，男女工资的实际比重仅为0.42至0.6，有关妇女实际工资的讨论仍需借助更多一手新史料。哈彻还认为，雇主决定采取何种支付方式是由工作的困难程度而非性别所决定的，如妇女日工资较低是因为妇女体力较差，因而妇女被排除在收入最高的农业工作之外；且

1 Simon A. C. Penn, "Female Wage-Earners in Late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 1 (1987), pp. 1-14.

2 Sandy Bardsley, "Women's Work Reconsidered: 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ast & Present*, No. 165 (Nov., 1999), pp. 3-29, esp. at 25.

由于需要照顾家人和打理家务，她们的工作时间也较短。简言之，女性在体力和工作时间上的竞争性不如男性，农业领域女性的工资水平是由市场决定的。¹巴兹利的观点得到了朱迪斯·贝内特的支持，后者于2006年出版《历史很重要：父权制和女权主义的挑战》一书，认为中世纪晚期女性的工资水平稳定地保持在男性工资的1/2至3/4。贝内特将这种持续存在的工资的性别差异解释为父权制对人口危机的胜利，女性的低工资是由父权偏见决定的，这种偏见也贬低了女性工作的重要性。²

到2015年，简·汉弗莱斯（Jane Humphries）和雅各布·威斯多夫（Jacob Weisdorf）发表论文专门探究了近6个世纪里（1260—1850年间）英国非技术女工的劳动工资。他们发现非技术女工有两种就业方法，一种是临时的日薪劳动，如农业工人、花园工人、清洁工、擦洗工、洗衣工、信使、建筑工人和运输工人等；另一种是年度服务，其报酬包含食宿和其他津贴，如被雇用进行农业生产和室内家政工作等。为了评估职业是否需要技能，他们使用了HISCLASS分类法，在其筛选后使用的6000多份非技术女工工资样本中，日工资占观察总数的31%，周工资占3%，年工资占66%。汉弗莱斯和威斯多夫将年工资转换成日工资，算出女仆的日工资在4—5便士，困难之处在于食宿费用的评估会影响日工资的计算结果，但食宿费用并不固定。该研究支持了巴兹利、哈彻和贝内特等前辈学者发现的工资具有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强调差异性从中世纪持续至近代。非技术女工的年工资折算的日工资在中世纪晚期基本保持平稳，在黑死病后稍稍回落；相反，非技术女工的临时性日工资在黑死病后因劳动力短缺而明显提高，两者的差异保持至1550年。³

学者们对劳动工资的讨论主要服务于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人生活水平的讨论。早期学者如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亨利·菲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希拉·霍普金斯（Sheila Hopkins）、格列高里·克拉克（Gregory

1 John Hatcher, "Women's Work Reconsidered: Gender and Wage Differenti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Past & Present*, No. 173 (Nov., 2001), pp. 191–198.

2 Judith M. Bennet, *History Matters: Patriarchy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 322.

3 Jane Humphries and Jacob Weisdorf, "The Wages of Women in England, 1260–18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5, Iss. 2 (Jun., 2015), pp. 405–447.

Clark) 等认为, 中世纪晚期劳动工资大幅度上升, 人们的生活水平远高于过往。¹ 克里斯托弗·戴尔 (Christopher Dyer) 通过对比发现, 收割工在1256年摄入食物的75%为面包, 2.5%为肉类, 到1424年其所摄入的食物中面包仅占37.5%。他认为在黑死病之后割麦工的饮食结构得到优化, 面包的摄入减少而鱼、肉类的摄入明显增加。他还研究了15世纪早期家庭收入的支出情况, 发现谷物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为40%—50%, 鱼和肉类占35%—40%,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极大提高。² 哈彻对此持相反观点, 2011年他在《“不真实的工资”: 长时段的生活水平和15世纪的“黄金时代”》一文中指出, 早期学者对劳动工资的看法出现了误读, 而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原始材料的不合理性, 即罗杰斯等学者倾向于将无地或少地者的收入状况代表有地阶层。事实上, 经过订正后的史料表明劳工的实际工资非常低, 且由于物价较高, 人们很难提高食品之外的其他生活水平。³ 哈彻的这一观点被戴尔解释为资料记载的缺陷, 大部分工资册不会提及是否为劳工提供食物, 但15世纪末食品价格的高昂使得劳动工资的多寡直接与食物供应相关。然而, 戴尔不得不承认的是, 中世纪晚期的家庭要想满足基础物质需求, 需结合全家力量获取更多实际收入; 尽管“黄金时代”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 但是15世纪末英格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失为转型时代社会经济的重大特征。⁴

第二, 随着更多原始史料的发掘与使用, 新世纪的学者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还从妇女的财产、继承与法律身份等方面切入。早在1993年, 艾米·埃里克森

1 Thorold Rog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1886, p. 326; Henry Phelps Brown and Sheila Hopkins, *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 London: Methuen, 1981, p. 19; Gregory Clark, “The long March of History: Farm wages,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ngland 1209–186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No. 60 (2007), p. 109.

2 Christopher Dyer,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Medieval Engl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 1200–1520*,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John Hatcher, “Unreal Wages: Long-run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Golden Ag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Ben Dodds and Christian Liddy eds., *Commercial Activity, Markets and Entrepreneurs in the Middle Ages: Essays in Honor of Richard Britnell*,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Publishers, 2011, pp. 3–4, 8–14.

4 Christopher Dyer, “A Golden Age Rediscovered: Labourers’ Wag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Martin Allen and D’Maris Coffman eds., *Money, Prices and Wages: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Nicolas Mayhew*,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80–195.

(Amy Erickson) 就研究了从妻子到寡妇的转变如何影响女性的经济财富，她对75对寡妇及其先夫的遗嘱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寡妇在去世时拥有的财富比其丈夫留给她们的更多。¹芭芭拉·哈纳瓦尔特于2007年出版《妻子的财富：中世纪晚期伦敦的妇女、法律和经济》一书，聚焦伦敦妇女因继承、嫁妆和亡夫遗产而获得的财产，及其在消费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丝绸贸易中的技工、学徒监督人、酿酒师、商店经营人和零售商，甚至充当代理商和钱币兑换商。她认为，中世纪晚期并非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无疑为妇女提供了大量经济机会。另外，伦敦的法律规定了妇女的继承权利，并赋予妇女在法庭上独立代表自身的权利。然而除了少数富有家庭有继承权的女子和富商的遗孀外，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实现经济成功的妇女寥寥无几，移民或贫困家庭中的妇女几乎不可能在伦敦这种咽喉之地获得足够的经济机会。²

妇女的财产不仅源于继承，更与她们从事商业活动赚取钱财紧密相关，而妇女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商业机会，则取决于其法律身份的限制。一般来说，“独立妇女”能够独立提起诉讼、出席法庭以及订立商业合同，而与之相对的已婚妇女(feme covert)则处于丈夫监护之下，无独立自主的法律权利。近年来与女性法律身份相关的探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修·斯蒂文斯(Matthew Stevens)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中运用量化方法分析了普通法法院保存的诉讼记录，发现在1320—1420年间与女性相关的债务案件有所增加，已婚和未婚女性都充分参与了中世纪晚期伦敦债务诉讼的抗辩。³一方面，这意味着女性具有一定的财富，积极参与商业经济、订立债务合同；另一方面，已婚妇女与丈夫共同出席法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普通法“保护原则”(coverture)对其的束缚，已婚妇女持有财产、持续深化商业参与促进了其法律身份的转变。特蕾莎·菲普斯(Teresa Phipps)虽赞同“保护原则”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认为其对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限制，并未严重到妨碍

1 Amy Erickson, *Women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93.

2 Barbara A. Hanawalt, *The Wealth of Wives: Women, Law, and Economy in late Medieval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Matthew Frank Stevens, “London Women, the Courts and the ‘Golden Ag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emale Litigant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he London Journal*, Vol. 37, Iss. 2 (2012), pp. 67–88.

妇女大量参与城市市场经济的程度，一些已婚妇女甚至可以通过操纵“保护原则”而达成自己的目的。¹

克里斯·布里格斯（Chris Briggs）于2023年发表的最新研究，总体评述了2004年以来学术界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的法律身份的争论，特别探讨了“保护原则”对妇女参与商业经济的影响，认为其关键在于既要明确区分妇女在法庭上的经历和能力，也要明确她们在市场中的地位。他承认，妇女独立提起诉讼、出席法庭抗辩等经历在法庭案卷中并不罕见，但是与女性相关的法庭诉讼比重的减少表明，“保护原则”的影响力在中世纪晚期不断扩张。在订立合约时，已婚妇女的法律身份增加了不确定性，任何与之订立合约的人都承担着法律风险，因其可能利用非独立的、丈夫保护下的法律身份逃避对其的控诉、拒绝出庭等，已婚妇女对财富的追求受到“保护原则”的不良影响。此外，布里格斯还认为，将妇女个人而非家庭视为商业经济的关键参与者存在一定危险，“婚姻伴侣关系”使得妻子和丈夫对债务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而有助于女性走出家门、寻求更多商业机会。²

第三，21世纪的研究者对英国妇女经济史、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时段上从中世纪晚期延伸至近代早期，致力于衡量妇女的劳动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贡献。早在1994年，荷兰学者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便提出，近代早期女性在北海地区经济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开启17世纪的荷兰“黄金时代”，甚至推动了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³弗里斯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勤劳革命：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中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与家庭的相互关系，认为已婚妇女对市场导向性工作的参与在18世纪时平稳增加，此时女性比男性更多参与市场导向的工作，他充

1 Teresa Phipps, *Medieval Women and Urban Justice: Commerce, Crime and Community in England, 1300–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Teresa Phipps and Deborah Youngs, *Litigating Women: Gender and Justice in Europe, c.1300–c.1800*, Abingdon: Routledge, 2022.

2 Chris Briggs, “Women, legal status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some thoughts on recent research”, *Cuadernos Medievales*, No. 35 (Dec., 2023), pp. 228–248.

3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54 (1994), pp. 249–270.

分肯定了妇女对工业革命的贡献。¹但是弗里斯将前工业时期的女性视作“劳力后备军”，对她们的经济参与和贡献持较为悲观的态度，间接回应了中世纪晚期妇女经济地位的大争论。2015年，斯蒂芬·布拉德贝里（Stephen Broadberry）和布鲁斯·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等人合著《英国经济增长：1270—1870年》一书，讨论了女性对经济的贡献及其在农业、纺织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人员分布情况。量化分析的结果是女性的工作天数占整个经济体工作天数的30%，这一结果遭到惠特尔批评，她认为男性的经济贡献被高估，女性的经济贡献则被大大低估。²

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辛勤劳作，从结果上来看促进了西北欧地区的经济转型，甚至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并非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的初衷。正如上文所述，女性为补贴家用、赚取工资或积累财富而进行劳作，荷兰学者蒂内·德·摩尔（Tine de Moor）和扬·卢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将妇女的经济活动、社会转型与欧洲婚姻模式相联系。他们试图突出女性劳动力对近代早期西北欧国家社会转型的贡献，为此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小分流”，即欧洲内部的分流，相比欧洲其他地区，西北欧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他们认为，促进分流的最重要原因是黑死病之后独特的婚姻模式导致英国和荷兰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特别强调，黑死病后西北欧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劳动、赚取嫁妆，弱化了财产的代际传递和父权制对婚姻的控制。反过来，这一形成的欧洲婚姻模式又增强了女性对工资的依赖，促使女性的婚嫁年龄和独身率的提高。基于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妇女在中世纪晚期经济中的参与也迎来了“黄金时代”，女性的社会经济劳动成为西北欧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³

简·汉弗莱斯和雅各布·威斯多夫的研究对英国婚姻模式有不同意见，他们考

1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u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Stephen Broadberry, Bruce M. S. Campbell et al. ed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27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Jane Whittle, “A Critique of Approaches to ‘Domestic Work’: Women, Work, and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Vol. 243, Iss. 1 (2019), pp. 35–70.

3 Tine de Moo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Girl power: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and Labour Markets in the North Sea Regions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63, no. 1 (Feb. 2010), pp. 1–33.

察了13至18世纪英国非技术女工的劳动工资，认为已婚妇女通过丈夫获得日薪更高的临时性工作，已婚妇女与男性共享了人口短缺造成工资上涨的“黄金时代”；年轻未婚女性则更多通过年度合同赚取工资，在黑死病后，未婚女性的年度工资受到《劳工法令》的压制，她们难以赚取足够嫁妆，因此导致女性保持单身、推迟结婚。这一研究不仅回应了中世纪晚期妇女是否处于“黄金时代”的大争论，还对德·摩尔和范·赞登提倡的欧洲婚姻模式提出批判意见。¹

最后，21世纪国外学术界有关转型时期英国妇女史研究的最大突破，莫过于重新界定无报酬家务劳动及其对家庭和社会经济价值。简·惠特尔（Jane Whittle）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不断发表新的研究成果。2013年，惠特尔在《牛津手册：中世纪欧洲的妇女与性别》中写作了《乡村经济》一章，概括了中世纪妇女与土地的关系、劳动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视角下的工资状况。惠特尔否定中世纪晚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的说法，认为11世纪之后妇女从未获得控制性的高地位和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在农业、纺织业和酿酒业等行业的参与度下降，女性工资总体低于男性，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1/2到3/4。但是，她也指出，部分女性拥有土地支配权、继承权和承租权，妇女在田间的农业劳作与男性无异；妇女持续参与纺织业和酿酒业，在参与社会劳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她们顺应时代潮流，前往更加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女性的劳动工资有益于其本身的独立，也使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受益。²

2014年，惠特尔使用多郡已婚男性及其寡妻的遗嘱，调研1534—1699年间英格兰农村和小镇家庭经济中妇女的无报酬劳作。她发现，妇女在婚姻存续期间和丧偶之后都能进行无报酬劳作，少数女性甚至通过无报酬劳作积累了超过其丈夫的财富，但总体而言，寡妇在财产清册上的财富少于其丈夫，尤其是用于农场营运资本的“户外财产”更少，例如农具、马匹、木材、燃料和仓储的农作物和牲畜等。惠特尔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许多男性生前背负债务负担，寡妇要继承

1 Jane Humphries and Jacob Weisdorf, "The Wages of Women in England, 1260–1850", pp. 419–426.

2 Jane C. Whittle, "Rural economies", in Judith Bennett and Ruth Karra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Women and Gender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11–326.

其遗产就必须为夫还债，其财富在还债后留给寡妇的已较少；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寡妇并未继承婚姻存续期间与丈夫共有的所有财产，其亡夫财产被遗赠给孩子或其他人。一些寡妇继续按丈夫生前的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甚至扩大规模，但大多数寡妇缩减了规模。寡妇从事的行业也不尽与其丈夫相同，常见的有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和纺纱织布，她们在经营酒馆和客栈、酿造麦芽酒等方面非常突出，一些富有的寡妇还会进行放贷。与麦金托什和贝内特对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酿酒女经济地位变迁的消极看法不同，惠特尔对寡妇财产清单的研究发现，在整个17世纪，妇女一直立足于麦芽制作和酿酒业，酒馆、客栈、食品店和商店的增加为妇女提供了新机会，甚至到18世纪，这些行业中都有许多女性代表。惠特尔试图说明，性别并不能限制妇女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相反她们是活跃的经济主体，能管理家庭财务，为丈夫偿还债务，为家庭积累财富，妇女从事无报酬劳动为家庭经济做出了极大贡献。¹

在此基础上，惠特尔更进一步反思有关家务的研究办法，2019年，她在英国顶级刊物《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对“家务”研究方法之批评：妇女、工作和前工业化经济》，专门探讨女性“家务”的经济意义，修正此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女性经济贡献的忽视。惠特尔首先重新定义了前工业化世界的“工作”，认为它是指与闲暇或无所事事相对立的概念，不仅包括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为赚取工资所做的劳动，还应包括无偿的家务工作，如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这类工作必要且耗时，需要一定技能也消耗体力，通常由女性承担。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和60%，但是前工业化时代女性的家务和护理工作的历史及其对经济的价值被忽视，惠特尔认为，其原因是此前学者们对“家庭劳动”一词的定义含混不清。她对三种家务劳动的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意见。第一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虽然它将家务劳动视作一种工作类型，但忽视了家庭中妇女提供的生产性消费具有的经济学意义，同时还认为女性工资较低是由其生理特征决定的，忽略了家庭内部不平等权利关系的作用。第二是女

1 Jane Whittle, "Enterprising Widows and Active Wives: Women's Unpaid Work in the Household Economy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9, No. 3 (2014), pp. 283-300.

权主义经济学，将女性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再生产视作资本主义所特有，只有在工资劳动为谋生形式的工业经济体中才有意义，因此惠特尔认为这不适用于前工业化经济。第三是联合国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二战”后妇女的无偿家庭工作尚未被纳入考虑范围，1993年开始，联合国将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纳入“生产性活动”，承认其经济意义的同时仍将其排除在GDP之外；到199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特别重视性别的不平等，将家务、护理工作、志愿工作和教育纳入分析范畴。研究表明，几乎在所有国家，女性的工作时间都比男性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承担了53%的工作总量，农村地区高达55%。惠特尔将现代理论应用于前工业化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前工业化英国的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并未脱离市场经济，而是高度商业化；此外，家庭主妇还要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行业承担一些熟练的生产活动，近代早期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女性经济活动的量化研究均支持这一论点。这篇文章对男女两性在前工业时代中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对比，其研究具有极高的可信度。¹

四、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术界妇女史研究起步晚、发展较慢，近年来有较多重要论著面世。1993年出版的《世界妇女史》由李平撰写，从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论述中世纪西欧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内妇女史研究的基础。裔昭印编著的《西方妇女史》对西方妇女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总体框架，书中有专门篇章描述中世纪乡村与城镇妇女的经济活动。2013年王向梅出版的《中世纪英国农村妇女研究》对英格兰乡村妇女的经济活动做了专题研究，关注乡村妇女的农业劳动和土地经营。她指出，妇女承担大量的无报酬田间劳作，参与土地经营和交易，此外从事家庭副业活动，如家庭内部的酿酒、纺纱织布和禽畜喂养，同时参与集市贸易，从事零售业、经营店铺，此外还提供雇佣服务，如女仆、农业劳动力、助产士等。她认为，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性别分工，女性的经济活动具有隐蔽性和附属性，同时肯定女

1 Jane Whittle, "A Critique of Approaches to 'Domestic Work': Women, Work, and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y", pp. 35–70, esp. at 36, 49–54, 60.

性作为劳动力的经济价值。该书还论及乡村妇女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妇女的公共生活与家庭婚姻等多方面。¹

近年来与中世纪晚期妇女经济地位相关的论文有以下代表性作品，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提供了本土参考。刘文明致力于探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妇女的经济职能与地位，他认识到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和妇女的劳动与贡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行会对妇女的限制使她们未能享受相应的社会地位。²陈志坚专注于研究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妇女的不动产继承权，他认为贵族妇女的继承权在中世纪晚期被削弱，原因在于封建领主对家族完整性的保存。³徐浩重点研究了中世纪西欧工业中的纺纱女、酿酒女以及其他从事劳动生产的女性的工作，他观察到少数女性获得了独立性，但在传统的中世纪手工行业中女性逐步让位于男性。⁴王超华研究了中世纪英国乡村妇女的劳动和工资，认为黑死病后因人口短缺妇女获得更多劳动机会，工资有所提高，但由于妇女的依附性，以及传统观念对妇女劳动的歧视，妇女很难获得与成年男性相同的工资待遇，因社会意识造成的性别上的工资差异并未因人口减少而消失。⁵2017年，王超华再次发表论文《工资谈判与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强调黑死病后雇工在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为雇工向雇主提出工资谈判提供机会，经过谈判，英国雇工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从工资谈判考察雇工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从而加深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经济社会的认识。⁶笔者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从东盎格鲁地区酿酒业中妇女的生产活动入手，以小见大地考察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妇女经济地位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力图回应“黄金时

1 李平：《世界妇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王向梅：《中世纪英国农村妇女研究》。

2 刘文明：《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的作用与地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29—34页。

3 陈志坚：《试论中世纪英格兰贵族妇女的不动产继承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9—26页。

4 徐浩：《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妇女群体：纺纱女、酿酒女及其他》，《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第66—76页。

5 王超华：《中世纪英国乡村妇女的劳动和工资》，《史林》2012年第2期，第159—164页。

6 王超华：《工资谈判与英国雇工的“黄金时代”》，《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3期，第35—45页。

代”与边缘地位的争议，展现14—15世纪酿酒业的转型对妇女经济地位的影响。¹

五、方法与史料的拓展

以上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再到今天全球学者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活动与地位的探讨，从妇女史研究的经济史倾向到妇女经济地位的大争论，再到21世纪研究的新趋势。是什么推动了这一研究的拓展和进步？从上文的学术综述来看，主要与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与新史料的不断挖掘有关。

首先，20世纪的学者多倾向于运用历史学的文献解析法、文化史的叙事手法，以及个案分析方法和经济史的量化研究法等，但此时的量化样本较少，通常为某一村庄和城镇，受地方史研究的影响也较深。21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的量化样本则大得多，在方法上深受社会史、性别史、法律史的影响，并跳出地方史研究的狭窄范畴，将视野投向跨区域国别的环北海或西北欧地区，研究的目的也从辩论妇女的经济地位，到讨论更为宏观的女性力量对欧洲社会转型的重要贡献，同时重视女性在历史上被忽视的无偿家庭劳动的经济意义。

其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或发表的妇女经济史相关论著使用的史料，主要有各地庄园档案、普通法和习惯法的条文、地产登记簿、教会档案、遗嘱、宣誓词、法庭卷宗和古代诗歌等；21世纪学者使用的研究材料明显有所拓展，如具体分析劳工法官法庭诉状、妇女债务诉状、家庭账簿、商业合约等。国外学者通常使用未出版的原始史料，例如遗嘱手稿、切边合约和地方档案等。这些史料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具有较大的获取难度和识读困难，因此对于国内学者而言，除了直接阅读国外学者的论著外，还可以使用各类已出版的史料文献集，包括庄园法庭档案和遗嘱，从中析出与女性经济活动相关的史料，便可为己所用。

例如，雷·洛克（Ray Lock）翻译和编写的《沃尔瑟姆村庄法庭卷宗：1303—1399年》上下两卷，记载了14世纪萨福克郡沃尔瑟姆村的社会关系、经济纠纷和土

1 黄嘉欣：《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酿酒业中妇女的经济地位——以萨福克郡为中心》，《妇女与性别史研究》2020年第四辑，第53—80页。

地转移，其中包括妇女的经济活动，如酿酒、割麦和剪羊毛等。¹彼得·诺斯宜斯特（Peter Northeast）和希瑟·弗尔维（Heather Falvey）翻译和编写的《萨德伯里副主教区的遗嘱：1439—1474年》上下两册，整理了该副主教区所保留的普通平信徒的临终遗嘱，展现了15世纪中后期人们的精神信仰、商业活动、财产赠予、土地转让和经济纠纷。²马克·贝利（Mark Bailey）所著《英国的庄园：1200—1500年》收集了中世纪庄园特别是东盎格鲁地区或萨福克郡庄园的调查报告、税收、信贷抵押书、财产清册、庄园法庭卷宗以及50余份遗嘱，这些材料尽管并不直接针对女性，仍能从中找到一些相关材料。³

20世纪下半叶至今出版了大量庄园档案。1970年开始，不列颠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重新启动了“卡姆登资料集系列”的“社会经济史文献系列”，命名为“新系列”，目前出版的史料汇编有多卷包含地方庄园档案。⁴“卡姆登资料集系列”中也包含了一些遗嘱文集，读者可前往其官方网站查阅。

此外，国内学者还可以使用专门展现妇女日常工作和经济地位的史料文献集。1995年，戈德伯格翻译并整理编辑了资料集《英格兰的妇女：1275—1525年》，其中收集了各类史料，包括自治区法令对妇女参与各行业的法令规章、法庭卷宗中记载的妇女因违反麦酒法令所缴纳的税费、行会对妇女参会的规定，以及妇女的临终遗

1 Ray Lock, trans. and ed., *The Court Rolls of Walsham Le Willows 1303–1350*, Suffolk Records Society, vol. 41,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8; Ray Lock trans. and ed., *The Court Rolls of Walsham Le Willows 1351–1399*, Suffolk Records Society, vol. 45,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2. 这一套庄园法庭的资料为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约翰·哈彻以此为史料，用微观史的方法研究了黑死病对沃尔瑟姆村庄的冲击，强调人口、经济和社会心态的变化；黄嘉欣收集了该村庄园法庭记录中村民违反《麦酒与面包法令》的情况，以此探究妇女在酿酒业中的参与和贡献；徐艺欢以该村为中心探究了14世纪英格兰的乡村信贷问题。参见 John Hatcher, *The Black Death: A Personal History*, Philadelphia: Da Capo Press, 2008；约翰·哈彻：《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欧阳敏、王晓燕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黄嘉欣：《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酿酒业中妇女的经济地位——以萨福克郡为中心》，徐艺欢：《14世纪英格兰乡村信贷研究：以沃尔舍姆村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4年。

2 Peter Northeast trans. and ed., *Wills of the Archdeacons of Sudbury 1439–1474*, vol. 1, Suffolk Records Society, vol. 44,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1; Peter Northeast and Heather Falvey trans. and ed., *Wills of the Archdeacons of Sudbury 1439–1474*, vol. 2, Suffolk Records Society, vol. 53,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0.

3 Mark Bailey ed., *The English Manor c.1200–c.15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ac.uk/publishing/specialist-scholarly-publications/records-social-and-economic-history/>, 访问时间：2024年5月23日。

言和遗嘱中涉及的财产分配、家庭账单中妇女的收入、人头税记载等，力图展现普通妇女的经济状况。¹2010年，埃米莉·阿姆特（Emilie Amt）整理编辑了《中世纪欧洲妇女的生活》，搜集的资料主要与妇女的婚姻、亡夫遗产有关，包括遗嘱、自传、圣徒生活、家庭账目、验尸官记录、庄园记录等。²

六、结 语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地位的探索，最初是为帮助说明妇女整体的社会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史料的差异，学者们对妇女的经济地位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以巴隆和戈德伯格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中世纪晚期是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黄金时代”，黑死病后由于人口锐减，妇女参与社会经济的机会大大增加，其工资水平较从前有大幅提升；以科娃雷斯基、贝内特和梅特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中世纪晚期妇女处于边缘地位，在父权制的控制下，妇女的经济地位低下。麦金托什修正了两者的观点，她认为，此时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较为有限，但仍对家庭生活和地方经贸活动有所贡献，更为强调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转变。

进入21世纪，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新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与妇女经济活动相关的论著产生了新的研究重心。一些学者从劳动工资、财产继承和法律身份等进行考察，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男女两性劳动工资差异的探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妇女的经济地位，学者们基本同意“黄金时代”是一个夸大的概念，同时也重视黑死病后妇女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经济价值。妇女对工资的追求反映出她们对财富的渴望，根据普通法，“独立妇女”可以独自提起诉讼、出席法庭及订立商业合约，寡妇还可以获得1/3亡夫遗产；已婚妇女则相对受约束，无独立的法律权利，但她们对商业经济的参与不亚于“独立妇女”，在“保护原则”下反而获得更多商业机会。此

1 Jeremy Goldberg ed., *Women in England c. 1275–1525: Documentary Sourc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Emilie Amt,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2nd Edition, Oxford: Routledge, 2010.

外，近期有关中世纪晚期妇女经济活动的研究趋势有二：首先是时段扩展至近代早期，将中世纪晚期作为社会转型的前期阶段，探究女性力量对欧洲“小分流”和工业革命的重要作用；其次是将妇女在家庭内部的无偿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纳入妇女的工作范畴，强调家务工作的经济价值及家庭经济对于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国内外学者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生活的长期研究，是衡量妇女整体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显然，妇女的经济活动无法与其生命周期、家庭环境、法律身份和社会政治与经济大背景相分离，妇女在家庭内外、乡村城镇中的经济参与是立体、复杂而丰盈的。有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妇女经济地位的争论目前已有基本定论，未来的妇女经济史将走向何方，相信我辈学人将有机会见证甚至参与这一历史进程。

（黄嘉欣，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

从拒绝到接受：伍麦叶王朝史研究与西方对穆斯林传统文献的认识*

| 赵 琳 |

摘 要：在利用阿拉伯史料研究早期伊斯兰史之前，有必要对穆斯林传统文献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严谨的“分析”与“考据”，对传统文献既不能“全盘接纳”，又不能“一概拒绝”。西方学界在研究包括伍麦叶王朝史在内的早期伊斯兰史时，对是否应采纳传统文献持相对审慎的态度。因为传统文献中总以负面形象示人的伍麦叶家族，在之后基于理性的研究当中，不但没有如此不堪，其世俗化的行为恰迎合了时代需求。加之传统文献成书过程难以追溯，对待人物与事件的看法也难免受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权威以及个人主观倾向的影响，进而催生了西方学界对传统文献客观性的疑虑。经过几代学者长期的讨论，对传统文献的态度总体呈现出了从拒绝到批判接纳的过程。这进而启发我国学界重视早期伊斯兰史研究的同时，思考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

关键词：穆斯林 早期伊斯兰史 传统文献 伍麦叶

在研究包括伍麦叶王朝在内的早期伊斯兰历史¹过程中，研究者会遇到两类史料。一类是形成于同时期以考古发现为主的原始材料，包括钱币²、碑铭和建

* 本文系2023年度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伍麦叶王朝史的多维考察”（项目批准号：23XWD07），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项目批准号：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1 本文主要指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出现到8世纪中叶伍麦叶王朝灭亡、阿拔斯王朝建立这段历史时期。

2 关于钱币学文献，可参见沃克尔（J. Walker）的《阿拉伯拜占庭和改革后伍麦叶钱币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Arab-Byzantine and Post-reform Umayyad Coins*）和《阿拉伯萨珊硬币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Arab-Sasanian Coins*）。

筑¹、伊斯兰早期基督徒记载的文献²以及存世的纸莎草纸³。受限于文字档案类史料的稀缺性、物质遗存的分散性、考古发现的滞后性以及非穆斯林的“局外人”视角，若想要绘制出历史发展框架的同时兼顾对细节的推敲，则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第二类“史料”——穆斯林传统文献（Muslim Tradition），下文简称传统文献。⁴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穆罕默德·伊本·伊斯哈格（Muhammad Ibn Ishāq, 704—767/768）的《先知传》（*Sirah Rasūl Allah*），还有研究伍麦叶王朝史必不可少的泰伯里（al-Ṭabarī, 839—923）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Tarīkh al-Umam wa-al-Mulūk*）⁵，拜拉祖里（al-Baladhuri, ?—892）的《坤舆征服》（*Kitāb Futuh al-Buldān*）和《贵族的谱系》（*Ansāb al-Ashraf*），哈里发·伊本·亥雅特（Khalīfa Ibn Khayyāt, 777—854/855）的《哈里发·伊本·亥雅特史》（*Tarīkh Khalīfah ibn Khayyāt*），麦斯欧迪（Abū Hasan al-Masūdi, 896—957）所著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⁶，伊本·艾希尔（Ibn al-Athīr, 1160—1233）的《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al-Tarīkh*）等等。这些文献分别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其中不乏采用诗歌等文学表达形式，详细记录了包括伍麦叶王朝史在内的早期伊斯兰历史。

国内学界对早期伊斯兰史涉猎并不晚，但却不及对晚近之后中东史研究深入，故而并未触及穆斯林传统文献的考据问题。所幸阿拉伯史学史的研究如今已有竹笋破土之势，趁势逐渐展开了对传统文献的介绍、翻译和研究，但是对“甄别”和“考据”文献仍有大量工作亟须开展。作为非穆斯林史料和考古材料的有益补充，对

1 相关铭文文献有康布（E. Combe）等人编辑的《阿拉伯铭文编年录》（*Répertoire chronologique d'épigraphie arabe*），收录了转录的铭文连同其法语翻译和参考书目。相关艺术和建筑类考古文献包括克里斯维尔（K. A. Cresswell）的《早期穆斯林建筑》（*Early Muslim Architecture*）和格尔巴尔（O. Grabar）《伊斯兰艺术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Art*）。

2 伊斯兰早期基督徒记载的文献为非阿拉伯语文献，由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等语言记载。叙利亚语文献可参见布鲁克（S. P. Brock）的《七世纪历史的叙利亚语文献》（*Syriac Sources for Seventh Century History*）。

3 相关纸莎草学文献的介绍有索瓦格特（J. Sauvaget）的《穆斯林东部历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uslim East*），该书由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于1965年再版。

4 较早开展早期伊斯兰史研究的西方学界将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由穆斯林以相对成熟的阿拉伯文撰写的文献统称为“穆斯林传统文献”。

5 又名《历代先知与帝王史》，简称《泰伯里史》（*Tarīkh al-Ṭabarī*）。

6 简称为《黄金草原》。

穆斯林传统文献的“考据”是开展以阿拉伯文文献为史料基础的早期伊斯兰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而研究西方学界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历程和研究方法，可为我国学界中世纪阿拉伯文献考据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参考和指引。本文从传统文献中对伍麦叶王朝的贬斥入手，通过找寻其原因分析传统文献的形成过程与特点，还原西方学界从批判到接受传统文献的过程及其影响。借此希冀能够启发国内学界以恰当方法论接受传统文献“史料”价值的同时，增进对早期伊斯兰史研究的关注。

一、饱受传统贬损的伍麦叶王朝与反思

伍麦叶王朝所处历史阶段介于四大正统哈里发与阿拔斯王朝之间，是帝国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的重要阶段。伍麦叶家族统治下的王朝本身具有从部落社会向阿拉伯帝国过渡的阶段特征，为阿拉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然而，绝大多数的传统文献对伍麦叶家族抱有敌意。这种公然的敌意甚至造成了误解，认为没有必要基于这些文献研究该时期历史。但若研究者始终以发展的眼光，仔细品读这些文献，则会发现敌意表面之下，透露出当时伍麦叶家族陷入了帝国建构与宗教传播相辅相成又难以两全的境地，更隐晦地透露着对该时期部分哈里发和官员的认可。

传统文献记载中的伍麦叶家族成员，不仅大部分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初就是“机会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奉行世俗化，伍麦叶哈里发及其官员在任期间甚至不遗余力地反对伊斯兰教教义。在前伊斯兰时期，伍麦叶家族是众多麦加人中反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先知即将获胜的最后时刻才皈依伊斯兰教。进入穆斯林社团（Umma）之后，伍麦叶人又通过巧妙的政治操纵并施以诡计谋取权力，取代了那些凭借长期为伊斯兰教服务、虔诚且与先知过从甚密的伊斯兰精英。¹在众多指控中，最大的罪名莫过于穆阿维叶使“哈里发”（Khalīfa）在伍麦叶家族中世袭化²；他

1 参见Martin Hinds, “Kufan Political Alignments and Their Background in the Mid-Seventh Century A. 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 No. 4, 1971, pp. 346–367; Martin Hinds, “The murder of the caliph ‘Uth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 No. 4, 1972, pp. 450–469。

2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3, Bayrūt: Dār al-Kutub al-‘Ilmiyah, 2008, p. 247.

们压迫甚至谋害了宗教人士和先知家族成员，最重要的是先知的外孙侯赛因¹；他们数次围攻麦加，袭击圣城²；他们以武力和暴政统治并且阻止非穆斯林接受伊斯兰教，使他们无法获得他们应得的权利等。³《乐府诗集》（*lqd Aghanī*）等文学作品中描述了许多伍麦叶哈里发的世俗化行径。诸如叶齐德每天都要喝酒，甚至到了酗酒的程度，他甚至还有一个“酒鬼叶齐德”（Yazid al-Khumūr）的称号；哈里发中瓦利德一世（Walīd I）每两天饮一次酒，希沙姆（Hishām）每周五饮一次酒，阿卜杜·马立克（Abd al-Mālik）一个月喝一次。⁴总之，传统对伍麦叶家族的敌意已是伊斯兰历史研究领域中公认可的事实。⁵

然而若研究者设身处地，以同时代的眼光审视伍麦叶王朝，则很容易想到，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教派、重要概念、教义仍处于雏形阶段，尚未成熟。了解了这一基本前提之后，以极大的耐心和敏锐的观察力去感知，对伍麦叶家族的控诉存在着许多或是讳莫如深，或是模棱两可的叙述，这些值得研究者审慎对待和思考。

首先，传统与伍麦叶人对哈里发的认知并不相同。其一，以逊尼派为主流的穆斯林传统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只继承了政治领导权，宗教立法权留给了宗教学者（‘ulamā’）。⁶哈里发是“先知的继任者”，全称为“哈里发·拉素鲁·安拉”（Khalīfat Rasūl Allah）。又因为《古兰经》中明确指出了穆罕默德是封印

1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3, pp. 305–342.

2 祖拜尔以避难为由盘踞于希贾兹地区，叶齐德曾于公元683—684年（伊历64年）派出叙利亚人穆斯林·本·欧格白·穆里（Muslim b. ‘Uqba al-Murri）带领军队在哈拉（Harra）战场上平定了麦地那的反叛，祖拜尔从麦地那逃往麦加。穆里追至麦加，但不幸在途中逝世，其职位由胡萨尼·本·努玛伊尔·萨库尼（Husayn b. Numayr al-Sakūnī）接替，胡萨尼带领军队再次围攻麦加；伊历72年，阿卜杜·马立克派哈查支图剿伊本·祖拜尔。

3 叶齐德·艾比·穆斯林（Yazid ibn Abi Muslim）治下的北非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公元734年（伊历116年），哈里斯·本·苏拉伊吉（al-Harith b. Surayj）叛乱；阿什拉斯·本·阿卜杜拉·苏拉米（Ashras’ Abdallāh al-Sulamī）遭遇到粟特人叛乱，以及伊拉克的哈瓦利吉叛乱等。参见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3, pp. 360, 530, Vol. 4, pp. 129–130.

4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51, p. 479.

5 当可以明显区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时期，什叶派传统比逊尼派更具敌意，但许多史料同时包含什叶派和逊尼派观点，参见 E. Kohlberg, “Some Imami Shi‘i interpretations of Umayyad history”, in G. H. A. Juynboll ed., *Studies on the first century of Islamic societ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5.

6 ‘Alī ibn Muḥammad Māwardī, *al-aḥkām al-sultānīyah wa-al-wilāyāt al-dīnīyah (naẓarīyatihi al-siyāsīyah ‘alā ḍaw’ bī’atihi al-tārīkhīyah)*, ed. M. Enger, Bonn: Apud A. Marcum, 1853, pp. 23–24.

的先知，所以哈里发在宗教领域能发挥的作用，仅仅是为保证宗教学者能够继续完成其使命提供必要的行政条件。但须指出的是，这种观点至少到9世纪中叶之后才形成。穆斯林关于哈里发的理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伊斯兰教对于哈里发的解释，实际上顺应了中世纪伊斯兰政权历史演进的客观态势和历史事实。伊斯兰教历经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其政教关系呈现出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政教合一传统渐趋弱化和工具化的演进态势。¹所谓传统是经历了这种演进历程之后相对成熟的传统。在伊斯兰初期，没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之前，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领导者，他们成为哈里发之前首先是圣门弟子，尤其是前三任哈里发。²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演变，什叶派中则以“伊玛目”（Imāmāte）的称谓代替了原本兼具政教权威的“哈里发”。³什叶派认为，真正具有宗教权威的人既应是逊奈的守护者，又应是先知的后裔，这些人被称为宗教学者。穆斯林传统中的主流逊尼派对“哈里发”的认知形成相对较晚，形成了“哈里发”宗教领域的权威逐渐受限的共识。然而，硬币和铭文中的证据则表明，伍麦叶人使用哈里发·安拉（Khalīfat Allah）这个头衔，意为“真主的哈里发”。因为此处“哈里发”不太可能意味着继任者，一个人不能成为真主的继任者，“哈里发”也有代理或副手的含义。这说明伍麦叶人认为自己是真主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先知的继任者。换言之，这个头衔暗示着，伍麦叶人认为自己代表真主领导穆斯林社团，并没有与新兴宗教学者阶层分享抑或是委派他们行使宗教权力的必要。⁴这一点与前三任正统哈里发时期哈里发政教权威兼具的情况是一致的。

其二，传统似乎认为，哈里发须从具备一定资格的人中选举产生，但历史上从

1 参见刘中民、郭强：《对中世纪伊斯兰社会政教合一传统的历史反思》，《西亚非洲》2019年第2期，第139页。

2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

3 为国家政教领袖的指称。什叶派中发展出了伊玛目学说，而且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论战中，也存在哈里发与伊玛目混用的情况。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665页；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4—66页。

4 参见W. M. Watt, "God's caliph. Quranic interpretations and Umayyad claims", in C. E. Bosworth ed., *Iran and Isla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atricia Crone and Martin Hinds, *God's Caliph: Religious Authority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Islam*.

未就如何进行哈里发选举达成过一致意见。传统认为，穆阿维叶任命叶齐德的错误在于，在没有与伊斯兰教代表（无论他们是谁）协商的情况下，自行选择了哈里发，甚至连象征性地认可该职位应该是选举产生的行为都没有。改变哈里发的继承方式是指控穆阿维叶歪曲哈里发制度的主因。这接而牵连了叶齐德在穆斯林传统文献中的评价，他作为“穆斯林”的失败被文献一再强调。然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哈里发的推选过程也并不一致。艾卜·伯克尔（Abū Bakr）是参照阿拉伯人推选部落首领的惯例，被推选为第一任哈里发；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则由艾卜·伯克尔去世前亲自任命；第三任哈里发伍麦叶家族的奥斯曼（‘Uthmān）是在欧麦尔遇刺身亡前指定六人中推举的；奥斯曼被害后，阿里（‘Alī）被拥戴成为第四任哈里发。所以四大正统哈里发中三任皆通过不固定模式当选，还有一任来自上一任的任命。在伊斯兰教出现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之后，逊尼派似乎认为，哈里发之位不应简单地以武力夺取，也不应在未经广大穆斯林协商的情况下由上一任任命。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对哈里发的看法与逊尼派迥异。¹什叶派认为，政教权力兼具的伊玛目应该出自阿里一支，这在血统上规定了成为合法伊玛目的条件；哈瓦利吉派则认为，哈里发不仅不应局限于阿里家族，更不应局限于古莱氏部落，即使是奴隶也有权成为哈里发。

其次，穆斯林传统的评判标准以宗教虔诚为准绳，认为哈里发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应完全是穆斯林的利益，却忽略掉了构建帝国的刚性需求和阿拉伯社会承袭的部落传统。传统对伍麦叶家族的诸多指控中，最为重要的是认为，其大部分君主是世俗国王（阿拉伯语Malik，复数为Mulūk）而非哈里发（Khalīfa）。²哈里发接替先知穆罕默德担任穆斯林的领袖等同于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minīn），而国王是主要依仗武力来维持其权力的专断世俗统治者。传统对伍麦叶家族世俗王权的苛责，主要来源于穆阿维叶公然违反了“推举”哈里发的方式，在其生前安排自己的儿子叶齐德为继承人。这件事的本质是穆阿维叶将世俗王权的世袭原则引入了哈里发制

1 参见Hamilton A. R. Gibb, “Al-Mawardi’s theory of the khilafah”, is Stanford J. Shaw and William R. Polk eds., *Studies on the Civilization of Isla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p. 441.

度，这无异于穆阿维叶扮演了世俗国王的角色。除了上述提到的缘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其核心围绕着伍麦叶王朝是否应对新穆斯林（大部分是非阿拉伯穆斯林）征税。伍麦叶王朝不足百年的历史，对这个问题一直摇摆不定。¹伍麦叶家族之所以被描述成反伊斯兰教的世俗形象，是因为大部分的决策者提出了为新穆斯林免税的良好愿景，但最终都以食言告终。在对众多伍麦叶王朝君主的指控中，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Umar b. ‘Abd al-‘Aziz, 717—720），又称为欧麦尔二世，是一个例外。虽然传统对他的记载也十分模糊，但只有他一人幸免于作为“世俗国王”的指控。这是因为欧麦尔二世在有生之年执行了全体穆斯林平等的免税政策。他曾言：“穆罕默德来召唤人们皈依信仰，而不是收税。”²虽然伴随着他的去世，继任者很快推翻了他的政策，该政策据称也仅在叙利亚地区施行，并没有推广到矛盾更为尖锐的新征服地区。但传统文献中一直强调欧麦尔二世的宗教虔诚，以至于忽视了王朝也曾出现过其他哈里发主张为非阿拉伯穆斯林免除人丁税的情况，从而使欧麦尔二世与王朝其他哈里发对待宗教的态度形成了天壤之别。

这件事的本质反映了宗教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张力。伍麦叶王朝从哈里发到总督之所以推翻他们对全体穆斯林免税的承诺，是因为在帝国的构建与宗教的教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秩序应该只服从于宗教至上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原本在部落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其部落化的结构或社会分层必然会遭到瓦解，为了规范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扶持宗教学者“乌莱玛”建立的新法规和体系等。希沙姆任哈里发时期，曾试图利用宗教实现社会内部稳定和抵御外敌。他开始通过树立宗教至高无上的原则，以寻求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这意味着吸纳更多的非阿拉伯人进入伊斯兰社会，与此同时国家会丧失税收来源。彼时正值阿拉伯大征服的尾声，停止征服新疆域意味着源源不断地输入战利品的辉

1 哈查支驱赶弃耕从军的马瓦利参见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3, p. 648; 阿什拉斯试图劝服粟特人皈依伊斯兰教，承诺他们如果皈依伊斯兰教，将受到与阿拉伯人一样的平等对待，其中最大优惠则是因皈依而获得人丁税（Jizyah）的减免。这样做的结果是，当地居民为了免于支付人丁税，而非是对伊斯兰教的虔信，涌入式地皈依伊斯兰教。布哈拉的地主阶层——德干（dihqān），参见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2, pp. 472–473。

2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4, p. 64.

煌已成过去。免征全体穆斯林人丁税的承诺，一方面会让财政本不宽裕的中央陷入更为逼仄的境地；另一方面又触犯了为王朝提供军力的阿拉伯部落的利益，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答应利益的丧失。包括希沙姆在内的伍麦叶王朝大部分决策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稳固统治，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所以才会出现阿拉伯统治者对是否应该向马瓦利收税踌躇不决的情况。

但显而易见，伍麦叶王朝君主哈里发的称号是否为传统所接纳，或是被贬损为世俗国王，完全取决于主观化的标准即当事人的宗教态度，而无关于个人品质和能力。但与伍麦叶的取代者阿拔斯王朝相比，早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与传统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伍麦叶人使用了国王的头衔作为称谓，或者是使用诸如王冠、宝座或权杖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工具¹，而阿拔斯王朝也不乏腐败、放荡不羁的哈里发。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被传统悉数接纳为哈里发，伍麦叶的哈里发除了欧麦尔二世，却悉数被认为是国王。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传统是逊尼派占据主流的传统。

再次，逊尼派对伍麦叶家族的矛盾态度时刻提醒着作为传统文献读者的我们，伍麦叶时期逊尼派与什叶派并未完全发展成熟，教义也不完善。至少逊尼派自己也没有想好应该接受哪些哈里发。依照逊尼派的观点，先知穆罕默德和圣门弟子的言行应被作为教义的权威来源之一。穆阿维叶是穆罕默德的书记官，换言之，也是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之一。穆阿维叶的言行也应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的来源。什叶派则更为激进地将穆阿维叶视作阿里和伊玛目们的敌人。然而，或许是出于维护伊斯兰教历史连续性的目的，为了将伍麦叶王朝与正统哈里发时代联系起来，传统文献承认欧麦尔二世是哈里发，而非国王。如此，逊尼派学者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出于维护伊斯兰教的目的，需要刻意贬损过于世俗化的伍麦叶王朝；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尖锐地质疑伍麦叶王朝的合法性，则可能会给什叶派以可乘之机。因为什叶派中的大多数认为，阿里不仅为穆阿维叶所骗，还被前两位正统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所骗。在逊尼派的观念中，后两者在传播先知圣言圣

1 Ignác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Vol. 2, Translation by C. R. Barber and S. M. Ster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7, p. 38.

行（Prophet's Sunna）以及建设后来的穆斯林社团（乌玛）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当我们将触角伸向传统文献叙述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时，会发现伍麦叶家族不仅值得称赞，甚至功不可没。

第一，就治理能力而言，穆阿维叶和阿卜杜·马利克等哈里发的统治和行政能力在文献中得到了认可。阿卜杜·马利克时期的币制改革、军队整编、官员任命、行政机构的设置，都为后来的伊斯兰黄金时代奠定了政治基础，甚至于后来的阿拔斯人对其前任在治理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曾表示过钦佩。¹

第二，就更为严格和具有原则性的宗教问题而言，所谓“穆斯林社团年”（指穆斯林结束了内部冲突，重建穆斯林社团的年份）这个名称，适用于穆阿维叶结束了第一次内战，即击败阿里后，其哈里发的地位在库法获得承认的那一年；也同样适用于阿卜杜·马利克结束了第二次内战，逐步实现了伍麦叶王朝的复兴。因此这两个时间称谓本身自带某种褒扬这两位哈里发将穆斯林社团从内部纷争中拯救出来的功绩意味。值得一提的是，若仔细阅读传统文献中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内战细节的描述，论及阿里和伊本·祖拜尔的事迹总给人以一种不安和隐忧之感，而穆阿维叶和阿卜杜·马利克却显得精明能干。即便是传统对伍麦叶王朝诸多抱怨中的关键点，即炮轰麦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天房，在个别传统记载中也有“狡辩”的余地。例如，有记载称，麦加遭到轰炸时损坏天房的大火事出偶然，甚至有记载称是由一名麦加的守卫者粗心导致的，而这名粗心的守卫者甚至被认为是伊本·祖拜尔。²

第三，传统对欧麦尔二世青睐有加，这说明就血缘谱系而言，伍麦叶家族也可以产生一位真正的哈里发（宗教领袖），伍麦叶家族并非生来就是“坏人”。除了伍麦叶家族属于古莱氏部落，以及欧麦尔本人对宗教的虔诚态度外，其母亲与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一世有血缘联系，其父则是一名伍麦叶家族的统治精英，系哈里发阿卜杜·马利克的兄弟，也是阿卜杜·马利克任内大部分时期的埃及总督。

第四，就伊斯兰法律传统而言，麦尔旺·伊本·哈卡姆是伍麦叶获得哈里发之

1 G. R. Hawting, *The First Dynasty of Isla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81.

2 Abū Ja'far Muḥammad ibn Jarīr Ṭabarī, *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 Vol. 3, pp. 361–362.

位的两大支系之一麦尔旺系的祖先，尽管其本人哈里发任期短暂，但是自他之后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均出自麦尔旺系。麦尔旺本人曾被称为法律的制定和裁决者，而且即便是与最为重要的追随先知的圣门弟子相比，关于他的记载也经常表现得相当积极和讨喜。对麦尔旺评价最高的传统文献中，他甚至作为“先知”出现。¹

二、传统敌视伍麦叶王朝的原因及其特点

前文关于传统对伍麦叶家族“贬损”的分析中，透露着无处不在的“时空错乱”之感，这无疑与传统文献形成过程有关。传统文献除了人物传记、编年史等，还包括传统文学。这些体例彼此之间边界模糊。传统文献最初以口头文学的形式起源、流传、收集，最终被后世所知并记录。因其文学性，也因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事件被书面记录下来的过程十分漫长，且经过了数位传述人辗转流传²，传统文献的客观性遭到质疑。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针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书面记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原貌，难免要引起一番讨论。本着历史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在讨论之初应了解传统文献具有的基本属性。

第一，从“伊斯纳德”（Isnād）的出现可以看出，宗教性是穆斯林传统文献与生俱来的属性，同时也是西方学者认为影响传统文献作为史料的“客观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伊斯纳德”伴随着圣训学（Hadīth）而出现，阿拉伯人记事求真的观念，伴随着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言行传述的需要而逐渐发展。出于宗教对口头传述权威性的要求，传述一方和听取的一方都必须具有公认的权威，比如传述人通过公开演讲（Khitāb）传述事件，或者传述一方和听取的一方是师徒关系（比如先知与圣门弟子）等等。“伊斯纳德”的出现标志着穆斯林传统史学的一大进步。³但记事求真的观念并非所有阿拉伯史家从一开始就具有，有些传记作者和圣训学家就会遗

1 G. R. Hawting, *The First Dynasty of Islam*, Introduction, p. 14.

2 传述人用于圣训学，纪事家（Akhbariyyūn）强调史学活动。虽然传述人指参与圣训的宗教人士，而纪事家指参与收集赫巴尔的史学人士，但因为“伊斯纳德”起源于圣训，实际上传述人与纪事家两种身份经常重叠。

3 James Howard-Johnston,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60.

漏“伊斯纳德”。可能是出于易读性的考虑，迪纳瓦里（al-Dinawari，卒于891年）、雅古比（al-Yaqubi，卒于公元900年）和麦斯欧迪（al-Masudi，卒于956年）等人的著作，就彻底摒弃了“伊斯纳德”。¹

在不断的口头传述过程中，因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主观评价虽非刻意，然而，学者一旦主动地，或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某种史观，该史观就会成为该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收集经验材料的出发点。²“伊斯纳德”的传述人也不例外。传述人往往都是早期伊斯兰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有的是迁士、辅士或者最终皈依伊斯兰教的里达战争参与者，或者是经历了两次内战的穆斯林。他们构成了“伊斯纳德”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传述的权威性恰恰来自他们早期穆斯林的身份。比如祖赫里（Ibn Shihāb al-Zuhrī，卒于742年）就是同时期最有名的宗教学者。³他们已经接受了集体身份认同，自觉地承担了传播宗教的责任。与作为史料所要求的客观性相比，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确保传述的权威性和历史事件的连贯性。为追求传述人的权威性，后人会替换掉先前权威性欠缺或是并非亲历者的传述链条；有可能在整合记录过程中出现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权威性而替换掉前者传述的情况，比如后者是一位知名的学者等原因，而传递同一事件的前者为无名氏。但并不能排除前者是亲历者，其传述更具客观性的可能。或者在整合过程中，传述人着意于凸显能够支持宗教主张和信仰的记载，删除有悖于其意图的记录，甚至是蓄意加入一些有利于确保传统连贯性和权威性，但却是虚构的内容。从确保连贯性来说，到9、10世纪，圣训才被接受为《古兰经》的补充。作为对先知穆罕默德以及逊奈的记录，其本身是由个人零散的传述汇聚整合而成。由此衍生出来的圣训学主旨之一就是对圣训传述进行多番考证和整合。在动荡的7世纪，传述人参照圣训学中的模式对史事进行从零散到连贯的整合，力求搭建出时间的连续性。

第二，传统文献的形成历经了从口头到书面，从零散转述到多番整合的过

1 James Howard-Johnston,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p.365.

2 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4页。

3 James Howard-Johnston,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p.362.

程。参与传统文献编撰的人不止受圣训学求证过程的影响，也受到整合阿赫巴尔（Akhbār）、武功纪（Maghazī）、生平事迹（Sīra）的影响。¹以阿赫巴尔为例，阿赫巴尔指成文纪事。²早期阿拉伯人的识字率不高，信息的传播最开始以口耳相传为主，纸笔记录为辅³，这些信息大多简短、相互独立，并且无序。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将口耳相传的信息收集成册，其中包括先知生平、族谱集、故事册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呈片段化，内容简短，彼此独立且不注重记录史事的发生时间。⁴在成为阿赫巴尔之前，史事大多以相对容易记忆的口头形式流传。口头传播形式造成的传述内容的不确定性，要远高于书面记录的阿赫巴尔。除非传述人机械性地死记硬背，否则每一次口头传述的过程，都是一次主题被主观重塑的过程。一方面，口头传述人对于事件的主观偏好，会决定他辞藻的选用；另一方面，传述人的关注点不同可能也会有意无意地切割和删减内容。可谓每一次传述都是对事件的重塑。

第三，除了口头传述和宗教性以外，因为书面记载和编纂成册出现相对较晚，所以传统文献还具有滞后性。后世传述人或纪事家对先前发生的事情，不断汲取旁人信息，多番整合，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代人，直到公元9、10世纪，才产生了这些材料的书面版本。公元761年前后，伊本·伊斯哈格撰写的《先知传》以及与圣训、《古兰经》有关的经注类材料才正式成书。⁵此时距离7世纪中叶纪事出现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书面版本出现之后，也不能保证信息不会被“篡改”，因为即使到了15、16世纪，穆斯林学者还在不断地从他们前辈的作品中挑选材料并对其进行再次重塑。对于幸存下来的最早的穆斯林文学资料、历史作品、传记、《古兰经》注释等等，如若比对它们早期和较晚的两个版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献本身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此一来，传统文献在成书的过程中存在因果倒置、时空错乱的可能，

1 学界对传统发展形成的顺序仍有争论，参见Andreas Gör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ghāzī and Ḥadīth in Early Islamic Scholarship”,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74, No. 2, 2011, pp. 171–185.

2 阿拉伯语单词赫巴尔（خبر）复数为阿赫巴尔（أخبار）。

3 梁道远：《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第42页。

4 Radwān Salīm, *Niẓām al-zamān al-‘Arabī: dirāsah fī al-tārīkhīyāt al-‘Arabīyah-al-Islāmīyah*, Bayrūt: Markaz Dirāsāt al-Waḥdah al-‘Arabīyah, 2006, pp. 30–34.

5 761年以前是阿拉伯史学的萌芽期。参见梁道远：《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第41页。

更有很大可能传述人会以后世的价值标准对先前的历史事件加以主观评价。¹不得不说，书面文献的滞后性增加了传统文献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因此被收集上来的信息经过各种形式处理后流传给后世。它们有可能会被再次打散并与不同出处的其他材料进行重组，以使其关联于不同的主题；被认为无关的材料也有可能被省略。如此，冗长的叙事被删减得简短，而简短的叙事也可能通过插入或黏合其他材料而被充盈。通常情况下，插入和黏合的位置几乎无法辨认。材料还有可能在流传中消失，或者通过替换措辞、添加注释，甚至通过编造全新的来源资料，被有意或无意地篡改。因此传统文献在传播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变化空间，更无须说材料会随着政治、社会和宗教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持续的变化，是为了使材料顺应于主观意图，或者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获得可接受性，可能会遗失材料本身的原始意义和发生背景。传统文献可谓历经了层层“工序”的加工与再加工。

如此就不难理解传统文献字里行间中透露的对伍麦叶家族的敌意了。就伍麦叶王朝史研究而言，记录伍麦叶王朝最早、最为严谨的原始资料要早于9、10世纪，并且这些材料大多已佚。直到王朝后期，伍麦叶王朝的史事才随机性地被记载下来。随着书面记录的形式越来越普遍，这些记录根据某一个特定主题或叙述框架被重建组织、编辑、整合成更复杂的文献单元。于是到了伍麦叶王朝晚期和阿拔斯王朝早期，出现了艾布·米赫纳夫（Abu Mikhnaf，卒于774年）、伊本·伊斯哈格或阿瓦纳（Awana，卒于764年）等学者。他们通过收集自己认为有用的材料来编纂成所谓的书籍。这些书籍（纪事本末体、人物传记）通常围绕一个主题，比如骆驼之战、第二次内战或者某位哈里发的统治等收集和组织资料。并不能排除这些学者可能只是简单地将相关资料口述给他们的追随者，再由追随者完成书写记录的工作。于是出现了不同追随者转述下来的信息有不同版本的情况。拜拉祖里和泰伯里等学者的著作也是伍麦叶王朝流传给后世相对较晚的版本。²从《历代民族与帝王史》呈现出的庞

1 Albrecht Noth and Lawrence I. Conrad, *The Early Arabic Historical Tradition*, Princeton: Darwin Press, 1994, pp. 1–25.

2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1.; A. A. Duri, *The rise of historical writing among the Arab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大史料中可以看到，泰伯里所引用的内容囊括口述和文献这两种材料，来自纪事家或传述人的口述与著作，其中包括祖赫里、伊本·伊斯哈格、赛义夫·本·欧麦尔（Sayf Ibn ‘Umar）、艾布·米赫纳夫、麦达伊尼（al-Madāinī）等等。这些纪事家或者传述人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晰，可以确定的是，伊本·伊斯哈格撰写的《先知传》是基于祖赫里的作品，而祖赫里则基于乌尔瓦·本·祖拜尔（‘Urwa b. al-Zubayr，卒于712年）。他们叙述方法、风格和准确度各不相同。阿拉伯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时至拜拉祖里、泰伯里等人时期，则需要明确，他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历史学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宗教学者。泰伯里不仅是《历代民族与帝王史》的作者，也是《古兰经》的经注学家，其经注作品数量恐怕要远多于其历史作品。虽然他们像历史学家一样关心的是过去及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但并不能过分奢求他们在所处时代的作品中保持客观，客观性是现代历史学发展的产物，要到19世纪以后才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愿望和迫切要求。

传统文献的宗教属性是伍麦叶王朝在伊斯兰历史书写中饱受非议的根本原因。希提指出，穆阿维叶不受穆斯林历史学家喜爱的主要原因并不难找，这些历史学家大部分是什叶派或者是伊拉克-波斯裔以及麦地那学派，而叙利亚学派中仅有一位历史学家——伊本·阿斯卡里（Ibn Asākir，1105—1176）。¹伍麦叶时期，伊拉克地区对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性，意味着该地区对该时期传统书写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传统文献倾向于反映伊拉克来源的观点，伊拉克的来源提供了比其他省份更多关于伊拉克和东部地区历史事件的信息，这些观点普遍具有反伍麦叶倾向。对伍麦叶心怀敌意的宗教学者在史料的收集、传播和最终成书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伍麦叶哈里发不愿将宗教职能让出去；另一方面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史料成书时间基本都是在取代伍麦叶王朝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尤其是伊拉克地区的宗教学者，他们在收集、整理和编纂这些史料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麦叶王朝之初所依仗的，正是伊拉克一带对伍麦叶统治者恨之入骨的一批穆斯林²，这些人成了后来的什叶派。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文献总透着一种对

1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p. 441.

2 大部分是马瓦利和不具备显赫部落谱系地位的阿拉伯人。

伍麦叶人原则性的敌意。这并非阿拔斯王朝雇用学者为“阿拔斯统治”合法性的辩护，而是这些学者从穆斯林反抗伍麦叶统治的传统中继承了材料，于是自己也逐渐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传统流传至今对伍麦叶王朝的敌意已然成了公认的事实。

三、从拒绝到接受：西方学界对传统文献的态度演变

西方学界经历了18至19世纪的积累，进入20世纪以后，因充分意识到了传统对伍麦叶王朝有失偏颇的态度，开始对传统文献中信息准确性的问题深感疑虑。有一部分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史料价值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更有甚者彻底否定了客观研究伍麦叶王朝史的可行性，进一步导致了学术化释读伍麦叶王朝史的进程迟滞。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才逐渐在批判中肯定了这些中世纪阿拉伯文本的“史料”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以伍麦叶王朝史为代表的早期伊斯兰史研究。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西方学者对基于传统文献撰写早期伊斯兰史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这些人包括匈牙利籍犹太裔学者伊格纳兹·戈德兹（Ignaz Goldziher，1850—1921）、德国学者约瑟夫·沙赫特（Joseph Schacht，1902—1969）、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闪族研究专家约翰·旺斯堡（John Wansbrough，1928—2002）²、德国伊斯兰历史学者阿尔伯希特·诺斯（Albrecht Noth，1937—1999）、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默什·沙龙（Moshe Sharon，1937— ）、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教授乌里·鲁宾（Uri Rubin，1944—2021）等等。

伊格纳兹·戈德兹作为欧洲现代伊斯兰研究的奠基者，对传统文献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圣训并非源自先知时代，而主要出现于先知去世后一个世纪甚至更晚时期，

1 福莱德·唐纳认为，西方学界对穆斯林传统文献的认识经历了三种方法论沿革：“拿来主义”——“批判与怀疑”——“多方争鸣”。其中18—19世纪囿于一手材料的稀缺，西方学界高估了传统文献的“史料”价值，基本上完全依赖穆斯林文献研究伊斯兰早期历史。这一时期的早期伊斯兰史研究仅限于对于历史框架的宏观概述，所采取的方法为描述法（Descriptive Approach），代表性作品诸如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Gustav Weil, *Geschichte der Chalifen*, 参见Fred M Donner, “Modern approaches to early Islamic history”, in Robinson CF ed.,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623–647。

2 John Wansbrough, “Islam, and Monotheism”,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Vol. 9, No. 1, 1997, pp. 23–38;

即8世纪和9世纪，其内容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的主要关切，并不一定是客观史事。戈德兹的关注点在圣训，而且在其讨论过程中认为，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动用政治权威影响了圣训的编纂。¹他还认为，高度世俗化的伍麦叶王朝代表叙利亚与麦地那争夺宗教领导权。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戈德兹的观点被他的学生沙赫特进一步深化。通过对穆斯林法律起源的历史研究，沙赫特声称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老师关于穆斯林传统起源相对较晚的观点。约翰·旺斯堡认为，传统是从碎片化的武功纪向圣训学发展而来，这意味着，严谨的伊斯纳德与宗教意识形态共存的情况掩盖了早期最接近客观史事的记载。²乌里·鲁宾认为，参与传统的学者在研究穆罕默德生平事迹时，关注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应该被记录的方式。他们意识到了在传述先知事迹时出现的神话、传说性质，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次要因素，首要因素是传述事迹的传述人够不够“权威”。³这些对传统持拒绝态度的学者，虽然各有侧重，但其研究都没有离开圣训。

这种情况在以伍麦叶王朝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得到了改善。史料处理方法的创新促使欧洲学者对传统文献的态度发生了改观。率先开辟西方利用传统文献研究伍麦叶王朝史先河的，是德国闪族研究学者尤利乌斯·韦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8）。他试图对传统文献如《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中关于伍麦叶王朝的记载所依赖的信息来源——纪事家——进行批判分析。⁴他将这些纪事家区分为不同“派别”，艾布·米赫纳夫被认为是伊拉克学派的代表，祖赫里被认为是麦地那学派的代表，等等。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侧重、观点和态度倾向。研究者可由此判断出这些纪事家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和倾向，继而纠正从传统承袭而来的“被扭曲之处”，更准确地书写出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阐释。按照韦尔豪森的方法，任何一个学者收集和流传的材料，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各种各样的来源，甚至包括亲伍麦叶家族的学者来

1 Ignác Goldziher, *Muslim Studies*, Vol. 2, pp. 38–48.

2 John Wansbrough, *The Sectarian Milie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Uri Rub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Life of Muhammad as Viewed by the Early Muslims (A Textual Analysis)*, Princeton: The Darwin Press, 1995, p. 1

4 Julius Wellhausen, *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 Translation by Graham Weir Margaret,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27.

源，并且当时并不存在所谓对学者进行审查的中央权威。既然所有学者都可以被归类为某“学派”，那么与某一学者名字相关的材料，肯定会偏向于支持他所属的地缘或者宗教“派别”的观点。

诺斯在1973年发表的《来源批判学研究》(*Quellenkritische Studien*)中否定了韦尔豪森分析文献来源的可能性。他认为，使用这些材料细节化地重建早期伊斯兰历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诺斯强调了历史传统在收集和传播过程中的不断改造，认为根本无法追溯这些早期纪事家的消息来源。在追溯任何纪事家传播来源时，都会发现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背景。即使是最早期的纪事家，因为他们已经有大量的材料可供选择，也不能准确定位对传统历史叙述起决定性作用的某个时间点或个人。对传统文献的任何分析都需要考虑到它的最终编辑和排列及其早期传播的时间顺序。¹因此不大可能将8世纪的纪事家与具有明确特征的“学派”联系起来，或者甄别某个学者的偏见。事实上，每一位纪事家流传下来的史料都反映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无法进行归纳。诺斯旨在暗示，这些来源只不过是可疑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构建的文学作品集合。诺斯甚至怀疑大征服背后是否存在统一的精神凝聚力，默什·沙龙则认为大征服并不存在。²诺斯等人陷入怀疑情绪而导致的不可知论与历史研究的精神不符。

然而，他们对韦尔豪森的批判不无道理。参与传统编撰的传述人或纪事家，虽然彼此是师承关系，但却不能尽数归为一个学派或一种风格，比如祖赫里是乌尔瓦的学生，而穆萨·本·乌格白和伊本·伊斯哈格作为祖赫里的学生，却并不能全部归为麦地那学派。伊本·伊斯哈格虽然与麦地那渊源甚深，但却更像一个纪事家，他博采众长的同时，其观点更加关注东部地区。³从内容上来说，伊本·伊斯哈格则更倾向于伊拉克学派。与此同时，可以明确地观察到，这些学者的侧重点从宗教逐

1 Albrecht Noth, *Quellenkritische Studien zu Themen, Formen, und Tendenzen frühislamischen Geschichtsüberlieferung*, Bonn: Selbstverlag des Orientalischen Seminars der Universität, 1973, Noth, Albrecht, and Lawrence I Conrad, *Studies in Late Antiquity and Early Islam*, translation by Michael Bonner, Princeton: Darwin Press, 1994.

2 Moshe Sharon, "The Birth of Islam in the Holy Land", in M. Sharon ed., *Pillars of smoke and fire: the Holy Land in history and thought*, Johannesburg: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3 'Abd al-'Azīz al-Dūrī, *Nash'at 'ilm al-tārīkh 'inda al-'Arab*, Beirut: Markaz Dirāsāt al-Wahdah al-'Arabīyah, 2005, p. 26.

渐向史事转变。阿卜杜·阿齐兹·杜里（‘Abd al-‘Azīz al-Dūrī, 1919—2010）评价伊本·伊斯哈格称：“我们能够感到，像伊本·伊斯哈格这样对民间事件的关注，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像是历史学家，其次才是圣训学者。”¹ 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丹尼尔·丹奈特（D. C. Dennett, 1942—）、伊拉克裔英国学者穆罕默德·沙班（M. A. Shaban, 1926—1992）的著作，持续修正韦尔豪森对伍麦叶王朝衰亡原因的解读，但是总体没有跳出韦尔豪森的研究框架，仍然保留了对伍麦叶人建立帝国并发展有效行政体系来维系帝国完整等成就的钦佩。韦尔豪森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使学者们认识到了不以后世价值观来评判古代历史的重要性。韦尔豪森书写伍麦叶历史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一部分历史学家继承了下来，他们批判对待传统文献的同时，相信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可以将其用于重构历史。这些学者往往是伍麦叶王朝的支持者。² 他们在理解了原始史料中固有的宗教观念之后，意识到伍麦叶人所处的艰难历史环境，倾向于以更为积极的态度看待伍麦叶王朝及其在整个伊斯兰历史和阿拉伯帝国中的作用，甚至于更加强调传统文献中对伍麦叶有利的记载。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学界对伍麦叶王朝史研究出现了新进展。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 1945—2015）等人在接受戈德兹、沙赫特和诺斯观点的同时，仍然探寻出了一种使用传统文献的方法。克罗恩在其著作《马上的奴隶》（*Slaves on Horses*）中采用比对人物生平的方法，在该书附录部分附有大量她对历史人物的追踪。³ 她认为，传统文献中的所有信息都不应因其时间滞后性而被视为臆造或主观文学创作。她经过考证如钱币、铭文、非穆斯林文献，检验了传统文献来源中给出的基本信息（如哈里发和总督的姓名以及任期等）后，发现两者大部分情况下相互印证。克罗恩因而强调：历史研究者与其过多关注政治事件，陷入到主观动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迷雾，倒不如重点关注诸如个人身份、部落或派系联盟、姻亲关系，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等细节。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基于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的提出必然会导致对伍麦叶王朝的研究主题逐渐疏离政治事件，而转向对制

1 ‘Abd al-‘Azīz al-Dūrī, *Nash‘at ‘ilm al-tārīkh ‘inda al-‘Arab*, p. 24.

2 除了福莱德·唐纳、帕特里夏·克罗恩外，还有里德旺·赛义德（Redwan Sayyid）、盖尔诺特·罗特（Gernot Rotter）、哈拉德·莫茨基（Harald Motzki）和迈克尔·莱克（Michael Lecker）等。

3 参见 Patricia Crone, *Slaves on Hor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

度建设、社会体系和宗教史等的研究。比如休·肯尼迪（Hugh Kennedy，1947—）就基于传统文献系统研究了早期伊斯兰时期的军事制度史。¹ 麦克尔·莫瑞（M. G. Morony，1939—）就对这一时期的宗教社会史尤其感兴趣。²

西方学界渐已形成基于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对阿拉伯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被誉为阿拉伯历史学之父的阿卜杜·阿齐兹·杜里，曾师从在英国任教的俄裔东方学家弗拉基米尔·明诺斯基（Vladimir V. Minorsky，1877—1966）、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汉密尔顿·吉布（Hamilton Gibb，1895—1971）。³ 杜里指出，早期伊斯兰历史书写的参与者即参与传统的学者受限于时代、环境以及文化和智识上的成熟度，但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历史学家而言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⁴ 言下之意，杜里认为，现当代学者在研究早期伊斯兰史时，不应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杜里更进一步指出，历史的核心要素包括社会、知识以及经济因素，并将其践行到了后来建设巴格达大学历史学系的过程中，他尤其重视早期伊斯兰经济史的研究。他更大胆地提出，“部落传统与伊斯兰”之间的利益纠葛导致了伊斯兰第一次内战和阿拔斯革命。⁵ 杜里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早期伊斯兰史，为阿拉伯学界基于理性和唯物的方法论开展伊斯兰史研究树立了典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他的另一个解读视角——“民族”⁶——就引起了福莱德·唐纳的反对，唐纳认为，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应更多地基于部落和地域，引入民族的概念只会掩盖掉更多值得研究的细节。⁷ 总之，虽然谈不上阿拉伯学界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早期伊斯兰史的研究方法，但是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借鉴，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值得国内学界学习。

除了借鉴国外学界的研究方法外，我们在开展早期伊斯兰史研究时，应时刻谨

1 Hugh Kennedy, *The Armies of the Caliphs: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Islamic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5.

2 参见Michael Morony,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Late Sasanian and Early Muslim Iraq”,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7, No. 2, 1974, pp. 113–135; Michael Morony, *Iraq After the Muslim Conqu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Usama Abd al-Rahman al-Duri, “Abdul Aziz al-Duri and a New Approach of Islamic Historiography”, *Majallat Dirāsāt fī al-tārīkh wa-al-āthār*, No. 60, 2017, pp. 362–363.

4 ‘Abd al-‘Azīz al-Dūrī, *Muqaddimah fī tārīkh šadr al-Islām*, Bayrūt: al-Maṭba‘ah al-Kāthūlīkiyah, 2007, p. 11.

5 ‘Abd al-‘Azīz al-Dūrī, *Muqaddimah fī tārīkh šadr al-Islām*, pp. 56–95.

6 Usama Abd al-Rahman al-Duri, “Abdul Aziz al-Duri and a New Approach of Islamic Historiography”, p. 378.

7 Fred M. Donner, “Modern approaches to early Islamic history”, p. 645.

记两大基本前提：第一，在尝试讨论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应时刻考虑到伊斯兰教动态演进和阿拉伯帝国从建立到兴盛的变化过程，注意辨别后世对伍麦叶的敌意态度。因为伍麦叶王朝要早于穆斯林传统的形成，不可理所当然地接受刻意贬损伍麦叶王朝的态度。第二，有志于早期伊斯兰史研究的学者，不应以阿拉伯帝国无正史遗存而画地为牢，更不应以遗留的传统文献缺乏客观性而庸人自扰。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942—2016）对于“正典”的看法，或许值得借鉴：不加批判地对待正典并理所当然地接受其统治地位，是错误的；无视正典文本中没有展现的历史特性和文化，一样不正确；但是，伪称没有什么正典之类的东西存在，或伪称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不是一项主要的历史事实，仍是迷误。¹

若将传统文献“不恰当”地比作“正典”，无视其所体现的神学思想，是不正确的，而佯装其所有叙述都受到了宗教意识形态的歪曲，则更不应该。正如马克·布洛赫曾言：“头脑简单的人容易轻信，而过分多疑也不可取，它未必能导致积极的后果。”²毕竟，穆斯林传统文献实际上是目前了解伍麦叶历史唯一详细的书面材料，而《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作为编年体史书仍然是关于早期伊斯兰教和伍麦叶时期最完整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两个基本事实构成了开展伍麦叶王朝历史研究的重要前提。最佳的选择是接受传统文献的同时保留我们质疑的权利。³

余 论

西方也并非一开始就跳出了神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迷雾，考古学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为塔西佗记载凶兆祥瑞辩解时称：探讨“共同的信仰”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事情，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根据资料来叙述历史。换言之，蒙田认为，史家以某些自然界或神学界的观念为依据进行哲学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蒙田在其所处的时代还不

1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曹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45页。

3 G. R. Hawting, “The Umayyads and the Hijaz”,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 1972, p. 24.

明白对历史的考辨是完全可行的。这要到17世纪西方历史考据学形成后才被人逐渐意识到。当人们从“怀疑”发展到“考证”时，历史考据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¹西方历史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到17世纪下半叶已达鼎盛时期，其诸多代表人物中，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1638—1712）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据法则，极大地推动了诠释《圣经》文本的工作，同时也标志着《圣经》诠释学的开端。韦尔豪森正是受到了《圣经》诠释学的启发²，开创了利用穆斯林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

但美国早期伊斯兰史研究的文献考据却要迟缓许多，这与中东语言人才培养的滞后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开展中东研究是为了适应冷战的战略需求，20世纪60年代大力推广中东语言人才的培养，促使更多人才投身到包括早期伊斯兰史在内的中东研究中去。伴随着对语言教学的重视，以及派遣更多的学者前往对象国学习，原本单纯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培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且中东史范畴内原本鲜为人知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被后辈学者们挖掘和研究。

受兰克史学所主张的去伪存真、如实直书的影响，国内史学研究也愈益重视一手史料的使用，但在早期伊斯兰史的研究中，需要明晰一手史料的判断标准，同时在研究工作中应重视史料考据的重要性。但不得不说，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的工作。作为研究者而言，应该抛弃所谓的“经世致用”，避免简单的历史概括，既保有必要的怀疑精神研究传统文献，又不陷入虚无主义和纯粹消极的态度，从而打破旧框架，推出新方法。我们应该意识到，轻视考证会在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埋下重重隐患，从而使产出的研究成果带有极大的缺陷，历史学的发展也更加难以推陈出新，为后人的工作不但不会带来便利，反而会产生极大的困惑与阻碍；但也不应为了考证而考证，在考证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是有目的地做有意义的考证。³

1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6页。

2 G. R. Hawting, *The First Dynasty of Islam*, p. 123.

3 参见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9页。

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 梁道远 卡哈尔·阿里木 |

摘要：阿拉伯史学史是研究阿拉伯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交往过程的一门学科，是“多元共存”中东史学史的最庞大分支。古代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经历了孕育、朦胧、明确和自觉四个发展阶段后，形成系统的、专门的史学史撰述。萨哈维《为史正名》从宗教学的角度为史学辩护，捍卫史学的尊严，是古代阿拉伯人撰述史学史的高峰代表作。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现代阿拉伯学界对阿拉伯史学史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初拉开帷幕。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由简单地罗列史家史书目录过渡到深入探讨史家生平和著作以及史学发展概貌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尤以弗朗兹·罗森索尔《穆斯林史学史》最具代表性。阿拉伯学界的代表作则是沙奇尔·穆斯塔法的四卷本《阿拉伯历史与史家》。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才开始起步。赵军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世纪阿拉伯的史学发展》是“拓荒之作”。21世纪以来，阿拉伯学者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奋力追赶西方，出版了数百部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同时，用西文撰写的阿拉伯史学史论著数量也在持续增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也开始走向勃兴。中国学者在21世纪20年代初推出了具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项目批准号：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LSYZD2102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以2023年11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与上海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基地“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建设”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协办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变革：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主题报告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

有标志性意义的“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提要丛书”，但要改变薄弱现状，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

关键词：阿拉伯史学史研究 阿拉伯史学界 西方史学界 中国史学界

何谓“阿拉伯史学史”(تاريخ التأريخ عند العرب)? 简而言之,它指的是阿拉伯历史学的历史。从学科层面上讲,它是研究阿拉伯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交往过程的一门学科,是“多元共存”中东史学史的最庞大分支。¹在目前的中国,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基本对象(即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历史流派、历史观念、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史学方法论、史学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主要任务(即通过探究史学的过去,以揭示它的变化规律和窥测它的发展趋势等)、基本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方法相似)、价值意义(主要体现为史学总结、提供借鉴、指点门径、造就史家和深化史学等)以及学科性质(即反思性质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等,与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相类似。²三者都应当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 1 根据中东的地域特征、历史变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的源流关系和自身特点,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借鉴国内外研究中东历史与史学史的相关成果,可以把阿拉伯史学史、上古两河流域史学史、上古埃及史学史、以色列列国史学史(包括古希伯来史学和现当代以色列史学)、伊朗史学史(包括古波斯史学和伊朗伊斯兰史学)、土耳其史学史(包括奥斯曼帝国史学和现当代土耳其史学)、中东基督教史学史以及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体量不大,但非常特殊)等视为“多元共存”中东史学史的八大分支。此外,还有古叙利亚史学史、古也门史学史、赫梯史学史、柏柏尔史学史、库尔德史学史和亚美尼亚史学史等诸多小分支。因而,笔者把整个中东史学史分支构成体系暂时称为“8+N中东史学史”。如果这个看法符合史学史事实的话,那么,“多元共存”中东史学萌发于约公元前3200年(甚至更早),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最庞大分支阿拉伯史学兴起于公元7世纪中叶,在史学交往的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中古时期中东的主流史学。中古时期的中亚伊斯兰史学和安达卢西阿拉伯史学,属于“8+N中东史学史”的外延构成部分。前者主要由阿拉伯史学和伊朗伊斯兰史学混合构成。后者完全可以划入阿拉伯史学史的范畴。关于“多元共存”中东史学的五千多年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点,参见韩志斌、梁道远:《中东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光明日报》2024年1月15日第14版。
- 2 关于史学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基本对象、主要内容、主要任务、基本方法、价值意义和学科性质,可进一步参见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周文玖的《史学史导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乔治忠的《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谢贵安的《中国史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4页),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3页)和陈恒主编的《外国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1—17页)等著作。

中国气派的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不可或缺构成部分。

阿拉伯史学的萌发时间（公元7世纪中叶），虽然比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晚近得多，但它迅猛地发展成“多元共存”中东史学的主流分支，在中古时期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在世界史学奇葩丛中璀璨耀人。一些眼光锐利的全球史学史研究者，甚至把阿拉伯史学视为可与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鼎足而三”的世界史学传统之一。¹因此，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历史学习者和爱好者，很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阿拉伯史学，特别是光耀灿烂的中古时期阿拉伯史学。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阿拉伯史学史（甚至中东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必须认真审视国内外学者在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方面已取得的成就、总结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做重复工作，早日达到该研究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一、古代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

世界范围内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萌芽于古代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滋生时期。史学史意识是史学发展到需要做总结阶段，才被敏锐的史学家捕捉到的一种意识。²它与史学史撰述、史学史研究的关系，正如历史意识与历史记录、历史研究的关系，先有前者的累积，才有后两者的开端。一般而言，史学史意识孕育于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经朦胧阶段到明确阶段，再到自觉阶段，然后诞生系统的史学史撰述短文甚至专著。

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孕育于阿拉伯史学的初兴与成长过程中。完成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下半叶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史籍只剩下书名幸存至今。那些书中的内容只有部分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反复转引才得以残存下来。因而，我们无法确切地判断阿拉伯人从何时开始滋生朦胧的史学史意识。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āq，约704—768）被一些学者誉为“第一位阿拉伯史学大师”“史家长老”和“武功纪与先知传伊玛

1 陈恒主编：《外国史学史》，第5页。

2 有关中国人的史学史意识论述，可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0—245页。

目”。¹他的《先知传》(*al-Sīrah al-Nabawīyah*)糅合了也门历史学派、麦地那历史学派和伊拉克历史学派的精华。²在他的总结前人成果的意识中,可能混杂着些许朦胧的史学史意识。但该书早已散佚,只有他的再传弟子伊本·希沙姆(Ibn Hishām, ?—约834)以此为蓝本编修而成的《先知传》(*al-Sīrah al-Nabawīyah*)流传至今。伊本·希沙姆在追溯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谱后,言明了他的编纂方法和处理史料的方法。³虽然他的史学方法意识已经非常明确,但他没有对先知传编纂史进行回顾。

瓦基迪(al-Wāqidī, 747—823)是较早表现出朦胧史学史意识的优秀阿拉伯史学家。他的《武功纪》(*Kitāb al-Maghāzī*)是武功纪学(‘Ilm al-Maghāzī)的集大成之作。⁴他在该书绪论中说:

欧麦尔·本·奥斯曼·本·阿卜杜·拉哈曼·本·萨义德·本·叶尔布俄·麦赫祖米、穆萨·本·穆罕默德·本·伊卜拉欣·本·哈黎思·塔米米、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穆斯林、穆萨·本·叶尔孤卜·本·阿卜杜拉·本·瓦赫卜·本·扎默阿、阿卜杜拉·本·贾法尔·本·阿卜杜·拉哈曼·本·米斯瓦尔·本·马赫拉玛、艾布·伯克尔·本·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艾比·萨波拉、萨义德·本·奥斯曼·本·阿卜杜·拉哈曼·本·阿卜杜拉·贴米、优努斯·本·穆罕默德·左发利、阿伊孜·本·叶哈雅、穆罕默德·本·阿慕尔、穆阿孜·本·穆罕默德·安索利、叶哈雅·本·阿卜杜拉·本·艾比·葛塔达、阿卜杜·拉哈曼·本·阿卜杜·阿齐

1 梁道远、洪娟编著:《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5页。

2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页。

3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Ibn Hishām, *al-Sīrah al-Nabawīyah*)第1卷,欧麦尔·阿卜杜·萨腊姆·塔德穆利注,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1990年,第18—19页。

4 武功纪学,是一门搜集、辑录和编纂先知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学问。它又被一些阿拉伯学者称为“武功纪与先知传记学”(‘Ilm al-Maghāzī wa-al-Siyar),是先知传记学(‘Ilm al-Siyar)的早期发展阶段。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学术史大师塔什库鲁扎德(Taşköprülüzade, 1495—1561)说:“这门学问固然是史学分支之一,但它又与圣训(al-Aḥādīth)和贤德遗训(al-Āthār)密切相关。我们把它视为圣训学分支之一。”参见塔什库鲁扎德:《幸福钥匙与黑暗明灯:诸学问题》(Ahmad ibn Mustafā (al-Shahīr bi-Tāshkubrī Zādah), *Miftāh al-Sa‘ādah wa-Misbāh al-Siyādah fī Mawdū‘āt al-‘Ulūm*)第2册,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553页。

兹·本·阿卜杜拉·本·奥斯曼·本·胡奈夫、伊本·艾比·哈碧芭、穆罕默德·本·叶哈雅·本·萨赫勒·本·艾比·哈思玛、阿卜杜·哈密德·本·贾法尔、穆罕默德·本·索里哈·本·迪纳尔、阿卜杜·拉哈曼·本·穆罕默德·本·艾比·伯克尔、叶尔孤卜·本·穆罕默德·本·艾比·索尔索阿、阿卜杜·拉哈曼·本·艾比·齐纳德、艾布·马俄沙尔、马立克·本·艾比·利贾勒、伊斯玛仪·本·伊卜拉欣·本·欧戈巴、阿卜杜·哈密德·本·易姆兰·本·艾比·艾尼斯、阿卜杜·哈密德·本·艾比·阿卜斯等，所有这些人告诉我的以及其他人告诉我的，我都写了下来。¹

上述25个人，要么是武功纪口传纪事家，要么是武功纪编纂家。瓦基迪一次性提及这些人名，其实是在进行最简单的武功纪学术史回顾。他们并非传统阿拉伯史学的伊斯纳德（al-Isnād）传述线索中的传述人。²瓦基迪只是罗列人名。这些人名之间没有明确的、连续的知识传承关系，即他们没有前后相继地传述同一史事或同一部书。传统阿拉伯史学的伊斯纳德传述线索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全书开头的书籍流传线索。比如，哈桑·巴士里（al-Hasan al-Basrī, 642—728）的《麦加特色及其住宅》（*Fadā'il Makkah wa-al-Sakan fī-hā*），是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地方志。笔者所见的伊拉克学者萨米·马奇·阿尼（Sāmī Makkī al-ʿĀnī, 1933—2013）校勘本（科威特：法拉哈书店，1980年），其开头的名字串就是该书的流传线索。该线索中的第一个人物是谢赫、教法学家、哈菲兹艾布·法德勒·贾法尔·本·哈桑·本·贾法尔·哈姆达尼。从他开始一直往前追溯到该书的作者哈桑·本·艾比·哈桑·巴士里。在两者之间还有十多个传述人。但相邻两个传述人之间都用“他说”（qāla）来连接。这说明他俩之间有明确的、连续的知识传承关系。

1 瓦基迪：《武功纪》（al-Wāqidi, *Kitāb al-Maghāzī*）第1卷，马斯登·琼斯校勘，贝鲁特：书籍世界，1984年，第1—2页。此处的人名音译主要参照梁道远、洪娟编著的《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附录3《人名音译表》（第900—1372页）。本文涉及的绝大部分阿拉伯人名翻译，也参照此表。

2 关于伊斯纳德被精通圣训的史学家们引入阿拉伯史学的论述，参见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第6页。关于圣训学术语“伊斯纳德”，参见杨克礼：《伊斯纳德》，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706页。

第二种，史事传述线索。在传统阿拉伯史学典籍中，这种传述线索很常见。《苏莱姆·本·盖斯·希腊里书》(*Kitāb Sulaym ibn Qays al-Hilālī*)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纪事与圣训集。苏莱姆·盖斯(Sulaym Qays, 620—714)在该书中大量使用伊斯纳德传述线索。比如，“苏莱姆说：我听萨勒曼·法里斯说……”和“苏莱姆说：阿里·本·艾比·塔里卜告诉我说：……”等。¹

从表面上看，以上两种史学伊斯纳德的传述线索虽然都是一串名字，但都与瓦基迪简单回顾武功纪学术史的名字串样式不同。我们不能把史学伊斯纳德的传述线索视为朦胧的史学史意识。因为这种线索反映的是史料或书籍的传播过程，而不是对一门学问发展程度的总结。史学史意识应当是一种对过去史学发展进行总结的意识。毫无疑问，瓦基迪在朦朦胧胧中具有了这种意识。

9世纪，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由朦胧阶段向明确阶段发展。大文豪贾希兹(al-Jāhiz, 约780—869)在《动物志》(*al-Hayawān*)中使用了类似于瓦基迪简述学术史的方法，集中罗列族谱学家的名单；在《解释与阐明》(*al-Bayān wa-al-Tabyīn*)中罗列了族谱学家和纪事家名单。²但他在集中介绍安巴尔家族(Banī al-‘Anbar)、蒙兹尔家族(Banī al-Mundhir)、胡尔孤斯家族(Banī Hurqūs)、伍赛伊德家族(Banī Usayyid)、阿慕尔家族(Banī ‘Amr)、古莱什家族(Banī Quraysh)、呼札仪家族(Banī Khuzā‘ī)、卡勒卜家族(Banī Kalb)、奇纳乃家族(Banī Kinānah)、莱思家族(Banī Layth)、沙达赫家族(Banī al-Shaddākh)以及达阿卜家族(Āl Da‘b)等家族的族谱学家和纪事家们时，还提到了一些族谱学家和纪事家的生平事迹及其学识。³族谱学家、纪事家和圣训学家是早期阿拉伯史学的“三大治史群体”。因而，笔者认为，贾希兹是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由朦胧阶段向明确阶段过渡的代表人物。

1 苏莱姆·本·盖斯·希腊里：《苏莱姆·本·盖斯·希腊里书》(Sulaym ibn Qays al-Hilālī, *Kitāb Sulaym ibn Qays al-Hilālī*)第2卷，穆罕默德·拔基尔·安索利·赞贾尼·呼伊尼校勘，库姆：达里勒玛出版社，2007年，第565、569页。

2 贾希兹：《动物志》(Abū ‘Uthmān ‘Amr ibn Bahr al-Jāhiz, *al-Hayawān*)第3卷，阿卜杜·萨腊姆·穆罕默德·哈伦校注，开罗：穆斯塔法·巴巴·哈拉比及其后裔书店与出版公司，1965年，第209—210页；贾希兹：《解释与阐明》(Abū ‘Uthmān ‘Amr ibn Bahr al-Jāhiz, *al-Bayān wa-al-Tabyīn*)第2卷，阿卜杜·萨腊姆·穆罕默德·哈伦校注，开罗：汗吉书店，1998年，第323—324页。

3 贾希兹：《解释与阐明》第1卷，第318—324页。

比贾希兹稍微晚近一些的伊本·古台巴（Ibn Qutaybah，828—889），则是在著作中表露明确史学史意识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知识》（*al-Ma'ārif*）是9世纪最著名的阿拉伯历史文化知识百科全书。其中的“族谱学家与纪事家”（*al-Nassābūn wa-Ashāb al-Akhhbār*）一章，介绍了20名族谱学家和纪事家的生平事迹、学识以及著作。¹这部分内容虽然简略，但所体现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已经非常明确，无疑是后来学者们研究早期阿拉伯史学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0世纪，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向自觉阶段发展。一些敏锐学者开始尝试着把史学（又被一些学者称为“纪事学”[*ʿilm al-Akhhbār*]）自身作为单独的探讨内容。艾布·栽德·巴勒黑（Abū Zayd al-Balkhī，849—934）的《纪事学优点》（*Kitāb Fadīlat ʿilm al-Akhhbār*），可能是阿拉伯史学家专门为史学辩护和阐述其裨益的早期代表作。但遗憾的是，这篇短文早已失传。²麦斯欧迪（*al-Masʿūdī*，？—957）在《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Maʿādin al-Jawhar*）的第一章中，通过以下三种叙述方式专门回顾和评价了阿拉伯史学的成就。

首先，罗列史学家名单。他说：³

-
- 1 这20名族谱学家和纪事家分别是：1. 达厄发勒（*Daghfal*，？—685）；2. 欧贝德·沙利耶（*ʿUbayd Sharīyah*，？—约686）；3. 伯克利（*al-Bakrī*，？—约762）；4. 伊本·里桑·宏默拉（*Ibn Lisān al-Hummarah*，7世纪）；5. 伊本·多姆多姆（*Ibn Damdam*，？）；6. 索里哈·哈乃斐（*Sālih al-Hanafī*，？）；7. 凯斯·尼姆利（*al-Kays al-Nimrī*，7世纪）；8. 伊本·考沃（*Ibn al-Kawwā*，？—约699）；9. 舒贝勒·独巴仪（*Shubayl al-Dubāʿī*，？—约757）；10. 撒伊卜·凯勒比（*al-Sāʿib al-Kalbī*，？—692）；11. 伊本·撒伊卜·凯勒比（*Ibn al-Sāʿib al-Kalbī*，？—763）；12. 伊本·凯勒比（？—819）；13. 穆贾里德·哈姆达尼（*Mujālid al-Hamdānī*，？—762）；14. 艾布·米赫纳夫（*Abū Mikhnaf*，？—774）；15. 伊本·达阿卜（*Ibn Daʿb*，？—787）；16. 欧特比·巴士里（*al-ʿUtībī al-Basrī*，？—843）；17. 麦达伊尼（*al-Madāʿinī*，752—840）；18. 海塞姆（*al-Haytham*，732—822）；19. 曼图夫（*al-Mantūf*，？—775）；20. 沙尔基（*al-Sharqī*，？—约772）。参见伊本·古台巴：《知识》（*Abū Muhammad ʿAbd Allāh ibn Muslim ibn Qutaybah, al-Maʿārif*），塞尔瓦特·欧卡沙校注，开罗：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534—539页；梁道远、洪娟编著：《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上册，第87—88页。
- 2 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家：伊斯兰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史学人物知识研究》（*Shākir Mustafā, al-Tārīkh al-ʿArabī wa-al-Muʿarrikhūn: Dirāsah fī Tatawwur ʿilm al-Tārīkh wa-Maʿārif Rijālīhi fī al-Islām*）第2卷，贝鲁特：大众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78—79页；吉哈德·阿卜杜·侯赛因·欧拉沃尼、吉南·葛哈塘·杰密勒·阿尼：《艾布·栽德·巴勒黑的生平及其学术经历》（*Jihād ʿAbd Husayn al-ʿUlwānī, Jinān Qahtān Jamīl al-ʿĀnī, “Abū Zayd al-Balkhī [T. 322 H./934 M.] Hayātuhi wa-Sīratuhi al-ʿIlmiyah”*），《安巴尔夫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Majallat al-Anbār lil-ʿUlūm al-Insāniyah*）2012年第3期。
- 3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Abū al-Hasan ʿAlī ibn al-Husayn ibn ʿAlī al-Masʿūdī, Murūj al-Dhahab wa-Maʿādin al-Jawhar*）第1卷，赛达 & 贝鲁特：现代书店，2005年，第11页。

人们已经先后相继地撰著了历史书与纪事集。部分人已功成名就，同时有些人遭挫止步，但所有人均已全力以赴，都使其聪明才智展露无遗，比如：瓦赫卜·本·穆纳比赫¹、艾布·米赫纳夫·罗得·本·叶哈雅·阿米利²、穆罕默德·本·伊斯哈格³、瓦基迪⁴、伊本·凯勒比⁵、艾布·欧贝达·马俄默尔·本·穆尚纳⁶、艾布·阿拔斯·哈姆达尼⁷、海塞姆·本·阿迪·拓伊⁸、沙尔基·本·古拓米⁹、韩玛德·拉威耶¹⁰、艾斯默仪¹¹、萨赫勒·本·哈伦¹²、

- 1 瓦赫卜·穆纳比赫 (Wahb Munabbih, 约654—732)，是也门历史学派的主要奠基人，所著《冠冕：希木叶尔列王》主要记载前伊斯兰时期也门的历史故事、诗歌文学和列王事迹。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节省篇幅，除了明确标出参考文献的译注外，下文的绝大部分译注内容均出自梁道远编著的《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及其与洪娟编著的《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
- 2 艾布·米赫纳夫 (Abū Mikhnaf, ? —774)，是8世纪著述量最多的阿拉伯史学家之一，有《侯赛因殉难及其家人与追随者被害于卡尔巴拉》《骆驼 (战役)、绥芬 (战役) 与奈赫赖万 (战役)》《穆赫塔尔·本·艾比·欧贝德·塞格斐纪事》以及《泰夫战役》等著作传世。
- 3 此处极有可能指的是上文提及的“第一位阿拉伯史学大师”伊本·伊斯哈格。
- 4 即上文提及的瓦基迪，一生著述三十多部，有《武功纪》《叛乱》《征服埃及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与呼罗珊》《征服杰齐拉、哈布尔、迪亚巴克尔与伊拉克》《征服沙姆》以及《征服伊非里基亚》等著作传世。
- 5 伊本·凯勒比 (Ibn al-Kalbī, ? —819)，是“族谱学家之长老”和“伊拉克历史学派奠基人”，所著《族谱集》(或名《谱系集》，或《大族谱》)是对早期阿拉伯族谱学成就的大汇总。此外，他的传世作品还有《马阿德与大也门族谱》和《蒙昧时期与伊斯兰时期马血统及其纪事》等。
- 6 艾布·欧贝达 (Abū 'Ubaydah, 728—824)，一生著述约两百种，包括《部落》《迪拔吉》《马》和《先知妻妾及其子嗣名单》等。
- 7 极有可能指的是伊本·欧达达 (Ibn 'Uqdah, 863—944)，著有《信士长官美德》《历史》《人物》《艾布·哈尼法纪事及其穆斯林》《库法特色》《信士长官诸战之见证者名单》《栽德及其纪事》和《叶哈雅·本·侯赛因·本·栽德及其纪事》等。
- 8 海塞姆·阿迪 (al-Haytham 'Adī, 732—822)，一生著述五十多种，包括《编年史》《波斯人纪事》《法学家与圣训学家层级传》《疯子纪事》《妇女》《国家》《哈里发史》《哈瓦利吉派》《库法地志》《蒙昧时期古莱什淫妇及其私生子名单》《与释奴联姻者之阿拉伯人》和《长寿者》等，但全部已散佚。
- 9 伊本·古拓米 (Ibn al-Qutāmī, ? —约772)，是圣训学家、文学家、纪事家和口传族谱学家。
- 10 韩玛德·拉威耶 (Hammād al-Rāwiyah, 约694—约772)，所著《韩玛德书》(又名《韩玛德纪事》)是泰伯里 (al-Tabarī, 839—923)《历代先知与帝王史》和艾布·法拉吉·艾斯法哈尼 (Abū al-Faraj al-Asfahānī, 897—967)《诗歌集》等著作的史料来源之一。
- 11 艾斯默仪 (al-Asma'ī, 740—832)，被哈里发哈伦·拉施德 (786—809年在位)称为“诗魔”，一生著述50余种，所著《早期阿拉伯列王史》(即《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史》)，从“第一位阿拉伯国王”盖哈唐开始，叙述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列王的生平、政策、教训、诗歌、演讲及其战争等历史故事。
- 12 萨赫勒·哈伦 (Sahl Hārūn, ? —830)，是阿拉伯化的口传波斯族谱学家，著有《国王举措与政策》。

阿卜杜拉·本·穆格发¹、叶齐迪²、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欧特比³、伍麦维⁴、艾布·栽德·萨义德·本·奥斯·安索利⁵、纳得尔·本·舒梅勒⁶、阿卜杜拉·本·阿依莎⁷、艾布·欧贝德·伽斯姆·本·萨腊姆⁸、阿里·本·穆罕默德·麦达伊尼⁹、达玛孜·本·鲁斐俄·本·萨拉玛¹⁰、穆罕默德·本·萨腊姆·朱默希¹¹、艾布·奥斯曼·阿慕尔·本·巴哈尔·贾希兹¹²、艾布·栽德·欧

- 1 伊本·穆格发 (Ibn al-Muqaffa', 724—759), 把《列王传》和《霍斯劳一世传》等典籍从古波斯文翻译成阿拉伯文。
- 2 可能指的是叶齐迪家族中的某位史学家。属于该家族的伊卜拉欣·叶齐迪 (Ibrāhīm al-Yazīdī, ? —840) 著有《天房建造及其纪事》。伊斯玛仪·叶齐迪 (Ismā'il al-Yazīdī, ? —约884) 著有《诗坛层级传》。穆罕默德·叶齐迪 (Muhammad al-Yazīdī, 843—922) 著有《记录》《阿拔斯人功德》和《叶齐迪人纪事》。
- 3 欧特比·巴士里 (al-'Utbi al-Basrī, ? —843), 著有《马》《游牧阿拉伯人》和《品德》。
- 4 此处是指萨义德·本·叶哈雅·伍麦维 (Sa'īd ibn Yahyā al-Umawī, ? —863), 著有《传记》。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Shams al-Dīn Muhammad ibn 'Abd al-Rahman al-Sakhāwī, *al-I'lān bi-al-Tawbikh li-man dhamma Ahl al-Tawrikh*), 撒里姆·本·加塔尔·本·撒里姆·诸费利校勘, 叶雅得: 苏梅仪出版社, 2017年, 第504页;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 第99页。
- 5 艾布·栽德·安索利 (Abū Zayd al-Ansārī, 737—830), 是著名文学家、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族谱学家, 著有《阿拉伯家族》。
- 6 伊本·舒梅勒 (Ibn Shumayl, 740—819), 是杰出的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圣训学家、文学家、诗人、教法学家、韵律学家和族谱学家, 所著《记述》由五大部分内容构成: 1. 创造人类、慷慨大方和女性特征。2. 帐篷、家宅、山峦、小路和财产。3. 骆驼。4. 羊、鸟、日、月、夜晚、白昼和奶等。5. 谷物、葡萄园、豆类、树木、沟渠、云和雨。
- 7 可能指的是伊本·阿依莎 (Ibn 'Ā'ishah, 约758—843), 精通阿拉伯族谱。
- 8 艾布·欧贝德 (Abū 'Ubayd, 774—839), 是圣训学家、教法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族谱学家, 一生著述20多种, 包括流传至今的《族谱》和《钱》。《钱》与艾布·优素福 (Abū Yūsuf, 731—798) 的《税》并称为“关于伊斯兰金融体系的两部最重要著作”。
- 9 麦达伊尼 (al-Madā'inī, 752—840), 一生撰著240多种, 包括: 20多种先知纪事类, 如《武功纪》; 30余种古莱什部落纪事类, 如《古莱什族谱及其纪事》; 20余种贵族妻室和妇女纪事类; 7种哈里发纪事类, 如《大哈里发纪事》; 20多种历史事件与名人小传类; 30多种征服史; 10种阿拉伯人纪事; 30余种诗坛纪事以及40多种其他类, 如《麦地那志》和《麦加志》等。大部分作品已佚, 流传至今的有《悼念》和《古莱什再婚妇女》。
- 10 达玛孜 (Damādh, ? —约824), 是上述艾布·欧贝德 (728—824) 的书吏, 学习了后者在族谱、纪事和功绩等方面的知识。
- 11 伊本·萨腊姆·朱默希 (Ibn Sallām al-Jumahī, 767—846), 所著《诗坛层级传》(又名《诗坛杰才层级传》), 把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诗人群体各分为10个层级。此外, 还著有《侠客诗坛层级传》《阿拉伯家族》和《古莱什族谱》等。
- 12 即上文提及的贾希兹。除了《解释与阐明》和《动物志》, 他的传世作品还有《冠冕: 列王品德》《奥斯曼派》以及《歌手层级传》《妇女》和《论栽德派与拒绝派》等诸多短文。

麦尔·本·沙巴·努梅利¹、祖拉基·安索利²、艾布·撒伊卜·麦赫祖米³、阿里·本·穆罕默德·本·苏莱曼·瑙发里⁴、祖贝尔·本·巴卡尔⁵、英吉里(al-Injīlī)、利雅什⁶、伊本·阿比德⁷、欧玛拉·本·瓦斯玛·米斯利⁸、尔撒·本·拉希阿·米斯利⁹、阿卜杜·拉哈曼·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哈卡姆·米斯利¹⁰、艾布·哈撒恩·齐雅迪¹¹、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米¹²、艾布·贾法

- 1 伊本·沙巴(Ibn Shabbah, 789—876), 是诗人、文学家、史学家、教法学家、圣训背诵家和族谱学家, 著有《麦地那纪事》《巴士拉纪事》《阿拉伯日子集录》《库法》《麦加》《库法埃米尔》《巴士拉埃米尔》《麦地那埃米尔》《麦加埃米尔》《素丹》《奥斯曼殉难》《书吏》《历史》《曼苏尔纪事》《诗歌集》和《诗坛层级传》等。
- 2 我们暂时无法确定“祖拉基·安索利”指的是哪位人物。萨姆阿尼(al-Sam‘ānī, 1113—1167)在《谱系》中提到这些人物: 1. 哈黎思·本·穆赫拉德·祖拉基·安索利; 2. 韩左拉·本·盖斯·祖拉基·安索利; 3. 阿里·本·叶哈雅·本·赫腊德·本·拉菲俄·祖拉基·安索利。参见萨姆阿尼:《谱系》(Abū Sa‘d ‘Abd al-Karīm ibn Muhammad ibn Mansūr al-Tamīmī al-Sam‘ānī, *al-Ansāb*)第6卷, 阿卜杜·拉哈曼·本·叶哈雅·穆阿里米·也玛尼校注, 开罗: 伊本·泰米叶书店, 1980年, 第268页。
- 3 萨哈维(al-Sakhāwī, 1427—1497)的《为史正名》(第503页)只是袭用了这个人名, 未做进一步解释。更详细信息, 可参见伊卜拉欣·索波利:《艾布·撒伊卜·麦赫祖米纪事与评论》(Ibrāhīm Sabrī Mahmūd Rāshid, *Abū al-Sā‘ib al-Makhzūmī: Akhbāruhu wa-Naqdātuhu*), 利雅得: 叶玛麦报业公司, 1997年。
- 4 阿里·瑙发里(‘Alī al-Nawfālī, 约卒于9世纪上半叶), 所著《纪事》记载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史事。
- 5 祖贝尔·巴卡尔(al-Zubayr Bakkār, 788—870), 是纪事家、诗人和族谱学家, 一生著述约40种, 有《穆瓦发基雅纪事》《先知妻妾选集》和《古莱什族谱及其纪事集》等著作传世。
- 6 即艾布·法得勒·利雅什(Abū al-Fadl al-Riyāshī, ?—871), 是语法学大家、语言学家, 精通阿拉伯日子(Ayyām al-‘Arab), 著有《马》和《骆驼》等。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 第504页; 雅孤特·哈默维:《文豪辞典》(Yāqūt al-Hamawī al-Rūmī, *Mu‘jam al-Udabā’*)第4卷, 伊哈桑·阿拔斯校勘, 贝鲁特: 伊斯兰西方出版社, 1993年, 第1483—1485页。
- 7 伊本·阿比德(Ibn ‘Ābid, 生活于9世纪), 著有《列王与历代民族纪事》。
- 8 此处的“瓦斯玛”(Wasīmah)可能有误。伊本·瓦西玛(Ibn Wathīmah, ?—902)的片段名号谱系是艾布·利法阿·欧玛拉·本·瓦西玛·本·穆萨·本·福拉特·法里斯·米斯利, 著有编年史《历史》。
- 9 伊本·拉希阿(Ibn Lahī‘ah, ?—871), 即艾布·穆罕默德·尔撒·本·拉希阿·伍尔都里·米斯利, 是圣训学家和纪事家, 著有《骆驼与奴隶》(*al-Halā‘ib wa-al-Jalā‘ib*)。2021年, 叶哈雅·阿卜杜拉·昆杜利(Yahyā ‘Abd Allāh al-Kundurī)整理和研究的该书残卷由科威特阿拉伯马中心出版。参见<https://www.ifao.egnet.net/recherche/manifestations/ma1599>, 访问日期: 2024年3月6日。
- 10 伊本·阿卜杜·哈卡姆(Ibn ‘Abd al-Hakam, 803—871), 是9世纪埃及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有《征服埃及及纪》《征服伊非里基亚与安达卢西》和《征服埃及与马格里布》等著作传世。
- 11 哈桑·齐雅迪(al-Hasan al-Ziyādī, 773—857), 是瓦基迪的得意弟子之一, 著有《诗坛层级传》《诗坛别号》《父与母》和《编年史》等。
- 12 花拉子米(al-Khwārizmī, 约781—约850), 所著《地形》是对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约90—168)《地理学导言》的改编和增补。

尔·穆罕默德·本·艾比·西利¹

其次，提到史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名称。他接着写道：²

《国家》的作者穆罕默德·本·海塞姆·本·沙拔巴·呼罗萨尼³，《诗歌集》等的作者伊斯哈格·本·伊卜拉欣·摩苏里⁴，《战争计谋与韬略》等的作者赫里勒·本·海塞姆·哈尔塔米⁵，穆罕默德·本·叶齐德·穆巴拉德·艾兹迪⁶，穆罕默德·本·苏莱曼·敏格利·焦哈利⁷，《慷慨》等的作者穆罕默德·本·扎卡利雅·加腊比·米斯利⁸，穆克塔菲比拉的太傅伊本·艾比·敦雅⁹，艾哈迈

1 伊本·艾比·西利 (Ibn Abī al-Sirrī, ? —862)，编撰了历史著作，但书名未可知。参见穆多尔·阿德南·第勒法哈：《史学家伊本·艾比·西利·艾兹迪及其历史著作》(Mudar ‘Adnān Tilfāh, “al-Mu’arrikh Ibn Abī al-Sirrī al-Azdī [247/248 AH-861/862 AD] wa-Kitābuhu fī Tārīkh”)，《穆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版）》(Mu’tah lil-Buhūth wa-al-Dīrāsāt: Silsilat al-‘Ulūm al-Insāniyah wa-al-Ijtīmā’iyah) 2016年第31卷第6期，第243—286页。

2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第1卷，第11—12页。

3 伊本·海塞姆 (Ibn Haytham, ? —约864) 的《国家》是一部阿拔斯王朝史。

4 伊本·纳迪姆 (Ibn al-Nadīm, 约932—约990) 把伊斯哈格·摩苏里 (Ishāq al-Mawṣilī, 767—850) 的这部著作记载为《大诗歌集》(Kitāb al-Aghānī al-Kabīr)。参见伊本·纳迪姆：《目录》(Abū al-Faraj Muhammad ibn Ishāq al-Nadīm, Kitāb al-Fihrist) 第1卷第2分册，埃曼·福阿德·赛义德注释，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2009年，第437页。

5 此处的“哈尔塔米”在萨哈维的《为史正名》中记载为“哈尔塞米”(al-Harthamī)。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第492页。

6 穆巴拉德 (al-Mubarrad, 826—898)，是语言学大家、巴士拉语法学派的领袖之一、文学家、诗人、纪事家和族谱学家，所著《语言文学大全》虽然是一部语言文学著作，但包含大量重要历史信息。此外，他还有《阿德南与葛哈塘族谱》传世。

7 萨哈维在《为史正名》中只是沿用了“穆罕默德·本·苏莱曼·敏格利·焦哈利”这个人名。扎哈比 (al-Dhahabī, 1274—1348) 为他立传，简要提及他的3位老师和2名学生。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第501页；扎哈比：《伊斯兰史与诸杰群英辞世录》(Shams al-Dīn Muhammad ibn Ahmad ibn ‘Uthmān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wa-Wafayāt al-Mashāhīr wa-al-‘Alām) 第20卷，欧麦尔·阿卜杜·萨腊姆·塔德穆利校勘，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1992年，第446页。

8 除了《慷慨》和流传至今的《骆驼战役》外，加腊比 (al-Ghallabī, ? —911) 的著作还有《侯赛因·本·阿里殉难》《绥芬战役》《哈拉(战役)》《信士长官阿里殉难》《陶瓦宾(起义)与艾因瓦尔达(战役)》《栽德纪事》《法蒂玛纪事》和《代表团》等。

9 伊本·艾比·敦雅 (Ibn Abī al-Dunyā, 823—894)，一生著述约两百种，包括流传至今的《信士长官阿里·本·艾比·塔里卜殉难》和已失传的《武功纪》《列王纪事》《哈里发史》《历史》《层级传》《奥斯曼殉难》《侯赛因殉难》《托勒哈殉难》《祖贝尔殉难》《伊本·祖贝尔殉难》《穆阿维叶纪事》《苏福彦纪事》《古莱什纪事》和《阿拔斯美德》等。

德·本·穆罕默德·呼札仪（以“哈伽尼·安塔其”著称）¹，艾布·叶齐德·易玛拉·本·栽德·麦迪尼的同伴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马哈富兹·白拉维·安索利²，《阐明》的作者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本·哈里德·白尔基·卡提卜³，名著《巴格达纪事》等的作者艾哈迈德·本·艾比·拓熙尔⁴，伊本·瓦沙⁵，名著《伍麦叶人纪事》等的作者阿里·本·穆贾希德⁶，《阿拔斯王朝》等的作者穆罕默德·本·索里哈·本·纳拓哈⁷，《伊卜拉欣·本·马赫迪纪事》等的作者优素福·本·伊卜拉欣⁸，呈给法特哈·本·哈甘的名著《列王品德》等的作者穆罕默德·本·哈黎思·塞尔拉比⁹，《阿拉伯诗行》的作者艾布·萨义德·苏卡利¹⁰。

最后，评价一些著名史学家的成就及其著作的价值，介绍它们的内容，分析编撰方法和著述风格等。¹¹麦斯欧迪把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约820—

1 此处的“哈伽尼”又被写成“哈尼伽尼”（al-Khāniqānī）。艾哈迈德·哈尼伽尼（Ahmad al-Khāniqānī，？—1009），著有《哈尼伽尼史》（或被记载为《哈伽尼史》）。

2 白拉维（al-Balawī，？—约952），著有突伦王朝创始人艾哈迈德·本·突伦（868—884年在位）的传记《艾哈迈德·本·突伦传》。

3 除了《阐明：巴格达纪事》，伊本·穆罕默德·白尔基（Ibn Muhammad al-Barqī，？—893）的著作还有《人物》《第一》《历史》《骆驼（战役）》和《先知武功纪》等。

4 艾哈迈德·本·艾比·拓熙尔即伊本·推富尔（Ibn Tayfūr，819—893）。他的《巴格达纪事》原稿凡13卷，从巴格达建城（762）写到哈里发穆赫塔迪时期（869—870）。残存的第6卷从麦蒙（813—833年在位）自呼罗珊前往巴格达（819）写到他崩逝，是流传至今关于哈里发麦蒙及其黄金时代的最古老阿拉伯史学著作。

5 可能指的是瓦西玛·瓦沙（Wathīmah al-Washshā’，？—851），著有《叛乱纪事》和《哈里德·本·瓦立德纪事》等。也可能是穆罕默德·瓦沙（Muhammad al-Washshā’，？—937），著有《赞吉起义者纪事》和《穆塔左拉法特纪事》。

6 即伊本·卡布里（Ibn al-Kābulī，718—798），除了《伍麦叶人纪事》，还著有《武功纪》。

7 伊本·纳拓哈（Ibn al-Nattāh，？—866）的著作除了《阿拔斯王朝》，还有《栽德·本·阿里殉难》《阿拉伯宗族》《阿曼艾兹德谱系》和《家族》等。

8 即优素福·达耶（Yūsuf al-Dāyah，795—约878），除了《伊卜拉欣·本·马赫迪纪事》，还著有《医者纪事》《艾布·努沃斯纪事及其诗选》和《占星家纪事》等。

9 穆罕默德·塞尔拉比（Muhammad al-Tha’labī，？—约864）的《列王品德》曾被一些阿拉伯学者误认为是贾希兹所写。

10 苏卡利（al-Sukkārī，827—888），是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文学家，喜好收集著名诗人的作品和部落的历史故事。除了《阿拉伯诗行》，他还编撰了《佳诗与部落》和《阿卜杜·穆塔里卜人谱系》等著作。

11 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第1卷，第12—14页。

约913)推崇为“著述之伊玛目”，言明他大量参考了后者的《道里邦国志》(*al-Masālik wa-al-Mamālik*)。他提到穆罕默德·本·阿里·侯赛尼·阿拉维·迪纳瓦利的史书从生写到死，从先知穆罕默德归真(632)之后写到阿拔斯王朝第16任哈里发穆尔塔迪德时期(892—902)。他把白拉祖里(*al-Balādhurī*, ?—892)的《征服各地》(*Futūh al-Buldān*)视为最佳的征服史著作。¹紧接着，他简单罗列介绍了杰拉哈家族达乌德·杰拉哈(*Dāwūd al-Jarrāh*, ?—904)编的《历史》²，伊本·伍赫特(*Ibn Ukht*, ?)的从前伊斯兰时期写到932年的史集³，穆纳吉姆家族艾布·尔撒·穆纳吉姆(*Abū ‘Isā al-Munajjim*, ?—约932)的《世界编年史》⁴，哈里德·本·希沙姆(*Khālid ibn Hishām*, ?)的《伍麦叶家族史》⁵，杜腊比(*al-Dūlābī*, 839—923)的历史著作⁶，法官瓦其俄(*Wakī‘*, ?—918)的历史书及其他纪事集⁷，穆罕默德·本·哈里德·哈希米(*Muhammad ibn Khālid al-Hāshimī*, ?)的传记和纪事书⁸，艾布·伊

1 麦斯欧迪还提到白拉祖里的史书。他所指的该书可能是《贵族谱系》(*Kitāb Jumal min Ansāb al-Ashrāf*)。这部巨著虽然未完稿，但却是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一部翔实地记载7—9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历史的经典名著，集一百多名学者的族谱学知识于一体。

2 除了《历史》，达乌德·杰拉哈还著有《书史纪事》和《古代民族》。

3 伊本·伍赫特，即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侯赛因·本·绍沃尔，以“伊本·伍赫特·尔撒·本·法鲁汗沙赫”著称，是诗人和书吏。参见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第1卷，第12页；萨哈维：《为史正名》，第499—500页。

4 梁道远在《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第123—124页)中提到的穆纳吉姆家族史学家还有：《伊斯哈格·本·伊卜拉欣纪事》的作者阿里·穆纳吉姆(*‘Alī al-Munajjim*, 816—888)；编撰了《跨两朝诗人纪事及其诗歌》的伊本·穆纳吉姆(*Ibn al-Munajjim*, 855—912)；续编完成《跨两朝诗人纪事及其诗歌》的艾布·哈桑·穆纳吉姆(*Abū al-Hasan al-Munajjim*, 876—939)。

5 麦斯欧迪只是提到了哈里德对伍麦叶家族历史和人物事迹的记载，没有明确提及及其历史著作的书名。哈吉·哈里发(*Hājī Khalīfah*, 1609—1657)把该书的名称记载为《伍麦叶家族史》(*Tārīkh Banī Umayyāh*)。参见哈吉·哈里发：《书艺题名释疑》(*Hājī Khalīfah Mustafā ibn ‘Abd Allāh Kātib Chalabī, Kashf al-Zunūn ‘an Asāmī al-Kutub wa-al-Funūn*)第1册，穆罕默德·阿卜杜·伽迪尔·阿拓注，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18年，第337页。

6 杜腊比著有《别名与名字》《圣洁后裔》和《生卒》。

7 瓦其俄著有《法官纪事》《纪事精华》和舆地学著作《路》(又名《区域》)等。其中，前者收录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至作者所处时代各大城市和主要地区的知名法官传记，是现存最有价值的古代阿拉伯伊斯兰法官史著作之一。

8 伊本·阿迪姆(*Ibn al-‘Adīm*, 1192—1262)说：“我曾读过艾布·贾法尔·穆罕默德·本·哈里德·哈希米所著《隋芬(战役)》。”参见伊本·阿迪姆：《诉求目标：阿勒颇史》(*Ibn al-‘Adīm, Bughyat al-Talab fī Tārīkh Halab*)第1卷，苏海勒·扎卡尔校勘与作序，贝鲁特：思想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斯哈格·本·苏莱曼·哈希米的历史和传记书¹，艾布·伯克尔·拉齐（Abū Bakr al-Rāzī, 865—925）的《哈里发传》以及著述颇丰的伊本·古台巴。麦斯欧迪充分肯定了《泰伯里史》的卓越地位²，认为尼弗托韦赫（Niftawayh, 858—935）《历史》是作者所处时代的最优质著作，指出宿里（al-Sūlī, ? —946）《阿拔斯家族哈里发及其诗人与臣卿纪事集》的独特史料价值³，提到伊本·玛什塔（Ibn al-Māshitah, ? —约922）的《臣卿纪事》，称赞古达玛（Qudāmah, ? —约948）擅长著述和用词简明易懂，述及教法学家贾法尔·摩苏里（Ja‘far al-Mawsilī, 854—935）和语言学家伊卜拉欣·玛哈韦赫（Ibrāhīm Māhawayh, 生活于10世纪）的著作，略提伊卜拉欣·瓦西蒂（Ibrāhīm al-Wāsītī, 生活于9世纪）的《臣卿纪事》、穆甸瓦戈（al-Mutawwaq, ? —约932）的《臣卿》、米斯里（al-Misrī, ?）的《众目花朵与诸心清明》、朱扎贾尼·萨阿迪（al-Jūzajānī al-Sa‘dī, ?）的《历史》、艾布·泽奇拉·摩苏里（Abū Dhakirah al-Mawsilī, ?）的《历史》与《摩苏尔纪事》等，批判斯南·本·瑟比特（Sinān ibn Thābit, ? —943）不按逻辑顺序叙述历史的做法。

麦斯欧迪对过去三百年阿拉伯史学发展的总结，由浅入深、简繁得当、比较客观，把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决定性地推向了自觉发展阶段。他的评述为更加系统的史学史撰述提供了有力借鉴。

二、古代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撰述

学术史大师伊本·纳迪姆（Ibn al-Nadīm, 约932—约990）是继麦斯欧迪之后，更加重视史学史撰述的关键人物。他在成书于987年（伊斯兰历377年）的学术史名

1 萨哈维《为史正名》中只是提到这个人。梁道远编著的《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及其与洪娟编著的《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两部著作中都没有收录此人。

2 编年体世界通史《泰伯里史》（*Tārīkh al-Tabarī*），原名《历代先知与帝王史》（*Tārīkh al-Rusul wa-al-Mulūk*），或名《历代民族与帝王史》（*Tārīkh al-Umam wa-al-Mulūk*）。其作者泰伯里全面汇总前人的著述，重视历史和时间的关系，以严谨细致的伊斯纳德、翔实可靠的史料、客观中立的叙述、优雅美妙的文辞和人类历史的视野，使它成为阿拉伯史学史上的划时代作品。他因而被一些学者誉为“阿拉伯历史学的奠基者”和“阿拉伯的司马迁”。

3 宿里的《阿拔斯家族哈里发及其诗人与臣卿纪事集》又名《阿拔斯家族及其诗歌纪事集》，或名《哈里发与诗坛纪事集》。他未完成这部历史、族谱、文学与诗歌巨著，只写了5或6卷，仅存其中4卷。

著《目录》(*al-Fihrist*)的绪论中说:“此乃阿拉伯与异域各族书籍之总目。它依托阿拉伯语而存世。其内容关涉学问分类,著者纪事,作者层级、族谱、生辰、年龄、辞世时间、安身之地、优点与缺点。它从诸学萌发写到当今时代,即伊斯兰历377年。”¹他把当时已知的所有学问分成十大类33门。第三大类是“纪事、文学、传记与族谱之学”,分为三门学问。其中第一门是“纪事家、传述人、族谱学家、传记与史事作家之纪事及其书籍名称”(Akhbār al-Akhbārīyīn wa-al-Ruwāh wa-al-Nassābīn wa-Ashāb al-Siyar wa-al-Ahdāth wa-Asmā' Kutubihim)²,收录了约百名人物的生平简介及其主要著作名单。³他提及的第一名人物是齐雅德·艾比赫(Ziyād Abīh, 622—673)。此人所著《缺点》(*al-Mathālib*)是第一本讲述阿拉伯人缺点的书,也是伊拉克历史学派的第一批著作之一。⁴伊本·纳迪姆在这部分内容的最后写道:

朱璐迪,即艾布·艾哈迈德·阿卜杜·阿齐兹·本·叶哈雅·朱璐迪,巴士拉人,纪事家、传记与故事作家,卒于伊斯兰历330年之后,著有《哈里德·本·索弗旺纪事》《阿贾吉与鲁阿巴·本·阿贾吉纪事》以及《信士长官阿里·本·艾比·塔里卜读物集》。⁵

以上是伊本·纳迪姆的史学史撰述的一般样式,即先写人物的著称名⁶,再追溯其名号谱系,然后简述生平经历,最后罗列著作名目。但他在介绍伊本·凯勒比和麦达伊尼两位著述量丰硕的人物时,借鉴了伊本·库斐(Ibn al-Kūfī, 868—960)所写的书籍名单,对二人的著作进行了分类。这种史书分类思想对后来的史学史撰述以及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第1分册,第3页。

2 值得一提的是,伊本·纳迪姆在绪论之后的全书纲目中写的是“纪事家、传述人、族谱学家、传记与史事作家之纪事及其书籍名称”,但在正文的标题里删去了“传述人”(al-Ruwāh)。详见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第1分册,第5页;第1卷第2分册,第277页。

3 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第2分册,第277—356页。

4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第33页。

5 伊本·纳迪姆:《目录》第1卷第2分册,第356页。

6 古代阿拉伯人的著称名多种多样。从构成形式上看,它们主要分为单个型著称名和组合型著称名(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名字组合而成)两种。参见梁道远、洪娟编著:《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上册,第9页。

伊本·纳迪姆对阿拉伯史学的贡献，除了全面总结阿拉伯史学兴起三百年左右的成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阿拉伯伊斯兰学术体系中给史学及其分支（即传记学和族谱学）安排了一个显赫位置。不过，他把史学的定义问题留给了后人们去解决。

11—13世纪，阿拉伯人的史学史意识向更加自觉、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雅孤特·哈默维（Yāqūt al-Hamawī, 1178—1229）约从20岁开始积累大型人物志《娴熟指南：文学知识》（以《文豪辞典》之名著称于世）的材料，直到暮年还在增补这部巨著。¹他在绪论中回顾完编纂该书的动因和搜集资料的过程后，开始介绍编纂语法学史、语言学史和文学史等方面著作的一些较具代表性的前辈。雅孤特认为，塔历烹（al-Tārīkhī, 生活于9世纪）是重视语法学史学史的第一人。塔历烹在其小册子《语法学家史》（*Kitāb Tārīkhī al-Nahwīyīn*）的绪论中，明确指出了穆巴拉德（al-Mubarrad, 826—898）和塞尔拉卜·纳哈维（Tha‘lab al-Nahwī, 816—904）在语法学家纪事编纂方面的贡献。这种语法学史学史意识是前无古人的。紧接着，雅孤特逐一介绍了伊本·杜鲁斯塔韦赫、麦尔祖拔尼、斯拉斐、祖贝迪、艾布·麦哈幸·塔努黑、法拉兹达基和伊本·安拔利等另外7位著名文史学家。²他在梳理了学术史之后，才开始谈论《文豪辞典》的主要内容和编撰方法等。显然，他的史学史意识已经非常自觉。

14世纪，部分优秀史学家的相关撰述甚至具有了鲜明的史学理论色彩。人物

1 雅孤特·哈默维：《文豪辞典（又名〈娴熟指南：文学知识〉）》（Yāqūt al-Hamawī al-Rūmī, *Mu‘jam al-Udabā’ [Irshād al-Arīb ilā Ma‘rifat al-Adīb]*），凡7卷，伊哈桑·阿拔斯校勘，贝鲁特：伊斯兰西方出版社，1993年。

2 伊本·杜鲁斯塔韦赫（Ibn Durustawayh, 872—958），编纂了《语法学家纪事》（*Kitāb Akhbār al-Nahwīyīn*）等著作。麦尔祖拔尼（al-Marzubānī, 910—994），写了原稿约六千页的《选录》（*Kitāb al-Muqtabas*）。斯拉斐（al-Sīrāfī, 897—979），著有《巴士拉语法学家纪事》（*Kitāb Akhbār al-Nahwīyīn al-Basrīyīn*）等。祖贝迪（al-Zubaydī, 928—989），写了《语法学家与语言学家层级传》（*Tabaqāt al-Nahwīyīn wa-al-Lughawīyīn*）等著作。艾布·麦哈幸·塔努黑（Abū al-Mahāsīn al-Tanūkhī, ?—1050），著有《巴士拉、库法及其他地方语法学林史》（*Tārīkh al-‘Ulamā’ al-Nahwīyīn min al-Basrīyīn wa-al-Kūfīyīn wa-ghayrihim*）。雅孤特提到的阿里·本·法铎勒·穆贾什仪，即法拉兹达基（al-Farazdaqī, ?—1086），撰写了《金树：文学家纪事》（*Shajarat al-Dhahab fī Akhbār Ahl al-Adab*）等著作。伊本·安拔利（Ibn al-Anbārī, 1119—1181）的《智者观赏：文豪纪事》（*Nuzhat al-Alibbā’ fī Akhbār al-Udabā’*），又名《智者观赏：文豪层级传》（*Nuzhat al-Alibbā’ fī Tabaqāt al-Udabā’*），按代际先后关系收录181名文豪传记。

志编纂家塔朱丁·苏波其(Tāj al-Dīn al-Subkī, 1327—1370)融汇伊本·希班(Ibn Hibbān, 884—965)、伊本·索腊哈(Ibn al-Salāh, 1181—1245)、米齐(al-Mizzī, 1256—1341)以及扎哈比(al-Dhahabī, 1274—1348)等史学大家的治史理念,撰成《史家原理》(*Qā'idah fī al-Mu'arrikhīn*),归纳总结出“史家九则”:1.真诚。2.若引述,看措辞,不改意。3.非他引述,需先备记,然后书写。4.写明引述来源者名讳。5.了解传主情况。6.善于辞令。7.擅长描写。8.中正客观。9.知识丰富。前四者是“引述四则”,后五者是“立传五则”。¹苏波其的论述获得了同时代和后来许多阿拉伯史学家的认可。比如,索法迪(al-Safadī, 1297—1363)的《逝者全录》、苏尤蒂(al-Suyūṭī, 1445—1505)的《纯金串珠:精英名士》、塔基丁·加齐(Taqī al-Dīn al-Ghazzī, 1543—1601)的《庄严层级传:哈乃斐派人物志》等大型人物志的绪论,都大篇幅引用《史家原理》的内容。²

索法迪在《逝者全录》的绪论第九章中专门谈了“历史裨益”(Fawā'id al-Tārikh),第十章讲“史家修养”(Adab al-Mu'arrikh),第11章分类回顾了马什里克及其各地史、埃及史、马格里布及其各地史、也门与希贾兹地区史、整体史、哈里发史、列王史、臣卿与官员史、法官史、诵读家史、学林史、诗坛史以及各种史书。索法迪虽然只是简单地罗列书名及其作者,但已是系统的史学史撰述。比如,他在回顾多部巴格达志时,写道:“赫蒂卜·艾布·伯克尔著《巴格达史》。萨姆阿尼续编。伊本·杜贝西续补,其中包括萨姆阿尼未提及、忽略或后续之内容。伊本·葛

1 塔朱丁·苏波其:《史家原理》(*Qā'idah fī al-Mu'arrikhīn*),塔朱丁·苏波其:《考证原理与史家原理》(Tāj al-Dīn Abū Nasr 'Abd al-Wahhāb ibn Taqī al-Dīn 'Alī al-Subkī, *al-Qā'idah fī al-Jurh wa-al-Ta'dīl wa-Qā'idah fī al-Mu'arrikhīn*),阿卜杜·法塔哈·艾布·谷达注,贝鲁特:伊斯兰印书局,1968年,第66—80页;塔朱丁·苏波其:《大沙斐仪学派层级传》(Tāj al-Dīn Abū Nasr 'Abd al-Wahhāb ibn 'Alī ibn 'Abd al-Kāfī al-Subkī, *Tabaqāt al-Shāfi'iyah al-Kubrā*)第2卷,阿卜杜·法塔哈·穆罕默德·胡勒戊、马哈茂德·穆罕默德·泰纳希校勘,吉萨:哈杰尔出版社,1992年,第22—25页。

2 索法迪:《逝者全录》(Salāh al-Dīn Khalīl ibn Aybak al-Safadī, *Kitāb al-Wāfī bi-al-Wafayāt*)第1卷,艾哈迈德·艾尔纳乌特、土尔奇·穆斯塔法校注,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出版社,2000年,第56页。苏尤蒂:《纯金串珠:精英名士》(Jalāl al-Dīn 'Abd al-Rahmān ibn Abī Bakr al-Suyūṭī, *Nazm al-'Iqyān fī A'yān al-A'yān*),菲利普·希提校订,纽约:叙利亚-美国出版社,1927年,第8—10页。塔基丁·加齐:《庄严层级传:哈乃斐派人物志》(Taqī al-Dīn ibn 'Abd al-Qādir al-Tamīmī al-Dāfī al-Ghazzī al-Misrī al-Hanafī, *al-Tabaqāt al-Saniyah fī Tarājim al-Hanafiyah*)第1卷,阿卜杜·法塔哈·穆罕默德·胡勒戊校勘,利雅得:利法仪出版社,1983年,第28—31页。

蒂仪、穆希布丁·伊本·纳贾尔、艾布·伯克尔·伊本·玛利斯塔尼、伊本·撒仪先后相继续编。”¹

同时代伊斯兰世界西部（即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的史学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重要性。1377年11月，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写成后来闻名世界的《历史绪论》（*Muqaddimat Ibn Khaldūn*）初稿。它是《殷鉴集与始纪录：阿拉伯人、异族人、柏柏尔人及其同时代最有权势者史》（*Kitāb al-'Ibar wa-Dīwān al-Mubtada' wa-al-Khabar fī Ayyām al-'Arab wa-al-'Ajam wa-al-Barbar wa-man 'Āsirihim min dhawī al-Sultān al-Akbar*，最终完稿于1405年6月，又被称为《伊本·赫勒敦史》[*Tārīkh Ibn Khaldūn*]）的绪论卷。他在《历史绪论》前言中说：

历史是一门各个民族世代代传述的学问，是学者、旅行者追寻探求的学问，是君主国王之间如何竞争的记载，是普通老百姓迫切想了解的知识，是学者和普通人都能理解的学问。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不过是记载过去的国家和时代变迁的信息，其中有许多是传世的警言和训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感兴趣的话题。历史也讲述了人类沧海桑田的千变万化，一些国家的疆土扩大了，繁荣起来了，后来开始衰败，最后消失了。而深入内部来看，历史有许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它对宇宙万物存在的原则和基础有着自己精辟的分析和解释；它深入研究各种历史事件为何产生又如何发展的；它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完全可以算是哲学的一个门类。²

他对史学的深刻理解是建立在批判地吸收大量前辈史学家的思想精华之基础上的。他列举了屈指可数的被尊为“权威”的史学家，批判那些因袭模仿、守旧笨拙、缺乏思想、生搬硬套、内容平淡、机械重复、臃长模糊、不加分析、未究其原因或过分简略的著作。《历史绪论》前言的第二部分是“历史学的功能：包括对各个历史学派的考证和评价、历史学家的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伊本·赫勒敦的史学史撰

1 索法迪：《逝者全录》第1卷，第57页。

2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述的集中体现。他对一些低级史学家的信口开河嗤之以鼻，对他们传述的荒诞故事和编造的离奇怪谈严加批判。为了避免历史科学被一些史学修养低劣的人搞成“破烂的大杂烩”，他对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说：

写历史的人需要有知识，要懂得政治的基本原则，了解各种存在的不同性质，知道各个民族的地区及时代的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行为、道德、风俗、信仰和思想等各个方面。他还要了解现在，并与过去做比较，有哪些是类似的和相互吻合的，有哪些又是不相同的；要分析它们相同和不相同的原因是什么；要了解各个国家和宗教派别，它们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存在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创建这些国家和教派的主要人物的情况如何、他们的经历如何，包括分析每种经历及其原因等。¹

此外，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前言的第三部分还分析了造成一些史学家所写历史不真实的原因：其一，宗派主义思想的影响；其二，因过分相信历史学家的传述而不去验证内容的真伪；其三，一些历史学家对各种发展情况性质的无知。

伊本·赫勒敦在格拉纳达的好友伊本·赫蒂卜（Ibn al-Khatīb，1313—1375）擅长于地方史编纂。他在《格拉纳达纪综录》的绪论中把史学视为“人类精髓”，回顾了约50部重要的地方史著作。²其中，第一部是穆罕默德·布哈里（Muhammad al-Bukhārī，？—928）的《布哈拉史》（*Tārīkh Madīnat Bukhārā*），最后是伊本·哈吉（Ibn al-Hājj，1281—1370）的《阿尔梅里亚与贝雅史》（*Tārīkh al-Marīyah wa-Bājah*）。这些著作作为伊本·赫蒂卜编撰安达卢西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与人物志的集大成作品《格拉纳达纪综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5世纪是古代阿拉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撰述的巅峰世纪。伊冀（al-Ījī，？—约1436）、卡菲耶冀（al-Kāfiyājī，1386—1474）和苏尤蒂，都在阿拉伯的史学理论发

1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第38—39页。

2 伊本·赫蒂卜：《格拉纳达纪综录》（*Dhū al-Wizāratayn Lisān al-Dīn ibn al-Khatīb, al-Ihātah fī Akhbār Gharnātah*）第1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易南校注与作序，开罗：汗吉书店，1973年，第80—83页。

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印记。伊冀在《史学宝鉴》一书中指出了史学的十大裨益和十二个基础。¹ 后者的《史学撮要》撰成于1463年4月7日，是现存最古老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文，由三个部分构成：1. 绪论，谈到史学的裨益、撰文动机、文章题名、内容安排、写作要旨以及在研究该论题过程中采取的措施。2. 主体部分，分为史学基础（包含十个要点），史学原理和问题，史学家的荣誉、品德以及记忆与反思的裨益等三章。3. 结论。² 1468年6月10日，苏尤蒂写成短文《史学嫩枝》，分为绪论，以及“历史起源”“历史裨益”和“相关裨益”三章正文，从宗教学角度阐述其对史学的理论见解。³ 虽然三人没有把太多精力集中到史学史撰述上，但他们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解，为萨哈维（al-Sakhāwī, 1427—1497）把古代阿拉伯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撰述推向巅峰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借鉴。

萨哈维是卡菲耶冀在埃及开罗的学生之一。前者在其著名人物志《绚丽光芒：九世纪人物》中说，他的恩师卡菲耶冀著述量逾百种，但绝大部分是小册子。⁴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萨哈维不仅在著作数量方面远超于其师之上⁵，而且在质量方面也远胜于卡菲耶冀。他在《史学撮要》的基础上，参考了约80部著作，糅合了上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撰述的精华，在1492年初于麦加完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为史正名》，梳理和评论史学、史学家及其作品，从宗教学的角度为史学辩护，捍卫史学的尊严。全书内容主要由以下12个部分构成：

第一，绪论。萨哈维讲述了撰写该书的原因和目的、编写顺序（或撰写方法）、主要内容和著作名称。他认为，史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的艺术，是必修学问之一，属

1 伊冀：《史学宝鉴》（Muhammad ibn Ibrāhīm al-Ījī, *Tuhfat al-Faqīr ilā Sāhib al-Sarīf fī 'Ilm al-Tawārīkh*），哈里德·艾哈迈德·穆腊·苏韦迪校勘，大马士革：奇南出版社，2010年，第50—52、66—111页。

2 卡菲耶冀：《史学撮要》（Muhyī al-Dīn al-Kāfiyājī, *al-Mukhtasar fī 'Ilm al-Tārīkh*），穆罕默德·卡玛路丁·易祖丁校勘，贝鲁特：书籍世界，1990年。

3 苏尤蒂：《史学嫩枝》（Jalāl al-Dīn al-Suyūtī, *al-Shamārīkh fī 'Ilm al-Tārīkh*），阿卜杜·拉哈曼·哈桑·马哈茂德校注，开罗：文学书店，1991年。

4 萨哈维：《绚丽光芒：九世纪人物》（Shams al-Dīn Muhammad ibn 'Abd al-Rahman al-Sakhāwī, *al-Daw' al-Lāmi' li-Ahl al-Qarn al-Tāsi'*）第7卷，贝鲁特：吉勒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5 马什胡尔·阿勒-萨勒曼和艾哈迈德·舒盖拉特编著的《萨哈维的著作》（Abū 'Ubaydah Mashhūr ibn Hasan Āl Salmān wa-Abū Hudhayfah Ahmad al-Shuqayrāt, *Mu'allafāt al-Sakhāwī*，贝鲁特：伊本·哈兹姆出版社，1998年）一书，罗列了萨哈维的270种著作。

于穆斯林五类行为规范（详见下文）中的第一类，即义务性的行为。但有人诋毁和贬低这门学问，他却没有找到一部“可以治愈烦恼、消除忧愁”的著作。于是，他奋笔挥洒，撰成此书，痛斥那些对历史无知和贬低史学的“病态中人”。他把该书命名为《公开谴责那些诋毁史家之人》（梁道远译作《为史正名》）。¹

第二，“塔历赫”（al-Tārīkh）释义。萨哈维丰富了《史学撮要》第一章中对“塔历赫”一词的语言学（相当于“日期”）和专业术语（相当于中文的“历史”）解释，引用了多位著名学者的相关论述。关于它的词源，卡菲耶冀只提到它是一个阿拉伯化的外来词，源自波斯语的“马哈·鲁兹”（māh rūz，其中的“māh”意为“月”，“rūz”意为“日”）。²萨哈维进一步深究，提到另外两种说法：一说，阿拉伯的塔米姆部落曾使用“塔历赫”的另一种书写形式“陶历赫”（tawrīkh），盖斯部落使用“塔阿历赫”（ta'rīkh）。另一说，“塔历赫”是穆斯林从“有经者”（Ahl al-Kitāb）那里借用的外来词。³

第三，历史主题。卡菲耶冀在《史学撮要》中说：“史学，乃探究时间及其周围一切之学问。”⁴萨哈维没有沿袭其师的观点，而是把“人类”（al-Insān）放到了第一位，认为人类和时间（al-Zamān）是历史的两大主题。

第四，历史裨益。这部分内容主要抄录了大量著名学者关于历史与史学（包括人物志学、族谱学、纪事学等）的用处、优点、性质及其重要性的论述。其中包括萨哈维自己在《铸金矿物：〈珠线〉续编》一书绪论里把史学视为圣训学的诸多分支学问之一的说法。⁵

1 关于该书的名称，有多种记载：1. *al-I'lān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hl al-Tawrīkh*；2. *al-I'lām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l-Tawrīkh*；3. *al-I'lām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shāb al-Tārīkh*；4. *al-I'lān bi-al-Tawbīkh 'alā man dhamma 'Ilm al-Tārīkh*；5. *al-I'lān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hl al-Tārīkh*；6. *al-I'lān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l-Tārīkh*；7. *al-I'lān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l-Tawrīkh*；8. *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l-Tawrīkh*。其校勘者撒里姆·诸费利（Sālim ibn Ghatar ibn Sālim al-Zufayrī）仔细分析了这些记载后，认为第一种才是正确的原书名。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校勘序言”，第27—29页。

2 卡菲耶冀：《史学撮要》，第60—62页。

3 在伊斯兰教中，“有经者”主要用来指代犹太人和基督徒。

4 卡菲耶冀：《史学撮要》，第55页。

5 萨哈维：《铸金矿物：〈珠线〉续编》（Muhammad ibn 'Abd al-Rahmān al-Sakhāwī, *Kitāb al-Tibr al-Masbūk fī Dhayl al-Sulūk*）第1卷，娜姬姆·穆斯塔法·卡米勒·拉碧芭·伊卜拉欣·穆斯塔法校勘，开罗：埃及国家图书档案馆，2002年，第33页。

第五，历史的五类行为规范。“五类行为规范”（al-Ahkām al-Khamsah）是一个伊斯兰教法术语，包括义务性的行为（Wājib）、可嘉的行为（Mustahabb）、准许的行为（Mubāh）、受谴责的行为（Makrūh）和禁止的行为（Harām）。萨哈维引用伊本·法里斯（Ibn Fāris, 941—1004）的观点，认为了解先知传是宗教人士的义务性行为。萨哈维认为，过分依赖那些传抄原初经典的人，引述那些如同神话一般的故事却没有说明其虚假性，记载那些没有意义和无益处的琐事，这三种行为是应当被禁止的。¹至于中间三种行为，他给出的定义分别是：1. 可嘉的行为，是遵循美德的一种方式，舍弃不适当的恶行，并思考行为的后果。2. 凡是不涉及利益的事情，无论是今生还是后世，都是可准许的。3. 因为一些小事而刻意去抹黑别人的行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部分内容仍然以大量应用著名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主。

第六，治史条件。萨哈维认为，史学家应当具备四个条件，即：有节制的公正；只引述核实过的史事；应当了解人物的能力、处境、家庭，以求不偏颇；虔诚相待。这显然不同于卡菲耶冀讲的智慧（al-‘Aql）、节制（al-Dabt）、信仰伊斯兰（al-Islām）和公正（al-‘Adālah）。²

第七，使用历法第一人。谁是使用历法记录历史的第一人？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萨哈维援引了各种说法，讲述了创制伊斯兰历的原因和过程，提到前伊斯兰时期（即古代阿拉伯学者常用的“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历法、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史、古波斯史、罗马史、科普特史和基督教史。

第八，历史著作。伴随着感叹“历史著作，何其多哉！不可胜数”³，萨哈维开始撰写《为史正名》下半部分，即由史学理论阐述转向史学史撰述。他先大篇幅引用“伊斯兰史学大师”扎哈比对史书分类的看法及其巨著《伊斯兰史与诸杰群英辞世录》绪论中罗列的史书与史家名单⁴，然后介绍至少34类史书与史家：

1. 武功纪与先知传，如穆萨·欧戈巴（Mūsā ‘Uqbah, 约675—758）《武功纪》

1 萨哈维：《为史正名》，第181—182页。

2 萨哈维：《为史正名》，第216—236页；卡菲耶冀：《史学撮要》，第70页。

3 萨哈维：《为史正名》，第264页。

4 扎哈比：《伊斯兰史与诸杰群英辞世录》（Shams al-Dīn Muhammad ibn Ahmad ibn ‘Uthmān al-Dhahabī, *Tārīkh al-Islām wa-Wafayāt al-Mashāhīr wa-al-A‘lām*）第1卷，欧麦尔·阿卜杜·萨腊姆·塔德穆利校勘，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1990年，第22—26页。

(*al-Maghāzī*) 和伊本·希沙姆《先知传》等。¹

2. 诸先知故事，如穆罕默德·奇撒伊 (Muhammad al-Kisā'ī, 生活于864—961年间)《诸先知故事》(*Qisas al-Anbiyā'*)等。

3. 圣门弟子传，如伊本·艾西尔 (Ibn al-Athīr, 1160—1233)《莽丛群狮：圣门弟子知识》(*Usd al-Ghābah fī Ma'rifat al-Sahābah*)等。

4. 哈里发传，如伊本·杜戈玛戈 (Ibn Duqmāq, 1349—1407)《宝贵珠玑：哈里发、列王与素丹传》(*al-Jawhar al-Thamīn fī Siyar al-Khulafā' wa-al-Mulūk wa-al-Salātīn*)等。

5. 列王传，如艾布·沙玛 (Abū Shāmah, 1203—1267)《双园：努尔丁与萨拉丁两王朝纪事》(*Kitāb al-Rawdatayn fī Akhbār al-Dawlatayn al-Nurīyah wa-al-Salāhiyah*)等。

6. 臣卿传，如希腊勒·索比 (Hilāl al-Sabī, 969—1056)《埃米尔珍品：臣卿史》(*Kitāb Tuhfat al-Umarā' fī Tārīkh al-Wuzarā'*)等。

7. 书吏传，如伊本·艾拔尔 (Ibn al-Abbār, 1199—1260)《书吏告诫》(*I'tāb al-Kuttāb*)等。

8. 埃米尔传，如慊迪·米斯里 (al-Kindī al-Misrī, 897—961)《埃及埃米尔》(*Umarā' Misr*)等。²

9. 教法学家传，如什拉齐 (al-Shīrāzī, 1003—1083)《法学家层级传》(*Tabaqāt al-Fuqahā'*)等。³

1 武功纪与先知传类著作非常丰富，包括：1. 武功纪。2. 先知传。3. 传记诗。4. 先知降世。5. 先知祖辈。6. 先知名讳。7. 先知割礼。8. 精灵呼唤。9. 先知明证。10. 穆罕默德美德。11. 先知特质。12. 先知品性。13. 先知鞋。14. 先知医术。15. 先知特征。16. 先知演讲。17. 先知图书与图书馆。18. 先知辞世。19. 先知礼拜。20. 先知臂。21. 先知妻妾。22. 先知释奴。23. 先知书吏。

2 《埃及埃米尔》又名《埃及总督名单》(*Kitāb Tasmīyat Wulāt Misr*)。

3 教法学家传又被分成四大类：1. 沙斐仪派法学家传，如艾布·阿斯姆·阿拔迪 (Abū 'Āsim al-'Abbādī, 985—1066)《沙斐仪派法学家层级传》(*Kitāb Tabaqāt al-Fuqahā' al-Shāfi'iyyah*, 戈斯塔·维特斯塔姆校勘，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1964年)等。2. 哈乃斐派法学家传，如阿卜杜·伽迪尔·古拉什 ('Abd al-Qādir al-Qurashī, 1297—1373)《往昔珠宝：哈乃斐学派层级传》(*al-Jawāhir al-Mudīyah fī Tabaqāt al-Hanafīyah*, 凡5卷，阿卜杜·法塔哈·穆罕默德·胡勒茂校勘，吉萨：哈杰尔出版社，1993年)等。3. 马立克派法学家传，如伽迪·易雅得 (al-Qādī 'Iyād, 1083—1149)《法庭整顿与道路接近：马立克学派群英知识》(*Tarīb al-Madārik wa-Taqrīb al-Masālik li-Ma'rifat A'lām Madhhab Mālik*, 凡8卷，穆罕默德·本·塔维特·唐冀等校勘，拉巴特：伊斯兰宗教基金事务部，1981—1983年)等。4. 罕百里派法学家传，如伊本·艾比·叶尔腊 (Ibn Abī Ya'lā, 1059—1132)《罕百里学派层级传》(*Tabaqāt al-Hanābilah*, 凡3卷，阿卜杜·拉哈曼·本·苏莱曼·欧筛敏校勘、作序与注释，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王国成立百年纪念庆典总秘书处，1999年)。

10. 诵经家传, 如沙姆苏丁·伊本·杰扎利(Shams al-Dīn Ibn al-Jazarī, 1350—1429)《终极目标: 诵经家层级传》(*Ghāyat al-Nihāyah fī Tabaqāt al-Qurrā'*)等。

11. 背诵家传, 如扎哈比《背诵家层级传》(*Kitāb Tabaqāt al-Huffāz*, 又名《背诵家备忘》[*Kitāb Tadhkirat al-Huffāz*])等。

12. 圣训学家传, 如扎哈比《鉴定器: 圣训学家层级传》(*al-Mu'īn fī Tabaqāt al-Muhaddithīn*)等。

13. 史学家传。萨哈维没有列出相关著作, 只是说: “我将列出许多位。”他指的是我们在下文介绍的《为史正名》中的“史家名单”。

14. 语法学家传, 如祖贝迪《语法学家与语言学家层级传》等。

15. 文学家传, 如雅孤特·哈默维《文豪辞典》等。

16. 语言学家传, 如伊本·马克图姆(Ibn Maktūm, 1284—1348)的十卷本《语言学家与语法学家纪事集》(*al-Jam' al-Mutanāh fī Akhbār al-Lughawīyīn wa-al-Nuhāh*)等。

17. 诗人传, 如塞阿里比(al-Tha'ālibī, 961—1038)《现世稀珍: 当代良善》(*Yatīmat al-Dahr fī Mahāsin Ahl al-'Asr*)等。

18. 苏菲传, 如艾布·努爱姆·艾斯法哈尼(Abū Nu'aym al-Asfahānī, 948—1038)《圣徒装饰品与苏菲层级传》(*Hilyat al-Awliyā' wa-Tabaqāt al-Asfiyā'*)等。

19. 法官传, 如瓦其俄《法官纪事》(*Akhbār al-Qudāt*)等。

20. 歌手传, 如艾布·法拉吉·艾斯法哈尼(Abū al-Faraj al-Asfahānī, 897—967)的历史文化百科全书《诗歌集》(*Kitāb al-Aghānī*)。

21. 圣裔传。萨哈维举了两名史学家的著作, 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厅室升级: 先知亲戚与圣裔亲善》(*Istīlāb Irtiqā' al-Ghuraf bi-Hubb Aqribā' al-Rasūl wa-dhawī al-Sharaf*)。

22. 慷慨者传, 如加腊比(al-Ghallābī, ? —911)《慷慨者》(*al-Ajwād*)等。

23. 聪明人传, 如伊本·焦齐(Ibn al-Jawzī, 1116—1200)《聪明人纪事》(*Akhbār al-Adhkiyā'*)等。

24. 智者传。萨哈维只提到阿拔斯·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曼·本·奥斯曼·安索利的《疯狂智者》(*'Uqalā' al-Majānīn*)。但赫蒂卜·巴格达迪(al-Khatīb al-Baghdādī, 1002—1071)在《巴格达史》(*Tārīkh Baghdād*)中为此人立传时记载

道：“他从其父那里传述了《疯狂智者纪事》。”¹

25. 医者传，如伊本·艾比·伍绥比阿（Ibn Abī Usaybi‘ah, 1203—1270）《讯息精粹：医者层级传》（*Kitāb ‘Uyūn al-Anbā’ fī Tabaqāt al-Atibbā’*）等。

26. 艾什阿里派史，如伊本·伊玛目·卡米立耶（Ibn Imām al-Kāmilīyah, 1406—1470）《艾什阿里派层级传》（*Tabaqāt al-Ashā’irah*）等。

27. 穆卜塔迪阿派（al-Mubtadi‘ah）史。²萨哈维首先介绍了伊本·艾赫达勒（Ibn al-Ahdal, 1377—1451）的《如意光芒：穆卜塔迪阿派知识》（*al-Lum‘ah al-Muqni‘ah fī Ma‘rifat Firqat al-Mubtadi‘ah*）。

28. 什叶派史。萨哈维罗列了十几位史学家的名字，包括伊本·法铎勒父子，即伊本·法铎勒（Ibn Faddāl, ?—839）及其子阿里·法铎勒（‘Alī Faddāl, 819—约903）。

29. 吝人传，如赫蒂卜·巴格达迪《吝人传》（*al-Bukhalā’*）等。

30. 英雄传，如伊本·佐菲尔（Ibn Zāfir, 1171—1216）《英雄纪事》（*Akhbār al-Shuj‘ān*）等。

31. 独眼人、弱视者、瞎子与驼子传，如索法迪《独眼感知》（*al-Shu‘ūr bi-al-‘Ūr*）和《腰带落地：盲人笑语》（*Nakt al-Himyān fī Nukat al-‘Umyān*）等。³

32. 修士传。萨哈维只提到坦玛姆·迪马什基（Tammām al-Dimashqī, 942—1023）的《修士纪事》（*Akhbār al-Ruhbān*）。

33. 古兰致死者传，如艾布·伊斯哈格·塞尔拉比（Abū Ishāq al-Tha‘labī, 951—1035）《古兰致死者传》（*Qatlā al-Qur‘ān*）。⁴

34. 恋人传，如萨拉吉·伽利（al-Sarrāj al-Qārī, 1027—1106）《恋人格斗》（*Masāri‘ al-‘Ushshāq*）等。

1 赫蒂卜·巴格达迪：《巴格达史》（Abū Bakr Ahmad ibn ‘Alī al-Khatīb al-Baghdādī, *Tārīkh Baghdād aw Madīnat al-Salām*）第12卷，穆斯塔法·阿卜杜·伽迪尔·阿拓研究与校勘，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2 “穆卜塔迪阿”（al-Mubtadi‘ah）一词由“比德阿”（Bid‘ah）衍生而成。“比德阿”，愿意为“新生”“创新”，引申为“异端”“标新立异”，带有贬义。参见吴云贵：《比德阿》，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98页。

3 萨哈维只提到索法迪有相关著作。此外，还有贾希兹的《麻风病人、瘸子、瞎子、斗鸡眼》（Abū ‘Uthmān ‘Amr ibn Bahr al-Jāhiz, *Kitāb al-Bursān wa-al-‘Urjān wa-al-‘Umyān wa-al-Hūlān*，阿卜杜·萨腊姆·穆罕默德·哈伦校释，贝鲁特：吉勒出版社，1990年）也值得一提。

4 该书主要收录受到《古兰经》经文影响而失去知觉的人物传记。

紧接着,萨哈维继续增补至少22类史书与史家:1.诸先知传摘要。2.圣门弟子传节略。3.圣裔家族史。4.其他部落家族史。¹5.麦瓦利传。²6.圣训人物志。³7.人物辞典(Mu‘jam)。⁴8.层级传(Tabaqāt)。⁵9.简略人物志(Tarājim)。⁶10.人名辞典(Rijāl)。⁷11.专业人物志。⁸12.政府人物志。⁹13.某类人物名单。¹⁰14.长老志(Mashyakhah)。¹¹15.含指定人名之人物名单。¹²16.长寿者与青年人物志。¹³17.特定

- 1 我们可以把圣裔家族史和其他部落家族史视为阿拉伯族谱学发展史。萨哈维在书中提到的葛勒格圣迪(al-Qalqashandī, 1355—1418)《阿拉伯部落知识观止》(*Nihāyat al-Arab fī Ma‘rifat Qabā’il al-Arab*),又名《阿拉伯谱系知识观止》(*Nihāyat al-Arab fī Ma‘rifat Ansāb al-Arab*),是古代阿拉伯族谱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参见萨哈维:《为史正名》,第356页;梁道远、洪娟编著:《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上册,第403—404页。
- 2 “麦瓦利”(al-Mawālī),指的是新改奉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半岛原住民血统的穆斯林。一些中国学者把它意译成“释奴”。但该词如同“哈里发”,最好采用音译。
- 3 萨哈维提到的圣训人物志主要包括四类:1.可信人物志,如伊本·希班《可信者》(*Kitāb al-Thiqāt*)。2.羸弱人物志,如欧盖里(al-‘Uqaylī, ?—934)《羸弱者》(*Kitāb al-Du‘afā’*)。3.群体人物志,如布哈里(al-Bukhārī, 810—870)《大历史》(*al-Tārīkh al-Kabīr*)、《中历史》(*al-Tārīkh al-Awsat*)和《小历史》(*al-Tārīkh al-Saghīr*)。4.圣训学人物志,即传播逊尼派“六大圣训集”(《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什叶派“四圣书”(《宗教学大全》《教法自通》《教法修正》和《圣训辨异》)以及圣训学知识的集体人物志。比如,艾布·纳斯尔·凯腊巴芝(‘Abū Naṣr al-Kalābādhī, 935—1008)的《布哈里圣训实录人名辞典》(*Rijāl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
- 4 比如,萨姆阿尼的《大辞典修润》(*al-Taḥbīr fī al-Mu‘jam al-Kabīr*, 凡2卷,穆妮拉·拿冀·撒里姆校勘,巴格达:宗教基金办公室,1975年),按照阿拉伯字母顺序编排1123名男长老和70名女长老的传记。
- 5 比如,伊本·萨尔德(Ibn Sa’d, 784—845)的《大层级传》(*Kitāb al-Tabaqāt al-Kabīr*)和《小层级传》(*al-Tabaqāt al-Saghīr*)。
- 6 比如,拉迪丁·加齐(Raḍī al-Dīn al-Ghazzī, 1409—1460)的《观者愉悦:沙斐仪学派晚近人物志》(*Kitāb Bahjat al-Nāzirīn ilā Tarājim al-Muta’akkhkhirīn min al-Shāfi‘īyah al-Bārī‘īn*)。
- 7 比如,扎哈比的《人物名字及其谱系混淆》(*al-Mushtabih fī al-Rijāl Asmā’ihim wa-Ansābihim*)。
- 8 主要的专业人物志涉及经注学、诵读学、圣训学、教法学、苏菲主义、语言学、语法学、诗歌、医学和文字工作者等领域。
- 9 主要的政府人物志包括哈里发、法官、封疆大吏、埃米尔和朝中大臣。
- 10 比如,拉施德·阿拓尔(al-Rashīd al-‘Attār, 1153—1264)的《马立克传述人名单》(*Mujarrad Asmā’ al-Ruwāḥ ‘an Mālik*)。
- 11 长老志是一种专门收录特定人士的老师们传记的人物志。比如,伽迪·玛利斯坦(Qāḍī al-Māristān, 1050—1141)的《大长老志》(*al-Mashyakhah al-Kubrā*)。
- 12 比如,艾布·伽斯姆·泰伯拉尼(‘Abū al-Qāsim al-Tabarānī, 873—971)的《名为阿拓之圣训传述人》(*Man Ismuhu ‘Atā’ min Ruwāt al-Hadīth*)。
- 13 比如,艾布·哈提姆·西吉斯塔尼(‘Abū Hātim al-Sijistānī, ?—869)的《阿拉伯长寿者及其纪事与临终遗言》(*Kitāb al-Mu‘ammarīn min al-Arab wa-Turaḥ min Akhbārihim wa-mā qālūhu fī Muntahā A’mārihim*);伊本·阿萨奇尔(Ibn ‘Asākir, 1105—1176)的《青年功德》(*Manāqib al-Shubbān*)。

时期人物志。¹18.特定王朝史。²19.单人传记。³20.作者著作。⁴21.地方史。⁵22.與

- 1 比如，索法迪的《当世精英》(*A'yān al-'Asr wa-A'wān al-Nasr*)。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世纪人物志”，即按照伊斯兰历的世纪来收录的人物志，如萨哈维的老师之一伊本·哈杰尔(Ibn Hajar, 1372—1449)的《隐珠：八世纪精英》(*al-Durar al-Kāminah fī A'yān al-Mī'ah al-Thāminah*)及其续编。
- 2 比如，伊本·达沃达利(Ibn al-Dawādārī, ? —约1336)九卷本《珠玉宝藏与精华荟萃》(*Kanz al-Durar wa-Jāmi' al-Ghurar*)中的第4—8卷，即《卓越珠玉：伍麦叶王朝纪事》(*al-Durrah al-Samīyah fī Akhbār al-Dawlah al-Umayyīyah*)、《华丽珠玉：阿拔斯王朝纪事》(*al-Durrah al-Samīyah fī Akhbār al-Dawlah al-'Abbāsīyah*)、《往昔珠玉：法蒂玛王朝纪事》(*al-Durrah al-Mudīyah fī Akhbār al-Dawlah al-Fātimīyah*)、《寻觅珠玉：艾尤卜列王纪事》(*al-Durr al-Matlūb fī Akhbār Mulūk Banī Ayyūb*)和《纯洁珠玉：突厥王朝纪事》(*al-Durrah al-Zakīyah fī Akhbār al-Dawlah al-Turkīyah*)。
- 3 萨哈维提到了他自己的《宝石与珍珠：伊斯兰长老伊本·哈杰尔传》(*al-Jawāhir wa-al-Durar fī Tarjamat Shaykh al-Islām Ibn Hajar*)。
- 4 即萨哈维自己的主要著作列表。
- 5 古代学者用阿拉伯文写的地方史著作非常丰富。萨哈维按照地名的阿拉伯字母顺序进行了简单罗列介绍：
 - 1 阿比瓦尔德(Abiwert, 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包括尼萨(Nasā)、库芬(Kūfān)和加兹岩(Ghāzyān)等村落和地区，如艾比瓦尔德(al-Abīwardī, 约1068—1113)《阿比瓦尔德与尼萨史》(*Tārīkh Abīward wa-Nasā*)。
 - 2 阿塞拜疆(Adharbayjān)，如伊本·艾比·海贾·劳沃迪(Ibn Abī al-Hayjā' al-Rawwādī, ?)《阿塞拜疆史》(*Tārīkh Adharbayjān*)。
 - 3 阿兰(Arran, 位于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如白尔迪翼(al-Bardījī, 约845—914)《阿兰史》(*Tārīkh Arrān*)。
 - 4 埃尔比勒(Irbil, 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如伊本·穆斯陶斐(Ibn al-Mustawfī, 1169—1239)的五卷本《埃尔比勒史》(*Tārīkh Irbil*)。
 - 5 阿斯塔拉巴德(Istirābād或Astarābād, 今伊朗戈尔甘)，如伊德利斯(al-Idrīsī, ? —1015)《阿斯塔拉巴德史》(*Tārīkh Astarābād*)。
 - 6 亚历山大(al-Iskandarīyah, 今埃及第二大城市)，如伊本·易玛迪耶(Ibn al-'Imādīyah, 1210—1275)的四卷本《亚历山大史》(*Tārīkh al-Iskandarīyah*)。
 - 7 塞维利亚(Sevilla, 阿拉伯人称为“伊什比利亚”[Ishbīlīyah], 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和塞维利亚省的首府)，如伊本·葛素姆(Ibn Qassūm, 1158—1242)《公正议会：优先对待》(*Majālis al-Abrār fī Mu'āmalah al-Khiyār*, 又被记载为《公正议会：强制对待》[*Majālis al-Abrār fī Mu'āmalah al-Jabbār*])。
 - 8 伊斯法罕(Isfahān, 今伊朗伊斯法罕省的省会)，如艾布·努爱姆·艾斯法哈尼《伊斯法罕史》(*Kitāb Tārīkh Asbahān*, 又名《伊斯法罕史事纪录》[*Dhikr Akhbār Asbahān*])。
 - 9 埃斯特波纳(Estepona, 位于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如葛拉璐斯(al-Qalālūsī, ? —1308)《隐藏宝石：埃斯特波纳良善》(*al-Durrah al-Maknūnah fī Mahāsīn Istabūnah*)。
 - 10 伊非里基亚(Ifrīqīyah, 其地理范围约相当于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和利比亚西北部)，如艾布·阿拉伯(Abū al-'Arab, 865—945)《伊非里基亚学林层级传》(*Kitāb Tabaqāt 'Ulamā' Ifrīqīyah*)。
 - 11 安达卢西(al-Andalus, 阿拉伯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这方面的著作比较丰富，如伊本·海彦(Ibn Hayyān, 987—1076)的60卷本《坚实》(*al-Mubīn*, 已佚)，胡梅迪(al-Humaydī, 1029—1095)的《火炭余烬：安达卢西当权者、圣训传述人、法学家、文学家、名流及诗人纪录》(*Jadhwat al-Muqtabis fī Dhikr Wulāt al-Andalus wa-Asmā' Ruwāt al-Hadīth wa-Ahl al-Fiqh wa-al-Adab wa-dhawī al-Nabāhah wa-al-Shi'r*, 又名《火炭余烬：安达卢西学林史》[*Jadhwat al-Muqtabas fī Tārīkh 'Ulamā' al-Andalus*])等。

- 12 杰尔宾特 (Derbent, 阿拉伯人称为“巴布·艾卜瓦布”[Bāb al-Abwāb, 意为“门中门”], 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萨哈维只提到了满木斯·达尔班迪 (Mammūs al-Darbandī, ? —937)。
- 13 贝贾亚 (Bijāyah, 今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 如纪波利尼 (al-Ghibrīnī, 1246—1315)《七世纪贝贾亚学林名人识要》(‘Unwān al-Dirāyah fī-man ‘Uraf min al-‘Ulamā’ fī al-Mi‘ah al-Sābi‘ah bi-Bijāyah)。
- 14 布哈拉 (Buxoro, 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 如纳尔沙黑 (al-Narshakhī, 899—959)《布哈拉史》(Tārīkh Bukhārā)。
- 15 巴士拉 (al-Basrah, 今伊拉克巴士拉省的省会), 如伊本·沙巴《巴士拉纪事》(Kitāb Akhbār al-Basrah)。
- 16 巴格达 (Baghdād, 今伊拉克首都)。阿拉伯史学家们写了大量相关著作, 其中包括赫蒂卜·巴格达迪的10卷本《巴格达史》、伊本·撒仪 (Ibn al-Sā‘ī, 1197—1275) 的约30卷本《〈巴格达史〉续编》(Dhayl Tārīkh Baghdād) 等。
- 17 巴尔赫 (Balkh, 位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萨哈维最先提到艾布·伊斯哈格·伊卜拉欣·本·艾哈迈德·本·伊卜拉欣·本·艾哈迈德·本·达乌德·穆斯塔姆里的层级传。
- 18 巴伦西亚 (Valencia, 今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海港), 如伊本·阿勒格玛 (Ibn ‘Alqamah, 1037—1116)《巴伦西亚史》(Tārīkh Balansiyyah)。
- 19 耶路撒冷 (Bayt al-Maqdis)。关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文著作比较丰富, 参见什贺布拉·巴贺杜尔:《关于阿克萨清真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及其城市特色与历史的著作辞典》(Shihāb Allāh Bahādur, Mu‘jam mā ullifa fī Fadā’il wa-Tārīkh al-Masjid al-Aqsā wa-al-Quds wa-Filastīn wa-Mudunihā), 迪拜: 玛吉德文化遗产中心, 2009年。
- 20 埃尔维拉 (Elvira, 阿拉伯人称为“伊勒比拉”[Ilbīrah], 位于今西班牙格拉纳达省)。萨哈维只提到了萨义德·本·苏莱曼·本·侯赛因·迦菲基。
- 21 贝哈格 (Bayhaq, 今伊朗萨卜泽瓦尔), 如伊本·丰杜戈 (Ibn Funduq, 1106—1170) 的波斯文著作《贝哈格史》(Ta’rīkh Bayhaq)。
- 22 提克里特 (Tikrīt, 今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的省会), 如梯克利提 (al-Tikrītī, ? —1188) 的两卷本《提克里特史》(Tārīkh Tikrīt)。
- 23 特莱姆森 (Tilimsān 或 Tilmsān, 今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省的省会), 如艾士发尔 (al-Asfar, 991—1070)《特莱姆森史》(Tārīkh Tilimsān)。
- 24 廷尼斯 (Tinnīs, 位于今埃及塞得港西南方向), 如阿卜杜·穆哈辛 (‘Abd al-Muhsin al-Khatīb, ?—1107)《新娘: 廷尼斯特征》(al-‘Arūs fī Fadā’il Tinnīs)。
- 25 帖哈麦 (Tihāmah, 一般指阿拉伯半岛的沿海平原和高原地带) 和希贾兹 (al-Hijāz, 位于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的地区, 包括麦加、麦地那及其附属地)。萨哈维只提到一名史学家伊本·迦里卜 (Ibn Ghālīb)。
- 26 突尼斯 (Tūnis, 今突尼斯共和国的首都), 如艾布·阿拉伯《突尼斯学林层级传》(Kitāb Tabaqāt ‘Ulamā’ Tūnis)。
- 27 戈尔甘 (Jurjān, 今伊朗戈勒斯坦省的省会), 如萨赫米 (al-Sahmī, 约956—1036)《戈尔甘史》(Tārīkh Jurjān, 又名《戈尔甘学林知识》[Kitāb Ma’rifat ‘Ulamā’ Ahl Jurjān])。
- 28 杰齐拉 (al-Jazīrah, 介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 如艾布·阿鲁巴 (Abū ‘Arūbah, 约835—930)《杰齐拉史》(Tārīkh al-Jazīrah)。
- 29 阿尔赫西拉斯 (Algeciras, 阿拉伯人称为“杰齐拉-赫德拉”[al-Jazīrah al-Khadrā’, 意为“绿岛”], 位于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的斯省)。萨哈维提到了4名史学家及其著作, 其中包括伊本·巴撒姆 (Ibn Bassām, ? —1147) 的《宝库: 岛民良善》(al-Dhakhīrah fī Mahāsīn Ahl al-Jazīrah)。
- 30 哈兰 (Harran, 位于土耳其尚勒乌尔法省), 如韩玛德·哈拉尼 (Hammād al-Harrānī, 1117—1202)《哈兰史》(Tārīkh Harrān)。

- 31 阿勒颇 (Halab, 今叙利亚阿勒颇省的省会), 如伊本·阿迪姆《诉求目标: 阿勒颇史》(是中古时期最大篇幅的阿勒颇城市史)。
- 32 霍姆斯 (Hims, 叙利亚霍姆斯省的省会), 如艾哈迈德·巴格达迪 (Ahmad al-Baghdādī, ? —约 871)《霍姆斯人物史》(*Tārīkh al-Himsiyyīn*)。
- 33 呼罗珊 (Khurāsān, 大致包括今伊朗东北部、阿富汗西北部和中亚南部地区), 如萨腊米 (al-Sallāmī, 948—1003)《呼罗珊总督史》(*Tārīkh Wulāt Khurāsān*)。
- 34 希伯伦 (al-Khalīl, 位于约旦河西岸南部的历史悠久城市), 如鲁梅里 (al-Rumaylī, 1040—1099)《到访希伯伦》(*Fadl Ziyārat al-Khalīl*)。
- 35 花刺子模 (Khuwārazm, 位于中亚西部、阿姆河下游, 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交界地区), 如穆兹鲁鲁丁·花拉子米 (Muzhir al-Dīn al-Khuwārizmī, 1099—1173) 的八卷本《花刺子模史》(*Tārīkh Khuwārazm*)。
- 36 德拉雅 (Dārayyā, 位于今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 如浩腊尼 (al-Khawlānī, ? —约 981)《德拉雅史》(*Tārīkh Dārayyā*)。
- 37 大马士革 (Dimashq, 今叙利亚首都), 如伊本·阿萨奇的 80 卷本《大马士革史》(*Tārīkh Madīnat Dimashq*)。
- 38 克孜勒泰佩 (Kızıltepe, 阿拉伯人称为“杜内萨尔”[Dunaysar], 位于今土耳其马尔丁省), 如伊本·拉姆施 (Ibn al-Lamsh, 1178—约 1242)《杜内萨尔史》(*Kitāb Tārīkh Dunaysar*)。
- 39 拉卡 (al-Raqqah, 今叙利亚拉卡省的省会), 如穆罕默德·古谢利 (Muhammad al-Qushayrī, ? —946)《拉卡史与该地圣门弟子、再传圣门弟子、法学家及圣训学家》(*Tārīkh al-Raqqah wa-man nazalahā min Ashāb Rasūl Allāh Sallā Allāh ‘alayhi wa-Sallam wa-al-Tābi ‘īn wa-al-Fuqahā’ wa-al-Muhaddithīn*)。
- 40 雷伊 (al-Rayy, 位于今伊朗德黑兰省), 如伊本·拔巴韦赫 (Ibn Bābawayh, 1111—约 1204)《雷伊史》(*Tārīkh al-Rayy*)。
- 41 扎比德 (Zabīd, 又译作“宰比德”, 位于今也门西部海岸平原), 如欧玛拉·也默尼 (‘Umārah al-Yamanī, 1121—1174)《也门史: 原名〈萨那与扎比德纪事及其列王、精英与文豪之诗〉》(*Tārīkh al-Yaman: al-Musammā al-Mufīd fī Akhbār San ‘ā’ wa-Zabīd wa-Shu‘arā’ Mulūkihā wa-A’yānihā wa-Udabā’ihā*)。
- 42 萨迈拉 (Sāmarrā’, 位于今伊拉克萨拉赫丁省), 如伊本·艾比·白拉卡特 (Ibn Abī al-Barakāt, ?)《萨迈拉史》(*Tārīkh Sāmarrā’*)。
- 43 休达 (Ceuta, 阿拉伯人称为“萨卜塔”[Sabtah], 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 与摩洛哥接壤), 如伽迪·易雅得《六只眼睛: 休达纪事》(*al-‘Uyūn al-Sittah fī Akhbār Sabtah*)。
- 44 撒马尔罕 (Samarqand, 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旧都和第二大城市), 如纳萨斐 (al-Nasafī, 1068—1142)《糖块: 撒马尔罕学林纪录》(*al-Qand fī Dhikr ‘Ulamā’ Samarqand*)。
- 45 塞古拉 (Segura, 阿拉伯人称为“沙古拉”[Shaqūrah], 位于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哈恩省), 如伊本·伊德里斯 (Ibn Idrīs, ?)《塞古拉史》(*Tārīkh Shaqūrah*)。
- 46 设拉子 (Shīrāz, 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 如希巴图拉·什拉齐 (Hibat Allāh al-Shīrāzī, ? —1092)《设拉子史》(*Tārīkh Shīrāz*)。
- 47 上埃及 (al-Sa‘īd, 指埃及开罗以南直到苏丹边境的尼罗河谷地), 如伍德福伟 (al-Udfuwī, 1286—1347)《汇聚福星: 上埃及有德者与传述人名字》(*al-Tāli‘ al-Sa‘īd al-Jāmi‘ li-Asmā’ al-Fudalā’ wa-al-Ruwāh bi-a’lā al-Sa‘īd*)。
- 48 采法特 (Safad, 位于今以色列北部), 如伽迪·索法德 (Qādī Safad, 1317—约 1398)《采法特史》(*Tārīkh Safad*)。
- 49 西西里 (Sicillīyah, 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 现归意大利西西里大区管辖), 如艾布·栽德·加慕利 (Abū Zayd al-Ghamrī, ?)《西西里史》(*Tārīkh Sicillīyah*)。

- 50 萨那 (San‘ā’, 今也门首都), 如伊斯哈格·萨那尼 (Ishāq al-San‘ānī, ? —约1058)《萨那史》(Tārīkh San‘ā’).
- 51 桑哈贾地区 (Sinhājah, 指今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桑哈贾部落的聚居地)。在现存的《为史正名》所有手抄本中,“桑哈贾”一词后面是空白。值得一提的是,伊本·韩玛德·桑哈吉 (Ibn Hammād al-Sanhājī, ? —1231) 著有《必要片段:伊非里基亚与贝贾亚桑哈贾人纪事》(al-Nubdhah al-Muhtājah fī Akhbār Sinhājah bi-lfrīqiyah wa-Bijāyah)。
- 52 苏尔 (Sūr, 今黎巴嫩的主要港口之一), 如伊本·艾尔默纳齐 (Ibn al-Armanāzī, 1051—1115)《苏尔史》(Tārīkh Sūr)。
- 53 泰巴 (Tābah, 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的别称之一)。萨哈维没有提及相关著作。
- 54 的黎波里 (Tarābulus, 黎巴嫩地中海岸边古城, 今为北部省的省会), 如伊本·马赫璐夫 (Ibn Makhlūf, ? —1127)《的黎波里史》(Tārīkh Tarābulus)。
- 55 托莱多 (Toledo, 今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的首府), 如伊本·穆拓熙尔 (Ibn Mutāhīr, ? —1096)《托莱多法学家及其法官史》(Tārīkh Fuqahā’ Tulaytilah wa-Qudātuhā)。
- 56 伊拉克 (al-‘Irāq), 如伊本·伽图里 (Ibn al-Qātūlī, ?)《伊拉克史》(Tārīkh al-‘Irāq)。
- 57 阿什凯隆 (‘Asqālān, 位于今以色列南部区内盖夫西部), 如伊本·阿丹 (Ibn Ādam, 生活于10世纪)《阿什凯隆特色》(Fadā’il ‘Asqālān)。
- 58 阿斯卡尔-穆克拉姆 (‘Askar Mukram, 位于今伊朗胡齐斯坦省)。萨哈维只提到圣训学家艾布·艾哈迈德·哈桑·本·阿卜杜拉·本·萨义德·阿斯卡利。
- 59 格拉纳达 (Granada, 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格拉纳达省的省会)。萨哈维提到了艾布·阿卜杜拉·朱留 (Abū ‘Abd Allāh Juzayy, 1321—1356) 的《格拉纳达史》(Tārīkh Gharnātah)。
- 60 法里斯 (Fāris, 位于今伊朗南部)。萨哈维没有提到任何史学家和著作, 只说:“见上述的设拉子。”
- 61 非斯 (Fās, 今摩洛哥非斯-布勒曼大区首府), 如伊本·艾比·扎尔俄 (Ibn Abī Zar‘, ? —1340)《纸园趣藻:摩洛哥列王纪与非斯城史》(al-Anīs al-Mutrib bi-Rawḍ al-Qirtās fī Akhbār Mulūk al-Maghrib wa-Tārīkh Madīnat Fās)。
- 62 开罗 (al-Qāhirah, 今埃及首都)。在现存的《为史正名》所有手抄本中,“开罗”一词后面是空白。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开罗的历史著作非常丰富,如伊本·阿卜杜·扎希尔 (Ibn ‘Abd al-Zāhir, 1223—1293)《绚丽花园:开罗地志》(al-Rawḍah al-Bahīyah al-Zāhirah fī Khīṭat al-Mu‘izzīyah al-Qāhirah)。
- 63 科尔多瓦 (Córdoba, 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科尔多瓦省的省会), 如呼沙尼 (al-Khushanī, ? —971)《科尔多瓦法官》(Qudāt Qurtubah)。
- 64 卡鲁因 (al-Qarawīyūn, 位于今摩洛哥非斯市)。萨哈维只提到艾布·阿卜杜拉·伊本·哈黎思 (Abū ‘Abd Allāh Ibn Hārith, ?)。
- 65 加兹温 (Qazwīn, 今伊朗加兹温省的省会), 如艾布·叶尔腊·赫里里 (Abū Ya‘lā al-Khalīlī, 约978—1054)《加兹温特色》(Fadā’il Qazwīn)。
- 66 叶哈苏卜堡 (Qal‘at Yahsub, 又被称为本尼萨义德堡 [Qal‘at Banī Sa‘īd], 位于今西班牙格拉纳达市西北方向), 如伊本·萨义德·安达卢斯 (Ibn Sa‘īd al-Andalusī, 1214—1286)《汇聚福星:本尼萨义德史》(al-Tāli‘ al-Sa‘īd fī Tārīkh Banī Sa‘īd)。
- 67 凯鲁万 (al-Qayrawān, 今突尼斯凯鲁万省的省会), 如艾布·阿拉伯《凯鲁万人层级传》(Tabaqāt Ahl al-Qayrawān)。
- 68 渴石 (Kashsh, 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 [Shahrisabz] 的旧称), 如穆斯塔厄菲利 (al-Mustaghfirī, 961—1041)《渴石史》(Tārīkh Kashsh)。
- 69 库法 (al-Kūfah, 位于今伊拉克纳杰夫省), 如伊本·穆贾里德 (Ibn Mujālid, ?)《库法史》(Tārīkh al-Kūfah)。
- 70 蓝图纳 (Lamtūnah, 即蓝图纳部落聚居地, 位于今毛里塔尼亚)。在现存的《为史正名》所有手抄本中,“蓝图纳”一词后面是空白。值得一提的是,伊本·绥拉斐·加尔纳蒂 (Ibn al-Sayrafi al-Gharnāfi, 1074—1162) 著

有《蓝图尼王朝史》(*Tārīkh al-Dawlah al-Lamtūniyah*)。

- 71 马赞德兰 (Māzandarān, 位于里海南岸的伊朗省份), 如伊本·艾比·穆斯林 (Ibn Abī Muslim, ?)《马赞德兰史》(*Tārīkh Māzandarān*)。
- 72 马拉加 (Málaga, 今西班牙的第二大港口), 如艾斯巴格·玛立基 (Asbagh al-Māliqī, ? —1196)《马拉加良善名人通告》(*al-I'lām bi-Mahāsīn al-A'lām min Ahl Mālaqah al-Kirām*)。
- 73 麦地那 (al-Madīnah al-Munawwarah, 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 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省的省会)。这方面的著作比较丰富, 其中, 伊本·扎拔拉 (Ibn Zabālah, ? —约814) 的《麦地那纪事》(*Akhbār al-Madīnah*) 是第一部麦地那志, 成书于814年。
- 74 马拉盖 (Marāghah, 位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 如伊本·穆尚纳 (Ibn al-Muthannā, ?)《马拉盖史》(*Tārīkh Marāghah*)。
- 75 木鹿 (Merw, 位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州), 如萨姆阿尼《木鹿史》(*Tārīkh Marv*, 其手稿约五百捆)。
- 76 阿尔梅里亚 (Almería, 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的省会), 如伊本·哈提玛 (Ibn Khātimah, 1299—1369)《阿尔梅里亚优于安达卢西亚其他地区》(*Mazīyah al-Marīyah 'alā ghayrihā min al-Bilād al-Andalusīyah*)。
- 77 穆萨米达 (al-Musāmīdah, 即摩洛哥马斯穆达部落联盟的聚居地)。在现存的《为史正名》所有手抄本中, “穆萨米达”一词后面是空白。值得一提的是, 呼沙尼著有《穆萨米达、蓝图纳与桑哈贾史》(*Tārīkh al-Musāmīdah wa-Lamtūnah wa-Sinhājah*)。
- 78 埃及 (Misr, 位于非洲东北部)。这方面的著作比较丰富, 如伊本·阿卜杜·哈卡姆 (Ibn 'Abd al-Hakam, 803—871)《征服埃及纪》(*Futūh Misr wa-Akhbāruhā*)。
- 79 马格里布 (al-Maghrib, 包括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 如伊本·萨义德·安达卢斯的15卷本《马格里布饰宝奇籍》(*al-Mughrib fī Hulā al-Mughrib*)。
- 80 麦加 (Makkah, 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省会, 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这方面的著作非常多, 如穆罕默德·艾兹拉基 (Muhammad al-Azraqī, ? —约865)《麦加纪遗》(*Akhbār Makkah wa-mā jā'a fī-hā min al-Āthār*)。
- 81 摩苏尔 (al-Mawsil, 今伊拉克尼尼微省的省会), 如伊本·拔蒂施 (Ibn Bāṭish, 1179—1257)《摩苏尔史》(*Tārīkh al-Mawsil*)。
- 82 锡尔万 (Silvan, 阿拉伯人称为梅亚法里钦 [Mayyāfāriqīn], 位于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省), 如法黎基 (al-Fāriqī, 1117—约1181)《锡尔万史》(*Tārīkh Mayyāfāriqīn*)。
- 83 纳萨夫 (Nasaf, 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的首府卡尔希 [Qarshi]), 如穆斯塔厄菲利《纳萨夫史》(*Tārīkh Nasaf*)。
- 84 努赛宾 (Nusaybin, 位于今土耳其马尔丁省)。萨哈维未提到任何史学家和著作。值得一提的是, 伊本·易玛德·艾戈法赫斯 (Ibn al-'Imād al-Aqfahsī, 1349—1405) 有拉吉兹式格律诗《清晰开口: 努赛宾纪》(*al-Fath al-Mubīn fī Akhbār Jinn Nusaybīn*) 传世。
- 85 奈夫宰 (Nafzah, 位于今突尼斯巴杰省), 如伊本·穆阿迪卜 (Ibn al-Mu'addib, ?)《奈夫宰史》(*Tārīkh Nafzah*)。
- 86 内沙布尔 (Naysābūr 或 Nīsābūr, 位于今伊朗礼萨呼罗珊省), 如哈奇姆·内撒布利 (al-Hākim al-Naysābūrī, 933—1015) 的6卷本《内沙布尔史》(*Tārīkh Naysābūr*)。
- 87 赫拉特 (Harāt, 今阿富汗赫拉特省的省会), 如伊本·雅辛 (Ibn Yāsīn, ? —946)《赫拉特史》(*Tārīkh Harāt*)。
- 88 哈马丹 (Hamadhān 或 Hamadān, 今伊朗哈马丹省的省会), 如艾布·舒贾俄·代拉米 (Abū Shujā' al-Daylamī, 1053—1115)《哈马丹史》(*Tārīkh Hamadhān*)。

地学著作。¹

第九，各地学术史。萨哈维提到了麦地那、麦加、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埃及、亚历山大、巴格达、霍姆斯、库法、巴士拉、也门、安达卢西、马格里布、杰齐拉、迪纳瓦尔（al-Dīnawar，位于今伊朗克尔曼沙汗省）、哈马丹、雷伊、加兹温、戈尔甘、内沙布尔、图斯（Tūs，位于今伊朗礼萨呼罗珊省）、赫拉特、木鹿、巴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沙什（al-Shāsh，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下辖的一个地区）、费尔亚布（Firyāb，位于今阿富汗赫拉特市附近）、花刺子模、设拉子、克尔曼（Karmān，今伊朗克尔曼省的省会）、锡斯坦（Sijistān，位于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南部）、阿瓦士（al-Ahwāz，今伊朗胡齐斯坦省的省会）、图斯图尔（Tustur，今伊朗胡齐斯坦省的舒什塔尔〔Shūshṭar〕）、古米斯（Qūmis，位于今伊朗马赞德兰省和塞姆南省）、达姆甘（al-Dāmghān，位于今伊朗塞姆南省）、塞姆南（Simnān，今伊朗塞姆南省的省会）、巴斯塔姆（Bastām或Bistām，位于今伊朗塞姆南省）以及库赫斯坦（Qūhistān，位于伊朗高原中心、呼罗珊省南部）等城市和地区的学术活动。萨哈维在这部分内容的最后，还表达了对不了解中国、印度、撒哈拉等地学术活动的遗憾。

第十，整体史著作。萨哈维详略得当地重点介绍了《泰伯里史》，麦斯欧迪的《时代纪事》与《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伊本·焦齐的《历代帝王与民族通史》及其外孙西波特·伊本·焦齐（Sibt Ibn al-Jawzī，1185—1257）的《时代镜鉴：精英历史》，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及其续编伊本·撒仪《史传粹集》，艾布·沙玛《双园：努尔丁与萨拉丁两王朝纪事》，白尔札里（al-Barzālī，1267—1339）的《双园续踪》及其续编伊本·伽迪·舒赫巴（Ibn Qādī Shuhbah，1377—1448）《伊本·伽迪·舒赫巴史》，伊本·福瓦蒂（Ibn al-Fuwatī，1244—1323）的未清稿编年体世界通史巨著及其50卷本《别号辞典文集》，伊本·艾比·达姆（Ibn Abī al-Dam，1187—

89 瓦西特（Wāsit，位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和波斯湾之间），如巴哈沙勒（Bahshal，？—905）《瓦西特史》（*Tārīkh Wāsit*）。

90 也门（al-Yaman）。有关著作非常多，如哈姆达尼（al-Hamdānī，893—约956）的10卷本《冠：也门纪事与希木叶尔谱系》（*Kitāb al-Iklīl min Akhbār al-Yaman wa-Ansāb Himyar*）。

1 萨哈维提到的舆地学著作包括雅孤特·哈默维《地名辞典》（*Muʿjam al-Buldān*）、艾布·欧贝德·伯克利（Abū ʿUbayd al-Bakrī，1040—1094）《道里邦国志》（*al-Masālik wa-al-Mamālik*）和《疑难地名辞典》（*Muʿjam mā istaʿjama min Asmāʾ al-Bilād wa-al-Mawādiʾ*）、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等。

1244)的《穆扎法里大历史》，艾布·菲达(‘Abū al-Fidā’, 1273—1331)的《人类简史》，扎哈比的《伊斯兰史》《群英诸贤传》和《伊斯兰国家》及它们的续编等，萨哈维自己的《言语简洁：〈伊斯兰国家〉续编》，伊本·杰扎利(Ibn al-Jazarī, 1260—1338)《历代史事与贵族精英辞世信息录》，伊本·卡西尔(Ibn Kathīr, 1302—1373)《始末录》以及伊本·哈吉(Ibn Hajjī, 1350—1413)的续编，伊本·哈杰尔的《毕生闻讯告新学小生》，伊本·沙奇尔·库图比(Ibn Shākir al-Kutubī, 1282—1363)的《历史精粹》和《精英辞世录及其补遗》，贝伯尔斯·曼苏利(Baybars al-Mansūrī, 1247—1325)的《思想精髓：希吉莱史》，伊本·卡扎鲁尼(Ibn al-Kāzarūnī, 1214—1298)的《智妙园地》，努韦利(al-Nuwayrī, 1279—1333)的《文苑观止》，雅菲仪(al-Yāfī‘ī, 1298—1367)《天堂镜鉴与警醒教训：历史熟思知识》，伊本·福拉特(Ibn al-Furāt, 1335—1405)的百卷本编年史《直通坦途：哈里发与列王传记知识》，《伊本·赫勒敦史》，尔撒·扎沃维(‘Isā al-Zawāwī, 1266—1342)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历史》，伊本·杜戈玛戈的《万物观赏：伊斯兰史》《时代解释者：精英人物志》以及《珠串：伊玛目努尔曼弟子层级传》等，麦戈利齐(al-Maqrīzī, 1365—1442)《王国知识珠线》及萨哈维的续编，希腊勒·索比的40卷本《索比史》，伊本·赫里康(Ibn Khallikān, 1211—1282)的《精英辞世与时代名人信息录》及其续编等大量著作。

第十一，附录，包括：1. 史学家名单。萨哈维在大量参考麦斯欧迪《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绪论中所列史学家名单的基础上，修改增删后，按照人名的阿拉伯字母顺序罗列名单。其中，第一位是伊卜拉欣·本·阿卜杜·阿齐兹·本·叶哈雅·卡提卜，最后是优素斐(al-Yūsufī)。然后专门罗列编纂辞世录(al-Wafayāt)的史学家名单。第一位是艾布·侯赛因·阿卜杜·拔基·本·伽尼俄·巴格达迪，最后是爱尼(al-‘Aynī)。2. 史学家及其目标。萨哈维引用了伊本·焦齐的话来说明，每一名史学家的目标都各不相同，有些历史著作很肤浅，有些著作只关注大人物的活动，有些涵盖面非常广却忽略许多内容。3. 一些游记。比如，伊本·朱贝尔(Ibn Jubayr, 1145—1217)的游记。4.《圣训人物谈论者》(al-Mutakallimūn fī al-Rijāl)。萨哈维按照代际关系分组罗列了210位学者名单，引用扎哈比的观点讨论了谈论者的分类。

第十二，结语。萨哈维最后写明了该书的完成时间和地点，即公元1492年1月

(或2月)于麦加。

显而易见,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地域的阻隔以及对史学内涵认知的不同等因素,萨哈维未能把7至15世纪的数以千计阿拉伯伊斯兰史学家和汗牛充栋的史书尽皆收入《为史正名》,但该书以三个特点而成为中古时期最重要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第一,表现出强烈的史学使命感,即以捍卫史学的尊严为撰著动机。第二,谨遵“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不发无根据的议论,所有论见都立足于大量的前人观点。比如,在谈论历史裨益时,大量抄录许多著名学者的有关言论。第三,真正做到了集大成。但凡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籍,要么是披荆斩棘的推陈出新之作,要么是集大成而力求达到顶峰的著作。《为史正名》属于后者。

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灭亡后,阿拉伯史学坠入衰落期。但阿拉伯伊斯兰学术不仅没有彻底沉沦,反而获得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史学史撰述也未曾销声匿迹。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史著作中,史学史占有明显的地位。塔什库博鲁璐扎德(Taşköprülüzade, 1495—1561)在《幸福钥匙与黑暗明灯:诸学问题》中介绍了320余门学问,其中包括史学(‘Ilm al-Tawārīkh)及其分支学问,即诸如先知纪事学(*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武功纪与先知传记学、哈里发史学、诵经家层级传学、经注家层级传学、圣训学家层级传学、圣门弟子与再传圣门弟子传记学、沙斐仪学派层级传学、哈乃斐学派层级传学、马立克学派层级传学、罕百里学派层级传学、语法学家层级传学、哲学家层级传学、医者层级传学和武功纪学等。¹哈吉·哈里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学术史撰述,增加了对族谱学和阿拉伯日子学(‘Ilm Ayyām al-‘Arab)的介绍,把上述层级传学(‘Ilm al-Tabaqāt)的诸多分支合并成一门学问。他沿用了塔什库博鲁璐扎德对“史学”的定义,即“关于群体状况及其地域、礼节、习俗、人物技艺、谱系和辞世等的知识”,但大篇幅扩充了对史书的介绍,按照阿拉伯字母顺序罗列了1300部著作。²此后,奥斯曼帝国学者萨杰克里扎德(Saçaklızâde, ?—1732)的《诸学编整》和印度穆斯林学者斯迪格·哈桑汗(Siddīq Hasan Khān, 1832—1890)的《诸学字母顺序编录》等学术史名著,都把史

1 塔什库博鲁璐扎德:《幸福钥匙与黑暗明灯:诸学问题》第1册,第231—246、260—262页;第2册,第553页。

2 哈吉·哈里发:《书艺题名释疑》第1册,第243—245、266、324—362页;第2册,第366—376页。

学视为一门重要学问来介绍。¹后者的著作大篇幅抄录塔什库博鲁扎德和哈吉·哈里发的作品内容。他在第三卷专门收录二十大学问和两圣地、也门、印度、根璐杰（Qanūj，位于今印度北方邦）、博帕尔（Būbāl，今印度中央邦首府）的学林人物志。史学家独占其一。²

显然，古代阿拉伯人对史学史的整体认知，基本上停留在罗列史家名字（或简短传记）和史书名称的层面上。虽然诞生了萨哈维《为史正名》那样的巅峰作品，但绝大部分撰述离学科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还有一些距离。不过，我们不应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过分苛责古人。因为他们为近现代学者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项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三、近现代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

尽管古代阿拉伯学术界不乏重视史学史的学者，但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却兴起于西方。它在西方学术温床上被孕育了三百多年才得以诞生。1566年，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出版了《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首次对历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省。³他在该书的最后部分罗列了一份书目，其中提到一些阿拉伯史学家和研究阿拉伯的西方史学家及他们的著作。⁴1713年，法国史学家弗雷斯诺伊（Nicolas Lenglet Du Fresnoy，1674—1755）出版的《历史研究方法论》（*Méthode pour Étudier L'Histoire*）第2卷，罗列了一份长达344页的“主要历史学家目录”（*Catalogue des Principaux Historiens*）。它是对让·博丹书目的扩充。1732年，艾布·菲达的《人类简史》在英国牛津首次印刷出版，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阿拉伯文

1 萨杰克里扎德：《诸学编整》（Muhammad ibn Abī Bakr al-Mar‘ashī [al-Shahīr bi-Sājaqlīzādah], *Tartīb al-‘Ulūm*），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赛义德·艾哈迈德研究与校勘，贝鲁特：伊斯兰福音出版社，1988年，第189—190页。斯迪格·哈桑汗：《诸学字母顺序编录》（Siddiq ibn Hasan al-Qanūjī, *Abjad al-‘Ulūm*）第2卷，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37—141页。

2 斯迪格·哈桑汗：《诸学字母顺序编录》第3卷，第89—105页。

3 张广智主编，张广智著：《西方史学通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4 参见博丹：《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朱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6—459页。

历史典籍之一。1789—1794年，该书的部分内容被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出版。¹它成为当时欧洲人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历史的基本参考书。但直到萨西（A. I. Silvestre de Sacy, 1758—1838）在1806年用法文介绍伊本·赫勒敦著作的片段为止，“欧洲对这位最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土耳其学者保持着对他的最重要著作《绪论》的知识”²。

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才真正开始大量“复活”阿拉伯史学遗产。1882年，德国东方学大师费迪南·乌斯坦菲尔德（Ferdinand Wüstenfeld, 1808—1899）推出的《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梳理了590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概况。³这在西方学术史上首次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的辉煌成就。⁴1898年，西班牙东方学家博伊格（Francisco Pons Boigues, 1861—1899）出版了《阿拉伯—西班牙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穆斯林统治时期的西班牙300多位用阿拉伯文撰述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⁵1898—1902年，德国东方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 1868—1956）的两卷本《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先后问世。他在这部著作中按照历史书的类型，即先知传、城市史、古代阿拉伯史、民族与列国志、文明与文化史、埃及与北非史、也门史、安达卢西史、单人传记、王朝史、人物志与族谱书、方志、哈里发史与世界史、诸先知史，介绍了220多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的手抄本流传和校勘出版情况。⁶至此，西方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基础被初步奠定。此时正值史学史研究在西方将要发展成一个专门学科的时代。

1 乔治·宰丹：《阿拉伯语言文学史》（Jurjī Zaydān, *Kitāb Tārīkh Ādāb al-Lughah al-'Arabīyah*）第3卷，开罗：新月印书馆，1913年，第187页。

2 马小鹤：《伊本·赫勒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253页。

3 Ferdinand Wüstenfeld, *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Araber und ihre Werke*, Göttingen: 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882.

4 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Leiden: E. J. Brill, 1968, pp. 3—4.

5 Francisco Pons Boigues, *Ensayo Bio-bibliográfico Sobre Los Historiadores Y Geógrafos Árabe-españoles*, Madrid: Estab. Tip. de San Francisco de Sales, 1898.

6 卡尔·布罗克尔曼：《阿拉伯文学史》（Carl Brockelmann, *Tārīkh al-Adab al-'Arabī*）第3册，阿卜杜·哈里姆·纳贾尔译，开罗：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第6册，赛义德·叶尔孤卜·伯克尔译，开罗：知识出版社，1983年。

20世纪初至40年代，西方的史学史研究获得了良好发展。瑞士史学家傅埃脱（Eduard Fueter，1876—1928）的《新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1911）、英国史学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德国史学家里特尔（Moriz Ritter，1840—1923）的《历史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9）、加拿大裔美籍史学家绍特威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1922）、美国史学家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7）以及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42）等著作影响至今。¹有学者把该时期西方的史学史研究视为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²在这个记述性论著流行的发展阶段，西方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也由简单地罗列史家史书目录，过渡到更详细地记述史家生平和著作以及史学发展概貌的模式。

其中，在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专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该时期西方学者，是法国的伊斯兰史学史研究者莱维-普罗旺萨尔（Évariste Lévi-Provençal，1894—1956）和英国东方学家马戈柳斯（David Samuel Margoliouth，1858—1940）。1922年，普罗旺萨尔出版了《谢里夫家族的史学家：16至20世纪的摩洛哥历史传记文学》一书。³1977年，阿尔及利亚裔摩洛哥籍史学家阿卜杜·伽迪尔·赫腊迪（‘Abd al-Qādir al-Khallādī，1907—1977），成功地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⁴该书主要由引言、4个部分内容和结论构成：第1部分，谈论历史的理解；第2部分，研究摩洛哥萨阿德王朝和阿拉维王朝的史学家；第3部分，介绍16—18世纪摩洛哥的传记作家；第4部

1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给阿拉伯史学安排了一个位置。这部历史目录学史著作的第20章是“中世纪阿拉伯、波斯和蒙古历史学家”。参见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59—603页。

2 陈恒：《西方史学史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 Évariste Lévi-Provençal, *Les Historiens des Chorfa: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Et Biographique au Maroc du Xvie au Xxe Siècle*, Paris: Émile Larose, 1922.

4 莱维-普罗旺萨尔：《谢里夫家族的史学家》（Lévi-Provençal, *Mu'arrikhū al-Shurafā'*），阿卜杜·伽迪尔·赫腊迪译，拉巴特：摩洛哥编辑翻译出版社，1977年。

分,讨论现代摩洛哥7名史学家和传记作家。

1929年2月,马戈柳斯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讲座。翌年,他把讲稿结集出版,书名为《阿拉伯历史学家演讲》。¹整本讲稿由“主题概论”、“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阿拉伯历史的开端”、“作为历史工具的诗歌”、“伊斯兰历2世纪的史学家”(介绍了伊本·伊斯哈格、瓦基迪和伊本·萨尔德等8位史学家)、“伊斯兰历3世纪的史学家”(介绍了泰伯里、白拉祖里和伊本·古台巴等6位史学家)、“伊斯兰历4世纪的史学家”(介绍了米斯凯韦[Miskawayh, 932—1030]、宿里和伽迪·塔努黑[al-Qādī al-Tanūkhī, 939—994]共3位史学家)以及“晚近的史学家”(介绍了赫蒂卜·巴格达迪、伊本·赫勒敦和伊本·伊雅斯[Ibn Iyās, 1448—约1524]等8位生活于公元11世纪至16世纪初的史学家)共八个部分内容构成。该书与同时代西方的其他史学史著作相似,包含了不少批评性见解,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²

论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东方学家吉布(H. A. R. Gibb, 1895—1971, 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在1938年为《伊斯兰百科全书(增补卷)》英文版撰写的长词条《史学》(Ta'rikh)。³1981年,贝鲁特的黎巴嫩图书出版社单独出版了它的阿拉伯文

1 D. S. Margoliouth, *Lectures on Arabic Historian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Calcutta, February 1929]*,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0.

2 埃及史学家侯赛因·纳索尔(Husayn Nassār, 1925—2017)把该书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书名译为《阿拉伯史学家研究》(*Dirāsāt 'an al-Mu'arrikhīn al-'Arab*),由贝鲁特文化出版社(Dār al-Thaqāfah)首次出版(具体出版时间不详)。

3 除了下文介绍的两篇论文,还有多篇论文值得注意,如:1906年,意大利东方学家伊格纳齐奥·圭迪(Ignazio Guidi, 1844—1935)的《闪米特人的史学》(*L'historiographie chez les Sémites*); 1927—1928年,德国犹太裔东方学家约瑟夫·霍罗维茨(Josef Horovitz, 1874—1931),在《伊斯兰文化》(*Islamic Culture*)上发表的《早期先知传及其作者们》(*The Earliest Biographies of the Prophet and Their Authors*)系列文章; 1928年,德国史学家库尔特·布雷西格(Kurt Breysig, 1866—1940)的《阿拉伯史学的开端》(*Die Anfänge der Arab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1932年,匈牙利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索莫吉(Joseph de Somogyi, 1899—1976)的《伊本·焦齐的〈通史〉》(*The "Kitāb al-muntazam" of Ibn al-Jauzī*)和《扎哈比的〈伊斯兰史〉》(*The Ta'rikh al-Islām of adh-Dhahabī*); 1936年,法国史学家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 1909—1991)的《伊斯坦布尔图书馆中关于叙利亚、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编年史:从阿拉伯征服到奥斯曼征服》(*Les Chroniques Arabes Concernant la Syrie, L'Égypte et la Mésopotamie, de la Conquête Arabe à la Conquête Ottomane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d'Istanbul*); 1936年,莱维-普罗旺萨尔的《伊斯兰史学家》(*L'historien de l'Islam*); 等等。更多相关论文和著作,参见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pp. XIV—XVI。

译本。¹吉布勾勒了7—19世纪伊斯兰史学（主要由阿拉伯伊斯兰史学、伊朗伊斯兰史学、土耳其伊斯兰史学和印度伊斯兰史学等分支构成）的四个阶段发展概貌。与该文相比，德裔美籍女学者伊利斯·利希滕斯塔特（Ilse Lichtenstadter，1902—1991）在1945年发表的《阿拉伯与伊斯兰史学》一文，无论在史料的运用，还是在分析的透彻度方面都稍逊一筹。²

在西方史学潮流的冲击下，现代阿拉伯史学界对自身史学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初拉开了帷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9月2日）前出版的较多地谈论到史学的阿拉伯文著作，至少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把史学作为阿拉伯文明史或语言文化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来研究。1902—1906年，黎巴嫩学者乔治·宰丹（Jurjī Zaydān，1861—1914）陆续推出5卷本《伊斯兰文明史》。他在第3卷中用9页半篇幅简明扼要地谈论阿拉伯伊斯兰史学。³1911—1914年，他又陆续出版4卷本《阿拉伯语言文学史》。其中，第1卷用一节内容来谈伍麦叶王朝时期的阿拉伯史学；第2和3卷都辟出三章内容来讲历史与史家。⁴比乔治·宰丹年轻的埃及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Ahmad Amīn，1886—1954），从1928年开始推出他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研究方面的系列著作，即《伊斯兰黎明时期》《伊斯兰近午时期》和《伊斯兰正午时期》，给予了史学足够的重视。⁵

1 H. A. R. Gibb, "Ta'rikh", in M. Th. Houtsma et al., eds.,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Supplement*, Leiden: E. J. Brill, 1938, pp. 230—245; H. A. R. 吉布：《史学》（H. A. R. Gibb, *ʿIlm al-Ta'rikh*），《伊斯兰百科全书》翻译委员会译，贝鲁特：黎巴嫩图书出版社，1981年。

2 Ilse Lichtenstadter, "Arabic and Islamic Historiography", *The Moslem World*, Vol. 35, Issue 2, 1945, pp. 126—132.

3 乔治·宰丹：《伊斯兰文明史》（Jurjī Zaydān, *Tārīkh al-Tamaddun al-Islāmī*）第3卷，开罗：新月印书馆，1904年，第86—95页。

4 第4卷谈到卒于1812至1907年间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参见乔治·宰丹：《阿拉伯语言文学史》（Jurjī Zaydān, *Kitāb Tārīkh ʿĀdāb al-Lughah al-ʿArabīyah*）第1卷，开罗：新月印书馆，1911年，第230—232页；第2卷，开罗：新月印书馆，1912年，第145—151、191—200、312—325页；第3卷，第60—83、148—218、291—325页；第4卷，开罗：新月印书馆，1914年，第281—295页。

5 《伊斯兰黎明时期》（*Fajr al-Islām*）原计划共3卷，谈论从伊斯兰初期到伍麦叶王朝末期的学术、政治与文学，分别由艾哈迈德·爱敏、阿卜杜·哈密德·阿拔迪（ʿAbd al-Hamīd al-ʿAbbādī，1892—1956）和塔哈·侯赛因（Tāhā Husayn，1889—1973）各写一卷。但最终，只有艾哈迈德完成了谈论学术的第1卷（开罗：编辑翻译出版委员会，1928年）。3卷本《伊斯兰近午时期》（*Duhā al-Islām*）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33、1935和1936年。4卷本《伊斯兰正午时期》（*Zuhr al-Islām*）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45、1952、1953和1955年。最后一卷在艾哈迈德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哲学家艾哈迈德·福阿德·艾赫沃尼（Ahmad Fuʾād al-Ahwānī，1908—1970）整理出版。

第二，史家史书个案研究。比如，“阿拉伯文学泰斗”塔哈·侯赛因用法文写的第二博士学位论文《伊本·赫勒敦社会哲学》的阿拉伯文译本，“阿拉伯民族主义之父”撒缇俄·胡士利（Sāti‘ al-Husrī, 1883—1968）的《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研究》以及叙利亚作家优素福·易什（Yūsuf al-‘Ishsh, 1911—1967）的《赫蒂卜·巴格达迪》等。¹

第三，某种类型史书研究。埃及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易南（Muhammad ‘Abd Allāh ‘Inān, 1898—1986）在《伊斯兰埃及与埃及地志史》一书中，研究了伊本·阿卜杜·哈卡姆、麦戈利齐、杰巴尔提（al-Jabartī, 1754—1825）和阿里·穆巴拉克（‘Alī Bāshā Mubārak, 1823—1893）等约20位生活于9至19世纪的史学家和地志名家及其著作。²

第四，史学方法论研究。1939年，黎巴嫩基督教史学家阿萨德·鲁斯图姆（Asad Rustum, 1879—1965）出版了《历史术语》，开启了现代阿拉伯史学方法论革新的时代。³四年后，埃及史学家哈桑·奥斯曼（Hasan ‘Uthmān, 1892—1968）的《历史研究法》问世。⁴后者经久不衰，被一些阿拉伯高校作为史学方法论经典教材。

同时期的中国学者在打开国门看世界和“新史学”思潮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也开始关注阿拉伯史学。早在13世纪（甚至可能更早），阿拉伯（或波斯）史学典籍就已经传入中国。元代的《秘书监志》中就提到“至元十年十月……帖里黑《总年号国名》三部”⁵。此处的“帖里黑”是意为“历史”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单词的音译。也就是说，1273年（至元十年），元秘书监直属的北司天台藏书中有三部阿拉伯（或波斯）史学典籍。不过，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才真正开始介绍

1 塔哈·侯赛因：《伊本·赫勒敦社会哲学：分析与评论》（*Tāhā Husayn, Falsafat Ibn Khaldūn al-Ijtīmā‘īyah: Tahlīl wa-Naqd*），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易南译，开罗：编辑翻译出版委员会，1925年。撒缇俄·胡士利：《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研究》（*Sāti‘ al-Husrī, Dirāsāt ‘an Muqaddimat Ibn Khaldūn*），贝鲁特：凯沙夫印书馆，1943年。优素福·易什：《赫蒂卜·巴格达迪：巴格达的史学家与圣训学家》（*Yūsuf al-‘Ishsh, al-Khatīb al-Baghdaḍī: Mu‘arrikh Baghdād wa-Muhaddithuhā*），大马士革：阿拉伯书店，1945年。

2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易南：《伊斯兰埃及与埃及地志史》（*Muhammad ‘Abd Allāh ‘Inān, Misr al-Islāmīyah wa-Tārīkh al-Khitat al-Misriyah*），开罗：埃及图书馆出版社，1931年。

3 阿萨德·鲁斯图姆：《历史术语》（*Asad Rustum, Mustalah al-Tārīkh*），贝鲁特：美国出版社，1939年。

4 哈桑·奥斯曼：《历史研究法》（*Hasan ‘Uthmān, Manhaj al-Baḥth al-Tārīkhī*），开罗：伊尔提玛德印书馆，1943年。

5 王士点、商企翁编次：《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130页。

阿拉伯史学家和阿拉伯史书。1919年，我国回族学者李廷相译介的阿拉伯史学家木海默第《天方大化历史》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问世的伊斯兰教列圣故事汇编译著。¹1928年，年轻的郭斌佳（1906—？）翻译出版了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林特（Robert Flint, 1838—1910）的《历史哲学概论》（*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893）。该书提醒人们不可以忘记中古时期伊斯兰史学，重点谈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称赞他的《历史绪论》是“传之万世而不朽”的著作。²1930年，史学家张星烺（1889—1951）耗费十余年时间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得以出版，全六册售价大洋7元5角。其中第三册汇编关于“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和“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之交通”的记载，提到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 1304—1377，张译：依宾拔都他）的《游记》、《苏烈曼游记》、麦斯欧迪《黄金草原》（张译：麻素提《黄金牧地》）和艾布·菲达《地名辞典》（张译：阿伯尔肥达《地理书》）等十多位阿拉伯旅行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及其著作。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撰写集中谈论阿拉伯史学的作品。1944年，阿拉伯语教育家马坚（1906—1978）在1933年翻译完成的荷兰学者第·博雅（T. J. De Boer, 1866—1942）所著《回教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Islam*, 1901），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³该书涉及古代阿拉伯史学遗产、麦斯欧迪、伊本·米斯凯韦和伊本·赫勒敦等内容。马坚在译完重要章节后，以“译者按”的形式对译文展开了研究。1945年，中央大学油印了阿拉伯语教育家纳忠（1909—2008）的《回教诸国文化史》（节略本）。该书改编自他在1939年翻译出版的阿哈谟德·爱敏（后来改译成“艾哈迈德·爱敏”）《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⁴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专著，也是我国首部把阿拉伯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著作。作者谈到了阿拉伯史学的起源，按体裁分类阐述了阿拉伯史学的成就，还辟专章论述伊本·赫勒敦及其史学成就。同年，社会学家陈定閔（1912—1992）发表专文讲伊本·赫勒敦的生平，评论其《历史绪论》所体现的社会

1 李廷相译著：《天方大化历史》，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5页。

2 R. 弗林特：《历史哲学概论》，郭斌佳译，上海：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31—146、271—296页。

3 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该书。1958年，该书修订更名为《伊斯兰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4 阿哈谟德·爱敏：《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纳忠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学思想。¹ 以上译著和介绍性论著为后来新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史学史研究进入了学科史学史发展阶段。史学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或伊斯兰史学史、穆斯林史学史）的西方学者也推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综合性、专题性、区域性、阶段性（包括断代）和个案研究等类型论著。²

1952年，德裔美籍犹太人、东方学家弗朗兹·罗森索尔（Franz Rosenthal，1914—2003）的《穆斯林史学史》（*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初版（1968年第2版）问世。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世界级综合性史学史专著，由三大部分内容构成：第一，研究阿拉伯史学的性质、历史书写的类型、史书的艺术表现形式、阿拉伯史学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史学史上的地位。第二，介绍和摘译伊冀的《史学宝鉴》、卡菲耶冀的《史学撮要》、萨哈维的《为史正名》、塔什库博鲁璐扎德的《幸福钥匙与黑暗明灯：诸学问题》中关于史学的论述。第三，选录伊本·法利贡（Ibn Farīghūn，？—约961）、法赫鲁丁·拉齐（Fakhr al-Dīn al-Rāzī，1150—1210）以及麦戈利齐等学者谈到历史与史学的阿拉伯著作部分原文。1963年，伊拉克史学家索里哈·艾哈迈德·阿里（Sālih Ahmad al-‘Alī，1918—2003）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后，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史学史著作之一。³ 叙利亚著名史学史家沙奇尔·穆斯塔法（Shākir Mustafā，1921—1997）在回顾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时，高度评价罗森索尔《穆斯林史学史》，说：“它是至今为止使用新科学方法全面研究阿拉伯史学的世界上第一部 and 最重要的著作。”⁴ 当代黎巴嫩翻译家利得旺·赛义德（Ridwān al-Sayyid）认为，该书除了集东方学家们研究阿拉伯史学史之大成外，还在两个方面超越前人和同时代的类似著作：其一是大量挖掘阿拉伯人写的论述史学的文献；其二是较为客

1 陈定阔：《回教社会学家伊本·哈勒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

2 参见 Chase F. Robinson, “The Study of Islamic Historiography: A Progress Repor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No. 2, 1997, pp. 199–227。

3 弗朗兹·罗森索尔：《穆斯林史学史》（Franz Rosenthal, *‘Ilm al-Ta’rīkh ‘inda al-Muslimīn*），索里哈·艾哈迈德·阿里译，巴格达 & 纽约：富兰克林公司，1963年。

4 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家：伊斯兰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史学人物知识研究》（Shākir Mustafā, *al-Tārīkh al-‘Arabī wa-al-Mu’arrikhūn: Dirāsah fī Tatawwur ‘Ilm al-Tārīkh wa-Ma’rifat Rijālihi fī al-Islām*）第1卷，贝鲁特：大众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观地分析评价阿拉伯史学。¹

论文方面，较具影响力的如英裔美籍犹太人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 1916—2018）和英国史学家霍尔特（P. M. Holt, 1918—2006）主编的论文集《中东史学家》。²它堪称把“多元共存”中东史学视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的典范之作，收录了41篇从各个层面研究中东史学的论文，分为四组：

第一组论“截至伊历12世纪（公元19世纪）的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和土耳其史学”，收录论文22篇，包括英国史学家瓦特（W. M. Watt, 1909—2006）的《伊本·伊斯哈格使用的资料》、弗朗兹·罗森索尔的《圣经传统对穆斯林史学的影响》、伊拉克史学家阿卜杜·阿齐兹·杜里（‘Abd al-‘Azīz al-Dūrī, 1919—2010）的《伊拉克历史学派概论：截至9世纪》、吉布的《伊斯兰传记文学》、法国史学家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 1909—1991）的《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史学》、埃及开罗大学穆罕默德·希勒米（M. Hilmy, ?）的《赞吉王朝和艾尤卜王朝时期的阿拉伯史学（1127—1250）》、意大利阿拉伯学家弗朗西斯科·加布里埃利（Francesco Gabrieli, 1904—1996）的《关于十字军战争的阿拉伯史学作品》、叙利亚作家萨米·达汉（Sami Dahan, 1912—1971）的《叙利亚地方史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法国史学家夏尔·佩拉特（Charles Pellat, 1914—1992）的《西班牙穆斯林史学的起源与发展》等。

第二组讲“欧洲关于近东和中东的历史编纂学（自中世纪至今）”，收录论文10篇。

第三组谈“现代中东的历史书写”，收录论文6篇，包括以色列史学家戴维·阿亚隆（David Ayalon, 1914—1998）的《史学家杰巴尔提》、埃及史学家杰玛路丁·谢雅勒（Jamāl al-Dīn al-Shayyāl, 1911—1967）的《19世纪埃及史学》以及巴勒斯坦史学家纳比赫·爱敏·法里斯（Nabīh Amīn Fāris, 1906—1968）的《关于阿里与穆阿维叶之间冲突的历史书写之发展》等。

第四组是“一般主题”，收录论文3篇。其中，最后一篇专论伊斯兰史上的历史编纂与理解伊斯兰之间的关系，出自加拿大神学家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 1916—2000）之手。

1 弗朗兹·罗森索尔：《穆斯林史学史》（Franz Rosenthal, *‘Ilm al-Ta’rīkh ‘inda al-Muslimīn*），索里哈·艾哈迈德·阿里译，利得旺·赛义德作序，贝鲁特：伊斯兰轴心出版社，2017年，序，第2页。

2 Bernard Lewis and P. M. Holt, eds.,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尽管有学者说，上述论文集“已经过时”¹，但它仍然能够为我们理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与五千多年“多元共存”中东史学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借鉴。

此外，除了英国史学家舒埃里（Y. M. Choueiri）的《阿拉伯历史与民族国家：现代阿拉伯史学研究（1820—1980）》和美国学者克拉布斯（Jack A. Crabbs）的《19世纪埃及的历史书写》等著作被当代全球史学史研究者列入关于阿拉伯史学的“推荐阅读书目”外。²一些非西方学者也使用西文撰写了谈论阿拉伯史学史的著作。

1959年，黎巴嫩史学家萨里比（Kamal S. Salibi，1929—2011）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马龙派传统史学研究（1100—1516）》（*Studies on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ronites on the Period 1100—1516*, 1953）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中世纪黎巴嫩马龙派历史学家》出版。³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这个选题是由伯纳德·路易斯提出的。

1968年，任教于孟加拉国拉吉沙希大学的印度穆斯林学者拉苏勒（M. G. Rasul，1921—1997）用英文写的《穆斯林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出版。⁴该书分为“阿拉伯史学”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史学”两大部分。

1994年，当代巴勒斯坦史学家塔利夫·哈里迪（Tarif Khalidi）的英文著作《古典时期的阿拉伯历史思想》出版。⁵他在该书中深刻地讨论了阿拉伯史学的兴起过程，历史与圣训、文学、哲学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近三十年来，该书一直是关于阿拉伯历史思想的最好著作。1997年，胡斯尼·栽纳赫（Husnī Zaynah）把该书翻译成了阿拉伯文（*Fikrat al-Tārīkh ‘inda al-‘Arab min al-Kitāb ilā al-Muqaddimah*），由贝鲁特的纳贺尔出版社（Dār al-Nahār）首次出版。

可以说，战后西方学者在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挑动了阿拉伯先进知识分子的神经。在阿拉伯文化复兴浪潮的席卷下，这些知识分子致力于埋首尘封的

1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第二版），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30页。

2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等：《全球史学史》（第二版），第630—631页。Youssef M. Choueiri, *Arab History and the Nation-State: A Study in Modern Arab Historiography 1820—1980*, London: Routledge, 1989. Jack A. Crabb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A Study in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Kamal S. Salibi, *Maronite Historians of Medieval Lebanon*,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59.

4 M. G. Rasul,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Lahore: Sh. Muhammad Ashraf, 1968.

5 Tarif Khalidi, *Arabic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故纸堆，用极大的热情“复活”了一大批几乎被人们遗忘或忽略的珍贵阿拉伯史籍。许多史学家也把他们的目光聚焦到了史学史研究上，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其中，经常被21世纪学者们提及的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著作有：埃及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雅达（Muhammad Mustafā Ziyādah, 1900—1968）的《公元15世纪埃及史学家》¹，伊拉克阿拔斯·阿札维（‘Abbās al-‘Azzāwī, 1890—1971）的《蒙古与土库曼时期的史学家介绍》²，埃及侯赛因·纳索尔（Husayn Nassār, 1925—2017）的《阿拉伯历史编纂学的起源》³，伊拉克阿卜杜·阿齐兹·杜里的《阿拉伯史学的起源》⁴，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加尼·哈桑（Muhammad ‘Abd al-Ghanī Hasan, 1907—1985）的《阿拉伯史学》⁵，叙利亚努尔丁·哈图姆（Nūr al-Dīn Hātūm, 1913—2000）等人的《历史入门》⁶，埃及赛义德·阿卜杜·阿齐兹·撒里姆（al-Sayyid ‘Abd al-‘Azīz Sālim, 1928—2003）的《阿拉伯历史与史家》⁷以及沙奇尔·穆斯塔法的《阿拉伯历史与史家：伊斯兰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史学人物知识研究》等。⁸

在以上著作中，沙奇尔·穆斯塔法的四卷本《阿拉伯历史与史家：伊斯兰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史学人物知识研究》最为全面、详细地讲述了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

1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雅达：《公元15世纪埃及史学家》（Muhammad Mustafā Ziyādah, *al-Mu‘arrikhūn fī Miṣr fī al-Qarn al-Khāmis ‘Ashar al-Milādī [al-Qarn al-Tāsi‘ al-Hijrī]*），开罗：编辑翻译出版委员会，1949年。

2 阿拔斯·阿札维：《蒙古与土库曼时期的史学家介绍（1204—1534）》（‘Abbās al-‘Azzāwī, *al-Ta‘rīf bi-al-Mu‘arrikhīn fī ‘Ahd al-Mughūl wa-al-Turkumān [601 H./1204 M.–941 H./1534 M.]*），巴格达：商务出版有限公司，1957年。

3 侯赛因·纳索尔：《阿拉伯历史编纂学的起源》（Husayn Nassār, *Nash‘at al-Tadwīn al-Tārīkhī ‘inda al-‘Arab*），开罗：埃及复兴书店，1959年。

4 阿卜杜·阿齐兹·杜里：《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研究》（‘Abd al-‘Azīz al-Dūrī, *Baḥṭh fī Nash‘at ‘Ilm al-Tārīkh ‘inda al-‘Arab*），贝鲁特：天主教会印刷所，1960年。该书后来改名为《阿拉伯史学的起源》（*Nash‘at ‘Ilm al-Tārīkh ‘inda al-‘Arab*），多次印刷出版。

5 穆罕默德·阿卜杜·加尼·哈桑：《阿拉伯史学》（Muhammad ‘Abd al-Ghanī Hasan, *‘Ilm al-Tārīkh ‘inda al-‘Arab*），亚历山大：现代印刷公司，1961年。

6 努尔丁·哈图姆等：《历史入门》（Nūr al-Dīn Hātūm wa-Ākharūn, *al-Madkhal ilā al-Tārīkh*），大马士革：英沙印书馆，1964年。

7 赛义德·阿卜杜·阿齐兹·撒里姆：《阿拉伯历史与史家》（al-Sayyid ‘Abd al-‘Azīz Sālim,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al-‘Arab*），开罗：阿拉伯作家出版社，1967年。

8 沙奇尔·穆斯塔法：《阿拉伯历史与史家：伊斯兰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史学人物知识研究》（Shākir Mustafā, *al-Tārīkh al-‘Arabī wa-al-Mu‘arrikhūn: Dirāsah fī Tatawwur ‘Ilm al-Tārīkh wa-Ma‘rifat Rijālihi fī al-Islām*）第1—4卷，贝鲁特：大众知识出版社，1978—1993年。

历程,展现了数以千计史学家的成就。其中,第1卷,主要由两大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探讨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的起源及其构成;第二部分研究10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东部地区的历史编纂学概况。第2卷,讨论10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的伊拉克历史学派、埃及学派、沙姆学派、也门学派、波斯学派和基督教学派。第3卷,介绍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的史学家与史学,详谈24位史学大家,提到183位一般史学家。第4卷,由四个部分内容构成:1. 沙姆学派,详谈46位史学大家,提到292位一般史学家。2. 也门学派,详谈16位史学大家,提到106位一般史学家。3. 伊拉克与伊朗学派,详谈25位史学大家,提到215位一般史学家。4. 希贾兹与安纳托利亚的附庸学派,提及希贾兹的9位史学大家和22位一般史学家,奥斯曼帝国治下安纳托利亚的4位史学大家、77位一般史学家。

相对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学术界而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的中国学者遗憾地错过了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阿拉伯史学史(甚至中东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两次良机。第一次错过是在60年代初。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召开。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从而掀起了一股“史学史热”。中国史学史研究由沉寂时期蹦向活跃时期。¹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由萌芽阶段迈向奠基阶段。²但此时,我国的阿拉伯历史和中东史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³,全面开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主要是严重缺乏相关人才)。

第二次错过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活力春天,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探索领域不断拓展,论著数量猛烈增长,理论创新层出不穷,学科建设稳步推进。⁴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的“东传”进入了兴盛期,出现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步入了“快车道”。⁵春风润万物,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也“迎风起舞”。我国

1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5—356页。

2 张广智主编,张广智著:《西方史学通史》第1卷,第150—157页。

3 王铁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东史研究》,《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

4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第356—377页。

5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四版),第424页。

自主培养的首位阿拉伯语专业博士赵军利女士（1955—1993）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世纪阿拉伯的史学发展》，“具有拓荒和填补空白的性质，是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工作”¹。但她因公出差，在国外英年早逝，致使史业未遂。²

《中世纪阿拉伯的史学发展》由绪言和六章内容构成。其中，第1章，探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其实是历史意识）；第2章，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萌芽（7—8世纪）；第3章，论述阿拉伯史学的形成与发展（8—9世纪）；第4章，讨论阿拉伯史学的繁荣与鼎盛（10—14世纪）；第5章，分析阿拉伯人的历史研究方法³；第6章，介绍阿拉伯史学家对中国的记载。作者在文中认为，阿拉伯史学成就非凡，其史籍数量之大、涉及面之广、体例之丰、种类之多和著史者之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史学难以企及的。虽然该文只写到伊本·赫勒敦就戛然而止，没有来得及深入考究一些史学史实（以致产生了谬误），但却颇具启迪价值。因而被后来的史学史研究者视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军利女士，中国还有不少学者偶尔以卓越且优美的笔锋触及阿拉伯史学。⁵但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把阿拉伯史学史看成人生志

1 赵军利：《赵军利博士论文集》（内部刊印），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1993年，序言，第1页。

2 王毅：《生如慧星之耀亮——追忆敬爱的赵军利老师》，《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3期。

3 值得一提的是，赵军利把这章内容整理成《中世纪阿拉伯历史研究方法》一文，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4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丛书总序二，第1—2页。

5 比如，纳忠：《中世纪阿拉伯的历史家：从口头流传到编纂著述》，《阿拉伯世界》1982年第1期；张广智：《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李振中：《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阿拉伯世界》1984年第3期；静水：《阿拉伯史学大师：伊本·卡尔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蔡德贵：《阿拉伯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黄培昭：《记录中国情况的阿拉伯著述家及其作品》，《阿拉伯世界》1990年第1—2期；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5—146、179—180、235—238页；徐晓光：《伊本·卡尔敦社会史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夏祖恩编著：《外国史学史纲要》，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36—138页；马小鹤：《伊本·赫勒敦》，李荣建：《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赛义德·阿述尔》，《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杨克礼：《历史演进的轨迹：伊斯兰史学概观》，《中国穆斯林》1994年第4期；王建娥编著：《外国史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9—115页；王建娥：《中世纪阿拉伯的历史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杨铭：《8—16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的西藏》，《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许序雅：《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哈全安：《古典伊斯兰世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71—376页；纳忠：《阿拉伯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5—372页。

业来矢志不渝地研究它、推广它，更遑论把它发展成我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的于沛先生说：“就我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各种版本的西方史学史著作面世，而较为系统地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著述则凤毛麟角。这无论是对教学，还是对学术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¹而这一缺憾，将在21世纪得到弥补。

四、21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

21世纪以来，阿拉伯学者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奋力追赶西方，出版了数百部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整体而言，这些著作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十大类型：

1. 整体史学史研究。比如，书名可翻译为《穆斯林史学史》的著作至少有7部²，伊拉克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的《史学与史家的方法》³，伊拉克尼札尔·哈迪西的《阿拉伯史学》⁴，黎巴嫩女学者法蒂玛·沙米的《史学》⁵，伊拉克法鲁戈·缶齐的《穆斯林历

1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丛书总序一，第1—2页。

2 赛义德·塔哈·艾布·萨迪拉：《穆斯林史学史》（al-Sayyid Tāhā Abū Sadīrah,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利雅得：法赫德国王国家图书馆，2003年；阿卜杜·拉哈曼·阿卜杜拉·谢赫：《穆斯林史学史》（ʿAbd al-Rahmān ʿAbd Allāh al-Shaykh,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开罗：阿拉伯知识书局，2006年；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伊德里斯：《穆斯林史学史：本质、阶段与发展》（Muhammad Mahmūd Idrīs,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 Māhīyatuḥu, Marāḥiluhū, Tatawwuruḥu*），利雅得：鲁世德书店，2006年；艾尔什德·优素福·艾布·艾尔什德：《穆斯林史学史：起源与发展》（Arshīd Yūsuf Abū Arshīd,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 al-Nashah wa-al-Tatawwur*），安曼：作者自印本，2007年；马哈茂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葛默尔：《穆斯林史学史》（Mahmūd Ahmad Muhammad Qamar,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利雅得：鲁世德书店，2008年；艾哈迈德·赫里勒·沙勒：《穆斯林史学史》（Ahmad Khalīl al-Shāl,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塞得港：萨基法出版社 & 陶希德书店，2012年；哈桑·赫兹利·艾哈迈德：《穆斯林史学史：问题与参考》（Hasan Khadrī Ahmad,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Muslimīn: Qadāyā wa-Murājaʿāt*），达曼：穆塔纳比书店，2015年。

3 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史学与史家的方法：史学的起源、编纂、批评、哲学与伊斯兰史学大家的方法》（Sāʿib ʿAbd al-Hamīd, *ʿIlm al-Tārīkh wa-Manāhij al-Muʿarrikhīn: fī ʿIlm al-Tārīkh Nashʾatan wa-Tadwīnan wa-Naqdan wa-Falsafatan wa-Manāhij Kibār Muʿarrikhī al-Islām*），贝鲁特：加迪尔研究与出版发行中心，2001年。

4 尼札尔·阿卜杜·拉蒂夫·萨欧德·哈迪西：《阿拉伯史学：思想与哲学》（Nizār ʿAbd al-Latīf Saʿūd al-Hadīthī, *ʿIlm al-Tārīkh ʿinda al-ʿArab: Fikratuḥu wa-Falsafatuḥu*），巴格达：伊拉克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5 法蒂玛·葛都拉·沙米：《史学：思想方法与学术研究著作的发展（自最古时代至20世纪）》（Fātimah Qaddūrah al-Shāmī, *ʿIlm al-Tārīkh: Tatawwur Manāhij al-Fikr wa-Kitābat al-Baḥth al-ʿIlmī min Aqdam al-ʿUsūr ilā al-Qarn al-ʿIshrīn*），贝鲁特：阿拉伯复兴出版社，2001年。

史编纂学》¹，黎巴嫩瓦冀赫·考塞拉尼的《史学史》²，突尼斯拉迪·达厄富斯的《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书写研究》³，阿尔及利亚巴沙尔·古韦达尔的《马什里克与马格里布的穆斯林史学家》⁴，伊拉克拉施德·哈施玛维的《历史编纂》⁵，埃及穆罕默德·兰玛哈的《阿拉伯历史与史家》⁶，埃及索腊哈·阿舒尔的《伊斯兰遗产的历史与史家》等。⁷

2. 区域国别史学史研究。比如，埃及伊卜拉欣·法尔加里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历史编纂活动（伊斯兰历7世纪）》⁸，埃及杰玛勒·缶齐的《十字军战争时期沙姆地区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521—660年》⁹，约旦优素福·雅幸的《安达卢西阿拉伯史学》¹⁰，埃及阿卜杜·法塔哈·法特希的《埃及与安达卢西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4世纪/公元10世纪）》¹¹，阿曼穆罕默德·葛德哈特的《伊斯兰历4世纪伊拉克历史书写

- 1 法鲁戈·欧麦尔·缶齐：《穆斯林历史编纂学：史学的起源与发展研究导论——截至伊斯兰历10世纪（公元16世纪）初》（*Fārūq ‘Umar Fawzī, al-Tadwīn al-Tārīkhī ‘inda al-Muslimīn: Muqaddimah fī Dirāsāt Nash ‘at ‘Ilm al-Tārīkh wa-Tatawwurihi hattā Bidāyat al-Qarn al-‘Ashir al-Hijrī/al-Sādis ‘Ashar al-Milādī*），艾因：扎耶德遗产与历史中心，2004年。
- 2 瓦冀赫·考塞拉尼：《史学史：趋势、流派与方法》（*Wajih Kawtharānī, Tārīkh al-Ta’rīkh: Ittijāhāt, Madāris, Manāhij*），贝鲁特：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2012年。
- 3 拉迪·达厄富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书写研究》（*Rādī Daghfūs, Buhūth fī al-Kiṭābah al-Tārīkhīyah fī al-‘Ālam al-Islāmī fī al-‘Asr al-Wasīṭ*），安曼：杰里斯·扎曼出版社，2012年。
- 4 巴沙尔·古韦达尔：《马什里克与马格里布的穆斯林史学家》（*Bashshār Quwaydar, al-Mu’arrikhūn al-Muslimūn fī al-Mashriq wa-al-Maghrib*），舍拉加：巴索玛特出版社，2015年。
- 5 拉施德·泰夫·伊卜拉欣·哈施玛维：《历史编纂：自伊斯兰历元年至400年》（*Rashīd al-Tayf Ibrāhīm al-Hashmāwī, al-Tadwīn al-Tārīkhī [min Sanat 1 Hijrīyah ilā 400 Hijrīyah]*），大马士革：索法哈特出版社，2016年。
- 6 穆罕默德·兰玛哈·阿卜杜·萨腊姆·穆赫里斯：《阿拉伯历史与史家》（*Muhammad Rammāh ‘Abd al-Salām Mukhlis,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al-‘Arab*），迪斯沃克：科学与信仰出版社，2020年。
- 7 索腊哈·阿里·阿舒尔：《伊斯兰遗产的历史与史家》（*Salāh ‘Alī ‘Āshūr, al-Tārīkh wa-Mu’arrikhū al-Turāth al-Islāmī*），亚历山大：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
- 8 伊卜拉欣·法尔加里：《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历史编纂活动（伊斯兰历7世纪）》（*Ibrāhīm Farghalī, al-Harakah al-Tārīkhīyah fī Misr wa-Sūriyā khilāla al-Qarn al-Sābi‘ al-Hijrī*），开罗：阿拉比出版社，2000年。
- 9 杰玛勒·缶齐·穆罕默德·阿玛尔：《十字军战争时期沙姆地区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521—660年）》（*Jamāl Fawzī Muhammad ‘Ammār,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fī Bilād al-Shām fī ‘Asr al-Hurūb al-Salībīyah [521–660 H.]*），开罗：开罗出版社，2001年。
- 10 优素福·艾哈迈德·本尼·雅幸：《安达卢西阿拉伯史学：截至伊斯兰历4世纪（公元10世纪）》（*Yūsuf Ahmad Yūsuf Banī Yāsīn, ‘Ilm al-Tārīkh fī al-Andalus hattā Nihāyat al-Qarn al-Rābi‘ al-Hijrī [al-‘Ashir al-Milādī]*），伊尔比德：哈玛达高校研究与出版公司，2002年。
- 11 阿卜杜·法塔哈·法特希·阿卜杜·法塔哈：《埃及与安达卢西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4世纪/公元10世纪）：比较分析研究》（*‘Abd al-Fattāh Fathī ‘Abd al-Fattāh,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fī Misr wa-al-Andalus fī al-Qarn al-Rābi‘ al-Hijrī/al-‘Ashir al-Milādī: Dirāsah Tahlīlīyah Muqāranaḥ*），凡2卷，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4年。

的发展趋势》¹，沙特阿卜杜·拉哈曼·艾哈默利的《伊斯兰历8世纪（公元14世纪）也门的历史与史家》²，利比亚阿卜杜·沃希德·舒爱卜的《安达卢西的历史书写及其方法》³，埃及阿腊·纳赫尔的《公元13世纪埃及、沙姆地区和伊拉克的史学家》⁴，也门阿里·巴拉卡特的《伊斯兰时期也门的历史书写与史家》等。⁵

3. 某座城市的史学史研究。比如，伊拉克拔斯姆·萨勒曼的《伊斯兰历6世纪巴格达的历史书写》⁶，沙特雅斯尔·艾哈迈德的《伊斯兰历1—2世纪麦地那的历史思想》⁷，突尼斯穆罕默德·希拉的《麦地那历史与史家》等。⁸

4. 史学世家与史学流派研究。比如，沙特苏莱曼·阿卜杜·加尼的《泰伯里家

1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葛德哈特：《伊斯兰历4世纪伊拉克历史书写的发展趋势：以伽迪·塔努黑（卒于伊斯兰历384年/公元994年）为例》（Muhammad ‘Abd Allāh al-Qadhāt, *Itijāhāt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fī al-‘Irāq fī al-Qarn al-Rābi’ al-Hijrī: al-Qādī al-Tanūkhī* [T. 384 H./994 M.] *Namūdḥajan*），安曼：约旦玫瑰出版社，2008年。

2 阿卜杜·拉哈曼·本·阿卜杜拉·瑟米尔·艾哈默利：《伊斯兰历8世纪（公元14世纪）也门的历史与史家：也门史料分析研究》（‘Abd al-Rahmān ibn ‘Abd Allāh Thāmir al-Ahmarī,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fī al-Yaman fī al-Qarn al-Thāmin al-Hijrī [al-Rābi’ ‘Ashar al-Milādī]: Dirāsah Tahlīīyah lil-Masādir al-Tārīkhīyah al-Yamanīyah*），利雅得：作者自印本，2012年。

3 阿卜杜·沃希德·阿卜杜·萨腊姆·舒爱卜：《安达卢西的历史书写及其方法：哈里发王朝与小王国林立时期》（‘Abd al-Wāhid ‘Abd al-Salām Shu‘ayb,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wa-Manāhijuhā fī al-Andalus: khilāla ‘Asray al-Khilāfah wa-al-Tawā’if*），拉巴特：艾曼出版社，2014年。

4 阿腊·米斯利·纳赫尔：《公元13世纪埃及、沙姆地区和伊拉克的史学家》（‘Alā’ Misrī al-Nahr, *Mu’arrikhū Misr wa-al-Shām wa-al-‘Irāq khilāla al-Qarn al-Sābi’ al-Hijrī [al-Thālith ‘Ashar al-Milādī]*），开罗：埃及图书总局，2019年。

5 阿里·阿卜杜·凯利姆·巴拉卡特：《伊斯兰时期也门的历史书写与史家》（‘Alī ‘Abd al-Karīm Barakāt,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wa-al-Mu’arrikhūn fī al-Yaman fī al-‘Asr al-Islāmī*），迪拜：马拉雅出版社，2023年。

6 拔斯姆·萨勒曼·马哈茂德·阿尼：《伊斯兰历6世纪巴格达的历史书写》（Bāsim Salmān Mahmūd al-‘Ānī, *al-Kitābah al-Ta’rīkhīyah fī al-Qarn al-Sādis al-Hijrī fī Baghdād*），巴格达：学术书籍出版社，2013年。

7 雅斯尔·艾哈迈德·努尔：《伊斯兰历1—2世纪麦地那的历史思想》（Yāsir Ahmad Nūr, *al-Fikr al-Tārīkhī bi-al-Madīnah al-Munawwarah fī al-Qarnayn al-Hijrīyayn al-Awwal wa-al-Thānī*），麦地那：麦地那研究中心 & 利雅得：阿卜杜·阿齐兹国王达拉基金会，2016年。

8 穆罕默德·哈比卜·希拉：《麦地那历史与史家：自伍麦叶王朝时期至伊斯兰历14世纪》（Muhammad al-Habīb al-Hilāh,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bi-al-Madīnah al-Munawwarah min al-‘Asr al-Umawī ilā al-Qarn al-Rābi’ ‘Ashar al-Hijrī*），麦地那：麦地那研究中心 & 利雅得：阿卜杜·阿齐兹国王达拉基金会，2016年。值得一提的是，穆罕默德·希拉在1994年通过麦加的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出版了《麦加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3—13世纪）：辑录、回顾与介绍》（*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bi-Makkah min al-Qarn al-Thālith al-Hijrī ilā al-Qarn al-Thālith ‘Ashar [Jam’ wa-‘Ard wa-Ta’rīf]*）。

族》¹，伊拉克阿卜杜·凯利姆·道罕的《沙姆、希贾兹、埃及、伊拉克历史学派的起源》²，伊拉克阿卜杜·杰拔尔·拿冀的《伊斯兰历史学派》³，埃及穆罕默德·阿卜杜·毛拉的《伊斯兰时期埃及基督教史学家的贡献》等。⁴

5. 史家史书个案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非常多，比如，叙利亚阿齐兹·阿兹玛、阿尔及利亚哈里德·卡比尔、摩洛哥马哈茂德·阿卜杜·加尼以及突尼斯艾哈迈德·泰维里等的伊本·赫勒敦⁵，沙特阿卜杜·阿齐兹·图韦吉利、约旦该达·卡提比的泰伯里⁶，阿齐兹·阿兹玛、约旦艾哈迈德·阿拔迪的麦斯欧迪⁷，埃及女学

- 1 苏莱曼·阿卜杜·加尼·穆罕默德·杰玛勒·马立其：《泰伯里家族：麦加史学世家在伊斯兰历8世纪的学术活动与职业》（Sulaymān ‘Abd al-Ghanī Muhammad Jamāl Mālikī, *al-Tabarīyūn Mu‘arrikhū Makkah al-Mukarramah: Nashātūhum al-‘Ilmiyah wa-Wazā‘ifūhum fī al-Haram khilāla al-Qarn al-Thāmin al-Hijrī*），塔伊夫：塔伊夫文学论坛，2005年。
- 2 阿卜杜·凯利姆·伊卜拉欣·道罕：《沙姆、希贾兹、埃及、伊拉克历史学派的起源》（‘Abd al-Karīm Ibrāhīm Dawhān, *Nash‘at al-Madrasah al-Tārīkhīyah fī al-Shām wa-al-Hijāz wa-Misr wa-al-‘Irāq*），巴格达：伊拉克图书穆尔塔多埃及公司，2009年。
- 3 阿卜杜·杰拔尔·拿冀：《伊斯兰历史学派：以巴士拉学派为例》（‘Abd al-Jabbār Najī, *al-Madāris al-Ta‘rīkhīyah al-Islāmīyah: Madrasat al-Basrah Unmūdhajan*），贝鲁特：学术研究中心，2013年。
- 4 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戈·阿卜杜·毛拉：《伊斯兰时期埃及基督教史学家的贡献（伊斯兰历1—7世纪）》（Muhammad ‘Abd al-Khāliq ‘Abd al-Mawlā, *Juhūd al-Mu‘arrikhīn al-Masīhīyīn fī Misr al-Islāmīyah min al-Qarn al-Awwal ilā al-Qarn al-Sābi‘ al-Hijrī*），开罗：埃及图书总局，2022年。
- 5 阿齐兹·阿兹玛：《伊本·赫勒敦》（‘Azīz al-‘Azmah, *Ibn Khaldūn*），贝鲁特：利雅得·雷伊斯图书，2000年；哈里德·卡比尔·阿腊勒：《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中的错误：批评分析研究》（Khālid Kabīr ‘Allāl, *Akhtā‘ al-Mu‘arrikh Ibn Khaldūn fī Kitābihi al-Muqaddimah: Dirāsah Naqdīyah Tahlīliyah Hādīfah*），阿尔及尔：伊玛目马立克出版社，2005年；马哈茂德·阿卜杜·加尼：《自传的艺术：伊本·赫勒敦的自传研究》（Mahmūd ‘Abd al-Ghanī, *Fann al-Dhāt: Dirāsah fī al-Sīrah al-Dhātīyah li-Ibn Khaldūn*），安曼：艾兹米纳出版社，2006年；艾哈迈德·泰维里：《伊本·赫勒敦：在古代与近代之间》（Ahmad al-Tawfī, *Ibn Khaldūn bayna al-Qudāmā wa-al-Mūdhathīn*），突尼斯：地中海出版社，2015年。
- 6 阿卜杜·阿齐兹·本·奥斯曼·图韦吉利等：《伊玛目泰伯里：教法学家、史学家、经注学家与诵读学者》（‘Abd al-‘Azīz ibn ‘Uthmān al-Tuwayjirī wa-Ākharūn, *al-Imām al-Tabarī: Faqīhan wa-Mu‘arrikhān wa-Mufasssiran wa-‘Āliman bi-al-Qirā‘āt*），凡2卷，贝鲁特：伊斯兰教派亲善出版社，2001年；该达·阿迪勒·赫兹纳·卡提比：《史学家泰伯里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历史书写》（Ghaydā‘ ‘Ādil Khaznah Kātibī, *al-Tabarī al-Mu‘arrikh wa-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fī al-‘Asr al-‘Abbāsī*），贝鲁特：阿拉伯研究与出版公司，2017年。
- 7 阿齐兹·阿兹玛：《麦斯欧迪》（‘Azīz al-‘Azmah, *al-Mas‘ūdī*），贝鲁特：利雅得·雷伊斯图书，2001年；艾哈迈德·欧韦迪·阿拔迪：《麦斯欧迪的历史与地理研究之关系》（Ahmad ‘Uwaydī al-‘Abbādī, *al-Irtibāt bayna al-Dirāsāt al-Tārīkhīyah wa-al-Jughrafīyā fī Turāth al-Mas‘ūdī*），安曼：杰利尔出版社，2007年。

者拉妮雅·欧麦尔、约旦马赫迪·拉沃迪耶的伊本·阿迪姆¹，伊拉克阿卜杜·沃希德·詹嫩、埃及穆罕默德·达布尔的伊本·易托利·马拉库什²，叙利亚穆罕默德·穆蒂俄的伊本·阿萨奇尔³，黎巴嫩乔治·马龙的雅孤特·哈默维⁴，阿卜杜·阿齐兹·萨璐米的瓦基迪⁵，埃及萨纳德·艾哈迈德的易祖丁·本·沙达德⁶，伊拉克女学者娜姐·吉腊维的伊本·葛腊尼斯⁷，阿联酋伽斯姆·阿里的伊本·巴施库沃勒⁸，约旦拓黎戈·艾布·哈德呼德、巴沙尔·古韦达尔的伊本·艾西尔⁹，伊拉克伊哈

- 1 拉妮雅·欧麦尔·艾布·福突哈：《史学家伊本·阿迪姆（1192—1262）》（*Rāniyā ‘Umar Abū al-Futūh, Ibn al-‘Adīm Mu‘arrikhān [588–660 H./1192–1262 M.]*），开罗：阿拉伯前景出版社，2013年；马赫迪·尔德·拉沃迪耶：《阿勒颇史学家伊本·阿迪姆·欧盖里及其历史巨著》（*al-Mahdī ‘Id al-Rawāḍīyah, Mu‘arrikh Halab Ibn al-‘Adīm al-‘Uqaylī wa-Tārīkhīhi al-Kabīr*），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基金会，2018年。
- 2 阿卜杜·沃希德·詹嫩·塔哈：《伊本·易托利·马拉库什：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家之长老》（*‘Abd al-Wāhid Dhannūn Tāhā,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Shaykh Mu‘arrikhī al-Maghrib al-‘Arabī*），贝鲁特：伊斯兰轴心出版社，2005年；穆罕默德·阿里·达布尔：《伊本·易托利·马拉库什：伊斯兰西部的历史思想记录》（*Muhammad ‘Alī Dabbūr,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Dhākirat al-Fikr al-Tārīkhī bi-al-Gharb al-Islāmī*），贝鲁特：穆格塔巴斯出版社，2018年。
- 3 穆罕默德·穆蒂俄·哈菲兹：《哈菲兹伊本·阿萨奇尔：沙姆地区的圣训学家和史学大家》（*Muhammad Mutī‘ al-Hāfiz, al-Hāfiz Ibn ‘Asākir: Muhaddith al-Shām wa-Mu‘arrikhuhā al-Kabīr*），大马士革：格拉姆出版社，2003年。
- 4 乔治·赫里勒·马龙：《雅孤特·哈默维·鲁米：地理学家、旅行家、史学家和作家》（*Jūrī Khalīl Mārūn, Yāqūt al-Hamawī al-Rūmī: al-Jughrafi al-Rahhālāh wa-al-Mu‘arrikh al-Kātib*），贝鲁特：阿拉伯思想出版社，2003年。
- 5 阿卜杜·阿齐兹·本·苏莱曼·本·拿斯尔·萨璐米：《瓦基迪及其著作〈武功纪〉：方法与史料》（*‘Abd al-‘Azīz ibn Sulaymān ibn Nāsir al-Sallūmī, al-Wāqidi wa-Kitābuhu al-Maghāzī: Manhajuhu wa-Masādiruhu*），凡2卷，麦地那：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出版社，2004年。
- 6 萨纳德·艾哈迈德·阿卜杜·法塔哈：《易祖丁·本·沙达德：史学家》（*Sanad Ahmad ‘Abd al-Fattāh, ‘Izz al-Dīn ibn Shaddād: Mu‘arrikhān*），开罗：鲁阿耶出版社，2007年。
- 7 娜姐·阿卜杜·拉札戈·马哈茂德·吉腊维：《伊本·葛腊尼斯：〈大马士革史续编〉中的传记和方法分析研究》（*Nadā ‘Abd al-Razzāq Mahmūd al-Jilāwī, Ibn al-Qalānisī: Strātuhi wa-Manhajuhu fī Kitābihi Dhayl Tārīkh Dimashq: Dirāsah Tahliṭīyah*），巴格达：文化事务总局，2008年。
- 8 伽斯姆·阿里·萨尔德：《安达卢西的圣训学家：哈菲兹史学家艾布·伽斯姆·伊本·巴施库沃勒（卒于伊斯兰历578年）》（*Qāsim ‘Alī Sa‘d, Muhaddith al-Andalus: al-Hāfiz al-Mu‘arrikh Abū al-Qāsim Ibn Bashkuwāl [T. 578 H.]*），贝鲁特：伊斯兰福音出版社，2008年。
- 9 拓黎戈·马哈茂德·艾布·哈德呼德：《伊本·艾西尔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Tāriq Mahmūd Abū Hadhūd, Ibn al-Athīr wa-Dawruhu fī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安曼：法铎阿特出版社，2009年；巴沙尔·古韦达尔：《伊本·艾西尔与历史百科全书》（*Bashshār Quwaydar, Ibn al-Athīr wa-al-Mawsū‘ah al-Tārīkhīyah*），阿尔及尔：巴索玛特出版社，2014年。

桑·瑟米利的艾哈迈德·本·艾比·拓熙尔¹，叙利亚伊卜拉欣·栽巴戈的艾布·沙玛和斯波特·伊本·焦齐²，埃及安瓦尔·扎纳提的伊本·海彦³，沙特哈里德·纳吉米的胡梅迪·安达卢斯⁴，约旦韩木德·马得安的伊本·福瓦蒂⁵，摩洛哥阿卜杜·沃希德·杰赫达尼的卡菲耶冀⁶，埃及萨勒玛·穆罕默德的伊本·海云⁷，埃及阿卜杜·拔基·赛义德的伊本·哈兹姆⁸，埃及穆罕默德·穆迦威利的伊本·塔厄里·比尔迪⁹，约旦苏阿德·英安的艾布·祖尔阿·迪马什基¹⁰，阿腊·纳赫尔的伊本·撒仪¹¹，

- 1 伊哈桑·詹嫩·瑟米利：《艾哈迈德·本·艾比·拓熙尔·巴格达迪：史学家和文学家》（*Ihsān Dhannūn al-Thāmīrī, Ahmad ibn Abī Tāhir al-Baghdādī: al-Mu'arrikh wa-al-Adīb*），安曼：拉齐出版社，2009年。
- 2 伊卜拉欣·栽巴戈：《艾布·沙玛：艾尤卜王朝时期的大马士革史学家（1203—1267）：生平与历史影响的分析性研究》（*Ibrāhīm al-Zaybaq, Abū Shāmah Mu'arrikh Dimashq fī 'Asr al-Ayyūbiyyīn (599 H./1203 M.–665 H./1267 M.): Dirāsah Tahlīliyah fī Sīratihi wa-Āthārihi al-Tārikhiyah*），贝鲁特：利萨拉出版公司 & 大马士革：阿米拉出版社，2010年；伊卜拉欣·栽巴戈：《斯波特·伊本·焦齐：〈时代镜鉴〉的训诫史家》（*Ibrāhīm al-Zaybaq, Sibṭ Ibn al-Jawzī al-Mu'arrikh al-Wā'iz fī Mir'āt al-Zamān*），贝鲁特：伊斯兰福音出版社，2017年。
- 3 安瓦尔·马哈茂德·扎纳提：《史学家伊本·海彦·古尔图比（988—1076）》（*Anwar Mahmūd Zanātī, Ibn Hayyān al-Qurtubī Mu'arrikhan [377 H./988 M.–469 H./1076 M.]*），开罗：阿拉伯前景出版社，2011年。
- 4 哈里德·本·阿里·纳吉米：《从巴利阿里群岛到巴格达：伊本·哈兹姆派往马什里克的使者胡梅迪·安达卢斯的生平及其著作〈火炭余烬〉》（*Khālid ibn 'Alī al-Najmī, Min al-Baḥār ilā Baghdād: al-Humaydī al-Andalusī Rasūl Ibn Hazm ilā al-Mashriq [Hayātuhu wa-Kitābuhu Jadhwat al-Muqtabis]*），凡2卷，利雅得：伊本·哈兹姆出版社，2012年。
- 5 韩木德·马得安·爱雅勒·萨勒曼：《史学家伊本·福瓦蒂（1245—1324）》（*Hammūd Maḍ'ān 'Ayyāl Salmān, Ibn al-Fuwatī Mu'arrikhan [642–723 H./1245–1324 M.]*），安曼：约旦文化部，2014年。
- 6 阿卜杜·沃希德·杰赫达尼：《杰出学者穆哈义丁·卡菲耶冀（1386—1474）的生平及其著述》（*'Abd al-Wāhid Jahdānī, al-'Allamah Muhyī al-Dīn al-Kāfiyāqī [788–879 H.]: Hayātuhu wa-Musannafātuhu*），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16年。
- 7 萨勒玛·穆罕默德·伊斯玛仪：《史学家伊本·海云·马格里比：从教派框架到哲学理论化》（*Salmā Mahmūd Ismā'īl, Ibn Hayyūn al-Maghribī Mu'arrikhan: min al-Ta'tīr al-Madhabī ilā al-Tanzīr al-Falsafī*），开罗：鲁阿耶出版社，2017年。
- 8 阿卜杜·拔基·赛义德·阿卜杜·哈迪：《伊本·哈兹姆·扎希利的历史编纂》（*'Abd al-Bāqī al-Sayyid 'Abd al-Hādī, al-Tadwīn al-Tārikhī 'inda Ibn Hazm al-Zāhirī*），开罗：阿拉伯前景出版社，2017年。
- 9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迦威利：《伊本·塔厄里·比尔迪及其〈闪耀群星：埃及与开罗列王〉》（*Muhammad Muhammad Mughāwīrī, Ibn Taghrī Birdī wa-Kitābuhu al-Nujūm al-Zāhirah fī Mulūk Misr wa-al-Qāhirah*），开罗：阿拉伯知识书局，2017年。
- 10 苏阿德·英安·阿拉丁：《艾布·祖尔阿·迪马什基及其历史编纂方法》（*Su'ād In'ām 'Alā' al-Dīn, Abū Zur'ah al-Dimashqī wa-Manhajuhu fī al-Tadwīn al-Tārikhī*），贝鲁特：阿拉伯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
- 11 阿腊·米斯里·纳赫尔：《伊斯兰历7世纪巴格达史学家伊本·撒仪：生平与历史著作研究》（*'Alā' Misrī al-Nahr, Ibn al-Sā'ī Mu'arrikh Baghdād fī al-Qarn al-Sābi' al-Hijrī: Dirāsah fī Sīratihi wa-Mu'allafātihi al-Tārikhiyah*），大马士革：浩兰之光出版社，2020年。

埃及女学者樱姬·白斯优尼、埃及穆罕默德·舒尔巴冀的伊本·绥拉斐¹，伊拉克拔基尔·凯尔拔斯的艾布·阿拔斯·穆巴拉德²，伊拉克沙奇尔·马吉德的哈姆扎·艾斯法哈尼³，埃及艾哈迈德·阿卜杜·凯利姆的穆托哈尔·麦格迪斯等。⁴

6. 史学史工具书。比如，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的《什叶派史学家辞典》⁵，埃及拉杰卜·巴黑特的《史学名人》⁶，黎巴嫩女学者莉玛·杜尔内格的《阿拉伯与穆斯林著名史学家》⁷，摩洛哥阿卜杜·拉蒂夫·赫腊比的《远马格里布历史学者辞典》⁸，埃及穆罕默德·阿瓦得的《中世纪与现代的埃及史学家》⁹，埃及穆罕默德·尤斯利的《埃及史学家辞典》等。¹⁰

1 樱姬·阿穆尔·穆罕默德·白斯优尼：《史学家伊本·绥拉斐（1416—1495）》（*Injī ‘Amr Muhammad al-Basyūnī, Ibn al-Sayrafi Mu’arrikhān [819 H.–900 H./1416 M.–1495 M.]*），开罗：阿拉伯知识书局，2020年；穆罕默德·杰玛勒·哈密德·舒尔巴冀：《伊本·绥拉斐的生平及其著作》（*Muhammad Jamāl Hāmid al-Shūrbajī, Ibn al-Sayrafi [t. 900 H./1495 M.]: Hayātuhu wa-Mu’alafātuhu al-Tārīkhīyah*），大马士革：浩兰之光出版社，2021年。

2 拔基尔·穆罕默德·贾法尔·凯尔拔斯：《艾布·阿拔斯·穆巴拉德：史学家》（*Bāqir Muhammad Ja’far al-Karbāsī, Abū al-‘Abbās al-Mubarrad: Mu’arrikhān*），大马士革：坦木兹·迪木齐出版社，2021年。

3 沙奇尔·马吉德·卡资姆：《哈姆扎·本·哈桑·艾斯法哈尼：〈世界列王与先知年谱〉的编纂方法与史料》（*Shākir Majīd Kāzim, Hamzah ibn al-Hasan al-Asfahānī: Manhajuhu wa-Mawāriduhu fī Kitābat Tārīkh Sinī Mulūk al-Ard wa-al-Anbiyā’*），贝鲁特：瓦拉工业出版社，2022年。

4 艾哈迈德·阿卜杜·凯利姆·优素福：《穆托哈尔·麦格迪斯：什叶派与穆尔太齐赖派之争》（*Ahmad ‘Abd al-Karīm Yūsuf, al-Mutahhar al-Maqdisī: Jadāl al-Tāshyī’ wa-al-‘Izāl*），开罗：鲁阿耶出版社，2023年。

5 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什叶派史学家辞典：伊玛目派、栽德派与伊斯玛仪派——伊斯兰历1至14世纪末的阿拉伯文史书编纂者》（*Sā’ib ‘Abd al-Hamīd, Mu’jam Mu’arrikhī al-Shī’ah: al-Imāmīyah, al-Zaydiyyah, al-Isma’īliyah [al-Mu’allifūn fī al-Tārīkh bi-al-‘Arabīyah mundhu al-Qarn al-Awwal hattā Nihāyat al-Qarn al-Rābi’ ‘Ashar min al-Hijrah]*），凡2卷，库姆：伊斯兰教法百科全书基金会，2004年。

6 拉杰卜·马哈茂德·伊卜拉欣·巴黑特：《史学名人》（*Rajab Mahmūd Ibrāhīm Bakhīt, A’lām al-Mu’arrikhīn*），开罗：瓦尔德岛书店，2011年。

7 莉玛·穆罕默德·杜尔内格：《阿拉伯与穆斯林著名史学家：1200多名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阿富汗与印度的史学家》（*Rīmā Muhammad Durnayqah, A’lām al-Mu’arrikhīn al-‘Arab wa-al-Muslimīn: Akthar min 1200 Mu’arrikh min ‘Arab wa-Furs wa-Atrāk wa-Afghān wa-Hunūd*），贝鲁特：现代图书公司，2019年。

8 阿卜杜·拉蒂夫·赫腊比：《远马格里布历史学者辞典》（*‘Abd al-Latif al-Khalābī, Mu’jam ‘Ulamā’ al-Tārīkh bi-al-Maghrib al-Aqsā*），凡2卷，开罗：宗教文化书店，2019年。

9 穆罕默德·穆阿尼斯·阿瓦得：《中世纪与现代的埃及史学家》（*Muhammad Mu’nis ‘Awad, Min Mu’arrikhī Misr fī al-‘Usūr al-Wustā wa-al-Hadīthah*），凡2卷，大马士革：浩兰之光出版社，2021年。

10 穆罕默德·尤斯利·萨腊玛：《埃及史学家辞典》（*Muhammad Yūsī Salāmah, Mu’jam al-Mu’arrikhīn al-Misrīyīn*），开罗：达里勒·爱敏出版社，2022年。

7. 阿拉伯历史哲学研究。比如，埃及拉阿法特·谢赫的《历史进程的诠释》¹，伊拉克杰密勒·纳贾尔的《批判性历史哲学研究》²，伊拉克阿里·贾比利的《阿拉伯思想中的历史哲学与文明》³，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的《伊斯兰思想中的历史哲学》⁴，埃及马哈茂德·伊斯玛仪、苏丹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加尼的《历史哲学》等。⁵

8. 史学方法论研究。比如，埃及伽斯姆·阿卜杜赫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⁶，伊拉克女学者左姆雅·撒默拉伊的《葛勒格圣迪的历史编纂方法》⁷，沙特阿里·伯克尔的《泰伯里及其史学方法》⁸，伊拉克女学者萨丽玛·马哈茂德的《伊本·赫勒敦编纂和诠释先知传的方法》⁹，哈里德·卡比尔的《穆斯林的历史传

1 拉阿法特·谢赫：《历史进程的诠释：历史哲学的理论》（Raʿfat al-Shaykh, *Tafsīr Masār al-Tārīkh: Nazarīyāt fī Falsafat al-Tārīkh*），开罗：艾因人文社会研究所，2000年。

2 杰密勒·穆萨·纳贾尔：《批判性历史哲学研究》（Jamīl Mūsā al-Najjār, *Dirāsāt fī Falsafat al-Tārīkh al-Naqdīyah*），巴格达：文化事务总局，2004年。

3 阿里·侯赛因·贾比利：《阿拉伯思想中的历史哲学与文明：批判理性研究》（ʿAlī Husayn al-Jābirī, *Falsafat al-Tārīkh wa-al-Hadārah fī al-Fikr al-ʿArabī: Dirāsah ʿAqlānīyah Naqdīyah*），伊尔比德：文化图书出版社，2005年。

4 索伊卜·阿卜杜·哈密德：《伊斯兰思想中的历史哲学：与现当代西方的学派比较研究》（Sāʾib ʿAbd al-Hamīd, *Falsafat al-Tārīkh fī al-Fikr al-Islāmī: Dirāsah Muqārannah bi-al-Madāris al-Gharbīyah al-Hadīthah wa-al-Muʿāsirah*），贝鲁特：哈迪出版社，2007年。

5 马哈茂德·伊斯玛仪、萨勒玛·马哈茂德·伊斯玛仪：《历史哲学：在西方哲学家与伊斯兰史学家之间》（Mahmūd Ismāʿīl, Salmā Mahmūd Ismāʿīl, *Falsafat al-Tārīkh: bayna Falāsīfāt al-Gharb wa-Muʿarrikhī al-Islām*），开罗：埃及图书总局，2019年；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加尼·伊卜拉欣：《历史哲学：它的历史、诠释与书写》（ʿAbd al-ʿAzīz ʿAbd al-Ghanī Ibrāhīm, *Falsafat al-Tārīkh: Tārīkhuhu wa-Tafsīruhu wa-Kitābatuhu*），科威特：图鲁斯出版发行中心，2020年。

6 伽斯姆·阿卜杜赫·伽斯姆：《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Qāsim ʿAbduh Qāsim, *Tatawwur Manhaj al-Baḥth fī al-Dirāsāt al-Tārīkhīyah*），开罗：艾因人文社会研究所，2000年。

7 左姆雅·穆罕默德·阿拔斯·撒默拉伊：《葛勒格圣迪的历史编纂方法：分析研究》（Zamyāʾ Muhammad ʿAbbās al-Sāmurrāʾī, al-Manhaj al-Taʾrīkhī ʿinda al-Qalqashandī: Dirāsah Tahlīlīyah），利雅得：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2001年。

8 阿里·伯克尔·哈桑：《泰伯里及其史学方法》（ʿAlī Bakr Hasan, *al-Tabarī wa-Manhajuhu fī al-Taʾrīkh*），开罗：加利波出版社，2004年。

9 萨丽玛·马哈茂德·穆罕默德·阿卜杜·伽迪尔：《伊本·赫勒敦编纂和诠释先知传的方法》（Sālimah Mahmūd Muhammad ʿAbd al-Qādir, *Manhajīyat Ibn Khaldūn fī Tadwīn al-Sīrah al-Nabawīyah wa-Tafsīrīhā*），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10年。

述》¹，黎巴嫩卡资姆·雅幸的《伊斯兰历史研究法》²，巴沙尔·古韦达尔的《伊本·赫勒敦与历史书写方法》³，沙特穆罕默德·沙赫利的《麦加史学家塔基丁·法斯的历史文献与铭文考证方法》⁴，埃及埃曼·福阿德的《穆斯林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与史学批评方法》⁵，约旦栽德·索里哈的《伊本·萨尔德及其历史书写方法》⁶，伊拉克拉麦丹·艾哈迈德的《伊本·沙达德及其著作〈素丹传奇与优素福家族良善〉的编纂方法》⁷，沙特女学者萨马娥·艾哈迈迪的《伊拉克史学家的传记与族谱编修方法》等。⁸

9. 某种体裁史书研究。比如，伊拉克赛义德·萨米的《先知传与伊斯兰历史资料研究入门》⁹，沙特阿卜杜·拉哈曼·苏奈迪的《贝哈基的先知传》¹⁰，伊拉克马立

- 1 哈里德·卡比尔·阿腊勒：《穆斯林的历史传述：批评方法与情境重现》（*Khālid Kabīr ‘Allāl, al-Marwīyāt al-Tārīkhīyah ‘inda al-Muslimīn: Asālib al-Naqd wa-Zāhirat al-Wad’ ft-hā*），科威特：圣裔与圣门弟子慈善团体，2010年。
- 2 卡资姆·雅幸：《伊斯兰历史研究法》（*Kāzim Yāsīn, Manhajīyat al-Baḥth fī Tārīkh al-Islām*），贝鲁特：穆斯塔法国际大学，2013年。
- 3 巴沙尔·古韦达尔：《伊本·赫勒敦与历史书写方法》（*Bashshār Quwaydar, Ibn Khaldūn wa-Manhajīyat Kitābat al-Tārīkh*），阿尔及尔：巴索玛特出版社，2014年。
- 4 穆罕默德·本·哈札俄·沙赫利：《麦加史学家塔基丁·法斯的历史文献与铭文考证方法：以〈迷药〉和〈宝贵瓔珞〉为例》（*Muhammad ibn Hazzā’ al-Shahrī, Manhaj al-Mu’arrikh al-Makkī Taqī al-Dīn al-Fāsī fī al-Istidlāl bi-al-Wathā’iq wa-al-Nuqūsh al-Tārīkhīyah min khilālī Kitābayhi Shifā’ al-Gharām wa-al-Iqd al-Thamīn*），麦加：萨勒曼·本·阿卜杜·阿齐兹国王麦地那历史研究室，2015年。
- 5 埃曼·福阿德·赛义德：《穆斯林史学家的历史书写与史学批评方法》（*Ayman Fu’ād Sayyid,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wa-Manāhij al-Naqd al-Tārīkhī ‘inda al-Mu’arrikhīn al-Muslimīn*），开罗：埃及黎巴嫩出版社，2017年。
- 6 栽德·索里哈·艾布·哈吉：《伊本·萨尔德及其历史书写方法》（*Zayd Sālih Abū al-Hājj, Ibn Sa’d wa-Manhajuhu fī Kitābat al-Tārīkh*），安曼：渗渗泉出版社，2017年。
- 7 拉麦丹·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伊本·沙达德及其著作〈素丹传奇与优素福家族良善〉的编纂方法》（*Ramādān Ahmad Muhammad, Ibn Shaddād wa-Manhajuhu al-Tārīkhī fī Kitābat al-Nawādir al-Sultānīyah wa-al-Mahāsīn al-Yūsufīyah*），大马士革：坦木兹·迪木齐出版社，2021年。
- 8 萨马娥·宾特·阿卜杜拉·艾哈迈迪：《伊拉克史学家的传记与族谱编修方法：塞尔柱王朝时期（1037—1194）》（*Samar Bint ‘Abd Allāh al-Ahmadī, Manāhij Mu’arrikhī al-‘Irāq fī Kutub al-Tarājīm wa-al-Ansāb fī al-‘Asr al-Saljiqī [447 H.-590 H./1037 M.-1194 M.]*），沙迦：马拉米哈出版社，2022年。
- 9 赛义德·萨米·白德利：《先知传与伊斯兰历史资料研究入门：历史研究方法、先知传与历史资料、纪事与事件的曲解因素、实践研究》（*al-Sayyid Sāmī al-Badrī, al-Madkhal ilā Dirāsāt Masādir al-Sīrah al-Nabawīyah wa-al-Tārīkh al-Islāmī: Manhaj al-Baḥth al-Tārīkhī, Masādir al-Sīrah wa-al-Tārīkh, ‘Awamil Tahrīf al-Akhbār wa-al-Ahādīth, Buhūth Tatbiqīyah*），库姆：教法出版社，2002年。
- 10 阿卜杜·拉哈曼·本·阿里·苏奈迪：《贝哈基的先知传：与伊斯兰历5世纪马什里克的同时代最优秀先知传编纂家相比较》（*‘Abd al-Rahmān ibn ‘Alī al-Sunaydī, al-Sīrah al-Nabawīyah ‘inda al-Bayhaqī: ma’a Dirāsah Muqārīnah li-Abraz Mu’arrikhī al-Sīrah al-Mu’āsirīn la-hu fī al-Mashriq khilāla al-Qarn al-Khāmis al-Hijrī*），利雅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克·白阿吉的《方志在阿拉伯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¹，埃及女学者姐丽雅·哈勒瓦冀的《阿拉伯遗产中的人物志著作》²，伊拉克索法·黎卡比的《伊斯兰历8世纪沙姆地区人物志史家的历史批评》³，伊拉克艾哈迈德·欧莱维的《公元15世纪埃及传记史家的史学批评》等。⁴

10. 史料研究。比如，沙特托腊勒·达俄贾尼的《伊本·阿萨奇尔〈大马士革史〉的史料》⁵，安瓦尔·扎纳提的《马格里布与安达卢西历史资料》和《伊斯兰与中世纪史料的全面回顾》⁶，突尼斯穆罕默德·阿迪勒的《伊本·赫勒敦的史料》⁷，伊拉克穆罕默德·穆邵瓦哈的《伊本·瓦尔迪〈人类简史增补〉的史料及其编纂方法》等。⁸

此外，还有历史思想与观念研究，如伽斯姆·阿卜杜赫的《穆斯林的历史思想》⁹，沙特女学者爱蜜拉·贾法利的《哈里发时期安达卢西的历史思想（929—

1 马立克·阿里·欧谢施·白阿吉：《方志在阿拉伯历史编纂学中的地位》（*Mālik ‘Alī ‘Ushaysh al-Ba‘āj, Makānat Kutub al-Tārikh al-Mahallī fī al-Tadwīn al-Tārikhī ‘inda al-‘Arab*），安曼：也拉尔出版社，2006年。

2 姐丽雅·阿卜杜·萨塔尔·哈勒瓦冀：《阿拉伯遗产中的人物志著作：自伊斯兰历7世纪初至12世纪末》（*Dāliya ‘Abd al-Sattār al-Halwājī, Kutub al-Tarājīm fī al-Turāth al-‘Arabī min Bidāyat al-Qarn al-Sābi‘ hattā Nihāyat al-Qarn al-Thānī ‘Ashr lil-Hijrah*），开罗：东方闪耀书店，2008年。

3 索法·沙黎德·拿斯尔·黎卡比：《伊斯兰历8世纪沙姆地区人物志史家的历史批评》（*Safā’ Shārid Nāsir al-Rikābī, al-Naqd al-Tārikhī ‘inda Mu‘arrikhī al-Tarājīm al-Shāmīyīn fī al-Qarn al-Thāmin al-Hijrī*），大马士革：坦木兹·迪木齐出版社，2020年。

4 艾哈迈德·欧莱维·索希卜：《公元15世纪埃及传记史家的史学批评》（*Ahmad ‘Ulaywī Sāhib, al-Naqd al-Tārikhī ‘inda Mu‘arrikhī al-Tarājīm al-Misriyīn fī al-Qarn al-Tāsi‘ al-Hijrī/al-Khāmīs ‘Ashar al-Milādī*），大马士革：新希望出版社，2021年。

5 托腊勒·本·萨欧德·达俄贾尼：《伊本·阿萨奇尔〈大马士革史〉的史料》（*Talāl ibn Sa‘ūd al-Da‘jānī, Mawārid Ibn ‘Asākir fī Tārikh Dimashq*），凡3卷，麦地那：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安瓦尔·马哈茂德·扎纳提：《马格里布与安达卢西历史资料：原典文献、相关著作与定期刊物》（*Anwar Mahmūd Zanātī, Masādir Tārikh al-Maghrib wa-al-Andalus: al-Masādir, al-Marāji‘, al-Dawriyāt*），突尼斯：萨哈尔出版社，2008年；《伊斯兰与中世纪史料的全面回顾》（*al-Marji‘ al-Shāmil fī Masādir al-Tārikh al-Islāmī wa-al-Wasūt*），大马士革：教父出版社，2017年。

7 穆罕默德·阿迪勒·拉蒂夫：《伊本·赫勒敦的史料》（*Muhammad al-‘Ādil Latīf, Masādir Ibn Khaldūn*），凡2卷，突尼斯：宰娜卜出版社，2020年。

8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勒丹·穆邵瓦哈：《伊本·瓦尔迪〈人类简史增补〉的史料及其编纂方法》（*Muhammad Ahmad Sultān al-Mushawwah, Mawārid Ibn al-Wardī [t. 749 H./1348 M.] wa-Manhajuhu fī Kitābihi Tatimmat al-Mukhtasar fī Akhbār al-Bashar*），安曼：知识平等出版社，2022年。

9 伽斯姆·阿卜杜赫·伽斯姆：《穆斯林的历史思想：解读阿拉伯历史遗产》（*Qāsim ‘Abduh Qāsim, Fikrat al-Tārikh ‘inda al-Muslimīn: Qirā‘ah fī al-Turāth al-Tārikhī al-‘Arabī*），吉萨：艾因人文社会研究所，2001年。

1031)》¹，伊拉克伊斯玛仪·鲁贝仪的《阿拉伯人对历史的理解》。²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如伊拉克盖斯·简纳比的《伍麦叶王朝时期诗歌对历史事件编纂的影响》³，叙利亚哈桑·萨勒哈波的《教义学与历史学》。⁴史学与社会的不关系研究，如沙特阿里·达法俄的《史学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的地位》⁵，埃及穆罕默德·韩木迪的《基督徒与伊斯兰历史编纂》。⁶会议论文集，如2000年的《历史书写的族谱史料论坛会议论文集》⁷，2011年的《第六次国际论坛：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书写——从纪事与传述到文本与文献》⁸，2019年的《哈德拉毛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6—9世纪）》等。⁹

与此同时，用西文撰写的阿拉伯史学史著作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这些著作

- 1 爱蜜拉·宾特·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哈曼·贾法利：《哈里发时期安达卢西的历史思想（929—1031）》（Amīrah bint Ahmad ibn ‘Abd al-Rahmān al-Ja‘farī, *al-Fikr al-Tārīkhī fī al-Andalus fī ‘Asr al-Khilāfah [316–442 H./929–1031 M.]*），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历史学会，2007年。
- 2 伊斯玛仪·努利·鲁贝仪：《阿拉伯人对历史的理解》（Ismā‘īl Nūrī al-Rubay‘ī, *Maḥmūm al-Tārīkh ‘inda al-‘Arab*），利比亚的黎波里：利比亚吉哈德历史研究中心，2000年。
- 3 盖斯·卡资姆·简纳比：《伍麦叶王朝时期诗歌对历史事件编纂的影响》（Qays Kāzim al-Jannābī, *Athar al-Shi‘r fī Tadwīn al-Ahdāth al-Tārīkhīyah fī al-‘Asr al-Umawī*），开罗：阿拉伯前景出版社，2007年。
- 4 哈桑·萨勒哈波：《教义学与历史学：伊斯兰史书中的信仰形态》（Hasan Salhab, *‘Ilm al-Kalām wa-al-Ta’rīkh: Ishkāliyyat al-‘Aqīdah fī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al-Islāmīyah*），贝鲁特：伊斯兰思想发展文明中心，2011年。
- 5 阿里·本·阿卜杜拉·达法俄：《史学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的地位》（‘Alī ibn ‘Abd Allāh al-Daffā, *Makānat ‘Ilm al-Tārīkh fī al-Hadārah al-‘Arabīyah wa-al-Islāmīyah*），贝鲁特：利萨拉出版公司，2003年。
- 6 伊玛目·沙斐仪·穆罕默德·韩木迪：《基督徒与伊斯兰历史编纂：伊斯兰历7世纪》（Imām al-Shāfi‘ī Muhammad Hammūdī, *al-Masīhiyyūn wa-Tadwīn al-Tārīkh al-Islāmī fī al-Qarn al-Sābi‘ al-Hijrī*），贝鲁特：阿拉伯传播基金会，2022年。
- 7 历史书写的族谱史料论坛会务组编：《历史书写的族谱史料论坛会议论文集（摩苏尔大学·1998年12月4日）》（Nadwat Kutub al-Ansāb Masdaran li-Kitābat al-Tārīkh, *Waqā‘i‘ Nadwat Kutub al-Ansāb Masdaran li-Kitābat al-Tārīkh: allatī ‘aqadātāhā Dā‘irat al-Turāth al-‘Arabī al-Islāmī fī Jāmi‘at al-Mawsil Yawm al-Arbi‘ā’ al-Khāmis ‘Ashar min Shahr Rajab Sanat 1419 H., al-Muwāfiq lil-Yawm al-Rābi‘ min Shahr Kānūn al-Awwal Sanat 1998 M.*），巴格达：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 8 拉迪·达厄富斯、哈里德·卡什尔整理：《第六次国际论坛：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书写——从纪事与传述到文本与文献（突尼斯：2010年4月28—30日）》（Rādī Daghfūs wa-Khālid Kashīr [rāja’a al-Nusūs wa-‘addahā lil-Nashr], *Ashghāl al-Multaqā al-Dawlī al-Sādis: al-Kitābah al-Tārīkhīyah fī al-‘Ālam al-‘Arabī al-Islāmī al-Wasī, min al-Khabar wa-al-Riwāyah ilā al-Nass wa-al-Wathāqah [Tūnis: 28–30 Afrīl 2010]*），突尼斯：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论坛会务组，2011年。
- 9 哈德拉毛历史研究与档案出版中心：《哈德拉毛的历史与史家（伊斯兰历6—9世纪）》（Markaz Hadramawt lil-Dirāsāt al-Tārīkhīyah wa-al-Tawhīq wa-al-Nashr, *al-Tārīkh wa-al-Mu‘arrikhūn al-Hadārimah min al-Qarn al-Sādis hattā al-Qarn al-Tāsi‘ al-Hijrīyayn*），利雅得：威法阁出版社，2019年。

的编纂者不仅有欧美学者，如英国皮考克（A. C. S. Peacock）和休·肯尼迪（Hugh N. Kennedy），美国蔡斯·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斯科特·萨夫兰（Scott Savran）、瑞恩·林奇（Ryan J. Lynch）和女学者希瑟·基尼（Heather N. Keaney），德国康拉德·希尔谢勒（Konrad Hirschler），瑞典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和女学者乌尔丽卡·马滕森（Ulrika Mårtensson）等¹，还有以下两类学者及其西文著作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接受西方教育后用西文写作的阿拉伯学者。比如，上述叙利亚史学家阿齐兹·阿兹玛的博士学位是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的。21世纪以来，他出版了多部研究阿拉伯历史和史学的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历史时代》和《古代晚期的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等。²埃及青年学者爱曼·伊卜拉欣（Ayman S. Ibrahim），从美国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获得博士学位四年后，从以色列海法大学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他在2021年出版了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谈论早期阿拉伯伊斯兰史学的英文著作。³

第二，用西文写作的亚非拉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学者。2003年，印度学者辛格（N. K. Singh）与萨米丁（A. Samiuddin）主编的三卷本英文工具书《穆斯林世界的史学百科全书》问世，收录了359名穆斯林史学家，其中的150多名来自阿拉伯。⁴ 以色

1 Chase F. Robinso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onrad Hirschler, *Medieval Arabic Historiography: Authors as Actors*, London: Routledge, 2006; A. C. S. Peacock, *Mediaeval Islamic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Bal'amī's Tārīkh-nāma*, London: Routledge, 2007; Hugh N. Kennedy, *al-Ṭabarī: A Medieval Muslim Historian and His Work*, Princeton: Darwin Press, 2008; Ulrika Mårtensson, *Tabarī*,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Heather N. Keaney, *Medieval Islamic Historiography: Remembering Rebell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Scott Savran, *Arabs and Iranians in the Islamic Conquest Narra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750–1050*,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Ryan J. Lynch, *Arab Conquests and Early Islamic Historiography: The Futuh al-Buldan of al-Baladhuri*, London: I. B. Tauris, 2019; Tobias Andersson, *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fīa b. Khayyāt*, Leiden: Brill, 2019.

2 Aziz al-Azmeh, *Times of History: Universal Topics i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Arabs and Islam in Late Antiquity: A Critique of Approaches to Arabic Sources*, Berlin: Gerlach Press, 2014.

3 Ayman S. Ibrahim, *Conversion to Islam: Competing Themes in Early Islamic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4 N. K. Singh and A. Samiuddin, eds., *Encyclopaedic Historiography of the Muslim World*, 3 Vols., Delhi: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列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博阿兹·索尚（Boaz Shoshan）凭借《伊斯兰史学中的诗》和《阿拉伯历史传统与早期伊斯兰征服》两部英文著作，在该国的史学史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¹

此外，随着西方的全球史学史研究氛围日益浓厚起来，伊斯兰史学传统（包括阿拉伯史学传统）在西方史学史研究者们视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2008年，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全球史学史著作出版。其作者试图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推动史学史研究的全球视角，在该书中肯定了穆斯林历史写作的丰富传统以及在某些方面远超当时的欧洲。²全球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在2011年出版的另一部《全球史学史》中指出，“在伟大的世界史学传统中，伊斯兰史学传统最可谓青春年少”³。

2011—2012年，由丹尼尔·沃尔夫担任总主编的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问世。⁴整套书共由150篇专论构成，出自众多知名学者之手，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⁵其中，第二卷（从400到1400年）第12篇专论由上述的蔡斯·罗宾逊撰写，谈论8至10世纪的伊斯兰历史著作；第13篇的作者是上述的康拉德·希尔谢勒，探讨11至15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史学传统。⁶第三卷（从1400到1800年）没有收录专门讨论阿拉伯史学的文章。⁷可能是因为马穆鲁克王朝灭亡（1517）后，阿拉伯史学全面衰落，在该时期中东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把主流地位分给了波斯伊斯兰史学和奥斯曼帝国史学。第四卷（从1800到1945年）第28篇专论是上述英国史学家舒埃里写的《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书写》，研究阿拉伯史学

1 Boaz Shoshan, *Poetics of Islamic Historiography: Deconstructing Ṭabarī's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4; *The Arabic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Folklore, Tribal Lore, Holy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 格奥尔格·伊格尔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8页。

3 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上册，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第110页。

4 Daniel Woolf,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2012.

5 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上），陈恒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中文版序言，第9页。

6 萨拉·福特、蔡斯·F. 罗宾逊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2卷（上），赵立行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296—367页。

7 何塞·拉巴萨等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3卷，陈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

从传统转向现代以及它在阿拉伯精英阶层中引起的反响。¹第五卷（从1945年至今）第24篇论述20世纪后半叶阿拉伯史学的文章还是出自舒埃里之手。²

正当21世纪外国学者不断深化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之时，中国学者也迎来了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阿拉伯史学史（甚至中东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第三次机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明确指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催促史学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史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对于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而言，这一任务不仅迫切且十分沉重。但为了完成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任务³，我们唯有砥砺前行。在这样的新时代大背景下，砥砺前行的中国学者发表了一批论及阿拉伯史学的论文，推出了旨在弥补中国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薄弱缺憾的“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提要丛书”。

2017年⁴，梁道远通过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把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繁荣期、延续期和衰落期，把它的整体发展特点归纳为“起步晚、发展快、史家众、书量大、直叙多、议论少、内容繁、记述细和不离

1 斯图尔特·麦金泰尔等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4卷（下），岳秀坤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758—782页。

2 阿克塞尔·施耐德、丹尼尔·伍尔夫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5卷（下），彭刚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647—672页。

3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丛书总序一，第2页。

4 关于2000—2016年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概况，参见梁道远：《中国的阿拉伯史学研究：回眸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编辑部编：《“第二十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当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论文集》，2017年11月4—5日·北京，第495—503页。

神”¹。同年，他在博士学位论文《阿拉伯史学的起源》中提出了把阿拉伯史学史视为“多元共存”中东史学史的分支之一来加强研究的设想。²

2018年，朱璇参考英文著作和中文译著写成的《早期伊斯兰苏非传记书写体例探究》得以发表。³同年，焦兴涛、王涛和朱文珊三名新时代中国的年轻学人，借鉴西文和中文的相关论著分别讨论了《伊本·朱拜尔游记》《泰伯里史》和《伊本·赫勒敦史》。⁴

2019年，梁道远自问自答地说：“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之路在何方？我们的路在我们的脚下。若畏惧不前，我们就只能原地踏步；若勇往直前，我们就会有更宽广的路。”⁵同年，叶尔孤比（al-Ya‘qūbī，？—约905）和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的著作，以及当代阿尔及利亚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尔昆（Muhammad Arkūn，1928—2010）的思想等受到中国人的关注。⁶韩志斌谈了20世纪中东史学发展的特点。⁷

2020年，姚惠娜探讨了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的关键叙事、学者和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⁸师明学则介绍了伊本·卡西尔及其《始末录》的主要内容。⁹梁道远等人编写了《古代阿拉伯编年体史书提要》一文，介绍诞生于9至16世纪的最具代表性的数十部阿拉

1 梁道远：《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2 梁道远：《阿拉伯史学的起源》，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3 朱璇：《早期伊斯兰苏非传记书写体例探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 焦兴涛：《〈伊本·朱拜尔游记〉及其文明视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王涛：《对〈民族与先知历史〉中关于屈底波进入过喀什噶尔的记载的质疑》，《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朱文珊：《〈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历史价值述评》，《红河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5 梁道远：《阿拉伯史学史之我见？》，李绍先、张前进主编：《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79页。

6 唐雪梅、马吉德：《雅古比及作品〈诸国志〉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影响探析》，《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赵洪娟：《中古入日节与波斯诺鲁孜节溯源考：基于比鲁尼〈古代民族编年史〉的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黄兰：《穆罕默德·阿尔昆的现代伊斯兰思想解读》，《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4期。

7 韩志斌：《二十世纪中东史学的发展》，《光明日报》2019年7月29日第14版。

8 姚惠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9 师明学：《伊本·凯西尔的〈始与末〉》，《中国穆斯林》2020年第4期。

伯编年体史书。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年11月27—29日，第一届“中东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这直接促成了多篇论文的写作。²

2021年是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年。是年12月24日，“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提要丛书”发布会暨第二届“中东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大学召开。这套丛书的首卷《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在会上发布。³其编著者通过整理大量的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大体上按照史学家的卒年先后顺序，编录了生活于7世纪至1524年间的约1500名阿拉伯史学家及其主要著作。此卷虽然简略，因时间仓促而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它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阿拉伯史学的专著。而且，整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将“有助于中国的外国史学史和中东史学界初步了解古代阿拉伯历史学的大致轮廓和特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培养相关人才奠定基础，因而具有重要意义”⁴。同年，梁道远、孔妍、李万春、邓燕平、张玉友等人还发表了多篇研究阿拉伯史学某个方面问题的论文。⁵

2022年，“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提要丛书”的第二卷《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上下册）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阿拉伯族谱学的专著，大体上按照卒年顺序梳理了820多名（包括两名女性）生活于6世纪至16世纪上半叶的成

1 梁道远等：《古代阿拉伯编年体史书提要》，李绍先、张前进主编：《阿拉伯国家研究报告（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16—243页。

2 经修改后发表的参会论文有孔妍的《埃及编年史家杰巴尔提及其史学“三部曲”》（《北方论丛》2021年第2期）和赵琳的《阿拉伯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学转向：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析论》（《中东研究》2023年第1期）等。

3 这套丛书是阿拉伯国家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宁夏大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包括已经出版的《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和《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和待出版的《古代阿拉伯编年体史书提要》《古代阿拉伯名人传记提要》《古代阿拉伯世界史与王朝史名著提要》以及《古代阿拉伯地方史名著提要》等。

4 梁道远编著：《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丛书总序二，第2页。

5 梁道远：《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艾西尔及其所处的时代》，《北方论丛》2021年第2期。孔妍：《埃及编年史家杰巴尔提及其史学“三部曲”》。李万春：《公元9至12世纪伊斯兰史学发展中的“地方意识”：以〈布哈拉史〉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邓燕平：《巴勒斯坦的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张玉友：《民族志·“分支型社会”·部落转型：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史书写范式的演变》，《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

文族谱学家和口传族谱学家，还研究了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名。同年，梁道远谈了阿拉伯的通史编纂传统的形成、发展与特点；黄新佼对汤因比与伊本·赫勒敦的文明史观进行了比较研究；楚日斯与吴旻雁探讨了伊斯纳德考据法在阿拉伯史学中的作用与变化；马得成分析了圣训与先知传之间的关系。¹

2023年是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继往开来”之年。所谓“继”，即继续推进相关主题的研究。比如，马峥嵘与韩志斌指出，“国内学者对古代阿拉伯史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探讨并不充分”，因而撰文分析20世纪阿拉伯史学著作，探究该时期阿拉伯史学的流派与特征。²张玉友与顾恺琴则合撰一文，从国别史学史的角度深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³“开”，即开拓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论著开新。2017年，梁道远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呼吁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19世纪40年代。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由马克思奠基（概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此后的演化可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余脉、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学’。笔者拙识，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应该被纳入这个‘谱系’……马克思主义史家仍然坚持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恢宏大廈添砖加瓦。仅此一点，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应该被列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就应该受到学界的重视。”⁴但中国的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极其薄弱状况直到2023年才有所改变。2024年3月28日，笔者到中国知网上按主题搜索“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示的结果只有4个。除了梁氏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赵悦清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理路》和《20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

1 梁道远：《阿拉伯通史编纂的形成、发展与特点》，《光明日报》2022年2月21日第14版。黄新佼：《汤因比与伊本·赫勒敦的文明史观比较研究》，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楚日斯、吴旻雁：《伊斯纳德考据法在阿拉伯史学中的作用及其变化》，《中国穆斯林》2022年第2期。马得成：《早期阿拉伯学术史上的圣训与先知传关系探析》，《中国穆斯林》2022年第3期。

2 马峥嵘、韩志斌：《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3 张玉友、顾恺琴：《从“构造历史”到“统一历史”：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史学的起源与流变》，《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

4 梁道远：《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第6—7页。

与流变》¹，以及上文提到的马峥嵘与韩志斌合撰的《20世纪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赵氏在她的第二篇论文中指出，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东史学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20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推进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裨益。

第二，项目突破。在当代中国，学者主持的科研项目直接关系到其生存与发展；一个学科的科研项目获批状况则与该学科的发展前途密切相关。2023年12月，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获批立项。²这是继2019年的“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之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的第二个与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³“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项目旨在深入挖掘中东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对中东地区从最古老时代至当代的史学产生与发展脉络、内在特征，史学发展与中东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剖析，深入探究中东史学和历史观念的起源与变迁，研究主要的历史学家及其代表著作，讨论中东史学与中东文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往互动等等，编纂成中东史学通史，以揭示“多元共存”中东史学的整体发展规律，为深化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提供借鉴。⁴如前所述，阿拉伯史学史是“8+N中东史学史”的最庞大分支，自然是该项目研究的重中之重。

显然，近些年来，通过一批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仍然处于史

1 赵悦清：《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理路》，《西部学刊》2023年第11期；《20世纪埃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缘起与流变》，《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2 2018—202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的与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有：2018年，青年项目“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研究”；2019年，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2020年，重点项目“阿拉伯学术史经典著作《目录》的翻译、注释与研究”和一般项目“近现代沙特阿拉伯史学史研究”；2021年，青年项目“近现代埃及民族主义史学研究”；2022年，青年项目“当代阿拉伯史学界对奥斯曼帝国的形象重塑研究”。

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体系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会同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实施，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的专项项目。

4 <https://skc.nwu.edu.cn/info/1024/3374.htm>，访问日期：2024年3月28日。

学史学科的边缘”¹，这个客观事实依旧存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非常多，比如，加快培养一批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人才步伐。

结 语

综上所述，国外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具有历时久远、人员众多、论著颇丰以及探究广深等优势。但中古时期阿拉伯学者对阿拉伯史学史的整体认知，基本上停留在罗列史家名字（或简短传记）和史书名称的层面上，除了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和萨哈维《为史正名》等著作外，鲜见精当的剖析。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作品离学科意义上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还有一些距离。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在该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些质量上乘、影响深远的著作，但由于深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致使部分学者对阿拉伯史学的认识和评价未能做到客观公正，甚至刻意贬低阿拉伯史学家们为人类的历史研究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现当代阿拉伯学者在阿拉伯史学史的沃野上深耕细作，产出大量论著，其中有一些论见精妙的作品，但相对缺乏通古今之变的力作。至于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大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们仍然需要持续地付出更大努力，才能彻底改变中国这项研究的整体实力“远不如人”的世界阿拉伯史学史研究格局。

综合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史为鉴，新时代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寻求在该研究领域的新突破。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使用文明交往论为历史探照灯，吸收阿拉伯史学家的相关理论精华，更加科学地重新衡量阿拉伯史学的成败得失。我们研究阿拉伯史学史，和研究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外国史学史、全球史学史一样，务必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引。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深入阿拉伯史学自身所固有的、浓厚的“宗教迷雾”里却不走偏方向。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地剖析

1 2017年11月，梁道远在第2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指出，“三十多年来，虽然产生了一些论著和译著，但由于起步晚、精品少等原因，中国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仍然处于史学史学科的边缘”。参见李桂芝：《当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第2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阿拉伯史学家们的观点，研究诸多史学流派，讨论各种史学思潮，解读浩瀚的史学论著等。第二，在阿拉伯史学遗产的挖掘方面，可向更加系统、全面、细微的目标突进。第三，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更加关注史学交往对史学发展的作用。第四，对阿拉伯史学的“古今之变”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和更加深入的分析，产出一批对阿拉伯史学史进行贯通古今的整体性研究的成果。第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存人民，紧跟时代，认真探索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资鉴。

实际上，我们能够为中国、世界的、人民的、时代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而干的事远远比这些要多得多。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努力更努力吧！

（梁道远，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
卡哈尔·阿里木，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五年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发展报告 (2019—2023)¹

| 董子云 |

摘要：在2019—2023年间，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在课题立项、论文发表、专著译著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科发展呈现出研究覆盖面广、研究前沿性强、国际学术声望显著提升、青年学者活跃这四大特征。不过，近五年的研究尚未充分覆盖如卡佩王朝和瓦卢瓦王朝历史，中世纪和旧制度法国经济史，早期中法关系史，现当代政治、社会史等领域。尽管如此，通过对近五年学术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在未来学科发展进程中，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将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攀上新的高峰。

关键词：法国 法国史 中世纪 近代 现当代

在刚刚过去的五年（2019—2023），中国学者的法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我国法国史学者在此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申请获得了为数众多的国家级课题，出版了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学术专著与译著。正是得益于我国众多法国史学者的不懈努力与积极开拓，我国法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与主题进一步扩大与完备，以往相对薄弱的领域有了显著增强，既有的优势领域研究不断深化，呈现出可喜的发展态势。以下，本文将首先从论文发表、学术著作出版、国家课题立项的情况出发，对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做总体性的概述（一）。随后，本文依照法国史惯用的历史分期（中世纪、近代、现当代）和不同研究主题，分类概括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二、三、

¹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沈坚教授、乐启良教授的帮助，特此感谢。

四)。在学术研究的贡献之外,我国的法国史学者积极引介法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助力我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五)。最后,本文将在回顾近五年我国法国史研究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找寻需要继续推进的研究工作,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初步展望(六)。

一、近五年发展概况

1.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报告所涉时间段,中国学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法国史相关论文270余篇。刊登法国史相关论文的学术期刊既包括史学专业期刊,也包括一些综合类期刊。在国内权威和重要学术期刊中,发表法国史相关研究5篇以上的包括(粗略统计):《历史研究》(8篇),《世界历史》(24篇),《史学月刊》(9篇),《史学理论研究》(8篇),《社会科学战线》(5篇)。《中山大学学报》《世界历史评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经济社会史评论》《读书》《法国研究》等刊物均发表了5篇及以上法国史相关论文。发表论文的学者年龄结构合理,学术后备力量不断成长。在发表的论文中,35岁以下(1984年以后出生)年轻学者的贡献占到近30%的比重。

2.学术著作及史料编译出版情况

中国学者在此期间出版或再版法国史学术专著近40部。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高校和社科院出版社。就著作的内容而言,不仅有对各历史时段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有若干更为宏观、呈现中国法国史研究者宏观思考的作品。对于在此期间出版的学术专著,本文将在后面的小节中述及。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亦组织出版了若干部学术论文集(见后文)。还有若干重要著作再版,如吕一民的《法国通史》推出了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陈文海的《法国史》也于2022年推出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著作的修订与再版也反映出我国法国史研究者与时俱进的学术追求,以及成果本身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

除了出版学术专著、论文集外，近五年间，中国学者在史料编译方面也有较为突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世纪早期法国史相关的经典史籍的翻译，二是法国政府部门档案。一些法国近代思想史经典名作也将陆续出版。史料的选编、翻译和注释工作，不仅反映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水平，也为未来法国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不小的便利。

继翻译出版《法兰克人史记》《弗莱德加编年史》之后，陈文海出版了《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人民出版社，2019年）。这部年代记大约成书于公元9世纪中前期，涵盖时段为公元741—829年，主要叙述了加洛林家族的历史，是研究墨洛温王朝晚期以及加洛林王朝历史的重要史料。2021年，人民出版社“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汉译与研究”丛书还出版了李云飞译注的《圣伯丁年代记》。《圣伯丁年代记》在记述的时间上紧接着《法兰克王家年代记》，涵盖时段为公元830—882年，叙述重点是秃头查理时期西法兰克境内所发生的事件。档案翻译方面，近五年间，我国学界集中对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法国外交部档案做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郭丽娜、别致、孙凤辑注的《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919—1922年留法勤工俭学文献》（学苑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及法国外交部所保留的相关档案，对文献进行了誊写和整理，对未来我国学界研究这场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中法大学“办学理念 and 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主客观原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集体翻译出版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法关系史档案汇编（巴黎分馆：卷一）》。该史料集依托南开大学学校委托项目，翻译出版了16世纪末到大革命前法国王室政府、使节、罗马教宗以及耶稣会士有关中国或中法关系的文书与记录，为我国学者研究早期中法关系史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张弛主持了商务印书馆“近代法国思想与历史书系”。书系集结了国内法国史研究者的力量，计划出版如达让松、弗朗索瓦·奥特芒、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等历史人物的著作。2023年，这套书系出版了董子云翻译的《法兰西君主制度》一书。该书是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史经典，是作者克劳德·德·塞瑟尔对弗朗索瓦一世如何治理法国的系统性建议，对于研究15、16世纪之交法国王权理论以及王国治理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学术著作和史料的出版工作之外，近五年国内学者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法国

史相关学术译作，如布罗代尔《论历史》上下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五卷本《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商务印书馆，2023年）、勒高夫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商务印书馆，2022年）等等。一些重要的译作，如乔治·杜比的三卷本《法国史》、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菲利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等顺利再版。这些作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频繁登上各大图书榜单，受到较高的评价。囿于篇幅，文中不一一介绍。

3. 国家级课题立项及研究生论文指导情况

在国家级课题的立项方面，近五年法国史相关主题的立项共40余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吕一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殖民扩张史料整理与研究”），重点项目4项（姚百慧，“围绕中法建交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黄艳红，“10—12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研究”；陈文海，“《撒利克法典》初始版、增补版和系统版汉译与研究”；李云飞，“加洛林王朝王位继承研究”）。课题结项方面，沈坚教授领衔的“《法国大通史》编纂”通过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

除了积极申请国家级课题并取得较多立项外，我国的法国史研究者也在各自岗位上培养了大量法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2019—2023年的五年中，以法国史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共计近150篇，研究内容覆盖面广，选题新颖多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法国史硕士、博士培养和论文指导方面有尤为突出的贡献，这也与这些单位较强的法国史研究团队有关。

4.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活动

作为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国家级学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组织学术活动、引领学术导向、促进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近五年中，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克服疫情造成的困难，顺利开展了各项年度活动。本文选择其中两项最为重要的活动，即研究会年会和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做简要回顾。

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2019年9月，第十五届中法（瑞）历史文化国际研讨班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研讨会主题为“历史与时间：欧洲与中国之比较研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

院校师生参加了本次研讨班。2021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与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主办的第十六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顺利举行。会议主题为“历史时间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受到疫情的影响，此次研讨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师生学者参加。2022年9月的第十七届研讨班同样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主题是“旅行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参与研讨会的师生学者200余名。2023年9月，第十八届研讨班顺利举行，主题是“16—20世纪的中法旅行史”。时隔3年，法国学者再赴华东师范大学，与来自中国各地的师生展开研讨与交流。

法国史研究会年会。2021年11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杂志社共同承办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21年年会在武汉大学成功举行。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法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会议采取线上方式召开。虽然如此，参加会议并做学术汇报的学者仍有60多人，线上旁听和参与讨论的人数达200多人。2022年年会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与中山大学共同承办，在线上举行。年会主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史研究”，同时设六个议题：（1）法国扩张史与殖民史；（2）域外镜像与法兰西民族认同的构建；（3）法国的全球史研究；（4）以法为师：法国制度、思想与文化的外传及其影响；（5）法国文明史；（6）中法关系史。数十位国内法国史学者在线上研讨论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23年年会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主题为“全球（跨国）视野下法国福利国家的缘起与未来”。此次年会是疫情后首次线下会议，共42名学者提交会议论文并做专题报告。

除了上述两项重大活动外，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也组织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沈坚、乐启良主编，10余位国内法国史学者参与撰写的《当代法国史学研究新趋势》（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就法国史学前沿做了深入述评，涵盖保罗·利科的历史阐释学，以及环境史、社会史、政治史、记忆史、情感史、身体史等诸多领域。在此基础上，该书编者指出了当代法国史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一是“反思科学史学的局限性，捍卫历史学的自主性”，二是“结构主义不再流行，微观研究大行其道”，三是“革命话语日趋衰落，而民主话语深入人心”，四是“宏大叙事趋于解体，主观的体验占据上风”。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的主题讨论也以论

文集形式出版，反映了中国学者与法国、瑞士学者之间积极深入的对话。例如202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坚与艾蒂安·布尔东主编的《时间再认识：中法历史学者的对话》，就与2019、2021年两届研讨班有直接的联系。而最近两次研讨班主题《16—20世纪的中法旅行史》于2023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活动基金（23STC006）资助。

二、法国中世纪史

法国中世纪史领域长期以来是我国法国史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早在2011年，沈坚在回顾当时国内法国史研究发展的情况时便指出，“法国中世纪史虽然谈不上死角，但确实是多年受到忽视的领域”¹。不过，从近五年国内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情况看，10多年前令人担忧的局面在不断改善。一方面，中世纪早期法国史的研究在欧洲中世纪史的视域下取得了不断的推进；墨洛温王朝的政治与宗教史研究主题集中、内容深入，加洛林王朝的相关研究视野宏大、格局开阔。另一方面，国内法国史学者正从不同视域出发，探索中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历史，以城市史、社会史、法律史、军事史等主题为主要切入口，为这一领域研究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初步打开局面。

1. 欧洲视域下的中世纪早期法国史研究

中世纪早期法国史的范围包括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在近五年，国内学者对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教务会议、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史和政教关系史以及查理曼统治做了尤为深入的研究，在宗教史、文化史和史学史方面也有若干成果发表。近五年来相关研究主要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中世纪史或中世纪研究范畴，国别史视角下的研究仅占少数。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教务会议。墨洛温王朝时期教务会议的相关研究在近五年取得了突出的进展。相关研究涉及教务会议在中世纪早期的起源、其对奴隶制社会的撼动及其对法兰克早期国家和王权理论的塑造作用。此外，国内学者也从人类学视角对教务会议做了新的解读。刘虹男在《中世纪早期高卢基督教的“主教团会议

1 沈坚：《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亟需加强》，《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第15页。

制”》中认为，在高卢社会由古典晚期转向中古早期的过程中，主教团合议制产生了三种主要的实践形态，即主教选举、教务会议和教会绝罚。这一制度与法兰克人世俗政权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并逐渐融入法兰克王国的权力架构当中。而就具体的历史影响而言，主教团推动了法兰克社会的基督教化进程，缓和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亦弥补了世俗政权在地方公共教育与救济事业方面的缺位。刘虹男、陈文海在《法兰克教务会议与中古早期高卢奴隶制的式微》中进一步探讨了主教团合议制所衍生出的教务会议制度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法兰克教会的教务会议通过传播一系列如“奴隶人性”“人类平等”“上帝分配”等理念，显著改善了奴隶的境遇，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共识。教务会议对法兰克王国的塑造作用也不容忽视。刘虹男、陈文海在《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构建》中指出，学界传统的对法兰克王权理论的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受到突破。基督教尤其是教务会议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法兰克王权。教务会议是墨洛温国王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为王权赋予了神圣性的色彩，传达了“共商同治”的统治理念。而在《教务会议视域下的法兰克早期国家形塑研究》一书中，刘虹男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教务会议对法兰克早期国家的塑造作用。教务会议一方面为法兰克君主赋予了基督教的权威与正统性，另一方面也将“合议精神”贯彻到教俗两界。教务会议所制订的教规教令不仅改变了法兰克共同体的权力架构、王权理论、族群意识、内外秩序以及社会风气等，还让新的“法兰克早期国家”从罗马地中海世界脱胎。最后，刘虹男在《圣职、仪式与表演——教务会议视域下法兰克王国的日常统治》一文中则引入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教务会议在弥补法兰克王国地方行政管理的缺失的过程中，展现出各式各样的王权表演。而究其本质，这种现象体现了法兰克早期国家“政教二元共治”的基调，并对维持法兰克人对墨洛温王权的感知和认同有一定的作用。

政治与政教关系。对于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及政教关系，国内学者在近五年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在政治史方面，有对传统制度、文献和历史解释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宏大思索。朱君杙在《墨洛温王朝宫相政治考》中认为，除了传统的解释，宫相政治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作用，即通过与国王、贵族之间的制衡延续墨洛温王朝统治。宫相制度因此为法兰克王国政治稳定性、统一性

以及政治扩张提供了推动力。刘虹男在《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虚无论”考议》中反思了传统史学所说的墨洛温王朝晚期的“懒王时代”，并评述了西方自20世纪中期起来对这一传统历史解释的修正。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墨洛温王朝晚期的诸王手中确实仍然掌握着一定的“显性权力”，但因为继承制度的缺陷，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王权式微仍然是不争的事实。朱君札在《〈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中解读了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库莱讷敕令》，认为其体现出法兰克人“君臣共治”的政治文化。其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在维持王权与教俗贵族实力均衡的同时，构造出“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从而维系王权的中心地位。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随着秃头查理去世后引发王位继承危机，《库莱讷敕令》原本蕴含的几项原则均无以为继，因此无法继续凝聚王国。李云飞在《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中，重新审视了加洛林王朝“分治疆土”的统治实践，指出疆土分治虽然表面上容易导致国家分裂，但加洛林王朝的早期统治者都注重以此为手段维护王族团结，也通过各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

在政教关系方面，中国学者以若干重要主题、人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了中世纪早期法国政教之间如何具体互动。朱君札在《论查理·马特与教会的真实关系》中阐述了查理·马特与教会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认为这种微妙关系的根源在于查理·马特对现实政治利益的重视高过了宗教情感。文章也同时指出，查理·马特染指教会地产、撤换地方主教的做法受到教会谴责，是他过世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事。张楠在《塑造丕平与教宗斯蒂芬二世的圈地建国》中指出，国外学界近来在丕平献土的问题上，转向强调8世纪早期教宗政治活动的主动性，但这种趋向有两方面的问题，即低估了斯蒂芬二世和“矮子”丕平的关键角色，也“淡化了拜占庭帝国对罗马的深刻影响”。张楠在《教宗选任制度与加洛林时期的政教关系》中又以教宗选任制度为切入点，在梳理加洛林时期选任制度的沿革基础上，指出其本质上反映了政教关系的动态平衡，并因此带来了加洛林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教关系。

查理曼研究。中国学者的查理曼相关研究在近五年间也呈现出可喜的态势，从研究视角来看，包括史学史、重要史籍的考辨，以及基于抄本新史料的研究。李隆国《亲眼所见：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中古拉丁欧洲传记的转型》，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对中古拉丁君王传记的写作体裁的影响。

艾因哈德引入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原则，并采用了编年体例，确立了其传记的独特性。王晋新在《情感与真实——诺特克所述“查理曼之泪”之辨析》中从文本、学术和历史三重语境出发，认为诺特克在《查理大帝业绩》中所述查理曼“流泪”的叙事不符合历史真实。但它仍然是对9世纪下半叶法兰克社会内忧外患及诺特克本人对统治者的期盼的真实反映。刘寅从加洛林里昂地区的抄本研究出发，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刘寅在《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新”》一文中认为，里昂主教莱德拉德所推动的改革，展现了里昂“加洛林革新”的开放性和“帝国视野”，并在里昂与法兰克政权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将里昂整合进了加洛林帝国体系。刘寅在专著《教授“二次立法”：〈申命记〉与里昂地区的查理曼改革》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NAL 1740的中古《圣经》抄本的加洛林读者的注释为研究对象，不仅确定了“里昂注释”的成文时间在公元810年前后，还梳理了《申命记》的早期注疏史。最终，该书证明应当在公元800年前后的里昂教会改革的背景下理解这些注释。

性别、文化与宗教。除了政治史、政教关系史以及重要人物的研究之外，中世纪早期法国史的研究也关注了性别史、文化史和宗教思想观念的历史，反映出这一领域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王秀红在《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王后们》中，从女性史的视角，较为全面地描绘了墨洛温王朝王后在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借此折射中世纪早期西欧文明形成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全貌。朱君棣在《“欧洲”还是“罗马”——基于历史文献对于法兰克人“欧洲”认同意识形成的探讨》一文中认为，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欧洲”认同意识，但也以“罗马情结”的形式保留了对罗马帝国的认同。刘寅在《律法与新民：〈申命记〉与加洛林时代的共同体想象》中，从9世纪初里昂《圣经》的佚名注释出发，研究了《申命记》对加洛林时代不同层面的共同体想象和秩序规范建构的作用。刘寅在《9世纪初里昂地方圣经文化中的〈申命记〉“摩西诅咒”》中，则进一步阐述了里昂大主教阿戈巴尔德如何运用对《申命记》“摩西诅咒”的解释来为自己的反犹话语正名。朱君棣在《加洛林时代的哥特沙尔克“异端”及其宗教争论》中关注了9世纪加洛林世界的宗教思想家哥特沙尔克，指出其反教会正统思想的宗教理论受到争议，反映了加洛林世界各派政治势力在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以及当时的基督教会仍旧由世俗君主主持的现实。

史学史。中世纪早期法国的史学史也是近五年国内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王晋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探析》一文肯定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研究价值，并对西方学界既有研究做了述评，指出其不足，呼吁未来学者继续深入探索。朱君杙在《论〈勒奇诺编年史〉的“民族史”特色》中，围绕这部9、10世纪之交加洛林王朝晚期的编年体史书，指出其展现出法兰克人的民族意识，但也没有完全摆脱基督教历史观的影响与束缚。因此，这部编年史呈现的是一种“基督教世界史”向“同时代民族史”过渡的混合形态。李隆国的论文《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就中古早期编年史相比基督教早期编年史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探讨，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例，认为这部编年史创造了一种神圣的文体形式，刻画了理想化的加洛林基督教君王形象，并促成了“外圣内王式”的基督教编年史传统。

2. 多元视域下的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史研究

在近五年间，以往相对薄弱的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以城市史、社会史、法律史等重要的视角与方法为主线，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未来在我国进一步展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城市史。朱明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构建中的城市》中关注国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进而从城市考察法国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世纪晚期的城市首先为法国民族国家奠定了空间基础，而王权在城市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也有助于王权的强化。朱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结构与空间》（商务印书馆，2019年）一书则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论述，通过对城市景观、城市布局、城市规划的考察展现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并将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社会史。吕昭在《阿维尼翁兄弟会与中世纪晚期法国基层互助》中分析了14—15世纪阿维尼翁兄弟会的运转模式，指出其弥补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缺位，增强了基层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吕昭在《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城市移民与社会融合》一文中则关注了中世纪晚期法国城市的移民问题，认为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大致分为两种路径，即市政权力机构筛选吸纳，以及移民自发建构多元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社会融合反映了移民群体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是中世纪法国城市社会实现自我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此之外，高露、王云龙在《行会视角下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以巴黎大学为例》中，关注中世纪巴黎城

教师和学生组建的学人共同体，其与不同政治权力的互动以及自我保护和自我管理的实践。

法律史。沈坚、董子云在《“真理”与法兰西近代国家——以路易九世法律形象建构为中心》中分析了路易九世法律形象的构成，指出其标志着福柯意义上的“真理意识形态”如何与法兰西王权的世俗统治结合。董子云在《布鲁日习惯法的两次更迭与国王、伯爵、城市的权力之争（1281—1297）》中认为，在1281—1297年间，法国国王、佛兰德尔伯爵以及布鲁日围绕城市习惯法展开的斗争，反映了法国王权如何借助司法和立法手段实现扩张。董子云在《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中，梳理了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立法沿革，将其主旨概括为“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两个方面，并肯定了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董子云的专著《真理的维度：法兰西民族法律文化的诞生（约1200—约1500）》以“真理”这个基本概念切入，反思了法国民族法律文化在中世纪晚期孕育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认为这一时期法国民族法律文化从欧洲共同法的法律文化中逐渐产生，但其民族性仍显著受制于既有的法律文化传统。

军事史。中世纪晚期法国的军事史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这些研究不仅关注军事活动、军事组织本身，而且重视考察其中反映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许二斌、杨慧英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中分析了自由军团的起源、组织形式以及消亡的过程。文章认为，正是自由军团造成的破坏刺激了法国常备军的建立，因此它对法国的近代转型有推动作用。许二斌在《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与王权》中考察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王家骑士团与中世纪的教会骑士团的差异，指出其在多方面加强王权的作用。王向鹏、王琳的《从冲突到妥协：东方战争时期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策略》一文，考察了第一次十字军战争之后法兰克人的东方政权与伊斯兰世界的各层次往来，以及这些往来反映的法兰克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策略“由冲突走向联系互动的发展过程”。

政治与政教关系。张庆海、温锴沁在《中世纪盛期法国中央王权犹太人政策的收紧》中考察了11至13世纪法国国王颁布的一系列涉犹法令，指出法国中央政权对犹政策在这一时期显著收紧，认为其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正在成型的、以“法兰西国王”为中心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内在需求和欧洲反犹运动的必然结果。郭冬梅《法

国“大敕令”的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一文，以法国1355—1357年间经多次三级会议而形成的“大敕令”为研究对象，指出这一敕令反映了权力分配与制约思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阶层与王权的发展，推动法国摆脱封建分裂，走向凝聚统一。董子云在《让·德·蒙特勒伊与中世纪晚期法国萨利克法神话的建构》中认为，查理六世的秘书让·德·蒙特勒伊提出了萨利克法是“国王敕令”的论点，使之很快融入法国王权意识形态之中，也可能是萨利克法日后得以迅速上升为王国基本法的关键因素。叶宣延在《〈布尔日国事诏书〉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政教关系》中，分析了1438年查理七世颁布的《布尔日国事诏书》的历史背景，并通过考察诏书实施和最终被废除的过程，阐明了其背后世俗君主、罗马教廷和法国教会“三者之间交织缠绕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董子云在《中世纪末期高卢主义的理论建构——科姆·基米耶〈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中的王权与教权》中，系统研究了巴黎教会法学家科姆·基米耶的《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分析了其中所反映的法兰西王权理论，及其与教会公会议至上主义政治理念的同构性和差异性。

三、法国近代史与革命史

我国学者在法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十分深厚的学术基础与传统。其中，法国大革命研究一直是国内法国史研究的优势领域。不过，在近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旧制度法国历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丰硕。中国学者在旧制度时期法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尤为突出的成果。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也正在以往深厚研究底蕴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出新的视角与领域。

1. 突飞猛进的法国旧制度史研究

旧制度法国政治史与财政史。在法国旧制度政治史与财政史领域，近五年的相关研究既包括视角宏观的比较研究，也包括对旧制度法国主要政治制度、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的研究。此外，若干研究从具体政治事件入手，试图勾勒旧制度法国政治演进的核心线索。韩伟华、盛心悦在《政治与社会思想比较视野中的近代法国立国之路》中采用比较视角，指出相比英美政治实践中的稳定性，法国却在19世纪后在革命与复辟间动荡，并由此思考相应的经验教训。黄艳红的《近代早期的国际竞

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采取比较的视角，指出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国际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国与西班牙在国际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当源于其低效的财政动员。庞冠群的专著《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详细论述了旧制度下的司法体系、王权理论、官僚制度、社会治理等内容，指出了绝对君主制下，王权与高等法院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以及18世纪后期法国政府改革高等法院制度的尝试。于京东在《近代法兰西的国家形象及其传播——兼论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构建》中指出，17世纪以后，法国有了较为统一的“祖国”体验与记忆，在一系列符号、象征、仪式、媒介与日常生活所展开的文化性场域中，民族国家的形象得以“不断地描绘、复刻、传播与重现”。梁桂蓉《危机中的“和平”：“正义之床”与1563年查理九世的成年礼》，以近代早期法国的主要王家仪式中的“正义之床”入手，考察了1563年“正义之床”个案中王权与高等法院的冲突，指出了其推进法国绝对王权建构的意义。郭冬梅在《亨利四世改宗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早期形成》中分析了亨利四世改宗的三方面客观因素，指出这一举动的目的在于追求权威与臣民认同，顺应了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旧制度法国治理史。近五年间，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尤其关注了旧制度的治理。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激起了有关旧制度传染病治理的相关研究。周立红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高谷价的性质及原因》中指出，路易十四时代高谷价有三大结构性原因：一是谷物生产的脆弱性本身；二是旧制度法国封建的土地分配制度产生了庞大的不能自给自足的农民群体，进而使得高谷价造成惨烈的社会后果；三是市场缺陷以及政府监控能力不足。高谷价的问题也折射出这一时期治理体系的弊病所在。于京东《空间的旧制度与区划的大革命——近代法国领土治理中的央地关系与结构转型》着眼旧制度治理的空间维度，认为“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在空间安排上试图摆脱中世纪的异质、杂糅与交错状态”，奠定了“空间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模式，进而又催生出了“基于领土的政治认同与爱国情感”。熊芳芳在《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中认为，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面对鼠疫等流行性疾病的反复威胁，法国城市在百年战争之后相继推行了若干治理措施和条例，不仅完善了疫病防控，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治理范围的扩

大和治理手段的发展”。而在17世纪后，瘟疫治理的权力主体从市政当局转移到了君主。梁桂蓉、熊芳芳在《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清洁与卫生治理》中回顾了16到18世纪王室政府和城市当局出台的一系列清洁卫生法令，指出这些立法和行政监管体现了“政府和城市管理职能的发展”，是近代以来制度化的法国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詹娜在《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犯罪与管控》中，从犯罪类型的转变，王室在犯罪治理方面的介入不断深入以及治安维持方面的角色等方面，描述了旧制度时期以王权为标志的国家从贵族手中收回暴力控制权的趋势，认为这一时期犯罪发生了“由司法审判到行政治理的转变”。

旧制度法国思想史、概念史与知识史。在近五年，旧制度法国思想史是我国法国史研究者十分重视的领域。学者们深入文本语境，对思想史经典尤其是孟德斯鸠的作品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与阐发。而除此之外，围绕历史中出现的某些基本概念，以及知识的组织、传播而开展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学者们从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嬗变，从知识的整理和生产，考察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崇明在《孟德斯鸠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的自然观念》中指出，孟德斯鸠的自然观念在继承17世纪自然法传统之外，也引入了若干多样性的要素；孟德斯鸠因此强调，各民族的立法者需要依照各民族的社会自然推行节制审慎的启蒙和变革。张弛在《孟德斯鸠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中根据文本语境认为，“孟德斯鸠提出商业精神与征服精神，目的在于反驳重商主义者于埃的《古代的商业史与航运史》的观点”，“他的商业理论意在颠覆重商主义的原则，倡议和平互惠的国际关系”。在《孟德斯鸠商业思想语境辨析》中，张弛又指出，孟德斯鸠的商业思想回应的是，经历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衰败后，法国人对重振国威的和平之路的求索，因此并非完全基于抽象理性主义，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张慧在《重农学派与18世纪法国旧制度改革》中认为，重农学派的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改革观念，设计出以财产为标准界定公民身份的政治方案，促进了“传统王权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重农学派所促进的改革也有其局限性，即“无形中塑造了另外一个特权阶层”。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历史话语与宪法概念（1750—1789）》指出，旧制度末期的宪法概念带有超时间、非演化性的特征，“有维护现有的不平等的等级—社会秩序的一面”，而革命者则带来了宪法的“零点时刻”，意味着“民族集体生活的重启及与历史的决裂”。崇明在《启蒙

思想的他者论述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分析了启蒙思想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成因与性质。石芳的《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关注启蒙时代的反哲人群体，指出了他们在启蒙哲人形象塑造和历史解读方面的重要影响。钟姗姗的《16—17世纪学院在法兰西王权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历史作用》，关注了这一时期法国的法兰西公学院和法兰西学术院在规范民族语言、促进文化创新和民族认同以及推动国家转型方面的贡献。徐前进在《法国启蒙时代初等教育改革：原因、过程与结果》中以初等教育为切入点，指出了启蒙时代初等教育改革迟缓的现实，认为初等教育的问题是矛盾的一个源头，而革命激进主义并未能消除这一长期以来的社会矛盾。张茜茹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知识系统：知识的分类及其新的组织方式》中指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更新了“组织知识的方式”以及“认识知识的方式”，使得“知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最重要的力量”。张茜茹的《从普通的工具书到底护知识的方舟——试论狄德罗对〈百科全书〉期望的演变》，从狄德罗编写《百科全书》的心态变化阐述了《百科全书》多重的意义和多元的价值。庞冠群的《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则回顾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与批判，认为其促进历史学家进一步发现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旧制度法国宗教史。近五年来，国内学者着重围绕寂静主义之争以及博絮埃的宗教-政治思想展开深入研究。但也有政教关系史研究以及宗教文化与心态史相互结合的研究。李德龙在《近代早期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中认为，在1564—1615年期间，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经历了从推迟接受到有选择地接受，再到默许地方教会接受三个阶段，反映了这一时期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法国政教关系调适的过程。江晟、郑欢在《16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中，从宗教改革时期宗教少数派的“想象的”神圣空间建构入手，认为这种空间维度“推动了相互对立的教派身份认同边界的成型”，它与世俗空间的边界最终走向模糊和混淆，标志着法国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趋势。陈喆在《法国静寂主义事件的开始》中探析了17世纪末法国发生的静寂主义事件，指出了既有研究在探究事件成因上的局限，通过梳理当时“法国政教两界上层人物之间复杂的人际和利益关系网络”，对此问题做了新的审视。陈喆在《从信仰到权力——静

寂主义问题的升级与博絮埃、费内隆之争的开始》中指出，静寂主义问题升级为博絮埃和费内隆的争论背后，反映了“法国政教两界上层人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揭示路易十四执政后期意识形态之争与政治权力斗争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联系”。周凝、乐启良在《情感与秩序：17世纪法国静寂主义之争》中专门考察了博絮埃和费内隆的争论中的两方立场，并指出“法国静寂主义之争的本质是基于情感的纯爱理论和基于秩序的王权理论之间的对峙”。周凝的《论十七世纪法国的身体隐喻政治：从帕斯卡尔到博絮埃》认为，帕斯卡尔和博絮埃的身体隐喻的书写差异“呈现出对国家起源、等级秩序以及宗教政策这三个政治主题的不同思考”，并合乎“法国绝对君主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语境”。周凝在《从上帝秩序到国家秩序——论博絮埃对奥古斯丁和平观的阐发》中考察了博絮埃对奥古斯丁和平思想的阐释，认为它不仅反映了“17世纪思想家对中世纪基督思想的延续与反思，也可推动当代人对国家秩序进行理性思考”。

旧制度法国文化史。也许是受到法国学界旧制度史研究侧重文化史的导向影响，我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数量大、范围广、视角多、选题新。郭华榕在《法国近现代一种难于避免的社会互动：创造发明与“恐新症”》中认为，法国与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创造发明与“恐新症”的较量，体现出社会矛盾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互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兰西文明的了解。王印在《法国近代早期的生活节奏与观念演变——基于〈牧羊人万宝通历〉的人类学考察》中，考察了法国近代早期历法中所体现的循环时间结构，进而阐述其对生活节奏乃至大众心理的影响。江晟在《秩序的崩溃：鼠疫对现代早期法国社群结构的影响》中认为，近代早期暴发的鼠疫导致社群秩序的停摆和崩溃，而“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诸多社群及其成员普遍采取排斥、迫害和驱逐边缘人群的措施”，此类措施“推动了现代以世俗政治为中心、以民族身份认同为特征的新社群结构的诞生”。江晟在《暴力与节庆——16世纪法国城市街道空间的仪式性意义》中认为，16世纪的街道空间展现出世俗—宗教二元性，“街道空间的内涵与表征本身即表现了这一时期民众对于秩序更替的渴望，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基础性架构”。汤晓燕在《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中认为，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的重要角色背后是法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而随着18世纪启蒙时代沙龙“开始面向更多元的社会群体”，原本以贵族

精英阶层为主的沙龙女性也逐渐隐退。周薇薇《从宫廷到民间：巴黎的时尚商人及其在法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18世纪下半叶，以罗斯·贝尔丹为代表的时尚商人在法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不过，“她们虽然推动了时尚传播，促进了奢侈性消费，但对宫廷王室的依赖又让她们成为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充当了性别歧视和阶级对抗的牺牲品”。唐运冠、沈坚在《“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指出，拉伯雷阅读史中，读者对小说中的“粗俗”元素的心态转变折射出16—18世纪法国“文明化”的进程。而巴赫金的解读将“官方”与“民间”的概念绝对化，有失公允。唐运冠在《法国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游戏伦理》中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游戏伦理的话语权从基督教转向人文主义学者，使得人们开始正面评价游戏的意义，并将游戏与儿童联系在一起。而随着绝对主义国家兴起，游戏伦理的话语权又逐渐转移到了宫廷社会手中。游戏成为“宣扬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彰显权力的威仪，并加强对臣民的精神控制”的工具。唐运冠在《游戏与路易十四宫廷社会的构建》中认为，“路易十四有意识地利用游戏来构建和强化绝对君权”，但同时肯定了这一时期“优雅”的游戏伦理孕育现代意识，促进文学艺术，为启蒙运动创造条件的积极意义。唐运冠在《从游戏到艺术：论近代法国戏剧的专业化》中认为，近代法国戏剧发生了从集宗教性和狂欢性于一身的公共游戏到职业性的戏剧演出的转变，反映了近代法国的社会转型。

2. 推陈出新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法国大革命史是我国法国史研究的传统强项。在近五年中，我国学者不仅深化了对传统意义的革命史研究的认识，也着重考察了革命话语与革命概念史，并引入了如图像史、情感史等新方法，可谓推陈出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法国革命史研究成果在总量上略显不足，后续也许是国内学者需要进一步着力的一個重点领域。

革命史研究。洪庆明、许姗姗《巴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与革命意识形态宣教（1789—1794年）》，围绕“再生”这个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指出巴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是对象征符号的重建，也是“对民众施以意识形态教化”，将革命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头脑当中”的手段。盛仁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救助：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尝试》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社会救助从前现代向现

代转型的重要分水岭，虽然大革命的转型尝试算不上成功，“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李惟一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军事节日（1789—1799）》中考察了大革命期间军事节日的产生、更替，指出了这些节日的教育性功能。侯建新《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纠正了托克维尔的判断，认为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是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周立红、马继红的《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与推进——一个跨国史的视角》运用跨国史视角，“从革命爆发的背景、革命战争爆发的动因、革命战争与姐妹共和国的关系、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四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革命的图像史。汤晓燕的《革命与图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图像与政治文化》一书，在反思当下图像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基础上，从整体上梳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图像，通过图像考察其背后展现的观念心态，并讨论了反革命图像的问题。

革命话语与概念研究。张智的《略论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诸提案中的财产话语》一文，考察了《人权宣言》不同的提案作者所提出的不同的财产话语。通过对西耶斯、色贡德和马拉等人的财产话语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些精神各异的财产话语不仅影响到了1789年《人权宣言》，也在大革命期间被不同立场的革命者所借用。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认为，大革命推崇古典典范，但热月政变之后，“观念学派”思想家否认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榜样地位。而贡斯当、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19世纪思想家进一步将古典塑造成远离现代社会的“异乡”。黄艳红在《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以公制单位“米”的诞生为中心的考察》中考察了法国公制单位的普及历程，以及大革命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及世界影响，表明“理性主义的努力可以有效克服旧传统的弊端”。黄艳红《从话语理解法国革命的观念起源——基思·迈克尔·贝克的政治文化研究述评》一文认为，贝克对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将英语学界的话语分析嫁接到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并在分析大革命的政治语汇的创生时与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形成某种呼应”。李倩《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迷”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质》认为，大革命时期出现的“英国迷”，在结合法国国情的基础上

借鉴英国政制，本质上“表达了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持续诉求”。李倩在《18世纪下半期英国模式在法国的困境》中进而认为，英国模式在大革命初一度受到推崇，但法国先后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都拒绝模仿英国。这种对英国体制的推崇在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中仍然延续，但从未取得成功。

四、法国现当代史

近五年间，中国学者对法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大体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研究覆盖面全。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直至“二战”后的第四、第五共和国均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二是呈现出内外兼顾的态势。一方面，主要着眼于法国国内的研究，围绕思想史、文化史、知识史、治理史等维度展开。另一方面，近五年国内学者就现当代法国的殖民史、外交史以及中法关系史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堪称是近年来法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三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在我国南海主权的历史渊源问题上，沈坚承担了南京大学陈谦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历史主权研究”的法国子课题，并于2019年率子课题成员赴法拍摄、整理、翻译了大量相关档案。多位中青年学者也于近五年发表了有关法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历史角色的研究。以下，根据研究内容的“内”“外”之分，做分别阐述。

1. 现当代法国史的“内”

就以法国国内历史为主题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在文化史、思想史、知识史和治理史方面有十分丰富的成果，但在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研究相对欠缺。

现当代文化史。近五年中国学者对法国现当代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涵盖宗教文化史、政治文化史、政治记忆史等方面，尤其着重阐述了教育对于国家政治认同和世俗化的推动作用。董涵宇在《试论19世纪末天主教在法国民族记忆中的融合——以1873年“朝圣月”中的记忆之场为例》中，以1873年“朝圣月”中出现的“记忆之场”为个案展开研究，剖析其中反映的“法国天主教如何从与共和国相冲突的国家层面迁移到与社会和谐共处的个人层面，最终实现和世俗生活的共存”。肖伊梵在《19世纪法国女修会的社会活动》中指出，从1801年起女修会发展迅速，是天主教复

兴的重要推力，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共和国强烈的反宗教情绪和国家世俗化的需要”，女修会最终随着天主教一道退出公共生活。史欣灵在《“重续时间之链”：〈亨利四世万岁〉与法国复辟王朝初期的政治宣传》中，以《亨利四世万岁》这首歌曲在复辟时期的不同版本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它在复辟王朝的政治宣传作用，即“唤起并强化法国民众对君主制的记忆，为现实政治构建出纵向的联系与支持”。江天岳在《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及其意义》一文中从记忆史的角度指出，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的历史记忆的纪念方式转变也反映出“人们面对过往的一种平和、包容、理性的态度”，及其向和解与共生的“记忆之场”的转变。曾晓阳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公立初等学校对大革命形象的重塑》中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在初等学校大力开展大革命教育，树立大革命的正面形象，为共和思想在法国的根深蒂固提供了巨大的助力”。这一经历亦显示出“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对稳固政体的重要作用”。曾晓阳在《帝国的解构与共和国的建构——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家认同教育》中，以第三共和国时期拿破仑帝国的形象为切入点，认为第三共和国采取多种教育手段从思想上瓦解拿破仑帝国，让广大农民更为认同共和制度，使得“第三共和国也因而成为法国历史上教育立国的典范”。孟亚莉在《法国第三共和国前期公立小学宗教中立原则》中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公立小学教育中，爱国主义价值观取代“上帝”，动摇了法国社会的宗教根基，推动了法国社会的世俗化。

现当代思想史。在这一领域，托克维尔研究、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独树一帜。李宏图《约翰·密尔与托克维尔——思想家交往关系的历史考察》，探究了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思想来源和谱系关系，指出“托克维尔确实在思想上启发了密尔，激发起密尔对民主政治、中央集权等诸多问题更有深度、更为理性的思考”。在《未被时代接受的思考——托克维尔和约翰·密尔论“劳动阶级的未来”》一文中，李宏图探讨了为什么托克维尔和约翰·密尔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当时都没有被接受，更没有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性安排”。黄艳红《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及其局限》指出，托克维尔眼中的民主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概念”，有助于让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整合到“一场不断迈向平等的运动之中”。倪玉珍在《圣西门的欧洲观：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分析了圣西门欧洲观的历史背景以及思想源

头，指出“圣西门认为欧洲应普遍确立实业体制，并确立科学家主导的、独立于各国世俗权力的统一的精神权力”，且这种欧洲观对于当今欧洲具有启发性。倪玉珍《兼顾个人与社会——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皮埃尔·勒鲁思想初探》，考察了圣西门的著名弟子皮埃尔·勒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活动，指出勒鲁对圣西门主义进行了改造，提出了兼顾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学说。倪玉珍《孔德与19世纪初法国社会科学探索中的道德重建》，考察了孔德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的欣赏者转变为批评者，进而形成独特的社会科学观，即“将经济、政治、道德等问题关联起来考察的综合性科学”。乐启良在《介入史学的意义与局限——奥古斯丁·梯叶里对法兰西民族史的重构》中认为，奥古斯丁·梯叶里的法兰西民族史学研究有着鲜明的政治介入色彩，但他的历史信念在1848年革命后坍塌，因此出现了重大摇摆。尽管如此，仍需肯定他对于法国史学革新的积极推动意义。沐越在《论1848年革命前拉马丁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的转向》中指出，拉马丁的政治理念转变与“19世纪上半叶法国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制的制度转型”暗合。肖琦的专著《法兰西思想界的神牛：科耶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考察了科耶夫从一位巴黎的俄国流亡者走上法兰西思想神坛的全过程，以知识生产与传播为切入点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二战”后的法国社会。

现当代知识史与教育史。周小兰的《纪尧曼出版社与法国政治经济学的传播（1835—1864）》，以成立于1835年的法国政治经济学专业出版社纪尧曼出版社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早期的出版历程，认为“纪尧曼出版社的经历展示了近代出版平台推动学科建设的经典模式”。张智在《“社会经济学”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的社会主义话语》中认为，“社会经济学”是今日法国知识界反对市场社会，而不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想的观念源头。吕一民在《重教尊师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中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充分强调发展教育，“为法国在这一时期完成现代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战后法国教育格局产生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王玮、吕一民在《拉维斯与19世纪晚期法国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在知识史视野下探讨第三共和国前期拉维斯式史学的建构历程，以及他在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曾晓阳在《女子教育与共和国：近代法国女子教育的世俗化改革》中认为，第三共和国对女子教育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促进

了“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使得女性“完成了从家庭妇女到女性公民的身份转变”。

现当代经济、政治与治理。周小兰的《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法国19世纪40年代末的贸易原则之争》认为，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针对贸易原则爆发的激烈论战是革命所造成的政治裂痕在经济层面的投射。周小兰《“气候—危机”模式再探——以法国无夏的1816年为例》，推翻了传统历史解释中“气候异常—谷物歉收—经济危机之间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认为1816—1817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常年战争、帝国解体和大陆封锁政策失效”。周小兰在《法国1846—1847年经济危机新论——兼论1848年革命的爆发原因》中指出，1846—1847年经济危机促成了法国1848年革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政府大量进口谷物，工业品市场萎缩，政府与投资人在铁路施工过程中的矛盾。面对危机，“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政府无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中所必需的制度改革，最终必被淘汰”。乐启良《霍乱、面包与谣言——论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认为，“七月王朝在处理霍乱危机时所表现的无能强化了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陷入膏肓的印象，促进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滕子辰的《1910年塞纳河洪水与巴黎市政建设》和荆文翰的《变革时代的城市现代化转型——以“巴黎大改造”为例》分别从个案研究出发，论述了1910年塞纳河洪灾对巴黎市政建设的深远影响以及奥斯曼改造巴黎的积极与消极意义。徐之凯的《二战后法国对德占领初期的社会治理危机考察（1945—1946）》指出，“二战”后德国法占区出现危机后，法方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急举措，“一定程度上将危机转化为法德双方战后人员相互接近的良机，并为盟国对德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借鉴和铺垫”。肖晓丹《“光辉三十年”期间法国工业环境监管模式的转型》指出，新合作主义的制度化是“光辉三十年”（1946—1975）期间法国工业环境监管模式转变的主要趋势。肖晓丹在《环境争议中的知识生产——基于法铝集团海洋倾废案的考察》一文中又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降兴起的反海洋倾废运动促进了环境风险知识的再生产，参与塑造了法国当代社会对于技术风险和环境公害的认知。

现当代社会史。张庆海、俞杰在《论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转型》中，认为“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职业发展实现了法兰西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转型”，但同时也因为犹太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而受到攻讦，甚至法国的国家形象也受到污蔑。

2. 现当代法国史的“外”

法国殖民史、外交史在近五年受到广泛的关注。中法关系史也出现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多基于官方档案，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视野。

殖民史。主要集中于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研究，对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的研究相对较少。刘梦佳《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阐述了法国确定对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的共和派基础，并指出了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陈雅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与北非殖民问题——以让·饶勒斯与摩洛哥问题为个案》中，“从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政治视角和反殖民主义视角这两个角度来考察饶勒斯对摩洛哥问题的关注”。张弛、沐涛《殖民时期法国对塞内加尔同化政策评析》认为，“法国在塞内加尔的同化政策涵盖政治同化、经济同化、文化同化和身份同化四个方面。由于现实利益纠葛、文化排斥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同化政策在塞内加尔最终归于失败”。闫波桥在《法国与塞内加尔“西非门户”地位的形成——基于长时段殖民史的考察》中，考察了法国殖民对塞内加尔在西非取得显著优势地位的影响，认为这个案例“体现出法国在该地区殖民利益布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韩志斌、林友堂在《部落与民族主义的竞逐——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变与格拉维部落的兴衰》中，刻画了摩洛哥部落、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殖民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由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殖民主义政权得以通过玩弄部落认同对殖民地进行分而治之”。谷名飞《1946—1949年法国印支政策中的“保大方案”》考察了“保大方案”失败的历史缘由，并指出在此之后，“军事解决成为法国印支政策的主要方向”。赵娜在《法国委任统治与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由来》中认为，“亚历山大勒塔问题肇始于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其主权转移“违背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维持现状的意愿，为叙利亚与土耳其两国的领土争端埋下祸根”。

外交史。将现当代法国外交史放在冷战史的视角下加以考察。高嘉懿在《传承与发展：三十年来法国学界的冷战史研究状况》中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学界的冷战研究“在传承国际关系史在政治、外交、经济等传统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向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等其他领域延伸”，呈现出“研究内容多维、研究视角全面、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的态势。姚百慧的《美国与1958年法

国政府危机》一文指出，在1958年法国政府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了冷眼旁观但逐渐偏向戴高乐的政策”，“从保持冷战优势、顺应非殖民化浪潮、法国自身政治变动等角度，美国最终认定戴高乐执政是对其最有利的结果”。王雯菲的《“尼克松冲击”与法国应对美元霸权的策略》一文阐述了面对“尼克松冲击”的挑战，蓬皮杜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认为其特点在于“强调欧洲合作和首脑对话”，是美欧同盟在经历分歧之后仍然维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冷战后法国对非军事干预、第二代中程弹道导弹研制问题、“二战”后美国对法德萨尔问题的政策等均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也有少数论文关注20世纪以前的情况，如1888—1898年的法意贸易战、战后国际友好城市、第二代中程弹道导弹研制问题等等。

中法关系史。大致涵盖三个主题：一是清代与民国之际的中法交通以及观念流通，二是“二战”期间中法外交和军事往来，三是中法建交。谢子卿在《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一书中，系统回顾了法国各界对于中国礼仪的态度和看法，认为“礼仪之争与法国的羁绊所彰显出的文明交互对于进一步探究近代西方崛起、东方衰弱的内在原因具有深刻意义”。梅谦立的《康熙年间两广总督石琳与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阐述了“安菲特利特号”的广州之行背后“总督石琳、粤海关及法国耶稣会士与商人各方势力的博弈”。汪聂才《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航行中国与中西文化交流——以祭孔礼仪为中心的考察》，将“安菲特利特号”航行放到礼仪之争的背景下，指出了两次航行记录中对祭孔礼仪的诠释的转变。葛夫平的《法国与门户开放政策》指出，19世纪末法国拥护门户开放政策的动机有两方面：一是法国在列强竞争中“未能取得优势地位，不满足于既得权益”；二是为了“促成列强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两者都服务于法国政府对华的侵略。顾少华的《从“French Revolution”到“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史学名词译名的确定》一文，考察了“French Revolution”一词如何最终在1898至1900年间得到中国本土知识分子采用，“并由一个指涉暴力鼎革的语词转向一个现代政治概念”。柯弘毅在《革命的全球化：法国早期华文出版业的发展（1880—1920）》中，以从1907到1920年中国知识分子在法国的华文出版活动为切入点，指出“华文出版业的诞生和发展与革命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以及背后“以法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和同盟会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团体对华

文出版业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庄和灏在《辛亥革命前法国应对孙中山革命的官方认知及立场》中，“从认知心态、政治诉求、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特点这三方面”，以及“力量关系、同异质体系等国际关系理论”探究了为何孙中山未能如愿争取法国为外援的原因。

“二战”期间的中法关系方面，侯中军《二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中法英军事结盟计划》描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到德国突袭波兰后，英法与国民政府开展军事合作的态度转变，指出即使在德国突袭波兰后，“英法仍未能意识到联合中国结盟抗日的重要性”。左双文、陈舒媛的《二战时中法在华南的军事合作构想》考察了“二战”时中法华南合作抗日的方案为何没有落到实处的多种因素，从而揭示为何“战时国民政府的对法外交未能有大的作为”。谭刚《滇越铁路滇段的接收与中法交涉（1940—1946）》认为，“1940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滇越铁路滇段的进程经历了控制调度权、接管铁路和收回路权三个阶段”。但“由于滇段路权在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中从属于越南问题，因此滇段路权并未主导1940—1946年的中法关系”。刘萍的《战后中法引渡战犯问题交涉》认为，“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在引渡战犯上的初步实践，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同时也是废除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

中法建交问题上，高嘉懿的《跨阵营的探路者：法国议员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认为，冷战时期法国议员在“两国外交关系空缺的情况下成为先行探路者，传递消息、维系联络，最后巩固了中法建交成果”。这种议会外交“有效传递了冷战跨阵营国家交往中寻求国际和平、共谋发展的呼声”。孙君健、李军军在《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与中法建交》中指出，“在反对美苏核垄断的共同利益诉求下，中、法两国调整外交战略，以核问题为契机进行外交接触、洽谈，并采取灵活建交方式，迅速成功建交”。因此，“核利益一致性”是“推动1964年中法建交的直接因素”。

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研究。郭渊《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西沙立场及对中法日关系的考量》、任雯婧《法国南沙群岛政策与“九小岛事件”再研究》、袁航《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陈梁芊《日本全面侵华后法国对西沙群岛的考量与行动（1937—1938）》、王静、郭渊《1937—

1940年日法的南沙群岛之争及交涉》等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具体时间段考察了法国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南海政策的演变，在突出我国对南海的既有主权的同时，展现了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

五、法国史学动态的引介

法国素来是历史学研究的大国，法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经久不衰。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长期以来都积极引介和评述法国史学的前沿动态。在近五年，这项工作也没有中断。相反，中国学者不仅对传统上受重视的年鉴学派史学方法和史学实践做了更为细致的评述，而且还将法国及国际学界在动物史、环境史、图像史、全球史、情感史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引介国内，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1. 有关年鉴学派的研究

年鉴学派可谓是法国史学的一张“金名片”，也是近五年间中国法国史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尤其是从史学史角度回顾年鉴学派的历史与演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国内学界对新史学、心态史、气候史的认识。学者们亦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新史学的关系，叙事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挑战，以及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视角下如何重新评价年鉴学派的问题。沈坚在《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指出，虽然也许法国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史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建设中的流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不完整，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张弛在《法国心态史的研究传统与理论转型》中指出，法国心态史起源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并在之后“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议题，推动了史学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史学在反思心态史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人的能动性，进而更有效地分析历史的转型与变迁”。张弛的《心态、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乔治·勒费弗尔的心态史》一文，阐述了法国革命史家乔治·勒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的三个理论特点，即“心态是一种能动的因素；心态构成社会经济与人行动之间的中间因素；心态通过人的实践得以影响社会政治转型”。周立红的《法国新史学的开拓者——访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教授》，通过对米歇

尔·伏维尔的访谈和生平经历回顾，指出“伏维尔‘从地窖爬到顶楼’，实现了从社会经济史到‘新史学’的转型”。周立红《从境地研究到气候史：勒华拉杜里的总体史探索》一文指出，勒华拉杜里从“没有人的气候史”转向气候史，反映了他某种程度上受到“叙事史的复兴”的影响的同时，也“努力将科学的历史学与叙事的历史学结合起来，从总体史的角度撰写气候史”。黄广连在《雅克·勒高夫对新传记的探索》一文中指出，“20世纪后期法国出现的传记回归对年鉴学派提出了挑战”，而勒高夫通过《圣路易》做了回应，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如何实现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个体化的叙述方法的有机融合，又能同时保持传记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等等。成威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叙事诗学——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亦属于叙事的范畴”。

2. 法国史学前沿引介

动物史。《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刊登了《法国动物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塞尔纳教授访谈录》。文中皮埃尔·塞尔纳教授说明了法国动物史研究相比英语世界研究的特色，随后以动物史与大革命史结合为例，阐述了其偏重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最后还“指出人类的义务是当今处理动物与人类关系的出发点”。

革命史。近五年的研究关注了法国大革命史转向关注个人的体验与情感的趋势，并反思了革命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图像史料的问题。庞冠群、查少琛在《体验革命：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新路径》中认为：“受情感史等当代史学潮流的推动，法国革命史研究转向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以体验与情感为切入点，从个体的生命经历出发重新审视革命。”虽然如此，这种研究视角下的部分研究“有过度共情的倾向，它们以体验与情感为借口不加区分地为革命造成的后果辩护，持论有失公允”。汤晓燕在《法国大革命图像史研究的兴起、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中，回顾了法国大革命的图像史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其“暴露出图像生产传播过程信息缺失及受众不明等诸多问题”，目前“法国大革命图像史学家尝试通过打破学科壁垒、连接图像史与传统政治史或社会史以及线上资源共享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情感史。孙一萍《威廉·雷迪如何解读情感的历史变化及其意义》认为，“雷迪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清晰勾勒出大革命前后法国人的情感变化过程”。“雷迪

有关‘情感主义’兴衰的研究，强调情感变化背后的历史意义……丰富并深化了对大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认识”。

全球史。主要围绕2017年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展开。汤晓燕《一部全新法国史对法国民族性认同的挑战——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及其引发的论战》，回顾了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出版之后在法国产生的舆论反应，指出了全球史在法国所遇到的阻力及其根源所在。周之桓《中世纪全球史：法国与意大利学者的探索》“以《法兰西世界史》和《意大利世界史》为切入点，从法国与意大利比较的角度考察两国的中世纪全球史探索”；并以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例，说明两国学者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解释和叙事，反映了法国与意大利两国学者不同的全球史路径及研究心态”。

中世纪史。关注了中世纪史学史、中世纪政治史，以及中世纪史研究中历史学与文学批评及人类学的结合问题。黄艳红《贝尔纳·葛内的中世纪史学研究述略》回顾了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纳·葛内对中世纪史学的研究，认为“葛内倾向于把中世纪史学视为整个西方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文艺复兴史学之间没有根本性的断裂”。董子云《贝尔纳·葛内与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研究》回顾了贝尔纳·葛内提出研究法国中世纪晚期政治史的新框架的历史背景，并就其所论社会基础、空间框架、政治行动和政治心态等研究方向，及其对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深远影响做了分别阐述。黄艳红《近年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的跨学科动向二题》则回顾了近十年中法国中世纪史学界如何“破除学科藩篱”，认为研究热点主要反映了文学批评和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趋势。

环境史。钟孜《“环境转型”研究：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考察了法国史学界“环境转型”研究的历史起源、研究方法以及考察主题，认为“未来的‘环境转型’研究可能会在地方性和全球性两种考察取向之间并行”。

社会史。庞冠群《启蒙时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莱特·法尔热的民众史研究》一文，述评了18世纪法国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阿莱特·法尔热的主要作品，认为“其研究保留了法国经典社会史的底色，同时又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边界”。肖琦在《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背景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

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与“‘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一道，有助于“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殖民史。王雯菲《“殖民情境”理论与法国殖民史研究的转向》一文认为，近年来法国殖民史研究受“殖民情境”理论的影响，展现了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强调殖民地社会的主体性，二是关注帝国内部流通，三是重视人、物质与思想在帝国间的循环。

对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除了对法国史学发展历程与前沿导向的关注之外，也有学者呼吁对我国第一代法国史学人开展深入的群像研究。乐启良在《政治、人生与学术：第一代中国法国史学人的群像研究》一文中对第一代中国法国史学人的主要代表做了群像式的回顾，认为“梳理其在不同历史处境下所做的政治选择、人生际遇和学术研究，不仅能够拓宽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而且也可能对中国法国史学科自身的反思有所裨益”。

六、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的展望

综合法国史研究各个领域在近五年的发展情况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学者的法国史研究至少主要展现了以下四个积极态势：一是研究覆盖面广，各个领域均有显著进展，一些传统薄弱领域也得到补强。二是研究前沿性强，在积极引介法国史学前沿的同时，结合中国学界实际，推出了一系列基于新史料、新问题、新方法的研究。三是国际学术声望显著提升。中国学者的法国史研究成果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刊登，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当选法国海外科学院终身通讯院士。四是青年学者活跃，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后备力量正崭露头角，在各自专门领域产生了有特色、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不过，在肯定积极态势的同时，对近五年中国学者法国史相关研究成果的总体梳理也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些缺憾和不足之处。例如，中世纪卡佩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政治史研究还未能深入。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研究整体上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中世纪经济史鲜有中国学者涉足；旧制度和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经济史往往是研究其

他问题时附带提及；仅现当代史领域对经济问题有直接的讨论。就中法关系史而言，虽然出现了大量扎实的档案研究，但1800年以前的中法关系史研究也许存在不足，这也体现在相关成果相对较少上。法国现当代史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思想、治理等领域，政治史、社会史的成果略显单薄。上述研究领域缺憾的成因，一方面是我国的法国史学科建设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才能有完备的人才和学术培养体系；另一方面，这也与法国史学界在不同领域的研究特点不无关系。在加快建设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的当下，我国法国史学者依然任重道远。

即便如此，展望未来五年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的发展，总体上乐观的局面应该仍将持续。我国法国史研究者的学术活跃度与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提升。他们还将在法国史的各个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和著作。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计划当中的六卷本《法国通史》（沈坚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已经面世。这部集中国法国史研究者学术造诣与风貌于一体的巨作，势必会让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迎来新的高峰。相关史料的编译引介工作还会进一步推进：中世纪早期法国相关历史文献出版工作还会持续；《法国政府南海档案》的翻译出版指日可待；《法国外交档案选编》（姚百慧编）将陆续面世；法兰西思想史经典史料的译介不会中断；大量法国史学经典的译介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这些可以预期的重要成果必定能为未来几年中国学者法国史研究奠定基本的格调。当然，本文所尝试概括的研究领域太过多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补充、指正。

（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

20世纪菲律宾民族史学书写： 基于菲律宾史学组织的考察

| 尹蒙蒙 |

摘 要：作为从反抗殖民统治中产生的民族史学，菲律宾史学界围绕着菲律宾民族历史的起源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并尝试书写一部“自我”的历史。在书写“自我”历史的过程中，传播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菲律宾史学的应有之义。在菲律宾社会建设和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中，菲律宾政府和史学家们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建立起一系列史学组织和研究机构，它们一方面践行着菲律宾历史发掘和传承的专业职能；另一方面履行着将历史融入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职责，肩负菲律宾民族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潮流的强烈使命。纵观菲律宾史学发展历程，菲律宾史学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从另一种视角呈现出菲律宾民族史学书写模式的演进：以否定“他者”历史书写到提倡“自我”历史为开端，从发掘本土历史促进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到大力发展地方史研究，积极与世界史学进行交流，形成菲律宾民族史学的独特性，并尝试在世界史学中寻求菲律宾民族史学的自觉定位。

关键词：菲律宾民族史学 史学组织 菲律宾国家档案馆 地方史 史学书写

作为一个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国，菲律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少以“统一国家”的样式展现于世界。及至近代，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兴起及其对外殖民活动的进行，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并受其殖民统治长达300多年。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菲律宾社会发展缓慢，起义反抗不断，但由于缺乏先进领导阶级和科学指导思想，多次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直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菲律宾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及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菲律宾对西班牙的反抗不断进入高潮并最终于

19世纪末取得成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成功并非意味着菲律宾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菲律宾继而又沦落为美国殖民地。从1899年菲美战争爆发到1946年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¹，美国对菲律宾殖民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受20世纪以来世界发展的影响，美统之下的菲律宾社会取得了一定进步，菲律宾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愿也更为强烈。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菲律宾自身历史的书写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纵观菲律宾历史的演变历程，菲律宾的“自我”历史书写诞生于近代反抗殖民统治的潮流之中²，这不仅是对“他者书写”的否定和批判，更是对自我解放的追求和坚守。

从菲律宾民族建构和认同来看，菲律宾民族史学的产生无疑对菲律宾民族认知和国家身份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其社会团结注入了内在动力。就菲律宾史学内部而言，其史学发展的专业化对菲律宾史学组织³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专业学者将史学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一系列史学组织的建立；另一方面则将不同的史学组织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响应政府发展的需要，使得菲律宾史学更具“实用性”。当然，一系列史学组织在促进菲律宾史学发展和政府相关政策传播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菲律宾史学组织在其民族史学发展和国家社会建设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本文将菲律宾史学组织置于

1 1942—1945年期间，菲律宾在日军侵略之下沦陷，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近3年。

2 关于菲律宾历史的产生以及史学源头的问题，菲律宾学界争论不断：奥拉西奥·科斯塔（Horacio de la Costa）、约翰·舒马赫（John Schumacher）等史学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对菲律宾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角度出发，把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菲律宾史学发展作为菲律宾史学脉络的组成部分；特奥多罗·阿贡西洛（Teodoro A. Agoncillo）教授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在1872年（1872年菲律宾甲米地发生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起义，因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这在菲律宾知识分子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之前菲律宾人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这遭致了不少史学者的批判。可参见Nicolas Zafra, “On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6, No. 4, 1958, pp. 454–460; C. R. Boxer, “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hilippines”, in D. G. E. Hall, ed., *Historians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00。

3 梅丽·麦克莱恩（Mairi Maclean）、查尔斯·沙尔韦（Charles Harvey）和斯图尔特·克莱格（Stewart R. Clegg）等学者将组织历史和历史组织进行区分研究，认为历史组织研究（Historical Organization Studies）是广泛利用历史数据、方法和知识的组织研究，并指出这历史组织研究离不开其社会历史背景。可见，历史组织具有历史研究的相关专业性，其特征也与所处历史背景具有密切关联。可参见Mairi Maclean, Charles Harvey, Stewart R. Clegg, “Conceptualizing Historical Organization Stud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41, No. 4, 2016, pp. 609–632。

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¹，从整体上探讨菲律宾史学组织与其史学发展的关系，进而从史学组织视角勾勒出菲律宾民族史学书写模式的演变历程，以期为菲律宾民族史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菲律宾民族主义与民族史学的萌芽与产生（1946年前）

在被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300多年的历史中，菲律宾社会发展缓慢，菲律宾的历史书写作为“他者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其历史记录主要由西班牙统治者来完成。²因而，围绕着否定“他者”与建立“自我”历史的斗争成为早期菲律宾民族史学的核心内容。当然，菲律宾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密不可分，更与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紧密相连。可以说，菲律宾民族史学的发展就是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具体表现，其演进历程也形成了以菲律宾“民族主义”发展为主线的整体脉络。

对近代菲律宾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回顾，离不开当时的核心人物，即后来的“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Jose Rizal）。黎刹既是近代菲律

1 学界针对菲律宾史学组织的探讨以埃马纽埃尔·卡莱罗（Emmanuel Franco Calairo）和马丁·佩雷斯（Martin Julius V. Perez）最具代表性。两者都是在菲律宾地方史学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尝试对菲律宾地方研究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进行探讨。卡莱罗认为，菲律宾地方研究机构对菲律宾历史记录的收集、菲律宾民族身份认同、菲律宾局部和全部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兼具教育功能，是联系地方和中央、民间和政府的重要纽带。佩雷斯认为，菲律宾地方研究中心兼具地方资料收集、图书馆、博物馆、书籍出版等功能，对菲律宾的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参见Emmanuel Franco Calairo,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Local Studies Center: the Case of Cavite Studies Center of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smariñas”, 2007, http://rizal.lib.admu.edu.ph/2007conf/papers/calairo_paper.pdf,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7日；Martin Julius V. Perez, Mariel R. Templanza, “Local Studies Centers: Transforming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the Philippines”, *IFLA Journal*, Vol. 38, No. 4, 2012, pp. 297–309。

2 关于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史料集大成著作，可以参见《菲律宾群岛（1493—1898）》，跨度400余年，凡55卷，是一部大型菲律宾历史资料集，其中辑录了西班牙发现和征服菲律宾的历史，包括早期航海家、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对菲律宾地理风貌、民俗风情、社会治理等的描述，涉及西班牙殖民当局官僚行政体系、法律体系、教会体系和贸易体制，以及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菲律宾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状况，是研究西班牙殖民史、菲律宾历史的珍贵史料。很显然，该史料集主要是从“他者”视角来审视菲律宾历史。可参见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s. I–LV, Cleveland: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03–1909。

宾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代表，也是菲律宾民族主义意识的灵魂和集中体现。黎刹于1861年出生于菲律宾内湖省，早年曾前往欧洲留学，著有《不许犯我》《贪婪的统治》《起义者》宣传民族主义¹，回国后积极参与反西班牙的革命活动。在政治上，黎刹以其“改革”理念和革命行动拉开了菲律宾革命的大幕，认为“整个菲律宾民族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²，是“自成一体的一个社会”³。在史学领域，黎刹提出“自我”历史，否定西班牙“他者”历史书写模式的做法。⁴与黎刹同时代的曼努埃尔·阿蒂加斯（Manuel Artigas）、何塞·苏卢埃塔（Jose Clemente Zulueta）、埃皮法尼奥·桑托斯（Epifanio de los Santos）三位兼职历史学家，也高举“菲律宾自我”的大旗，尝试以史学来唤醒菲律宾民族的民族意识。⁵作为兼职史学者，他们生活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深受西班牙殖民政策的影响，但作为菲律宾史学的提倡者，他们所高举的“自我”大旗，成为菲律宾民族史学的萌芽，也因此拉开了否定“他者”史学书写的序幕。

进入1896年后，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拉开了菲律宾胜利的大幕。因而这也赋予1896年菲律宾革命不同的历史含义，以至于在菲律宾历史的书写中，1896年革命成为菲律宾史书书写的重中之重，后来菲律宾史学界将之视为菲律宾社会团结的典范并不断加以塑造。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菲律宾成为美国针对西班牙的另一个重要战场，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率领美国太平洋舰队迅速向西班牙舰队出击，并顺利取得海战的胜利，然后利用菲律宾起义军的力量共同抗击西班牙军事力量，最终占领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94—295页。

2 John N. Schumacher, S. J., “Rizal and Filipino Nationalism: A New Approach”,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8, No. 4, 2000, p. 550.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296页。

4 这种史学理念是黎刹对东西方文明发展冲突进行“比较”的结果，然而其革命行为和反对暴力革命的理念却阻碍了菲律宾革命史学的发展，并遭致了后来学者的批判。可参见Teodoro A. Agoncillo, *Professorial Chair Lecture*, Manil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74, p. 11, in Floro Quibuyen, “Towards a Radical Rizal”,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6, No. 2, 1998, p. 152.

5 参见John N. Schumacher, “Wenceslao E. Retana: An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0, No. 4, 1962, pp. 550–576; Floro Quibuyen, “Towards A Radical Rizal”,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6, No. 2, 1998, pp. 151–183; Ambeth R. Ocampo, “Who Was Epifanio de los Santo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Jun. 29, 2018.

马尼拉。¹面对着国内犹豫不决的困扰以及帝国列强对菲律宾的觊觎，麦金莱总统在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以“上帝的名义”²占领菲律宾群岛。1898年12月10日，美西双方在巴黎签订条约，即《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通过该条约，美国以2000万美元为代价获得菲律宾群岛的主权。而后经过菲美战争(1899—1902)，美国顺利将菲律宾变为其殖民地。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从1898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开始至1946年菲律宾获得独立结束，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在美统治期间，美国实行“新殖民主义”，强化对菲律宾的“美式教育”，尝试将之打造成宣传美国的附属和工具。因而，美国的殖民政策与西班牙大不一样。在政治上，美国以“美式民主”为重要工具，尝试将美国民主移植到菲律宾，将之打造成宣传美国的“民主的橱窗”，并以允许菲律宾“自治”的承诺促进菲律宾人积极参与其殖民统治之中；在经济上，美国也一改西班牙的粗暴掠夺方式，以所谓“经济殖民主义”的方式，对菲律宾经济进行投入，以使其支撑政治上的“美式民主”；在文化教育上，美国殖民当局大力普及英语教育，企图以“美式文化”来影响菲律宾发展。

在历史记载和书写方面，受美国殖民政策的影响，菲律宾史学家在研究其民族精神时仍更多地停留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层面，对美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在史学领域中并未成为主流。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殖民政府十分重视菲律宾的英语普及和文化教育的提升，这为菲律宾历史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气息和氛围。该时期不少菲律宾历史学术机构也纷纷成立，使得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史学教育、研究和宣传呈现出一种活跃状态。1933年，时任菲律宾殖民政府总督的威廉·墨菲(William Francis Murphy)颁布第451号共和国法案(Public Act No. 451)，设立菲律宾历史研究和标记委员会(Philippin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Markers Committee, PHRMC)，识别并标记马尼拉的“历史文物”，以显示对菲律宾历史文化的重视。委员会对诸如

1 菲律宾革命代表阿吉纳尔多后来声称，杜威曾向其许诺，美国是帮助菲律宾争取独立的，但是后来杜威却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与之合作的菲律宾爱国人士却以为自己是为政治自由而战的”。可参见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5—196页；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姚楠、马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89页。

2 麦金莱总统曾为自己下决心占领菲律宾的行为辩解，并声称得到“上帝的启示”，可参见杨生茂、冯承柏、李元良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第258—259页。

圣奥古斯丁教堂等年代久远的教堂、建筑、高校进行“标记”，作为官方的“文化遗迹”。第一届委员会由美国人沃尔特·罗布（Walter Robb）任主席，并由美国人类学者H. 贝耶（H. Otley Beyer）、西班牙耶稣会神父米格尔·塞尔加（Miguel Selga）、菲律宾工程学院主任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前菲律宾常驻专员杰梅·维拉（Jaime C. de Veyra）等担任委员。鉴于历史学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并未有历史学家参与委员会工作。1937年，在菲律宾联邦政府的推动下，菲律宾历史研究和标记委员会被菲律宾历史委员会（Philippine Historical Committee, PHC）取代。新机构不仅取代了原有部门职能，同时还肩负起修复国家文物和收购私人文物的任务。¹后来随着日本的侵略，菲律宾历史委员会被迫处于关闭状态。

除此之外，菲律宾民间也诞生了自己的历史学术组织。菲律宾历史学会（Philippine Historical Society）作为该时期菲律宾最早的民间学术组织，由20世纪20年代的菲律宾女子大学历史俱乐部发展而来，当时主办发行《历史评论》（*Historical Review*）季刊，专注于历史学术训练。1941年，历史俱乐部转变为菲律宾历史学会，成员包括格尼古拉斯·萨弗拉（Nicolas Zafra）、格雷戈里奥·泽德（Gregorio Zaide）等在内的一大批当时菲律宾“名人”知识分子。该学会旨在鼓励和开展对菲律宾历史的研究，促进全社会对历史的兴趣，并力图将历史作为菲律宾民族认同的基石。菲律宾历史学会不仅活跃了史学界死气沉沉的局面，还为菲律宾未来历史研究培育了大量人才，为菲律宾独立后的史学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此外，学会还大力宣传菲律宾历史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自豪感，对凝聚菲律宾社会民族意识，促进民族独立起到了一定作用。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5），随着战时美军的撤离以及菲律宾的陷落，菲律宾各种机构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该期间的菲律宾史学组织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给菲律宾造成了物质上的破坏，还一度使得菲律宾历史书写陷入“黑暗”时期。及至战争结束，美国于1946年承认菲律宾政治独立，菲律宾的社会进入重建阶段，其史学发展和史学组织建设也进入一个大力发展的新阶段。

1 Executive Order No. 91, Jan. 23, 1937.

二、菲律宾史学组织与民族史学的发展（1946—1970）

随着菲律宾国家重建的开展，为了进一步促进菲律宾社会团结和民族构建，菲律宾政府十分重视史学组织在构建民族身份和实现民族凝聚目标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菲律宾政府除对独立前的一系列历史相关机构进行合并和重设外，还陆陆续续设立了许多其他历史组织。这些历史机构进一步凸显了政府意志，也凝聚了菲律宾史学界力量，促进了菲律宾独立后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历史与菲律宾民族身份认同”成为菲律宾历史书写的一个中心话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菲律宾政府更是将史学作为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根源，试图从历史中为其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寻求合法依据和动力。1963年，菲律宾政府为纪念19世纪后期的菲律宾历史英雄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把独立前的一系列官方历史机构合而为一，并命名为民族英雄委员会（National Heroes Commission）。民族英雄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对所塑造的民族英雄的周年纪念活动、编撰其传记，通过设立节假日等方式对其进行纪念以及翻译、宣传其作品等，以期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更好地凝聚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意识。¹

为进一步展现该时期菲律宾史学组织在菲律宾历史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笔者就一些重要机构分别进行介绍：

（一）历史研究所（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历史研究所作为菲律宾重要的史学组织，是史学组织在促进国家民族身份构建中所起作用的典型代表。历史研究所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可谓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和社会变化的见证者。早在美统时期，菲律宾人民为争取自治而不断彰显“自我”历史。1933年10月23日，菲律宾当局通过第451号共和国法案，创建菲律宾历史研究和标记委员会，其宗旨是标记马尼拉乃至整个群岛的历史文物，以显示菲律宾的独立性。菲律宾历史研究和标记委员会通过对马尼拉及其周边能够体现菲

1 Executive Order No. 28, Dec. 27, 1962.

律宾历史文化的文物的标记，一方面促进了菲律宾历史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激发了菲律宾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对菲律宾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进入1935年后，在菲律宾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殖民当局准许菲律宾开始自治。为了进一步凸显菲律宾的民族特性以更好地自治，菲律宾自治政府于1937年1月23日通过第91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 91），以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取代菲律宾历史研究和标记委员会。菲律宾历史委员会经历了菲律宾的沦陷以及菲律宾独立，并在独立初期在凸显菲律宾的历史文化独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菲律宾国家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身份的建构，菲律宾民族主义逐渐增强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官方民族主义，菲律宾政府对黎刹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转移，以期适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发展。¹1954年8月10日，菲律宾政府通过第52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 52），设立黎刹国家百年纪念委员会（Jose Rizal National Centennial Commission）与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共同承担文化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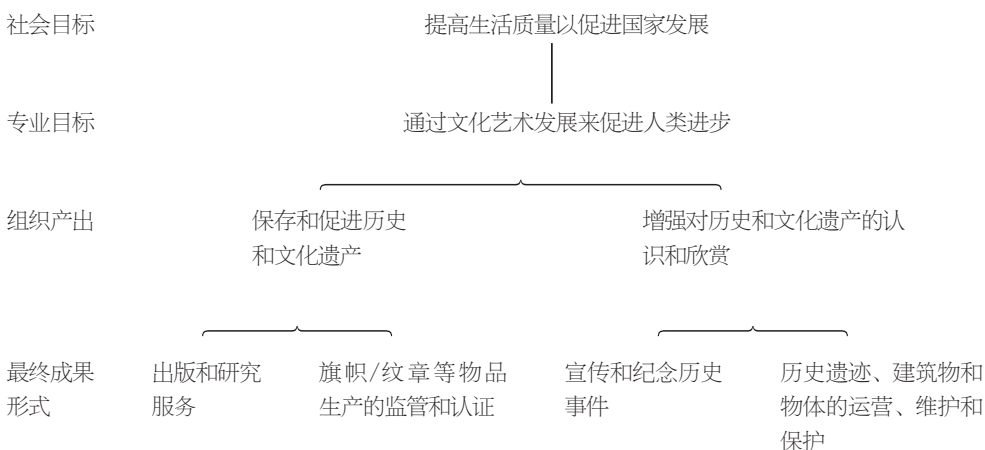
1963年10月3日，菲律宾政府通过第28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 28），创立民族英雄委员会取代黎刹国家百年纪念委员会。1965年6月19日，政府通过第4368号共和国法案（Republic Act No. 4368），设立国家历史委员会（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取代民族英雄委员会，并让该机构隶属于教育、文化和体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s, DECS）。1972年9月24日，在颁布军管法后，马科斯政府重组国家历史委员会，将之重组为国家历史研究所。这是马科斯政府在擘画菲律宾历史叙事的同时，在史学组织方面所做的调整。此举主要目的是马科斯政府为了进一步从历史叙事中为其军管法的实施以及其独裁的建立提供合法性。

从具体活动来看，国家历史研究所承担菲律宾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出版，以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教育活动；保障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实体的修复、保存和保护；负责实施菲律宾国家历史法案（第260号总统法令〔Presidential Decree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第326—327页。

No. 260〕¹和第1505号总统法令〔Presidential Decree No. 1505〕²);管理历史遗迹、建筑和民族英雄纪念品;以及实施第8491号共和国法案或《菲律宾国旗和纹章法典》。此外,国家历史研究所作为国家机构,还肩负着促进菲律宾社会发展的文化和精神宣传的重大责任,其社会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以促进国家发展”。在这个最高的社会目标之下,国家历史研究所才具体实施“通过文化艺术发展来促进人类进步”的专业目标,其社会功能与专业目标如下表所示。³可见,在菲律宾重建时期,国家历史研究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和责任远高于其专业职能,这也体现了菲律宾政府对历史研究在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作用的重视。

表 国家历史研究所的目标和专业活动流程



- 1 1973年8月1日, 马科斯总统根据宪法第15款第9条第2段关于“菲律宾文化应得到保护和发展以实现民族认同”的规定, 签署了对马尼拉圣安娜遗址博物馆(Santa Ana Site Museum)等一批历史遗迹给予认可和保护的法令。可参见Presidential Decree No. 260, Aug. 1, 1973, https://lawphil.net/statutes/presdecs/pd1973/pd_260_1973.html, 访问日期: 2023年11月9日。
- 2 第1505号总统法令是1978年马科斯总统颁布的对第260号总统法令的修改, 进一步推进对菲律宾文物古迹等方面的保护。可参见Presidential Decree No. 1505, Jun. 11, 1978, https://lawphil.net/statutes/presdecs/pd1978/pd_1505_1978.html, 访问日期: 2023年11月9日。
- 3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https://www.dbm.gov.ph/wp-content/uploads/OPCCB/opif2009/2009%20OEOs%20Opif1st/historical.pdf>, 访问日期: 2022年11月18日。

（二）菲律宾历史协会（Philippin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与历史研究所不同，成立于1955年的菲律宾历史协会作为非营利性专业机构，无论是在促进史学专业发展、专业人才培养、执行政府政策，还是在促进菲律宾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体现了菲律宾社会发展民间“声音”由下而上的一种途径，其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影响更为凸显。

1955年9月18日，以恩卡纳西翁·阿尔佐纳（Encarnacion Alzona）、加布里埃尔·法贝拉（Gabriel Fabella）、格雷戈里奥·泽德、尼古拉斯·萨弗拉、塞莱多尼奥·雷苏雷西（Celedonio Resurreccion）、特奥多罗·阿贡西洛和埃斯特班·奥坎波（Esteban de Ocampo）等著名历史学家组成的史学小组，在马尼拉勒班陀（Lepanto）街的卡邦科餐厅（Carbungco Restaurant）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专业史学组织菲律宾历史协会。¹ 菲律宾历史协会的宗旨主要是促进历史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收集和保存与菲律宾有关的文物、手稿、文件等，开展任何其他促进协会宗旨的活动。菲律宾历史协会以《菲律宾历史协会公报》（*Buletin ng Kapisanang Pangkasaysayan ng Pilipinas*）² 作为推动菲律宾历史文化研究的平台，并举办以处理国家关注的实时或相关问题的学术年度研讨会，尝试从历史视角来寻求答案以解决现阶段国家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同时，菲律宾历史协会还与政府建立了紧密关系，菲律宾多位总统成为该组织的名誉主席。作为一种半政府性质的组织，菲律宾历史协会俨然成为菲律宾政府声音的民间史学代表。

1955年菲律宾历史协会成立后，由著名史学家法贝拉担任首届会长（1955—1957、1959）。法贝拉作为协会的创建者和首届会长，积极推动协会发展，使协会逐渐成为在菲律宾史学界和社会中都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性组织。至20世纪末，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协会先后经历了由萨弗拉（1958、1962）、埃斯特班·奥坎波

1 Proclamation No. 498, Declaring the Period from November 24 to 30, 1965, As History Week and Designating the Philippin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Children to Jointly Take Charge of the Observance Thereof, Nov. 20, 1965.

2 《菲律宾历史协会公报》1957年首期发行，并于两年后改名为《历史公报》（*Historical Bulletin*），作为纪念菲律宾历史英雄和政治家、讲述菲律宾历史大事件以及其他涉及菲律宾历史主题的专刊。

(1960、1963—1964、1969—1970)、达尔马西奥·马丁(Dalmacio Martin, 1961)¹、泽德(1965—1966、1971)、塞莱多尼奥·安凯塔(Celedonio A. Ancheta, 1967)、西斯托·奥罗萨(Sixto Y. Orosa, 1968)、格洛里亚·桑托斯(Gloria M. Santos, 1972)、雷苏雷西(1973—1974)、迪奥斯达多·卡皮诺(Diosdado G. Capino, 1975—1976)、米内尔娃·冈萨雷斯(Ma. Minerva A. Gonzalez, 1977—1978)、博尼法西奥·萨拉曼卡(Bonifacio S. Salamanca, 1979—1980)、罗密欧·克鲁斯(Romeo V. Cruz, 1982—1983)、罗萨里奥·科尔特斯(Rosario M. Cortes, 1984—1985)、奥斯卡·德万杰利斯塔(Oscar L. Evangelista, 1986—1987)、拿破仑·卡萨马布(Napoleon J. Casambre, 1988—1989)、西泽·波夫雷(Cesar Pobre, 1990、1991—1992)、米拉格罗斯·格雷罗(Milagros Guerrero, 1993)、埃皮塔西奥·帕利斯皮斯(Epitacio Palispis, 1994—1995)、奥斯卡·埃万热利斯塔(Oscar L. Evangelista, 1996—1997)、巴勃罗·特里利纳三世(Pablo Trillana III, 1998—1999)、朗伯斯·奥坎波(Ambeth Ocampo, 2000)等22位著名历史学者担任会长。这些学者不仅仅在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担任协会会长一职,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菲律宾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菲律宾社会的变化,为进一步促进菲律宾民族史学、历史文化教育的发展,菲律宾历史协会董事会还创建了菲律宾历史基金会(Philippine Historical Foundation),对学术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历史成果出版、相关历史研究项目的制定和开展进行大力支持。基金会设立由11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成员基本上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密切。尽管菲律宾历史基金会与菲律宾历史协会一样都作为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但是其领导机构成员的官方背景进一步促进了其资助行为的“官方化”,对菲律宾政府社会文化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此外,菲律宾历史协会还积极以史学学术活动的方式推动菲律宾社会民族认同发展,强化历史研究在菲律宾社会文化和精神建设中的作用。1957年,加西亚总统指定该协会牵头举办庆祝菲律宾议会成立50周年活动,促进菲律宾社会对菲律宾历史的认知;1960年,该协会在马尼拉第一次组织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

1 其间由里卡多·阿西利亚(Ricardo A. Arcilla)代理会长。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ans of Asia, IAHA), 提升菲律宾历史研究在东南亚史学界的影响力; 1962年推动法律通过菲律宾国家独立日为6月12日, 进一步弘扬民族主义; 1988年发起庆祝菲律宾革命一百周年运动, 即通过研讨会、出版物等一系列活动开展主题为“民族主义和独立百年”(Decade of Centennials of Nationalism and Independence) 的纪念活动; 同时, 该协会每年都以固定主题开展一次历史学术会议, 强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期望从历史中寻求解决菲律宾现实问题的方法。

(三) 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

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作为菲律宾政府促进菲律宾史学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官方代表, 负责推动、协调和监督菲律宾历史研究和历史遗产保护工作, 并致力于编纂和出版历史文献, 管理历史文物和纪念碑, 开展历史教育和意识形态的推广。

1965年7月, 为进一步增强史学组织机构在菲律宾社会民族身份构建中的作用, 菲律宾国会通过了菲律宾第4368号共和国法案, 创建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 同时废除菲律宾历史委员会和民族英雄委员会, 将其职能归于国家历史委员会。作为菲律宾政府机构, 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研究、传播、保护、管理历史遗址和遗迹来推广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并通过出版菲律宾民族英雄的作品等在内的多种实际行动加强菲律宾民族历史教育。¹ 1972年,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颁布军管法, 重组政府部门, 将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命名为国家历史研究所, 仍延续其职能。2010年5月12日, 时任菲律宾总统的格洛丽亚·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 签署菲律宾第10086号共和国法案, 依法将国家历史研究所恢复为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² 当前的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继承之前机构的所有职能, 尤其是在保护历史遗迹和建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作为菲律宾政府专门支持的历史机构, 通过灌输对菲律宾历史英雄及杰出菲律宾人的崇高

1 Republic Act No. 4368, An Act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to Define its Powers and Functions, Authoriz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Fund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Jun. 19, 1965.

2 Republic Act No. 10086, An Act Strengthening Peoples' Nationalism Through Philippine History By Changing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Into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of The Philippines, Strengthening Its Powers And Function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May 12, 2010.

事迹和理想的认识，有利于增强菲律宾人民的自豪感，对菲律宾官方史学民族精神的增强和强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其他史学组织

为进一步发挥史学组织的作用，“二战”时期被迫关闭的菲律宾历史学会于1965年正式更名为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并于同年批准《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History*）为其官方刊物的新名称。在成立后的十多年中，学会始终把挖掘研究菲律宾历史人物、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并积极促进菲律宾民族历史的传播和普及。1976年后，随着菲律宾史学研究整体性转向的出现，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在关注主题方面，开始转向菲律宾国家地方史的研究¹，通过积极主办相关年会、征集相关论文等方式，推动了菲律宾地方文化和历史的发掘，极大丰富了菲律宾地方文化。

此外，在菲律宾史学界比较著名的组织还有菲律宾社会科学理事会（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PSSC）。菲律宾社会科学理事会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组织，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为学者提供学术资源和支持，推动社会科学在菲律宾的发展。菲律宾社会科学理事会作为菲律宾“最重要且唯一”的社会科学专业学术机构，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倡导“好的”社会研究。在其成立初期，该机构就编制了一套参考材料来帮助其学生从事社会实践和丰富其研究。成立多年以来，菲律宾社会科学理事会指导并影响了一批菲律宾社会学家的成长和发展。²尽管该机构主要立足于社会实践、调查和研究，但是随着菲律宾学者对菲律宾地方社会探索的深入，理事会保留了大量的资料，为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总之，在菲律宾社会重建时期，菲律宾史学组织作为历史学专业组织，一方面

1 这种转向是在当时担任学会主席的历史学者小马塞利诺·福龙达（Marcelino A. Foronda, Jr.）带领下实现的。可参见Marcelino A. Foronda, Jr., “Regional Culture As Part of Philippine National Culture”, *Transaction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XV, 1993, pp. 55-62。

2 Clarence M. Batan, “Review: Rekindling the Cultur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6, 2018, p. 109.

为菲律宾史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学界内部交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其社会功能，并认真履行其社会职责，积极推动宣传和普及菲律宾政府政策，为菲律宾民族认同提供历史依据和智力支持。

三、地方史兴起：菲律宾史学组织与史学转向（1970年后）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菲律宾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马科斯政府统治的强化，政府主导的官方史学兴起，马科斯政府尝试打造出一种新的菲律宾叙事模式，从历史角度为其独裁统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受菲律宾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学术转向的变化，菲律宾史学界的地方史研究兴起。菲律宾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菲律宾国内马科斯独裁统治的回应，更是菲律宾史学书写模式在特殊环境下的转向和蜕变。

就官方史学而言，马科斯政府为从历史中寻求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历史书写体系，一方面用以增强菲律宾人民的自豪感，另一方面显示菲律宾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特性。为此，马科斯政府制定了一项名为“命定计划”（Tadhana [Destiny] Project）的菲律宾通史编撰工程，并组织大量史学工作者参与。该工程计划撰写一部21卷的菲律宾史，力图涵盖从最早的地质时代到1970年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范围内“真正的菲律宾民族”，在精神上体现“真正的菲律宾人”。该项修史工程雄心勃勃，并于1973—1974年在一片争议中启动。¹然而，该工程并未吸引菲律宾史学界的兴趣，反而遭致众多史学家的反对。

为了对马科斯政府的史学工程做出回应，菲律宾史学界以“自觉的”意识纷纷开始从事地方史研究，而且史学家在研究转向的过程，不仅对地方历史进行深入探讨，还对地方文化、资料建设等一系列领域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得菲律宾地方研究呈现出其独有特征。

就民间史学发展而言，进入20世纪70年代，地方历史研究是菲律宾历史研究中

¹ 可参见 Berber Bevernage and Nico Wouters,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237。

的一大热点。该热点的兴起源于对文化保护、学术研究和以次国家社区（地理或种族）为重点的宣传的必要性的认识，这种地方史研究的意识，源于1972年军管法颁布前后菲律宾社会不断膨胀的民族主义和“重新发现历史”的氛围。¹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菲律宾社会经济史专家约翰·拉尔金（John A. Larkin）就指出，菲律宾历史书写的主要问题之一源于对菲律宾农村历史状况的了解不足。因而，为解决这一困境并更好地了解菲律宾的历史力量，有必要研究更多的地区历史，这些历史从整体上来看将揭示菲律宾社会的统一性和多样性。²

菲律宾地方史兴起主要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全国地方史会议的召开和举办，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史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菲律宾全国地方史研究年度大会的相继召开，既是对马科斯军管法影响下菲律宾史学研究进入“死胡同”的回应，也是地方史研究推向全国的重要表现。全国地方史研究年度大会的举办，一方面为地方史研究在全国的推广营造了氛围，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史深入研究指出了方向。1978年，在多个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努力下，全国地方史研究年度大会在棉兰老岛的卡加延-德奥罗（Cagayan de Oro）召开，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地方史研究的序幕。在1983年第七届全国地方史研究年度大会召开时，以小马塞利诺·福龙达（曾作为卡加延-德奥罗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为主席的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接过了推动地方史发展的大旗。直至今日，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还在继续举办该会议，其杂志《历史杂志》也对地方和区域研究给予强烈重视。³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作为全国性的历史专业组织，在菲律宾历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对地方史研究的重视显示了该学会研究方向的转移和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菲律宾地方史研究成为菲律宾史学发展的主流。

其次，众多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极大推动了菲律宾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进展。宿务省圣卡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 Carlos）的雷西尔·莫杰雷斯（Resil B. Mojares）教授认为，菲律宾地方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有着“民俗学之

1 Resil B. Mojares, "Revisiting Local Histories",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 Society*, Vol. 25, No. 3/4, 1997, p. 225.

2 John A. Larkin, "The Place of Local History i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8, Iss. 2, 1967, p. 306.

3 Resil B. Mojares, "Revisiting Local Histories", p. 225.

父”“劳工运动之父”“菲律宾社会主义之父”之称的民族主义作家伊莎贝洛·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出生于1864年的雷耶斯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活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期的著名的菲律宾爱国者、政治家、作家、记者和劳工活动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耶斯就出版了关于伊罗戈斯（Ilocos）和米沙鄢（Visayas）两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著作，拉开了菲律宾地方史研究的序幕。菲律宾独立后，地方一级政府部门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包括城镇或教区传统节日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并由此“制造”了大量村庄、市和省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制定了一个项目，通过公立学校收集地方史、民间传说和传统，推出了一部大型报告资料，称之为“历史数据文件”（Historical Data Papers）。¹

1972年军管法颁布之后，菲律宾史学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民族史学与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对地方文化的保护和研究被愈加重视，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宣传也被赋予新的使命，这成为“一种由民族主义自省和‘重新发现’精神所滋养的意识”²。伴随着这种重视地方历史文化意识的出现，研究地方文化、历史的各种史学文化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快速发展起来。诸如霍洛（Jolo）的苏禄文化协调研究中心（Coordinated Investigation of Sulu Cultures）、马拉维（Marawi）的丹萨兰研究中心（Dansalan Research Center）、塔克洛班（Tacloban）的莱特-萨马研究图书馆（Leyte-Samar Research Library）、卡加延-德奥罗的民俗博物馆和档案馆（Folklife Museum and Archives）、碧瑶（Baguio）的科迪勒拉斯岭研究中心（Cordillera Studies Center）以及宿务的宿务研究中心（Cebuano Studies Center）等众多地方文化研究机构³都是该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不仅对菲律宾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探讨，还进一步拓展了地方历史年限和范围，使得菲律宾民族史学的研究更为多样化。事实上，地方机构和部门在研究本地历史中具有先天优势，尤其是在开发本地特色文化历史资源中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城市起源及演变、地方政府政治、地方民俗文化以及地方历史人物等纷纷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1 Resil B. Mojares, “Revisiting Local Histories”, p. 226.

2 Resil B. Mojares, “Revisiting Local Histories”, p. 225.

3 Resil B. Mojares, “Revisiting Local Histories”, p. 225.

在众多的地方史研究组织中，1972年开始酝酿并于1975年建立的宿务研究中心作为宿务市圣卡洛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地方研究中心之母”（mother of all local studies centers）之称。¹宿务研究中心作为从事研究宿务文化各方面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通过对宿务历史、艺术等各领域研究，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历史和白话文学研究服务需求。其功能主要有：（1）作为一个专门图书馆，收藏与宿务地区及主要讲宿务语的地区（Cebuano-speaking areas）有关的原始资料；（2）作为一个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与宿务有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3）作为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机构，专门协助推广宿务文化和艺术。在行政管理上，宿务研究中心隶属于圣卡洛斯大学文理学院，并与大学图书馆和圣卡洛斯出版社建立了良好关系。²

作为率先建立起来的菲律宾地方历史与文化研究机构，宿务研究中心的成立极大推动了依托于地方高校的地方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如甲米地研究中心（Cavite Studies Center，依托于德拉萨大学达斯马里纳分校 [De La Salle University-Dasmariñas]）、布拉干研究中心（Bahay-saliksikan ng Bulacan，依托于布拉干州立大学 [Bulacan State University]）、Tarlagueño研究中心（Center for Tarlaqueño Studies，依托于太历国立大学 [Tarlac State University]）、科迪勒拉斯岭研究中心（依托于菲律宾大学碧瑶分校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Baguio]）、卡庞安胡安·内波穆塞诺研究中心（Juan D. Nepomuceno Center for Kapampangan Studies，依托于圣天使大学 [Holy Angel University]）等一大批地方研究中心纷纷成立。2008年，一种伞式网络/组织成立，并命名为“全国研究机构协会公司”（Kapisanan ng mga Bahaysaliksikan sa Bansa, Inc）。³这些机构的成立，一方面以当地大学为依托，很好地实现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教育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地方特色，极大地推动了菲律宾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以地方史研究推动了菲律宾全国历史文化研究，也进一步促进了菲律宾历史研究的转向。

1 Martin Julius V. Perez, Mariel R. Templanza, “Local Studies Centers: Transforming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the Philippines”, p. 7.

2 “About Cebuano Studies Center”, <https://www.cebuanostudiescenter.com/about-cebuano-studies-center-2/>,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7日。

3 Martin Julius V. Perez, Mariel R. Templanza, “Local Studies Centers: Transforming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the Philippines”, p. 7.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机构作用的凸显，菲律宾地方当局相继筹建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官方性质的省级研究中心（如丹萨兰研究中心、宿务研究中心、哥打巴托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tabato Cultures]、米沙鄢研究机构），菲律宾社会科学委员会（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PSSC）积极在比科尔（Bicol）、米沙鄢和棉兰老等地推进建立区域研究联盟，以促进区域研究的整合。国家经济发展局（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 NEDA）在宿务圣卡洛斯大学设立了中米沙鄢试点地区研究和培训中心（Area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ARTC），以强化对该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档案管理局（The Bureau of Records Management, BRM）在宿务建立一处地区档案馆（Regional Archives）作为推动菲律宾档案系统区域化的重要一步。尽管菲律宾中央和地方当局及相关部门在推动科研机构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科研机构的建设仍面临很大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进一步提升地方科研机构的功能，发挥其在菲律宾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莫杰雷斯教授就呼吁扩大地方研究机构权力和进行制度化建设，增强其规范地方资料管理的能力，以及区域和民间历史工作管理的能力，建立口述历史项目，推进当地历史研究与菲律宾语教学相结合，并推广和完善相关研究方法。此外，莫杰雷斯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研究机构分布不均，如研究规划和资助机构（research planning and funding agencies），知识建设、专业知识和培训项目（repositories, expertise and training programs）仍然过度集中在大马尼拉地区，以及省级机构和个人研究人员仍然面临着与决策机构相交流、接触信息来源困难等问题，存在研究机会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他呼吁进一步制度化。¹

尽管目前菲律宾地方史的研究和探讨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而且地方史研究机构也呈现出局部衰落的迹象，但不可否认，众多地方研究中心及各种机构的建立对地方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为菲律宾民族历史的书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丰富的地方史研究，不但为菲律宾民族历史的书写营造了其特色，还进一步展现了菲律宾民族史学在世界历史中的风格。

1 Resil B. Mojares, "Recent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An Evaluative Review",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 Society*, Vol. 9, No. 4, 1981, pp. 315-316.

地方史研究机构在菲律宾全国范围内的筹建和发挥作用，使得菲律宾史学研究呈现出其自身的“独特性”。事实上，这种“独特性”孕育于菲律宾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受影响于世界史学研究的变化，体现为地方史的勃兴发展。德拉萨大学达斯马里纳分校文学院院长埃马纽埃尔·卡莱罗指出，地方研究机构在菲律宾的历史阐述和研究、社会教育、国民身份构建和塑造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一，地方研究中心在收集当地材料方面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第二，专门研究机构，尤其是史学研究机构往往和大学联系密切，无疑提升了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能力；第三，地方研究中心在记录和促进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很多地方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政府深入基层的合作机构，在促进基层政府对菲律宾社会底层了解和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很多机构具有教育功能，这促使教育机构通过当地研究中心，可以有意义地参与教育公众了解国家身份细节的整个过程。此外，专业机构还对青年人的学习和研究起着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帮助青年人很好地从事研究，还是对其思想形成的塑造，都具有积极作用。总之，地方研究中心作为学术界、商业界、政府部门和社区的纽带，充分实现了记录菲律宾综合历史的国家目标。¹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学术机构，地方研究中心一方面充当了学术研究先锋，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为学者们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从国家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中心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起到了良好的政策宣传和普及作用，并很好地将国家政策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很好地发掘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1986年，随着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的成功，马科斯独裁政权被推翻。为了充分发挥文化传统在社会民主建设和政治民主建设中的功能，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总统于1987年1月30日签署第118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8），成立总统文化艺术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the Arts）以促进菲律宾文化发展。第118号行政命令明确规定，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受权制定和维护国家文化和艺术政策、支持和宣传方针，并且为了进一步加

1 Emmanuel Franco Calairo,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local studies center: the case of Cavite Studies Center of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smariñas", 2007, http://rizal.lib.admu.edu.ph/2007conf/papers/calairo_paper.pdf,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7日。

强对菲律宾社会文化艺术的管理，该委员会下辖14个相关专门委员会以分管文化遗产、艺术、文化宣传等工作。¹作为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后新设立的文化艺术机构，这一方面显示出菲律宾新政府对菲律宾文化艺术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阿基诺政府对文化艺术在恢复社会秩序等方面功能的充分利用。作为菲律宾文化遗产等领域专业机构，菲律宾地方博物馆、图书馆等与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家、地方性机构组织也受到专门委员会的管理。

随着菲律宾逐渐恢复民主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4月3日，菲律宾国会通过第7356号共和国法案（Republic Act No. 7356），成立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国家社会文化艺术等领域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的具体管理和实际工作，进一步强化了对史学组织的管理和协调，进一步增强对菲律宾文化中心、国家历史研究所（现为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国家博物馆、菲律宾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的管理。²

四、特殊史学组织：菲律宾国家档案馆和高校的史学组织功能

与史学组织等专业性组织不同，菲律宾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ilippines）和菲律宾高校作为菲律宾史学领域的一种特殊存在，不仅为菲律宾史学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保障和支持，还为菲律宾政府对外政策以及人才培养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菲律宾国家档案馆不仅具有收集、保存和管理菲律宾包括政府文书、历史文献、照片和影像资料等在内的档案文件和记录的功能，还进一步提供档案资源的公共访问，促进学者和研究人员对菲律宾历史的研究。其保存的历史档案不仅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基础，还承载着菲律宾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一定程度上是菲律宾历史发展演变的见证者。菲律宾国家档案馆作为菲律宾

1 Executive Order No. 118, January 30, 1987.

2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https://gpdnet.org/national-commission-for-culture-and-the-arts/>,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0日。

重要的政府机构，其主要肩负着收集、存储、保存和提供政府档案记录并使之成为公众所利用的任务。¹

菲律宾国家档案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些核心机构，初名为档案局（Division of Archives）。当时西班牙并没有建立一个类似国家档案馆的存储机构，各种殖民记录分散在各个机构中，主要是教区、宗教团体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管区中心，以及殖民政府的许多机构。²在美统时期，殖民当局为进一步保存、管理从西班牙手中接收的档案材料，于1901年7月将档案局改为档案办公室（Office of Archives），隶属于行政局（Executive Bureau）。10月份，又更名为公共教育部档案局（Bureau of Archives），隶属于公共教育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1915年又归属行政局，并对下属部门进行精简，仅作为一个专门的档案机构。1916年，菲律宾图书馆和博物馆合并了档案部门以及专利、版权和商标部门，并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档案馆作为其组成部门。1928年，档案馆成为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部。1935年，国家图书馆被移交给公共教育部后不久，受国民议会议长管辖。1947年，国家图书馆改制为教育部公共图书馆局，档案馆仍为其下属部门之一。1958年，加西亚（Carlos Garcia）总统签署第290号行政命令，成立档案管理局，隶属于总务部（Department of General Services）。档案管理局的职责包括规划、制定和协调政府范围内的计划、政策、规则和条例，以管理具有永久或历史价值的当前运营记录的使用、存储和处置。该部门由三个科室组成，即现存科、档案科和档案储存科。档案科负责储存和修复具有永久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记录。³受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档案管理局对外所进行的国际联系并不多，而且其相关人员的培训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经济委员会（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承担。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复印专家（reprography expert）

1 Republic Act No. 947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ilippines Act of 2007, May 21, 2007, https://lawphil.net/statutes/repacts/ra2007/ra_9470_2007.html, 访问日期：2023年12月22日。

2 Ricardo L. Punzalan, “Archives of the new possession: Spanish colonial records and the American creation of a ‘national’ archives for the Philippines”, *Arch Sci*, Vol. 6, No. 3-4, 2006, p. 385.

3 Executive Order No. 290, Mar. 14, 1958,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1958/03/14/executive-order-no-290-s-1958/>, 访问日期：2023年12月22日。

雷默纳健·查里（Ramunajan Chari），对其中三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关于通过移动缩微胶卷装置进行缩微胶卷和档案文件复制的培训。历史学家多明戈·阿贝拉（Domingo Abella）时任档案管理局的主任，并作为代表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东南亚分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chives and its Southeast Asian Branch, SARBICA）。1972年，档案管理局更名为档案管理处（Records Management and Archives Office, RMAO），隶属于总务处（General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on）。1987年，根据第285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 285），它被列为隶属于教育、文化和体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ports）的文化机构。1999年第8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 80）又将其移交于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管辖。直到1997年，国家才开始修复位于王城的政区大楼，使其成为国家档案馆所在地。2007年5月21日，阿罗约总统签署第9470号共和国法案（Republic Act No. 9470），确定了该机构的各种职能，并正式将其更名为菲律宾国家档案馆。¹

菲律宾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从16到19世纪）、美日统治时期（19世纪末至1946年）、独立后时期（1946年后）。其中，保存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档案最多，其主题包括西班牙君主的皇家法令，西班牙总督报告，菲律宾起义的相关文件，不同省份和普韦布洛人村庄（pueblos）的记录，具有皇家头衔的土地和地产文件，神职人员的牧函，有关教堂和修道院的文件，建筑物和房屋的地图和建筑平面图，出生、婚姻和死亡等民事记录等16至19世纪的约1300万份手稿含400个主题在内的总计约6000万份档案。在美日占领时期，主要涉及菲律宾国民警卫队记录、公务员名册、战争审判等方面的材料。独立后时期材料主要涉及公证文件（notarial documents）、登记册、公务员记录等文件。²

菲律宾国家档案馆在其国家建设时期，经过了一个从制度建设到内容管理不断完善的过程。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埃德加·维克伯格（Edgar B. Wickberg），曾于1952年对菲律宾国家档案馆进行了考察，

1 Republic Act No. 947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ilippines Act of 2007.

2 Teresita R. Ignacio, "Profil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ilippines" i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Jan. 1,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101114803/http://www.ncca.gov.ph/about-culture-and-arts/articles-on-c-n-a/article.php?igm=2&i=181>, 访问日期：2023年12月22日。

认为菲律宾对收藏档案并不感兴趣，而且当时菲律宾国家档案馆无论是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文件保存环境抑或是档案馆安全管理都十分不完善。后来，从1953年夏季开始，随着档案馆搬迁新址，档案保存的环境和馆藏资料管理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此外，档案馆的人员配置、对档案文件收集管理的兴趣也大大提高。¹随着菲律宾政府对档案资料等方面的重视，档案馆的人事管理制度、薪酬规定、办公环境和时间等各方面都有了制度保障。这些改进和变化，不仅显示了菲律宾政府对档案文件等原始材料的重视意识的强化，更是凸显了档案馆在社会建设、菲律宾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外，菲律宾大学机构在关于菲律宾历史及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国别来看，美国对菲律宾和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占据多数，但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相关经费的削减，涉及菲律宾的研究更多的是由菲律宾大学承担。马尼拉大都会的相关学术机构、地方大学及相关研究中心都存在很多相关学术研究项目和活动。诸如约翰·舒马赫、威廉·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福隆达等一大批著名历史学家，都活跃在大学或相关研究机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的加入，这些大学或机构的活动规模显著扩大且不断多样化。在学生发展方面，大学中的相关机构也通过一系列科研项目鼓励和促进相关学术活动的开展²，并逐渐成为菲律宾史学研究的主力军。

在后殖民时代，凸显民族特色、驱除殖民主义残余是菲律宾本土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尽管在美统时期建立，且被认为是美国在菲扩大统治的重要工具，菲律宾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然在反殖民意识中取得了斐然成绩。大学里的出版物、学生组织、教师工会等，在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中，自觉不自觉地抵御美国意识的干扰。³

随着菲律宾史学界对菲律宾政治、文化、历史的讨论日益深入，菲律宾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得以加强并呈现出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

1 Edgar B. Wickberg, "Spanish Records in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Archives",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5, No. 1, 1955, pp. 77-89.

2 Resil B. Mojares, "Recent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An Evaluative Review", p. 315.

3 Mga Patnugot, Bienvenido Lumera, Judy Taguiwalo, Roland Tolentino, Arnold Alamon, Ramon Guillermo, Eds., *Serve The People: Ang Kasaysayan Ng Radikal Na Kilusan Sa Universidad Ng Pilipinas*, Quezon City: Ibon Books, 2008, p. 6.

菲律宾外交政策开始发生“亚洲转向”，菲律宾史学界很快做出回应，主要侧重于菲律宾与亚洲国家关系研究，以期为国家决策提供学术服务，并形成了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Asian Center）“一枝独秀”的研究局面。1955年，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政府设立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作为研究和咨询菲律宾对外关系政策的中心。1968年，在第5334号共和国法案（Republic Act No. 5334）的推动下，亚洲研究所改为亚洲中心，其目标是在学习和研究领域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密切和更广泛的联系，通过对亚洲文化、历史、社会和愿望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构建菲律宾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认同。亚洲中心前负责人及菲日关系的专家约瑟法·萨尼尔（Josefa Saniel）在研究菲日关系时，把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盛行与国内的反日情绪相结合，把区域研究和菲律宾民族建设相结合¹，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把历史学科建设、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民族身份构建和菲日关系统一起来，以理论指导菲日现实关系的转变，对菲律宾政府的对日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帮助。此外，在发展对外关系的推动下，以菲律宾大学历史系为中心，形成了一批从事菲律宾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努力把菲律宾区域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加强了菲律宾对亚洲周边国家的认知和了解，推动了菲律宾的对外国际交流和国际认同。

当然，基于大学最根本的属性，菲律宾著名史学家雷纳托·康斯坦蒂诺（Renato Constantino）对大学教育寄予更多希望，认为它并非培育少数精英的场所，而是培养服务大众的意识、培养服务大众的人才的地方。²

五、史学组织在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整体而言，从西属菲律宾到美属菲律宾，菲律宾史学在艰辛中发展起来。由于菲律宾教育落后以及史学不受普遍欢迎的原因，从19世纪80年代到1946年菲律宾独

1 Janus Nolasco and Danae Pantano, “Area Studies in a Time of Nationalism: Dr. Josefa Saniel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1960s”,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sia*, Vol. 54, Iss.1-2, 2018, pp. 3-25.

2 Mga Patnugot, Bienvenido Lumbea, Judy Taguiwalo, Roland Tolentino, Arnold Alamon, Ramon Guillermo, Eds., *Serve The People: Ang Kasaysayan Ng Radikal Na Kilusan Sa Universidad Ng Pilipinas*, pp. 13-14.

立之前，菲律宾史学的早期发展受到诸多限制。¹受时代以及自身职业的限制，早期的菲律宾史学者们在对菲律宾本身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探讨菲律宾历史的“独特性”，呼吁并试图从菲律宾“自我”视角来书写菲律宾历史，并自觉承担起宣传民族主义、唤醒菲律宾民众民族意识的重任。独立后的菲律宾史学在新的环境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随着菲律宾政府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表象。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随着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上愈加独立自主，其史学也不断呈现出“自我独特性”，并逐渐尝试在世界历史中以其“独特性”谋求一席之地。在菲律宾国家社会发展形势影响下，菲律宾民族史学书写模式的变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与之相适应，菲律宾史学组织也呈现出愈加多样的特征，其活动也逐渐成为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动态的代表。此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菲律宾史学组织还在菲律宾国家和社会发展之中承担多种社会职责和功能。

第一，菲律宾史学组织作为由史学家组成的专业机构和组织，一方面为菲律宾史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大活跃了菲律宾史学活动并促进了菲律宾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菲律宾历史文化、档案记录等得到进一步开发。从菲律宾史学组织的专业功能来看，它们集收集、保存和保护历史文献、档案和文物于一身，并建立和维护各类数据库、图书室等资源，使研究者和公众能够访问重要的历史资源，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此外，它们还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甚至在不同学科机构中针对同一主题提供了史学的视角和观点。事实上，史学家们参与不止一个学术机构或平台，他们还加入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术机构或组织，从不同视角解读和研究菲律宾历史，从而促进菲律宾史学研究的进步。²此外，菲律宾史学组织在引导和促进菲律宾史学发展趋势和方向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菲律宾历史学家长期以来

1 Virginia A. Miralao, Joanne B. Agbisit, ed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Capacities,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2012, pp. 141–164.

2 如有不少历史学者加入菲律宾社会学学会，并积极参与相关学术活动，从历史视角解读菲律宾社会发展历程和动态，加强与社会学领域专家的交流，从而推动了菲律宾社会史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拓宽了菲律宾历史研究范围和领域。Belen Tan-Gatue Medina, “The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Society: The Early Decades”,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2014, pp. 179–212.

一直关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塑造菲律宾本土社会及其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最终为以土著为核心的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比较方法来探讨菲律宾人及其社区的独特特征。¹在20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历史研究著作，而且许多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当代人对菲律宾过去的了解。许多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得到探索，新的方法和观点得到尝试和检验，旧的话题得到了重新审视，使得一些常见史学结论被更详细、更深入地进行论证，或者被修正。²

第二，菲律宾史学组织在菲律宾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性特征。在菲律宾独立之初，菲律宾史学组织肩负专业属性和国家社会属性，是菲律宾政府支持的引导塑造和强化菲律宾社会民族认同的工具。经过菲律宾政府的干预，国家历史研究所成为菲律宾政府宣传和推广菲律宾官方史学的一个重要渠道。这种官方史学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时效性，是对黎刹时期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史学内涵的一种修订或改变，使原先早期的民族主义成为菲律宾政府所支持和认可的民族主义，更加有利于菲律宾民族特性的形成。这种官方史学也深受冷战氛围的影响，是菲律宾政府基于美菲“特殊关系”以及寻求“亚洲身份”的一种博弈和自我调整。从民族主义演变的历程来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中，菲律宾民族主义出现了自我否定和排斥；然而从横向来看，菲律宾在自我的否定和塑造中使得统治阶级更具合法性。

第三，菲律宾史学组织与政府关联密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菲律宾国内外政策的实施，成为菲律宾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制定和推广的一种有力工具。随着菲律宾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转型，菲律宾社会科学家群体及相关的机构组织，会根据菲律宾国家政府政策及社会形势变化而“无意或不情愿”地做出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回应来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³对内而言，菲律宾史学组织积极促进菲律宾社会

1 John A. Larkin, "Philippine History Reconsidered: 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 1982, p. 628.

2 Resil B. Mojares, "Recent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An Evaluative Review", p. 309.

3 Kenneth E. Bauzon, "Knowledge And Ideology in Philippine Society",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9, No. 3, 1991, p. 233.

团结和民族认同。在菲律宾重建时期，菲律宾历史学家积极塑造民族团结的历史和共同记忆，并指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1896年菲律宾革命并发挥重要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与美国学者的立场截然相反。¹从促进民族团结、培养民族认同意识、加强社会各阶层合作的视角来看，1896年菲律宾革命所产生的共同历史记忆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外而言，菲律宾史学组织在如何与外国进行交往的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菲律宾政府如何处理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有直接关系。历史学家兼教育官员奥诺弗雷·科尔普斯（Onofre Dizon Corpuz）呼吁，菲律宾历史学者有责任在研究中秉承客观的标准，通过自我民族书写来构建菲律宾对外交流的桥梁。²

第四，菲律宾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不断重塑和书写，向菲律宾公众和国际社会展现出一种菲律宾人的“自我”历史书写，对“他者”历史书写的否定，为菲律宾民族身份构建和认同提供了历史基础和智力支持。菲律宾史学组织通过对菲律宾历史的重新解读和推广，一方面提升了公众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则促进公众对“菲律宾”这一民族和国家的不断深入认知。共同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有助于强化多民族意识对同一主题的认知和践行。在史学组织的努力和塑造下，菲律宾人对于1896年菲律宾革命的记忆通过各种纪念方式在不断强化，而这种记忆也成为菲律宾人民的共同的集体记忆，成为菲律宾不断追溯或凝聚其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件，成为“菲律宾现代历史的根源”。以1896年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契机，一些菲律宾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重新书写菲律宾历史，体现了冷战后菲律宾社会的“全球化”环境。³在地方史研究的推广和拓展中，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和菲律宾国家历史

1 美国部分历史学家，尤其是曾经历过殖民时代并坚持进行殖民书写的历史学家，尝试利用不团结的问题来证明美国干预菲律宾人民事务的合理性。因而，在对1896年菲律宾革命的书写中，他们试图将之视为一场地方起义，并着重强调菲律宾社会的不同利益。John A. Larkin, “The Place of Local History i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p. 311.

2 Onofre Dizon Corpuz, “Western Colonisation and the Filipino Respons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3, No. 1, 1962, pp. 22–23.

3 Michiyo Yoneno-Reyes,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and Colonial Discourse: Eight Selected Essays on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by Yoshiko Nagano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ichiyo Yoneno-Rey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7, p. 6,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8zt322fw>, 访问日期：2024年9月27日。

委员会，这两个具有官方性质的机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开展各种项目，将历史带入马尼拉大都会以外的地区、菲律宾的偏远地区，丰富了他们对菲律宾历史的了解并提高了他们作为历史教师的能力，以及尝试通过开发地方历史资源以拓宽国家历史视野，提升其公正性。¹

第五，菲律宾史学组织还进一步促进了菲律宾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彰显了菲律宾历史的独特性，为菲律宾史学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积极支持。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菲律宾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史学研究中，菲律宾民族史学研究同样具有第三世界史学的一般特征，但是由于菲律宾国家独立时间不长，加之其在世界中的影响不大，其史学并未受到国际史学界过多的关注。然而，随着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民族史学的独特性日益彰显，其民族史学在第三世界民族史学乃至国际史学中的特色也更为明显。如何将菲律宾民族史学和国际史学结合起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针对20世纪70年代后，菲律宾地方史研究呈现出高潮的现象，国外学者也对菲律宾新的史学书写模式很感兴趣。美国学者拉尔金认为，菲律宾历史书写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对农村地区的了解不足，而且“人们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并以统一速度发生变化的整体结构”的理念，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以致在菲律宾民族历史的书写中，很难准确判断殖民主义、1896年菲律宾革命和20世纪国家政治等现象对菲律宾社会的影响，因而，对菲律宾农村地区，尤其是地方史的了解就显得异常重要。²此外，拉尔金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聚焦西班牙和美国权威所在地马尼拉地区，只能揭示菲律宾社会的“西方”面貌。历史上将菲律宾与东南亚其他国家联系起来的纽带，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农民的传统农业生活、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外部影响更为肤浅的接受，以及对家庭和村社忠诚度的高度重视。³菲律宾地方史研究不仅是一种从底层推动整体史学研究和发展的模式，更是菲律宾民族史学与世界史学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

1 Virginia A. Miralao, Joanne B. Agbisit, ed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Capacities,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p. 147.

2 John A. Larkin, "The Place of Local History i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p. 306.

3 John A. Larkin, "The Place of Local History in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p. 307.

结 语

史学组织作为菲律宾民族史学产生、发展、演变的一种载体，不仅是凝聚历史学家推动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的平台，更是菲律宾政府促进菲律宾社会团结和民族身份构建的重要动力。从历史中寻找菲律宾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开展各项历史活动促进菲律宾社会团结和民族进步，以历史为工具解决菲律宾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成为菲律宾史学组织在菲律宾民族社会建设中的自觉使命。无论是推动菲律宾政府社会政策的宣传和实施，还是对菲律宾历史文化进行自觉发掘和拓展，菲律宾史学组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拼凑”出一种独特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以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呈现整个民族史学的全貌，更尝试以一种新颖的史学书写模式来回应菲律宾史学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

纵观菲律宾史学的发展历程，史学组织作为菲律宾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一个经历者，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菲律宾民族史学发展早期，史学组织作为民族主义发展下菲律宾的一个缩影，从否定“他者书写”到提倡并追求“自我历史”，从在美国政策下“保护历史遗迹”到自觉“珍视历史”，体现了菲律宾社会从被殖民到独立的抗争精神。在菲律宾重建时期，史学研究机构的改组和成立（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充分彰显了政府在菲律宾国民经济重建时期对史学研究的重视，也突出了菲律宾史学在该时期的快速发展。在亟待构建民族身份时期，史学组织和组织团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极大地从历史中挖掘和发现菲律宾文化，对菲律宾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进行宣传，这些对独立后菲律宾民族身份的构建和民族自豪感的增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尹蒙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Contents and Abstracts

1. Paradigm Shifts in Germa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Yang Yixuan, Zhang Jun

Abstract: Due to the brief duration and limited scope of Germany's colonial history, the study of German colonial history has long occupied a marginal position with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The trajectory of Germa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can largely be seen as a microcosm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Before the 1970s, nationalist myth narratives dominated the historical explanatory models in We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However, since Germany began its colonial pursuits in 1884, unti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70s,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reflected various pha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completed a shift from a "top-down" to a "bottom-up"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 After the 1980s, the introduction of postcolonial theory provided new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field of German colonialism,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 postcolonial turn in Germa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dditionally, the growing maturity and visibility of German colonial historiography have broadened the concept of colonialism, paving a new historical path for the study of imperial history and even the research on Nazism in modern German history.

Keywords: Germany;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German Historiography

2.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Historical Knowledge: A German Case

Yu Peiyun

Abstract: In a basic sense, history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are not natural categories of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and expressing empirical content such as materials and codes of human past life. In its original form, "understanding the past" does not mean a specific form of historicity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Historiographical form and historicity themselves are the result and produc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is result and is fixed in academic form. In the German-speaking worl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ocialization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German ide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formed a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k*). After that, the "World War II" broke the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of German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ory. As a representative theorist after the war, Jörn Rüsen negated J. G. Droysen'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 and shaped a new for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four theme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istoricism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evolution and restatement of ideas from ontology to epistemology, from empiricism to categories,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as been modernized and fits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form, thereby restor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history. However, in his criticism of Droysen's thought, in his study of concepts such a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life world, Rüsen did not completely deny and abandon the idealist interpretation method. The ideal and spiritual elements were retained in Lüssen'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a modern form.

Keywords: Historiographical Form;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k*); J. G. Droysen; Jörn Rüsen; Historicism

3. Toward General History: The German Landscap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Fan Dinglia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knowledge has experienced a gradual evolu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By incorporating research resources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concept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stable presence in 21st-century German historiography. This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enriched German historians'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knowledge itself but has also facilitated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German history since 1800, serving as both a research probe and a reflective impetus. In contrast to the intellectual flourishing and methodological openness observed in this field, research in history of knowled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nd unstable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Numerous issues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are being investigated under various auspices and methodologies, and these inquiries are often met with diverse critiques.

Keywords: Germa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Knowledg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4.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 in Modern Italy

Xin Meili

Abstract: Prior to the Risorgimento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alia" was only a geographical concept, and the Ita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Italians", were the result of constructs. As the centre of the ancient Roman Empire and the Catholic world, Italy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s a part of the Western whole, forming its unique conception of Europe, which includes nostalgia for the glorious

past of the Roman Empire, self-confidence in its own “advanced” civilization and splendid culture, and also tiredness of the fragmentation and foreign intrusion. However, it did not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Ita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to a certain extent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nation-state. From Dante,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to Mazzini, Cavour and De Gasperi, Italian thinkers and politicians have tried to construct the Italian nation and “Italia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mpire” or “Europe” as a whole, and to realize the recovery of their own nation with the help of European power. Historically, the Ita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European concept have been both interdependent and insepar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contradiction, struggle and dissolution.

Keywords: Italy; Europ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mpire

5. 20th Century Ital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Huang Lu

Abstract: Ital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beg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the relevant interpretations of Labriola, Croce, Gentile and others,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cludes a doubl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However, Croce and Gentile made seriou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prompted Gramsci to try to restor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put forward a practical philosophical historical view of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action. Gramsci’s relevant propositions have suggested the basic theoretical purpose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for the practice of Ital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ince the 1950s, Ital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political history path with themes such as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o a social science orientation such as soci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To this day, it still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Keywords: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oce; Gramsci

6. The Study of Rus’ in Anglo-American Historiography: Knowledge Traditions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s

Zhou Houqin

Abstract: Rus’ was a significant early state on the medieval East European plain, serving as a common origin for the Russian, Ukrainian, and Belarusian peoples. Si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has been a contentious debate over the heritage of Ancient Rus’ among Russia, Belarus, and Ukraine.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ynamics shift, particularly with the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the

history of Rus'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in Slavic studies within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ic community. The study of Rus' in this context has a century-long tradition, initially shaped by both émigré historians and Anglo-American scholars,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e Byzantine influence. Howev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influenced deeply by global history, The study of Rus' in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y has taken a "global turn".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ctively incorporates Rus' into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Middle Ages", employing innovative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ologies to explore new areas such as Rus' materi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even engaging in "counterfactu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Their work aims to reevaluate the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Rus' with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the Nordic regions, and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to reconsider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Rus' within the medieval world. This not only helps to dismantle the "Western-centric" barriers that place Rus' within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but also reflects on the profound impacts of Imperial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iography. Moreover, it aids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eval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world and provides a more objective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Russo-Ukrainian relations and changes in global conditions.

Keywords: Rus'; Anglo-American Historiography; Global Middle Ages

7. The Petersburg-Leningrad School among Soviet Social Historians

Mikhail Viktorovich Khodyakov, trans by Yan Minxiang

Abstract: The St. Petersburg-Leningrad School of History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historiography dating back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s still active on today's world stage of historiography. The school has been continuously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and USSR sinc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 Petersburg-Leningrad School of History's study of Soviet soci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e emphasis that scholars of the school have placed on the analysis and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archives.

Keywords: St. Petersburg School of History; Leningrad School of History; Sovietology;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8.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Yao Hanchang

Abstract: The predecessor of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ise of Antiquity in Britain in the 16th century. William Camden's *Britannia* published in 1586 was the first book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remains of the Roman Britain period. After several centuries of development,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became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Haverfield, the "father of modern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discipline was further develop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archaeologists such as Collingwood and Wheeler. Finally, Oxford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Professor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1956, and Collingwood’s student Richmond served as the first professor of the chair, which marked that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oman Britain period in British history and the relatively poor documentary materials related to this period,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has a special status, that is,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Britai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is discipline,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ystem by nar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Keywords: Roman Britain of Archaeology; Haverfield; “Romanization”; Hadrian’s Wall

9. The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of Caribbean Regional History

Tao Wany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six volum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review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aribbean regio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focusing on the dominant colonial and decolonization histories, with additional references to pre-colon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which were the strengths of the book. The shortcomings of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were manifested in the dilution or neglect of the equally common histories of the sea, the history of epidemics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All these fields had produced most of the academic hot spots and frontier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region, which are the research basis for both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region.

Key words: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Region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0.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Ech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Animal History Research

Liu Xiaochen, Bao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animal history research. Animal history emerged in the mid to late 20th century, gradually forming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with the rise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sm. The article compares animal history with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the history of zoology and animal studies, elucid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 history and different historical fields lik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It also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imal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definitions,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ologies. Animal history research encourages a re-examination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and non-human worlds.

Keywords: Animal History; Animal Studi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thropocentrism; Interdisciplinary

11. Women's Work and Economic Status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Huang Jiaxin

Abstrac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England originated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cholars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upper-class women to ordinary working women in the lower classes of society, try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 status of ordinary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gradually reached its peak. One group of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 late Middle Ages was the "golden ag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conomy. Another group of scholars hold an opposing view, firmly believing that women at this time were still economically marginalized. Enter the 21st century, the academia's attention to this controversy had diminished, but many works still indirectly respond to it. Due to the use of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some new research cores and trends had emerged in works related to women's economic activities.

Keywords: Late Medieval England; Women's Economic Status; Golden Age; Domestic Economy; Social Transformation

12. From refusal to acceptance: The study of Umayyad history and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Muslim tradition

Zhao Lin

Abstract: To study the early Islamic history by using Arab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tudy" Muslim tradi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rigorously, and can neither "accept" nor "exclude" Muslim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ompletely. When the Western academic community studied early Islamic history including Umayyad dynasty, it was relatively cautious about whether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hould be adopted. Umayyads were always shown in a negative way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owever, in the subsequent rational research, it became less unbearable and its secular behavior kept pace with times. This causes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questioning of the objectivity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addition, it is difficult to trac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uslim tradition, and opinions on people and events ar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religious ideology,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ubjectivity.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discussions, the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literature generally shifted from refusing to accepting with criticism. This inspires Chinese scholar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way early Islamic history is studied.

Keywords: Muslim; Early Islamic History; Traditional literature; Umayyad

13.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Liang Daoyuan, Kahaer Alimu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is 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exchange in Arab World.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branches of the history of 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ographic conscious of ancient Arab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gestation, ambiguity, clarity, and self-awareness, and then forming a systematic and specific writing of historiography. al-Sakhawī's *al-I'lān bi-al-Tawbīkh li-man dhamma Ahl al-Tawrīkh* defended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t is the best historiographical work of the ancient Arab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emerged in the west. Not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rab scholars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in the west transitioned from listing the catalogues of historians' works to discuss historians' biographies and works, as well a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west took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Franz Rosenthal's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is the best work in this field. Shakir Mustafa's *al-Tārīkh al-'Arabī wa-al-Mu'arrikhūn* (4 vo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sterpiece in this period in Arab World. Not until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Zhao Junl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Medieval Arab" is a pioneering work in this fiel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rab scholars have been striv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west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ical research, publishing hundreds of works and thousands of papers.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works on Arabic historiography written in Western languages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s rising. In the early 2020s, Chinese scholars' symbol work in this field is *The Summary of Ancient Arabic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they need to put in more effort.

Keyword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abic Historiography; The Arabic Historiographical Circle;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Circle; The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Circle

14.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y Research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19–2023)

Dong Ziyun

Abstract: From 2019 to 2023, Chinese French history researcher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curing national project funding and publishing papers, monographs and translation wor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mainly four aspects: wide research fields,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hig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active young scholars.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the past five years has not fully covered such fields as the history of the Capetian and Valois dynastie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Ancien Régime France, the early history of Sino-French relation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Nonetheless, through a review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 can optimistically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research on French history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ts research fields and reach new heights.

Keywords: France; History of France; Middle Ages; Modern France; Contemporary France

15.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Wri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Organizations

Yin Mengmeng

Abstract: As emerged from the resistance to colonial rule, the Philippine historian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a big debate on the origin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y and trying to write a “self-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writing of “self-history”, nationalism and country independence have become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urse of Philippin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historians hav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organiz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one hand, the historical organiz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dertake the professional func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grating history into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shouldering the strong mission of integrating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to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iograph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Philippine historiography organizations shown the evolution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writing model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denying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others” to advocating “self-history”, exploring local history to promot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ctively communicating with world historiography, forming the uniqueness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trying to seek the conscious positioning of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world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Organization; Philippine National Archives; Loc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Writing

· 作者简介 ·

杨怡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殖民史。

张骏，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西方史学理论。在《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史林》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尉佩云，山西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波鸿鲁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入选山西大学“文瀛青年学者”人才计划。兼任巴西《史学史》（*História da Historiografia*）杂志客座编辑、中国德国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尤其关注德国史学思想的现代转型及相关的理论演变与社会功能问题；以及德国“战后一代”史家群体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哲学》《史学月刊》《中华读书报》等核心刊物、报纸上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民族意志视野下德国历史理论的变迁研究”），参与国际学术合作项目两项。

范丁梁，德国特里尔大学近现代史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史学史和德国现当代史，重点关注历史知识生产、史学现代转型、历史意识和历史文化等问题。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抉择》，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核心期刊和重要报纸上发表论文十多篇。曾获2020年“第四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人文科学组一

等奖，2020年上海市教学能手，2023年“第三届上海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信美利，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Firenze）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意大利近现代史，在《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等学术期刊（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文章）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

黄璐，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曾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访问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意大利史学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近年来主持教育部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两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国家民委环黑海研究中心研究员，致力于俄国中世纪史、俄国政治史、俄国史学史及环黑海研究。著有《从城邦到帝国：俄国专制君主制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曾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主持在研国家社科项目一项，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多项。

霍佳科夫·米哈伊尔·维克托洛维奇（Ходяков Михаил Викторович），历史学博士，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历史学院现代俄国史教研室主任。苏联史研究权威期刊《现代俄国史》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俄国革命、内战史，苏俄早期工业史，苏联卫国战争史，中东铁路史。著有《俄国革命及内战时期的货币（1917—1920）》《苏联卫国战争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内务部战俘营中的外国战俘（1944—1949）》《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战线上的军事法庭》等著作，其中《俄国革命及内战时期的货币（1917—1920）》一书多次再版，并在2014年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译本。主编多套

苏联史相关档案集，同时著有多本苏联史教材。

姚汉昌，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史林》《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新史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陶万勇，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师资博士后，曾赴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学习交流，研究方向为加勒比区域史、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国的拉美史研究。出版译著一部，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史林》《经济社会史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篇，目前参与一项安徽省重点项目。

刘晓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访问学者。在《圣彼得堡大学学报》《中共党史研究》《史林》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包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师范）2019级学生。

黄嘉欣，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流动站博士后，2023年获上海市“超级博士后”。师从著名史家向荣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世纪晚期英国史，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史、政治社会史和妇女史感兴趣。目前在《古代文明》《光明日报》《经济社会史评论》《历史教学》《新史学》《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合作翻译《中世纪的模型：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理论》一书。

赵琳，世界史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获世界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世纪中东史、中东社会史、伊拉克史学史。先后赴埃及开罗大学（2007—2008）、美国印第安纳大学（2013—2015）学习。主要论文有《阿拉伯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学转向：阿里·瓦尔迪历史社会学思想及其影响析论》《1979年后的伊朗人口政策：嬗变、机制与困境》，另有译文和译著各一部。主持完成2021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倭马亚王朝历史兴衰中的部落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1XJC770009），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二项。

梁道远，1987年生，广西合浦县人，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长期专注于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理论的探索。代表性论文有《古代阿拉伯史学史的分期及其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阿拉伯通史编纂的形成、发展与特点》（《光明日报》2022年2月21日第14版）和《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嬗变》（《史学月刊》2024年第9期）等。已出版著作《古代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目录》（独著）、两卷本《古代阿拉伯族谱学家及其著作提要》（第一作者）和《阿拉伯文化史》（参著）等。主编“古代阿拉伯史学文献提要丛书”和“中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丛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已结项）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一项（在研）。

卡哈尔·阿里木，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阿拉伯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阿拉伯史学史。

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根特大学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中世纪史、法律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The Senses and Society*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译著十余部。入选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成果两次获浙江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尹蒙蒙，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现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美菲关系史、菲律宾史学史。曾先后赴菲律宾圣·路易斯大学（2014）、美国范德堡大学（2017—2018）访学。近年来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东南亚研究》《历史教学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省级课题二项，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五项。